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三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

——为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

（一）国民党改组问题

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划，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着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亦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着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

（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S·Y·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给。

（d）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二）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协定关税制，税则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制〔致〕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

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

题，吾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

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放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排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彻，然我们断然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

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知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

委员长：T·S·Chen（陈独秀）

秘　书：Lec·DrchanLunp（罗章龙）

国民党改组问题*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孙 中 山

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改组问题。我们自办同盟会以来，有很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就是把满洲政府推倒。但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坏虽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数反革命派即以此为口实，而攻击革命党，谓只有破坏能力，而无建设能力。此种话我们革命党虽不肯承认，然事实上确是如此，这都是因为我们破坏后没有机会来建设。我们秉政时的南京政府，只得三个月。到了北京政府的时候，政权都归于反革命党手内，此后革命党在政治上就没有建设的机会；不仅如此，且至于逃亡海外，在自己领土之内不能立足。自民国成立后，政权皆操之反革命派手内，故虽革命党对于政治上、社会上做了种种的破坏，而苦于无机会从事建设。故从各方面看来，中国自革命后并无进步，反为退步。但此并非革命党之初心，今人民皆以此归咎于革命党，我党亦不能不受。在满清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党之奋斗，重在宣传其主义于全国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切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视革命二字为神圣；成功后不能如其所期，顿使失望。此种事实，谁负其责？革命党不能不负其责，人民以各种痛苦归咎于我们，我们实难辞其责。要皆由于所用方法不对。

今回想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牺牲性命，为国效力，艰难冒险，努力奋斗，故能成功。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以成。而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何啻数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乃此辈反革命派——即旧官僚——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反破坏革命党，故把革命事业弄坏，实因我们方法不善。若有办法有团体来防范之，用对待满清之方法对待之，则反革命派当无所施其伎俩。俄国有个革命同志曾对我言，谓中国反革命派之聪明本事，俄国反革命派实望尘莫及。俄之反革命派为官僚与知识阶级，当革命党发难时，均相率逃诸外国，故俄国革命党能成功。而中国的反革命派，聪明绝顶，不仅不逃避，反来加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而革命党人流离转徙，几至消灭；到了今日，只西南数省为一片干净土，余均为反革命所得。由此观之，革命党有力量推倒满清，使反对者投于革命党之旗帜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坏而不觉，虽至失败，尚不知其所以失败的缘由。若当时有办法，有团体，先事防范，继续努力奋斗下去，建设起来，则只需三年之时期，其

---

* 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效果已颇有可观，决不至如今日之一无成绩。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方才俄国朋友对我所说的话，乃是旁观者清，当局的人尚设想不到。但俄之反革命派，并非真正不如中国反革命派之聪明厉害，且百倍过之，特俄国革命党之聪明厉害，又百倍过于彼辈耳！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遂令反对派得尽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方法以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虽迟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仍失败。

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来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此即为今后之第一大希望。此次改组，即本此意。改组之能成功与否，全凭各同志之能否负责联络与努力奋斗而定之。若能如此，则中国事业大有可为。我国人民身受十三年的痛苦，吾党此次应在最短时期内解放之，将国家障碍完全消灭。此次改组，各种办法，已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许久，今提出"中国国民党宣言"案，请秘书长将原文朗读。

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发表后，应大家同负责任。诸君系本党各省代表，宣言通过后，须要负责回各省报告宣传。此宣传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并应使之实现。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四年一月）

一　中国之现状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复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追随本党总理孙先生之后，知非颠复满洲，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为国民前驱；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满洲颠复之举，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复满洲而已，乃在于颠复满洲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试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

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民所为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傍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谓生路者果如何乎？国内各党派以至于个人暨外国人，多有拟议及此者，试简单归纳各种拟议，以一评骘其当否，而分述于下。

一曰立宪派。此派之拟议，以为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无法，苟能借宪法以谋统一，则分崩离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尔者，曹锟以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借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具矣，而其所为，乃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宪法之先决问题，首先在民众之能拥护宪法与否、舍本求末，无有是处。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只知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为宪法而奋斗。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复之后耳。

二曰联省自治派。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之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其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借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于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之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国人一思之也。

三曰和平会议派。国内苦战争久矣，和平会议之说，应之而生。提倡而赞和者，中国人有然，外国人亦有然；果能循此道而得和平，宁非国人之所望？无如其不可能也。何则？构成中国之战祸者，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此互相角立之军阀，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过各军阀间之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此仅军阀之联合，尚不得谓为国家之统一也，民众果何需于此乎？此等和平会议之结果，必无以异于欧战议和所得之结果。列强利益相冲突，使欧洲各小国不得和平统一；中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梗也。至于知调和之不可能，而惟冀各派之势力保持均衡，使不相冲突，以苟安于一时者，则更为梦想。何则？盖事实上不能禁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结果，不能不

出于战争，出于掠夺。盖掠夺于邻省，较之掠夺于本省为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为此说者，盖鉴于今日之祸，由军阀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资本家起而代之也。虽然，军阀官僚所以为民众厌恶者，以其不能代表民众也，商人独能代表民众利益乎？此当知者一也。军阀政府托命于外人，而其恶益著，民众之恶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于外人，则亦一邱之貉而已，此所当知者二也。故吾人虽不反对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且其政府必为独立的不求助于外人，而惟恃全体平民自己之意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种拟议，虽或出于救国之诚意，然终为空谈；其甚者则本无诚意，而徒出于恶意的讥评而已。

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详阐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

二　国民党之主义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此次毅然改组，于组织及纪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党员各尽所能，努力奋斗，以求主义之贯彻。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孙先生之演说，及此次大会孙先生对于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言之綦详。兹综合之，对于三民主义为郑重之阐明。盖必了然于此主义之真释，然后对于中国之现状而谋救济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据也。

（一）民族主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帝国主义受民族主义运动之打击而有所削弱，则此多数之民众，即能因而发展其组织，且从而巩固之，以备继续之斗争，此则国民党能于事实上证明之者。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毁无余，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二）民权主义。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也。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三）民生主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犹有当为农民告者：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

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为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俾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唯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根据，能为全国国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三　国民党之政纲

吾人于党纲故悉力以求贯彻，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一步之救济方法。谨列举具体要求，作为政纲。凡中国以内，有能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与明辨而公行之。

甲、对外政策

（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对内政策

（一）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

各县之天然富源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

各县对于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过于百分之五十。

（四）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厘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七）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

（八）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

（九）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查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十）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一）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二）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十三）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四）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

（十五）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以上所举细目，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中国革命史之第二篇

（一九二四年一月）

瞿 秋 白

中国自有思想革命以来，已经有不少主义：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等等。这许多主义所以发生的原因，都是对于旧社会不满意，想另外找出一个理想的社会来补救的。但这些主义都是从外国裨贩而来，是理想的和抽象的。究竟在中国能够发生什么影响和关系，尚是一个问题。

新思想所以在最近发生原故，并不是五六年前的人如此呆笨，五六年后忽然聪明起来，这完全是由于中国经济变动，由此意志而变动，便有所谓新主义输入。至于三民主义的发生，是完全由于中国现实经济状况而起的，是中国已需要此种主义完全与外来的乌托邦说不同。三民主义与基尔特主义等的分别，因为一个是中国经济情形本身有此种要求而发生，一个是空想的和理论的。三民主义本是一个极简单而毫不费解的主义，因为有外国的压迫和欺凌，故首先有民族主义。试看中国所有商埠，一切都在外人的掌握，许多政治上的大权，都操自外人，所有铁路矿山完全为外人经营，关税盐税都由外人监督。在如此情形之下，我们即使有心和帝国主义者讲交情，试问有何方法？所以提倡民族主义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并不用何种高深理想。

因外人的侵略而发生种种影响，中国的旧经济与外国的资本主义相接触，使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不得不起变化，汉阳铁厂和各处工厂随之而起，引起政治上极大的变动，满清政府不能不放弃政权。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如华侨，商会，新军，如游民，会匪，都是新旧经济力量交替消长之间所生出来的新现象；他们有意的或无意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自然而然要反抗满清政府。这种平民反抗专制政府，可说是民权主义发生的原因。

这两主义是很明白的，无论何人对于反对外国反对满清专制，是没有不赞成的。但是运动中间，有军阀官僚的分子，利用人民的心理，来制造自己的地位。平民的意思决不是推倒满清之后便欢迎一般军阀官僚若袁世凯等，他们所要求的是一切事业的发达，生活的安定，及自己权利的保障。因外国之经济压迫，军阀之政治扰乱，无从保障平民的生活，当然要发生民生主义的要求。所以在如此情形之下，发生三民主义，并不是一桩奇怪的事，是很平常的。但是三民主义的意义在十年前却非常之幼稚，这是因为社会里的革命力还没有十分养成；当时的三民主义，仅仅隐约的代表一般平民的政治要求及经济要求，三民主义之明晰的程度当随此革命实力的增长而日益深入。——却并不在学说的精湛不精湛。

现在已是民国十三年，在过去十三年之中，因为一天一天的经验，三民主义渐渐明了

了。在辛亥时候，所谓三民主义只是民族主义，而且所谓民族主义，只知排满，不知排及外国人，其余民生民权更不用说了。辛亥革命排满主义虽说是达到，然压迫中国的外国人仍在，三民主义可说始终不曾达到。中国平民必须经过这十三年斗争的苦经验，才能明白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的意义很简单，是使中国成为独立的，不受外国压迫的。话虽然易说，但事实上却不容易，民生民权不达到，则民族主义亦不能达到。因为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得到政权，则政权必落在军阀手里，他们必然勾结列强以压人民。故民权主义不到，民族主义亦不能达到。再则即使所谓人民能得到政权，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全体人民——政权落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试问资本家能代表人民不能，他们有资本有公司与外人贸易，止求其个人有利益，更何惜牺牲多数人幸福，而另冤出卖中国。资本家利用金钱及一切手段，甚至于学术机关，以争取政权，自私自利剥削平民，此等政府如何能代表中国民族？所以民生主义不达到，民族主义断乎不能达到的。

如此说来，三民主义是整个的，是浑然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必完全达到三民主义，然后可以说革命成功。在三民主义未达到以前只有革命。所以三民主义的定义是很简单的，并不是个乌托邦新社会，是由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要求，才产生这三个革命原则：

民族主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世界各民族的平等；

民权主义：——中国平民群众的政权，使政府真能代表全民族；

民生主义：——中国最大多数民家（工人农民）的生活之保障，使有真正参政之可能，使得到从事于征取经济权之一切必要条件。

既然不是一种空想的社会，而是现实的革命原则，就不能当他是一种固定的制度，却要人去实行。这种革命原则，我们可以当他是平民意志的结晶，是平民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农民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意志之表示。

既然如此，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的一种口号，是从事革命的目标，是平民组织团结力量以达到革命的旗帜。研究三民主义，并不是合理不合理，与理想高明不高明的问题。三民主义达到不达到，完全看我们平民力量与军阀势力之消长如何，平民力量大一份，三民主义也达到一份；反转过来说，军阀势力大一份，三民主义亦少得一份，我们在今日只有努力革命，至于何日可以完全达到，我们暂时可以不必问。更不必说最理想的社会。——反正在中国的现状，总不是什么理想社会；第一步必须先打破现状，而三民主义便是最切近于这现实需要的。三民主义的实现，完全靠我们革命的力量，向反革命派进攻。国民党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代表全中国平民的利益的，所以能组织平民，集中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作战，这是国民党应有的责任，也是平民应有的责任。

革命的力量何在？在于组织。一吨铁若没有造成什么机械是丝毫没有力量的；若变成一部机器——就是融化锻炼之后，使一部分变成镞钉，一部分变成齿轮，装置起来，——虽然仍旧是一吨铁，然而他的力量，却狠大的了。农人工人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若不组织起来，则仍然一盘散沙，没有丝毫实力。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情绪，革命的意志，在平民之间是现成的；必须组织他，集中他，他才能变成一种势力。这种组织的工作，是国民党的责任。青年及工人农民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也应加入，以从事于反抗军阀列强的行动，这是平民的责任。平民应当以国民党为工具，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国民党为先锋，领导自己的斗争；加入国民党是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并不是国民党利用我们。平民何必要组织？

因为平民的仇敌，组织得厉害，帝国主义，用赔款买去许多留学生，收买中国教育：军阀养一班政客策士压制我们，试看他们的组织何等精密！他们决不单靠兵力扰乱或侵略；财政上，外交上，交通上，教育上处处都是他们的剥削手段，仇敌已然有如许大的力量，我们平民力量是有限的。他们有枪炮有军队有警察可以指挥，最后一着便是武力解决。我们如果不将国民党办好，使成为一有力量的团体，去和列强军阀对抗，三民主义是永远不能达到的。

我们知道以前已有许多运动，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安徽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结的——可以说是无意之中自然而起的国民革命运动。如今我们各方面渐渐集中，——革命势力的数量日增，质量也就渐变，——我们便有意的来指导组织并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了。有意的与无意的运动，有很重要的异点。以前的运动是各自运动，是本能的运动，而且是无意的运动：——心上明明要反对帝制却说是光复，明明需要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却说是提倡国货以抵制日货，明明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却想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主持人道正义。现在呢？认真组织起来，做全国大规模的各方面，各部分互相关联的有意识的斗争。于是中国革命史的第二篇开始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便是这第二篇的第一页，因为他表示很明显的革命原则，及决心改组的意志；这就是开始集中中国革命势力，以从事于有意识的彻底的斗争。大会有这样的责任，可从大会宣言中看出来。大会宣言是以前所没有的；三民主义因此得有良好的界说，是数十万国民党员共同意志的第一次表现。无论何人皆由此同一目的做去，违反宣言的，便不是国民党员。其次宣言里有一般平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国民党对现在政治的政纲，从前国民党只注意军事，而不注重其他，现在则全中国的国民党员，都有一致对于政治经济的要求，用此去运动宣传平民群众，使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有力的中心。再其次宣言明白说出国民党力量在于农民工人身上。

以前国民党的力量，不过少数人的奋斗，其余都不管；以前以为可用兵力征服民敌之后，再来按步就班的照着书上写好的计划办理，现在却已经知道三民主义是平民自己的要求，当将平民实力组织运用，使在斗争的过程里，炼出实行主义的力量来；而革命军呢？仅仅是平民力量中之一种特殊形式而已。

（原载1924年1月《民国日报》特刊）

评 国 民 党 政 纲

（一九二四年二月）

恽 代 英*

一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是此次全国国民党代表大会发表了他们的政纲；其中包含对外政策七条，对内政策十六条，他们认这为“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中国的青年，因为本来不知政党的重要，又加以受了一般反动的旧思想所鼓惑，一听见党的名字便害怕。他们不肯协助人，因为他们是不愿受人利用的。他们不肯赞成任何积极的主张，因为他们是不愿沾染色彩的。他们只知嬉笑怒骂，只知零碎敷衍的做一点他们所认为好的事情。他们宁可听中国人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宁可听中国人是这样的永远软服于军阀与外人势力之下；他们不愿团结在一个有正确明了主张的政党之下。所以这一次国民党改组，必定仍是有许多人不肯理会他。

自然国民党亦是有应得之咎的。第一，国民党以前不甚注意对民众解释他的主张。第二，国民党虽曾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党纲，然对于时局不曾发表过他们最切近而具体的要求。第三，国民党以前组织与纪律颇多缺点，所以因为党员每有逾越常轨的行事，致令人家疑惑他们所有党纲只是空谈。

然而可以注意的，这些错误，国民党都已经自己承认。在这一次广州举行的大会中，已将组织大加改良，而且极力整顿纪律。他们所发表的政纲，有不少可以供我们研究之处。

为篇幅所限制，我只能于介绍他们的党纲以后，略附我个人的意见，以引起大家讨论。

以下列举他们的对外政策原文：

“（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亦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窃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

---

* 恽代英同志这篇文章是用笔名“但一”发表的。——编者

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以上七条，前三条是关于修正条约的事，后四条是关于清偿外债的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屡遭挫辱，满清政府愚弱不知外交，至使列强得乘以劫制中国，订定许多不利的条约，以束缚中国的发展。如租借既成为变形的割让，复因外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不受中国法庭判决，致使坐视外人私运军火，助长匪乱，无法加以遏制。海关税则，复须受外人协定的约束，不能视自国的利益以为变改；而海关主权亦旁落于客卿之手，税款的拨付，全成了客卿独揽的大权。以上各种条约，及其他有损我国利益的条约，我们必须根本反对，否认其有效力。中国的人忍受此等条约，为日已久；国民党此次竟能毅然以废止修正为己任，不能不说是可以敬服的事。

外债数目，现约共十八万万元。其中除交通部欠电政路政外债五万万余元，因军阀截款，及办事人私肥，至于无法清偿以外；财政部所借款，由甲午赔款所起的俄法，英德，英德续借款，及庚子赔款，除历年摊还不计外，合共尚将欠九万万元。庚子赔款，最为非法的勒索；有人心的外国人，久倡归还之议，国民党不认有支付此款于外国的义务，实为合当。我们所负外债，为数既已甚巨，非法政府的借款，当然应与否认，以减轻国民的负担。

我对于庚子赔款完全划作教育经费，还未敢表同情。这种办法，自然是教育界所希望能实现的。但是我们中国今天，与其说"教"重要，不如说"富"更重要。我以为划出庚子赔款，作修路浚河之资，受益的人必然比办教育还多十倍。我亦赞成我们应当注重一般农人工人的公民教育，但我以为若只是花费巨款去办些粉饰太平的学校，还至少不是中国今天必要的事。

对于召集各种团体会议以偿还外债，我略有一点怀疑。中国在政治革新以后，第一件事必须多有资金，兴办实业；所以在那时或许尚须以不丧失主权的条件，借外国资本。即令不借外国资本，我们亦必不能让自国资本，因偿债之故，反转流出国外。所以我以为召集会议偿还外债，未必是一件合当的事。我想，或者革命过后，暂时须将外债本利，延期交纳；否亦必须减轻利息，延缓还本。我以为第四条规定偿还外债，总要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这种预定的范围，十分妥当。

我以上所说的，只是将我个人所赞成或怀疑的叙明。我很望所赞成的地方，将成为一般青年所信仰拥护；所怀疑的地方，国民党或可以有相当的解释，否则将来有更完善的修改。我相信国民党只要能常抱着这种切实，这种向上的热诚做上去，只要他们三十万党员都能这样做上去，他们必然还要进步，以至于完全能担负中国改造的责任。

关于对内的政策，在次期亦将介绍原文而加以评论。

请大家注意，下列是国民党最近发表政纲中之十六条对内政策，我们试研究他的主张是否值得尊重。

他的原文是：

"（一）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

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

“各县之天然利源，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地方均之。

“各县对于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过于百分之五十。

“（四）实行普遍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厘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七）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

“（八）政府当设法安置土匪游民，使为社会有益之工作。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一法，计可以租界交还中国国民后所得之收入，充此用途。此之所谓租界，乃指设有领事裁判之特别地区，发生“国中有国”之特别现象者而言。此种“国中有国”之现象，当在清除之列。至关于外人在租界内住居及营业者，其权利当由国民政府按照中国与外国特行缔结之条约规定之。

“（九）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

“（十）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十一）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二）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三）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十四）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十六）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①

---

① 此条后来被删除，故市上通行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内政策只有十五条。——编者。

以上十六条，很能使人知道国民党预定施政方针。就国民党向来的党纲看，在中国总算是最能有进一步之主张的。可惜以前党员不注意党纲，遂使主张与行动生不起关系来。我相信国民党果能从此以后，仔细研究这些政纲，而且在可能时极力求其实现；那便纵有不十分切合实际地方，自会逐渐修改更进于圆满。要救中国，总不是象这样安于无目的的盲动，所能行得的啊！这一次国民党的改组，令我们十分兴奋；我们只希望国民党真能完成为一个有主义有办法的政党，中国正需要这样一个政党呢！

前三条订明了国家地方间权力的分配，最可注意的是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从下层做的精神。县的自治，要办到官吏由人民选举，亦由人民罢免，人民对议员所议不妥的案件可以复决，对议员所不肯提出的议案可以自己提出议决（创制）。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有真正的政治权力。第三条规定了地方各种收入，除地税公产原为公家收入外，又加入地价增高后的收入，山林，川泽，矿产，水利的收入，以及国家协助兴办的大实业一半的收入，均为地方所有。此等收入，除至多以一半为国税外，余均为地方自治的经费。这样自然教养，以及后列为农民，工人，军官，兵士，土匪，游民的利益所兴办的事业，均可以易于着手。

从第一二条看，可知国民党并非主张中央集权，一般人因为他们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而起的这种误会，实属毫无根据。我以为事务关系有只限于一地方的，应归地方办理；关系各地方或全国的，自应由各地方联合或国家处理之。这样以解释中央及地方权力的分配，或更明确些。

第四五条主张普通选举，可以除去现今只有有钱的人才可被选为议员的毛病；但以考试制度救选举制度之穷，亦须防只有知识阶级的人才可被选为议员的毛病。我亦信考试制度有些好处，只是必须认定不是做文章考高等文官那样的考法；因为那将只有大学或中学生才有资格去与考，那岂非剥夺了无力求学者的应得权利了么？自然将来大学中学的教育，要成为人人可以自由学习的，然最近十余年，怕总没有这种希望罢！我以为议员最要是能代表选举人的利益。将来的选举，不应以地方人口的比例为主，应以职业的类别为主。所以议员只要他有起码的公民知识与知道注意他本职业的利益，便可以被选举。这种起码的公民知识，国家应赶急宣传教化；若用考试只能试验这种起码的公民知识。

第六条规定人民的自由权，要与他们在宣言第二段解释民权主义时所说的话参看。他们在那里曾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今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革命的党，对于反革命的人，有时须杀戮拘禁。若因贪图尊重民权的虚誉，使反革命的人得以自由活动，实为最笨的事。我很赞成国民党这种显明态度。

募兵改为征兵，使人民服兵役，以自卫其利益，亦同时保卫国家，这是消灭游民为兵致无法禁遏其受人利用的最好方法。收回租界，以使游民土匪均有生计，自然还不能够用，不过租界之在中国，不但为一种耻辱，而且私运鸦片与军火，无法加以取缔，自然是应当毅然取消才是。

国民党此次政纲，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的生活，教育，与法律地位；注意安置土

匪游民的工作；注意人民租税负担的减轻；注意民食的均足；注意工人农人的生活及法律地位，而且保障他们的团体；注意妇女青年的利益；这都见国民党已经自任代表国内一切比较被剥夺的民众，真无愧为国民革命的领袖了。下级军官与兵士对于革命的关系，本期增昌君另有文论及。农工与革命的关系，前中夏君亦屡论之。土匪游民，在一般人多认为是没有生活权利的人，他们以为土匪游民，都是因为好吃懒做所造成的。然而他们既不知人民生计一天天窘困，甚至于找不着生计，自易流为土匪游民。流为土匪游民之后，学成懈怠习惯，然而即令要回头亦仍是找不着安定生计，他自然只有安于做土匪游民了。现在生活渐渐不敷的家庭，知道多少？现在闲空着谋了半年一年的事而不曾谋到手的，知道多少？中国若永远听外国资本主义这样剥削中国，外债越深，则人民负担越重：洋货越输入得多，本国农工生计被夺的越众；将来还计算不清有多少土匪游民！读者不要诧异国民党为甚么这样重视土匪游民，中国若再不转机，读者还不知有几多是候补的土匪游民呢！

现在提倡妇女青年利益的文章不少，自然是一件好现象。但可惜以前提倡的人，多只系无力量的个人或团体，他们不知道借重政治的力量；而一般政党，又熟视无睹，任其自生自灭的变化进行。所以这些妇女或青年的利益，终只是纸上的空谈。一切应得的权利，在妇女终不能不为生活而屈服，在青年终不能不为学绩而忍让。他们实际很少几个人能脱出于奴隶的生活，但他们仍是很时髦的在那里做那些空洞无物的自由解放的文章。我愿真有血性的妇女或青年，要认定非政治改革，终无所谓自由解放，要认定非大家加入革命的党，以分途协力的促进政治改革，终无所谓自由解放。所以我愿他们注意国民党的政纲，亦愿国民党要切实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庶以后妇女或青年的自由解放，再不只是那些杂志报张上"以充篇幅"的淡而无味的一些废话。

第十五条是国民党素所提倡的"平均地权"。这种办法，是要使地主报地价于政府；报价太高，则征税重；报价太低，则政府可以廉价收买他。中国的租税，零碎而多由消费的人民担负；例如厘金盐税，贫民担负与富人一样多，自然很不利于贫民。国民党此次政纲，特别注意田赋地税，而主张废除杂税，这可以减轻贫民负担不少，即可以减低生活费用不少。在这民不聊生之时，实为救济的要政。同时国民党主张特别注意田赋，地皮捐，房捐等，使靠租谷或房租富户，多担任租税，以供国用，而减少他们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是最合当的事情。不过我以为还要加入两层，（一）所得税财产税都应注重，以免那些靠放帐，买股票的人没有租税的担负，自然遗产税更宜重征，遗产的无益而不合理，只读马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四语，便可以知道了。（二）征收这些税，均宜用累进率，即是越富的人，纳税的比例越要多些；因为富人便多出几倍的税，并不为难。穷人若要出一样比例的税，如都出十之一的税，为难的就只有穷人了。

国民党要逐渐收买国中大土地，并不许私人经营独占性质的企业（即有专卖垄断性质的），这是国民党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国家最要是使土地工厂成为公有，则可以希望办到凡人都有工做，凡做工的人都有相当的生活。若这些事归私人所有，私人只顾自己谋暂利，则减工资，减工人，及其他一切刻薄掠夺的事，终无法防止，亦便终无以永绝土匪游民的发生。为一劳永逸计，国民党对于大企业，断然应取国营的方针；至土地国有，亦未必定须用收买的法子。

以上所说，是因我对于国民党的希望颇大，所以于诠释之余。亦愿更就所见，补加几层意见。我愿向来只知做抽象的研究功夫的人，亦大家就国民党的政纲讨论一下，或者亦可以大家督促国民党更进步，更完善些。

敬祝改组后的国民党，用你们勇猛实践的精神，使你们的政纲，更值得大家注意。

（原载《中国青年》18、19两期，1924年2月16日出版）

我 们 的 力 量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邓 中 夏

一

中国自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之后，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新式工业经济日益发达，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在这当中也就随之日益发展而长成壮大了。

在初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原不过只欲销售商品和采得原料，本不欲中国新式机器工业有大规模的增进与发达——因这会引起殖民地的工业对宗主国的工业剧烈之竞争对抗，以至于排斥的。所以那时帝国主义只容忍中国本国的“商业资本”之存在，至于本国的“工业资本”，那是他们所引为隐忧引为大患而在所必斥的。

本国的商业资本家渐渐学会组织生产，发展了所谓“家庭工业”（如商店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其织腊帽手套等）和“工厂手工业”（如手机的小工场等），这些小小生产因与帝国主义无多大的妨害，亦为它们相当的容让。

但是，自从鸦片之战以来，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压迫实在太猛了，使得中国不能不起一种“自强御侮”的反感；那时帝国主义者间亦有互相倾轧的裂痕，中国政府得利用这些机会购入机器以制炮造舰，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的“军用工业”。

再则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侵略，除掉投资，还是投资，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故当时铁路投资为各帝国主义者所垂涎欲滴争先恐后的。此外，他们还有采取煤铁和商品输入内地的需要。故借款官营，中国得以兴修铁路及开掘矿山。于是又成就了中国的“交通工业”“煤矿工业”。

随后因机器既已输入，又引起中国本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而兴工制造；并且外国资本利用中国劳力的低廉，原料取携的便利，运输周折的免除，海关定税的减轻，亦宜于在华设厂制造；因此而本国资本的和外国资本的各业制造工厂也就如云而起了。于是终于成就了中国的“制造工业”。

中国的工业是在这些原因上发起来的。虽先为帝国主义所不能容忍，然而终究为投货投资掠夺富源，种种矛盾冲突中，而不得不使中国建立相当的工业。谁知工业化的速度是与无产阶级之长成壮大成正比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公然因三四十年来工业之进展而组成一个雄厚而伟大的队伍，掉转头来便向帝国主义举行背叛，举行反攻，这那里是他们始料所及的事哩。

现在且把我们的力量，先来检查一下。

二

首先检查我们的总人数。

说到这个问额，使我们感到无穷困难的，就是没有精确而完备的统计可资依据。现在只好把比较可靠的略为说说。

先前我们说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六十一万人，这是根据农商部民国七年（1918）的统计估量而定的；可是民国七年到现在又是六年了，这六年之间，工厂增加不少，故我们有时鼓着勇气大胆猜度说：总加至八十万人了。其实这是错的：农商部统计所指六十一万人完全是制造工厂工人，而铁路工，矿工，海员，市政工，码头工，车辆劳动者，农业工人，以及政府直辖的造币厂造船厂兵工厂等工人和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均不包括在内。

据我们最近的考订，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一百八十五万余人（手工业工人当然不在其内，合手工工业工人总人数据农商部民国四年〔1915年〕的统计，是一千余万人）。兹分述于下：

制造工厂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因其时南方护法军兴，川、湘、粤、桂、滇、黔六省无从调查，所以缺而不全。我们现在还是根据民国四年的统计较为完全。该统计民国四年填注的制造工厂工人总数是六十四万八千五百二十四人。民国四年以后，工厂增多无数，现在总人数当然还有增加。

铁路工人

交通部民国八年（1919年）的统计，所有国有各路人员总共是七万三千六百五十一人（外有建筑人员二千二百七十四人未算在内）。现将非工人如会计处九百四十人；车务处的管理员、巡查员等一百六十人，站长六百三十八人，副站长、电报生、车站司事等二千二百七十二人；机务处视察员、段长、工厂工头三百九十七人；养路工程处视察员等七百零七人，共五千一百一十四人除外，加上建筑人员，铁路工人实数总共是七万一千八百一十一人。但有数点须注意的：（一）这里数目仅限国有铁路而言，其余省有的江宁、民有的潮汕等和外国建筑的如南满滇越等尚不在内。（二）就是这数目恐有不尽确实之处，就中如机务处工匠（即铁路附设工厂的工匠）据该表细数长辛店机器厂工人仅填七百四十五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三千人以上的数目相差太远；又该表江岸机器厂工人仅填三百七十二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二千人上下的数目又相差太远。以此类推，其他各项数目当亦有不尽确实的。（三）铁路附设工厂和修路有采用包工制，这些包工，路局是无法按名注册的。所以铁路工人如果一人不漏，当然还有增加。

矿山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是以工数计算，探矿采矿工数总共是四千二百九十九万余人。工数是以一人一日为一工，然而究竟不好从工数推定工人人数，现在是根据该统计民国四年填注的人数为准。探矿工人数是一万六千七百一十一人，采矿工人数是五十一万四

千一百七十四人，合计总人数是五十三万零八百八十五人①。矿山采用包工制的尤多，这些包工亦未计算在内。

海员

无统计可查。因为远洋轮船固然完全为帝国主义者所有，就是沿海及内河轮船亦百分之九十五六是帝国主义者所有，我们何从调查呢。中国远洋轮船只中国邮船公司一家有三艘，现在已卖去了。中国沿海及内河轮船亦只招商局三北公司宁绍公司数三家有数十艘，可惜都无从调查。据深悉海员情形的人说，外国轮船航行远洋的，华籍海员，宁波人约四万以上，广东人约六万以上。假使此话若确，那么加上沿海及内河的海员，总人数当有十五万人。

市政工人

指邮差、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清道夫而言，然而均无调查统计表可考。唯邮差一项，交通部民国十年（1921年）总计，全国邮局共为二千四百所。邮局有管理局，一、二、三等邮局暨邮务支局五等之分，我们假定邮局最低数为五人，那么全国邮差总人数当是一万二千人。码头工，车辆劳动者（人力车在内）这两项如果有统计可察，其数目之大，当更使我们失惊。

农业工人

指用新式机器的农场工人而言，现在亦无从考查。唯据海关册机械类输入农业机器额逐年均有增加，虽然一部分是用之于各省农事试验场及农业学校，其他一部分确为农业资本家用于垦荒及种田，可推知中国农业工人当亦有一个相当的数目。

政府直辖工厂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合计是三万一千八百一十二人。除交通部所管辖之各铁路附设工厂一万零一百七十二人已算入上面铁路工人项下之外，尚余总人数为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人。此外由各省政府设立的工厂工人还不算在内。

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

这种工厂自然完全为外国资本家所有，本国资本家扯洋旗的亦有一点在内。可惜无从调查。唯自“马关条约”订立以后，外商在华设厂逐年增加，据《最近支那经济》所调查，民国二年（1913年）其数已达一百六十六家。民国二年到现在已是十一年了，所增必多无疑。兹举一例证明，如该书所列的纱厂民国二年共是十家，但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民国十年所调查，外商纱厂已达三十六家。又举一例证明，欧战期间，日人在山东、津浦增厂甚多，单就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已为一百三十九家。并且外商工厂，资本皆极雄厚，规模亦皆宏大，其所用的工人往往比华商工厂多。我们姑且假定外商工厂工人总人数只有华商工厂总人数之一半，那末亦当为三十二余人。

列表于下：

---

① 按民国四年五年云南省均未报矿工人数，所以这个全国矿工总人数里不包括云南省的矿工人的数。如以民国三年云南省矿工八万六千六百二十一人計入，则民国五年全国矿工总人数应为六十一万七千五百零六人。——原编者

类别	制造工厂工人							运输工人					矿山工人	市政工人							农业工人	政府直辖工厂工人	外国工厂工人	总计
	织染	机械及器具	化学	饮食物	杂工厂	特别工厂	计	铁路	海员	码头工	车辆劳动者	计		邮差	电灯	电话	电报	自来水	清洁夫	计				
人数	三〇二·六六六人	一六·三六一人	一九·七八九人	一五一·六七七人	三五·〇八五人	一三·〇六三人	六四八·七二五人	七一·八一一人	约一五〇·〇〇〇人			三七一·八一一人	五三〇·八八五人	约一二·〇〇〇人						一二·〇〇〇人		二一·六四〇人	约三二四·三六二人	一·八五九·四二三人

三

再检查我们的组织。

我们自已承认我们的组织还是很幼稚的，但是我们开首组织还不到三年，以这样短的时间，公然能够组织二十七万余人，在向无组织习性的中国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惊的事。虽然自京汉“二七”失败以后，各地不免受了些重大的打击和连带的影响，然而大部分还仍旧存在，不过存在的形式，有些是公开有些是秘密罢了。兹分述于后：

（一）铁路——铁路工人运动是1921年才开始进行的。不到一年，京汉路组织一万三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每站满五十人以上成一分工会，计全路有十六分工会。此路有一特色，就是全路工人概行组织在一个总工会之下。不幸“二七”失败，受打击不小，现在只能秘密的存在一部分罢了。京奉路最先组织的是唐山，其次是山海关，再其次是天津、丰台，现其组织有八千余人，并有成立总工会之进行。津浦路最先组织的为浦镇、浦口，随后蔓延至徐州、泰安、济南、德州、天津，共组织有三千五百余人。京绥路全路概行组织起来了，共有七千余人，微有欠缺的就是机务、车务、大厂分成三部分，尚未统一。正太路全路完全组织，共二千余人，有一总工会。道清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焦作煤矿工人亦有不少加入，原拟附入京汉路总工会之内，后因京汉大罢工失败，不果。陇海路先亦全路完全组织了，因有监工工头参人其中，任工会高级职员，后来这些工贼卖工人的事实层见叠出，工人愤，遂分裂，现尚保存一千余人。粤汉北段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株萍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附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胶济路组织二千九百余人，以四方大厂为中心，青岛港工亦加入在内。粤汉路南段组织一千四百人。广九路组织一千三百余人。广三路组织三百余人。沪宁、沪杭两路因帝国主义防范厉害及工人工资较优，虽有组织，系员司、监工、工头、工人共同组织的，唯最近有四百余纯粹工人秘密另组之进行。南满路最近组织四百人。中东路俄工早已完全组织了，华工组织的已有六百余人。全国铁路已于今年一月在北京举行各路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共计全国路工已经组织的为四万四千八百余人。

（二）海员——海员以广东人宁波人为最多。大概从上海以南至欧美各国，粤籍海员约占五分之三，宁籍海员约占五分之二；从上海以北至天津以及长江一带，几全为宁籍海员，粤籍海员甚少。先前宁籍海员有小组织，名叫“焱盈社”、“保安水手公所”等；粤籍海员亦有小组织，名叫“联益社”、“群义社”等。此外还有“关帝会”、“同心会”种种名目。人数少则五百，多至数千。然而这些组织不离同乡主义和秘密结社的性质，故无甚大用。颇有新式意义的组织，要算是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据说前年大罢工后，会员增至四万五千人。虽组织稍差，近因与印度、日本、菲律宾、爪哇以及西欧各国运输工人颇有联络故感观所激，已有改进之动机。

（三）矿工——中国矿山虽多，唯有全部组织的，只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安源组织有一万二千余人；水口山原组织三千余人，唯去年遭赵恒惕惨杀后，归于停顿了。其余只山东之淄博，直隶之开滦，湖北之大冶，河南之焦作，颇有一部分之组织。淄博约为六千人，开滦约为四千人，大冶约为一千人，焦作约为二百人。合计全国矿工已有组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人。

（四）湖南——城市工人依产业组织而公开存在的，只有湖南。除粤汉株萍路工和安沅水口山矿工已见上外，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纺纱厂，以及机械、电气、印刷、陶器、辗谷、泥木、缝纫、理发、人力车、笔业组成工会十五个；并共同组织一“湖南工团联合会”。合计组织人数二万六千余人。

（五）武汉——武汉新式产业约十余万人，在全国中居第二位。当时已组织的，除京汉、粤汉路工、大冶矿工外，如铜铁、水电、造船、造币厂、煤油栈、染织、棉花、香烟、缝纫、皮鞋、蛋厂、洗衣、电话、牛皮业、人力车、轮驳、调剂、杂货共有工会二十个，并组织一“工团联合会”，合计人数三万二千三百人。唯因京汉大罢工失败的连带影响，亦一部分归停顿了。

（六）上海——上海原为中国工业第一位发达的地方，然而劳动组合却比其他各工业区落后。其原因有二：（一）帝国主义防范周密压迫惨酷；（二）劳动界失业众多，生活恐慌；因此，故工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前。上海劳动运动最盛时代，要算1922年之下季。那时浦东纺织工组织了一万余人，烟草工组织了八千余人，华洋两界金银业工组织了一千余人，但不久而皆因罢工先后摧残殆尽。此后虽有二、三十个工会，多半是一块空招牌罢了；就中只南洋烟草职工会有七千人，机器工会有三千人，粤侨工界联合会八百人，机器工人俱乐部五百人，算是有群众。最近新生的劳动组合，颇有雨后春笋之观，虽多系混合制而非产业制，然已有组织的不下五千余人。总共约一万六千三百人。

（七）粤港——广州和香港工会数目共有二百以上之多，广州原来新式工业甚少，工会多至如此，则他们的组织末脱旧式“行会”性质可知。在政治上比较自由之地，而不利用时机作统一的劳动组合运动，当地有觉悟的工友不能不负其责，该处组织，虽旧虽软弱无力，可是所有工业及手工业工人概行组织起来了。组织人数总共约五万余人。

（八）其他各地——济南组织八千余人，太原组织三千余人，重庆组织六千余人，成都组织一千余人，天津组织五百余人，九江组织二百余人，青岛组织二百余人，大连组织三百余人。合计约三万余人。

列表于下：

铁　　路	44,800人		武　　汉	32,300人
海　　员	45,000人		上　　海	16,300人
矿　　工	26,200人		粤　　港	50,000人
湖　　南	26,000人		其他各地	30,000人
总　　计				270,600人

四

我们的总人数和组织既如上述，由此，我们现在的力量固然可以征验，就是我们将来的力量亦不难推测了。至于我们力量的试验与表现，在此数年内已经有许多战斗的事实（他日再详述之。）可以证明；我们不敢夸张我们的力量已可与欧美产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絜长比短，然而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比较起来，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罢。

不幸自去年二月七日京汉大罢工失败以后，不仅是同情者对于我们的力量加以意外的轻视，就是笃信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家亦抱持过分的怀疑。那时我在《中国青年》一节《论工人运动》的短文里，曾这样说：“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军的地位。”又这样说：“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群众居首位”。这些话便是对他们说的。我并且指明：“不幸京汉路失败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和毅力了。”我又大声直呼：“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挫折，便认为此路不通，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不外两点理论，兹分别指出及纠正于下：

（一）从数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幼稚，他们并没有举出实际的数目，仅持一种形式的理论说：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这种理论用之于产业先进国是对的，用之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似是而非了。何以呢？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本国的和外国的之分。有少数地方虽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比外国的资产阶级强壮，但是多数地方却反而是外国的资产阶级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或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均势了。中国外国的资产阶级，虽现在无确实的调查可断定它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我们至少可推测其必为均势。‘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不用说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强壮了，就以‘工业资本’举数例来讲：

一、如铁业。中国铁的产额最近几年（1918年）约共355，000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的铁矿，总共产额是336，561吨，外人在铁业中简直占全数。二、如煤业。中国煤的产额最近几年约共20，000，000吨，而日本之奉天抚顺、山东淄川，以及中英“合办”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就有9，918，863吨，外人在煤业中，几乎占一半。三、如纺织业。1921年底，全国共

有纱锭3，266,666枚，计华商1,340，000枚，日商867，000枚，英商259，000枚，其余未开车者1,300，000枚，外人在纺织业中亦占一半。四、又如烟草业。中国烟草业之三雄：一为英美合办之英美烟公司，一为日本人之东亚烟草股份公司，一为华人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在上海、汉口、奉天三处均设立工厂，东亚在营口、天津、上海三处亦设立工厂，南洋只在香港、上海二处设立工厂，可见外人在烟草业中又几乎是垄断独登了。由此种种例证，我们说中国工业资本本国的和外国的处在均势的地位，总不算近于夸张罢。既是如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那么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是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看上面第二段所列举工人的总数目更可见得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了。

（二）从质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其理论是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心理，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还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有国家觉悟的是少数；有阶级觉悟的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种理论近乎说"哲学"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以心理来解释社会现象，今姑退一步假定心理是可能解释的，然而亦应有平时心理和战时心理之分。无产阶级平时心理尽管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尽管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然而一到战时（罢工），他们的眼里却清清楚楚认识资本主义了，他们的心理却完完全全表示出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了。如以平时心理来断定无产阶级质量之幼稚，我们同样以平时心理来检查资产阶级是如何？上海新兴的资本家不是办了什么"同乡会"吗？不是仿刻什么"太上感应篇"、"袁了凡四训"赠送亲友吗？不是还有佞佛茹素的吗？这些是否可说他们已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但是资本家一到战时（应付工人罢工）却和工人一样的将阶级的意识与觉悟表示得显露无余，以压迫工人甚至残杀工人起来了。我们考查工人心理最好是把罢工条件来做根据。1922年9月至12月罢工次数是四十一次，提出的条件是九十七项，其内容如下：一、要求增加或维持工资三十七项；二、反对管理规则十五项；三、承认工会十一项；四、给假休息十项；五、养老抚恤金六项；六、恢复革工五项；七、反对工头五项；八、响应他处五项；九、减少工作时间三项。试问这九十七项之中除反对工头五项似为对人问题而近于所谓"宗法社会思想"者以外，其余的哪一项不是具体表现阶级的意识和觉悟？原来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被掠夺的地位反应出来的，它的觉悟程度是随它的反抗的争斗之经验而发展的，断乎不能因其有宗法社会心理而能阻止它的觉悟。所以以心理断定它的质量幼稚是不对的，况乎是拿了平时心理而非战时心理。

五

老实说罢，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一）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何以呢？兹分别言之："商业资本"是贩卖洋货及代办原料出口，固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而独立存在；"银行资本"(即官僚资本)是买卖公债及政治投资，又与军阀有深厚之关系，而并受外国资本之操纵；试问他们能革命吗？"工业资本"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的动机，然而终因顾虑目前之

利益，亦不过只有动机罢了；即或有时动机见诸行为，亦不能坚持到底，终出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之一途。这是事实，去年上海资产阶级不曾发电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吗？后来又如何？又不曾做什么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吗？现在又如何？这些和平的运动尚且如此，若采用革命的手段，并进行革命到底，他们哪里有此大胆和魄力呢？（二）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唯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何以呢？亦分别言之：手工工业家和小商人因竞争而致企业之崩坏，生活之不安，往往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比大资产阶级为猛进为坚决，如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比总商会急进，便是一例。可惜他们终因资本微小，而且组织亦甚为歧纷，不能集中其势力，是其大病。农民（雇农除外）因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种种原因亦驱使他们有加入革命之可能。如广东、湖南、陕西、直隶、江西、山东等省往往发生抗税罢租运动及组织农会，最近广东甚至成立农民自卫军，可见他们可以革命了。可惜他们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也是其病。知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掠，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褎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便是其证。可惜他们本来没有经济的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并且他们因经济条件之限制，使他富有浪漫、自由、无政府种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亦是其大病。

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

（原载《中国工人》2期，1924年11月出版）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

（一九二五年五月）

邓　中　夏

自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过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正是中国劳动运动发生第一次高潮的时候，所以那一次大会，影响所及，更使中国劳动运动更激成奔腾澎湃的怒潮，震撼一世，莫之与京了。不幸九个月后，京汉“二七”惨变发生，而劳动运动为之一落，全国工人阶级几乎全取纯粹的退守态度。随后虽随时因利乘便，企图改守为攻，究因外界的强暴压迫太甚，终未能恢复旧观。去年北京政变以后，直系军阀势力颠覆，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帝国主义者亦因政局之变化，而相互间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时，劳动运动确已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又有开始第二次高潮的可能。现在上海纱厂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以及北方铁路工会之恢复，南方海员新斗争的准备，都是这第二次高潮潮信的预告。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集之不容缓，已是明明白白的不用说了。这个第二次大会，确实是一个中国最神圣最光荣超越一切的会议，比之军阀分脏丑声四播的什么善后会议，真是有一朵金花和一团狗屎之别了。我们在这第二次大会里面，自然要把这三年中间一切丰富的经验，大家检查一下，同时我们亦应该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精密确定的规定与指导。

鄙人不敏，且把我个人的见解，写在后面，贡献于大会之前。

一　组织问题

在我们这次大会第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用说是“组织问题”。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是最少数，我们工人是最大多数，但是我们向资本家反抗奋斗，往往是我们失败，资本家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旁的原因固然有，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组织，或者组织不好。

这是有许许多多的实例可以证明的。虽然也有没有组织偶然战胜资本家的事件，但是确系侥幸得来，不足为法；因为乌合之众，虽然有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吓得资本家手足无措，不得不容让屈服，但这种“纸老虎”，以之吓“暴出河”的资本家有时或能生效，若以之吓“老精怪”的资本家那就碰上钉子要倒霉了。上海洋资本家开设的工厂，所

有罢工，十次就有九次失败，就是因此。所以我们人数虽众，我们如不紧紧的组织起来，组织得像军队一样，那么向资本家作战，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组织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了。

这里分三段来说明。

一、组织的性质与作用——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我们的组织，决不是什么同乡的组织，也不是什么帮口的组织，他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是同一阶级，便应该不分籍贯性别老少都组织在一起。因为同一阶级的人，所受的痛苦是一致的，要求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并且这个组织是一个斗争的组织，显明些说，它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向资本家作战的组织。只有我们的组织发展与坚固，才能战胜资本家，才能使我们的利益之获得并保障。我们并且要从此种组织去促进我们所有工友更深切的觉悟力，去训练我们所有工友更勇决的奋斗力，在另一方面，故这种组织又是教育工人群众的。

二、组织法的原则——组织法的原则有两种：一种是"产业组合"。什么叫做产业组合呢？比方一条铁路，是一个产业，所有机务处，车务处，工务处，养路处等等，都属于这一个产业。在这铁路产业底下做工的人，不论是在那一处，开车生火也好，打旗挂钩帮札也好，修车擦车也好，火车上卖茶的也好，车站上帮运的也好；总而言之，都要组织在一个铁路工会里，这就叫做产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一种是"职业组合"。什么叫做职业组合呢？比方机器匠是同一个职业，于是各个产业中把机器匠这一部分的工人，分了出来，不论是在那一个工厂，铁路上的机器匠也好，轮船上的机器匠也好，纱厂里的机器匠也好，自来水厂的机器匠也好，造船厂的机器匠也好；总而言之，都组织在一个机器工会里，这就叫做职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

我们现在把两种组织法的得失来比较一下。(一)产业组合可以使工人团体的势力扩大而统一，因为他是以产业机关为本位的，并且是以产业类别而有全国组织的。反之，职业组合则完全相反，因其每一产业机关里的职业，少者数种，多者数十种，那末以职业来区分，不是每一产业机关要组织数个或数十个工会吗？虽有以职业谋全国组织者，但是新式产业发达的结果，资本家的营盘（产业机关）是整个的，我们却由整个中划分出来，零零碎碎的结合，这不是破坏工人的营盘吗？何能损坏资本家势力之毫末。(二)产业组合可以致资本家的死命。比方罢工，假如是一个产业机关全体工人一致动作，资本家把它没法。反之，职业组合又与之相反。比方一个厂，有一部分罢工，有一部分不罢，资本家便可以操纵于其间，消极哩，不理；积极哩，开除。即或不罢的一部分工人后来也起而援助，同情罢工，但是晚了，资本家已布置妥贴，施以小计，便可以把我们的战线破坏无余了。(三)产业组合可以消除工人间之等级。因为厂中有熟练工与不熟练工之分，然而产业组合则不分熟练与不熟练，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组织在一起，所以不致再有等级发生。反之，职业组合却恰恰相反。熟练工人组织在一起，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他们两者的工钱与地位是不同的，自然发生熟练工瞧不起不熟练工的坏现象。不熟练工依然是工人本色，依然谨守阶级战线，而熟练工却变成了工人中的"贵族"了，却离去工人地位而附属于资本家甚或为资本家的走狗了。

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既如上述。但是职业组合在目前在有些地方亦有相当的用处。如手工业中就可采用它（裁缝店、理发铺、泥水作……等）。因为手工业的小工厂

作坊采用职业组合，是没有害处的。并且可借此去改善那些“行会制度”、“公所制度”，引导它们从原始组合到阶级组合来。总结一句话，新式工业是绝对宜于采用产业组合的，若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合。若新式工业里亦用职业组合，直接是破坏产业工人整个的势力，间接是帮助资本家，那是我们要彻首彻尾的觉悟的。凡新式工业中之已采用职业组合者，要赶快改变过来才是。

三、组织的系统——一个军队，三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才便于指挥，才能够和敌人作战。资产阶级便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敌人，他们一天不倒，我们一天受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和他们作战。我们亦是一个阶级的军队呀！假使我们的组织系统，不与军队相仿，那么何从指挥呢？何从指挥去和资产阶级作战呢？我们因受不了暴虐的待遇，无情的压迫，天天高叫“打倒资本家”，如果组织不严明，不是放空炮吗？

工会组织的系统应该是这样：“支部”设一“干事会”；干事会之上有“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之上有工会“执行委员会”，便成为某个产业机关的工会。再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支部”为基本组织，也叫做基本单位。依工作部门而分。（如纱厂之粗纱间，细纱间，摇纱间，打包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等）。支部之下，可组织若干小组。人数不必拘定，少则五人，多则十人均可（类似十人团）。由各支部下之小组代表大会（它是该支部之最高机关）选举三个组织支部的“干事会”，执行某一间或某一部的各项公务。由各支部代表大会（它是一厂的最高机关）选举五人或七人组织某厂“工厂委员会”，执行这一厂的各项公务。再由各厂代表大会选举七人或九人组织某产业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执行这一个产业机关的各项公务。更进一步，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代表，召集全国大会，选举若干人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全国某产业的各项公务。

这里对于“支部”的作用须得解释一番。支部这样东西，它在组织上是有严重的意义，我们不可忽略看过的。因为新式产业的工厂里每一工作处是它的单位，我们就在每一工作处组织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便是工厂的核心。其职能有数种：甲、支部是工会的基础。只有支部组织好，然后上层构造的工会才不至于发生动摇；我们看见许多工会或是软弱无力，甚至逐渐解体，就因没有做建立基础——组织支部这一步工夫哩。乙、支部是训练工友的养成所。全体大会因客观情形之限制，是不容易开的，所以使个个工友都得着训练的机会，只有支部有可能，因为每日同在一处，人数也不甚多，所以开会是轻而易举的。丙、支部是便于战斗的武器。发生大罢工，固然要靠各支部羁勒部伍以听工会之指挥，如发生小事件，此小事件又仅限于某一工作部分（如管工打人或开除一、二人等事件），那就犯不着小题大做，举行全厂大罢工。只由支部当工友入厂的时候，向工友说明事实，并决定本工作处举行若干时的罢工或怠工，这种威力是可制服资本家的。这种手续也不要多少预备，只数分钟便可以实现。所以支部在组织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在工会公开的地方应该进行，就在严重压迫的地方亦极其适用。因为在严重压迫之下，工会即令不能进行，然而支部是潜伏于一工作份的小组织，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非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

关于组织的系统，我们还有两点要说：

一是“地方组合”，就是不论你是那一个产业的工会，只要是在一个地域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地方的“工团联合会”。二是“全国组合”，就是不论你是那一种产业的总工会或一地方的工团联合会，只要是在一个国境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业的“全国总工会”。

工人阶级要有地方组合和全国组合的理由，是很明白的。“团结即力”是我们唯一的信条。我们团结，不能存狭隘的眼光，以为只团结某一个产业机关的工友就满足了，我们还要扩而大之，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因为资产阶级是整个的，我们工人阶级亦是整个的，我们如要推翻整个的资产阶级，那末我们须有整个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才有可能。你不看见资产阶级方面的组织吗？不仅一个公司的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还有地方的、全国的、世界的组织。比方上海，纱业一项，日商、华商各有“纱业联合会”，其余类推。此外各业联合组织的，外商、华商各有“总商会”；各国联合组织的，又有所谓“万国商会”。工友们！试想：他们这样的严密组织，用这样严密组织压迫我们，我们已是难以抵抗，况且他们还有国家、政府、法庭、警察、军队，种种的组织，来重重压迫我们，我们如不有大规模的统一组织，以与之对抗，以与之搏战，试问我们工人阶级那能战胜资本家而得到解放之路呢？

我们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以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至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法及章程，我此地不能细说了。

二 经济斗争问题

其次，我们这次大会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经济斗争问题”。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工人阶级的经济问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彻底解决，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确信而无疑的。但是我们在此时亦应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为经济生活的改善而奋斗，奋斗到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根本推翻为止。

我们现在提出经济斗争的几个大的目标来：

一、八小时工作制——四十年来，欧、美工人阶级即为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至欧战后，资产阶级为缓和无产阶级革命，曾在所谓“国际联盟”里，规定各国皆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独日本与中国说是有特别情形，规定十小时工作制。什么别特情形呢？真是日本、中国工人的身体比欧、美工人格外健壮些，可以做十小时工作吗？不是的。不过因为中国、日本工人的组织没有强盛，革命的潮流没有高涨，他们以为可欺，这就是所谓特别情形罢。可恶呵！不仅八小时工作制不能行，就是十小时工作制又何曾做到。请看国内工厂普通不是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吗？甚至还有十八小时的工作哩。而且都是整天的站立着作工。

孩童与妊妇亦然。一个人做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其疲倦辛苦为何如？无怪工人要得脚肿病、肺结核病了。无怪工人死亡率逐年增加了。至于工人因工作时间无教育，无娱乐，犹算小事。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第一要事，就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二、最低度的工资——中国工资至不齐一，大概的标准是这样：粗工：纱厂每月平均九元，钢铁及机器十五元。精工：纱厂每月平均十六元，钢铁及机器二十五元。女工童工，其工资更为低下。由此可知中国工资比世界任何国家为少。以日本资本家所办的纱厂做个例：在日本国内的纱厂工资，平均男工日币一元五十四钱六厘，女工一元二十二钱五厘。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工资，平均四十九钱五厘，女工四十六钱一厘。日本一工可在中国雇佣三工有零。中国工资如此之低下，何怪洋资本家不在华遍地设厂呢？当此百货腾贵，十年以来，物价均超重过数倍以上，然而工资并未增加，独身工人所得工资已有不能糊口之虞，若五口之家更何能免号寒啼饥之苦。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就是要各地斟酌生活程度，规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率来，资本家雇用工人，工资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此数。

三、反对一切虐待——中国境内不论是洋商的或华商的工厂，厂家对于工人待遇异常残酷，克扣，罚工，非刑拷打，开除，……种种暴虐行为，罄竹难书。工人的身体既遭涂毒，工人的人格亦被侮辱，言之伤心，思之下泪。工人出卖劳力而吃饭，竟受此惨无天日之虐待，真奴隶牛马之不如。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反对一切虐待，务要将厂中不合理之管理苛章与无人道之管工人员，尽行撤废及驱除。

四、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资本家之喜用女工和童工，自然是因为他们工资极低，可以多得利润；体力较弱，可以任意欺负。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苦况，除掉受男工一般的苦楚以外，还有其他不可计数的痛苦。工资比男子成年工为低，而工时却是一样。此外女工遭管工之调戏侮辱，妊妇之无休息时间，不准携儿入厂哺乳；以及童工做笨重工及危险工，不仅妨害身体发育，而且危及生命安全。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中，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亦为必要。做同样的工作，必加至同样的工资，其厂中并应为女工、童工设置特别之设备与教育娱乐等机关。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只能作六小时工作，工资仍旧。

五、劳动保险——劳动保险的范围，有健康保险，残废保险，失业保险，老年恤金、死亡恤金及遗族恤金等种种。试问中国工厂有实行者否？我们经济斗争，对此点亦宜注意，应限令资本家对于工人因工作上及其他故障，不能做工的时候，给以经济上的补助，以维持工人本身的疗治和生活，并减少工人家属生活的困难。此项保险金或抚恤金皆应由资本家完全负担。

以上为我们经济斗争之较大事项，其他暂缺不录。但是我们怎样去达到这些要求呢？据历来的经验与教训，磕头请愿是无半点效果的，惟有靠我们的组织力，利用时机实行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才能强制资本家屈服承认而执行。

至于互相援助的方法，则第一次大会“罢工援助案”所定者虽然简约，还可供参考。兹撮录于后：

“（一）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通讯义务（按此项条文现在当然要全改）。

（二）凡某地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告各会员干下列各事：（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受该处东家之雇请；（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丙）派人帮忙办理事务；（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

末了，我们须得郑重一说的，就是一个经济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斗争。我们千万不可

专为经济斗争的狭隘意义所囿，而忘记了政治斗争。须知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绝对之关联，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绝对没有解决之可能。所以我们须把经济斗争接连着政治斗争乃有意义。这是我们不可一时忘记的。

三 争自由运动问题

再其次，我们这次大会里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应该是“争自由运动问题”了。

我们工人没有自由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中国的临时约法，明明规定“凡是中华人民”的种种自由权，我们工人却被驱逐于“中华人民”范围之外，是不能享受的。你看，商人可以组织商会，银行界可以组织银行公会，教育界可以组织教育会，……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组织会，只有工人不可组织工会，不是禁止，便是封闭。又看，官厅的小官僚可以罢官，学校的教职员可以罢课，甚至警察也可以罢岗……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罢，只有工人不可以罢工，不是捕人镇压，便是派兵打散。此外如开会、言论、出版，都是一样，只有工人没有自由。不但如此，他们还定了什么罢工刑律，什么治安警察法，以及什么取缔工会的种种条例，唯恐其不多，唯恐其不密。重重网罗，啼笑皆罪，你看压迫阶级是何等毒辣横暴呀！

我们历年来所受不自由痛苦的不少了，我们自“二七”以后更感觉着自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因为没有自由，便不能使工会发展；没有工会，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工人阶级所急切需要而不可少的东西，简直和菽粟水火一般。

有些朋友，以为去年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吴佩孚倒了，我们的敌人去掉了，我们从此可以自由了，北方不是逐渐恢复了工会吗？各处罢工的运动不是多半得了胜利吗？”其实这不过是这些朋友久困复苏后一种直觉的快感，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是怎样呢？直系军阀的势力诚然颠覆了，杀我们的刽子手吴佩孚诚然倒了，但是我们在此时能够稍为发展，不过是继承的军阀尚有剧烈的冲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亦发生新的变化，而国民革命势力亦有相当的增进的缘故。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安福军阀段祺瑞，以及其他新兴的军阀，能够好过于吴佩孚吗？帝国主义互相间在中国政治上的政策尽管冲突，而对于民族革命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势力之伸张，是他们所能容忍的吗？我们真自由了些吗？请看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奉系军阀的爪牙（上海警察厅）是如何帮助外人压迫同胞？英美帝国主义的报纸和巡捕房是如何帮日本压迫中国人？工友们！我们仍旧没有自由呵！我们仍然要继续“二七”争自由的壮举而奋斗而牺牲。我们争自由的大目标是三个：

一、组织工会的自由；

二、集会、言论的自由；

三、同盟罢工的自由。

我们怎样去争得这些自由呢？我们这次大会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我以为下列几项是必要的：

一、定“二七”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二七”之役虽是京汉路为成立它的总工会而起，然而它确是争自由的开始，确是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壮举。应规定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全国各地应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方面追悼为我们争自

由的死者，一方面提出争得自由的呼声向政府严重警告。

二、要求政府废止罢工刑律及治安警察法。可以联合各界表同情的人士共做。北京曾发生过“废止治安警察法运动”，我们要连络各地各界做此运动，同时并举。

三、参加废止出版法这一类的运动。上海租界还有印刷附律，华人全体反对，我们亦应表同情并参加之。因为这些东西虽不为工人而定，然而于工人自由的剥夺，是与各界一样的。

四、反对政府制定什么工会条例、工人协会法以及工会规程（湖南有）这一类束缚工人自由的法律。因为政府制定对于工人的法律，不出两个大原则：一、根本不愿意纯粹工人的团体成立（如会员要劳资合组或工人与高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合组之条款。）二、成立的可以随意由政府取缔和解散。所有这种法律有不如无。

五、政府如制定劳动法或保护劳工法时，须准全国各地总工会代表出席，共同订定，否则，绝对无效。

六、如政府制定何项选举法时，我们工人应发起争选举的运动。因为争得选举可以使我们的代表出席，可以将我们取得自由及改善劳动条件的议案提出，可以揭破压迫阶级的黑幕并监督其行动。此次军阀的善后会议通过之国民会议条例，不依孙中山先生之职业选举，我们不能承认。

四 参加国民革命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参加国民革命问题”。我们这次大会应加以详细的讨论，确定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态度。

“国民革命”亦叫做“民族革命”。各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目的各有不同：封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然而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却是为了要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之压迫。故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因为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什么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

就国民革命要求的本身上说，它虽不过只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租界权……等），并不根本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一切经济机关（工厂、洋行、银行……等）；虽只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并不没收国内一切生产机关；虽只主张建设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对内的民族统一国家，并不主张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制”：然而我们无不参加在国民革命中去，推翻帝国主义之侵略，打倒封建军阀之压迫，固然已可得到一部分的利益与自由，若是我们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表现独多的力量，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特殊的利益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度工资的规定，以及取缔苛待、改善待遇、劳动保险等），不断的去奋斗，亦可一步紧一步的去取得。就目前

国民革命的现象来看，它确有左倾的趋向，这就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而奋斗之故。所以我们可以大声说：殖民地半殖民地里国民运动如不顾及工人的利益要求，那便是假国民革命，不是真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是为了阶级利益而参加的。

复次，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发达而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都给他们把持了，垄断了。政府、国会、法庭，是他们的；工厂、机器、铁路、矿山、田地、船舶，也是他们的；军队、警察、侦探和一切军需用品枪械、大炮、飞机、军舰，都是他们的。他们有了这些东西，所以能够对无产阶级施行横暴无比的压迫与残杀。中国的资产阶级虽因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阻碍而尚没有充分的得势，然而已经开始了。假使我们不努力，听资产阶级安然去取得一切权力，那么我们将来的命运一定更要坏。所以我们此时固然要作目前的经济争斗，然而尤应要作目前的政治争斗，因为不如此，则无产阶级因无政权的缘故，目前固踏践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下，将来必钳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其痛苦永不能够解除，幸福永不能够得到。现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争斗就是国民革命。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一、固可使我们目前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得到若干的自由与机会，能够更使之格外发展，格外稳固；二、并可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而巩固，消极方面得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积极方面，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

复次，更放大眼光来观全世界，我们又知道自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直接的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与政治，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之统治成了整个的，我们无产阶级对付他们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也随之而异，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运动。虽这两种革命之性质不同，而革命之目的却有一共同点，就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中国还不是资本制度完全成熟的国家，同时却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一）可对帝国主义施以最大的打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是维持帝国主义生命的源泉，国民革命把此源泉断绝了，帝国主义的江山去了一大半，不倒而自倒。（二）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势力更加扩大。各国无产阶级虽有国籍的不同，而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则一致。须得全世界联合起来，准对资本主义进攻，并根本推翻之，然后才能得到全部的解放。（三）即从消极方面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他们的老板就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老板打倒，擒贼擒王，那么国内的资产阶级亦容易连带的推翻了。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又是为的实行世界革命得到全部解放而参加的。

总而言之，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它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它自己阶级的目的，推翻目前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时他并不放弃阶

级斗争，而且必要阶级斗争，打倒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从此把国民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完成他历史的使命。所以这次大会里，对于参加国民革命问题，应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决议，以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指导。

五 工农联合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要在大会里讨论的，就是"工农联合问题"。中国自从资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一途。近年来如湖南、陕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已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运动而进入于经济组织与政治斗争，已表示他们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成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广东已有组织之十六万农民群众中可以看得出来。

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

我们工人固然不能忽略了城市劳动者之紧紧的团结，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中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其数量远超过我们数百倍以上。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本年（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与本会同在广州省城举行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本会应与开一联席会议，讨论共同奋斗的目标，以及彼此间结合之方法与互相之计划。

六 国际联合问题

末了，我们这次大会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联合问题"了。

这里我们随便举出一、二件极浅近的事实，可以证明国际联合之必要：

从经济斗争上说：比方这次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日本资本家破坏罢工之一手段，便是想从日本国内的纱厂中，调一批日本工人来华，替代中国工人；幸而日本工人深明大义，起而反对，于是资本家的诡计遂不得逞。现在中、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还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日本国内纱厂亦举行同情罢工，不是更足以制资本家的死命吗？

从政治斗争上说：比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劳农政府成立，于是各资本家帝国主义国家，大惊失色，调遣军队去打，特别以英国政府为尤烈，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家起来反对。事遂终止。那时英、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并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同时英国亦起革命，不是更给帝国主义一个致命伤吗？

由此可见国际联合之必要了。我们不仅是此一国与彼一国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而且扩

而大之，全世界各国间的无产阶级要有总联合，因为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们掠夺无产阶级的方法国际化了。在经济组织方面，它们有所谓“托拉斯”、“辛迪加”；在政治组织方面，它们有所谓“国际联盟”。这些是它们集中力量压迫世界无产阶级的好工具；在这样组织的下面，这国的资本家与那国的资本家连成一气，不分彼此的共同对付工人阶级。假使我们工人阶级如不越过国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资本家，我们真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欧美各国的国际联合，数十年前便已实行了，至一九〇二年更有进步，各国组成一个“国际工会书记部”，此外各种产业还组成一些产业国际（如纺织工人国际，五金工人国际等）。不过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的影响，被出卖阶级的工会领袖们所破坏瓦解了。至一九一七年欧战告终，俄国大革命，于是国际运动又勃然而兴。

现在世界的工人国际有两个：一个在俄国之莫斯科，叫做“赤色职工国际”；一个在荷兰之亚姆士丹，叫做“国际职工协会”。这两个国际，我们究竟应该加入那一个呢？我们加入的标准，最好看它们那一个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原来亚姆士丹的“国际职工协会”，现在尚在民主社会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良的，换句话说，主张维持资本制度，要工人忍耐着吃苦，好好替资本家作工，不要说话。社会民主党这种勾当，简直是资本家的走狗，出卖工人阶级的蟊贼。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却不然了，刚刚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反。它是主张工人要革命，因工人不革命，资本制度不倒，工人的幸福是绝对得不到一丝半缕的；工人如不欲解放则已，如要解放，除了革命，并且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革命，绝不可能。所以它只主张工人统一的联合战线，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打倒帝国主义。由此可看出谁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样显明的路途上，我们是毫不犹豫主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

我们这次大会固要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且对与国际结成亲密的关系之种种方法，亦要有具体的规定。

（原载《中国工人》5期）

中国共产党给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

（一九二五年四月）

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

中国国民革命潮正在高涨的时候，你们于全世界劳动节“五一”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召集了全国工会的代表开第二次劳动大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宰制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中国人就是被他们宰制的民族之一。可是帝国主义的末运到了，此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约而同的向帝国主义举起反叛之旗，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这个全世界的大运动中之一。

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我们须要知道中国的各社会阶级对于这革命的关系是怎样。贿卖国家剥削平民的军阀及大商买办绅士阶级，不用说都是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串通一气，与国民革命为敌的。被压迫而濒于破产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虽然不满现状而有革命的要求，可是他们的政治观念却是模糊，他们的战斗力也涣散薄弱，因此还不能够加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有明了的政治观念，有集合的战斗力，在国民运动中，能够加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

正因工农阶级有这样的力量，我们的敌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大商买办绅士阶级——欲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首先要消灭中国工人农民的势力；他们不但用政权、法庭、军队、警察，在外面压迫工人农民的势力发展；他们并且要雇用一班工贼，在内部破坏工人农民的团结，阻挠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农民同情的援助；他们尤其要严禁工人农民有自己的政党之组织，因为工农联合起来，又有了自己的政党，那便更要增加革命运动的力量。

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你们所代表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所负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你们的敌人虽然众多而且强有力，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的奋斗，不但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终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利也必属于你们。祝你们团结！祝你们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12期，1925年4月26日出版）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

全国工友们！我们现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万状：不是生活程度日高，工资不够维持，便是工作时间太长，疲劳过度；不是工厂私定苛章，虐待工人；便是整工包工头等，殴辱剥削工人；不是横遭抢掠欠薪失业，便是受拉夫封船，苛捐重税痛苦；种种事实，数不胜数。我们受了这许多痛苦，自然不能低头忍受，而且不得不奋起图存。但是敌人却枪杀我们的战士，拘禁我们的代表，封闭我们的工会，摧残我们的罢工，开除我们的弟兄，监视我们的行动。为什么我们的命运这么苦？非明白知道不可。

我们受痛苦的原因，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什么侵略中国？无非是想发财。发财就只有三个方法：（一）盗贼中国的财富，如占据矿山铁路收买原料等；（二）剥削劳苦人民，即是以低廉工资役使中国人；（三）输入洋货。这三种发财的方法，都大不利于中国人民，尤其不利于中国工人。他们的勾当，即不利于中国人民，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各个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彼此之间，不免互相冲突；如是他们强迫中国缔结不平条约，遣派战舰军队来华，并获得租界和领事裁判种种特权。所以他们能够在华设工厂，奴隶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如有反抗，他们又能利用特权以压迫之。输入大宗洋货，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失业；如是一部分又变为他们利用的工银奴隶，大部分失业者便变为兵或匪。他们想在中国领土内和劳苦人民身上发财。自然是各国的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而且各人都想大发其财；如是首先就想瓜分中国，进于共同宰制中国，更进于分途侵略中国。他们各自都培植一派军阀，藉图扩充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其大发财主义；如是他们培植的军阀，便是蹂躏中国人民的仇敌。军阀受帝国主义的指使，特别摧残工人和民众势力。

帝国主义者不但用种种侵略的方法以图发财，还用种种方法愚弄中国人民，用意在制造一班洋奴，为其发财之走卒，如开设教堂、学校、报馆等方法是。最近帝国主义者和受其利用之军阀官僚，又收买一班工人败类和反革命分子，假借工人名义，破坏工人团体。这班工贼和反革命分子是与工人势不两立的仇敌，却是保障帝国主义者发财的走狗。

全国工友们！我们要睁开眼睛，看清我们受痛苦的原因。明瞭了受痛苦的原因，方能知道怎样解除痛苦。现在给我们种种苦的敌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其一切走狗，那么，只有打倒他们，才能解除我们的痛苦。有了这班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便没有工人的利益；有了工人的利益，便没有这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这是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全国工友们非一致团结，与这般仇敌作一最后的死战不可。

全国工友们！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集会，参加者全国一六五个工人团体，到会代表二七七人，共代表全国五四〇、〇〇〇有组织的工人，一致认定全国工人必

须用自己的组织力量，解除自身的痛苦，获得自身的利益；并要力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全国工人所需要的组织工会和同盟罢工的自由，而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和摧残工人自由的仇敌，又非首先打倒不可。

大会并代表全国工人与广东有组织二一〇、〇〇〇农民和数千革命军人联合，而且正式加人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队伍。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第一，要由进步的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第二，要与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共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工友们！大会为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起见，为统一战斗力起见，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

全国工友们！全国工人都觉悟起来了，都纷纷起来组织团体了，都知道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了；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又组织起来了，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重要决议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

一　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

（一）工人阶级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优越的势力保障之上，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来压迫工人的行动。

（二）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调和就是牺牲工人阶级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的生活的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

（三）我们敌人的力量很大，他们据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更握着国家的政权、军队、警察、监狱等有形的压迫机关，学校、宗教、报纸等无形的压迫的麻醉方法，这都是资产阶级制服无产阶级的武器。而且在中国每个阶级斗争中，各国资产阶级总是相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阶级争斗就是一种战争，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战争中重要的武器，就是团结，不分国界省界及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自争自由的政治争斗到夺取政权的政治争斗，都要依靠这个武器。

二　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

（一）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生路。

（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要推翻资本制度，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更多受一层帝国主义的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要推翻这种压迫的，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运动。

（三）民族革命虽然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可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主要的买办阶级，完全为外国资本家所养成，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反革命的。其他一部分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固直接或间接受外国资本之支配，不能有革命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见到中

国工人阶级革命发展之危险，反愿勾结帝国主义，以阻碍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它的本身没有集中的战斗力，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

（四）在过去许多次罢工中，如1922年的海员罢工及开滦矿工罢工，1923年的京汉路罢工，本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无次不明显的表示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人主要的仇敌，军阀必是帝国主义的爪牙。所以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应努力于这个工作。

（五）民族革命既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所以无产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一方面固然协力以反抗我们更大的仇敌帝国主义及军阀，一方面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和；这种混和，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人的危险。

（六）民族革命运动一切方面的进行，一定要不妨碍工人阶级的发展，而且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

三　工人阶级目前的争自由运动

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这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才能得到的。

（一）在这长期争斗中，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加资减时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运动，罢工自由运动，普选运动等，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要求；这些要求之实现，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的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长我们的斗争经验，树立我们的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

（二）同时我们不可把这些目前迫切的要求，当作最终目标，这些要求只是达到我们最终目标民族革命世界革命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更要明白，如果帝国主义、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不完全解放，这些目前的要求都不能达到。

经济斗争的决议案

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劳动的完全解放。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我们不否认为改良劳动待遇条件，增高工人生活程度，以及部分的要求，而实行最激烈最坚强的斗争。第一，因为现在的劳动条件，已经坏到极点。千百万的工人，还未到他精力衰疲之时，而已衰弱不堪，失了他们的力量，失了他们的健康同他们的生命；第二，因为每一部分劳动条件的改良，都可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为最后的目的争斗，并且促进资本主义的崩坏，及劳动解放之实现。

一、我们不否认经济斗争，不否认目前切近要求的改良运动，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运动的态度是：

（一）每个目前切近的改良运动，只是行向总解决的一部分，不可把他看作最终的目标去做。比如资产阶级不打倒，目前所要求增加工资，难保将来又克扣，总之，工人阶级的根本解放，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

（二）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如工人的罢工，本是经济的斗争，但是资本家一利用军警来干涉，便转成政治的斗争了。

二、在中国现时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切近的要求是：

（一）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本来资本家发给工人工钱的标准，是按照工人生活必需品价值而定，它应该要够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维持子嗣（即预备工人老后，再有小奴隶替资本家工作）之用。照这样发给工人工资，工人已经遭受了很大的剥削，因为工人每日所生产的，并不只值他所领得这点报酬。很多劳动是没有受报酬，这就是资本家所谓企业的利润，上了他们的荷包了。但是现在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中国的资本家，他们还不肯按这个生活必需标准发给工人工资，还要从这里面再加克扣，这样一来，中国工人的生活，真是苦到万状了。我们试拿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工人的工资一相比较，两地的生活程度相差甚微，而工资竟为一与三之比，即中国工人每日所得，不过日本工人所得的三分之一。年来生活用品日见提高，而工资之所增极少，工人待遇，苦不堪言。因此，要求按照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二）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这个数目只有再往下少，不能再赶上加，如矿山的窿内工人，则至多不能超过六小时；火车升火的工人不能超过四小时。欧西各国工人，数十年来为要求此制度之实现，不知经过了几千百万次的运动，流了几千百万工人的血，但是中国工人还是做十二点以至十八点的工，难道中国工人就不是一样的血肉构成的人么？我们现在应与各国的工人共同争这八小时的工作制的规定；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必须在工作时间缩短之下，不影响于工资的低落，而反应该增长或照旧。不然资本家一面虽减少工作时间，一面却减少工资，迫使工人不得不因维持生存而愿继续加工，这样名至而实不至的手段，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反对一切虐待：在欧美各国的工人，资本家尚表面尊重他人格的独立，雇佣的自由；而在中国则资本家视工人直与牛马无异，动辄任意拳打脚踢，私刑拷打，杀死无罪。最近日商纱厂罢工，发出反对日本打人的口号，我们试想这是一种什么呼声；又加工作中屎便之限制，下工时遍体之搜索等，以及许多不可胜数的事实，无异对付盗贼囚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四）女工童工之生活改善：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喜欢女工童工，他们是看中了这两种人较为柔软，容易欺负，容易加他们以惨无人道的压迫，因而女工童工的生活遂愈苦不堪问了。女工的工资，是不能与男子相等的，她们的身体，是可以任意侮辱的；至于童工呢！许多六岁未满的小孩，终日站着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这还是人的生活么？最近上海工部局曾提议改良童工生活，但所有条文完全是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我们应当要求：（甲）禁止妇女与不满十三岁者作有损健康之特别困难与危险以

及地穴下面的工作。（乙）绝对不许怀孕与哺乳的妇女作夜工及特别强度的工作。（丙）妇女在产前产后有八星期的休息并照领工资。（丁）怀孕及哺乳之妇女，于普通规定的休息时间以外，并须补足其哺乳小孩的时间。哺乳相隔的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三小时半以上，且每次哺乳不得少于半小时。（戊）绝对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女工。（己）绝对禁止使用童工作夜工。（庚）每日工作六小时，每周须有继续四十二小时之休息。（辛）不得克扣工资。女工童工与成年工人做同样工作时，须得同样的工资。（壬）为童工设立免费的平民学校。

（五）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中国国内各种工厂的一切设备，是很少能顾及工人身体健康的，因而危险之事常常发生。如去年上海祥经丝厂的大火，工人被烧死者数百人，平时因工厂之不洁，而得肺痨疫症以死者，更不可计其数；又在工人工作受伤或死亡失业后，亦无相当的保证。因此我们当努力要求：（甲）一切企业机关，应设法消除或减少于工人身体有害的工作及生产方法，并当预防不幸的事情的发生；极力注意工场卫生与防疫事宜。（乙）对于从事于有危险健康的工作之工人，工厂须供给他以种种抵抗危险的服装、用器、消毒材料等。（丙）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于工作伤亡时，能得到赔偿；于疾病失业老年时，能得到救济。

（六）取消包工制：有许多工厂的资本家非常狡猾，他在他与工人间设立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就是包工制度。他利用他最忠实的走狗为工头，把工作包与工头，工人须向包工头请工做，这样一来，在资本家与工人间，更多一层工头的剥削，愈使工人的生活痛苦，而且在斗争时，资产阶级更可利用工头以破坏工人的组织。所以我们非打破这种制度不可。

三、为监督实行保护劳工的一切事件，预防机器的不慎，在危险的生产中，要预备保险的服装及防毒的用品，工人有病，或者在工作时受伤，须赔偿其损失，关于工厂的监督员，必须参加工人的代表，又保护童工女工的利益，亦必须有童工和女工的代表参加。

四、全国总工会在这次大会后，应具体的指导他所属各业工人，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争取这些权利，去从事为获得这些权利的斗争。在这阶级斗争中，去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五、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想得到胜利，必须注意下面的几点：

（一）当有统一的集中的便于斗争的组织。

（二）一地方的罢工，同时须得各地方的援助，切忌分立的行动。

（三）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发生罢工后，其他地方及其他企业，应做通电声援，或集资援助，若形势严重时，总工会应讨论对资本家经济封锁及宣布同情罢工问题。

（四）不可无组织的暴动，应善利用时机，善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力量向其最弱点进攻。

（五）全国总工会应附设工人救济会之组织；在罢工时，筹备罢工的基金；罢工后作失业及被禁同志之救济。

（六）应发展协作社的工作，一方面图减低工人的生活费，一方面这也是团结工人及工人家属的一个武器。

组织问题的决议案

一、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

二、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有时连工人阶级的习惯和特点都要注意）。

三、中国土地广阔，各处经济发达的情形不一样，各省政治的环境不一致，因此很难有统一的工会组织形式，至少须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四、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许多行会。这些行会是根据手工业的，已经是旧式而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奋斗。因为他们将有组织的工人势力分裂和消费了。最好的组织是产业工会。产业工会的主要原则，是在每个工厂或作坊内，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的职业是怎样，都要按照该工厂或作坊是那种产业性质，就都组织那一种产业工会，比方一个纱厂，不论是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电灯间……的工人，都是纱厂工会的会员。又比方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处，工务处，车务处，养路处……的工人，都是铁路工会的会员。这种制度的益处，就是每个产业机关是整个的奋斗单位。当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只有一个工会包括该产业机关所有一切工人，他们就可以为自已的利益很快的得到决议，并且就可马上很坚决的起来奋斗。所以这种组织，对于工人是有极大的帮助。再有一种是职业工会。这种制度，是按照工人的职业加入工会。譬如机器匠是一种职业，轮船上的机器匠，铁路上的机器匠，纱厂里的机器匠，自来水厂的机器匠……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做会员。这就是说，一个大工厂内的电灯工人就加入电气工会，机器工人就加入机器工会，木工就加入木匠工会，一个大工厂内有各工会的会员。很明显的，这种组织对于阶级斗争是不及产业组织，因为当对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各工会的代表与会员有各自的利益与观点，所以要彼此同意，很难有一致行动之可能，即使可能，也必须消费时间，对于工人的奋斗力与精神是极有障碍的。还有最坏不过的，就是不特不是依产业组织，并且也不是依职业组织，而是以狭小的专门为范围（如铜匠、铁匠、司机、翻砂等），这就是等于不善的旧式行会制度了。因此，很明显的，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及其他新式产业中，是绝对须采取产业组织。若小铁厂、理发店、裁缝店、泥水作等小工厂及手工业，亦可酌用职业组织。至于行会组织务要设法改进到新式工会的形式。但我们亦须记着工会是广大群众的组织，亦须斟酌该处之实在情形，决定他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

五、政治的环境应当特别注意，在中国目前还只是广东一省比较自由，工会可以公开的活动，其他各省因政治情形各有不同，工会或者半公开的存在，或者简直秘密的存在，至于公开的工会活动很少可能，或受限制，或被干禁。因此，要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学校，协作社等，去做职工运动的工作，这种公开的工作，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工作，密秘发展工人的组织。

六、工厂支部当为工会的基本，在小的企业内，特别是在不能公开工作的地方，首先工作只能委派工会的全权代表，由这工会的全权代表，按照工会上级机关的指令，在该企

业内工作。在大的企业内，必须按照工作部分组织工厂支部；倘若工厂支部增加到几十或几百的时候，工厂支部内或者小企业内，得按加入工会会员十人、五十人或者一百人选出一代表，酌量情形组织办事机关。这部分代表即工会的中坚分子，与选举他的群众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并通知他们工会的一切情形。有可能时，还须召集大会，报告工作的经过，时常在工作的时候、工人的家庭里，与工人见面时，宣传工会利益，动员工人加入工会。

在工会的中坚分子的大会上，（倘若不能开大会时，则在代表会议上）选举职员，组织某一地方的机关。这地方的机关，又须经上级机关批准，至少一年须召集该工会大会一次，在大会上，选举该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为统一当地工会组织及亲密互助起见，凡城市或省区应只组织一个工会联合总机关。如一城市或一省区有数个此项性质总机关者，应开联席会议，公决归并为一。

七、工会是为所有工人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当为改良劳动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争得星期日过节日不扣工资的休息，规定劳动法等而奋斗；工会必须储蓄基金，罢工的基金，补助医药费的基金等，以备不虞。工会为关心自己会员的阶级教育，当开办学校，设短期讲演所。

八、为要实行上面所说的，因此工会每月要征收其会员会费。每月至少为一小时平均工资，工会不宜收太高的入会费。

九、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些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职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但工会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工会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行动。

十、工会的建设须有经常的计划，能利用一切劳资的冲突，和一切罢工，以及一切关于工人阶级有意义的事变，作普遍的宣传。

十一、目前因组织的力量缺乏，不能注意到所有的工作，须特别注意组织铁路、海员、内河及码头运输工人、矿山、纺织、缫丝、烟草、印刷，以及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大连、长沙、广州、香港、澳门等处各重要城市的工会工作。

十二、为加多职工运动的领导分子起见，大会完后，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须多造就一些领导分子，职工运动才有稳固向前发展的基础。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一、无论在哪一国，农民总是占大多数，至少农民也是经济上一个主要势力。他们所受的压迫，不减于工人阶级，或且还有过之，因此他们在现存制度之下，也是一部分革命的势力。

二、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

命便难成功。

三、我们知道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着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该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

四、过去许多国家内劳资两阶级的斗争，如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其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得着农民帮助，或农民的势力落在资产阶级手中。反过来说，俄国革命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得着农民的援助。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

六、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

七、工农联合在目前应该实现下列几点：

（一）工人在其回乡村时，或在其工作附近地之农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

（二）工会农会之间，得互派代表；工会应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

（三）农民如发生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斗争，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

（轉自《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
1957年工人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一九二五年“五一”告
中国工农阶级及平民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

全中国工人们农民们及一切被压迫的平民们！

每年的“五一”本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检阅战斗力的日子，可是这个日子，在中国应该扩大它的新意义。这新意义就是“五一”这一天，在中国不但是工人阶级检阅战斗力的日子，也是农民检阅战斗力的日子，并且是被压迫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一切劳苦平民，对工人农民表示同情的日子。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一切劳苦平民，同是活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大商绅士阶级等恶势力欺压摧残之下，已渐至不能自存。反抗这种欺压摧残的必是工人农民最激烈，恶势力之欺压摧残亦必是对工人农民为最甚。然而被压迫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一切劳苦平民，切不可以为这是工人农民独有的运命，你们的生活不安和破产，甚至于为经济所迫而犯法或自杀，也是受了欺压摧残工人农民的那班恶势力所迫害。工人农民反抗那班帝国主义者、军阀、大商、绅士阶级勾串一气的势力，直接是保卫自己，间接也可以保卫你们。因为帝国主义者、军阀、大商、绅士们固然是工农的敌人，也决不是你们的朋友。工人农民反抗这班恶势力，不但与你们无害，并且战斗力涣散的你们，只有联结工人农民，打倒这班恶势力，才能够得着较安定的生活。

今年“五一”到了，我们应该扩大它的意义，叫出两个口号并要实现两个事实：

（一）工农联合的“五一”运动！

（二）一切平民同情于工农的“五一”运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

（一九二四年一月）

中　夏

在向来不曾重视统计的中国，要解答这一类的大问题，真是"戛戛乎其难矣"。所以国中出版界关于这一个问题的文章，检直绝无仅有；就是仅有的不是"捕风捉影"，便是"隔靴搔痒"。只有前锋第一期陈独秀先生"中国农民问题"一篇文章，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很正确，读者可去参考，我这里不再重述了。我这里只说中国农民运动的状况。如这一层明白了，我便可征测农民觉悟程度如何，能力如何，及其在革命运动中所占的地位如何。

中国农民运动在现时只可说是萌芽时期，当然不能象工人运动一样可有编成数十万言专书的资格。虽然，即此萌芽时期所表现几桩运动的事实，已可令我们惊异，已可证明农民革命的潜在性逐渐发泄出来，是各种群众中"崭然露头角"新兴的伟大势力。

我上期"论农民运动"文里已说过萧山，萍乡，马家村，青岛，海丰，衡山六处的农民运动都是很剧烈的，可惜我手头只有海丰衡山两处较完备的材料，现在只能把这两处介绍一番，其余四处暂行从略。

先介绍海丰农民运动。

其实这里的农民运动，并不止海丰一县，其邻县的陆丰，惠来，普宁，紫金，归善五县都组织在一个农会里，几乎把广东东江各县都包括起来了；这里只提海丰，不过是求简明易记的意思。兹摘录香港华字日报如下："去年八月海丰组织农会，后来推及陆丰，归善，紫金，惠来，普宁等县。海丰，陆丰，惠来三县全县农民加人农会，其余三县亦大半加人。人数达十余万人。……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者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二斗租'之农民悲剧。当演至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至可哀，观众悲忿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而出，有痛哭失声者。……今年'五一节'，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者万余人，手持小旗，呼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组织亦日渐完备。……最近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五日飓风大水为灾，海陆丰惠阳各县损失不下千万，农产物完全失收，倒塌房屋，不计其数，实为空前之巨灾。该会召集大会议决减租问题，输纳三成为最高限度。遂与田主冲突，田主勾结陈军围攻农会，捕去职员二十五人，并分兵四出布哨，如临大敌。现尚在相持中云。"

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运动呢？因为他们有完善巩固的组织。现在把他们的章程摘要如下：（一）纲领——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二）组织——分区会，县会，省会三级。每级分大会，执行委员会两机

关。省大会为最高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分文牍，会计，交际，教育宣传，农业，卫生，调查，庶务，仲裁等。（三）会务。（一）防止"田主吊"，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防止耕地不加肥料至生产力日下。（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地主请减租额。（三）会员如发生争执事件，由本会自行排解，以免讼累。（四）禁止会员吸鸦片赌博等事。（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图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教育事项。（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七）办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堤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借用。（十二）办理民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

再介绍衡山农民运动。

其实这里的农民运动，也不止衡山一县。因为这里的农民运动是发生在衡山岳北的白果。白果是衡山，衡阳，湘乡三县接壤的地方，周围数十余里的农民差不多都加入农会了。这里只提衡山，也不过是求简明易记的意思。兹把各报所载摘录于下：

湖南衡山岳北地方有名白果者，其地与湘乡后阳接壤。田亩大概为赵恒惕及其亲故所购置，逐渐形为大地主，其虐待农民甚酷。此地农民多往水口山矿坑作工，故工潮颇影响于此地，一般有觉悟的农民，遂奔走相告，进行组织农会。于本年旧历八月初六日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万人。成立后，四处讲演，将农民如何受大地主及劣绅种种苛待压迫不堪忍受的情状合盘托出，农民大受感动，加人农会者突增至十余万人之多。该会会员限于雇农，佃农，自耕农三种；但无上三项资格而得农民多人之介绍，认为确可为农民谋利益者，亦得酌量准其人会。该会组织，每十家烟火，公举一十代表；百家公举一百代表，区各十代表公举一总代表。由总代表联席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委员会，内互推委员长及财政，交际，调查，交通，宣传，教育委员各一人，为农会最高机关，一年改选一次。闻八月初六日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议决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议决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并发表宣言，兹抄录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甚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余。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拖夫，明日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并喊道："不买洋货呵！""打倒洋鬼子的走狗军阀和洋奴们呵！""中华民国独立万岁呵！""农友们联合起来万岁呵！"农会成立后，该地的大地主闻之大骇，于是贿请县知事及驻在军加以压迫。其时适谭军占衡山，农民乘机活跃，声势愈振。此时并

做平粜及阻禁谷米棉花出口等事。原谷价每洋一元，买谷三斗，后通行四斗半，农民阻禁甚力。地主痛恨入骨，合集万金贿买县署请以土匪办理农会，阴历九月初七夜县署派兵包围农会，枪声隆隆，逮捕委员谢怀德等八人，其余银钱什物，劫掠一空。农民大愤，翌早聚集数万人，拟夺回逮捕诸人，军队开枪，击毙农民胡仁二，受伤者不计其数。随后又将该会首领刘东轩捕去。该会禀吁谭总司令，谭派人到县查办，提交总司令部办理，方得全数释放。闻被捕释回时，沿途八十里农民爆竹喧天，对联数百付，其兴致可知。及谭军失败后，地主又大肆活动，十一月二十五日，赵恒惕调大军一营到该会放火焚烧，杀死六十七人，内小孩一人，伤千余人，捕七十余人，烧民房百数十栋，尸体遍野，哭声震天，可谓惨矣。

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青年们！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就是这两处的农民运动，听说实在有不少青年含辛茹苦的在其中活动，所以他们能够知道组织农会，知道进行罢税抗租的方法。假如各省的青年都能象这两处的青年一样，那么全国的农民大联合运动，可说是指顾间的事了。

不过做农民运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方针，我现在把我的意见简单写了出来，以便青年们的参考：

（一）组织方面——最要紧的自然是组织农会。（或佃农协会，或雇农协会），因为必有这种机关，然后散漫的农民才可团结起来。并须在这农会之下，设法组织“消费协社”，“借贷机关”，“谷价公议机关”等，因为必有这种机关，然后农民才感觉与自身的利益有密切关系而拥护农会。至于是先组织农会或先组织消费协社等机关，那就看各地的情形而定了。

（二）教育宣传方面——能多设补习学校或讲演所固然很好，如一时力量来不及，利用现成的教育机关亦可。至于其他如露天讲演以及新年大节休暇时聚会娱乐尤应利用时机宣传，方法愈多愈好，不细说了。但是中国纯粹农民劳动者（雇工）究不及自耕农佃农之多。所以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因为一般农民私有观念极深，真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里以上”，如果我们用那样多高的口号，不是反而把他们吓跑了吗？我们的宣传口号只能用“限租”，“限田”，“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这一点极其重要，运动家不可不特别注意。

（三）行动方面——分为两项：一是经济的，如要求减租，改良待遇等。一是政治的，如要求普通选举，改良水利，组织民团，集会自由等。就中组织民团尤应特别注意。因为农会威权终不敌民团威权之大，假如农民户户有人组织民团，以代替现在地主绅士所召募的民团，一方固然可以防御兵匪，而他一方一俟时机成熟亦可立呼成军，为革命之用。如此层不努力遍国中的办到，农民运动终是软弱无力，如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

（原载《中国青年》13期，1924年1月5日出版）

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蔡 和 森

广东农民运动是国民党改组后实行其新政纲之一部分的产物。广东农民运动不仅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而且最足以显明工农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影响与特性。他的现状和经过想是一切关心中国革命之新动力与工农阶级发展的人们所愿意知道的。兹特将最近所得材料与消息缀成此文，以饷读者。

（一）省农民协会将于五一开成立大会

从去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行农民协会章程及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出特派员实地宣传之后，广东遂开始有了系统的农民运动。以前海丰虽然成立过大规模的农会，但总不免染着一种狭义的地方主义色彩，而且内部的组织不从基础上着想，只是一乡一乡的组织起来，故被陈炯明拘捕几个上部的办事人便冰消瓦解了。

在国民党和革命政府的扶助之下，广东农民运动理宜进行顺利。但事实上，地主劣绅常与国民党右派军人官僚勾结，极力暗中阻挠破坏，或明施攻击。在这一年中虽然发生过许多次的悲剧，农民运动受其打击不少，但只要国民党的新政策未完全被右派推翻，广东农民运动仍然是一天一天发展的。

现在广东政府势力范围以内，已经有了农民协会组织者二十县。计：番禺，南海，顺德，香山，东莞，宝安，增城，惠阳，海丰，陆丰，惠来，鹤山，广宁，清远，高要，新会，花县，曲江，普宁，潮安等二十县。已经成立县协会者有广宁，花县，海丰，陆丰四县；在旬日内可成立县协会者至少有番禺，顺德，香山，东莞四县；其他各县均已有区协会成立。会员人数共十六万人。

照协会章程：有五个县协会成立即可组织省农民协会。今既超过此数，而且事实上亦要求一指挥全省各县协会的统一机关；现时国民党农民部虽未行使省协会的职权，但是以一政党而与一经济的职业团体相混，总觉不大妥当，所以省农民协会的成立，当然事不宜迟。

闻主其事者业已决定于五月一日正式召集省代表大会成立省农民协会。其代表的选出法：先从乡起，每乡召集会员大会，选举出席区会代表，代表人数视该乡的会员多寡而损益之，大概乡会会员十人可选代表一人；各乡代表选出之后，即召集该区各乡之代表开代表会，互相推举若干人（大概每百人选一人）出席各区代表会议；该区代表选出后，更召

集该县各区代表开一代表会，由这次会议选举若干人代表该县出席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预计各县代表在百二十人以上。

大会议程，闻为：（一）农民自卫军组织法案；（二）农村合作社新组织案；（三）农村教育宣传案；（四）民团问题；（五）土匪问题；（六）对于地方官吏及驻防军队之苛捐婪索取缔案；（七）修改协会章程。

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之日亦即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之日，并闻青年军人联合会亦将于是时召集大会，而三个大会将协同举行一次兵工农联欢大会，——一面表示其阶级的带连义气，一面表示其共同的政治要求。所以今年五一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放一异彩，而且将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放一异彩！

（二）打倒陈炯明后的东江农民

此次革命军在东江的胜利，农民的帮助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本报前几期曾指明过了，此处不用赘述。陈逆走后东江农会复苏的情形（海丰农会一九二三年八月被陈炯明解散，捕去会员二十人，监禁半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农会领袖们被释出狱后又开复活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地主绅士和陈炯明大惊，旋遭第二次武力解散）怎样？本报昨接彭湃君来信，报告甚详。彭君是东江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来信说：

二月念七日我军入海丰，当时粤军先至县城占住陈炯明之将军府陆军学校。我（彭君自谓，以下仿此）从淡水一路至白云，所过乡民无不痛骂陈军之野蛮——奸淫，掳掠，放火。由白云入鹅埠赤石梅陇一带，农民欢迎我军异常热烈，或插青天白日旗或插农会旗，沿途并插，旗上都写标语；摆茶摆水，欢呼革命万岁者不绝于途。我抵海丰第二日即二十八日，各乡农民来问我，磋商农会进行事宜，及与我欢叙别后三年来受陈逆压迫之痛苦者约有七八千人。三月一日经陆丰惠阳惠来，是日有农民万余人到农会，使我应接不暇。三月三日开海丰全县农民欢迎党军大会，到会者三万余人。海丰城自陈军劫掠后已呈十室九空之状，是日城乡一带行人拥挤异常，各商店亦纷纷开始营业，骤呈盛状。在农旗蔽野欢声雷动之中：平山，加伦两同志及许总司令皆登台演说，农民鼓掌声如巨雷。尤以许总司令对农民声明将海丰逆产全数之半归农会，十分之三归工会，十分之二归学生会，并主张取消苛税杂捐，农民更热烈的欢呼党军万岁。许总司令加伦同志出发时，数万农民携小旗沿途欢送。并由此大会发出快邮代电，农会亦于此日宣布恢复。在县代表大会未召集前，由旧时职员组织临时县执行委员会，行使会务。我一入海丰境，农民就向我表示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及发给武装。以上三项，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在欢迎大会时也有此种要求，经许总司令答应将所缴陈军枪械之中提出四十杆给农会。

陈军此次逃败，枪支子弹散失各乡不少，多为农会会员所拾，亦有缴到农会来者。农会得此枪枝即成立农民自卫军。陈军溃时，枪械多藏匿于乡间各亲戚家，农民来报者日有数起，此种枪械若不收集诚为后患。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所以农会现已决定扩充农民自卫军一百名，训练三个月，养成下级干部人才。同时并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约四五十人。

现在东江农会运动的发展当已不成问题。只是军队与农民的关系还发生问题。这个问

题于党军教导团当然不会发生，因为教导团有铁的纪律并受了充分的政治教育，所以无处不为农民所欢迎。现在问题只在那些还未受政治教育与从新整饬纪律的军队。此次农民充革命军夫役向导侦探等职异常出力；但粤军对于农民夫役仍然不免残酷，凡到一地不肯放回，即放回亦每不给夫价；农民向前理论，每以刀刺之；有一农民手掌刺伤长寸许，我带往见总部副官长，该官长只说待查办，夫价依然不给。本来农民向农会报名愿充党军挑夫为党服务者有五千余人，但粤军偏偏不找农会反要自己去拉夫才快意，真不知何故。又党军来时曾向农民宣言不筹款不拉夫，并取消苛税杂捐等。现在款则筹了又筹，凡从前陈炯明所抽的捐项，除了烟捐禁止之外，其余杂捐亦依旧抽收。以故农民异常怀疑。

以上都是彭君来信中的话。彭君最后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很关重要的。任何陈林反攻，唐继尧侵桂的问题都没有这个问题的重要，因为革命政府若真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些反革命势力是不难制胜的，苏俄便是用这种方法制胜了反革命的好榜样。当陈炯明第二次解散海丰农会时曾对彭君兄弟说："群众我是很怕的，尤其是农民，我从前在广西时几乎被乡民赶出来，兵力虽足以战胜桂军，而没法镇压农民，他们出没神秘莫测"（见本报七十期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这回陈炯明的命运果然又结果于农民之手，可见革命若得劳苦群众的拥护，抵抗敌人一定不必单靠军事势力来决定。现在问题不在农民帮不帮助革命，而在革命政府本身的财政政策与军队之改造或取缔。这是陈炯明倒后国民党与广东政府急须有所决定的。我们屡次主张而且现在更主张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将军事行动的负担由小民移于反革命的大地主买办阶级肩上，并仿照黄埔教导团的方法改造许汝为部下的粤军及其他愿意继续革命的军队。

（三）广东农民之概况

广东是外国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方，所以农业经济亦最先破产；失业农民远在几十年以前即一群一群的向海外寻生活，流落于美洲澳洲及南洋群岛为华工。别一方面，地主贵族一天一天的买办阶级化，近代式的外国资本主义不仅未打破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束缚，反而极力加以维持，借以镇压那含有平英团义和团之可能性的几万万农民群众；因此封建社会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在广东社会及海外各属的华侨中特别保持着，（帝国主义早已替中国保存国粹，已不待国故大家东方文化大家和反动的国家主义者费心了！）直到如今比内地各处都还腐败都还可怕。所以广东农民一面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特别大，一面受地主贵族的压迫亦特别严。

广东农民，大多数为佃农，其次为半自耕农及自耕农。现在他们所受的经济压迫之显然可见者：第一是田租，大多数五成以上归田主所得；第二是田亩捐，每亩由二毫至六毫，田主佃户各出一半，归民团所有，有时亦为商团所有；第三是军队苛捐，约占农产物价格百分之三、四或名目繁多，且征收不止一次，归驻防军所有，有时亦为土匪所有；第四是青苗债，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向地主借钱还谷，大都借两元还一石谷，月息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第五临时借贷，农民需用工具肥料种子及吃用等，向地主临时借钱谷，月息由三分至五分；第六私当，农民意外急需时拿自己的东西向地主抵借，利息有以日计算者，农民呼之为"雷公劈"；第七公当，月息三分，赎期半年或一年；第八钱粮预征，政

府因筹军费预征钱粮，地主亦有预收田租者。所以他们的经济压迫，概括的说约有四项：就是重租，苛捐，高利债和钱粮预征。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以来，农民所受的政治压迫亦与日俱深。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官僚压迫农民，农民眼见得到的就是地方官或军人保护传教师霸占田地山庄为教堂。官僚军阀劣绅互相勾结利用，包揽词讼，挑起农民私斗以敛钱；或借慈善事业如修县志道路桥梁等来敛钱。田主勾结地方官或驻防军勒租索债；土豪下结土匪，上通官府，对农民敲诈勒索。

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武装自己；如民团乡团之组织，乡镇自治之要求及反对驻防军队等，都是地主们欲在乡村取得本阶级的政治地位之表现。现在地主阶级差不多全有武装，而且潜势力很大。及农会运动发生，地主知农民不易利用了，遂与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相勾结，成一地主与军阀之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向农民进攻。商团变乱之前后，一面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进行反革命，同时李福林任民团统率处督办，亦到处勾结乡团商团土豪劣绅等实行摧残农会。他们共同的宣传农会为共产党机关，以图反革命之复燃。幼稚的农民运动经不住这个进攻，遂发生踌躇不前或退后的现象。如花县顺德广宁香山东莞等处均有此种现象的表现，尤以花县和广宁更显著。

（四）农会被摧残之一斑

本报近来搜集广东农会被摧残的事实，所得材料非常之多。现在专举上年十一月中的几个报告，以见农会被地主，劣绅，国民党右派军人摧残之一斑：

A　香山县

1、小黄埔　小黄埔农民协会自成立以来，进行颇利，一般农民极感团结的必要，对于会务异常热心，但为当地之土豪劣绅所忌。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乘正副委员长不在，被劣绅陈思敬陈华翰纠合八人，各持枪械，直入农会，洗劫一空，将所有书籍行李什物尽数捣毁。声称奉香山县长林警魂命令特派到来解散，若小黄埔有此农会，实属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言毕即将孙总理肖象撕毁掷地，谓为怪物。

2、北侧乡　北侧东侧农民协会，于十一月八日，突被驻扎容奇顾家祠之福军林响带同兵士百余人蜂拥入乡，将该农会旗帜及总理肖象撕毁，并拘去会员六名，所有会内衣服银两扫数抢去，会之近邻亦受抢，声言搜查乱党，后由省电诘，始诿谓误会，释放会员，然已饱受蹂躏矣。

3、大冈乡　于前星期为田主劣绅勾结商团围困农会，开枪扫射，击毙会员（农民）三名，捕去数名，捣毁一切而去。

4、谷都乡　该地已成立一国民党分部，近为土豪恶霸捣毁。此次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学生到该地组织农会，由县派游击队保护宣传，返县城时，中途为土豪劣绅纠党放枪截击，幸未伤人。

5、小揽沙步乡　该地有组织农会之可能，值演戏机会，派人到地宣传，为地主乡痞凶殴。

B　广宁县

乙十

两个月以前政府委任蔡鹤平为广宁县长，但旧县长未允交代，新县长因乏实力拥护，无法入城接事，乃走至江屯与李济源勾结，希望李予以助力，李乃介绍土匪头邵佐助之攻县城。饷项不继，土匪又非钱不行，李与劣绅马月庭等主张抢掠，于是拿去该地农会名册，嘱各匪令其对已加入农会者可以抢杀夺牛。土匪依计而行，现起始在江屯附近江坑宾坡望墨斗塘一带劫牛，遭害者已逾十家。又以前广宁江屯一带保卫团抽收团费，每石四升，现在加扣至一斗或一斗三升不等，农民至感困难。因此二事，多数加入农会之农户不明真相，以为未加入农会之前无此种种危害压迫，加入之后反受种种痛苦，乃怨及办农会之人，谓为多事。

C 东莞县

1、宵边乡　被西路军谭启秀营在该地拉夫骚扰，并将该农会执行委员长蔡如平及会员蔡某掳去殴打，受重伤。

2、怀德乡　十一月九日为该乡乡团正邓远昌副团正邓修国纠合团丁三十余人闯入农会，如狼似虎将总理肖象旗帜撕毁无存，拘去会员二人，淫刑毒打。

3、涌头乡　被逼缴纳联团费，捕去数人，后得他乡农民援助，才将捕去数人夺回。

D 花县

花县县长谭声诔勾结劣绅江耀中，联合民团土匪，设立田主维持会，仇陷诬枉农会及办事人。谭声诔未能到任以前即寓田主维持会中，尤属显然。至本月十四日谭声诔得民团（土匪变相）拥护，运动驻防军队成熟，得入县城，旧县长知势力已去，乃不待交替即离城去。是日以田主而兼土豪绅士之江耀中等即在平山开地主维持会大会，提议拘办办农会的人，肇事即在目前。

E 南海县

南浦乡　南浦农团军成立已逾一载，成立之后即为商乡团所嫉视，一般劣绅恶商更多方破坏。在商团未被击散前两月，即为佛山商团勾结乡团土匪，强入南浦，竭河而渔，损失已不赀，以其势力不能与较，忍气吞声而已。及第一二次商团罢市时，商团势力热可炙手，而佛山商团尤横戾，其嫉视南浦商团益甚。其时省城适有农民讲习所之设，旋改为广东农民自卫军，南浦农团数十人与焉。及击败商团后，附上农民深感受愚，拟改编农民自卫军多处，遂先遣归，未及旬日，而滇军之事作：初南浦划为三区，各区设一分团，第三区分团乃假乡庙为地址；十五日前，忽有称官产处者数人，携同锹斧，指该庙为官产，硬欲折卸，为该团所拒，乃不能逞而去；五六日后，遂有第三军胡思舜部（滇军）多名到该分团，将团内一切什物捣毁一空，拘去留守者多名，复按家搜索，缴去枪械十二杆；次日势更汹涌，强行拆毁该庙，鸣枪示威，严密布防，如临大敌，该乡男女老幼，惊惶奔逃，无处安身，虽经政府电饬滇军制止，仍置若罔闻。该农团在商团侧目时犹能幸免于难，今于商团败后正可从容扩增团结各乡一致进步之日，乃竟被摧残于政府军，亦奇事也。

F 番禺县

钟村乡　钟村特别农民协会，最近被该村商团掳去会员二人，囚禁于商会，以农会名义去保，置之不理。驻防福军袒护商会。

（五）广宁农潮之回顾

广宁县在广东之西北，人口约四十万，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农户中佃农占百分之六十，半自耕农百分之三十，自农耕百分之十。大地主甚多。占人口多数之佃农，其生活极苦，其向地主所佃之田，每年每亩亏本约在六元以上。其收支比较如下表：A收入之部——在中等年况，每年每亩收获约十石，除纳七石五斗租谷于地主，所余仅二石五斗，以现时每石三元计算，佃农每年每亩实得七元五角。B支出之部——种子费每年每亩约三元五角，肥料费约三元二角，农具消耗约一元，工食约六元，共计十三元七角。收支两抵，亏本六元二角。此外每亩尚须缴纳什么乡保卫团费，巡田费，田土业佃保证费，乡联团等等约二三元。至于父母妻子之扶养费教育费及其他生活必需之种种杂用尚不在上列支出之部。

该处农民向地主佃田，或用契约，或用口订，没有定规，因此地主往往得自由加租及收回耕地；而一般农民亦以地狭人多，互相争耕，如此，地主更得乘机操纵。当农民向地主订田时，地主每亩索取佃信银十元或二十元。地主下乡收租时又有所谓田信鸡一只菜银数十文及雇工挑送费约每石课米一升。此外还可用加大的斗斛去量租。以上种种条件，佃农稍有欠缺，地主即告知该地保卫团局或警察派兵捕押，任意罚金。若值岁歉，地主更铁面无情，不能短欠升合。

广宁农民运动之勃兴，初系广州油业工人回乡宣传活动之所致。上年五月间成立农会，加入者达万人。地主劣绅见将不利于己，乃以保卫团兵力捣毁农会殴伤职员而去。农会领袖，收拾残局继续奋斗，至十月间农会运动又形蓬勃，遂成立县农民协会，并组织农民自卫军，同时实行减租运动。于是东西南三区富豪与前捣毁农会之劣绅江汉英等见农会在各区集众公决减租：以六成归地主，三成归佃农，一成归农会，他们遂先发制人，于旧历十月十六日召集各区田主绅富会议，决定一致反抗，而以“乱世无王，强奴反主，大祸压眉，武力反抗”等口号相号召。一面飞函各处绅富协同反抗，一面标贴“不承认减租，从农会者自误”之长红告白，恐吓农民。当他们集会时，个个磨拳擦掌，大呼“有田主无农会，有农会必攻破”。他们议决收谷时各人佩齐武装，不承认升合抽交农会；并悬赏格，如有临时勇敢帮打加人农会之佃农者，愿将所耕半造之租谷豁免，若被打死，恤安家费六百元，伤者包医全愈。试看潭乡各坊业主标贴之长红，到是很有趣的：“盖闻八政详于洪范，食货为尚，四计陈自豳风，耕稼最重；故佃人勤劳操作，资粒食以育家人，业主仰望西成，仰斗升以供国课，此田产所关特重也。近有无耻之徒，恒心顿丧；左抽右剥，常存燕食之心，结党合群，每肆鲸吞之计；有此流风日炽，甚于天灾之流行，弊窦潜生，惨于萑苻之洗劫。独不思，噬人膏脂已非豪杰，夺人财产岂是英雄？且不视乎董卓荣膺恩相尚遭王允所诛，公瑾计取荆州何丧巴丘之地？大只凡事付诸天命，岂诸人力可图谋。嗣后无论诸款抽捐租谷，各业主概不承认，各佃人切勿混交。倘有违抗，乃为自误，愿各佃共慎之！专此预闻。”同时业主积极准备武力进攻，决定潭坊先成乡团一百二十名，江屯狭溪于旧有五十名外再加五十名，东西南三区联防旧有三十名，添招九十名，并勾结李济源匪军四百名，共八百余人，决于旧历十月二十八日向农会各村总攻击。农会发出减租宣言，

并严整纪律：（1）不得僭耕；（2）不得私自抗众背章完纳；（3）不得于应交田主成数额内有所短交，及各种流弊；（4）全体会员一律出身反抗田主无理压迫；（5）无论何村有事，各区农团一律会齐出发援助；（6）全体会员完全听县区乡执行委员会指挥；（7）如有违背纪律时，得由纪律裁判委员会从严裁判。地主既积极准备作战，农军亦出发自卫，因而农会声势甚张，各区未加入农会之农民，皆纷纷要求加入，即极巽懦者亦停纳租谷，不受田主催促，盼望农军胜利。

县长蔡鹤平，定于十二月一日召集农民开会解决减租问题。届期农民代表赴县，而蔡宣布改期，不料地主江汉英江淮英等乘此不备，纠集土匪百余人袭击社冈农会，幸被农军击退，农民代表去质问蔡，蔡显然袒护地主。本来中立田主皆允照农会决定成数收租，惟少数恶地主挟其封建的"主人"权威决用武力剿灭农会，中立地主亦无如他们何。农会武力不够，乃电请国民党发兵援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派铁甲车队去援助。同时业主维持会一面派人携款往四会属茶山等处广雇土匪，一面运动政府军第三师郑润琦部，扑灭农会。不久，第三师果派两连兵士前来，地主们大宰猪牛，欢迎于保卫团局。地主们因此有恃无恐，百倍活动，乘机招兵买马，着着进行，并宣传第三师要扑灭农会，缴农军械，同时到乡收租，强勒十足，一粒不减。

然忠实援助农民的铁甲车队亦到了，农民勇气百倍，异常欢迎，开一农兵联欢大会于杜冈，每家农妇制"革命糍"为午点，糍上印革命二红字。妇女们在这次运动中尤其热心，每次每乡"聚福"会议时，"婆姆"们出席参加者不少；四乡鸣锣出队，一般婆姆也很踊跃的在后方煮饭煮粥烧茶，或抬大炮上山，或运兵士食料于前方，因此把乡村的革命精神，提到顶点。

第三师虽被地主运动，只因铁甲车队与农民自卫军连战大捷，敌人望风溃走，不久农会方面即得到胜利的结果。据参加这次争斗者说，农民在此次经验中，对于国民党左右派已完全认清谁是他们的友谁是他们的敌；此次地主的反革命恰好与商团事件相对照：江汉英是陈廉伯，江淮英是陈恭受；保卫团是商团；第三师是李福林；蔡县长是帮助反革命的右派。

以上是广宁农潮的一大幕；是地主阶级接着买办阶级而起的反革命。这两个历史的大事变，最足以显明工农阶级自觉的参加国民革命后的影响与特性。

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反动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进，不仅使西方各先进国阶级争斗达到极点，就是在落后的东方如中国亦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是谁鼓吹的或谁可设法调和的？只不过是客观上事实上必然不可免的历程罢了。必须理解这个才能理解广东农民运动之武装的形式；必须理解这个才能理解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亦必须理解这个才能理解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特性。

自从国民党改组大会发表其具体的政纲，与工农阶级自觉的参加革命以后，中国国民革命再也不是混沌的了。谁要更忠实于革命，谁便应更求明白帮助工农阶级发展的意义。只有这个是一切国民党分子决定其自己对于左右派之争应取如何态度的最好方法：你们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原载《向导》112期）

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

（一九二五年五月）

吾人从实际地，身受其苦，比较任何人都苦不过的，现在已感觉着了，并且十分知道从何来了。不但如此，吾人更加在一年斗争中之经验教训，找到一条共同的出路了，千百年呼号跳叫，暴动流血，做不出来的一篇农民历史，现在居然在革命策源地广州，于世界劳动者联合向资本主义进攻之纪念日“五一”召集有组织之二十余万农民的代表，开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同时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确定并宣言革命的工农兵联合战线，这就是开宗明义有价值的第一篇历史呵！

工友们，农友们，一切被压迫的贫苦同胞们，吾人已由自然的过程进于觉悟之途了。但吾人不要忘记永远与敌人作战，不要忘记只有奋斗才可以解除敌人反攻之危险。

中国目前之现状，吾人所处之地位，仍是危险万分，在全中国来说，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利用来压迫工农阶级的政局，仍然是番鬼佬与国内一班带兵老爷，鬼鬼祟祟来谋害我工人农民的时候。北京政变，冯玉祥虽然将曹锟、吴佩孚打走，但是走了两个猛人，又来了无数猛人，现在北方的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班猛人，其残害我农民、工人，与曹锟、吴佩孚是一样的。况且曹锟虽倒，其走狗萧耀南等依然存在；依然想维持其原来的势力；依然舍不得食工人农民之肉。东江战争，虽然将与曹吴同一鼻孔出气之军阀陈炯明，及林虎、洪兆麟打走，但是走了三个猛人，还有无数猛人存在：现在进兵广西之唐继尧；盘据湖南之赵恒惕；霸占琼州之邓本殷。这班猛人包围广东，残害广东百姓，压迫工人农民通通是一样厉害的，彼等自然会联合跑到福建之陈炯明、洪兆麟、跑到江西之林虎，图谋反攻的。因此，吾人可以看得到，北方的一班军阀与南方的一班军阀，都是翻来复去，大家同弄把戏，争权夺地无有已时，使我农民、工人、无数穷苦同胞，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做彼等之枪架、把子、炮夹，更为遭殃，更为受苦。这班军阀（带兵大老爷），何以会弄到如此田地呢？此无他，无论北方军阀或南方军阀都有后台老板（司头）帮助，他们的老板（司头）就是英（红毛鬼）、美（花旗鬼）、法（法兰西鬼）、日本（倭奴）帝国主义者。那班帝国主义者（红发绿眼勾鼻孔的番鬼佬），是时常想谋害我中国的；想我中国做彼等属地；想工友农友做彼等奴仆。中国军阀想升官发财，所以甘心卖国卖同胞，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与军阀通同一气，蛇鼠同穴，来与中国同胞作对，来与工友农友为仇。

你看上海、汉口、天津等处，时常发现番鬼佬，一船一船装炮带枪到中国私卖。去年商团作反，枪杀我等工农团军就是番鬼佬私卖枪械与陈廉伯之结果，就是一件事实的明证。军阀打仗没有钱用，帝国主义就借钱给他，你看曹锟想做总统，袁世凯想做皇帝，都有帝国主义借钱给他。陈炯明打广州，却有（红毛鬼）英国帝国主义者、或（花旗鬼）美

国帝国主义者借钱与他。最近消息，美国资本家与残害广东工农阶级魔王邓本殷，订定三千万美金借款合同，以广东琼州之森林矿产做抵押。参与此次借款进行者，有北方军阀段祺瑞的代表，新失势力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林虎的代表在内。这更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谋害我工人农民全国同胞的铁证。帝国主义谋害吾人，还不止此，占我重要海港，如北方之威海卫、胶州湾、大连湾、旅顺口、青岛；南方之琉球、台湾、香港、九龙、澳门、广州湾都被帝国主义占去了，变了"老番"的土地了。强租重要的商埠，如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沙面都是老番租借地了。管理出入口货的海关也在外人手上。出金银铜铁的矿山，往来交通的铁路，也在外人掌握之中。还有外国领事裁判权：老番在中国犯事，吾人不得管理他；中国人在租界犯事，老番就来干涉、就要受他的领事裁判。从此外国人在中国就横行无忌了。外国军舰可以在中国内河行驶了。南京、上海、广州白鹅潭就有无数的红毛的、花旗的、法兰西的、日本的战舰停船了。彼等就可以明目张胆向中国人民示威了。从此外人就可以自由运载洋货入口发卖，大扒特扒中国金钱财宝而去，使吾农民在乡村造出来之农产品被其抵制，不能销售，因亏本而不敢再造，专用彼等洋货。从前用火石，现在用火柴；从前点豆油，现在点火水；从前穿纺棉布，现在穿洋纱；你看食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番的东西了。这就是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吾人的侵略，尤其是吾农民被侵略更厉害。

还有精神上思想上文化上被帝国主义者侵略也不在少，不说别的远的，单说广东，东江的惠州、潮州地方，北江的韶州地方，西江的肇庆地方，南部的琼雷等处，农村中的耶稣教堂，教会办的学校，几乎遍地皆有，这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吾人之工具。一班进教佬（耶稣教徒）天天向吾农民讲道理，称颂上帝，引诱农民子弟到教会学校读书，使吾不知道病苦之何来，一味只向上天祈祷，弄得不会向压迫和侵略吾辈的敌人进行反抗。彼等还时常霸占田庄起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

照上面的事实看起来，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军阀怕帝国主义，弄成中国之政局如是纷乱，搅到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如是惨痛，岂不是吾人当前最可恨的仇敌么？最受痛苦最受压迫的工农同胞们：吾人仇敌就只两个吗？并不止此，军阀之下还有一班走狗呵，这班走狗更是接近吾人的，就是贪官污吏。因为军阀压迫吾等，做其升官发财的生理，专靠贪官污吏直接向吾人进攻，筹饷呀、抽捐呀，就是彼等唯一替军阀尽的义务。彼等是为自己荷包的，因此彼等也要倚带兵老爷做护身符而甘心做走狗。现在各县的县长，各区的区长，都是拥戴一个或大或小的带兵老爷的，彼等并要贡献许多钱与上官，才能得到下官做的。或者从农民扒到的钱，亦要时常奉送上官一些，这班下级官长，就变成贪官污吏了。彼等刮削农民方法：除了直接派兵派警之外，并时常派许多步哨，这些步哨就是劣绅土豪了。劣绅土豪，上通官府，下结游民（地痞），利用失耕的农民兄弟们，来损害自己阶级的人，真是一件痛心之事呵。操纵农村政治，拿联防局、民团、保卫团、护商局等机关做工具，设种种绅苛杂捐，以盘剥鱼肉吾民。照实际调查，在广东各县，以东莞、香山、顺德等处为最著，抽捐名目，如人头税、婚姻税、果木捐、水道捐等不下三十余种，农民血汗，能有几多供他们刮取呢？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是未有经济地位做基础的，因为彼等多数在所在地未有田地收租的，彼等又因此以利害相同的关系，自然与田主联合，联成地方反动阶级的战线，而压迫农民。

田主们用重租、押租（批头）、租信（田信鸡或银钱）、租契压迫农民，农民稍有反抗，就可借军阀、贪阀污吏、劣绅土豪做镇压农民暴动的利器。吾人可见浙江萧山的农民运动，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此外如山东、河南等处，不是农民因受苦不过而发生过暴动吗？不是因地主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军阀联合成反攻战线而失败吗？在广东因连年战争，地主阶级也曾受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压迫的，也曾主张人民自卫，乡村自治，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为反抗军阀的工具，吾等农民也曾在此等糊混阶级意义之组织下，过了无聊生活的，现在也许是有许多农友仍然过此无聊生活的，可是有农民协会组织之地方，形势就不同了。这种起初假名人民自卫、乡村自治而本来是地主阶级的机关，现在已反过脸来，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之反革命武力了。不但如此，彼等已进而与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联合成反攻的战线了。当广东广宁农民协会做减租运动与地主斗争的时候，从前利用农民而武装的民团，居然不要农民当团兵了，冒牌的国民党员广宁的县长也不革命而帮助地主压迫农民了，革命政府下的驻防军队而同时为国民党员的也不革命而帮助地主了。地主被农民进攻最厉害的时候，也说失败了跑去租界居住，将所有土地财产抵押洋行（老番的）。彼等联合战线向农民进攻，岂不是有了事实证明吗？农民同志们！农民协会的组织完全建筑在阶级意义上面，不同的阶级，便是利害不相同，任你平时说得如何好，等到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就会压迫我们了，同志们，当心呵。

霹雷一声，广东有组织的二十余万的农民同志，已联合起来成立全省农民协会了。从此吾人为更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更完密的统一而共同奋斗。吾人在此过去一年中，也有许多令吾人不能忘记之事实，就是省农民协会之有今日，完全为自身组织及斗争得来。广宁为减租而死的是谁？陈桂燊等十三位死者，都是我农民兄弟，当时冲锋陷阵的，也是我农民兄弟。花县与地主阶级作战而死的是谁？王福三同志，被地主们去手割耳而死，他是花县农民协会的职员。广州芳村被民团杀死的是谁？林宝宸同志，他是番禺第一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在东莞被土豪买凶暗杀的是谁？李海东同志，也是东莞第一区农民协会的职员。在顺德被劣绅土豪勾结防军所杀十余人是谁？也是顺德理教乡农民协会的职员或会员。其余为农民利益坐牢的亦有许多。吾人固然要纪念为农民利益而牺牲的死难先烈，农民同志们，吾人亦要知道为农民运动而牺牲是我们同志，受损失是我们农民，更要因此认识解放我农民，只有靠我们自己团结本身奋斗的力量。更要认识因本身奋斗的经验而成立省农会的统一机关，从此为更有组织更统一的全国的普遍运动，其力量更大，其成功必速。

吾人在"五一"节那一天，得到和全国劳动代表联合起来，热烈表示其力量。在工人农民开始见面的第一天，已实地的为有组织的工农大联合，我们从此就认识了同一战线的好兄弟。吾人在平时也见得到农工是好兄弟：受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大地主压迫的农民，与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其痛苦是一样的；工人失业跑回乡村去耕田，农民失耕跑到城市去做工，或同样的流为兵匪，卖身给洋人做苦工、华工之厄运。因此，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是压迫阶级，是联合向我们被压迫阶级工农反攻的，我们应该联合成工农革命战线，向压迫阶级进攻，这才有解放自己阶级之希望。我们在东莞、宝安、香山、顺德、广宁各处的农民运动，得到工人同志助力不少，使我们知道工农联合之意义更加明显，工农联合越坚固，力量越大，其成功自不待

言。吾人于正式讨论大会第一天，已全体赞成加入世界组织农民国际了。这个农民国际，分明是联合世界的农民，为整个反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解放被压迫阶级的全体人民。工人们，农民们，联合起来，为全省全国全世界的贫苦群众联合共同奋斗！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推翻国内一切军阀！农民大联合万岁！工农大联合万岁！广东省农民协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农民国际万岁！

广东省农民协会

（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2、13、14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我们人民自古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士是专门读书的人，他们是以知识擅长，可以称他们是知识阶级。商人是拿金钱做买卖的，可以称他们是资本阶级。农工都是以劳力谋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劳动阶级。

从前只有读书的士人有知识，所以做官治民的都是士人。商人有钱即便有势；有钱可以在政府买得官做；有钱可以在城市雇工人开工厂做厂主、做资本家；有钱可以在乡间买田地雇佃户做地主。士人做官发了财，也要到乡间买置田地做起地主来。最苦的只有劳动阶级的工人和农民。

世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切东西，那一样不是农民和工人劳力做出来的？然而工人农民自己的吃穿用却是很苦，完全为厂主地主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

工人农民在全国人数中，差不多要占十分之九，若说人民应该享幸福，便不该把工人农民除外。在实际上，全国享幸福的人，只有少数资本家和地主，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工农劳动阶级，不但为厂主地主做牛马，而且还要受其他各方面的压迫，几乎不能活命，还说什么享幸福！现在单就农民说，你们所受各方面的压迫，待我们一一讲来。

第一个压迫农民的自然是地主。地主召佃户耕田，只是供给他若干亩田地，或者有几间茅屋，此外一无所有，所有耕牛犁锄稻麦种子肥料以及一切收获前所需食用，都须佃户自备，此外立约承租时，还要交地主若干银钱做押租。地主丝毫不费气力，到收获时，便向佃户收取租谷；无论是照约收取额租或是临时分租，每亩地主所得约占收成之半，即少也要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如湖北汉川县）还要预收来年的租。非遇到水旱奇灾，佃户没得吃，地主的租谷是不能减少的。佃户因为无力缴租或是因为缴了租后吃用无着，便不得不向自己的地主或别人的地主重利借贷，冬春借谷一担，秋收时便须归还两担，最客气的也要一担半。农民一经这样的重利盘剥，便永世不能翻身。现在许多军阀官僚到乡间去买置田地，这些地主也和别的地主一样是不耕不种的寄生阶级，土地由他们更集中了，集中的结果农业上并不能改良进步，只是使农村中的佃业贫农增加，农业反则退步。地主绅士们所把持的民团局或团防局，更是欺压农民的乡村军阀政府。

第二个压迫农民的要算外国资本家。自古道男耕女织，自从外国资本家把他们的洋货潮水般的输入中国以来，乡间手工的纺纱织布生意，都被外洋机器制造的棉纱棉布夺去了。据海关报告，洋纱洋布入口，每年价值二三万万元就是每年中国种棉纺纱织布的农民工人之损失。此外洋油，洋火，洋灯，洋针，洋肥皂，洋头绳等都一一运到乡间，成了农民的日用品；就是农民日用所需的本国货，如油盐纸张茶叶酱醋等，也因为釐金等捐税增加及别的洋货输入的影响，价钱日见高涨，尤其是盐税归外国人管理，因为偿还洋债，他

们拼命增加盐税，盐价日渐高涨，农民生活因之更加困苦不堪了。最可恶的是法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天主教，英国美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耶稣教，这些教士在乡村庇护教民欺压良儒，真是无法无天。

第三个压迫农民的就是军阀。军阀们连年战争，一方面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如厘金盐税等，使一切物价无不高涨，又复巧立各种名目直接勒捐，加之预征钱粮，增加田亩捐，强迫公债，逼得农民非典田卖地卖儿卖女无从活命。一方面军队经过的地方，抢虏焚烧，更是悲惨，往往整个的农村，都被这般野蛮的军队毁灭了。即在不受兵祸的地方，军阀们只顾筹款增兵，民间的水利农田，从来不暇顾问，因此水旱灾荒遍于全国，最厉害的象淮河和洪泽湖一带，历年淹没田地，总在一二万万亩以上，直隶山东沿黄河一带，历年淹没田地一万万亩。其余若天津的白河，湖北的襄河，湖南的洞庭湖，都久未疏浚，河身淤塞，泄水蓄水都不灵，屡成水旱奇灾。这些地方农民的困苦便可想而知了。

第四个压迫农民的是贪官和劣绅。各县征收的钱粮，除国家正项之外，内收陋规至少也在正项一倍以上，譬如地丁银一两，至少须缴纳银元三元以上，此项陋规，国家丝毫得不着，乃用"赢余"的名义归县官房班以及征收人员私分了。此外催钱粮的差役下乡，还要另外需索。印契税照地价收百分之九，也只有三分归国家，县官得三分，房班衙役共得三分。农民欠了钱粮欠了租谷，都要到官办罪。乡间的劣绅多半是地主，他们往往勾结贪官鱼肉农民，农民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挑拨农民到官兴讼，于中取利，或者因欠税欠租，借官势威吓农民，甚至诬告农民抗粮抗租，禀请县官派兵究办闹出大乱子来。劣绅们不仅借官势威吓农民，并且还要摊派亩捐，办理什么民团局或团防局作威作福，直接的欺压农民。至于乡村自治机关和各县议会选举，更是劣绅们包办的了。

农民受上述种种压迫，不但生活艰难，有些并不能在农村安居，只得弃农改业了。各地乡间充满了没有田地耕种的农民和有田种而吃穿不够的农民，再加上水旱兵灾便不得不去当兵随匪替军阀匪首充当炮灰，能跑到城市里做苦力的还算得法。

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样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这不但是农民自身的不幸，并且是国家的损失和危险。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缴纳租谷，此外，废止盐税和厘金，关系农民生计也非常之大。可是要达到废止盐税厘金和实行"耕地农有"这些目的，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来〕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因为军阀政府是断不肯把盐税和厘金废止的，至于"耕地农有"，更须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归耕地的农民所有。为农民目前自救计，本党主张全国农民应该有左列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

（二）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

（三）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

（四）由各乡村自治机关动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

（五）各乡村须禁止私人积谷居奇。

（六）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应往之钱粮，无论地丁或糟米，均只按照实际市价缴纳，不得缴收陋规。

（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须专设治河局，政府预算均须指定治河专款不得移作别用。

（八）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

这些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但是要想达到这些要求，非农民自己大家结起团体来出力奋斗不可。

怎样的结团体呢？就是组织农民协会。或者有人以为农民一向这样涣散，恐怕不容易结成团体。其实不然。我们根据广东的经验，农民的团体是可以组织成功的。自从民国十二年七月本党第三次大会后，本党才起首在广东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经过不到二年，农民组成了协会的，有二十多县，各处协会会员现在已经有四十六万五千多人，并有几千的武装自卫军和地主开了好几次战，这二十几县的农民协会代表，于今年五一劳动节（每年五月一日是全世界的劳动节），在广东省城成立了广东全省农民协会。适逢这一天（五月一日）全国各工会代表也在广东省城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劳动大会的二百七十八个代表，和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一百二十五个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喊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大家都十分亲密。在这些集会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可以组织协会和工人可以组织工会没有两样。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农人和工人同属一劳力谋生的劳动阶级，实有联合互助的必要。并且工人大半集中在大都会，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处，都站在政治争斗之重要地位，尤其是五卅运动以来的上海广州工人，都有了二十万人以上的工会组织，他们不断的经济争斗及政治争斗，使中外资本家都心惊胆裂，这更可以看出农民有了城市工人做有力的领导者。第三我们可以看出一向被厂主地主当做牛马的工人农民，一向被绅士们看不起的工人农民，现在都结成团体，便渐渐有抬头之一日了。

或者有人以为广东农民有国民党政府的帮助，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他省恐怕不行。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广东国民党政府固然肯帮助农民，而同时广东各地方的地主商团勾结国民党中右派（国民党中官僚分子）的军队和县官，破坏农会，摧残农民的事，也不在少数，有时国民政府也无如之何，还是要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奋斗才行。现在除广东之外，湖南湖北的农民，也渐渐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了。可见没有政府帮助，农民也能够团结起来。

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压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各省各县现有的协会都是地主绅士们所组织的，他们的利益和真正农民的利益相反，非耕田的真正农民自己另组织农民协会，决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本党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不用说应该帮助你们，就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革命分子）也必须帮助你们，因为他们的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你们参加是不会成功的。

农民协会应该怎样组织呢？各地的农民协会章程，按照各地情形，自然会有些小小的不同，至于主要的办法应一致如左：

一、农会会员以年满十六岁之佃农雇农自耕农及农村中手工业者体力劳动者为限。凡不耕田之地主，重利放债者，不耕田之宗教家如神甫牧师僧道尼巫等，均不得为会员。

二、凡会员须缴纳入会费与月费若干。

三、各省协会须分为四级。

（甲）村农民协会以一村或合数村组织之，会员人数须在二十以上。由会员互选三人组织村执行委员会。

（乙）乡或区农民协会以本乡或区内三个以上村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乡或区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乡或区执行委员会。

（丙）县农民协会以本县内三个以上乡或区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县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县执行委员会。

（丁）省农民协会以本省内五个以上县农民协会联合会组织之，由全省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全省执行委员会。

四、各村协会所收之会员费，百分之六十用于本村协会，百分之四十用于高级各协会。

五、非协会会员不得加入农民自卫军。

六、每年由省执行委员会召集全省会员代表大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县及乡或区会员代表大会，均每半年由该县及邻〔县〕或区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全村会员大会，每月由村执行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

七、村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三次，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县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二次，省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

八、各级执行委员均互推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秘书一人为常务委员，驻会办事。

九、各级执行委员均得指定会员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办理自卫军；消费合作社，教育会，水利局，害虫检查会等公益事业。

十、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聘请非农民为顾问，及各项技术人员，助理各种事务。

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全国农民大会代表诸同志们：

中国农民的数量，不但在全中国人口比例上居最大多数，在全世界各国农民人数比例表中，亦居第一位。可是中国农民所受的困苦，也居第一位，因为中国农民兼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兵匪六种蹂躏，是别国农民所未曾同时苦受的。

被人指为睡觉的中国农民，现在已经开始醒悟，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并且准备自己的武装，向六种蹂躏者反抗了。

中国农民运动要注意两件事：

（一）中国完全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宰割之下，非到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革命得着胜利，农民所受六种蹂躏者所给之困苦是不能免除的，因此农民运动必须与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广大群众参加，也不会成功。

（二）工人是现代革命运动中之最急进的先锋，且城市工人又站在政治上重要地位；因此农民运动有与工人运动结合之必要，而且革命的工人阶级有领导这些运动之必要。

本党是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责，是领导中国农民工人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争斗；同时，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争斗。因此，在此次大会提出“全国农民工人大团结”的口号，以贡献于大会，并祝大会之成功。

全国农民大会万岁！

中国农民运动万岁！

中国农工大团结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51期，1926年5月1日出版）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年五月）

在一九二五年，世界劳动阶级向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定期挑战之“五一”节，全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革命的广州举行极其壮烈的大示威运动，建设拥护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大本营——中华全国总工会。我们呢？满脚牛粪的农民，“半片铜臭不值”的农民，也踏着我们的好兄弟、革命战线里的先锋——工友们所杀出来的血路，冒死的在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军阀、帝国主义四面包围重重压迫底下，集合了二十二县十八万有组织的农民代表，悲痛愤恨而又慷慨激昂的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统一了我们的战线，确定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建设了为我们农民利益而奋斗的大本营——广东省农民协会。同时并与工友们紧紧的握着手联合起来。

回忆一九二五年的今日，全世界的局面，不消说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向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进攻剥夺的严重局面。中国的境内，也正弄着被那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压迫中国民族的把戏；曹锟、吴佩孚虽然一定的跟着军阀崩坏的途径失败了，然继续而起的张作霖、段祺瑞，造成同样的或变本加厉的军阀政治来了。全国的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依然脱不了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铁蹄底下的践踏。

东江陈炯明，南路邓本殷，广西唐继尧，湖南赵恒惕，把革命的广州包围得水泄不通，同时我们的内部，中国国民党里头的假革命、反革命和一般摧残革命的无聊政客、贪官污吏、买办、地主、劣绅土豪，天天的反动，尤其是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基础石、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各地的农民协会，不断的加以破坏和摧残，甘心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时满脚牛粪绝不怕死的我们，在阶级的民族的意义上为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团结，冲破“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买办、军阀、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拥护革命政府，请国民党肃清内部的反动分子，请国民政府消灭叛党的一切骄兵悍将！同时又加入世界组织的农民国际，联合世界农民为整个的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促成世界革命，去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

在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闭会未久，霹雳一声，六月六日的一周间，叛党叛国的杨希闵、刘震寰，公然做了英帝国主义的走狗，谋颠覆国民政府，压迫广东的革命民众，反叛起来了。急进的兄弟们、广东的工友——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工友，于战机危迫的一瞬间，罢起工来，断绝了敌人的交通。海陆丰一带的农友，西江广宁、佛山一带的农友，北江清远、花县一带的农友，南路东莞、宝安一带的农友，统一在省农民协会的指挥底下，一致行动起来。或武装来省预备参战，或出农军截断滇桂军逃窜之后路，或收缴广三路线滇军枪械，或为党军侦探、运输、向导，皆不惜牺牲性命，站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上，一鼓而荡平刘杨。这一次的牺牲，使我们最满意的就是：国民政府的革命基础多得了一些巩

固。

帝国主义感觉其走狗之日渐衰败，不足以镇压慑服中国的民众，乃舞爪张牙，用其铁血政策，直接残杀中国的民众。于是乎“五卅”惨案发生，中国所有大通商口岸，无一不是遍地鲜血淋漓，演出帝国主义残杀我国同胞的惨剧。急进的兄弟们——无产阶级的工友们，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众们，从帝国主义的血刀底下恶战苦斗。上海二十余万工人之大罢工，省港二十万罢工工友奋斗十余月，满脚牛粪的我们，与省港罢工的兄弟，通力合作，封锁香港；农村中为“五卅”案反帝国主义而武装示威者总在五十万人以上；并在农村中破获了许多土豪劣绅、地主、奸商买办、工贼、农贼盗运仇货接济香港之反革命行为，镇压农村中一般反革命势力之潜滋暗长，截断了帝国主义和内地一切反革命派的联合战线。不久廖仲凯惨案发生，亦因此而得以闭门捉贼，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肃清了许多反革命派，更加巩固了革命的基础。

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活命汤而死灰复燃的陈逆，乘刘杨事变之后，卷土重入东江。满脚牛粪的我们，为死心塌地的拥护国民党，捍卫国民政府，顾全罢工的胜利，保障本身的利益，任凭东江各县的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怎样欢呼雷动，咄咄逼人的欢迎逆军入境，帮助逆军解散工会、农会、学会、商会，及捕杀工人农民学生的革命领袖；任凭刽子手钟景棠造出无数极其锋利之斩首刀，将欲使东江数十万革命民众变成断头鬼；五华、海丰、陆丰的农友，武装而起与军阀决战，牺牲了五百余农友的生命，农民财富及农民妇女被焚毁、抢掠、奸淫的莫可计算；而海陆丰农军领袖李劳工同志及被捕而就难的农友们，在反革命派的铁弹穿过他们的胸坎的一刹那间，还是大呼“革命万岁！农民万岁”！最后悲壮痛绝的声音，染着鲜血的肉体，至今尚活现于我们的耳目！这次牺牲，卒至助成罢工工友与党军扑灭陈逆，收复东江，削平邓逆（本殷），肃清南路，使十数年来混乱的民无宁日的广东，统一在国民政府势力之下，将有再举而统一全国之趋势。

现在呢，我们相信在广东确能享受政治上相当的自由了；然而我们本身的饥饿和被压迫的痛苦，依然得不到如何的改善。这就是地主重租压迫，债主高利盘剥和贪官污吏的苛抽酷勒，国内军阀与国外帝国主义的直接间接的剥削。我们农民失业，依然逐日增加，自然造出大批的土匪和无量数卖身的猪仔奴隶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危险。其次，我们要知道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的前提，首要使广东得到真正的和平和真正的统一，广东最多数的农民群众不但要跳出了一切反动势力的包围，同时使其能够去帮助政府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可是，最近高要的惨杀案，广宁地主利用土匪攻打县城，普宁地主保卫团、警察之与农民的冲突，陆丰、海丰、五华的逆党之潜滋暗长于内地，时演其残杀民众之恶剧，或提高租额，或收回耕地，无时不以破坏农村消灭农会为快事。此外一班落伍军人、劣绅土豪、反动地主和流氓也加入了国民党，或混入农民协会或工会或学会，恐吓农民加入农会，甚至说国民党是父亲，农会是儿子，国民党可以解散农会，处处造谣，毁谤中伤，务使民众的联合战线为之破坏。这种农村中的反动势力，随便可以造成反动军阀之基础，而将来造成新的军阀之继起者，诚为广东和平统一之一大危机。

农友们！我们应把这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农友更加认清楚，更加努力的团结起来，肃清潜入会内之劣绅土豪，以严申我们的纪律，整饬我们的组织！更进一步而统一全国农民运动的战线，拥护国民政府，肃清全国的军阀，促成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

约，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革命！我们应该高呼：

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

拥护国民政府出兵北伐！

打倒一切贪官污吏、逆党、土豪劣绅及反动的大地主！

肃清内部的劣绅土豪及农贼！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轉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案（选）

（一九二六年五月）

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

大会听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报告之后，一致决议如下：

（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经济即他们的生命，便是建筑在剥削农民上面。因为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经济侵略，最主要的是：销售高价的工业品，换买低价的原料；而农民便是工业品之唯一买主和原料品之唯一生产者。至于军阀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农民身上，如租税苛捐……等，更是很明显的事实。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犹如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一样，是维持社会的唯一柱石，也就是一切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唯一剥削对象。

（二）在另一方面，国民革命是各被压迫阶级联合的解放运动，换言之，即在解除各被压迫阶级的痛苦，而在各阶级中，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最大的一个阶级，并且和工人阶级是更受痛苦和更被压迫的阶级。所以国民革命的真正群众是大多数的农民，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也就是在解除这大多数农民的痛苦。

（三）因此可以说，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讲，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的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自然，在国民革命中各种民众运动如工人运动、商民运动、学生运动……等都格外重要，尤其是工人运动，我们可以说，城市的工人如果不起来作先锋军，国民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不过在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国民革命的群众上说，农民运动，始终站在最主要的地位。

（四）根据以上的理由，本大会站在国民革命的见地上，站在我们农民自身解放的利益上，特别努力完成全广东的农民团结，并进而谋全中国的农民大团结。同时应努力领导全广东的农友，并唤起全中国的农友，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同时并希望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革命的政府以及其他一切革命的党派的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注意农民的利益，

特别注意帮助农民运动的发展，以期国民革命早日成功。

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到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后，认为：

（一）广东农民已从无方法的运动，进而为有方法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并且由取消苛捐杂税及流租运动等改良生活要求，进而为反抗民团压迫的改革乡村政治要求。此种要求经济上解放转变为政治上的斗争，就因为乡村政治实权握在土豪劣绅地主手上，他们俨然是统治阶级，农民非从这里冲锋，很不容易得到目前生活要求的条件。且能在充满了地方主义家族主义的重围冲出来，由各姓的联合，集中一乡而奋斗，由各乡的联合，集中一区一县一省而奋斗。

（二）有些地方因团结奋斗使取消苛捐及减租成功：一、得到生活上改善，影响小商人得着利益而表同情。二、农民协会组织普遍，成立有力之农民自卫军，使交通便利，地方安宁，一般民众都得着利益。三、特别的是有了广大农民群众入会的县份，或经过几次为经济或政治利益而奋斗的，必引起各界之注意，如工人起来组织工会，小商人组织商民协会，学生组织学生会，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协会。这些民众组织，都与农民协会有密切之关系，尤其各县国民党部之组织，多以农民为基本党员，在广东省党部成立，农会分子差不多居代表人数过半，即其明证。可见农民运动已促成革命民众联合战线。

（三）广东农民运动与乡村统治阶级接触，即发见地主们与地方官防军勾结作武装的压迫与摧残，故一年多来政治斗争及牺牲事件为多，差不多满纸都是血肉模糊的惨案，可说是血的广东农民运动。

（四）广东农民一年来牺牲的经验与教训，已能跑入国民革命战线，为打倒军阀及反帝国主义而努力。如东江两次驱陈之役，广州驱逐刘杨之役，帮助省港罢工封锁香港事件，都曾积极参加，有流血之事实。余如追悼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追悼实行国民党工农政策之廖仲凯先生，援助罢工周，反段反日本奉直大示威，都有很大的农民群众运动。在广东统一的革命行动上，农民的确占国民革命重要之地位。

（五）广东农民奋斗的影响，已惊起全国农民运动，中国中部及北部各省农民，已有如广东农民同一的奋斗与发展。南部与广东毗连的各省，与广东有密切关系的发展。广东可说是全国农民运动之开始。

但在封建社会制度底下，广东农民一年来之奋斗及运动上之急激变化，客观上主观上都有了不少的缺憾与错误：

（一）在发生事变奋斗过程中，每每发见组织松懈，指挥不灵，不能使各级协会取一致行动，经不起敌人之进攻。同时不能向各界宣传，引不起学生、工人、小商人同情，有时反使与农民利益不大发生冲突之小地主站在反对方面，农民变成孤军奋斗，得不到胜利。

（二）囿于眼前小利害，缺乏政治常识，每于政局变动期间，不能容忍，轻举妄动，结果不惟无益反受其害。

（三）不注意客观环境好坏及自己实力是否充足，时常为过分之要求。如协会组织未巩固，会员人数不多，便想做不能即时做到的事，致引起纠纷，使敌人乘机进攻，坐视失败。

（四）不教育及训练农民使成为有方法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群众，往往因奋斗未有方法及根本不明白地位不同利害不同而发生冲突之原因，所以演成只与土豪劣绅地主打官司。区区争目前小胜负，便认为生死荣辱关头。甚至互相仇杀，引起骚扰。而不知注重本身团结力量，唤起全体农民联合起来，采取革命策略，为有计划的奋斗。

（五）不注意纪律和组织系统。时常犯着越权干涉，或不听上级命令，各自为政，演出分裂组织之坏破现象。此种状态，尤以最近几个月最为显露。在客观上的原因，就因为广东统一后，还未有将封建军阀基础破坏，留下来而未有出路的落伍军人、无聊政客、土棍流氓，在乡村活动起来，或假借各县党部做工具，或侵入协会，故意破坏纪律，紊乱系统，分裂组织，损害农民利益，即现在外间对农会发生怀疑，其原因亦在于此。在本身上，就因为各级协会，不重视会员大会或代表会议，致使协会未有农民群众做基础，使协会失了群众监督，以致反动派侵入。

（六）在过去一年来的广东农民，差不多专在反抗防军、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互相勾结压迫的斗争中，流血牺牲，疲于奔命，使农民长处于干燥无味、困顿无聊的状态中，绝无生人之愉快，不能引起其对于协会发生乐趣。其原因就是未曾注意到积极方面为农民谋利益，如疏通水利，兴筑公路，创办各种合作事业，建设教育娱乐机关等。

因此，为纠正以前的错误，确定今后进行的方针，特决议如下：

（一）农民协会系为农民利益奋斗机关，其责任至为重大，其组织要完密巩固，才能负此重大之使命。以后必要使各级协会发生较密切之关系，上级协会要督促和指导各级协会工作，各级协会要服从上级命令，定期报告其工作与农民生活状况及目前要求于上级协会。

乡协会会员大会，区及县代表大会，要有一定时间开会。因为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可以报告工作经过，检阅自己力量，批评已往错误，发表对于会务之意见，规定目前进行计划，促进会务，训练会员，全在此种大会养成之。

各县区乡协会要向外发展组织，要在邻县邻区邻乡之未有协会者，使其组织起来。尤其乡会对于未加入之农友，要设法劝令其加入，如有怀疑之点，应设法向其解释，务使明了农会宗旨而入会。此为整理系统，巩固内部，普遍组织，扩充实力之必要条件。

（二）协会的责任，是以农民利益为奋斗的目的。但农民利益，非笼统说几句话就可以得到，也非今日提出明日就可以实行，必要平时注意农民实际生活之调查，观察农民对于经济政治教育之急切需要和农民奋斗之趋势如何，在一定计划之下，有步骤的为最低限度之要求，以谋实现之。

（三）现在各地协会时常发生事变，为应付此事变，要有很好的准备工作，先要检阅自己力量，侦探敌人实况，并要将事变发生之前因后果及发生后对于内部与社会上有何影响，自己应该如何进行，一一报告上级机关，以便上级机关指示应付之方法。尤要注意未得省协会批准不得妄启争端。同时通知附近各地协会，以便有所动作时起来为同情之援助。别方面要向一般民众及社会各团体宣传此事实经过之真相，以引起社会之同情。又为

减少敌人势力起见，不好弄得范围太大，免使战线延长，难于收拾，而受重大之损失。尤须观察时局对于此事有何影响，或此事对于时局有何关系。如在时局上对于此事有不利时，或此事对于时局有妨碍时，宁可目前容忍过去，反攻为守，保存固有之实力。总而言之，我们一举一动，要与农民有利益，同时要与中国革命有利益。

（四）我们协会与社会各界是有关系的，如某一事件，与某一界或某社会团体有共同利害的，应大家共同合作。因为合作可以打破共同危险，得到共同利益。

（五）现在各县之商民协会、学生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皆与我们在同一革命战线而组织的，应发生较密切之关系，表示极诚恳友谊的态度。如发生相互间不了解的事情，或大家会员因小事误会冲突，应召集双方负责人以互不妨害之原则和平解决之。

（六）我们以前的奋斗过程中，时常发现贪官污吏、防军，勾结土豪劣绅、地主压迫我们。现在广东统一了，与以前情势颇为不同。故遇有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防军及官员行动，如认为在事实上与农民利益有冲突时，可向省协会报告，省协会应根据国民党保护农民利益之政纲及决议，向政府提出交涉，务使政府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处理之，切不可直接取攻击态度。因为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革命民众合作，共同打倒公敌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谋中华民族解放的共同奋斗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要拥护民众利益为农民而奋斗，农民也要拥护为民众利益的党及其政府自身而奋斗。

（七）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谋得完全解放之成功，想谋得完全解放的成功，除非将我们的敌人一概打倒不可，此是在世界革命成功之后。若在目前，我们要为一步一步的解放，故在中国革命的意义上，要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除去贪官污吏、买办、地主、劣绅土豪的靠山，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同时我们要联合全体农民，以多数人应享得幸福之原则，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参加地方政治，得派代表参加地方行政、司法、教育等机关及关于农民事件之会议，以得实际之利益。如要求限制高利借贷，减免苛捐杂税，取消地主对农民用种种习惯法之苛刻待遇，兴办水利，建筑公路，疏通河道，办贫民义学、通俗图书馆及阅报社，设立公共市场，规定公用度量衡等有益于农民事项。此为有组织有理由的为农民目前利益的政治要求，与无端干涉行政显然有别。

（八）我们农民多半是受经济压迫之痛苦，除消极的反抗种种经济压迫、要求政府改良经济条件外，在积极方面，应择其轻而易举者自设方法进行之。如办各种合作社，办义务学校及农民子弟学校、农民俱乐部等，减少干枯无味之生活，引起农友对协会之乐趣，提高知识，增进地位，亦为目前应注意之事件。

（九）农民解放运动，是长期继续奋斗的事业，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尤非单独农民自己可以解决的。在过去的经验，因同地位同利害的关系，可与我们作长期奋斗的，所谓革命的天然同盟者，就是工人阶级。去年“五一”通过工农大联合之后，在广州驱逐刘杨之役，省港罢工封锁港口反帝国主义事件，东征南征统一广东运动，无一不表示工农联合共同积极奋斗之重要。此后奋斗的途程，应有工农好兄弟携手并进，逐步为营，以达解放之成功。间或有农友和工友因某种小利害发生纠纷，此是属于个人利益方面之事，若在整个的两个团体的关系，敌人是一样的，利益是相同的，行动是要联合一致的。

（一〇）广东统一后，农民运动已有长足之进步，相当的成绩。但广东是中国重要之

一部分，并非中国全部，我们想继续努力下去，必要保持此统一的广东革命基础，不为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摇动。因此，就要谋中国全部农民起来组织共同奋斗的攻守同盟。"五卅"运动之教训，中国中部及北部的农民仍是呻吟于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铁蹄践踏之下，组织未甚发达，遂使工人罢工孤军奋斗，一时高涨之反帝国主义运动，终为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所压服，现在演成奉直军联合勾结英日帝国主义极反动之僵局。于此，我们更有努力号召全国农民赶快组织准备起来，与革命民众联合、尤其与工人联合共同奋斗之必要。此次国民政府北伐，就是大半解决农民问题，故北伐与全国农民运动是一致的。

在中国革命的意义上，在工农本身解放奋斗的过程中，单是工农大联合，并联合全国革命民众共同作战还是不够的，还是不能成功的，我们要联合世界上被压迫阶级及各被压迫弱小民族，共同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尤其世界组织的农民大本营——赤色农民国际，我们要受其指挥，使我们农民从在中国在世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会务总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会务总报告之后，一致决议如下：

（一）广东省农民协会自去年（一九二五年）成立之后，在过去一年中，从组织上已经由二十一县发展至六十一县，会员人数由二十万增加到六十二万。宣传的工作扩大，协会内部统一，影响所播，被于西北各省。协会的地位，与革命潮流俱进，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间，屹树基础，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对此各点，认为满意。并且在每个实际问题中，如刘杨之役，廖仲恺先生被刺，镇压反革命派，肃清东江，勘定南路，均能领导农民，实际拥护国民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并且在香港空前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大罢工，都能够始终与工人同站在革命的战线之上，实现工农联合。凡此均能证明协会努力于政治工作，而且革命化了。于此更足以证明中国国民革命之完成，非农民起来参与不可。过去的工作，大会认为有相当的成效，此后务须依此方针，并加努力，以求达到最后的成功。

（二）但是，检阅一年来的工作，在组织上，在策略上，在一切的行动上，发现有以下的缺点：

一、组织仍然涣散；

二、会员缺乏训练；

三、调查与宣传的准备工作未充分；

四、各级协会间互相关系尚不密切；

五、各级协会未能按章开会及报告；

六、不顾客观的情势及政治环境的冲动行为；

七、依赖政府的心理，失却本身的自信力；

八、会员的行动犹未除宗法——地方个人主义的色彩；

九、会员对协会的观念仍然薄弱；

一〇、使用权力致政府一部人之不谅解，及未能获得一般人之同情，甚至予人以攻

击、造谣的工具；

一一、未得上级命令，滥发快邮或报告不尽确实。

以上诸点，苟犯其一，均可使到协会内不能紧密团结，外不能得人同情，并且破坏农会者越有所借口。故大会以为不仅要积极扩展协会的组织，还须力矫上述的错误，然后能充实协会的力量与敌人争斗，然后能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主、军阀、帝国主义几重压迫底下解放出来。

（三）协会的经费，不能影响到政府的收入；会员按章必须缴纳月费。而且为使农会与会员间的关系密切起见，月费之征收，至不容忽略。因为会员缴纳月费，不特协会的经济赖以维持，而且使会员与协会不能分离，时常注意会务，实有最重大的意义；无论协会的经费如何的充足，断不能以手续繁琐，放弃征收。因如此则会员淡忘会务，协会等于虚设，易为三数人把持，于协会前途尤发生绝大的危险。

（四）农民自卫军在过去一年种种事实中，完全证明不徒能够保护地方治安，尽了自卫的职责；并且拥护国民政府，协助罢工，也尽了相当的努力。自卫军组织的原则为：一、非在战时状态不得常备；二、非会员不得充农军队员；三、直接受协会指挥统率；四、平时分警备、义勇两队，并注意训练。此后仍须依照上项原则从事组织。

（五）中国国民党，其目的在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农民协会为人民组织的团体，其目的在谋农民群众的解放。然农民解放必待国民革命之完成，所以国民党与农民协会在组织的形态上及性质上均不容混淆，然而互相的利害关系则皆一致。东江南路相继肃清，全粤统一，一般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分子，失所凭借，每乘间加入国民党，肩国民党之名以便其私，甚而至与农民协会成对峙形势，此不独国民党之不幸，抑亦对协会大有危险。于此，大会决定凡有协会组织之乡区，须同时扩充国民党的组织，以增加国民党的力量，使在群众中建立不移的基础。

（六）以前协会组织手续未经规定，因而发生了许多误解，虽然章程上确立了组织的原则。大会承认前次扩大会议议决所颁布的组织手续是对的，此后各级协会的组织，均须依照是项手续办理。关于章程上所定一、区的范围是指行政区而言，如果地方太大，可在区之下组织分区；二、特别区应该即取消；三、增加各级协会职员人数；四、乡会会员须超过该乡成年农民一半以上；五、区会组织须占该区所有之乡总数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形时，可由省协会审核特许。各路办事处之设，原图指挥便利，及使各级农民协会关系密切，于组织及进行上更有秩序、更有纪律的健全发展，在数月中已收甚大之效果，仍应继续。

（七）纪律为协会之生命所托，严格的纪律，为一个有组织的革命的团体所不可缺的要素。纪律愈森严，则团体亦必愈坚固。不但协会需要一种纪律，而会员与会员之间，亦应保持着互相监督及批评的精神，以巩固农会的内部。此后凡有不遵会章，违背大会决议，不执行最高协会之命令者，应依章程之规定惩戒。

（八）本会会务已因广东的统一及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扩大，工作将更加重而困难。农会之目的在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但未达到目的之前，自必经过几个时期。即如今年的情势比去年初成立省协会时就大不相同。在某一时期中，协会应运用如何方法，以使协会的力量愈加伟大，使一切行动无背乎目的，然亦适合当时客观的环境，所以大会决定

协会应采取如下的方法：

一、须认清农民协会是农民自身的运动。农民解放能不能成功，全视农民有无能力为断。

二、农民协会是有组织的、整个的、继续的、全国的、甚至全世界的运动。

三、农民协会得到最后的成功，一定经过很长时间的奋斗，经过多次的失败，并非农会一经组织，则以前种种压迫痛苦，均可不费力气，立刻蠲除。时时都应该准备作残酷的争斗。

四、农民协会要以贫农为中心。因为最劳苦的便是最革命的。然而自耕农与农村中的知识界、小商人、负贩者也须与之联合，并且可以和小地主合作；因为现在尚在国民革命时期，只要是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均可以联合一起，集中各界力量于反帝国主义之战线上，共同努力。

五、协会应该注意青年农民的教育，切实从事农村青年生活的改善。

六、根本的政策及主张务须全省都能够一致，但应付事实时，则完全要看实际上的情形，变换战术，因地方或时间上不同而异。至于提出未到时机的、目前不能实行的口号或要求，应极力避免；因不啻促反动势力之团结，向农会联合进攻。现在一切反动势力，仍立于有利的条件之下，农会组织仍然薄弱，轻于一试的结果，徒然获得无谓之损失。因此，一切的口号和要求，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有充分的宣传与准备。

七、妇女在农村中约居人口之半，所受之痛苦较之男子尤为厉害。现在会员绝少妇女，不能代表农民妇女之利益。而一年来的经验，已证实妇女拥护农会时，即得有绝大的帮助，及至反对农会时，则受莫大的损失。所以凡属会员应介绍其妻女人会，豁免其人会费，及减低其月费至最少限度。

八、努力于思想的宣传，设立农民学校，以教育会员之子弟。

九、在过去一年的工作中，农民运动正在萌芽，反动势力顽强压迫，到处发生骚动，自然没有余力来举办建设事业。现在已与去年不同了。敌人虽还是伺隙而动，压迫仍然是紧紧的，绝不会放松，但总不如去年猖狂，故此时已多少有点可以建设的机会。现在农村中最急的工作莫如合作社，如信用、购买、利用生产、贩卖合作社，是项合作社关系农民生计甚巨，应由乡或区农民协会设立合作部以经营之。

十、省港反帝国主义大罢工后，工农联合已不徒是一空泛口号，各地农民都帮助纠察队封锁香港澳门。但是村落中的及市镇的小手工业及纯粹的工人仍然未十分联络，以后应发生密切的关系，并且须与商界学界有切实的联络，以谋工农商学共同的利益，打倒共同的敌人。

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报告之后，一致决议：

（一）自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到现在，是中国政治状况最剧变的一个时期，即中

国革命潮流最高涨的一个时期，也就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搏战最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消涨，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阶段：自“五卅”初起至郭松龄倒戈，是革命潮流最高涨期，即革命势力进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时期；自郭松龄失败至现在，是革命潮流低降期，即反革命势力胜利向革命势力进攻期。现在的北方已完全被日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所把持，北方的国民军正在被追击；长江流域渐归吴佩孚掌握之中；湖南的唐生智又退出长沙，并且吴佩孚还想企图进攻广州政府。所以目前正是革命势力一个最危急的关头。

（二）但是在另一方面，从这一年革命运动与政治斗争的结果，革命势力已得到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工农的势力。工人阶级组织在这一年数量上的发展已经非常之伟大，如上海和香港两地，差不多新组织了三十万以上的工人，至质量上的发展，如上海及香港工人之战斗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革命中一个伟大的力量，并且是世界革命的一支有力军队。农民在这时期无论数量上与质量上都有惊人的进步，尤其是广东，现在已有八十万以上的农民组织，成了广州革命政府之唯一的基础。这个革命尤其工农的发展是表明中国的国民革命已到胜利之前夕了，这是“五卅”以来在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的一切牺牲上所得伟大的结果。但是同时我们须指出：因工农势力的特别发展与帝国主义的零碎让步，遂使资产阶级离开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而与敌人妥协，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亦渐趋于消沉，因此工农阶级已渐成孤立之势。这是一个最危险的现象。

（三）虽然目前的政局已到了一个反动时期，虽然反动势力正在向革命势力进攻，但是反动势力的自身始终还没有稳定，自身的冲突还向前发展，即是张吴自身的势力还在摇动期间。英日帝国主义还不能如意指挥张吴支配北京政权，迅速建立北京的反动政府，即此也显然表示张吴间冲突之险恶。照现在的情形看，北京绝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张吴间的冲突是绝对地逐渐向前发展，张吴间的新战争就在眼前。在革命一方面看，广州的革命政府已经基础稳固。北方的国民第一军虽受了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还能保持相当实力。长江流域反吴的势力在各省都是始终存在。北方和长江的民众势力虽一时受了损失，其活动虽一时受了限制，但在暗地里还是进行。我们可以说革命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停顿，并且正在准备一个新的进攻，寻找新的出路。

（四）革命运动最新的出路，便是广州革命政府势力已经发展，换言之，即广州政府北伐。所以目前我们工农阶级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以全力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同时在北方帮助国民第一军保存其实力，使之能与张吴渐成对抗之势。在各地则领导一切被压迫民众，特别使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回到革命的战线上来，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联合战线，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革命的出路是广州政府北伐！

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

巩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打倒张吴，北伐成功！

废除地主对于农民苛例决议案

人类靠土地来生活，好比靠空气和水是一样。地主有了土地所有权，好象握着人类生存的命脉。尤其是专靠土地来养活的农民，地主更容易把他随便操纵。地主看清了农民脱离土地，好比鱼之脱离水一样，地主在这个情形和他的特权之下，每每把地租提高至每亩地全收获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之高额。此外额外还要附以种种苛例，如要求“上期租”之类。地主恐怕农民遇凶年不能还足租，故先向农民预收下期之租。农民向地主批田耕种，用工下肥，田地渐好，收获较丰，地主即要农民增加租额，使农民不敢尽量下肥及竭力工作。又如“调田”，地主欲加增租额，如遇农民不应，即收回土地。或者旧地主转卖与新地主时，新地主必经过一次之“换佃”并“增租”，易使农民失业，流为匪类。又如田主收租时，要农民请其饮酒，并规定其酒席中之鸡、鱼、猪肉等物，地主每每来饮酒者并不限制人数，往往数人至数十人之多。又要“田信鸡”、“田信鸭”、“田信粮”、“田信酒”、“田信钱”等种种附带的东西。又如批田之时，硬要农民纳缴“批头银”，每亩一二十元至数十元不等。又要“饮茶钱”等。地主收租时，必用地主之斗为正斗，农民之斗，概不承认，于是地主把斗一年一年的加大起来。用箩用秤者亦然。地主将租收好，又硬要农民挑送到家，虽数十里亦不给工资。且有时因迟些时候，反而取打。又有所谓“铁租”者，是逢凶无减，不论农民饿死不饿死，一粒也是要交清的。地主往往派工役到乡间索租，必要农民给与工役费，即所谓“脚皮钱”，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如牵牛、掠猪、锁屋、或拿农具仓料等为抵。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或因农民对地主不和顺一点，地主即殴打拘禁之。此种情形，广东西江、北江、南路到处都有，应请政府一律禁止之。

取缔高利债决议案

我们现在借钱还利，是应该的。可是少数拥有资财的人，往往乘多数贫困的农民工人，于饥饿难堪青黄不接的时候，即提高其利息。贫困的农民工人，以其“现死不如赊死”，明知道借高利债是终于必死的，然比较目前即时饿死，总觉得好些，故任由债主提高利息到如何程度，也必出尽方法去借债，所以贫困日益扩大。掠夺贫民的高利债，若不加以限制，则农民必不聊生。

据我们所知，如龙川、曲江、仁化、惠州、河沅、遂溪、海陆丰、佛山各地有“借谷债”者，借银一元，到收获时，还谷四斗至五斗（约银三元）之重。广州市郊更有借谷银一元，利息以月递增者，如一月一元，三月三元，四月四元，五月五元，六月六元，而照银计算，以谷抵之。

又如英德、遂溪、罗定、海陆丰、德庆等县，有所谓“按借”，有母钱一元，月利一角；或借九角而契约写作一元，月利以一角计算；或借一元，一日利一仙者；或借百元半

年还利四十元者；或母银一两，月利五分者。其抵押之物为田园、房屋、猪牛等之动产不动产，罗定更有以妻儿作抵押品于债主，如在债主家中怀孕者，则其子归债主，借债者得以母银赎回其妻，或常因过期不能赎回而断送其妻者。此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使人不忍听闻。

又有如海陆丰、潮安、饶平、英德、曲江、普宁、德庆、潮阳、遂溪等县、汕头市郊，有所谓“借银”者，借母银每两月利三分至四五分者。遂溪有一元三天利息一分五厘，即月利一钱五分者，以三个月或四个月或半年为限期，至期未还者，即转利为母一次，名为“复利债”。

又有如紫金、乐昌之“出九入十”，即借银一元，交九角，每月利息一角。

琼崖有所谓“五钱市”，借一百元，月利七十五元。

惠阳、河沅、紫金、海丰、罗定，有所谓“九出十三归”者，即借银一元，交九角，一个月后，还一元三角。

海丰有所谓“圈仔利”，借银一元，十天结利一角，一年为限；至年终将母利共起来做“租仔”，每十元年利纳谷一石。

阳江有“卖青苗谷”，借母银一元，每半年还利一元。又有“私押利”，借银一元，月利一元五角。

海康又有所谓“借十交六”，“借十交八”，即借银十元，只交六元或八元与借者，月利三分至五分乃至十分者亦有之。

罗定有所谓“乾利”，母钱一元，月利五角；“湿利”，母银一元，年利还谷二斗。

四会有所谓“投钱”者，母银十元，年利由九元至十一元。

佛山有所谓“逋桥利”者，借银一元，一天利息一角，五天为期，过期倍计，转利为母。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无奇不有。一般贫民，因此债累重重，卖家业、卖妻子、或逃亡、或自杀者，不可胜数，惨不忍闻。救国之计，首在救人，此种高利盘剥，不但害人，且足以亡国。应请我政府明令制止，规定最高利率，以杜流弊，而安民生。

废除苛捐杂税决议案

地方官厅、警察、民团或军队，为维持地方行政与保护人民治安起见，对于财政一项，当然是要有充裕的收入，故征收捐税为必然之事，亦当然之事。但是地方官厅、警察、民团或驻防军队之利益，必须与人民之利益，同时并说。苟地方官厅、警察、民团或驻防军队所征收之捐税，太损及人民利益者，人民固不愿意给纳，即地方官厅、警察、民团或驻防军队，亦不应该征收。

如汕头市郊有猪只捐、女子出阁捐、牛只捐、鹅母捐、番薯捐、青菜捐、丁口捐等之征收。普宁有猪厘捐、糖寮捐、祠堂捐、戏厘捐、嫁女捐、糖沫捐、牛头捐、攤擡捐等之征收。中山有游联队费、联团费、民团费、保卫团费、自卫团费、捕费、附看费、沙骨费、沙夫费、果木费、鸭部费、疯人口粮费、旧式农会费，中小学附加费等之征收。新会有游击队费、碉楼费、民团费、联团保安费、船卡费（内分上中下三卡）、联航保安队

费、联防保安费、勇费、商轮稽核所费、团警教练所附加费等之征收。惠阳有牛捐、屠牛捐、屠猪捐、花生捐、生油捐、谷捐、米薯捐、盐斤捐、梅菜捐、豆豮捐、米麦捐、生菜捐、糖出口捐、杉木排捐、房捐、蚕茧捐、驳艇捐、黄豆捐等之征收。吴川有牛只捐、蒜头捐、蒜串捐、麻捐、壳捐等之征收。番禺沙河一带，有过路捐之征收，宝安有人头税之征收。韶关有粜谷捐之征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或为县分署征收，或为警区署征收，或为民团局征收，或为驻防军队征收。其名虽曰维持地方行政，或保护人民治安，其实则徒饱私囊，给人民以重大痛苦。而地方行政，人民治安，毫不顾及。

在廉洁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有此苦毒人民之苛捐杂税，实属有污国民政府，且予人民以埋怨国民政府之口实。我们为维持政府对人民之威信起见，应请政府一律废除之。

农民合作运动决议案

大会接受了农民合作与农民运动报告之后，深信此等经济组织，实为农民利害切身的组织，可确立并巩固农民运动之基础。其对农民现在所受经济上的痛苦及压迫，确能解除其大部分。例如信用合作社，确能谋贫农间金融之流通而轻减其借贷之利息，以抵制地方土豪、地主等高利贷。购买消费合作社，确能使农民收价廉物美之效果，而使其生活容易减少层层奸商之盘剥。贩卖合作社，确能使农民卖得其值，不致为奸商、土豪、垄断其利益。生产合作社，确能增加并改良农民之生产，而使其生活上有裕余。因此，本大会决定对合作社之组织，今后当努力向农民宣传，并促其实现。

青年农民运动决议案

青年是活泼而勇敢的，青年农民因受压迫的痛苦，革命的需要尤为热烈，在各地的斗争中，都可以证明。但以前各地做青年农民运动尚很少，所以青年农民的力量尚未能表现出来。

青年农民运动是包括农民之子女及乡村学生，那末他的地位，就很重要了。他的成绩将使农会更其有力量，更为巩固。他可以帮助农会的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他能扩大国民革命的势力；他能使新文化在乡村里萌芽起来。所以各地农会一定要极力帮助提倡青年农民运动，并帮助其发展。青年农民运动的意义是要引导他们来参加政治经济斗争。但经济斗争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容易感觉，我们必须引导他们先做经济的斗争，从这斗争中引起他们的政治斗争兴趣。同时文化的斗争也很紧要，因为不把旧思想的锁链打断，他们将无从活动起来。

政治的斗争，在中国的环境里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劣绅们所把持的乡村政治，取得一切自由。这个斗争，青年农民是要与一般农民共同去奋斗的，因为他本身种种痛苦都是这恶劣政治环境所给与，各地农民要竭力去引导他们来参加。

青年农民的经济斗争，除一般农民的要求如减租额，加工资，减时间，反对苛例，反

对高利，反对不平等待遇之外，应特别规定如次：

（一）青年雇农得工资，最少都要能维持生活。与成年作同等工作者须同等工资。

（二）不得加多额外工作，不做危险工作。

（三）雇主不得虐待青年农民及牧童。

（四）反对父债子还制。

（五）每日工作时间不过八小时，不作夜工。

（六）年节及喜庆日须休息。

（七）病伤由东家医理，不得开除及扣工资。

（八）无故不得开除工作，如中途辞退，须赔偿失业损失。

（九）青年农民的待遇，应与成年的平等。

（十）青年农民应得免费教育，东家应资助青年雇农及牧童以教育费。

（十一）要求以乡村公款，设立俱乐部及其他娱乐机关，以供青年农民之娱乐。

以上的青年农民要求，须常向青年农民宣传，乘机提出，或各在可能时，须努力使之实现。

青年农民的教育、宣传是很重要的，各级农会须争得各乡村公款或各县公款以设立完全免费的平民义学，名曰青农补习学校。

除暴安良决议案

自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全省以来，人民获得了不少的幸福，但是一般土匪散兵逆党，潜伏内地，到处奸淫、劫掠、焚杀，实为广东和平之大障碍。我们晓得土匪之中，多数为失业之农民受压迫而为土匪者，其他如散兵逆党为匪者，亦不在少数。我们固然一方面要求政府改善农村之组织及其生活，使农民减少其失业者，或已失业者，亦可恢复其业务，而不至于为匪；一方面仍是请政府以兵力竭力剿办。如惠阳一带土匪，勾结奸商，包运仇货，焚劫农村，四贴赏格，能捕农会会员者，每名赏百元，能捕农会办事人者，每名赏三百元，能捕罢工纠察队员者，每名赏五百元，这是完全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土匪，又如陆丰五华陈逆余孽罗一东、杨作梅、温伯洲等，勾结地主劣绅土豪，组织武装千余人驻扎陆丰之剑门坑及五华一带，专以残杀农民为唯一之目的，并与香港陈逆炯明互通声气，秘密组织三合会，希图再扰东江，非迅为剿办，必贻将来之忧。其余如北江西江及中路南路之土匪，霸占河道、勒收行水、掠人勒赎、洗劫农村者，不一而足，亦非速为肃清，不能使广东人民得到真正和平和统一，及巩固革命基础。应请政府于最短期间，完成除暴安良之事业。

惩办逆党决议案

对于一年来东江陈炯明逆党、南路邓本殷逆党以及各处土豪劣绅、摧残农会虐杀农民

等逆党，给予我们革命农友焚杀流离死伤的惨痛，大会异常痛恨，认为本会全体农民当前大敌，有呈请国民政府从速执法严惩之必要。唯有这样才能够肃清反革命势力；唯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农会安全；唯有这样才能够安慰我们被难的农友和我们既死的烈士。我们一致决议：除一方面继续烈士奋斗精神，继续与逆党奋斗外，仍应请国民政府采纳我们惩办逆党的要求，必肃清逆党，不能再有虐杀摧残为止。以此确保今后农会的安全，特议决如上。

预征钱粮问题决议案

国民政府要巩固革命基础，要打倒国内一切军阀，要打倒帝国主义，所以非有大量的财富来运用不可。不过国民政府预征钱粮，须根据下列三个原则，方有成效：第一，要使财政的收入多；第二，要使财政的收入快；第三；要使不满意的人少。现在据各地的报告，各地方官署预征钱粮，多由一般地主、土豪劣绅、旧粮房粮站粮差所包办，结局不但地主劣绅不用出粮，并且有得中饱。粮差则到处苛勒，贫困的农民，不论无钱也好，无地也好，一律硬派钱粮，否则拘捕监禁。结果使政府所得的钱少，收入又迟滞困难，不满意政府的人多。这就很容易使人民与政府分离，使政府的基础动摇。我们为拥护国民政府及人民利益起见，应请求政府明令规定预征钱粮，须由大地主殷富者负担，凡属有地三亩以下之贫苦农民，应予以怜恤，一律停止预征。

农村教育决议案

横在我们目前唯一的大问题，不消说就是国民革命之成功，最要的就是把占了全国人口十分之八的农民组织起来，做成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队。我们虽是组织了，如不能加以相当的教育和训练，结果所谓组织，只是一种形式，会失去作用。本会从去年成立到现在，农民协会发展之程度，在数量上虽然增加了三四倍，在质量上不能得到如数量上相当之增加，这都是组织了而缺少教育训练之故。

在去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农村教育决议案中，虽然把教育方针和教育设施定几个原则，可是没有规定具体的计划，因而一年来实施的也是很少。本届大会为促进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民知识程度，增加农民革命战斗力起见，实有重新规定具体计划之必要。

第一、经费问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本有利用地方公款兴办各种农民学校之规定。查各县地方公款之收入，多是取之农民，而为劣绅土豪所侵吞中饱，即使由政府曾经指定之学款，亦不过用之于县城地方，甚少遍及于农村。因此我们要求政府，今后对于地方学款之支配，应以十分之五以上用之于农村，未经指定用途之公款，得由各县农民协会分别举报于省农民协会核实，向政府要求，明令拨归专办农村教育之用。

第二、教师问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本有厉行农村义

务教育，及补助教育之规定。但是想厉行农村教育，第一步就要首先养成一班农村教育师范人材，因为农村办学，困难的就是教师问题。所以我们要要求政府立令各县速办一间农村教育师范学校，以便养成一班人材，专备农村学校之聘用。

第三、农业展览会。农村教育方针，一面可使农民于教育中养成其革命思想，同时也要增进其农业之知识与技能。中国农民的农业知识太幼稚了，所以一切农业生产品一和外国比较，往往落后，因之个人及国家之经济均受影响。农业展览会，就是搜集中外所有与农业上知识技能有关之农具及农产品，尽量陈列之以供农民改良农业之参考。对于提高农业上之知识技能，有极重要之关系。所以我们要要求政府于最速时间，筹办一个全省农业展览会，并招待我们各县农民代表来省参观。

第四、农民自动兴办各种学校。我们除了要求政府兴办学校之外，自己也要协力进行。农民协会是农民自己之组织，负有组织农民教育农民之责任，应该体察农村情形，积极提倡教育，兴办成年农民补习学校、通俗讲演所及农村小学等。其设备不妨简单，其经费务求节省，以便举办，至普遍为原则。

第五、教学之课程。关于成年农民补习学校及讲演所，应以国文、信札、卫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政治常识、国民党史及三民主义等为课程或讲演材料，此外现代政治问题、改良风俗问题、世界大势等，尤宜随时提出讨论。至于农民小学之课程，除普通小学课程之外，其与农业有关系及显浅之革命理论，亦宜随时灌输，故宜特别增设三民主义浅说、国耻小史及农业常识等科。

（轉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

李　　锐

在初期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同志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1923年初，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

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干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于1922年9月设了补习班；在补习班国文课中特别讲授了依据湖南情况写的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土地日渐集中和农民日益破产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23年初，在水口山矿区作工会工作的刘东轩、谢怀德两位同志被党派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这儿的农民在水口山作工的很多；农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水口山罢工斗争的情形和工人俱乐部的作用，都非常兴奋。不久就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

白果这个地方是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是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虐待很重。在刘、谢两同志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采取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一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七人为委员，刘、谢分任正副委员长。

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十二期邓中夏同志"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宣言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

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社会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十万人以上。在农会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原来谷价一元三斗，后压平为一元四斗。同时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急忙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群众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一人，受伤的很多，并将刘东轩、谢怀德等九个农会负责人捕去。这时正逢谭延闿、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刘、谢等九人得以释放。战争结束后，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四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七十多人。1926年北伐军刚到衡山时，曾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

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在他的家乡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几个在地方上惯打不平，常同地主团保作自发斗争的农民积极分子，毛泽东同志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使他们很快成为农民中真正的带头人。于是，几个月之内，在毛泽东同志的家乡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农民开始懂得“打倒军阀”的道理；毛泽东同志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通俗地解释为“打倒洋财东”，使农民更加容易接受。农会开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时常与地主豪绅发生冲突。于是地主们告到长沙城里，要赵恒惕来捉毛泽东同志。农民报了信，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便到广州去了。

1926年8月，“湘潭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中，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地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经过很艰苦的斗争和伟大的牺牲，虽在赵恒惕的铁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绅、团防、地主武装的严重压迫，而农民协会的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斗争。如韶山、株亭农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平粜阻禁运动，农民领袖被赵政府捕押者凡三次，被团防局捕捉及诬控为匪者盖已屡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①，且以煽动农民嫌疑，几至被逮。

韶山的共产党支部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的韶山农民，从1925年成立农会之后，培养出不少的农民运动骨干和党的干部。比如革命烈士毛福轩同志，雇农出身，没有读过书。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养，带他到长沙的学校中去当校役，半工半读，后来又带他到安源煤矿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回到湘潭一带进行农民运动，毛福轩同志因此成为能说能写，颇具才干，且为农民所爱戴的领袖人物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福轩同志仍在湖南、上海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时，毛主席有一次谈起毛福轩同志，他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务

---

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梅、蒋迪空、庞叔侃等，都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韶山的农民干部。”①

毛泽东同志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中国农民运动、革命运动大规模培养干部，是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

1925年，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后，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名额比过去增加了，共有三百二十七人，包括十九个省的学生，其中以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学生最多。湖南党组织这时动员大批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广州去受训，有的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多的进了“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是李富春同志），毛泽东同志在班上讲“农民问题”。政治讲习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干部。

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毛泽东同志讲课时深刻地联系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讲“牛王庙、三薯加一米②，这些为学生熟悉但不能从其中看出道理的农村情况。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毛泽东同志也向学生要东西，“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居民情况，土地情况，生活方式，他们的出身，张三如何富起来的，李四变贫的具体事实，那个村里官（公）地有多少，归谁管，归谁种，租金数目……他又经过分析研究作为教材讲给学生听。”③

当时彭湃同志④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毛泽东同志组织讲习所的全体学生到海丰参观和实习。“学生于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⑤

毛泽东同志讲课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学生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图表，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体而形象地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说明那些是革命的朋友，那些是革命的敌人，以及在革命运动过程中，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又会起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于1926年广州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

---

①毛远耀：《在毛主席亲自教育下的韶山农民》，载《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的人民英勇奋斗的三十年》，195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牛王庙、馬王庙，指地主恶霸营公堂一类的事。三薯加一米，是指广东东江一带农民因地租太重，經常吃三分紅薯一分糙米的飯，小孩子多餓的患鼓胀病。

③《記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二三事》，載《华南革命史迹》，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彭湃，广东海丰人。中国共产党党員。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的領导者。第一次国內革命战争时期曾領导广东东江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員。等一次国內革命战爭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在海、陆丰組織农民自卫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維埃政府。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29年在上海参加江苏省委的領导工作。同年8月24日，因奸細告密，被捕，8月30日牺牲于上海龙华。

⑤《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經过》，載《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出版。

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这篇伟大的文献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公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当时陈独秀曾拒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发表这篇论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篇文章成为湖南各地群众干部训练班的讲义，实际上指导着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思想和行动。

受了毛泽东同志这样明确的阶级教育和策略教育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的湖南籍学生，由于形势的发展，没有等到毕业，就先回来了一批人。他们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名义，大多数被派在铁路沿线工作。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走上了正确道路，因为他们从毛泽东同志和彭湃同志那里学到了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他们从下层访贫问苦开始，联络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后，就成立乡农民协会。有二、三个乡成立了农会，然后才成立区的领导机构（县的领导机构多半是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才开始成立的）。那时农民协会的主要成分是贫苦农民和一部分农村贫苦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由当地共产党员早就联系了的小学教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从组织新民学会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共产党，在湖南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广州办训练班时培养出来的大批革命干部，质量一般都很好，这样就使得下层群众运动中的根子很正。

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前，在农民运动中开展的多半是宣传、教育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也有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农会的工作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地方是秘密状态，有许多地方是半公开或公开状态。如当时益阳的农民运动就是公开进行的。1926年的阴历元宵节，益阳郊区“农民诉苦队”一万多人，举着灯笼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苛捐杂税”等等。大队以十六个溜星（火球）开路，农民把牛牵到县衙门的“大堂”上，向县长说，“我们喂牛都喂不起了”。

①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9頁。

第一届至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

（一九二六年）

绮　园

编者按：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二期。文中所說的"本党"，是指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有中国共产党員参加的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資产阶級、民族資产阶級結成的革命联盟——国民党。文中所說的"本部"是指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会农民部。"中国农民"月刊即該部的机关刊物。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名义上也是該部所办。

一、总　述

本党自改组以后，即认定中国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故宣言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发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之实力。根据此等扶助农工运动之原则，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乃有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之决议。第三十九次会议，乃有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之决定。农民运动讲习所之组织，乃实施方案中之一项，盖所以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

农民运动的目的，一方固然要求农民了解本党之主义，使之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之奋斗；而一方亦要使之明白自身阶级之利害，起作自身阶级利益之奋斗；盖必如是方能使之不断的努力，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

因此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之取材，在第一、二届，则以中国国民党员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而身体强健能忍苦耐劳者为合格；第三、四届，则专招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

因此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科目之分配，第一注重本党主义之解释；第二注重国民革命基础知识之灌输；第三注重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法；第四注重集会结社之实习及宣传之训练；而尤注重于军事训练，盖学生熟习军事训练，一方可以指导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革命之真实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一方可以养成有纪律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

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十三年（指一九二四年，以下类推——编者）七月开办至今，学生毕业者前后已有五届了。第一届凡三十三人，第二届凡一百四十二人，第三届凡一百一十四人，第四届凡五十一人，第五届两班学生共一百一十四人，总共毕业生四百五十四人。在此四百五十四人之中，被选派为本部特派员者约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使之从事地方农民运动工作。

本党一年来之努力，在广东一省已有三十二县、五十余万农民所组织之省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运动有如风起云涌之势，最近未成立之各县，固已纷纷成立，而北部诸省亦相继开始进行，若再加以切实指导，保护其发展，不难于最短期间使全国农民参加本党战线，促成国民革命成功。所以对于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材，益感缺乏，而要求亦非常急切。本部前办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皆取材于纯粹农民子弟，系为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现在此项人材，在年来每个争斗中，已足表见其奋斗苦战之特具精神，可以勉强敷用，且已筑起农民协会之基础。此后尤宜注意者，就是上马杀贼有人，下马作露布者仍难其选，且亦势难兼顾，因此本部为利便农民运动全材起见，乃决议续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定考取中学毕业之学生。

二、章程及科目

第一章 入学资格及手续

第一条 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始能合格；第二、三、四届不限中学卒业，凡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均一律录取，并声明不取田主及绅士的子弟。

第二条 凡合于前项资格，经本党各级党部负责人介绍，或由各地农民协会之负责介绍与保证，并携带四寸半身相片及国民党党证，始得报名，考试合格者录取。

第二章 学额与考试

第三条 本届学额定××名。

第四条 笔试，口试，检验体格。

第三章 修业期限

第五条 定三个月毕业，如修业期满，考试合格，由农民部给予毕业证书。

第四章 教授科目

第六条 （甲）关于本党主义者

一、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

二、国民党党纲及宣言

（乙）关于中国国民革命之基础知识者：

一、甚么是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侵略简史

三、中国民族革命史

四、各国革命史

五、社会学浅说

六、政治经济之浅释

七、各国政党状况

八、法律常识

九、中国秘密社会简史

十、每周政治报告

（丙）关于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略者

一、农民运动之理论

二、世界农民运动史略及其现势

三、农民协会与自卫军之组织法

四、农民运动现况及其趋势

五、中国农业情形及改良方法

六、农村教育

七、合作运动与农村之关系

八、中国工人运动及工人状况

（丁）关于实习宣传训练者

一、统计学

二、阅书报与造论

三、演说与集会实习

四、辩论会

五、唱歌

六、图画

（戊）军事训练

（己）农民运动见习（于假日或星期日为之）

第五章 待遇

第七条 学费膳费寄宿费堂费一律豁免

第八条 录取后由本所发给制服一套，并按月发袜一双，每个半月发鞋一对。

第九条 书籍讲义与纸张笔墨概由本所供给。

第十条 除此之外，每名每月另发给津贴费三元以资零用，毕业成绩优良者选充本部农民运动特派员。

第六章 纪律

第十一条 本所为训练革命人材机关，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要绝对尊重团体行动，无复个人自由之可言。所以凡关于本所宣布之一切规例及命令，均须绝对服从遵守。

第十二条 本所为使学生习惯团体生活，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活动干员，凡在操场讲堂膳堂宿舍及在外之一切行动，均以军事训练方法管理。

第十三条 如学生于纪律有违反时，则视其犯事之轻重为惩戒之标准。轻微者警告，重者记过，不可贷者开除（警告二次作记过一次，记过三次即行革除）。

第十四条 学生请假，如属于农民运动事件者，须由该负责保证人备函申明理由，经所务处核准，方可请假；告病假，须得本所医生证明；关于个人私事概不准请假。

第七章 保证书与志愿书

第十五条 学生于入学时，须由该负责介绍之人填具保证书及自己填写志愿书。

第十六条 该保证人须保证该生除因不得已事故经请主任允准或由校斥退外决不中途退学。

第十七条　学生如有被斥革或无故中途退学者，所有一切该生学膳宿衣物书籍等费，由农民部追究保证人负责赔偿。

第十八条　本所设一检查委员会，由本所职教员及农民部派员若干人组织之。其权限为检查应考之学生合格与否及学生入校后之一切行动。

第八章　休假

第十九条　本所休假日如下：

一、星期日

一、纪念日

第九章　所址

第二十条　本所所址在广州市东皋大道第一号（报名处设在本所）。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一　讲堂规则课程表宿舍规则膳堂规则另订之。

第二十二　本章程得以本所所务会议多数通过或农民部之训令修改之。

三、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甲　分子

十三年七月三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训练，定一个月毕业，计学生三十八名，在中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人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有女生二名。

乙　训练

此届讲习所主任为彭湃同志。学生除正式授课外，最注意于所外活动，凡星期日须有农村运动实习，步行之训练，马术之训练，又有农民党员联欢大会之组织，市郊农民协会之成立，及东西南北四郊之实际调查与宣传组织。故此期学生实为本党农民运动之推进机，现在亦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

丙　军事训练（略）

注：本届毕业学生共33名（原38名，5名因故未能毕业），毕业日期是1924年8月21日。

四、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之经过

甲　续办之原因

第一届毕业所员数三十三人，以广东九十四县之广，农民有二千四百余万之多，第一届毕业人数如是其少，难于普遍。为大规划之农民运动计，乃赓续举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扩充学额至二百二十五人。练习期亦延长至两个半月。

乙　招生及开学

（一）通告各县农民协会介绍及登报招考。

（二）学生审定

（1）有农民协会介绍或现为农民工人者为最合格，入学试验以口试为甄别主体。试

题（笔试）如下：

一、你现在做何种事业？

二、你觉得现在中国农民的地位如何？

三、你何以要入农民运动讲习所读书？

四、世界上何种人能与农民联合？

五、本党何以要做农民运动？

（2）学生填写入学检查表。

（三）取录学生二百二十五人，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开课。课堂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礼堂，以罗绮园同志为主任。

丙　军事训练（农民自卫军的组织）

广东农民自卫军原来就是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办，第一届学生三十六人，一个月毕业；毕业后续招第二届，扩充至二百二十五人，毕业期间也延长至两个半月。所招的学生多半是由本党同志在各县介绍来的，故此工人农民占有半数。其中尚有十三名女子。入学试验的时候，注重口试，把一般闻声投考的及无聊的学生尽数排除了。第一届毕业生中遣了二十五人为特派员，派往各县干农民运动。第二届也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了。照原定计划，先上讲堂两个月，再经军事训练半月。后来因地方与教授问题，不能划分数班。然聚二百二十五人于一堂观察与甄别均难着手。故我提出先行军事训练看谁能耐苦不畏艰难；绳以军纪，看谁能服从团体动作。而刚好扣械事件发生，商团鼓动商家罢市，即将二百名（女生除外）学生改组为农民自卫军。工团军此时也组织成功。即命农民自卫军移驻省署，是为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始，也就是第二届学生军事训练之始。后来共管粮食因范廖等军人反对而消沉。农军遂常留省署训练。这次虚张却收了点微效就是学生中的怯懦分子，以为忽然迁入省署，不知葫芦里是什么药于是逃去者约二十人。从此后请了十位西江讲武堂的毕业生作教练，整天的操练，不能吃苦而退学的在十人以上。所遣留的不过百六十人而已。如是训练了半个多月，仍改为上午上课堂，下午军事演习。及大元帅出发韶关，下两度命令着农民自卫军赴韶训练，并担任后方宣传工作。九月二十日下午七时乃与工团军全队开往韶关，二十一侵晨步到，由大本营参军处指定在第十三号兵棚驻扎。是日下午三时大元帅亲到，集合工农团演说。大概说：宣传比武力更为重要，以力服人者一时，以主义服人者始能永久。每天在韶做农村运动，即拔队返省。在开赴韶关之前一夕百六十学生预知消息，因害怕而逃走者有八人，因病不能去者五人，刚好那时南浦农团有二十人来省，加入队伍，仍足百六十人之数。

到韶之次日，即九月二十二日，将全队分为十小队，以附近韶籍之学生作领队，分别往各乡村及城内调查。结果甚得当地农民之欢迎。嗣后每日以四人为一队，共三十六队，出发到韶城附近数十里内一切农村作宣传运动。宣传的方法，先将该村户口及生活状况作详细之调查，然后说以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之利益。北江农民年内受兵燹之灾最惨，受地主重租之压迫亦烈，各人均知组织团体之需要，故数日之间，各村农民纷来接洽。可惜时间不足，各村农会尚未及组织成功，然此时苟派三四人前往，马上即可成立。我们从韶返省是九月三十日。虽然在韶驻有十一天，然其中有三天学科演讲，由绮园、平山、啸

仙担任教授；两天筹备赞助北伐大会，一天巡行市面散发传单，农村运动实在只有五天，乡落太多，而且太散，所以不能立刻成立农会。

从前只是讲习所的组织，所以职员只有主任一人。后来军事训练时期，才多请十位教练，到完全成为农民自卫军之后，乃着手改为军队的组织。军衣在省署训练时已做好。去韶之日，再备置干粮袋、水壶、军毡，军装已经齐备，所差者仅枪问题而已。兹将自卫军的组织列下：

以全体分为两个中队，每个中队九个分队，每三个分队成一个小队。每分队九人以一人为分队长，总共一百六十二人。

以教练官为中队长及小队长。

丁 分 子

一、以地方分之：

南海六人，香山十九人，顺德十八人，广宁二十三人，东莞三人，高明三人，潮洲与海丰八人，惠州与梅县九人，琼崖二十七人，花县七人，女生十三人，西江一带十人，北江一带五人，南圃农团二十一人，番禺与清远五人。

共一百七十七人（出发韶关女生除外）

二、以职业分之：

学生十分之三，农人十分之三，各地农会送来者十分之一，工人十分之二·二，女工十分之〇·八。

戊 双十节屠杀之后

农民自卫军自从韶关回省之后，即行停止军事训练，注意政治宣传，每日上课，迄八小时，一直至十月九日，没有间断。到双十警告节那天，除病及因事请假者外，全体列队参与。二时许从第一公园散会后加入巡行。巡行队伍警卫军讲武堂先导工团军从之，我们又接着工团军。其后便是各工会学校团体。行至太平路西河口转角处，商团屠杀的惨剧就开幕了。是役农民自卫军因排列第三，非火线密集地点，所以受害比较警卫军讲武堂工团军稍轻，得于枪声初起时避入附近居民商店。下午六时陆续归队回省署者已半数，其余为商团福军协同拘往福军本部者，亦于晚间由胡汉民省长电李福林饰令放回。其避入民居者，因得从容更换便衣故皆幸免于辱，其为商团福军拘去者，则无不饱受拳击枪殴。计是役受伤最重的为队员梁歧玉，身中四枪并受刺刀伤二，倒卧地上，商团见其不死，复以足踢其颅，皮破血出，晕不省人事，幸航空局长陈友仁汽车驰至，即送入韬美医院救治，得免于死，迄今半月渐见痊好。其受拳及铁器重伤者三人，轻微伤则除当时避免者外无一幸免。十一日之下午，商团之势焰益炽，滇军态度复至不明，以手无寸铁之农民自卫军留居省署，殊非安全，故决迁往黄埔。

十一号全体除因伤未痊不能往与请假回乡者外，全数由大沙头起程开赴黄埔。到黄埔后又因与蒋校长商酌未妥，仍居船上。后与蒋校长往返磋商，结果蒋允拨两操场为驻扎地，并肯派教练员十名担任教练。于是十四早遂开始发枪，工农团军共领三百零五枝（农团军八十五枝，工团军二百二十枝）。实行军事训练。十日之中由托枪、瞄准、装放子

弹、实弹射击、散兵线、密集教练、冲锋等各原则，均在此短时期内练习，对于武事，不致茫昧无知。十月二十八拔队回省，再从事政治讲演两日，将以前功课作一总结，两日后遂分别散往各县，第二届农民讲习所算做毕业了。是届毕业生人数共一百四十二人。

己　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姓名表（略）

五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甲　招生及开学

是届共取得学生一百二十八人，于十四年一月一日开学，以阮啸仙同志为主任。兹将学生之职业年龄籍贯分别如下：

一、职业分类　乡村学生二十九人，工人四人，小商人一人，军人二人，自耕农二十人，佃农七十二人。

二、年龄析别　二十五岁以下者九十人，二十五岁以上者三十三人，三十岁以上者五人。

三、籍贯分别　东莞十七人，香山十三人，清远四人，花县十人，鹤山十人，紫金五人，顺德七人，高要五人，潮安四人，广宁三人，海丰六人，乐会一人，琼东一人，文昌二人，遂溪一人，龙川二人，五华二人，番禺一人，梅县一人，云浮一人，台山一人，四会一人，佛冈一人，三水二人，新会一人，河源二人，博罗一人，惠阳四人，开平二人，南海二人，广西二人，四川一人，广州市郊七人，其他五人。

乙　学生训练方法

一、军事训练，依军队组织编成一连，名曰农民自卫军模范连。

每连分三排（排长一人，以学生任之）

每排分三班（班长一人，以学生任之）

每班十三人至十五人不等。除技术训练外，间授以军事应具之学识演讲。

二、军事训练用意及经验：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在第一、二届之考察，凡在军事训练用心之人，现在即为农民运动最努力之人。如广宁、花县两处，在农民与地主斗争中，打前锋者多为讲习所卒业之学生，可为例证。此届在军事训练中，所得之教训，显出不革命之知识界分子或小资产阶级子弟，不是反对军事训练，便是受苦不过，自行退学。至于纯粹农民，最初不习惯此种纪律，多有被处罚者，但未尝说吃苦不过，也未曾表示反对，多半是处欢喜学习的态度，故成绩颇为不恶。在每次临时考试中，他们能自己说出军事训练的好处及其用意。有些说出教练员太严厉不讲道理，这是不懂话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农民无产阶级的态度，及宗法社会底下的人所必然发出的脾性。

三、组织训练：依照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假设县农民协会，名曰模范县，以学生地理上关系及言语不同，而分为若干区、若干乡，组织各级农民协会，使学生实习团体生活，并讨论各自地方农民问题。

此外还设有各种讨论会、音乐会、技击团、园艺部、新闻社，并设置一学生俱乐部，

有粗具之乐器及农民运动或革命殉难之人物画等陈列，不过因学生知识程度幼稚，自治能力薄弱，不见多大的功效。此是一大缺憾，以后须更宜注意此等课外之训练。

四、学生在训练之心得：据临时考试学生之答案，看出学生已经知道：社会之进化及其制度之特征，革命之所由发生及其趋势，明了阶级意义。最能使他们得到实际学问的，就是他们承认广东农民运动经过得失的之批评，及调查农民生活状况与宣传方法。在学期间，每次派往各地学习，他们都能适用此种方法而有效，听他们回来的报告知之。

丙　卒业后的分配

由所务会议议决留军事训练班中比较好学生十五人，继续再受军事训练，预备派往各乡训练农民自卫军；并在中择四五人留到第四届招生时做军事助教。留在农部做见习员者二十人，为该部调遣到各乡去宣传，其余的完全发资遣回自己乡村，并训令他们能实行回乡帮助农会办事。留所学生每名给予生活费每月十五元之津贴，但在见习时间，可以随时褫免，并可以择其回乡工作好的，随时增加。

十四年四月一日毕业，四月三日行毕业礼。是届毕业生凡一百一十四人。（人名略）

六　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甲　招生及开学

遵照农民部颁布第四届招生章程，于四月一日开始招生，四月二十日截止报名，四月三十日举行学生入学检查。检查结果：取录合格男女生共九十八名。其余不合格者一律分遣回籍。是届以谭植棠同志为主任。

乙　学生之训练

取录学生之后，本定期五月一日开学，适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于是日在广州开成立大会，并讨论农民运动各种问题，各地代表类皆于农民运动富有经验之人，在会议期间定有伟大之贡献，遂由所务会议决定令全体新生一律到会参加旁听，以资观感，籍作训练。该会会期一连十二天，迨该会闭会后，遂于五月十七日实行上课。每日训练时间八小时。为使学生熟习军事动作，以备毕业派往各地指导农民组织自卫军，故特别注重军事训练，每日上午三小时，专做军事训练。下午五小时教授其他各种科学。晚上则练习假设各级农民协会。星期日则往农村实习，或开辩论会，或开联欢会。至于学生编制及管理，一准军人生活动作部勒。兹将军事训练规则附列于后：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熟习军事动作养成军人习惯起见，除教普通科学时间外，学生一律准军人生活动作。

二、本规则由所务处决定呈请农民部批准后实行。

三、本规则由军事编制，各干部执行，学生须一律遵守之。

第二章　编　　组

四、全体学生准军事编组，编成一中队，下分三小队，每小队分三分队。

五、中队小队分队各设队长一人执行各该部队职务。

第三章　教　　练

六、教练依各级职务，由统一计划进行之。

七、在教练时间完全依军事纪律行事。

八、每出操时须由各干部负责检查人数并报告之。

九、在教练时间除病假（须由医生证明）及所务处特派勤务外概不准假。

十、请病假须经总教练批准方为有效。

十一、出操时前各生由小队长分队长监督取出武装，收操后仍置原处，此外不得随意玩弄。

第四章　内　　务

十二、宿舍内一切整齐卫生事宜，由分队长负责指派学生轮流经理之。

十三、饭堂清洁卫生事宜，由分队长轮流值日监察之。

十四、每起床及就寝时，须全体到集合场列队点名。

十五、每开饭时间，先列队到饭室，由值日生小队长监督，俟全体坐齐发哨音开始食饭。

十六、每上课时间，由值日分队长检查人数，记人簿内，俟教员到时发立正口令敬礼。

十七、每出操上课点名或临时集合等闻号音哨音或铃音后须于五分钟内全体到齐，迟者予以惩罚。

十八、每集合列队等时严禁言笑，违者重惩。

十九、学生在所内无论何时何地不得大声呼叫及喧闹。

二十、学生无论在所外内须一律着制服。

二十一、所内学生不得私留外客住宿食饭。

第五章　守卫勤务

二十二、守卫人数：大门二人，军械室一人。每日由分队长指派学生轮流充当之。

二十三、大门卫兵每日早晨点名后派出，至晚上点名后撤销。

二十四、军械室卫兵无论昼夜不撤，且于夜间增加一人作展望哨，位置于二楼前廊。

二十五、守卫人员在勤务时间完全准陆军卫兵勤务规定，不得玩忽。

二十六、除本所人员及与本所有直接关系（如中央党部及各农民协会等会员，惟必须有会员证章）者外，其余有来本所者须经传达处传达，否则卫兵干涉不得入内。

二十七、凡上级人员经卫兵哨所时须立正敬礼。

二十八、守卫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勤务时间须负完全负任。

二十九、卫兵如有看出意外现象时，须即报告卫兵长或总教练。

第六章　附　　则

三十、以上诸条如有违者，分别轻重，由总教练主任或所务会议惩罚之。

三十一、本规则自公布之日实行。

丙　所址被占及恢复上课

开学不久，鉴于刘杨叛迹日著，时局日趋紧张，各县各地工作重要，由所务会议议

决，暂将全体学生分别派遣回籍，指导农民工作，并定于六月四日学生一律离所。殊当学生于是日下午三时相率离所之际，突有武装逆滇军冲进本所，强行占驻。迨逆军肃清，直至六月二十四日，始由粤军第一师第一旅将所址交回，而器物校具，早已被逆军劫掠一空，购置须时。直至七月一日始能恢复上课。而学生回所者仅五十余人，其他远道学生，一时尚未全数回所也。

丁　毕　　业

自七月一日开学之后，海陆丰学生因海员罢工，交通不便，一时不能回校，学生人数过少，于是续招旁听生共二十五名，继续授课两个月，直至九月一日举行毕业。计正取生毕业者五十一名，旁听生二十五名。其中留所见习者十六人。（人名略）

七　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甲　开　　学

第五届分为甲乙两班：甲班六十四人，乙班五十人。原定于十月一日开学，三日开课。因甲班学生均由远方而来，且先到所数十天，为该班学生惜时计，所以预早于九月十四日提前开课。

乙　训　　练

此届除遵章教授学科及军事训练外，更注意学生的自治，组织一自治会。兹录其简章如下：

（一）本会为学生训练自治之能力及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最革命的战斗员为宗旨。

（二）凡本所学生皆为本会会员。

（三）本会为学生之自治机关，但须受本所所务会议之监督。其下分设两部：

一、管理部：管理部受本所军事教育主任之监督。其下设什务股、卫生股。什务股之下又设班长及室长，卫生股之下设休养室。

二、俱乐部：俱乐部受本所政治教育主任之监督。其下设音乐会、图书馆、娱乐室及报社。

（四）本会设主席团为本会之执行机关，以五人组织之。

（五）管理部设部长一人，部员二人。

（六）什务股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班长室长各一人。

（七）卫生股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休养室管理一人。

（八）俱乐部设部长一人，部员三人。

（九）音乐会设管理一人。

（十）图书馆设主任一人，助理三人。

（十一）娱乐室设管理一人。

（十二）报社设编辑委员会，由委员五人组织之。

（十三）本会各部职员除主席团正主席由本所主任兼任外，余均由学生选举之。

（十四）本会各职员任期一个月，〔期〕满由大会改选。但得连选连任。

（十五）本会会员须纳入会金二角，每月缴月费一角。

（十六）本会得派相当代表出席本所所务会议。

（十七）本会对于本所纪律须绝〔对〕遵守。

（十八）本会对于违背纪律之会员，经大会过半数通过及主席团之批准，得呈请于所务会议开除之，其所犯情节较轻者亦得依法呈请惩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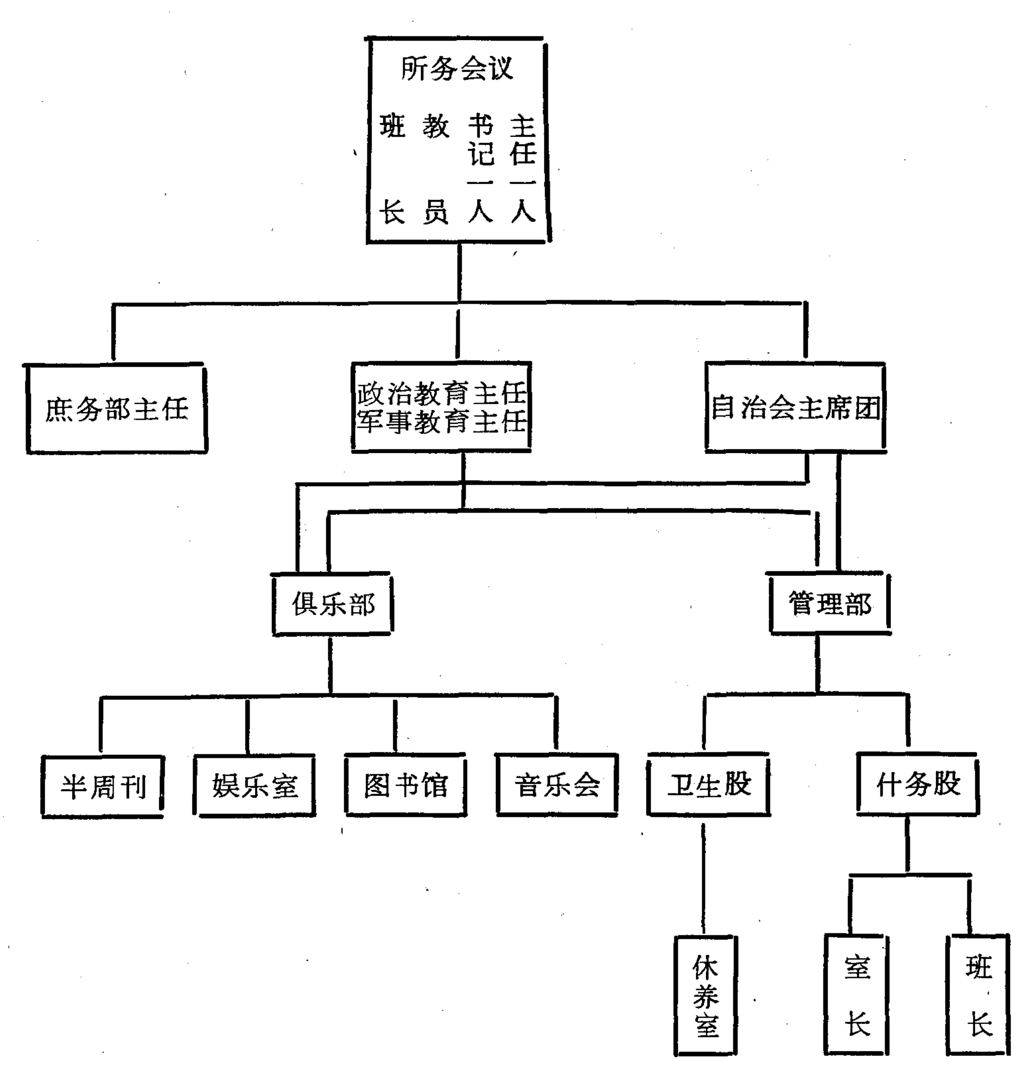
（十九）主席团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

（二十）本会会员大会每两星期至少开会一次。

（二十一）主席团对于会员大会之决议，须切实执行。如认主席团有违背决议时，由大会提出改选，对于正主席即本所主任亦得呈请党部撤换之。

（二十二）本简章自公布日发生效力。

学 生 自 治 会 组 织 表



丙　开会及旅行

十月十一日甲乙两班为交换知识，联络感情起见，开一联欢大会。是日到会者陈部长公博、谭部长平山、罗秘书绮园，均有演说。其他团体十余，备极一时之盛。十一月一日全体学生参加番禺第二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十一月三日全体员生由罗绮园同志领导，到石井兵工厂参观，备受该厂执事之欢迎，每人练习实弹射击。十一月七日为苏俄革命成功八周年纪念日，本所除开会纪念外，并分派学生到各处演讲。据各处演讲员回所报告，成绩颇优、十一月十九日旅行曲江城，分学生为三队，二十二组。是日在车中各组讨论“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怎样才能成为真正革命者”、“什么是三民主义”各问题。各生孜孜讨论，互相发表，虽风雨凄凄，亦无难色。活泼之精神，诚足观也。二十日早饭后参观曲江第一高小学校。十时参加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散会后各组随即出发各街市及附近农村演说。二十一日返所，在车中各组又讨论“国家主义与国民革命”、“农民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解放”、“谁能领导国民革命”、“我们的人生观”、“奉直战争与国民党”各问题。下午九时抵所。

丁　毕　业

十二月八日两班同时举行毕业礼。是届卒业人数甲班六十四人，乙班五十人，共一百一十四人。卒业后之——分配：甲班分发往河南湖南安徽山东广西福建各省工作，乙班则以往东江及南路为多。

附：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录

日期：三月十六日

时间：下午一时

出席者：林祖涵　甘乃光　毛泽东　谭植棠　阮啸仙　罗绮园

主席：林祖涵

记录：彭公达

主席恭读　总理遗嘱——全体起立

甲　报告事项

（一）主席报告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之理由及经过

（二）罗绮园同志报告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经过

乙　讨论事项

（一）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

A、地址（报告广大校长来函请让回西边之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为学生宿舍）

决议：遵照中央决议，以番禺学宫全部为讲习所所址，且因开学期迫，再请中央催第

二军官学校迁出，以便着手筹备。关于广大校长来函请让出西边之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一事，因本届学生名额三百人，均从各省党部送来，学宫中座只敷讲堂及办事之用，两旁宿舍势难让出，将此意复广大校长。

B、招生

决议：

1、名额扩充至三百名。

2、三特别区电请增派学生二十人照准。

3、福建学生额决定十名。

4、广西学生额四十人，其中三十名由梧州市党部在广西宣传员养成所内选送，十名由南宁广西省党部送，旅费均自备。

C、预算（略）

D、教职员

1、所长决议请毛泽东同志担任，请求中央照准。

2、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

3、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下略）

八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尾各省学生开始来粤，四月举行入学试验，确定所址于番禺学宫，依照预算从事开办。五月三日开学，收录学生三百余人，训练四个多月，业于九月十一日举行毕业试，截至十月五日止，除病生三人未出所外，所有学生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查本届农所，为本党第一次大规模之农所，应全国农运之要求，集二十省区之学生于广州，而训练之，兹将经过情形分数项述之于次：

一　学生人数及籍别

原定学生名额三百人，后以来学者多，加收十六人。六月间又增收十一人，共有学生三百二十七人。嗣以疾病或他故先后退学者九人。至毕业时共有学生三百十八人。依省籍分别则如次：

直隶二十二人　山东二十三人　河南二十九人　热河四人　察哈尔五人　绥远八人
陕西十六人　四川二十五人　湖北二十七人　江西二十二人　湖南三十六人　安徽十五人
江苏十人　福建十六人　广东二人　广西四十人　云南十人　贵州一人
奉天二人

二　授课情形

五月三日虽经开学，因课堂为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用为会场，至五月十五日，才开始上课。中有两星期为赴海丰实习时间，理论之讲授，实际授课十三星期，共授二百五十二小时。计：

三民主义（陈公博　陈其瑗）	六小时
中国国民党史（甘乃光）	六小时
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	二十三小时
农村教育（毛泽东）	九小时
帝国主义（肖楚女）	十四小时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肖楚女）	五小时
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肖楚女）	九小时
中国政治状况（彭述之）	十二小时
中国财政经济状况（陈启修）	四小时
经济学常识（陈启修）	十八小时
苏俄状况（陈启修）	十八小时
中国史概要（恽代英）	十小时
地理（毛泽东）	四小时
中国职工运动（李立三）	十七小时
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罗绮园）	十五小时
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周其鉴）	六小时
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彭　湃）	四小时
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周恩来）	六小时
法律常识（毛　宪）	九小时
统计学（安体诚）	九小时
农业常识（韦义光　蒲良柱）	十六小时
农村合作概论（于树德）	十小时
各国革命史（张秋人）	九小时
革命画（黄煒华）	十四小时
革命歌（李一纯）	四小时

上列功课二十五门，于革命之理论及方法，尤以农民运动之理论及方法，大体已备。上列各课，多数均有讲义或参考材料发给学生。

三　军　事　训　练

将学生分为二队，每队分为六区队，设总队长一人，区队长六人统率之。于五、六、七三个月内，实行正规之军事训练，共计训练十星期，上操一百二十八小时。由总队长赵自选、队长黄征泮、罗焕荣、区队长马天根、毛华达、杨汉池、张士表、胡珩、田中杰等负责训练之责，俾学成之后，能为农民武装自卫之领导。

四　实　　习

五十人赴韶州实习一星期，全体赴海丰实习二星期。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五　授理论以外之理论研究

本届设专任教员一人，除讲堂授课外，指导学生为上堂以外之理论研究。专任教员为肖楚女，毛泽东亦参与之，发给下列各种书籍每学生一全份：

三民主义
建国方略
建国大纲
汪精卫先生演讲集
帝国主义之政策的结果
帝国主义浅说
资本制度浅说
社会进化简史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中国农民月刊
农民运动周刊
犁头周报
中国民族运动及其策略
孙文主义讨论集
孙中山先生对于农民之训词
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
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
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
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之策略
农民合作概论
列宁与农民
农民国际
俄国农民与革命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土地与农民
苏俄之农业政策
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
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
步兵操典

凡重要书籍，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案，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

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之理论研究颇不小。

六 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

因学生来自各省，又即须回到各省从事工作，对于各省实际的农民问题亟须研究。乃组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江浙、山东、奉直、豫陕、三特别区等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一研究会由各该省学生组织之。推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八人主持其事，各研究会开会每星期自一次至二次。开会时由教务主任陆沉同志负指导之责，在各省研究会内，引导学生开始研究实际问题。引导学生做出了下列各种全国的调查：

（一）租率
（二）主佃的关系
（三）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
（四）利率
（五）拖欠逼帐及烂帐等情形
（六）田赋
（七）抗粮情形
（八）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
（九）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
（一〇）地主的来源
（一一）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一二）工价
（一三）失业情形
（一四）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
（一五）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
（一六）地方政治组织
（一七）地方政治情形
（一八）会党及土匪
（一九）团防情形
（二〇）教育状况
（二一）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
（二二）兵祸及其影响
（二三）天灾及其影响
（二四）贪官污吏及其影响
（二五）烟赌偷抢各种情形
（二六）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
（二七）妇女的地位
（二八）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二九）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

（三〇）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三一）农村组织状况
（三二）地质之肥硗
（三三）宗教之信仰状况
（三四）度量衡
（三五）民歌
（三六）成语

七　编印农民问题丛刊

为应全国农运同志研究上之要求起见，极力节省原预算内不必要之开支，剩出一点钱来编印农民问题丛刊，计共五十二种，现在已出版者十七种：

（一）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
（二）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
（三）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
（四）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
（五）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六）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七）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
（八）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九）农民合作概论
（一〇）列宁与农民
（一一）农民国际
（一二）俄国农民与革命
（一三）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一四）土地与农民
（一五）苏俄之农业政策
（一六）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
（一七）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

以下尚在印刷或编辑中

（一八）广东农民运动概述
（一九）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二〇）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二一）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二二）中国的重要农产物
（二三）中国重要农产物之对外贸易概况
（二四）全国农业行政机关试验机关及教育机关
（二五）各国之农业进步及其原因
（二六）中国农业生产问题

（二七）全国农民运动概况
（二八）中国地租问题
（二九）各地主佃的关系
（三〇）中国重利剥削问题
（三一）中国田赋问题
（三二）各省抗粮运动
（三三）苛税问题
（三四）各省农民之分析
（三五）地主的来源
（三六）祠堂
（三七）地方公会
（三八）各省地方政治组织
（三九）中国地主阶级的武装问题
（四〇）天灾问题
（四一）兵祸问题
（四二）贪官污吏问题
（四三）土豪劣绅问题
（四四）各地的工价
（四五）各地的度量衡
（四六）农村教育问题
（四七）农村宗教问题
（四八）中国农村中妇女的地位
（四九）中国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五〇）农村文学
（五一）农村成语
（五二）中国农民问题概论

这部丛刊如能完全出版，在目前之农民问题之迫切的研究，农民运动之急激的发展中，确实可尽相当的供给材料之责。

（原载《中国农民》2期、9期，1926年出版）

中共中央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

然而短视而又懒惰的国民，总喜欢在国民革命以外，费尽气力试用各种药不对症的方法，考验的结果，至今只有空言和平免战，结局仍旧移家逃难丧失生命财产，别无办法！

在直皖直奉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安福派及奉张完全失势，在表面上似乎是中国政治上进步的现象，实际上却不然，因为打倒安福派与奉张并非由于人民的力量，乃是由于另一部分军阀曹吴背后挟着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当时国人迷信曹吴，以为借重他们而国民自己不费气力便可以达到统一和平的希望。殊不知世界上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军阀曹锟吴佩孚和帝国主义的英美勾结为患的局面之下，只有去统一和平更远；因此，我们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全国革命分子结成联合战线，继续民主的革命战争，以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军阀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唯一的道路。

曹锟吴佩孚眼见国民很容易被他们欺骗，得了政权以后，反动的局面日益严重起来：压迫北京知识阶级；以武力及阴谋扰乱川湘闽粤；惨杀京汉罢工工人；驱逐他们自己所利用为傀儡总统的黎元洪；至此，直系军阀之罪才为国民所认识。此时，国民依旧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找不出第二个像以前所崇拜的吴佩孚，遂转而出于消极否认及国会南迁等懦弱无能的办法，即避开革命的办法；因此，我们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由国民党或人民团体出来号召一个国民会议，开始以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来解决一切对外对内的政治问题。

直系军阀，腐败政党外交系及帝国主义者，都看破中国国民懦弱无能，遂敢于沆瀣一气，进行中外古今所希有之公开的贿选。曹锟贿选成功将近一年以来的成绩是：

（1）承认列强临城案的要求，以为列强承认贿选之交换条件；

（2）力谋承认威海卫案，金佛郎案，宜阳丸案，以取得帝国主义者的援助；

（3）利用赵恒惕杨森吞噬湖南四川；暗助周荫人陈炯明扰乱闽粤；

（4）因袒护贿选议员，名捕安徽全省学校学生数百人，并累及其家属；

（5）向外商进行津赤，烟潍，沧石三路借款；

（6）在天津购买意大利军械，价值五百五十万元；

（7）吴佩孚派人强提胶济路款，以充由广东降北之海军军饷，并滥提盐款，强截捐税，种烟贩烟；

（8）解散胶济铁路工会，并逮捕及开除工人多名；

（9）因拥护曹党私人北洋大学校校长冯熙运，直隶省长派出保安队，包围学校，驱逐学生，逮捕学生代表；

（10）曹锟的妾舅任意殴伤铁路人员，曹锟的卫队任意打死警察；

（11）在汉口郑州石家庄逮捕工人杨德甫孙云鹏等七人，在北京逮捕张国焘等五人，均未宣布罪名；

（12）禁止学生着白色衣白布靴走过新华门，禁止北京戏馆唱演“捉放曹”“打鼓骂曹”“徐母骂曹”等戏；

（13）接受日本公使的照会，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于“五七”“五九”开会纪念国耻；

（14）容纳列强干涉中国商标之要求，商标公报用英文，商标局聘外人为顾问，对于李义元陈魁元及英舰炮击万县等案之丧权辱国；

（15）办理德发债票案，国库损失至少三千万元，收回前存伦敦拟付德债之款，悉作军用；

（16）重禁京沪所出多种新书新报；

（17）为办金佛郎案，纵令王克敏迫孙宝琦去职；

（18）向美国购运大批军火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又购德国军火三百五十大箱；

（19）力持以造路名义攫取各国退回的庚子赔款；

（20）纵令齐燮元兴帅攻浙。

此次齐燮元兴师攻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说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其战争之实际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

我们不可迷信中国的军阀真有独立作战之可能，——倘有此可能，已应有一个军阀主义的独立国家。每次内战都有国际帝国主义争斗的背景。国际帝国主义者，欧战后以英美法日四国为其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关系：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只须保守其既得权利已足惊人；与英争霸欧洲大陆的法国现时工业状况，中国虽还不是他必以死力争的市场，然而也不是可以忘情的肥肉；在中国竞争最烈的乃是欧战中骤然澎涨的美日两个帝国主义者。因为种种的关系，法国与日本站在一边，英国与美国站在一边。日本是帝国主义中之最幼稚者，还有结托中国统治阶级以政治的支配达到经济的侵略之必要；美国是侵略中国之后至者，全中国已没有他回旋的隙地，所以也必须援助一派军阀，树立他在中国政治的势力，以倾复他在中国经济的敌人——日本。华盛顿会议美国给日本第一次大打击，直皖奉直战争，美国给日本第二次大打击，自此以后，美日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我们当已看出；此次直系兴师攻浙，乃是美国给日本第三次总结束的打击。

贿选前，（去年五月）美公使曾到保定府和曹锟接洽最高问题；贿选前（六月），美总统哈丁表示美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的意见；贿选成时，美使首先称贺；列强为曹政府以武力制止广东政府分取关余时，美国最出力；直系爪牙赵恒惕将失长沙时，以炮舰拒谭助赵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天津给吴佩孚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厦门给直系军队的也是美国；和齐燮元进行导淮借款的也是美国；美国扶助直系是不可掩的事实，此次助直兴师统一中国（不只是对浙），乃是结束一切可与日本接近之政治的势力。

这次战争的爆发是与美国国务卿休士赴伦敦所订关于处置中国之密约（见本月五日路

透电）有直接关系；而于英国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广东商团以图推翻孙中山之举尤足证明。我们再看战前直与反直两方之财政与军火的准备：英美赞助曹吴解决德发债票外，英福公司与吴佩孚订定的道济借款为百五十万磅，美公使替该国商人与吴佩孚做成的军火买卖为步枪一万枝子弹二千万颗，机关枪二百五十架，而吴佩孚的飞机队完全由美国人替他组织与训练，并且与苏齐进行导淮借款。日法军火之输人奉浙（最近张作霖向法商订购快枪三千枝，子弹六百万发及其他军用品若干），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奉浙飞机队之发展显然法国人为之主持，故上次法飞行家杜氏来华，备受奉浙之优待而遭齐燮元严厉之反对。至于张作霖与日本之秘密交涉，也不下于曹吴与英美。张作霖与日本订约，任其在满洲取得三十年租借权，以换得军火与财政之援助；而齐燮元于宣战时更向美国宣言下沪后任美国在沪设立无线电台。故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乃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

在开战的两方：直方于数省人民水灾待救不遑中，大兴排除异己之师，残害人民，自然是此次战乱之罪魁祸首；浙方虽宣布讨曹而非反直，实际上当然是反直战争。反直战争，在目前政治现象上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事势，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救国卫民的战争，其理由：（一）在逻辑上，只有反国际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争，可以全称肯定他是为国为民，至若“反直即是为国为民”，我们实未能加以承认；（二）军阀自身的性质与环境，在客观上亦无由实现他为国为民的余地；（三）在他们政治的行为上，一向连为国为民的倾向也没有，出兵宣言中虽然抬出抽象的正义与民意，直军讨伐安福奉张时，更说得词严义正，自来口说无凭。所以此次战争，我们只能承认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只能承认是帝国主义与军阀重苦吾人民之较前更大的惨杀。

因此，我们可推定此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我们对于前者固深恶痛绝，对于后者又岂能欢迎！无论前者后者，外力侵人断送国家生命的惨痛都是有加无已，内部战争屠戮人民牺牲人民的惨痛也都是有加无已。

第三，假若双方势均力敌胜负不分或直系形势大有不利时，则野心勃勃的美国帝国主义必然发起干涉中国内政，以图达到共管目的，其形式必然是勒令双方听命于列强强制的和平会议之下，组织买办式的商人阶级与军阀阶级暂时混合统一的政府，而根本剿灭广州和全国一切革命的进步势力。然而即使成功这样的局面，也是暂时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与各军阀之间不久仍要因利害冲突而争斗，不过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便要因此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

所以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一天，即军阀与战争的惨痛存在一天。我们要解除这种惨痛，固然不是空言哀求和平息战可以得到，也不是依赖何派军阀战胜可以得到，更不是希望阴谋构成中国内乱以达到其垄断或共管的目的帝国主义之干涉可以得到。人民若希望此次任何一派军阀之胜利，只有蹈直皖直奉战时希望吴佩孚得胜之复辙；若希望什么“友邦”出面干涉，只有步印度安南之后尘！我们对于双方军阀不能存丝毫希望，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尤不可存丝毫希望，这种希望不仅可耻无效，而且要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凄惨更加危亡。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

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全国被压迫的人民！你们看呀：外国帝国主义刚刚构成这次内战，同时他们在华盛顿与伦敦之间便发起（由美国发起）干涉中国内政，采取强制号召各势力派和平会议的方式来亡中国。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呀！亡国的惨祸是由这次外国帝国主义构成的内战临头了！你们尚可希望军阀给你们以“正义”，帝国主义给你们以“和平”么？起来！起来：

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屠杀人民供外国帝国主义利用的一切军阀！

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

（原载《向导》82期，1924年9月10日出版）

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一）

此次北京政变之后，在国内政象上，一方面表现出反直派在北方之胜利，将回复到直皖、奉直战前安福、交通执政的局面，一方面表现出直系在中部仍保有其地位；同时，在外交上，一方面表现出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能独力挟曹吴攫取全中国，一方面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没有挟段（祺瑞）张（作霖）统一中国之可能。

（二）

帝国主义者宰割中国之企图，约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是所谓瓜分政策，由帝国主义的列强协议在华势力范围之划定，华盛顿会议以前，均属此时期；第二时期是所谓共管政策，由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协力共同宰制中国，自华盛顿会议至今年七月伦敦会议，均属此时期；——这两种政策，均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间在华利害之冲突不能成为事实，遂进入第三时期，即现在之分立政策。

这种分立政策，和第一期不同者，只是不取列强间协定形式及表面上避去瓜分之名，而实际上乃是帝国主义者各在其势力范围内——日本在北方，英国在中部，法、比在其他方面，——集中当地军阀之力，由经济的支配权力，进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机关，实行分裂中国。

独有后到的美国，一面因为其国内经济力特别优裕——余资、余货——之故，一面因为在中国尚未有独占的势力范围，遂极力鼓吹什么“在华开国际会议讨论施行于中国之一道威斯计划”，以图寻得相当的机会与工具——游移于英日帝国主义之外的军阀，达到其以经济力宰制全中国之野心。

（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此时不得不大声疾呼，警醒国民，勿固执从前的预料与恐怖，以为帝国主义者宰制我们只有瓜分与共管两个死板方式，应该觉察他们希图宰制我们别有新而更毒的方式：分立或道威斯计划。前者比后者更有实现之可能，其危险更迫在目前。此种政治的分立，即是国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计划之实

现。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

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更应极力反对军阀们拿什么各省军民长官会议来代替此会，执行此会职权。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备国民会议，我们更应号召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的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

此临时国民政府：（一）为挽救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危机而成立，自应不妥协的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势力，同时，也应杜绝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划之阴谋；（二）依赖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帝国主义尚无确定关系的武力之拥护而存在，至少也应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方能得工农兵等民众的同情。

（四）

此临时政府如果成立，本党当然不能妄想他是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还不是中派；然而我们却准备赞助他，只要他确能防止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或共管中国之阴谋，只要他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他不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之机会。

（五）

为全民族的解放，为被压迫的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本党将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本党认定拥护这些要求，是一切人民及其代表之责任，尤其是国民党之责任。要求如下：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

（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唯一关键；

（三）全国非战时的常备军，均以旅长为最高级军职，废除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总司令、检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军长、师长等军职，因为这是杜绝军阀势力集中盗国乱政之重要关键；

（四）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取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以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

（五）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

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制，工厂卫生改良，工人补习教育之设施，工人死伤保险法之规定，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设劳动平民之住屋；

（八）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损失及救济北方水灾；

（九）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

（十）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

（十一）增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征收遗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此等大宗税收，不但足以补偿废止旧税——厘金、牙税、盐税、米税、田赋附加税及其他各种正、杂捐税——之损失，并可用为补助退伍士兵失业贫农及推广教育之经费；

（十二）为保障知识阶级之失业及青年失学计，国家预算中，不得将教育经费移作别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庚子赔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费，优待小学教员，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92期，1924年11月19日出版）

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蔡 和 森

现在有两个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横在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前面：一个是怎样对付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右派诸叛徒及滇军等都包括在内）在广东做成的反革命；一个是怎样对付美日两派帝国主义在全国做成的直系与反直系两派军阀间的战争。

对付商团事件的正当政策，只有坚持没收全部扣留的军械，否认范、廖二军阀与商团私订的六条件，进一步完全解除买办阶级（商团军）的武装，实际抵抗英国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唤起全国人民之同情与助力，而开始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新时期。对于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站在国民革命原则上的国民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对于人民的屠杀，反对帝国主义构成内乱借口干涉的阴谋，号召全国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群众集中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发展并组成国民革命的真实力量。

但据最近上海各报所传消息：中山先生对于前一问题，于痛斥英国帝国主义的宣言公布后，忽然又向粤人发表一类似"罪己诏"的宣言，悉率客军北伐，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对于后一问题，则已决定实行北伐，响应浙卢。这种政策的内容：第一是中山先生离开广州而赴韶关，以避免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不仅发回扣械，而且以广州市政交与反革命的商团（商团军干事李郎如已代理公安局长）；第三是与陈炯明妥协，所谓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便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这就是现在北伐政策的背影。

所谓"护法""北伐"虽是国民党以前的传统政策，但这种政策曾经屡试屡败，而且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的新政纲，这种过去的错误政策尤属成为废物而不应该复活。现在居然复活起来，我们敢大声说，这又是右派包围中山先生的成功。右派因为恐怕中山与英国帝国主义冲突而打破他们的巢穴，因为要成功与陈炯明的调和以巩固他们与左派对抗的武装势力，因为要讨好段、张、唐继尧等军阀以遂其蝇营狗苟、奔走南北、升官发财的勾当，所以又包围老头子出此名为"北伐"而实属投降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的下策。

退一步就北伐政策的本身而说，我们亦完全不能予以赞同：第一，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号召。第二，这种政策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第三，从新成就西南军事局面不过又是从新成就唐继尧、陈炯明、沈鸿英、唐绍仪等军阀政客将来与任何一派战胜的军阀做买卖的基础。

或问你们这样主张不怕右派指为破坏革命暗助曹吴吗？我可大声回答：只有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右派是破坏革命，只有主张交还广东于陈炯明和商团的右派是暗助曹吴。我们在革命的政策上和理论上素来不赞成雇佣军阀的军事行动，素来反对在广东设立有害革命进行而徒利于官僚分子、非革命分子的革命政府。我们现在更坚决的主张：与其强颜交还广东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上什么北伐政策的鬼当，无宁抛弃广东而与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决一死战，以开始全国反帝国主义的真实工作！

（原载《向导》83期）

工　农　军　与　北　伐

（一九二四年十月）

邓　中　夏

孙中山北伐政策的背影，明明是中山离开广东以避免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所谓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明明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商团）阶级，总而言之，是中山抛弃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决定的新政纲，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正确意义，而妥协屈服于帝国主义与反革命的法西斯蒂。

即就北伐政策的本身而论，亦不过是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系的军阀张目呐喊，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所以北伐与国民革命的正确意义丝毫没有关系。

这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然而广东新兴的工团军农团军却率队跟从中山北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我们工农阶级不论在任何政策之下，我们不能离开我们阶级的观点而有所主张。今就我们赞成国民革命的意义来讲，我们并不是要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要借此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军阀制度之存在。这是我们工农阶级当前的正确要求，除此以外，我们别无什么。

所以如果有人误解了国民革命的正确意义，或误用了甚或故用了反国民革命的荒谬政策，我们工农阶级应毫不犹豫的挺身出来大声疾呼的反对，以至政策改变为止。对于该荒谬政策之服从与执行，那更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了。这是我们工农阶级最合理的政治态度。

此次广东的工团军农团军对中山北伐政策亦应如此。假如中山能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广东决一死战，以开始反帝国主义的真实工作，那我们工农阶级当立在战线的最前头。所以我们广东的工农阶级此次不反对中山反国民革命的北伐政策固然是错了，并且率队跟随中山北伐，更其是错上加错。

（原载《中国工人》1期，1924年10月出版）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陈独秀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都有就理论上事实上仔细研究并发表意见的必要，慎勿固执"主张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便是破坏国民党"的偏见，硬闭起眼睛不理！

反对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的人，他们所持最有力的理论是：革命党须有军事行动，也须有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这种理论，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形式的逻辑，至于国民党本身状况及其在中国所遭遇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书符念咒又恐怕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我们有何方法能得着和军阀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说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论，想用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打倒他，不待军事专家，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第二，广州政府现有的军队内容又是怎样？完全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我敢说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并且也还没有相当数量质量的革命党人能在这些军队中宣传活动，能左右这些军队的群众。建立在这些军队力量上的军事行动，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军阀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掳掠搜刮，连陈炯明赵恒惕也不曾打倒，而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所谓军事行动（北伐包含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因滇军勾结商团而妥协是国民党的耻辱，然而因为要做军事行动，便不得不容忍这班反动的军队。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反动的西南将领不可与之革命，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实力，便不得不和他们联合。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段系奉张都是革命党所应讨伐的军阀，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声势，便不得不称他们为友军。这些耻辱的行动，这些错误的政策，都是军事行动所必然产生的。因为此时的国民党除了采用这些政策，本来没有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之可能。然而采用这些政策来做军事行动，不但这些军事行动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为滇军西南将领段系奉张自身便都是军阀的及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样的军事行动，且可以使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宣传完全无效。

应否放弃广州政府和应否停止军事行动，是两件事不可分开的一个问题。因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

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既没

有革命的军队，又没有强大的革命党。因此，在名义上在极少数政府首领的愿望上，是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这反革命的军队官僚与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因此，政府中极少数首领仅仅是有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权能支配所属的军力财政用在革命的意义上。并没有实权能制止革命政府所万不应做万不忍做的事：开赌、拉夫，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警察、商团压迫工人农民，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官吏和帝国主义者的爪牙商团勾结妥协。这些都是广州政府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若仍要保持广州政府，对内，不但上述各种可痛的状况必然继续下去，而且反革命的军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实现；对外，永远不能抛弃和西南将领及北方一部份军阀妥协的政策。如此，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将使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在全国民众中丧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国民党的力量与注意，事实上必然集中到关于保持这块领土的一切应付，没有余力可以计及全国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即在领土内，亦以军警官吏之横暴，取消了党的宣传效力。本以为有一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而结果实得其反。

总而言之：在原则上，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一个革命党做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并且极热忱的希望中国国民党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实际情形上，我们一方面观察得国民党的内容，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们观察得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力量及国内军阀的力量，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他们，那更是此路不通！

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神圣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

因此，我们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走这条新路，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份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不断的为这些大民众之自身利益而奋斗，使这些大民众都认识国民党的确是为民众利益而革命的党，的确和军阀派及其他官僚的政党不同。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真实力量。

这样本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变动，反动的右派，在他们自身的利害上当然要反对这种变动，即畏难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赞成这变动之勇气与决心。然而这个变动确是中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革命的领袖们若是看清了这个需要的事实，便应该拿出革命的责任心克服他们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头脑，都被军阀战争及局部政情之琐屑应付具体问题占领了，没有考虑全国革命所需要的事实之余地，诚然是国民党的不幸。然而我们相信终有大家回过头来考虑这个事实之一日。如此，我们只好改日再谈。

（原载《向导》85期，1924年10月1日出版）

段张馮三派军閥暗斗之北方政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和　　森

北京政变成功，北方政局遂入于奉张皖段直冯三派北洋军阀角智竞雄的新时期。冯玉祥原先本想挟“和平”“停战”四大字号召天下，制奉倒吴；殊知事出意外，吴佩孚率军回津而奉军随着长驱直入（参看本报八十九期），冯玉祥主宰中枢之地位无形为之动摇，于是才屁滚尿流把曹锟撵走，而去捧段祺瑞的佛脚，迎他进京做什么国民军的大元帅。段祺瑞自然有他自己的算盘，他不仅不愿意做冯玉祥的傀儡，同时也不愿意做张作霖的傀儡，他的主意是要乘机造成自己强固的实力之后才入北京揽持政权。所以他不仅与吴佩孚暗结收拾吴之残部为己有，重要目的还在使吴纠合长江各省直系势力弃曹拥己，所以他对于吴的态度始终只说“子玉拥戴非人”，这句话的反面意义自然是很明了的。

前此路透电及英字报纸常常散布段张冯暗斗的消息，因为路透电及英字报纸都是帮助直系的，所以阅者不甚注意。可是这种消息现在在日文报及日本各通信社所发的消息中，几乎日不绝书。现在先把上海和文日日新闻（本月九日）论段张冯的外交战一文介绍于下，以见此类消息之确实：

“段祺瑞之迟迟入京，盖知在东南诸省形势未定之前，而遽行轻动，将自陷于不利也。对于此次政变，段氏之声望与活动间接固与有力，而直派失势后直接之最大动机，则在奉军之战胜与冯氏之政变。今张作霖与冯玉祥，虽均声明拥戴段氏，段系各省亦表示服从段氏，而不带一兵之段氏，不造成强固之背后之势力，而径行入京，势必仰承战胜者之鼻息，或为奉派之傀儡或作冯派之招牌，而供其急进政策实行之工具，均有为北京城内高等俘虏之虞。此为段氏之所已见到者，故段氏务迟迟入京，必将本系各省及旧有直系各省联络就绪，以消弥奉冯二派之隐患，且进而造成得号令天下之实势力，而后入京主持。即段氏之计划，在利用张冯之武力威吓，诉诸平和之手段，以支配天下，以段氏之所以不易动也。

至于冯派，甚冀段氏早日入京。冯等幸乘北京之虚，告厥成功，虽一时握有中央主权，而其支配区域，仅限于近畿地方，拥兵数万，而无地方的地盘，知现状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时局早日收拾，且由段氏负设施一切责任，故请段氏入京。又奉张之地位，与冯稍异其趣，张之目的，在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氏以再起之余地，因之于方法手段皆所不问，其所惧者即吴氏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戴段氏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耳。段吴提携之可能性，已为数年来识者间之一问题，以其意气人格之相近，较之张段之关系，仅由利害而结合者不同。在曹锟失势之后，吴固不妨先行纠

合长江各省，拥戴段氏，此亦奉张之所熟知也。要之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氏以收战胜之全功，而在段氏，亦欲乘张冯之拥戴，且免彼等之反感，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妥协，而实则角智以竞取权势。由此以观，目下京津间之形势，可谓奉直冯吴之战争已闭幕而入于段张冯之外交战斗时期。”

段祺瑞迟迟进京的原因，日日新闻固已论之甚详；我们所更欲了解的，段氏这种老算盘不仅出自个人的心裁，而且是由于后台老板日本政府的决定。如不相信，请再看上月底东京传来的消息：

“电通社东京二十九日电：据东京人士之一般观察，段合肥氏若果出就总理之职，而摄行总统职权时，当首开各省代表会议，而图实行其联省自治政策，且当此财政困难之时，或须对外募集善后借款，以济急需，而其先时当寺内内阁时所成立之西原借款电话借款等等，此际纵不能偿还其本利，亦当有整理之希望。又日本若遇段氏为实行其联省自治计划，而至仰给其经费于外债时，亦不惜与以援助，借谋奠安中国之时局云。又同日电：昨日日上院议员，曾往访霞关外务当局，叩其对于中国时局意见，得其答复如次：‘段氏虽终不免于出而收拾时局，但亦必审慎周详，须至万不获已时而后出此，当决不如外间所传之冒昧从事也。且现时段氏手无一兵一卒，若贸然出而肩任艰巨，恐不免为冯氏所操纵，此固为段氏及其左右所深虑者，而奉张此次自恃其功进兵京畿，以制冯氏，亦未可知。果尔，则今后北京政局，殊未易乐观，而段氏对此自更不得不深加审慎其出处矣’”。

段祺瑞不冒然以赤手空拳进京受冯玉祥之操纵，及张作霖进兵京畿以制冯玉祥之二点，现在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业已如法办到不成问题。这三大军阀间的暗斗，一面是段张联合以制冯，别面是段暗联长江直系各省势力以制张。苏皖赣闽浙陕鄂豫八省联防拥段内幕，一面固然是吴（佩孚）齐（燮元）萧（耀南）等保持直系势力的政策，别面又是段祺瑞扩张自己地位的妙计。这种段吴默契的联合政策不仅给冯玉祥及其所谓摄政内阁以大打击，同时在奉张看来也是一个不堪容忍的眼中钉，所以任从段氏在天津怎样高叫“吾对东南已有办法”，冯氏在北京怎样高叫和平会议，胡大帅对之总是一声不响，悄然提着十万大军进驻天津，马上分部由津浦路南行向山东进发：据各通信社消息，张作霖对于东南决用武力剿灭直系余孽，并且以山东与东三省有深切之利害关系，将令张学良与姜登选军继李景林而入天津济南方面，同时胡大帅的先锋吴光新宣言：“此时欲望彻底统一，无论如何不可不攻取南京而讨伐西南”（见七日东方社北京电）。

现在三大军阀间短兵相接的问题，第一是地盘的瓜分，第二是中枢政权的争夺。关于第一问题，段祺瑞要以他的爪牙卢永祥任直鲁豫的首席巡阅使，而以冯玉祥任苏皖赣巡阅使，并且急不择时，便要求他所不慊意的摄政内阁颁发明令，可是奉张的主意完全与段相反，奉张老实不客气地主张调开冯玉祥离北京去做两湖巡阅使，而以苏浙皖巡阅使俾卢永祥，至于首席的直鲁豫巡阅使胡大帅却默而不言，好教善于参禅的段太师去领会领会。

至于第二问题，冯玉祥本属捷足先登，所谓摄政内阁既未仰承段氏意旨又未征取胡帅同意，基督将军斧柯在握独出匠心，一时得心应手之乐自不待言。然他一方面，与段张之间的摩擦自然要加倍的增高。段祺瑞在天津不仅开府办公俨然自立政府，而且更进一步拟议安福系之正式内阁（十二日天津电：庚电：段派集议，拟推王揖唐组阁，伍朝枢曾

毓隽叶恭绰等为阁员，但奉张方面尚未赞同）；至于奉张，前此既反对二王（永江，乃斌）就职而荐叶恭绰钟世铭长交财二席，以现在奉张抵津后的凶势看来，乃有完全排除冯玉祥于北京政权外之趋势，请看下列消息 （一）东方社十二日天津电：奉天军气焰极盛，冯玉祥王承斌失踪；（二）上海各报同日电：天津会议，张作霖请冯玉祥带兵赴热河，冯荐李景林，段未置可否；（三）上海新闻报同日电：张作霖与冯玉祥王承斌争权龃龉，王承斌逃避往英租界，冯玉祥被扣留，现象极为纷乱；（四）连日上海各报电：京奉局长，奉张又委唐文高，未到任前以锦州站长吴藕塘代理，并随张来津，有路员二百余人，沿途更换，查该局长京冯曾委任丁某，今张又委，不知如何决定去留；又摄政内阁新任长芦盐运使刘之龙，天津海关监督徐祖善天津造币厂长刘人杰，均被张作霖挡驾，不能到任。

从上面这些消息看来，冯张的决裂似乎即在目前；但这种时间的问题，我们实无预言之必要，因为段氏对冯的态度不必与奉张完全相同，则三大军阀头的暗斗局面自然还可延长到相当的时日；毫无疑义的便是这种暗斗将日趋于严重。即以直隶与天津的地盘而论，冯玉祥的摄阁既已决定维持王承斌和李竟容的地位，而奉张则欲以直督地位与李景林，皖段则欲夺天津镇守使地位与刘询。这类的争夺正在方兴未艾，而总统制与委员制的暗斗又近在眉睫；主张委员制最力的是冯玉祥，在目前段张之对冯自然常处于联合的地位。

现在冯玉祥的地位业已入于危困时代：他介于段张两大的压迫之间，他除了自己的军队外没有领袖直系势力的希望，他所联结的同盟只有孙岳与胡景翼两个小军阀，惟因他的地位如此孤危，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左倾一点而做些有利于己的投机举动：如高唱中央政府改采委员制，高唱尊崇孙中山，实行取消宣统尊号改订优待条件，急开中俄会议等等。冯玉祥这些投机举动一面固然可博智识界多少同情，别面却因此大招段张与日本方面的疑忌。现在请看下列几项消息：

（一）东方社十日电：际此天津会议集中内外视线之时，加拉罕与王正廷在北京往来甚频，一般人士推测，或系谋中俄会议之完成起见，但他方面盛传，有人正在运动，将乘天津会议机会，在中国布类似苏俄之委员制度，现内阁中一部分国民党之有力者与加拉罕之间，正在努力进行，有所企图云。

（二）路透社十一日电：段祺瑞虽不以待遇溥仪之手段为然，但力避自相分裂，惟大局颇伏危机，盖冯氏在京所任诸人刻力图固其应急政府之地位，张作霖段祺瑞二人则既利用冯氏之叛吴，显复谋图推翻冯之机关以自定新政府基础也。

（三）申报十一日北京电：东方时报（张作霖收买之机关报）论孙派太新，须迎合旧社会观念，意在贯彻张作霖主张，而使段为总统，此间官吏亦赞成段来，谓较能筹款发薪，唯北京智识界，均主张实行委员制，免却今后争总统之内讧，苟仍袭旧军阀故辙，则改革徒劳。

三派军阀间的暗斗既如上述，然则隐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此为最堪吾人注意之一问题。试分日本与英美两方面言之：段张得势，日本固然踌躇满意，然鉴于段张间目前与将来之冲突，以及长江直系势力之难于复灭，亦时常有所危惧而发出悲观的论调，下列十二日东方社所发表的消息，最足以窥见日人之隐衷：

"某要人谈收拾时局之难处如左：（一）张作霖声称推戴段祺瑞为各省联军统帅，一切听段指示，冯玉祥等不问段尚未允，即以国民军大元帅之礼待段，但内部实并非如此忠

实于段氏。（二）王正延承冯玉祥意，与赤色浓厚之国民党及北京大学之一部通气脉，为迎合急进论者之施设，但如此，则根本上与段张等之主张不相容，北京一带，既为冯之大兵所围绕，段若能如预定之办法，一俟受各方面之推戴，即行入京，则如何能使战胜之冯玉祥从北京附近撤兵乎？（三）张作霖自身，如能依有利之条件巩固东三省之地盘，则其干涉中央政治之念或可淡薄，但其部下诸将借战胜之余威，已成骑虎之势，如李景林之窥直省，张宗昌之窥鲁省，吴光新且有越徐州而更南下之传言，彼等眼中已无冯玉祥，段将何以驾驭此骄横之奉军将士哉？（四）苏齐浙孙赣蔡鄂萧等直系有力者联名发拥段之通电，而从其里面观察之，则彼等表示团结巩固，乃欲合力防阻北方势力之南进，岂真彻底服从段氏乎？（五）南方之形势，尚在混沌中，孙文意见，不足以代表南方，纵孙段二氏之间已有接洽谅解，但国民党员之北上，大有促成北京急进施设之虑。总之，段氏身不带一兵而欲与国民会议谋自己所主张之根本改造说，在未行之前，不可不先将此等错综纷扰之难题一一措置妥贴，段氏之任务，可谓重且大矣。然则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做呢？他的责任，第一是谋怎样处置冯玉祥而巩固段张的狄克推多；第二是调和段张，使吴佩孚无隙可乘，徐图剿灭长江各省直系之势力。

至于英美，此次因为忙于国内的选举竞争，（美国代理公使又病死了），坐令日本势力在中国获得“如此奇异之发展”（伦敦太晤士报惊叹之词），本已吃亏不少。但一俟英国保守党内阁与美国共和党政府巩固之后，对于华事一定有积极之举动，这在近日伦敦太晤士报及包尔温的言词中，已明白表现出来了。包尔温本月十日对于中国时局的宣言是“如遇可用外人势力以助中国之机会，则政府定即商诸他国而为之”；太晤士七日的社论是“英国在华政策，今已届应表示更大敏捷与策略甚于许多年来所详示者之时机，英国政府刷新后，今已有对于中国困难问题更为活动注意之机会，合作固当维持，但他国之不活动，或方向不正的行动，未许为英国不活动之理由，英国于保卫其利益与维持其观念时，有更大的独行之必要云”。然则英美怎样做呢？第一当然暗中维持长江各省的直系势力，坐以观冯段张之变；第二是经过必要的旁观时间后，采取积极的干涉态度。军阀的和平会议也许要到这时候才能召集。

综观以上种种事实与消息，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即继曹吴而起的北方政情，仍然为北洋军阀三派余孽争夺宰割的局面，旧战争未了，新战争的种子正在胚胎萌芽；不仅真正的和平邈不可得，即各军阀间暂时妥协的分赃会议亦相隔尚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民除了静待军阀及列强的新牺牲外，只有准备上革命的道路；若还希望军阀头目出来收拾时局，简直是梦里做梦。

（原载《向导》91期，1924年11月出版）

〔附〕北洋军阀的各派系及其复灭

荣 孟 源

一、北洋军阀的来历

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北洋军阀”是指从袁世凯以后至国民党军阀出现以前的军阀势力。所以我们要来说明北洋军阀的历史，得先把袁世凯的武力的来历说一下。

一八九五年，满清政府为了保护其封建统治，设新建陆军，命袁世凯在小站（在天津东南七十里）督练。这一支七千人的军队，是一股新起的反革命武装。

一八九八年，北洋诸军归荣禄节制。一八九九年北洋诸军编为武卫军，共有五个军，每军约一万人。荣禄统率全军并兼统中军、马玉昆统前军、董福祥统后军、聂士成统左军，袁世凯仍统率其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年底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从袁世凯开赴山东。

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了，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和直隶（今河北省）各地，武卫军前、后、左、中四个军都消灭了，惟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在山东屠杀进行反帝斗争的人民，保全下来，而且深得帝国主义嘉奖。北洋军阀的买办性比满清政府更甚，这一个特点，在当时就可以看出来了。也正因为袁世凯能充当帝国主义的奴才，所以一九〇一年汉奸卖国贼李鸿章死去，就由他来充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武卫右军调回小站训练，改名北洋常备军，扩大编制。

满清所练的“新军”，一“镇”约一万二千五百人，略等于后日的“师”；一“协”约四、五千人，略等于后日的“旅”。北洋军于一九〇三年时，只有两镇，一九〇五年增加为六镇，约七、八万人，分驻在直隶、山东境内。一九〇六年以后满清政府在各省都建立“新军”，到一九一一年共成立了二十六个镇。河南与东北的新军，多是由袁世凯的旧部扩大编成。因此，直隶、山东、河南、东北的新军，差不多都属于北洋军系统。

辛亥革命后，满清各地的“新军”或者转向于革命，或者为革命军所消灭，北洋军仍保有原来的势力，成为继续反对革命的反动武装。袁世凯依靠北洋军的武力，窃取到大总统的职权；又利用其大总统的职权，扩大北洋军的势力，扩充其统治区域，一九一五年末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时候，他直接控制的武力，即北洋军的嫡系，计有拱卫、禁卫两个师、第一到第十二和第二十师等十三个师、第一到第十六和第四十七混成旅等十七个混成旅。姜桂题的毅军、倪嗣冲的安武军、张勋的定武军……等满清残军，原非北洋系统，也都归附于袁世凯，成为北洋军的旁系。这时各地军阀的势力系统是：直隶、河南、山东等省为袁世凯的嫡系所把持。热河、察哈尔为姜桂题所把持。

东三省于一九〇六年建立“新军”，是袁世凯的重要爪牙徐世昌调去一部分北洋军扩充而成的。此外东北还有旧军四十多营，多是招抚马贼而成，其中以袁世凯党翔张锡銮所招抚的张作霖等部的势力为最大。辛亥革命后，袁党张锡銮、段芝贵先后督理东北军务，东北军队全为袁世凯所支配。一九一六年张作霖驱逐了段芝贵，遂形成以张作霖为首的奉

系军阀。

阎锡山本与北洋军阀无关，趁辛亥革命窃取了山西省的军政实权，对袁世凯表示恭顺，以保全地位，袁世凯称帝时，曾上表劝进。一九一六年以前，阎锡山是袁世凯的爪牙，以后遂形成为晋系军阀。

陕西原来不属于北洋势力。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派陆建章率北洋第七师进入陕西，逐渐消灭了地方势力，攫取了全省。

长江下游各省与福建浙江，辛亥革命以后，多是国民党的势力。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冯国璋、张勋南侵，占领南京、上海；又派倪嗣冲、李纯等率军进入安徽、江西和福建；浙江都督国民党人朱瑞依附袁世凯；华东各省遂落于北洋军阀之手。

武昌起义，两湖革命党人消灭了满清军队，组织起新的军队。一九一二年黎元洪依附袁世凯首倡裁兵（只裁革命军），袁世凯就趁机向南扩张势力。一九一三年之后，段祺瑞、段芝贵、张锡銮等军阀先后统治湖北，湖北遂为北洋军阀所据。同时袁世凯又派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杀害进步人士，占据了湖南。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命其爪牙陈宧督理四川军务，派伍祥祯、冯玉祥、曹锟、张敬尧等率部分驻成都、重庆各地，从此四川也为北洋军阀势力所控制。

陆荣廷和龙济光同为强盗出身，投降了满清。辛亥革命以后，陆荣廷窃取广西军政实权，归附于袁世凯。一九一六年云南反袁的护国军兴起，陆荣廷先以出兵攻滇为名，向袁世凯索得饷械，大举扩张势力，形成桂系军阀。后来又与滇军联合，以反袁为名，伸展势力于广东。龙济光于一九一三年受袁世凯指使，夺取广东军权。一九一六年反袁战争发生，云南军与广西军进入广东，龙济光一时逃亡海南岛，最后被广西军消灭。

蔡锷于辛亥革命之后，掌握云南军权。一九一三年蔡锷入北京，云南军权遂归唐继尧掌握。后来形成为滇系军阀。

此外，还有许多后起的小军阀如陈炯明、赵恒惕等，霸占一省或不及一省地区而称霸一方者，不胜枚举。

北洋军阀以及其他非北洋系统的军阀在袁世凯未死以前算是有一个“头子”、在袁世凯死后就出现了许多小“头子”，这些小头子都争做大“头子”，所以就有了一九一六年以后十年间的军阀混战的局面。

二、北洋军阀的混战

毛主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毛泽东选集”卷一，五三页）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中央政府的大军阀与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帝国主义相互间争夺中国的斗争，表现为买办豪绅所支持的各派军阀的混战。辛亥革命前后，侵略中国的是英、美、日、帝俄、德、法等六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以英帝国主义力量最大；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有的，但是美、日帝国主义与英帝国主义联合，共同对付帝俄和德、法等帝国主义，不能不尽量减少彼此间的内

讧。帝俄和德、法等帝国主义固然反对英帝国主义集团，但是自己力量较小，而且内部冲突也很多，不可能对英帝国主义集团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时袁世凯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兼供各帝国主义驱使，勉强维持着“统一”局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

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德和帝俄等帝国主义忙于欧洲的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美、日帝国主义就乘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力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苏俄不只彻底铲除了帝俄对中国的侵略，而且竭力援助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对于中国革命是非常有利的。一九一八年德帝国主义打败了，它不能不暂时放松对我国的侵略。法帝国主义虽然没有打败，可是因受战争的影响，战后对中国的侵略力量，毕竟也缩小了。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有相当庞大的基础，战后卷土重来，还是侵略我国的主要力量。美、日帝国主义新近扩大了对我国的侵略力量，和美英帝国主义共同成为压榨我国人民的三个主要国家。这三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日益尖锐，因此他们所支持的军阀混战也日益剧烈。

一九一六年的反袁战争，打破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却带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那时许多军阀如奉天的张作霖、云南的唐继尧等就乘机独霸一方，不过力量最大的还是北洋军阀的几个嫡系，华北和华中的主要省份，还是由他们控制着。袁世凯部下的大头目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王没有什么力量，冯和段都是实力充足，袁世凯死后他们就分裂为直系和皖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其部下有曹锟、吴佩孚等人，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与奉系的张作霖联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其他军阀，也都是依靠帝国主义的。但是，事实上一个帝国主义往往并不是只支持一个军阀，一个军阀也不是只依赖一个帝国主义。

袁世凯死后，反袁战争停止，黎元洪当了大总统。北洋军阀立即召集徐州会议（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等十二个省军阀和海南岛的龙济光都有代表参加。借此力量，段祺瑞攫得了国务总理的职位，冯国璋攫得了副总统的职位。冯、段对黎元洪明争暗斗，冯、段互相间又不断冲突。一九一七年冯国璋、段祺瑞怂恿张勋驱逐了黎元洪，弄出溥仪来复辟。随后冯、段又以反对复辟名义，驱逐了张勋，冯国璋当上了正式总统，段祺瑞重为国务总理。此后冯、段矛盾日益尖锐，一九一八年段祺瑞以徐世昌代替冯国璋为总统，遂展开了直、皖两系军阀的大混战。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间，段祺瑞向日本帝国主义借款数万万日元，即所谓“西原借款”。据当时日本财政大臣胜田主计说，西原借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菊分根”政策。他在所著的“菊之分根”一书中说，这就是“日本的经济势力，得发展于大陆，将此种可庆时期已近之意，比之菊之分根。”明白些说，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西原借款，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卖国贼段祺瑞妄想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撑腰，武力统一全国，对于日本的一切要求，莫不极力逢迎：把东北的森林和矿产，东北、蒙古和华北的一些铁道都出卖给日本；允许日本在我国设立无线电台和有线电报；一九一八年更与日本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竟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进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俄，并借“共同防敌”的谰言引导日军进入东北和蒙古；而且，段祺瑞还向日本表示，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一五年所提出的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件，他是“欣然同意的”。总

之，段祺瑞的一切行为，都“伫候此邦（指日本）密息，以决进止”①。他既这样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就选用他为侵略中国的唯一走狗，在中国军阀混战中，亦即在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中，“决计援段”②。

胜田主计在“菊之分根”一书中说：“日本对华野心，已被外人怀疑。”“列中国尤其美国，深信‘此即日本侵略中国之恶魔手段’，强烈加以攻击。”日本支持皖系军阀，美帝国主义是不能坐视的，因此，美帝国主义联合英帝国主义支持直系军阀以与之对抗。一九一七年冯国璋病死，其部下曹锟、吴佩孚等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势力逐日扩大，一九二〇年发动了直皖战争。皖系军阀在战争中失败了，北京政府遂落入直系军阀手中。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其走狗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失败，就指使奉系军阀张作霖向长城以南扩张势力，一九二二年掀起奉直战争。奉系战败，退回东北，这时直系军阀差不多统治了华北和华中的全部省份，气焰甚为嚣张。直系军阀首先驱逐了徐世昌，搬出和美国有关系的黎元洪来当大总统，随后又驱逐了黎元洪，曹锟自为大总统③。同时向外伸展势力，派杨森督川，把四川攫为己有；派孙传芳督闽，把福建攫为自有；还派沈鸿英为粤督，从江西等地进攻广东，企图驱逐孙中山，驱逐广州革命力量，霸占广东；又命齐燮元，孙传芳等围攻浙江和上海，消灭了皖系军阀的残余，浙江督办卢永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竟妄想着武力统一全国，

曹锟、吴佩孚和段祺瑞同样是卖国贼，他们把持着北京政府的时候，向英美大举借款，出卖中国主权给英美帝国主义。如一九二一年以中美无线电台借款名义，允许美帝国主义在上海、北京、广州、汉口、哈尔滨设立电台；又以中美无线电报借款名义，允许美帝国主义在拉萨、巴东、重庆、兰州设立电台；以中美烟酒借款名义，将全国烟酒税抵押给美帝国主义；以各种铁道借款的名义，将沧石路、京奉路、川粤汉等铁路的主权抵押给英帝国主义。这些事件不过是直系军阀卖国勾当的几个例子而已。一九二一年末到一九二二年初，美帝国主义以宰制中国为目的，召集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等为出席代表，而以美帝国主义分子蓝辛④等为顾问。美国顾问实际上是北京政府代表团的太上皇。所谓“中国代表团”，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他们曾在大会上提出了“十大原则”，那是前一天晚上接受美国国务卿许士的通知，临时和美国顾问草成的，内容空空洞洞，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美国的利益。美帝国主义要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即是要求中国完全变为殖民地。北京政府的代表竟说：“中国完全赞同所谓门户开放主义或中国有约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之故，准备接受该主义实施于中国全部不设例外。”（“十大原则”第二页）直系军阀这样效忠于英美帝国主义，自然获得他们的洋主人的宠爱。一九二一年四川军阀刘湘攻击湖北宜昌时，英帝国主义制止川军开炮，帮助吴佩孚驱逐刘湘回川；一九二二年奉直战争时，英教士介绍两方代

---

①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毅給馮国璋的密信，原件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②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九日蔣侴化給周学模的快信，原件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③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直系軍閥驅逐了黎元洪，此后曹錕即进行贿选活动，以每人五千元收买“猪仔議員”，十月五日曹錕被“选”为总統。

④ 蓝辛（Robert lansing）一九一七年为美国国务卿时曾与日本帝国主义商談共同侵略我国，成立“蓝辛石井协定”。

表在秦皇岛英国军舰上签订媾和条约，压迫奉军出关；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美帝国主义供给直系军阀价值三百二十万美元的军火，另有步枪一万枝，子弹二百万发与机关枪等件。一九二三年六月初，驻华美公使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要“迫走黎元洪……选举曹锟为总统。”美总统哈定指使曹锟进行贿选，说“美国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

皖系军阀势力大的时候，英美帝国主义不能允许；如今直系军阀势力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样不能允许。一九二三年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与皖系军阀残余卢永祥就联合反对直系。八月间江浙战争，卢永祥失败，皖系军阀复灭了，直系军阀孙传芳遂霸占了东南各省，成为一支独立的封建和买办的势力。吴佩孚在直系霸占东南以后，“武力统一”的野心愈炽。九月间，张作霖出动十五万大兵，电斥曹吴，响应卢永祥；吴佩孚就自任总司令率二十万人马，与张作霖混战。这时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倾向革命，十月间起兵反吴，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从此，直系在华北的势力消灭了。奉军进入关内，段祺瑞乘机攫取政权，在北京组织执政府，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北方成为奉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势力，因为冯玉祥倾向革命，奉系军阀就竭力排挤国民军。那时，吴佩孚逃回汉口，自称苏、浙、豫、皖、陕、晋、湘、鄂、川、赣、黔、桂、闽、粤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实际上他所能统治地区仅有湘、鄂两省。孙传芳霸占着长江下游，控制着苏、浙、闽、皖、赣五个省，势力似乎超过了吴佩孚。总之，从此北方是奉系的势力，长江流域是直系的势力，奉直两系的混战，以及各系的内讧，仍是继续不断。

三、北洋军阀的复灭

中国在北洋军阀蹂躏之下，日益堕入于殖民地的深渊。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之类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二十一”条、“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九国公约”等等，比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出卖中国主权更多，危害中国人民更严重。他们更公开代表帝国主义来压榨中国人民。例如一九二三年二月军阀吴佩孚不准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工会，工人罢工反抗，北京公使团要北京政府武力解决罢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二月七日一天杀死工人四十余人，杀伤数百人。又如一九二五年五月青岛纱厂工人罢工，反抗日本厂主，日本帝国主义命令北京政府说：“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须解散工会。”山东督办张宗昌就派兵杀死工人八名，重伤几十名，逮捕七十余名，悍然宣布：“工会应该取消，因为日本人望着骇怕。”又如五卅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命令北京政府封闭上海总工会，淞沪督办丁文江即奉命执行。工人代表每天几次的到淞沪督办公署去质问：“为什么要封闭总工会？”当时淞沪督办丁文江的代表总是回答说：“外国人告了你们啊！”“你们且回去，回去，好好替外国人做工啊！”这样的实例不必多举。就是这几件事已足说明，军阀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是全中国人民的死敌。

军阀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唆使，一方面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连年进行混战。又为了进行混战，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势力。一九一四年全国陆军不过四十五万七千人，一九一八年增加为八十五万人，一九二二年又增加为一百零六万人，一九二五年更增加为一百四十七万人。因此，满清末年（一九一〇）全国军费不过一亿零二百万元，一九一六年增加为一亿五千二百九十一万元，一九二五年更增加为六亿元。北京

政府的军费开支，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间占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到三十五，一九一九年增加为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二三年更增加为百分之六十四；各省的军费支出，竟有占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者。这样庞大的军费，不管当时来源是外债、内债或捐税，归根结底都是由劳动人民来负担。有人计算过，以全国人口数计算，一九一六年平均每人每年负担六元六毛五分，一九二六年平均每人每年负担八元一毛八分。此外各省各县以及区乡地主豪绅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摊派，更要超过上述负担若干倍。

连年军阀混战，残害人民，破坏生产，损失无法计算。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倒戈通电①指摘奉系军阀说，大兵所到之处，“一厝之内，剽掠十遭；一夕之间，焚烧百处。”其烧杀掳掠的惨状，不难想见。甘肃小军阀部下所唱的歌词所说：“拉住富汉烤银子，拉住穷汉补名子，为姑娘去攻堡子。”实是全国军阀队伍的写照。大小军阀吮吸人民脂膏、大发横财。如安徽督军倪嗣冲有财产银洋八千万元，另在安徽阜阳县还有土地七、八万亩；湖南督军张敬尧有土地七、八万亩；据郭松龄通电说，奉军首领张作霖有私产银洋九千万元，其部下杨宇霆有二千万元，王永江有一千万元，其余有数百数十万元者，不可胜数。劳动人民陷于饥寒困苦，那是必然的了。

毛主席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告诉我们说：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小手工业者，贫苦的店员和小贩也都和贫农差不多，“叫苦不迭”，“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中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学生、中小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只有少数人有余钱剩米，惧怕革命。大多数是尽力挣扎，方能维持生活，或者是生活“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他对革命采取中立态度，或者是参加革命。在革命高潮时，不只中立派可以参加革命，就是从前惧怕革命者也只得附合革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的反帝反军阀统治的自发的斗争，五四运动以后，日益发展。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学生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旗帜。正如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说：“无数万中国民众的命运真不能再静听军阀的愚弄了！革命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中日长一日，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锁链已经开始摇动。”

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运动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英、美、日各帝国主义为了共同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就指使奉直军阀合作，以“讨赤（即反共反人民）为主旨”，停止混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吴佩孚通电声明：“结束讨奉战争息兵尊法”。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一月二十三日靳云鹗代表直系，张宗昌与李景林代表奉系，在泰安订媾和合作条约，共同“讨赤”，且同谒曲阜孔林，“永矢不渝”。当时北方的革命武装，只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因此，奉直军阀与山西军阀阎锡山联

---

① 郭松龄原为张作霖部下的小軍閥，一九二五年冬武装反对张作霖，通电述张罪状，但不久即失败，被张作霖逮捕枪杀。

合攻击国民军，日本军舰开抵大沽口，向岸上的国民军开炮轰击。英、美、日、法、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防务，并且威胁说："若于三月十八日正午止不得满足保障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奉、直、晋军阀压迫之下，退到了西北区。

国民军退出北京，奉直两系为争夺北京政府又吵闹起来，最后在共同反共反人民一点上"团结"起来。段祺瑞下野，取消了执政府；曹锟通电退位，不再当总统。六月二十八日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晤，面商反革命的军事计划。这时广东是革命中心，陕西、绥远也成为革命地区。反革命军阀力量的布置是，吴佩孚据守两湖，担当反革命战争的第一线，阻止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直系的另一首领孙传芳仍然盘据上海、苏、浙、皖、赣、闽一带，进行反革命勾当。张作霖霸占着北京、直隶、山东各地，并向河南伸展势力。阎锡山跟随在吴佩孚与张作霖的尾巴上，保持其山西土皇帝的地位。

当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孙中山曾几次发动南方的武力，反对北方军阀。但是滇系、桂系、粤系等军阀，在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之下也是混战不休，并且和北方军阀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曾表示过赞成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不过一旦目的达到，他们就抛弃了民主主义的招牌，并且要排挤孙中山。后来，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东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以后，帝国主义还是指使这些军阀扰乱广东。到一九二五年才消灭了陈炯明等军阀，统一了广东。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在苏联援助下从广东出师北伐，依靠共产党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一切革命战士的英勇作战，各地工农群众的热烈响应，半年的时间打垮了吴佩孚，打败了孙传芳。革命力量发展到了长江北岸。奉系军阀张作霖看见两支直系军阀的队伍，一支复灭，一支受伤，感到革命的严重威胁，十二月一日、六日连次通电急呼，说什么："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企图拉拢所有反革命的力量，来阻止革命的发展；竟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借以表示他真实是要结成一个"绝无南北新旧之见"的反革命"团体"来作最后的挣扎了。

北洋军阀没有能力来阻止中国人民革命，而且当时的形势，也不可能从外面来阻止革命。因此，美帝国主义首先寻找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使他来破坏革命并排挤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美帝国主义找到混入革命队伍的上海交易所经记人蒋介石，一九二六年冬季就派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等到南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去接洽。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起义，革命力量发展到长江下游，直系军阀孙传芳也垮台了。这时蒋介石公开叛卖了革命，随后汪精卫与曾经混入革命阵营的军阀官僚们都相继叛卖了革命，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于失败。

但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多年来祸国殃民的北洋军的主力基本上已被消灭了。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迫使奉军退回东北。此后，蒋介石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靠山，兼充英、日等帝国主义的走狗，把北洋军的余孽一一收罗在部下，代替北洋军阀而建立了他的封建和买办的新王朝。

为"国民会议"奋斗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但一（恽代英）

自从北京政变以后，中国政治界颇陷于紊乱之境；帝国主义者的势力既一时得不着平衡，各派军阀的地位亦都动摇不定。这是全国民众在政治上自求发展的好机会。我们应当趁帝国主义与军阀间之纷扰，提挈全国民众，向他们作一个最有效力的政治上的争斗。这是为救中国与救自己，我们不可不加倍努力的事情。

我们从今以后，要注全力于孙中山先生等所提倡的"国民会议"，因为这是引导全国民众作直接政治斗争的。我们知道在"国民会议"中间，必须还要从各方面与帝国主义军阀的势力相抗拒；便是我们想要能开成这样的"国民会议"，亦须得我们很多的奋斗功夫。我们要救中国与救自己呢？还是愿放过这样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

孙中山先生十一月十日发布的宣言，说明国民党"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半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之改善"，于是根据此旨说明其顺序，"（1）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2）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乃得有改善之可能。（3）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可能。（4）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5）经济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增，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经费易于筹措，一切失业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6）中国法律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孙中山先生既认定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是一切救国方案的根本，又认定自袁世凯以来之反动军阀，皆为帝国主义所勾结羽翼；然此等军阀一遇与国民相结合之武力，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故言"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的现象，第一步当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一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孙中山先生因此，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召集以（1）现代实业团体，（2）商会，（3）教育会，（4）大学，（5）各省学生联合

会，（6）工会，（7）农会，（8）共同反对曹吴各军，（9）政党等派代表所组织之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人数宜少；国民会议人数当较多，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唯其代表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以前，各省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而且亦决定于国民会议实现以后，将以国民党政纲提出于国民会议，以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

孙中山先生的用意是很深远的：他要唤起全国民众打破一切垄断包揽的局面，初使各种团体派出代表列席会议，以破坏向来为武人把持的政局；继由各团体直接选举，使人民更能直接参与政治。反对曹吴之武力，是容许他们与国民合作的；而且在国民会议中间，即全国各军，凡由军士直接选举的代表均一律允其参与会议。为保障选举宣传等自由，提出赦免政治犯等主张；为求贯彻国民党政纲，决定于国民会议中以此政纲质之于全国真正的人民代表。这是一个如何光明磊落的国民革命领袖的政治主张啊！

中国共产党最近发布的对于时局的主张，首先赞成国民党所号召的，而亦即是他们在黎元洪去职时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他们更进步的，主张以这个国民会议为临时政府。就他们所指示的，以为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企图有三个时期：华盛顿会议以前，他们是要瓜分中国；华盛顿会议以后，他们是要共管中国；但这两个计划，都因为他们在华利害的冲突而不能实现。最近他们是要采取分立政策，各拥护他所接近之军阀以分裂中国。日本在北方，英国在中部，法、比在其他方面，要集中当地军阀之力，由经济的支配权力，进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机关。但是美国在中国没有独占的势力范围，他的经济势力如余资、余货又特别优裕，他不利于中国的分立，使中国完全堕入日、英、法、比的荷包里；他希望在中国实行道威斯一类的计划。中国今日是不免于分立呢？还是不免于实行道威斯计划呢？被压迫的人民在此危急时期，应大家联合起来，而且应当与一般还没有与帝国主义发生确定关系的武力相联合，以共同努力使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极力反对军阀们拿什么各省军民长官会议来代替此会。此会之任务不但是筹议国民会议，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前，并应拥护此会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此政府虽非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还不是中派；只要他确能防止帝国主义分裂中国或共管的阴谋，只要他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他不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准备赞助他。他们亦说明了他们预备要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中奋斗以求贯彻主张的要求，他们认为拥护这些要求，是一切人民及其代表的责任，尤其是国民党的责任。他们列举了下述几项事：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

（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唯一关键。

（三）全国非战时的常备军，均以旅长为最高级军职，废除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总司令、检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军长、师长等军职；因为这是杜绝军阀势力集中盗国乱政之重要关键。

（四）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

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用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以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

（五）规定高最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制，工厂卫生改良，工厂补习教育之设施，工人死伤保险法之规定，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设劳动平民之住屋。

（八）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损失及救济北方水灾。

（九）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

（十）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

（十一）增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征收遗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此等大宗税收、不但足以补偿废止旧税——厘金、牙税、盐税，米税、田赋附加税及其他各种正、杂捐税——之损失，并可用作补助退伍兵士、失业贫农及推广教育之经费。

（十二）为保障知识阶级之失业及青年失学计，国家预算中，不得将教育经费移作别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庚子赔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费，优待小学教员，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

我们从上面所说的具体的条文，不能不十分同情于共产党的要求；共产党本来特别是代表被压迫的农工群众的党，所以他们的要求，更明确而切近于人民的实际生活。这一切所要求的，亦应当都是国民党所要求的，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纲，都包括有这些意义在内。因为国民党是代表一切被军阀帝国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所以真正的国民党对于代表被压迫的农工群众的共产党，有很多应当一致努力的工作。我们祝这两个伟大的民众的党的成功，我们祝他们因为这一次的奋斗而得着民众，我们祝他们因为这一次的奋斗而进为民众的党——被压迫的民众自己加入，而且成为能左右党的行动的主要势力。

中国以前没有民众的党，所以民众不能在政治上有力量。现在，民众可以自己选择他们的党了。引导他们认识最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党！使他们加入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党！使他们成为最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党的中间决定一切行动的主要势力！

我们应当注意段祺瑞通电主张的善后会议与国民代表会议：他主张善后会议是由“各省军民长官”的代表所组织的，这便是一个强盗魔鬼的聚餐会，而所谓国民代表会议的组织法，便靠从这个强盗魔鬼的聚餐会中间产生出来。狗咀里会出象牙么？前几年因武力统一而身败名裂的段祺瑞，现在又想做成一种把持包揽的局面了。我们应当努力宣传代表民众利益的主张，使民众在他们还未能预防的时候便已经组织而且行动起来，这样，我们要逼迫到使这些强盗魔鬼不敢不召集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时局是如何严重啊！

中国青年所负的使命是如何伟大啊！

（原载《中国青年》55期，1924年11月出版）

北 上 宣 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孙 中 山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州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复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党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北伐目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团结力之增长，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蕲其实现者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其内容具如此。十三年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其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荦荦诸端，无繇实现。为谋目的之达到，不得

不事于障碍之扫除，此北伐之举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后，本党旗帜下之军队在广东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党复从种种方面指示国民以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虽怀挟其武力统一之梦想，而其失败终为不能免之事实。今者吴佩孚之失败，足以证明本党判断之不谬矣。

军阀所挟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

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求逞，军阀亦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愿我友军将士暨吾同志，于劳苦功高之余，一念及之也！

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此，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

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用以拥护国民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预备会议，以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

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

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者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

（原载《孙中山选集》下卷）

〔附〕国民会议之怒潮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超　麟

自从本报和孙中山先生发表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以来，一直到本月十四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为止，国民会议运动已告一个段落，——即现在国民会议已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全国各被压迫阶级已应声而起，自己团结起来，依照本报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去实现这个国民会议了。这是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一件极可注意的事，也可说是中国人民具体地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要回政权之一种运动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当去年黎元洪出走之时，即发表具体的主张，召集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共同开一个国民会议来解决时局。但当时因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宰制人民的形势还未能如目前之深印入广大群众脑海之中，以致应声而起者廖廖无几，而其结果反惹得帝国主义一番嘲笑。香港南华晨报——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南部之喉舌——特为中国共产党那一次发表的主张，做了一篇社论，该文著者居然说这种主张的小册子只值得送到烂字堆里去，居然说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召集的国民会议只是油与水混合的药方（见本报第三十四期）。

然而召集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及其他职业团体共同开一个国民会议是油与水混合的药方吗？中国共产党依照这样的主张而印行的小册子只值得送到烂字堆里去吗？帝国主义报纸记者这种恶作剧的嘲笑不幸已被这一个月来风起云涌从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各方面发出的国民会议呼声证明其为无聊的滑稽了！

读者只要披阅十一月下旬以来的民国日报，就可看见该报国民会议一栏里所载各团体关于国民会议的通电及消息之灿若繁星。这种种通电，公函及集会截至本月十三日为止已经有人为之有系统地统计起来发表在十四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时候发行的“特刊”里头了。本报为篇幅所限可惜不能将这些通电，公函及各团体的进行消息尽量披露出来；然而读者看过近一月以来的民国日报或十四日大会时的“特刊”，已够知道国民会议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有广大民众在其背后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分赃的所谓各省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而务必使人民自身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能够成功地实现，向执政政

府收回政权了。

大要这一个月以来，国民会议的应声可以分做三方面来说：

关于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上海总商会于孙中山先生离沪北上之时即通电全国商会请一致要求职业团体加入国民会议；同日有学生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六十二公团发出通启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到十一月二十九日又有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市民协会等二十七公团组织一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并发表宣言。自此以后继续不断有许多公团加入这个筹备处。加入的公团数目，经过筹备处开了七次委员会之后，直到十四日成立大会，已逐渐由原发起的二十七个增加至一百四十三个。在这期间内除这些公团多各自有宣言或通电发表外，上海国民党要人特为国民会议事招待商，学，实业各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亦致电段祺瑞请注意五事，召集国民会议也是应注意之一。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自身也发了一封快邮代电给全国各公团请在各所在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一封公电给段祺瑞请其放弃军民长官善后会议计划及十二日之拥护孙中山，警告段执政二电。到了十四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遂正式由一百四十三公团，四百余代表宣告成立，通过十四条章程，十六条要求的宣言，一封致段执政电及选出二十一位执行委员，五位候补委员。这篇成立大会宣言及所列十六条要求是很值得我们介绍的：

> “十三年以来号称民国，而民主政治未尝丝毫实现，以至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任意损坏中国国家生命及人民利益。自曹吴倒后，一般军阀方在分裂崩溃的状态中，在此时机，中国的政局有两个可能的倾向：一是由人民团结努力取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一是续曹吴而起的军阀集中其势力，复行武力专政。前者成功，方有保障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之希望，后者成功，必继续卖国乱政引起战祸的局面，此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及其是否人民团体代表的会议，乃为两方——民主政治或武力专政，分别胜负之第一步。所以我们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努力创造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并应立即努力要求一个真正人民代表的预备会议。我们不但反对各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并且反对各省军民长官有派代表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权利。我们在国民会议的要求是：（一）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二）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之自由权利；（三）废督裁兵；（四）废止厘金及一切苛税杂捐；（五）民选省长县长及乡村自治机关；（六）定保护工人农民利益的法律；（七）禁止预征钱粮及其他陋规；（八）整理财政，发展教育实业；（九）限期禁绝鸦片及其他类似毒品；（十）切实保护华侨，取消取缔华侨教育条例及移民律；（十一）收回教育权；（十二）妇女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十三）裁撤上海护军使镇守使；（十四）没收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上海等十县被兵灾民，十县内被灾农户，免纳钱漕三年；（十五）召集上海市民议会选举市长，并组织市民自卫团；（十六）救济上海各工厂失业工人。希望一切人民团体，一齐加入本会，集中我们的力量，为上列要求奋斗。”

要这十六条要求能够向国民会议提出，必须国民会议之召集得着保证，于是大会又向段执政要求实行三事：“（一）立即召集人民代表之预备会议，在三月内召集国民会议；（二）立即明令取消箝制人民之治安警察条例，并禁止北京及各省官吏干涉国民会议及其选举；（三）立即明令恢复曹吴等军阀解散之工会农会学生会”。我们敢说一句话，这种

种的要求都是名正言顺，而且为在两重压迫底下中国人民之最低限度的要求的。至于国民会议之能否召集及这些要求之能否被采纳则全靠上海人民及全国人民之努力了。

关于外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在外埠亦极为热烈。南京学生总会五日登出快邮代电赞成国民会议，主张对内建设真正国民政府，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接着，徐州八县就发起徐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铜山县教育会，邳县国民会议促成会亦有同样的主张；到了十二日徐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就正式成立。此外如松江教育会，县农会等亦先后发表宣言赞成孙中山主张的预备会议而反对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安徽方面，首由民智促进会等四团体致电孙，段赞成国民会议，随后芜湖学生会及其他公团，安徽救国会，省教育会及南陵各团体等亦屡次通电声明为国民会议奋斗。湖北方面，十一月三十日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即起来做国民会议的运动，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善后会议；平民教育社汉冶萍总工会学生总会亦有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之表示；到了十一日湖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就成立了；八日武汉学生曾有一通电请求段祺瑞放弃善后会议之主张，去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湖南方面，首由外交后援会发起：（一）召集湖南各团体讨论国民会议之进行，（二）电孙中山先生请贯彻初衷，（三）通电全国一致赞成；长沙总商会亦赞成此主张；结果湖南也由全省农工商教律师公会各公法团成立一个国民会议促成会了。浙江方面亦有进行，浙江全省及宁波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萧山农民而且发出通告劝告全国农民都赞助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了。广东方面之热烈更不用说，东方通讯社十一日广州电说广州新学生社等团体皆通电赞成国民会议一致的反对善后会议，并且广东大学，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市商民协会也是同样主张的。此外如九江，烟台等处亦有赞助国民会议之各团体的通电或宣言，于此可见要求国民会议的空气已经弥漫全国了。

关于妇女的。此次，妇女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异常活动，特别是上海及浙江。本月三日上海，浙江的女权运动同盟会通电致全国女界请推举代表来沪“妥筹建国大计”。五日又有十五个女团体发起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七日在上海大学会议后，决定发布宣言，致电孙段及全国女界。同时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曾来函请女界加入合作，女界亦已复函应许，但声明女子有特殊要求，加入合作后必须仍保存其原有的组织，所以十四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亦有二位女界代表被举为执行委员，一位被举为候补委员。至于杭州女界的活动亦时有消息传出。自孙中山先生派王华芬女士回浙宣传后，杭州女界已在吴山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关于国民会议之进行方法，结果决定女界亦宜组织一个国民会议促成会与杭州国民会议促成会一致进行并且通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一致要求女子参加国民会议预备会。此外浙江各县妇女联合会也有公函给全国女界亦是要求女子参加国民会议的。

总而言之，国民会议呼声已深入广大群众脑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到处成立就足证明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已日益加增，此次国民会议运动更是人民和几千年被压迫的妇女的一个政治活动之机会，这个机会我们切不可轻易放过，仍旧让帝国主义和军阀“执政”来再压迫我们。

临了，我还要请读者诸君切勿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主张（见本报第九十二期），切勿忘记了帝国主义报纸记者——南华晨报的记者，对于前次共产党主张之嘲笑，并且要

对他们证实“国民会议绝不是油和水的药方”“只有帝国主义报纸是应该送到烂纸堆里去的”。

（原载《向导》95期，1924年12月出版）

〔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通信——

罗　敬

一、全国民众代表之集合

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前后一月有余，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这些促成会旗帜之下集合的是：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及各种有职业的平民。到会各代表虽不能将各地团体人数作确切的报告，但所代表的民众，当在数十万以上。这个民众性的大集合在北京开会一月有余，而全国知者尚少；其原因是：在安福派政府高压之下，该会于开会时常不能自保安危；该会所寄出的会报，多被政府劫留；该会所发表的新闻，在北京占大多数的反动报纸，多不予以登载，而对于安福部政学系研究系联治派及军阀代表所组的善后会议消息，则逐日连篇累幅的与以登载。

这是一个民众的会议！从会议之经过与结果看来，是颇良好的。这样从民间产出的会议，在我国实不易见，或者竟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本报代表民众利益，并曾屡次勉励此会之成功，对于此次会议，实有不惜篇幅介绍之必要。记者曾觅得该会各种材料，并曾到会旁听，特作此篇以告本报读者，并盼本报读者特别注意于该会议之各种议案与宣言。

二、会议时期与政治环境

当大会开幕之日，段政府的善后会议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各方面的“人物”，段政府竭力网罗，从好政府主义者以至于新官僚“社会党”领袖，都被召应试；与此会议之各地人民代表纷纷到京，遥相对应。北京城于安福派统治之下，早已在恐怖的状态之中。人民不仅集会不得自由，而且言论也遭政府罗织。但在当初，孙中山先生尚存一息于病榻之上，段祺瑞还不敢马上撕破面具，人民的活动还勉强自由。及至孙先生去世，骨尚未寒，而孙先生主义庇护下的民国日报被封，嗣后连续压迫各报馆与通讯社，无端逮捕新闻记者，无数侦探鹰犬，大形活动。中山灵柩之停放，政府最初不允许在中央公园，而指定远离民众之城外荒坛。中山遗体之移往西山，也是政府所欣愿的。北京城日堕于恐

怖，反动势力日益增长，民众不能抗争。

军阀角逐而要造成的未来大战，自张作霖来京忽而离去之日，其局面已经开始。从此以后，段张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多。然而执政府谋臣甚多，能奔走者尤众；善后会议或连续或间断，日以金钱与交换条件贿买，务期成功。自中山逝世，分裂国民党的计划便自执政府而出；政府的机关报与附属于政府的各党系报纸，都扶掖国民党右派，宣传国民党之分裂。

但在这个时期的全国民众，反对善后会议之声遍于各地，哀悼中山，誓愿继续革命的表示，来自大小城市与庄村。然而政府对此，充耳不闻，只图应付军阀，手忙脚乱，急谋成功。

三、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工作

各地民众代表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集会，自然感觉到人民自身责任之所在。因此，大会决定否认段祺瑞所提出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又以为趁人民代表聚集的机会，应该详细讨论中国衰弱祸乱之真因，并提出具体的救济方案，以宣告于民众；民众应从此继续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以求得真正的国民会议之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之成立，必然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重要工具，因此大会决定讨论各种国际与国内的问题，而定出下列的范围：（一）国际问题，其中包含：（1）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2）不平等条约及特权；（3）租借地与租界问题；（4）关税问题；（5）外人在华驻兵问题；（6）外人在华航行权问题；（7）外人在华传教及教育问题；（8）外资与其势力问题；（9）华盛顿会议；（10）临城案件；（11）金佛朗案；（12）鸦片会议；（13）无线电问题；（14）外国银行团；（15）上海租界焚书问题；（16）沪西日本纱厂罢工问题。（二）国内问题，其中包含：（1）军阀军队与内乱；（2）联省自治问题；（3）人民自由问题；（4）实业问题；（5）教育问题；（6）商业问题；（7）工人问题；（8）农民问题；（9）妇女问题。（三）财政问题，其中包括内外债各问题；并详细审查中国的财政与提出救济方法。（四）国民会议运动之方针，其中包含：（1）批评并否认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国民会议组织大纲；（3）促成国民会议与励行民众组织。

大会的责任既是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而此国民会议之产生，非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不足为功；所以该会议开会后于发行会刊时便宣言说：

"最近国民会议之运动，弥漫全国。此种运动孕育于反帝国主义怒潮之中，且产生于中国最强之直系军阀推倒之后，其使命乃为客观情势确定无疑；质言之，它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所束缚的锻炼之目的。它将继续打倒直系军阀，进而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它的方法是不妥协的，民众运动的。今日之一粒种子，他日必结为最大果实。我们必须努力栽培灌溉，扫除其周围之蔓草荆棘。此工作最初虽不免于艰难困苦，牺牲流血，然吾人之责实无旁贷"。

四、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之决议

大会自决定讨论各项问题后经过半月余的工作，便整理出各种问题之报告与其决议方案，报告的内容是十分繁多的，这绝不是豢养的善后会议议员甚至国会议员所能作的事，

而唯有革命的民众代表才能做到。各种内容该会将另出专册印行，下面所述乃简略指出决议案中之重要者：

国际问题之决议——最初说明欲谋中国民族之独立与自由，须将已经为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攘夺以去的国家权力，完全收归在集体的人民手里。其次说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经过，历述自最初的商业政策以至为鸦片贸易扩清道路的英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民族史的第一页。马关条约为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开一新时代，割地赔款保护外货的关税制度，由此而生。马关条约外，辛丑条约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酷烈者之一，这个条约是对中国民族反抗外力的惩罚，把中国军事、经济的国防完全打破，将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尊严蹂躏无余。鸦片战后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入史。中国自从堕入这个历史里，就变为国际的殖民地。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依国民会议产生国民革命政府，宣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大会决议案中曾一一指明：（1）领事裁判权；（2）租借地、租界及中国境内其他的外国行政权；（3）协定关税制及其他保护外国商品、保护在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等规定；（4）外人管理财政权；（5）庚子赔款；（6）外国在中国内地驻兵权及内河航行权；（7）外人在中国境内传教及教育设施。此外，又指明帝国主义列强于近数年对中国之进攻有下列诸事实：（1）华盛顿会议；（2）临城案件；（3）鸦片会议；（4）金佛朗案；（5）无线电问题；（6）上海租界焚书问题；（7）上海日本纱厂华工罢工问题。对于以上诸问题，都分析其内容，而提出严重之抗议。本决议案之结论是：恢复国家权力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就是恢复国家权力的机关，故大会决以全力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实现。

五、"打倒军阀！""排斥联治！"

国内问题之决议——在国内问题中，包括九个重要问题已如上述。决议文中一再申述打倒军阀的口号，在军阀军队与内乱之决议里，说明全国民众在打倒军阀的旗帜之下，应当猛勇的以人民要求民治为前提，对于一切军阀施行总攻击；尤其要反对的是军阀的武力主义，因为那是军阀否认人民力量的标语，与人民所期望的和平与统一，绝对背道而驰。同时又说明广大的兵士群众之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在国民革命中，兵士应该为国家利益战，不要为军阀官僚战，应该为国家利益作捍卫，准备为国家幸福而牺牲。〔其〕次关于联省自治问题，大会决议痛斥联省自治论者之误国，其理论既幼稚，其所根据事实更错误。大会以为在此封建残局之下，决不能由制宪而获得自治。真正的自治必待国民革命成功，中国民族获得独立与自由之后，始能实现。

关于人民之自由，大会要求废除一切警治与军治。人民应有绝对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警察不得任意逮捕，羁押或搜索人民住宅，非军人绝不受军治。工人应有罢工的自由。惩治盗匪法，陆军审判条例等，均当废除。复次，对于实业、商业、教育诸问题，均各有确切之决议。最后关于工人、农人、妇女三问题，更一面分析在被压迫各阶级中此三大群众的痛苦，一面提出具体的要求。大会尤注意广大的工农群众与妇女界，应速起急谋团结，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成功。

在各项国内问题中，且提出各自的切实主张或要求；大会为注重国家财政问题起见，

又单独讨论财政问题。

六、"十年的外债停付！"

大会特别讨论财政问题，为求详细探索财政紊乱之情形，与国家财政破产之根源。据财政委员会讨论报告之结果，其结论就是："十年的外债停付，留待国民会议解决其用途！"

这种主张是关系严重的，帝国主义的列强一定畏惧，因为这种主张之结果，绝对有利于中国国民，而无利于列强。列强听到这种主张，一定要惊惶失措，指我们人民为"过激"。殊不知这种"过激"的办法，在列强各自的国家里，在他们祖先的历史上，早就实行。法兰西曾要求过外债停付，比利时也要求过外债停付。"停付"（或缓付）这个名词，这个办法，是他们自己当初想出的。论到"过激"的办法，并不这样。"过激"——假使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自从革命以后，并不是停付，而是不付了。

中国的财政问题并不困难，难在帝国主义之继续侵略。一国的财政破产并不是稀奇的事，所奇在无救济办法。中国的财政家梦昧终日，只学算账，不知清账；即有清账的办法；又都是有利于列强的，如主张再借外债以救财政的，便是一例。

大会同时感觉借债之危险，故发出公开宣言两种，一给外国银行团，一给国内各银行，警告不得再借债与政府。

七、宪法是人民收回政权的证书

大会于各种问题之外，又特别注意宪法问题：

"中国国家的权力，现在不在国民手中，而在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使者——军阀手中；一切不平等条约，即是保障此等权力的明文。所以吾中国全民众，应集中其精力以求于最近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目前中国国民所要求于此国民会议的职任，不在制定一部空文无力的宪法，而在为一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斗的人民机关。"

这是国际问题决议案中评宪法问题之一段。在国内问题决议案里，也有同样的说明：

"宪法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国国民保持主权的一部证书，这部证书，必须国民自己得了政权以后，才能产生出来，向统治的军阀要宪法，与奴隶要求主人严订管理法一样，结果反让统治阶级强奸民意，任意造作。政权的取得是由于革命的力量；必须国民革命成功，才有国民自己的宪法可言。……真正的国民会议之目的，就是要求政权收归人民以解决一切外患与内忧。"

八、"敌人软化不了工农阶级"！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有两种政治的遗嘱：一为国内的，一为国际的（即致苏俄之遗书）都笔记而出，为民众所普知。在这两种遗嘱传授之时，中山先生警告其同志说："你们不怕敌人的软化吗？"记者曾于本报通信中述过。现在这一句话，全国民众还没有公开的答复，唯有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中之工农代表团早就答复了："敌人软化不了工农阶级！"

工农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中人数虽少，且偏于南方，但在大会中仍产出良好的工作。大

会会刊中，我们看见农人代表某君的论文，充分表示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之使命。大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工作，关切于大多数被压迫工农阶级最深。此次各种的决议，一方面证实民众代表工作之良好结果，一方面也可断言将受全国民众之有力的拥护。

九、第二安福国会与人民的国民会议运动

当大会闭会之时，安福部的善后会议也闭会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是要召集预备会议；善后会议闭会之后，是要召集第二安福国会。后者也许是可能的，可能则必是较快的，因为“政权”在段祺瑞之手。

然而大会指示了人民以国民会议之性质，指示了人民以奋斗的方法，并指示了人民对于各种问题之确切方案。素来藐视民众无组织的，将由这次人民代表的实际工作中证明其为恶势力所迷。现在促成真正国民会议的民众代表大会闭幕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闭幕了！我们需要一个第二安福国会呢？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会议呢？全国革命的民众应当答复这个问题！

（原载《向导》113期，1925年5月3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自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侵略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经济及手工业经济之破坏遂随之日甚一日，因此全国农工大群众，在客观上都早有了民族运动的要求；最近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方式，不但垄断中国的商业、航业、矿业、金融、海关等，更进一步纷纷在中国设厂制造并垦种土地，直接压迫中国的工人农民，直接排挤中国的工业，在事实上逼得中国的工人农民及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自然有了民族自卫的觉悟，这就是现在中国民众一致奋起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之唯一真因。这个民族运动，明明是由于客观的事实逼得中国的工人农民及爱国的知识阶级等广大民众，为自己生存计不得不出此一途。为民族自由而战的中山先生，他的民族运动之主张与战略，完全是随着这些事实上的要求而发展的，决不是因为有了中山先生民族运动之主张与战略才有这些事实发生。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促起中国民族运动的这些事实存在一天，就是没有了中山先生，这个运动也是一天不会停止的。

在这方兴的民族运动中，失了一个有力的领袖，自然是很大的损失，然而这也不成大的问题。因为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国民党仍旧存在；这个党，尤其是其中革命分子，必然遵守大会宣言，必然遵守中山先生的遗嘱，依照中山先生的主张与战略——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帝国主义——领导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和中山先生生时无异。

中国民族是被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所以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及被压迫的民族自由运动互相联结的；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初步与关键，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点在中山先生的遗嘱中都郑重指出。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始终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

我们并且要求全国民众，因为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之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

全中国的民众啊！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07期，1925年3月21日出版）

〔附〕孙中山遗嘱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　文

〔附〕孙中山致苏俄遗书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原载《向导》第108期1925年3月28日出版）

军 队 中 政 治 工 作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

周 恩 来

一、军队之组织

今天讲这个军队中之政治工作的问题，第一部分，讲军队之组织。关于军队呢，我们要知道军队的本身完全在兵士，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成为一个军队。这兵士群众是不是个阶级呢？这是须要弄明白的。我们常常说："工农商学兵，"看看兵士究竟能不能成为一个阶级？我们先来解答这个问题。

梁启超说过一句话："中国有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有枪阶级是压迫者，无枪阶级是被压迫者。"这话说得对不对？如果兵士群众不能成为一个阶级，那末兵士在阶级中有种什么作用？

我们要明白军队能否成为一个阶级，须先了解阶级的意义。我们要知道阶级的意义，不是一群人生活相同就可以说他是个阶级。比如学生群众，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找出很多相同之点，就说他是一个阶级。因此，我们说军阀掌握中的军队，资本家帝国主义的军队，劳农政府之下的军队，他们的生活都有相同之点，这样也可以说军队是个阶级么？不是这样的！阶级的意义，不是这样简单！

要明白阶级的意义，须看清楚生产的问题。阶级的来源是生产的分化。在原始人数（类）的时候，生活的方式很简单，只用手与棍棒就可以得到野兽来饮他的血，吃他的肉，这时每人都有生产力，彼此都能满足他生活的需要。可是因为人类生活的环境不同，如温带寒带山地平原地方的不同，于是分出人类的强弱。强有力的便征服弱者。一部分人（强有力的）寄托在普通的生产上，就是占有另一部分人的生产，造成一个压迫阶级出来。生产者成为被压迫阶级。原始社会社（里），强有力的仗他的威力抢有软弱者生产的一部分，弱者受他的支配，于是就成为酋长，这是很显明的阶级造成的原因。

从渔猎社会进到封建社会的时候，成为天子诸侯王的统治阶级。他有一切的统治权和支配生产权。土地全是他的。一般农人要在天子诸侯士大夫手里去请求田土来耕种，生产全是由他们统治阶级来支配，结果便把人类分出一部分是统治阶级，另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从封建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尽量的掠夺剩余，压迫农工，乡村里的农人受大地主的压迫；城市里的工人受资本家工厂主的压迫。这样便造成一个资产阶级压迫无资产阶级的社会。

封建社会破坏后，军阀掌握政权，中国或其他的殖民地的工农的生产品，受军阀或帝国主义者的支配和享用。凡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势力之下的民众，无论工农商学，都成

了一个被压迫者。

在这个阶级的意义中，我们可以找出两个定义：第一，社会上的阶级不是生产的阶级，便是掠夺生产的阶级。不是压迫的统治阶级，便是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从上古酋长时代一直到现在，天子诸侯士大夫军阀资本家地主都是掠夺生产的阶级，是压迫人民的阶级。第二，凡是压迫别人的阶级，至少于他的本身都是很有利的。比方酋长压迫奴隶，而酋长的生活一定比较要好。天子诸侯士大夫的封建社会，压迫乡村的农人及城市的商人工人，而天子诸侯士大夫的生活一定比乡村的农人和城市的工人商人好得多！至于现在的军阀官僚资本家大地主他们的生活，那更不待说了！根据这两个定义，看看兵士成不成为一个阶级呢？

第一个定义应用到军队来，诚然军队是可以拿来压迫人的，可以拿来压迫群众的；可是军队的本身，不是生产的群众，而又不是掠夺别人生产成为自己所有。如酋长掠夺农奴，天子诸侯王掠夺臣民，地主资本家掠夺农工一样。这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发生问题了，并且在被压迫者的本身组织起来的武力，也并不是压迫人的，而成为解放人的武力了。如中国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苏俄劳农政府的红军。这第一个定义是说不通的了。再看第二个定义怎样？就是说："兵士的生活，是否是压迫别人的生活于自己有利"？你们都是从军队中做过工作出来的，自然不待说也很知道。兵士的生活，比农工的生活更坏！自然国家有时也给他们的优待，改良士兵生活，但与其他的比较起来，这是赶不上被压迫的农工群众的生活。这样说来，说军队是个阶级，对第二个定义推论起来也是不成立的了。然则说军队究竟是什么？我可以这样说："他是工具不是一个阶级"。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如酋长以其工具去压迫奴隶；天子诸侯王拿这工具去压迫乡村的农奴，和城市的市民；又如现在的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利用这工具去压迫农工或其他的群众。但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酋长制度的社会，奴隶起来赶跑了压迫他的酋长；封建社会破裂，资产阶级起来赶跑了压迫他的天子诸侯王；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最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会起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和支配之下的工农商学，也会起来利用武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军队不是一个阶级，乃是工具。

中国有句话："知识阶级"，这也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也是工具，他不生产，同时也不是掠夺别人生产而成为自己的生产的。完全不是个阶级，只可说他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而没有知识阶级。压迫者利用知识分子来想法压迫人，被压迫者也可利用知识分子起来反抗压迫者。

资本主义自然有他的经济理论，但被压迫者也有他的经济理论。所以西方有马克思的理论，东方就有我们的总理，因为不但压迫阶级要有经济理论来延长他的寿命，而被压迫阶级也需要有种理论去反抗他的压迫者。

从上面看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军队是一种工具，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阶级"。

第一步既懂得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谁也可用的。那末第二节我们须知道这工具怎么拿来使用？普通的工具都是压迫者拿来用的。如像古时的酋长，他利用奴隶去打他们的兄弟，来造成他更大的势力；封建社会的天子诸侯王，要同别个争土地，也用乡村的

农奴或城市的民众，利用他们来打他的兄弟，扩张他的权势；至于资本主义社会那更不用说了！资本家他拿这军队去压迫工农，帝国主义者拿起军队去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逞他的声威，或压迫本国的革命运动。如英国工人罢工，政府拿起军队去威吓镇压；印度图谋独立，他也拿起军队去镇压屠杀，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压迫阶级利用这被压迫者造成的武力来打他的兄弟，造成他更大的势力。但这不是永恒不变的。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这例子便冲破了！压迫阶级压迫过甚，即是说资本家大地主压迫工农过甚，被压迫的工农也会起来利用这武力了。反过来说就工农受了过甚的压迫，必然会觉悟起来利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工农利用武力推翻了俄皇贵族，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他会从他的本身造出的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世界也进化到了压迫阶级利用武力打他的兄弟的例子冲破的时候了。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会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这世界革命成功，便进于世界大同。这样说来，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刚才说过，这工具（军队）压迫阶级可利用，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拿来造成他本身的武力，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从这两部分分析看来，军队的组织得到两个新的意义。……

……□军队分子之集成。军队的分子是怎样集成的呢？刚才知道军队里的兵士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分子。酋长要同他的仇敌作战，便指挥他的奴隶去拚命；封建社会的天子诸侯王不能亲身去杀敌，也必利用兵士去替他打仗，去为他牺牲的；资本家大地主不能亲自到战场去冲锋，也必利用兵士替他去挡炮子，替他去抛掷头颅。这是欧洲战争告诉我们的。军阀打仗，那个亲自去上火线？通通的是兵士！由此，可知道军队通通是由被压迫的兵士集成出来的。中国有句话："好人不当兵。"什么是好人？凡是一个社会都没有永远不变的道德，道德宗教文化习惯通通都是依着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变迁的。酋长时代一切风俗习惯道德都合意于酋长，而不合意于被压迫的奴隶。至于封建社会的一切风俗习惯文化道德，当然是合意于天子诸侯士大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破坏，军阀承继了这种残局，被军阀造成了骄奢淫逸的风俗，逢迎媚上的习惯，造成这种卑鄙堕落的社会。由此知道，凡是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都是把来束缚和压制被压迫者。他们所谓"好人不当兵，"封建社会的好人，是天子诸侯士大夫，们他是瞧不起农人的。把农人看做不是人的。至于无产游民，那更不是人了。所以天子诸侯士大夫的儿子是不拿去当兵的，只有读书做官。至于农人，因别的原因受了生活逼迫的原故，只有去当兵，不然便没饭吃了。因此一般人都争跑到士大夫阶级去，不愿在受人蔑视的农人里，或军队的队伍里去当一个兵士。这种人给他一个名词，就叫做，"阶级的叛徒。"他本身再受痛苦，饿死可也，却不愿当兵。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大地主，都把农工看做顽民暴徒，或叛贼。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军队，还是要这些顽民暴徒叛贼去当兵的。从这点看来，军队中的兵士，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农工，所谓不好的人去干的。但我们要认清什么是好人！

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简单说起来有"拘捕""招募""征兵"三种。什么时候需要拘捕？什么时候需要招募？什么时候需要征兵？则也要根据时代环境产生的。在古时游牧时代当兵的都是奴隶，这很明显的证明是拘捕的。为什么呢？我曾经讲过？那时生产自由，人人都有生活的能力，而且地土广大，人口稀少，这时要拉别个来替他打仗，是不容

易的。于是强有力的打败了别的人，就捉他来指挥他去打仗，所以那时非拘捕不成功。到了封建时代就不同，天子诸侯士大夫都有生产分配一切的支配权。换句话说，那时所谓臣民通是他们的奴隶；那时生产方法简单，一遇天灾水旱的时候就有饥荒的事情发生，于是有失业工人农人手工业者，即成为流匪，甚至于酿成社会上极大的变动。中国所谓“天道百年必变”，这就是说遇了大的饥荒，常常有些游民他设（没）法生活而又不愿饿死的，只有去当兵，或者起来造反。有了这个变动，而天子诸侯王便招募兵去平乱，古来亡国之君不一定比开国者好，不是天子诸侯才能的问题，是社会上经济起了变动的结果。东汉末因有大的饥荒，结果造出兵匪……

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在四川陕西造出很大的变动，由此可知道农业社会里遇了天灾的时候，常常会引起变动的。还有好当功的君主，如——不但中国是这样，就是西方也是这样，俄国农民失业，大彼得扩充兵力到西伯利亚。这知道在农业社会里农人生活无保障，常常会迫着他去当兵的。中国现在还是农业社会破产，封建社会崩溃的时候，所以好招兵。他不当兵，便不会生活。

为什么工业社会不适宜招募的方式，而适用征兵的方式呢？因大工厂发展，农民和乡村中的手工业者，都跑到城市去当工钱奴隶，集中在城市的工厂里去了。兵士生活是很苦的，而且作工所得的报酬较多，如没有特别的原因，他一定不愿意牺牲他几毛钱一天的工资去找那不到两毛子一天而且常常都有挡炮子的危险的事干的。所以这样就须用征兵制了。资产阶级造出个口号，欺骗农工说：“人人平等，有当兵义务，”但资本家的儿子可以出钱去免除兵役的，倒霉的还是农工呵！这就是军队集成的三种方式，这方式是根据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在某时代他用某种的方法来集成他的军队，造成他的工具。

今天所解释的概括拢来是：

1、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的。

2、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3、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

4、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第　一　讲 六月二日

（此文章来源于国民革命軍总司令部政治部1926年印的《政治工作须知》中）

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及其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斗争

萨坡什尼柯夫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就采取了建立革命军队的措施。要是没有革命军队，国民党是无法实现其纲领的。

在1924年以前，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还没有自己的军队，在军事方面它实际上还要依赖南方各省军阀。但这些军阀完全从本身利害出发，忽而拥护、忽而反对孙中山。孙中山也渐渐明白：在谋求全国解放的事业中，决不能依靠这个或是那个军阀的支持，必须建立新型的军队——革命军队，但问题是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孙中山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便求教于苏维埃俄罗斯的建设红军的经验；因为红军，在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不论从物质上或是从技术上来说都明显地占着优势的情况下，还是消灭了国外的武装干涉者和国内的反革命军队。

1923年春，由孙中山发起而派出了一个军事政治代表团去苏俄访问。

红军的经验，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同情和支援，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孙中山常说，俄国人的革命方法应当成为我们的榜样。

建军的主要问题在于培养军事干部。军阀及其军中将领是敌视革命运动的，或者，在较好的情况下也是疏远革命的，这样就必须培养出一批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的新型干部来。

因此在1924年5月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取名为黄埔军校①——因该校校址是在黄埔，故称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最积极地参加了建校工作，表现其为革命军队的骨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周恩来担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此外还有共产党的其他许多著名活动家，如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等人，也在该校工作。学员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们是军校内革命力量的中坚。

然而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却是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在他背后站着买办和地主。那时他还不敢公开反对革命势力，而是玩弄其两面派手法：一面隐藏其反革命的真面目，一面把劳动人民的各色各样的敌人一个个拉到身边，结成党羽。任命蒋介石为校长的结果，使革命斗争在后来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

①在中国的文献中，該校亦名为“黄埔軍官学校”。

在军校的学员中，大多数是革命青年，但也有不少是日后背叛革命的同路人。

黄埔军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既熟练于指挥作战又长于政治工作的军官。它的教育计划和组织机构都是为了适于实现这个任务而确定的。

在军校中讲授下列军事科目：战术、地形学、炮兵、工兵和通信。通过这些课程，保证把党员训练成营、连、排长。从第二期起还开办下级军官训练班，按照精简的教育计划在班中授课。

除军事科目外，教育计划中还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许多政治科目："中国的国民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国际形势"、"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苏联状况"、"世界革命运动史"等；对于在军队人员中组织政治工作的问题，也给以十分的重视。

军校组织机构的基本特点，就是设有领导政治工作的政治部。国民党任命了一名党代表以监督校内的各项工作。从第三期起还设置了政治训练班。

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就其培养任务、教育计划和组织机构各方面看来，都是和中国的其他军事学校有根本性质的不同。

截至1926年10月，黄埔军校已经训练出4届毕业生，总数为4258名，其中大多数已成为很干练的军官①。

该校还附设短期训练班以训练中级军官，给国民党革命政府输送了许多新型的指挥人员。校中的革命学员都参加组织工农武装部队的工作。

1924年8月，在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校中实行战斗编组并开始组成两个学生军教导团②。

1924——1925年间，正当黄埔军校活跃的时候，局势是非常紧张的。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推翻广州的国民革命政府。它们利用自己的中国走狗出面来干这种勾当。受英美帝国主义者嗾使和支持的商团军，便是孙中山政府的第一个凶恶敌人。

1924年10月10日，正当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13周年之际，广东买办阶级的商团军便企图在广州举行反革命叛乱。他们枪杀游行示威中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当场死难的有20余人，受伤的近100人。叛乱者到处张贴在英国公使馆事先印好的传单，迫令孙中山下野，并明目张胆地欢迎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陈炯明前来主持南方政府。

但这次反革命叛乱被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团以及工农武装部队镇压下去了。在粉碎商团叛乱的斗争中，共产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反革命商团所作的斗争，促使革命军新生部队壮大起来，并使广州政府有可能将斗争方向转来驱除广东境内的外国（主要是英国）资本的走狗——军阀势力。通过这场斗争也昭然若揭地证实所谓"联军"的不可靠（"联军"就是驻在广州政府境内的粤、滇、桂三省军阀的杂牌军，官兵总数在45000人至5万人之间）；他们不过是表面支持广州政府而已。正当和商团军激战的10月间，"联军"总司令许崇智却在他的广东同乡李福林那里作客，拒绝政府要他回广州领导军队以镇压商团叛乱的请求。指挥"联军"的大部分军

---

① 参看M·尤利也夫：«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革命軍队的作用»（М.ЮРьев，иоль реролюцнонной армии на первом этап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第14—16頁。

② 参看«中国問題資料»，（Материал во втай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1928年第1卷；此外也可参看«孙中山的軍事观点»，（Военный вэгляд Сунь Ятсена），1928年上海版。

官、将领，按其社会成分说来，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他们终归要反对工农的革命运动，实质上与北洋军阀乃是一丘之貉。

只有黄埔军校学生军、广州的工人战斗队以及军阀统治区的农民武装部队，才是广州政府的可靠支柱。

当时广州政府最凶险的敌人之一乃是军阀陈炯明，他是按照英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的。

为了积累政治资本，陈炯明曾长期伪装孙中山的拥护者，他还采取其他类似的手法来加强他自己在广东的势力。

1920年，把反革命的桂军逐出广州后，在孙中山重新组成的政府中，陈炯明便担任了陆军部长。

但过后不久他就起来反对孙中山。他在英帝国主义的牵线下，便与国民革命运动的死敌——北洋军阀吴佩孚实行勾结，约定要推翻孙中山政府，以便在广州建立军事独裁统治。1922年6月，陈炯明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孙中山不得已而退出广州。

以后，在陈炯明统治广州的半年中，便暴露出他十足是英帝国主义的奴仆。1923年1月，陈炯明被广西和云南的某些将领的军队逐出广州。1923年2月孙中山又回到在那里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广州。

但陈炯明在广东的实力仍非常强大。例如1924年上半年，陈炯明及其盟友的军队数目约有55000至7万人之谱，控制了广东省的大部分地面；而孙中山政府势力所及仅是广州地区和粤汉铁路上从广州到株州这一段地方而已。

在陈炯明统治的地方，白色恐怖十分猖獗；他的军队残酷地镇压农民运动，横征暴敛而使人民破产。

在英帝国主义的援助下，陈炯明从1924年12月到1925年1月间准备进攻广州。由于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从中出力，陈炯明获得北京政府的声援：后者支持他反对孙中山政府，并允诺派遣陆战队到汕头港登陆援助。此外陈炯明还与邓本殷、林虎、洪兆麟、沈鸿英等军阀订立了军事同盟。在这种形势下，广州政府最紧急的任务便是消灭陈炯明及其同盟者。

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广州政府还没有足够的精锐部队。上面已经提到，滇军、桂军以及其他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不过等待一个有利时机，以便一举而推翻孙中山政府。

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把一切革命力量都动员起来。黄埔军校已开始组织和训练战斗部。1925年2月，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工人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到陈炯明叛乱地区的后方（汕头、潮州、海丰、陆丰一带）去，从事组织游击战争的工作，而广东东江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便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彭湃。

2月间，革命军打了头一仗，肃清了广九铁路上的敌人，这一仗的意义很大，因为当前的东征就需要这条铁路运兵。在东征前夕，广州政府的主要兵力，便是在黄埔军校的基础上组成的数千名官兵的部队。由于以后东征的过程中有许多工农志愿参军，这支部队得到补充而组成一个革命远征军①。东征的部队从广州出发，分为3路：右路、中路和左

① 这支部队还不是国民革命軍第一軍，这只是临时組成的。在后来建立国民革命軍时，它是第一軍的基础。

路。实力最强的是右路，它的任务是要进入海丰地区和游击队配合，并经过陆丰对汕头的敌人施以致命的打击。

2月底，3路革命军都已越过莲花山脉而到达进攻的出发地点，右路军已和海丰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敌人盘据了广东东江的广大地区。其主力（约1万人）集结在汕头——潮州——揭阳一带。陈炯明的司令部设在汕头，以便和英帝国主义者取得联系，在汕头港口接收自香港从海道运来的枪械弹药；第二支部队分成数小股，分驻在塘湖——河口——陆丰一线；第三支部队为数甚少，用来防守莲花山上的关隘，陈炯明打算用这部分兵力来与当时在西江口及其西南地方骚扰的邓本殷部队互相配合作战。

革命军的进攻一开始便很顺利。当右路军进入海丰的东北一带地区时，便有一大队敌军（500余人）持械反正到革命军方面来，因而直通汕头的要道便被打开。中路和左路两个纵队，由于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进攻也很顺利。

到1925年4月底，陈炯明占领区的面积已减少了四分之三。由于战败和逃亡的结果，陈军的数量也减到7000——8000人了。

革命军的胜利大大得力于广东劳动群众的支持。在陈炯明的后方游击运动广泛展开。游击运动的组织者是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战士和指挥员，还有从广州派来的工人和革命青年学生，其中共产党员起了主导作用。

他们向民众解释了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与此同时也揭露了陈炯明的反革命阴谋。

在他们的领导下，广东东江的劳动人民（大部分是农民）组成了自卫军，学习游击战术，并从革命军方面取得武器。

1925年3月3日在海丰县举行农民大会，参加大会人数在3万以上①。在会上通过的决议是：恢复海丰农民协会，动员所有成年人起来参加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陈炯明的斗争。

陈炯明的后方处处爆发了起义。

此外，在讨伐陈炯明的过程中，工农志愿参加革命军的数量大有增长。革命军进到紫金——海丰一线时，兵员便增加了一倍。

在讨伐陈炯明的同时，工农群众广泛地展开争取改善自己的地位的运动。

现举1925年3月14日北京“晨报”的报导为例：“宣传工作在进军（指革命军的进军。——作者）沿途广泛展开，农民大会一开起来就有5000——6000人，会上军校（指黄埔军校。——作者）毕业生发表革命演说，使得整个作战地区马上受到宣传的影响，农民们纷纷起来要求瓜分劣绅②的土地。”③

1925年5月上半月，英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了紧急措施，想纠合闽赣两省军阀来进攻广州政府，它不但答应给军阀们以全力援助，而且允诺他们在击败革命军后可以“自治”。尽管这些军阀都十分敌视广州政府，但还不肯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来作孤注一掷，因而不敢起来帮助陈炯明。北京政府也没有履行其派遣军队登陆汕头的诺言。于是英帝国主义的奸计便落了空。

---

① 《彭湃日記》(Записки Пэн Бая)，1936年莫斯科版第86頁。

② 劣紳——大部分是以封建主义方式压榨农民的地主。

③ 1925年5月6日《眞理报》。

歼灭陈炯明军队的革命军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军，他们从广州出发，英勇地迂回东进，并立即与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的工农武装部队配合，将陈炯明的在滨海的东部地区的驻军包围起来，一鼓歼灭。在这次战役中革命军俘敌官兵7500人，并缴获了许多武器。

5月16日在汕头市爆发了劳动人民的起义。5月17日拂晓，自东南方和西南方攻入城内的工农游击队与城内起义的人民群众会合，敌驻军受到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便狼狈逃窜。陈炯明及其司令部人员好容易才得从该城西北面逃出，遁入福建省境。汕头城外前线的陈军残部，有的被俘，有的退到江西去了。

1925年5月28日，广州政府宣布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由上可知，击败陈炯明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因为有高度作战能力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革命军，另方面是因为有作战地区的劳动人民对革命军的种种支援。

1925年3月12日，正当进行第一次东征的时候，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广州政府的领袖孙中山逝世了。

仇视孙中山的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意料孙中山的逝世一定会引起革命营垒内部的张惶失措，便乘机加紧向广州政府进攻，当时他们利用驻在广东的滇桂军阀作这次进攻的工具。

滇桂军阀乘革命军远离广州的时机，于1925年5月间举行叛变，占据广州东北部和北部地区。在广州临时组成的忠于国民政府的两团步兵，与将近2万名的敌军作战，众寡不敌，不得不随政府机关向西南方撤退（这里前后几段参看图1）。

这时可以用来抗击叛军的部队，距离广州还很远；革命军第一军（见第151页注①）虽然在5月底就开始从汕头调回广州，但赶到作战地区还需要几天工夫。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又表现出其组织者的作用，他们领导了对政府机关迁往的地区——河南（广州的西南部分）——的保卫工作。当时在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开幕，大会向全体劳动人民发出支援国民政府的号召。结果广州的电厂和铁路工人都拒绝为叛军服务了。

江防舰队的船只全部动员起来，担任巡逻珠江的任务，并在广州的东南与敌军有过接触。舰队准备在广州的东面、北面及西北面的敌后方登陆，以打击扼守该数处的敌军。在革命军回师到作战地区以前，舰队的任务如下："在东征部队到达之前截断广州敌军和外地的联系；掩护政府所在地（广州的河南），掩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学校所在地（黄埔）；保证革命军各个部队之间以及政府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系不使中断；以舰上炮火支援地面部队；派遣陆战队进入叛军后方登陆。"①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便将全部舰艇编成3组。第一组舰艇30艘，在珠江上活动；第二组9艘，在西江上活动；第三组7艘，在黄埔附近集中以作后备。

革命军第一军的主力于6月10日从增城和石龙赶到，马上与叛军交锋。内河舰队的主力也于6月11日拂晓在车陂——石牌地区往敌军右翼的后方登陆，登陆战士共800人。在舰上炮火支援下，登陆部队和第一军联合进行攻击，加上城内工农民兵的英勇行动，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叛军受到重创后即行溃退，其中大部分被迫投降。

革命军与滇桂军阀在广州的斗争，是在革命的浪潮已开始席卷全国的形势下进行的。

---

① 《海軍杂志》(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列宁格勒，1926年第10期第90頁。

而1925年的“五卅”惨案，乃是掀起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高潮。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组织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军警在青岛残杀中国工人和日本监工在上海枪杀了一位共产党员工人的罪行。当游行队伍走过南京路（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时，公共租界的英美巡捕竟向他们开机关枪扫射。

为了抗议这一暴行，上海全市宣布总罢工，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之久。在全国其他城市，都掀起了游行示威、举行群众大会和同情罢工的浪潮。

广州的劳动人民，在消灭滇桂叛军后，马上起来支援上海工人，6月19日便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情罢工。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广州重演了和上海一样的惨杀案：抗议上海屠杀案的示威群众竟遭帝国主义军警开枪扫射。惨案发生后，香港和广州英租界（即沙面）的工人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总罢工，参加者达25万人。这次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结果大大地巩固了广州的革命阵地。

罢工证实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及其革命觉悟的提高。在一年零四个月的罢工期间，由工人维持局面的广州，秩序井然①。从香港、澳门、沙面前来广州参加罢工的工人，按各行业分别到市内8个地区进行登记，登记后，工人及其家眷全都领到了住宅和食粮。从每50个罢工工人中选出一名代表，以组成800名代表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这是最高的议事机关。从大会中选出13人组成罢工委员会以直接领导整个罢工运动。

罢工委员会之下设有8个部门，其中财政委员会和纠察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本来罢工工人及其所属的工会组织都没有储金，这是财政委员会的难题。因而必须设法捐募罢工委员会的基金，以支援罢工工人。进行捐募的结果，总共收到500多万元的捐款。这笔巨额捐款便是全国人民同情罢工工人的明证。

罢工委员会之下成立了一个2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

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很严密：每12人为一班，3班为一小队，3小队为一支队，3支队为一大队，3大队为总队。

纠察队队员都受到军事训练。

纠察队维持城内秩序，不许从城内运出食物，并严格监督执行抵制英货的措施。

显然，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掌握武装的数以万计的罢工工人这样一个革命因素，广州政府的地位哪有不能巩固的道理。

革命军在反对叛乱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广州政府的威望大大提高。而这些胜利的到来，只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巩固了一支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的革命军，才成为可能。

反帝反封建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广东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已达到空前的高潮，在这样的形势下，广州政府在讨平滇桂军阀的叛乱之后，便于1925年7月1日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新政府的领导力量属于以廖仲凯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廖当时担任财政部长和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与政府改组同时，其所属全部军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而国民革命军正式宣告成立的日子也是1925年7月1日。

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团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担任了该军的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的成员除志愿参加者外，还包括一部分受过改编和政治上改造过的滇桂军阀军

①这个时候，在广州已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队的残部。

另外几位优秀的共产党活动家（李富春、林祖涵等）也被任命去担负国民革命军的重要职务。

正当与滇桂叛军作战的时期，英法帝国主义者又来扶持陈炯明，帮助他招兵买马并供给军火武器，蓄意纠合广东的一切反革命势力来反对国民政府。

但滇桂叛军在广州突被迅速消灭，这就打破了在华南作祟的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如意算盘。1925年10月1日，革命军奉命举行第二次东征以彻底消灭反革命军队。

10月14日，担任先锋的第一军和学生军的一个教导团（后来在11月间以该团为骨干而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旗开得胜，打败了通往汕头要道上的前哨敌军，到11月4日，便将海丰、陆丰两县内的敌兵全部肃清。到11月中旬，陈炯明的12000名官兵悉数被歼就俘。

在1925年10——11月间的第二次东征过程中，国民革命军表现出其勇猛进攻和迂回机动的技巧，同时还表现出其善于组织正规部队和工农游击队的联合行动。

在革命军取得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广东全省遂为革命的国民政府所统一。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准备

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劳动人民群众运动过去主要只在广东得到发展，而现在已经席卷全国。广东在国民政府的力量控制下发展为革命根据地，从而为进攻北洋军阀创造了有利条件。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和山东督办张宗昌等霸占了大半个中国。这些革命的死敌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都加以残酷的镇压。

但在这些革命敌人的内部并没有统一局面，军阀们还是连年混战。军阀之间的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竭力扶持一些军阀充当自己的走狗，以扩充其在华霸权。

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张作霖的军队就是在日军参谋总部的帮助下成立的。同样，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也都是美英帝国主义者武装和训练起来的。

由于得到帝国主义的援助，在北伐之前，北洋军阀的军队已成为严重的反革命势力。他们的军队数量多，装备好。1925年底，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武力合计起来约有60万官兵、1000多门大炮和1500余挺机关枪①。

反对军阀，必然也要反对站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主子。帝国主义者因而绞尽脑汁，竭尽全力，要来扼杀中国革命。他们不仅以金钱、军械、军事教官和军事顾问来资助军阀，而且有时还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

由此可见，北伐战争必然演变为全国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武装

① 参看B·威索戈列茨：《中国的軍队》，（B.Выcoгорец,Китайская армия），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0年版；B·B·安德里安諾夫：《中国軍队的組織》，（B.B.Андрианов,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армии），1941年版；以及苏联和国外的当时的期刊。

斗争。

在胜利地结束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后，北伐的准备工作便开始加速进行。

军队改编的工作完成后，广州政府的武装力量便结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武装部队的领导机关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而军事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构包括作战部、侦察部和行政管理部，步兵、炮兵、工兵和通讯兵的检查处以及卫生检查处。

根据政府的决议，成立了中央军需部，以杜绝旧式军队中惯有的贪污浪费行为。早在1924年，孙中山曾提出要成立一个专管军中补给和财政的中央机构，但这个尝试因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将领的反对而失败，因为他们不愿放弃独自掌握军中财政和军需的职权，而是要利用这种职权，好使个人发财致富，从而达到把持这些军队以供其个人驱使的目的。

军需部每次从财政部领到款项后，便分发到军中各部门，核算炮兵及其他军备的经费，并对兵工厂进行管理。

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海军局（1925年6月），其职责为管理、调查登记现存的所有舰艇，同时安排其修理工作。

可见军队的管理是高度集中的。但在国民革命军中，有一些图谋不轨的将领和军官却横加破坏；而蒋介石正想依靠这批人来实现其反革命计划，所以纵容他们为非作歹。这批人拚命要保持过去带兵的老方法，而不愿受国民政府的监督。

军的组织的设立，在中国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个时期，能建立起军这样巨大的军队组织单位乃是进步的现象。这一点以及国民政府的其他措施，都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领导而反对指挥官们的分立主义行为。

在北伐开始之前已编成6个军。每军有3师，每师有3团，每团有3营，每营有3连①。

虽然已编成的各个军、独立师和独立团，依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形式上都已接受总司令部的领导，并通过它而接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可是某些指挥官，尤其是蒋介石、何应钦、李福林，却置身度外，这不能不削弱了军队的纪律。

补充兵员的原则乃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因为它能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的高低。在这次革命战争中，国民革命军本来有可能实行志愿兵制度，从而可以促使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但蒋介石和陈独秀之流叛徒们却一齐反对这种军队民主化制度，一心一意力求在国民革命军中保持军阀军队所惯用的雇佣式的补充兵员制度。

尽管成千上万的工农和青年学生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军，但由于不实行志愿兵制度的结果，使他们大部分不能加入反帝反军阀的武装斗争的行列。蒋介石不仅这样做了，他进一步还指派反动军官到部队里担任指挥官。他的目的不外是要把革命军队变为反革命军队，好利用它作绞杀人民革命的工具。

在组织北伐军的准备工作中还有其他缺点，现举一事为例：当成立一个军或一个师

① 参看B·威索戈列茨：《中国的軍队》，第34——35頁。在北伐的过程中，在各个团内，营的数量可多于上述編制，而在营内的連的数量可能增到12个。但在北伐开始，进攻湖南时，战争要在山地进行，一个营或团往往要离开其所属的师而单独作战，于是便需增加大炮、机关枪以加强火力。当一个营在某处单独作战时，就可以从团的机枪連中領取机关枪以加强火力。

时，该军或师的首长都是任命其同乡或同事来作该单位及其下级单位的干部。比方说，第二军的全部军官都是湖南人——大家都是湖南同乡；第三军尽是云南人——大家都是云南同乡。共产党人反对这种做法，提出必须以北伐纲领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争取全国和全国人民的统一团结”为基础团结全军。

缺少统一的战斗训练计划和制度，这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较严重的缺点。在这方面，各军首长各行其是。比方说，第四军（这个军受共产党人影响较大）结合当前的作战条件来练习如何在山区作战①，而第五军却在练兵场上大操其“鹅步”等等。

其结果是，第四军成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其余各军与它相形之下大有逊色。

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干部是以集中的方式（主要通过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从前各军军长在他们自设的军校内所培养的军官，不是根据其才干，更不是根据其对革命事业忠诚的程度来选拔，而是根据其对军长“阿谀奉承”与否来选拔的。这种做法使军队的改编工作受到了阻碍。

蒋介石自窃据第一军的领导权后，就因利乘便派遣大批爪牙到黄埔军校去学习。同时他又在惠州设立分校，内有军官班和后备班，学员共约5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反动分子，甚至有不少人还是吴佩孚、孙传芳的奸细，他们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来“投奔革命”。

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部门虽然是稳步建立的，但仍存在很严重的缺点。例如，参谋人员并不是专门培养出来的，参谋的职务在军中一般是不吃香的，军官们大都不愿做参谋工作，因为干这一行的人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

为了提高军人尤其是军官和将领们对政府和人民的责任感，根据政府的决议于1926年1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法庭。决议指明：“为了在国民革命军中严明革命的法纪和秩序，杜绝经济工作中的犯法行为，清除奸细和叛徒，为了防范反抗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指挥部的领导，特设立军事法庭，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领导之。”②军事法庭由主席、常设副主席、三名审判员和两名助理审判员组成，其成员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提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后任命。法庭设有审讯部、行政管理部和军务处。

尽管在建军工作中存在过许多缺点，但国民政府所属的部队的管理却是统一而集中的，这是中国建军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革新。

但国民革命军最主要的特征，还在于建立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主要内容是对革命士兵和军官们进行忠于革命事业的教育。正如陈伯达指出的那样：“这是中国旧军队制度的一大破坏，一大革命，正是军队制度有这一方面的革命，就使得东征和北伐的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把北洋军阀的军队打得象摧枯拉朽。”③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人。

为了便于领导政治工作，特成立总政治部，直属军事委员会领导。它负责在军中筹

---

① 第四軍曾制訂一个“野外教练”課目，包括散兵队形、前哨勤务、偵察、进攻据点、强行渡河、冲过山隘等等的练习。

② 《中国問題資料》第1卷：“軍队改編草案”及“广州的武装力量”。

③ 陈伯达：“人民公敌蔣介石”，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9頁。

建国民党支部，制定各级部队中党代表的工作守则，在军和师中建立政治部，并在士兵中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共产党人大力支持军中各级政治部门的工作，从而成为士兵群众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在某些共产党员——各地地方党部中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倡议下，1925年11月成立了以一个月为期的军中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军中政治工作和成立中央军事工作部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于组织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宣传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决议同时规定，要成立军事政治训练班来培养军事人才，以供军队和各省党部的需要。

为了不断扩大革命影响，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其对象不限于国民革命军，还要对冯玉祥的国民军①和各个军阀的军队以及在军阀割据下的各地人民当中进行工作。

1925年12月，为参加军事工作的共产党人开办了训练班。制定了军事政治工作人员的工作守则，其中规定要向国民军和军阀军队的士兵解释反帝战争的目的；组织和领导农民武装力量，以反对地主、土豪②和劣绅；在工业区则组织工人战斗队或工农联合部队。

对国民军进行政治工作的就是在该部服务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国民军第二军中出现一种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是由黄埔军校毕业的下级军官发起的。在国民军第三军中有好几名指挥官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人员还深入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军队中去进行工作。

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人员在湖北也向吴佩孚的士兵、向兵工厂和铁路工人进行反帝宣传，因而以后在北伐战争中，铁路工人起来破坏了吴佩孚的军运计划。

政治宣传工作进行得特别好的省份是湖南，因为领导湖南革命运动的便是中国人民日后的领袖毛泽东。在北伐军解放湖南后，农民反对地主、土豪、劣绅的武装斗争获得空前的发展。1926年12月间，有组织的农民运动便发生了200余次，参加者达327000人。全省常备队共有127个，每队人数从10人到500人不等。对常备军进行政治工作的是武汉工业区的共产党员工人③。

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敌军中也进行了巨大的政治工作。在吴淞（上海的东北部）驻扎的中国舰队里便有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的一个工作组，他们对水兵进行政治工作，并出版了“海员”杂志。

共产党人对国民军和军阀部队以及军阀占领区的民众所进行的政治工作，使国民革命军在北伐进军期间完成战斗任务时所遇到的困难大大减轻了。

1926年2月18日，根据国民政府的决议，关于训练国民革命军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工作，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统一负责。该校设有步科、政治、炮科、军需和土木工程等科。在上述决议中有一项规定极为重要，即规定要解散各军自设的军事学校，而“训

---

① 馮玉祥将軍有許多地方表現为一个爱国人士而不同于其他軍閥。1924年10月，他倒戈反对他从前所追随的吳佩孚，而将他的部队改为国民軍（гоминьцзюнь）。在苏联的文献中常称为“人民”軍（народная армия）。

② 土豪——以封建主义方式剝削农民的乡間老財东。

③ 在对吳佩孚作战期間，出版的传单达100种，印数达1000万份，小册子达200种，印数达600万多份。

练未满两个月的学员一律转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其余学员皆准予毕业，并派往军中担任排长”。

关于国民革命军的军械装备及其供应这一重要问题也应在这里叙述一下。可以说，在军械弹药方面的物资补给能力是极端有限的。当时在广州归国民政府管理的有两个兵工厂，一大一小，不过，它们全是1896年开办的老厂，装备是德式的，领导人员也是德国人。这两个兵工厂可以生产出5——6种不同口径的枪弹，此外还能造些步枪、机关枪、火药，也可以修理一些轻武器。

军中武器的口径各不相同，这使得弹药供应困难重重。子弹的生产不能满足军中各种口径的步枪和机关枪的需要。

根据中国报刊上的资料，广州政府那两个兵工厂每月仅能生产840枝左右的步枪和马枪，以全军现有兵员数和武器数对比，则缺少步枪、马枪4万多枝，重机枪200挺，轻机枪450挺。弹药则更是少得厉害：每月只能造出100万发，这个数目才抵上每月练兵中实弹射击所需的子弹数的五分之一。

海军局名下有60艘内河航行的舰艇。其中排水量达400吨以上的兵舰7艘，100——400吨的9艘，20——100吨的44艘，舰上有各种炮约125门，而以年久失修的炮舰占多数。从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底，被英帝国主义者以海盗般的行为扣留和劫往香港的舰艇就有30多艘，排水量共达2860吨，而后英国又从厦门、汕头、上海等港埠转卖给了北洋军阀。

国民革命军总共有7架旧式飞机（其中1架为水上飞机）。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兵种而成立了空军部，内分军用航空和民用航空两局①。

由上可知，国民革命军在物质上和技术装备上都是很差的。何况帝国主义国家又十分仇视广州政府，决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买到国民革命军所急需的军械。

国民革命军的建设是在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进行的。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使帝国主义者及其奴仆——国民党右派分子——日益感到忐忑不安。

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大资产阶级的物资援助下，组织了一系列的旨在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挑衅行动。1925年8月20日，刺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凯。从1925年8月20至1926年3月20日这整整7个月中，广州、香港的国民党右派的恐怖组织杀害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和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的左派国民党党员。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国民党右派匪帮手中的暗杀名单是由英国驻沙面的外交官员提供的，每刺杀一名就可以从其帝国主义主子那里领得一笔赏钱。

但蒋介石和他的后台老板不仅以恐怖行为来反对左派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员为限。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因害怕革命运动日益扩大而产生的动摇情绪，阴谋策划了一次反革命政变。决定把黄埔军校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因为它是培养革命军官干部的场所，又是受共产党影响最大的地方。蒋介石通过自己的爪牙，在黄埔军校成立了

---

① 《中国問題資料》第1卷：“軍队改編草案”。

一个反共反革命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来作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

反动派谋叛的开始是扣留开往黄埔的“中山号”巡洋舰，逮捕舰上的党代表，诬告他企图在黄埔军校组织暴动来推翻国民政府。接着蒋介石的喽罗们便将黄埔军校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缴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捕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并企图夺取海关、电话局、港口及城内其他重要据点。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激起了人民大众的义愤，省港劳动人民挺身而出保卫革命事业。当下蒋介石及其党羽估计在这时进行反革命政变还不利，才不敢彻底破坏统一战线，而“承认事件出于偶然”了。

但国民党右派分子这时还竭力把自己背叛革命利益的真正嘴脸隐藏起来，而继续以“革命者”、“统一战线的拥护者”的面目出现。

这个事件益发尖锐地向共产党人提出要巩固广州政府的武装力量的问题，提出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对反帝斗争忠贞不贰的精神来教育全军。

由于揭穿了“中山舰事件”的反革命政变的阴谋，革命工作和北伐的组织准备工作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国民革命军自从1926年春正式建立之后，有不少个军已成为战斗力很高的军事单位，这主要是由于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对战士们和军官们进行群众性的教育工作的结果。大批共产党员——他们是经验丰富的宣传鼓动家和组织工作者——在各个军和各个师的政治部门中工作，这个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到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已组成6个军（番号为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两个独立师和4个独立团，官兵总数为9万多人。驻防海南岛的原属第四军的第三十四团，在1925年11月改编为独立团，团长是共产党人叶挺。

广州的青年革命军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张 秋 人

农民、工人、兵士是国民革命中的主力军，他们联在一起，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这次广州的青年革命军打败了三年打不破的反革命军——陈炯明——便是一个好例。

这些革命的青年军是国民党的党军。他们在党立的军官学校中不仅受过军事教育，而且受过很正确的革命的政治教育。他们底学校特别设有政治部，告诉他们中国如何受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其工具——中国军阀的压迫，农工群众的痛苦，及解除这压迫和痛苦的途径。他们对于这些自然格外懂得，因为他们本来是农工或农工的子弟——贫苦学生，他们所受的帝国主义和军阀底压迫格外严重，所以他们革命战斗的精神格外坚决，保护农工的利益格外努力，而农工群众也一致地援助他们，于是他们得胜了！

他们出发东江的时候，就宣言不强拉夫役，不用军用票，付价购物，保护人民。他们不是说空话的，我们看他们底校长蒋介石在平常训勉他们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了。他说：“……这几天来，各士兵没有进到百姓家里去过，买东西照价给钱，公平交易，这是本校长很满意的。……这几天炮兵队和机关枪队自己挑抬，令人十分满意，这才真能实行三民主义，爱护人民……”我读他们党部底东征日记，有二事使我永不能忘记，现在把这二事写下来：二月八日日记：“下午由第二团解来土匪六名，枪决三名，本部（特别区党部）及政治部均因宣传外出，未及阻止，实为遗憾；因是辈土匪非生性恶劣，乃环境所迫，历年来受各军队之摧残，一般人民均无以为生，其与各军队为难，或系图自卫之手段，亦未可知。我革命军对此种情形，应原谅其心，用先抚后剿之法，岂可不加考虑，竟如彼军阀草菅人命之所为耶？”十日日记：“我军中有一女挑夫，因病不能前进，司财务者在前方，又无资遣回，某同志遂另雇挑夫一名，再将病者负于背上，俨如孝子之负慈母……”他们的爱护人民，真可谓无微不至了。

他们这样地爱护人民，人民——尤其是农工安得不援助他们？所以，东江农民纷起扰乱反革命军的后方，工人发传单，敬告同伴共起打倒陈炯明。因此，二月八日革命军乘铁甲车向樟木头方面视察，途中遇反革命军数十人，督率工人掘毁铁道，即有一铁路工人举红旗向革命军告警，得免危险。次日，这位举红旗的工人告诉他们在樟木头以南十余里，有反革命军二千余人。这些农工如何援助革命军，如果革命军没有他们底援助，他们在这一刻是如何危险，他们哪能打败反革命军呢？

他们不仅保护人民，而且促人民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到一个地方，就帮助人民组织团体，并且召集农民开联欢大会，他们告诉农民要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底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君在东莞商务分会之欢迎会上说：“人民如有强固的组织，则军队不敢横行，请各界注意

这点”。他们到汕头后所发的宣言，更明白告诉人民，要他们自己组织团体。他们《告人民同胞》说：“我们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革命军，是本着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来救援农民，救援工人，救援商人，救援其他一切人民的。我们不抽任何种不正当的税，不占地盘，不强迫人民当夫，不强住民房。我们是要杀贼，要肃清东江潮梅，要出师北伐，要将全中国人民从外国人的侵凌侮辱，和军阀的摧毁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暂时只能专顾杀贼，专顾铲除一切害民的种子，不能多分力量来为你们建设稳固的政治。同胞们，这个责任便落在你们身上！你们要赶快团结起来！农民组织农会，工人组织工会，商人组织商会，学生教职员组织学生教职员会。各种职业人民自己组织起来了，便可以举出代表来共同管理本地的一切事务，便可以产生有利于各种人民的政治，决不至于产生地主，富商，东家，绅士，勾结军阀残害压迫人民的怪现象。所以在平时人民应当团结，在战时尤其要团结。我们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革命军要前进杀贼，可惜不能久留。但是我们仍然要竭力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我们今以十二万分的诚心希望你们即刻团结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他们所说的多么热烈，多么恳切！

他们觉得宣传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将要出发的时候，便组织宣传队，同政治部协办宣传事宜。他们底宣传工作分三方面进行：对人民，对友军，对敌人兵士。他们军队进行的时候，宣传队总在前面，到各村庄演讲，发传单及中山先生肖像。乡民初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当然非常害怕，因为他们已是惊弓之鸟了，后来渐渐聚集，向他们要传单及中山先生肖象，而且告诉他们某种服装军队经过时，如何野蛮，如何劫掠。最痛心的，就是他们在前面告诉人民他们如何不拉夫不强劫，他们去后，后面别的军队（例如许崇智的军队）来了，就要拉夫强劫了。这是革命军最大之累呵！

至于他们底奋勇善战，他们底纪律精神，三月二十七日的商报上记得很详细：“二十日广州函云：此次联陈两军开战之初，吾人初以为亦不过如往年常例，战二三星期，互有胜负，屡进屡退，至终仍是不死不活保持现状之僵局而已。而且此次联军进攻，中（桂军）左（滇军）两路大有坐观成败，不参战斗之概……初出茅庐之黄埔学生军教导团，尤出类拔萃，每战必克，每攻必取。俄加伦将军在前敌目睹学生军之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视死如归之革命精神，谓比欧战时之德国少年军尤超出几倍。学生军之受人欢迎，初不在战功卓著，而其纪律精神，亦有足令人起敬者。学生军及教导团，皆归蒋介石（浙人）统率，所习兵工步炮各课程，皆为最新式实用之功夫。炮科教授者均俄人，其瞄准力，实非中国教授所能梦见。对中山之三民主义，尤能彻底了解。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蓬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而学生军聆此好誉，益自勉励，盖此次右翼之长驱直入，遇危不乱者，实学生军之功居多，而粤军因有学生军之良好印象，亦足以励其进取之志，激其奋勇之心，此右翼大胜之原因也。林虎闻学生军奋勇善战，尝笑曰：“咄，何物学生军，不过小孩子胡闹把戏而已，你们看我杀他个片甲不回。咄咄，何物学生军！”不料林隐青轻视学生军，出此狂言，殆至潮汕失守，林虎挥军反攻，以一万兵力，包围学生军二千，卒被冲围而出，得许济之援助，反败为胜，学生军奋勇追击，追敌百里，俘获林军团长黄济中一名，营排长八人，枪枝七百余支，俘兵士五百余人，林始惊顾失色……。”

中国的军人素来是野心军阀的工具。他们将他们自己的好身手廉价卖给军阀，他们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他们只知牺牲自己替大小军阀升官发财，只知掠夺人民以满足自己一时的要求，所以他们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只是有损无益，而他们亦被人民视若仇敌，现在好了，有广州的青年革命军，他们是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保护者。他们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他们现在并且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已有二千多人加入，他们出版《中国军人》，要把他们底主义精神，和纪律传到中国各军队中，要使中国各军队都变为革命军，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他们现在正在努力进行下面的三种工作：（1）领导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向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进攻；（2）深入一切军人群众，告诉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他们所受的痛苦；（3）努力同农工群众联合，结成农工兵的严密的联合战线。

代英按，广州青年革命军的成绩，令一切革命的青年诚心敬佩，这为中国的革命前途开一新纪元。他们到现在不过二千余人，这二千余人是编制不到数月的教导团，为受了六个月军事教育的黄埔军官学生所教练出来的。他们在军事方面，实在远远不及那些久于行伍的军队。但他们靠甚么能以少胜多，每战必克，使陈炯明林虎诸贼闻而破胆呢？第一他们靠党的约束，第二靠主义的宣传。他们军队的编制方法，从连以上，与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平行，都设有党代表，党代表负责以党的主义训练兵士，部勒军队中的党员，一切大事官长须得党代表同意行之。军队因为受了主义的训练，明确了解他们的战争是为他们自己及他们的家族亲戚，而且知道他们全军队都是属于一个主义之下的同志，所以真有如管子所云：'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他们应战的口间，军行所至，有政治部与宣传部队相随，采问人民疾苦，教以组织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并且很注意向敌人军队讲演或发散传单，陈炯明的军官自己说，他们的军队因此不战而自退了（见时事新报）。我们看了这些事情，很可加增我们为革命党与他们的主义而奋斗的决心。我们以一百二十分的热诚，希望我们的青年革命再加努力，使党的力量更可以支配军队，使每个他们的军人，都丝毫不摇动的站在党的主义之下，以保全而且扩大他们的荣誉！我们亦希望全中国热心于军事运动的青年，要看广州这个例证，要知道我们的军事运动，决不是迷信武力，乃是要把党与主义公开的或是秘密的输入军队中间去。全国的军队，都需要党与主义，他们都可以变成象广州一样的革命军，希望已经委身作军事运动的青年，必须明确认定在这一点上面努力。

（原载《中国青年》74期）

〔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

李 奇 中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方面努力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方面建立革命军，积极准备北伐。当时广东的军事形势是：在公开敌对方面，叛逆陈炯明所属的林虎、洪兆麟等部割据东江地区，其另一部分邓本殷

部则割据南路高雷八属和琼州岛地区，他们勾结北洋军阀和英帝国主义，企图夺取广州，消灭革命势力，占据整个广东地盘。在内部方面，广东境内各派驻军，包括广东本省军队和滇军、桂军、湘军、赣军、川军等等，情况复杂，只知各自争夺地盘，截留税款，开设烟赌，扩充实力，并未打算做革命的事情。其中滇军杨希闵等，甚至暗中勾结叛军，拥兵自大，骄横跋扈，对孙大元帅的命令阳奉阴违。驻军中虽有少数将领如粤军陈铭枢、湘军谭延闿、程潜和滇军朱培德等忠于孙大元帅，但力量太薄，不大济事。另外还有在英帝国主义直接培养下的商团武装势力，阴谋活动，破坏革命。总的看来，当时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处境是非常危险的。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迫切希望广东革命根据地脱离危险状态，获得巩固，以便早日实行北伐，完成国民革命，无奈革命的军事力量过于薄弱，而新创立的黄埔军校又尚未形成一个力量，大有心余力绌之感。为了使驻粤各派军队改造成为革命军，实现内部团结统一，集中力量北伐，孙中山先生曾经不得已而采取过说服和妥协的方法，例如对叛逆陈炯明，只要他放弃割据，服从政府，参加北伐工作，即可不咎既往。但是这种说服、妥协的办法只有极小部分发生效果，大部分失败了，因此，不得不对广东革命根据地采取武力统一的手段。现在把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几次战役情况分述如下：

一、平定商团叛乱

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以陈为首在广东形成了买办资本家集团势力，为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并且组织武装商团，同革命势力相对抗。这个集团，最初采用了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表面上服从孙大元帅；另一方面则勾结陈炯明、杨希闵等各派军阀，私贩军火，从中获取暴利（从英国人手中用低价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报废军火，再以几倍的高价转售给各派军阀）；同时，暗中利用走私军火中的一部分来增编和武装商团，陈廉伯自封为商团团长，并派具有政治野心的前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恭受为副团长，组织商团司令部。陈廉伯等借口广州驻军分子复杂，时常发生抢案，商人利益失去保障，要求政府准许商人武装自卫，用商团来代替驻军和警察担任商业区街坊的守护责任。他们在骗取了商人武装自卫的特权以后，就得意忘形地大事扩充武装力量，以佛山为主要基地，分别在佛山和广州西关编练武装队伍，朝着军队形式发展，并同陈炯明和杨希闵订立密约，获得军事干部的供应。在武器方面，他们只靠走私已不能满足需要，就正式同英帝国主义订立密约和军械供应合同，据说供应的数目是步枪十万枝，还有各种重武器。

陈廉伯等的阴谋野心逐渐暴露，从英帝国主义那里买得的军械分批运入佛山和广州。孙大元帅正在韶关督师北伐，获得上项情报后，当即电令黄埔军校协同海军实行拦截和扣留。黄埔军校执行了这个命令。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初截获了一批很大数目的商团军械，并予以扣留，存放于黄埔。这是数目较大的一批，至于小批偷运就防不胜防了。

商团军械被扣后，陈廉伯乘机兴风作浪，竟敢胁迫政府，要求无条件发还被扣军械。陈恭受并代表陈廉伯于八月下旬在佛山召集广东全省商团首领开会，决定用商团总部名义通令全省实行罢市，并用武力驱逐各县县长，宣布独立，成立商人政府。商团这些行为显然是叛乱的行为，广东的革命派主张采取断然手段平定这次叛乱。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竟正面支持商团的叛乱，公然行文给广东政府，说什么不得使用武力对付商团，并且命令驻

在白鹅潭海面的英国舰队进入作战状态。孙中山先生对英帝国主义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无耻行为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但是对商团的叛乱，却在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玩弄下妥协了；这种妥协的结果，适足以助长反动势力的气焰，使其更加嚣张。

十月十日，广州市民一万多人举行国庆游行大会，走到太平路的时候遭到商团开枪扫射，死伤数百人。太平路并不属于商团所辖武装自卫区域，而武装商团竟任意扩张自卫区（商团武装自卫的西关，等于外国租界，不受政府约束）。他们不仅对市民群众进行大屠杀，并在街上张贴布告，公开要求孙中山先生下野，请陈炯明回省主政。

孙中山先生在韶关闻悉广州商团武装叛变，广东革命政权危在旦夕，心甚焦虑，于是星夜回师广州镇压叛乱，挽救革命危局。

孙中山先生根据敌情和政府军驻防情况，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滇军杨希闵部的廖品卓（又名廖行超）师负责剿灭广州市西关区的全部商团；命令驻防佛山的滇军胡思舜部胡思清师负责剿灭佛山市全部商团。

胡思清遵行大元帅命令，派旅长罗廷标执行平剿任务。罗廷标以全旅兵力暗中包围了佛山商团各驻扎地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法，经过较少的战斗，就完全解决了佛山市的商团，缴获步枪六七千枝，摧毁了商团基地，但是掌握实权的陈恭受，却据说用巨款买通滇军而从容逃往香港了。

滇军师长廖品卓并未服从孙大元帅的命令。他的驻军防区包括广州市西关区在内，而西关正是商团在省城的基地，廖品卓不但不遵令进剿，反而予以包庇，掩护商团输入和屯积粮弹。孙大元帅对滇军的违令行为暂时予以容忍，另派李福林军队和湘军去进剿。李福林原先也是同商团勾结的，现因情势变化，乐得受命，还可借此从中取利。李部多是土匪出身，善于巷战。湘军与李部经过一天多的战斗，没有攻进西关。因为西关所有街道都建有层层的铁栅或木栅闸子，构成了街坊式堡垒，颇为坚固；这些堡垒原先本是用来防御土匪的，现在却被商团利用当作反抗政府的阵地。商团凭借街坊堡垒并得到滇军暗中支援，实行顽抗，很有旷日持久之可能。

孙大元帅看清了这个危险局面，决心采取非常手段以求速决，当命令吴铁城的警卫军和黄埔军校学生担任清剿任务，并针对街坊堡垒的战术使用火攻。警卫军和黄埔军校学生于十月十五日实行火攻，放火烧毁了西关的商店和住宅约计千余户，才把这种街坊式堡垒攻破。商团在无险可守之后，就把武器交给滇军廖品卓部，滇军让叛乱分子逃走。至此，广州全部商团被肃清了，商团的武装叛乱就算平定了。

在攻入西关前后时间，吴铁城的警卫军、李福林的福军、湘军、滇军，都趁火打劫，不但作战区的西关被他们连烧带抢地洗劫一空，就是靠近西关没有划入作战区的街市如金银珠宝首饰店铺所在的小市街一带，也被抢劫一空。经过负责巡查市区和维持军风纪的黄埔军校学生劝告和制止后，抢风始息。广州商人当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这是由于买办资本家集团武装叛乱所造成的灾祸，在政府方面来说，是不得已的事情。英帝国主义曾为这次事件动员舆论，诬蔑孙中山先生实行烧杀政策，不是在搞革命。其实，孙中山先生这种断然的非常手段，正足以显示他的革命气魄。

这里叙述一下在扣械期间发生的一个插曲：广东驻军知道黄埔军校扣留的商团军械存放于黄埔的消息后，纷纷要求分发给各军。孙大元帅曾为此事写了几封信给蒋介石（详见

蒋介石印发的孙中山通信手扎），叫他认真考虑这件事。但是蒋介石对孙大元帅这些指示没有认真考虑，对各军的要求置之不理，以致引起各军不满。孙大元帅特为此事召集过会议，听说有一滇军将领（好象是范石生）在会上骂蒋介石并且拔出手枪向蒋射击，经孙大元帅严加制止，风波才告平息。结果，所扣枪械全部分给了各军，黄埔军校并未留用一枝，因为黄埔军校所需的一切武器都已由苏联供应了。

二、平定陈炯明叛乱，第一次东征

孙中山先生在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一手培植陈炯明作为粤军首领。不料陈炯明忘恩负义，不忠于革命事业，更不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实行叛乱，炮击观音山总统府，迫使孙中山先生避难于永丰兵舰（后改称中山舰）。后来陈炯明在被各省入粤支援革命的部队打走以后，就盘据东江，形成对抗局面。陈炯明在叛变之时，业已勾结了北洋政府，窃据东江后，又勾结英帝国主义，从汕头获得英帝国主义的军火接济来扩充实力。到一九二四年末，政府虽然多方对他进行说服工作，他仍不悔悟，并且气势汹汹，命令部队向淡水推进，企图进攻广州。因此，广州革命根据地内，在去掉了武装商团这个心腹之患以后，当时的唯一敌人就是陈炯明，必须把这种反动势力消灭，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才能保证革命顺利前进。

讨伐陈炯明、平定东江的任务，本来应由滇军担任，因为滇军兵力雄厚，战斗力强，很有把握打倒陈炯明；同时，滇军胡思舜军的主力曾万钟一个师和四个独立旅都驻在惠州地区，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出击也比较便利。但是，杨希闵等拒绝接受打陈炯明的任务，不愿为了革命利益而暂时离开广州、韶州、惠州等地去打仗，他们惟恐这些肥沃地盘被别人侵占。此时最高统帅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鞭长莫及，无法促使杨希闵等接受东征任务。形势十分紧迫，滇军既不肯打仗，别的部队力量又不够，不得不提前使用黄埔军校教导团这个新兵队伍去应付紧急局面。于是政府派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东征总指挥，以军校教导团为主力，并派粤军陈铭枢、许济两部协助，来完成东征任务。后来滇军虽然表示愿意担任左翼的攻击任务，但政府已经看清他们“坐山观虎斗”的毒辣态度，所以在作战计划上根本没有把滇军算在里面。

一九二五年一月，由浙江、湖南等地招募来的新兵编成了两个教导团，由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第一期毕业生担任各级干部，编制仿效苏联红军三三制并实行党代表制。兵器全是由苏联供给的，有步枪、重机关枪、手机关枪、十响驳壳枪、手榴弹和山炮等等。由于时机紧迫，新兵教育采取了非常手段，使用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所编订的新式典、范、令和速成练兵法进行训练，一开始就教练新兵练队、用枪、瞄准、射击、掷手榴弹等战斗动作，不教一般制式动作；同时利用行军在沿途施行宿营警戒、利用地形地物等项教练。这样，新兵在极短时期内就锻炼成为富有战斗能力的战士。

苏联军事顾问团，从新兵团的编组、教练、行军以至作战，都是参加的，他们行军时从未骑过马，都是步行（第一次东征时，只有两匹马归两个团长骑，蒋介石坐轿子，所有顾问和各级干部一律步行）。作战时他们都亲临前线，到各个阵地上进行指导。

二月上旬起，两个教导团沿广九铁路线举行野外演习，一边行军一边教练，每天只走一、二十里。在行军途中，士兵和连、排、班长都不知道是出发打仗，还以为是在操练和

演习。到樟木头车站附近，就离开铁路线向东前进，到达龙岗后，再前进一段路程就是淡水。

淡 水 战 役

陈炯明的洪兆麟部，派有一个旅的兵力进驻淡水，作为进攻广州时主力集结的掩护。当黄埔军校教导团（以下简称黄埔军）在蒋介石率领下到达淡水附近时，由于地方民众的协助，远道报信，发现上述敌情后，决定对当面之敌进行攻击，并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要在敌人后续部队尚未赶到之前占领淡水城。

淡水之战是考验黄埔军的头一关。黄埔学生和士兵除了实弹射击演习以外，都还没有听过枪声，毫无战斗经验，现在头一关就碰上攻城战，胜败如何，很难预料，所以在攻击部署上必须极其周密慎重。首先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挑选了奋勇队（即敢死队）担任爬城任务。这个奋勇队由官长十人（其中国民党二人，为营党代表蔡光举、连党代表冷欣；共产党八人，为连党代表刘畴西、彭干臣、张际春、游步仁、李奇中、张隐韬、李汉藩、郑洞国）和士兵一百名组成，分成若干攻击组。以教导第一团为攻击主力，教导第二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防御敌人后续部队接近淡水城的任务。

二月中旬某日（大约是十二日）拂晓开始攻城，战斗激烈，约在正午左右攻入了淡水城内，经过巷战后，全部敌军缴械被俘。这一仗算是打胜了，但是死伤颇大，奋勇队在接近城墙和爬城搏斗时伤亡更大，官长中蔡光举阵亡，刘畴西被打断了右臂，还有几人受伤，士兵则伤亡半数。

正当第一团歼灭了城内敌人的时候，洪兆麟的后继部队果然赶到了，同第二团展开战斗，团长王柏龄临阵逃走，部队也有一部分退下来。幸得第一团从速整理了战后的部队，派第二营营长刘峙率领全营反攻，把敌人打跑，才稳定了淡水城的占领。当刘峙率部反攻时，适值黄昏时候，发生一个偶然的奇事：敌人在昏暗中误认刘峙的队伍是从淡水城逃出来的自己人，等到两方靠拢，黄埔军上刺刀冲锋时，他们措手不及，只好败退。黄埔军乘势猛追，敌人狼狈逃窜。

淡水战役，是在采用速战速决法、使用奋勇队爬城以及炮兵协同作战等条件下取得胜利的。

平山附近击溃洪兆麟主力的战斗

黄埔军在淡水略事休整补充后，根据人民群众探报，得知洪兆麟率领他的全部万余人向淡水前进。黄埔军于是从淡水城向东前进，迎击敌人。事先对洪兆麟的战法特点作了研究，知道他是以"三冲"出名的，即经常使用连续举行三次以密集队伍猛烈冲锋的战法把对方冲垮，牺牲多少，在所不顾。黄埔军根据这个特点采取对策，认为只要站稳阵脚，打退敌人的冲劲，就有取胜可能。

二月十七日上午，两军在平山附近的山区遭遇，展开大战。黄埔军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采用新战术，即是运用侦探部队代替骑兵在前卫的较远前方搜索前进，求与敌发生接触，以诱使敌人主力过早展开并迷惑其主攻方面，同时便于自己的主力从容地占领有利阵地和选择主攻方面。洪兆麟的部队果然名不虚传，勇敢善战，冲锋的密集队伍象潮水一样，奔腾汹涌，猛烈异常。黄埔军除发挥高度的革命意志和坚毅沉着、有进无退的战斗精神以

外，还在火力上加以严密的配备来迎击敌方的“三冲”。洪兆麟的部队在黄军埔密集火力杀伤之下，死伤虽然惨重，但仍然前仆后继地连续猛冲，有不少官兵从火网空隙中冲到了黄埔军面前，但是当他们发现黄埔军的枪上都上着白晃晃的刺刀，而他们自己没有刺刀的时候，就吓得回头就跑。洪兆麟的所谓三冲法宝遇着劲敌，没有发生效果，没有冲破黄埔军的阵线，只好全线后退。黄埔军乘势进行反击，一举击溃了洪兆麟的主力，立即转为追击战。洪兆麟部溃退后，一直没有能力重新组织战斗，大约是退向林虎防区要求收容去了。

黄埔军到达海丰时，当地农民群众集会盛大欢迎，旋经陆丰于二十六日进据普宁、揭阳，沿途农民送茶送水，当挑运伕，热烈支援“学生军”（东江的人都称黄埔军队为“学生军”）。至此，黄埔军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

棉湖、河婆战役

叛逆陈炯明原有两股军队，窃据潮汕地区的洪兆麟这一股，已被击溃；另一股号称四五万人，由林虎、李易标统率，窃据韩江流域的梅县、兴宁地区。陈炯明对于洪兆麟一万多人竟被两千多新兵打败这一事实很不服气，想使用林虎、李易标两部大军一举消灭黄埔军，于三月上旬从兴宁、梅县等地南下，寻求决战。

黄埔军在揭阳、普宁地区休整了半个月，在老百姓的热烈支援下，探悉陈炯明倾巢来犯，迫进潮汕地区，正好以逸待劳，向前迎击。三月十一日敌我双方到达棉湖、鲤湖附近之线，就在这一线展开大战。

黄埔军的作战，是以第一团攻击敌之正面，第二团攻击敌之右侧背（即我军的左翼），以粤军许济旅的一个团（人枪约五六百）为预备队。当时我军对于林虎等的战法了解不够，只知道比洪兆麟稳重，同时兵力比洪多三倍以上。因此黄埔军虽然在精神上抱有必胜之心，而在战术上却无取胜的充分把握。

三月十二日拂晓，第一团在棉湖西北山地与林虎主力遭遇，当即展开极其剧烈的战斗，战线逐渐延伸到数里之长，阵地变换几十处之多，战斗的时间从拂晓到下午四时左右，一直没有停歇过。由于第二团团长钱大钧（前团长王柏龄在淡水退却被撤职，由钱接充）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向敌人侧背进攻，敌军因而能够倾全力对付第一团，致使第一团遭受压力太大，伤亡惨重。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一以上，仅第一营就有营长蒋鼎文受重伤，第一连连长余海滨、副连长刘赤忱阵亡，副排长全部受伤，只剩下党代表李奇中和特务长邢国福两人率领残存士兵三十多人撑持阵地，整个阵线几呈动摇之象。有一处阵线被敌人突破，敌军冲到团部指挥所附近，团长何应钦亲自率领卫士队手机枪排进行反击，才把冲入之敌打退，卫士死伤多人，情势极其危险。把预备队许济的一团兵力用上去之后，不到半小时就混乱了，仍未能稳定战局。这时，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也在团部指挥所，眼见这种情况，颇感忧虑。蒋介石向何应钦说：“何团长，你要坚持，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得遭到严重的挫折。”蒋介石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就转过头去询问炮兵连长陈诚：“为什么六门大炮都打不响了，能不能再试一试？”随即偕同苏联顾问跟着陈诚前往炮兵阵地。

事情真有这样的凑巧：炮兵连长陈诚把一门山炮加以调整，装上炮弹，对准正聚集在

团部指挥所前方小河对岸的几百敌军，亲自拉火，果然一炮打响了，炮弹正落在这群敌人中间爆炸，打死了几十个敌人，敌人一哄而散，向后奔逃。接着几门炮一连打了几炮，都打响了，而且打中了目标，几处敌人都后退了。于是黄埔军阵地上精疲力竭的官兵突然兴奋起来了，振起精神，奋勇反攻，把全线敌人打退到稍远的地方，但是也再无力前进追击了。这时已近黄昏。黄埔军正在调整阵地，预防敌人再来进攻，并且内心惶惶之际，突然看到敌人纷纷后退，全线退却，而且极为慌张，感到奇怪。

情况原来是这样：第二团在进击鲤湖附近后等候蒋介石的命令，久候不得，虽然听到右翼剧烈的枪炮声，但团长钱大钧不知当机立断，坐失良机。后来该团的营长刘尧宸实在忍耐不住了，独自率领本营前进，走不多远就发现敌情（正是林虎的总预备队和指挥所位置），立即展开战斗。钱大钧听到刘营战斗的枪声，才命令全团迅速加入战斗，实行猛攻。这时已近黄昏，正是第一团由于炮兵最后发生作用、举行反攻的时候，林虎全心对付棉湖方面，没有想到侧后方会遭到这样猛烈的袭击，事出意外，手足无措，只好被迫后退。后面一乱，很快就影响到前方，林虎、李易标全部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全线溃退。

第二团袭击成功，第一团乘势追击，两团在傍晚取得了联系。至此，棉湖大战，黄埔军又获得了胜利。这一仗基本上决定了第一次东征的胜负，尔后虽有河婆、五华、兴宁等战役，仅是尾声而已。苏联随军顾问对棉湖战役作评价时，非常称赞第一团的战斗精神，认为可以同苏联最优秀之红军某师媲美。

占领五华、兴宁、梅县，结束第一次东征

黄埔军在棉湖、鲤湖击溃林虎等部主力后，就转为追击战。林虎在河婆组织了一次微小的抵抗，目的在掩护退却。黄埔军追击到河婆，排除了林虎部的抵抗后，便重新部署。苏联顾问建议采取奇袭战法，从速结束战争。作战部署是，第一团取捷径奇袭五华而占领之，然后从速向兴宁前进；第二团紧紧尾随溃退之敌追向兴宁，估计陈铭枢旅可以同时到达兴宁，协同攻击，歼灭敌人，占领兴宁。

第一团从安流镇出发，循山径小道，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拂晓前就到达了五华附近。五华是林虎的后方，敌人不多，但军需物资不少。五华的敌人并不知道棉湖方面的战况，更不知道黄埔军已临近大门口，所以黄埔军于拂晓发起攻击后，很快就把敌人肃清而占领了五华县城。第一团完成占领五华的任务后，仅留小部担任警戒，大部立即转向兴宁前进。

第二团尾随溃退之敌追击到达兴宁时，陈铭枢旅也同时到达了，首先把在兴宁城外神光山的敌人击败，并立即实行攻城。第一团也从五华赶到，协同作战。这次战斗是黄埔军集中兵力最大的一次，气势也盛，战胜敌人，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只是占领了兴宁城，彻底摧毁了陈炯明的巢穴，而敌军却并未被歼灭，很大一部分逃往闽边去了。

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黄埔军在兴宁举行孙总理逝世追悼大会后，即分兵进据梅县，一边向闽边警戒，一边整补。

滇军本来是答应担任东征军的左翼攻击任务的，但是果然不出所料，一直到战事结束，未见他们有任何行动，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希望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尤其希望黄埔军被陈炯明吃掉。

三、平定杨、刘叛乱

一九二五年滇、桂两派军队在粤驻防的情况是：滇军范石生部已回滇打唐继尧去了；杨希闵部的廖品卓师驻广州，赵成梁师驻韶关；胡思舜部的胡思清师驻佛山，曾万钟师和四个独立旅驻东江惠州等地；朱培德部驻广州。杨希闵名义上是滇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可以勉强指挥的只有他本人的部队和胡思舜部。朱培德部是忠心于孙大元帅的，惟兵力较弱。桂军以刘震寰为总司令，全部驻在西江，与滇军约定，桂军士兵不到广州滇军防地。

杨希闵、刘震寰两人密切勾结，骄横跋扈。孙中山先生开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杨、刘两人认为这是同他们的私人利益不相容的，多方阴谋进行破坏，主要是阻发经费，企图扼杀这个军校。廖仲恺为了黄埔军校的经费问题，不知同杨希闵讲过多少好话。在扣留商团枪械事件上，因争论这批枪械的分配问题，杨、刘等未能达到最满意的目的，遂对政府表示不满；后来又看到苏联供应的枪械只分配给黄埔军队，不分配给滇、桂军，他们更由不满而发展为仇恨。于是杨、刘等人处处与政府为难，既包庇商团造反，又拒绝执行东征的命令。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杨、刘等人更是无所顾忌，野心更大，竟进而勾结北洋政府和英帝国主义，打算实行叛变。当黄埔革命军以少胜多地打垮陈炯明，收复了东江地区以后，杨希闵等认为革命势力将日益壮大，对他们的反动活动更为不利，因而叛乱之心更加急迫。五月中旬，反动头目在香港皇后酒店召集会议，杨希闵、刘震寰亲自主持，邀请陈廉伯、陈炯明、邓本殷、唐继尧和段祺瑞的代表参加，香港英国殖民政府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大家会商叛乱计划，企图联合向革命政府进攻，推翻革命政府，建立反动政权。

杨希闵从五月中旬起，开始集中兵力，部署作战。他把驻在韶关的赵成梁师调到广九铁路线布防，把驻在佛山的胡思清师调到广州白云山一带布防，把廖品卓师从广州市区扩展到郊区布防，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阵线。

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还想采取妥协的方法来挽救危局，曾派邹鲁赴港请杨、刘两人回省，商量改组大本营。但来杨、刘打了胡、汪一记耳光，非要推翻革命政府不可。另一方面，国民党的革命派以廖仲恺为首，则同共产党和群众站在同一立场，主张实行讨伐。后来胡汉民等为形势所迫，也只好同意下讨伐令。

黄埔军校奉到讨伐杨、刘的命令后，决定采取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解决广州地区全部滇军，再解决惠州地区的滇军和西江地区的桂军。作战部署是：以第一、第二两团为主力，秘密而迅速地撤离东江，集结广州附近，配合粤军一部准备攻击白云山、龙眼洞、瘦狗岭一带及广州市区之敌，占领广州；黄埔军校在校的学生队和入伍生团队配合海军攻击广九铁路线之敌，并努力向右翼延伸，同教导团取得联系，协同攻击前进，歼灭敌人，并限六月十日前各部分别完成作战准备，预定十一日拂晓开始攻击。

十一日拂晓，教导团在白云山、龙眼洞一带同滇军展开战斗，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入伍生队伍也于同时登岸攻击广九线石牌一带之敌，海军舰队也同时用远射程大炮向车陂、石牌等地之敌猛烈射击。滇军师长赵成梁的指挥所设在石牌车站，海军的大炮对准石牌车站发射，命中了目标，打毁了车站，当然就把赵成梁的指挥所摧毁了，赵成梁本人逃命不及，也被打死了。这样就使得赵师无人指挥，战线陷入混乱，这就给予从黄埔过江登岸的

学生队伍一个发挥战斗威力的机会。学生队乘势猛攻，突破了赵师的阵地，赵师开始溃退。教导团方面，战斗进展也很迅速，经过剧烈战斗后占领了龙眼洞、白云山，随即夺取了瘦狗岭，滇军全线溃退。教导团和学生队取得联系，协同追击，滇军溃不成军，纷纷缴械投降，或丢弃武器，藏匿民家，或四散逃窜。到十二日，所有叛乱的滇军全部肃清了，革命首府的广州又掌握在革命势力手中，使革命政权转危为安了。

这次战役，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很大，例如铁路工人实行罢工、怠工，破坏滇军的运兵计划，郊区农民向阵地的革命军送茶水，市区居民打"红帽子兵"（滇军的军帽是用红布做帽圈的）、缴"红帽子兵"的械等。

驻防惠州一带的滇军没有来得及协同广州地区叛军作战，当广州地区的叛军被歼灭以后，这一部分叛军就陷于孤立无援。朱培德奉令去招抚收编时，因叛军有少数官长表示不服，还是打了一小仗才告解决。

西江地区的刘震寰部由粤军和广西李宗仁军解决了。至七月间所有参与叛乱的滇军和桂军完全彻底肃清了，杨、刘叛乱事件至此结束。

四、第二次东征

一九二五年七月初，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后，把驻在广东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黄埔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蒋介石为军长，周恩来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第一军这时只编成两个师，以何应钦为第一师师长，王懋功为第二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这时由于平定了杨、刘叛乱，又整肃了粤军，革命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固。

叛军陈炯明部在第一次东征时被击溃后，即退匿闽边，后来从香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府那里得到援助（据说枪枝万多枝、子弹数百万发和大量现款），并得到段祺瑞政府给予的军饷三十万元，实力遂得恢复。他们乘着黄埔江军队撤离东江、回师广州平乱和驻惠州的滇军被改编、撤出惠州的时候，又乘隙卷土重来，占据潮、梅、惠州整个东江地区，并集结重兵于惠州，凭借惠州险要作为基地，企图夺取广州。

国民政府决定彻底消灭陈炯明反动势力，命令蒋介石执行这个任务。十月一日，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的第四团（当时第二师担任广州卫戍勤务）出发，于当月上旬末到达惠州附近，准备先击破惠州之敌。

陈炯明的全部兵力几乎都集中在惠州地区，企图利用惠州险要进行顽抗，折损革命军兵力以后，再反守为攻，一举歼灭革命军。

革命军于十月十一日先行扫荡了惠州城外之敌，占领了飞鹅岭。以第一师为总预备队，第二师的第四团为攻城部队，十二日开始攻城大战。在攻城大战中，由于蒋介石求胜心急，在炮兵的射击还没有给攻城的步兵造成有利条件以前，就硬性地严令步兵发起冲锋，企图援淡水战役先例，迅速接近城墙，实行爬城。第四团部队在敌人的密集火力封闭下，连续不断地冲锋。一排人倒下了，第二排跟着冲上去；第二排死完了，第三排又紧跟着冲上去。这样连续不断，前仆后继，一会儿就牺牲了好几百人，始终没有冲到城墙脚下；偶有一两人侥幸漏过弹雨冲过了护城河的石桥，也在尚未到达城脚之前就被打死了。第四团官兵这种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真是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了。但是用这样的攻击方法，一连两天，都未奏功，并且伤亡很大。象这种只有损失、毫无战果的战斗，蒋介石也

觉得太无意义，不忍再继续下去了，因而暂时停歇一下，研究对策。

为什么会弄成这种局面呢？

这是一个战术问题。这是由于蒋介石缺乏战术知识（他不懂战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最多），不懂得步兵、炮兵协同作战的原则，只凭主观冲动行事。炮兵营长陈诚也不懂炮兵战术，不向蒋介石作合理的建议，只知一味盲目地顺从。当攻城战开始时，苏联顾问曾建议先用炮兵施行重点的面积射击，摧毁敌人设在城墙上的重机关枪阵地并打开一处城墙缺口，给步兵开辟入城进路或者掩护步兵接近城脚，然后实行爬城攻进城去。但蒋介石拒绝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说是没有这么多炮弹，认为想用炮弹去打垮城墙是绝对办不到的，并且举出淡水战役之例来证明他的想法。因此，蒋介石叫陈诚按照攻淡水时的战法使用炮兵，多打城内的目标，尽可能地压制攻城地点城墙上的敌人火力。现在蒋介石经过了重大牺牲的惨痛教训，才重新考虑苏联顾问的建议，改变了炮兵的使用方法。

炮兵集中火力射击一点，经过一天多的不停轰击，果然摧毁了几处重机关枪阵地，并且打开了一处城墙缺口。我军步兵攻城队这时才能接近城墙实行爬城，占领城墙上阵地向城内射击，并且从被打开的缺口冲进城去扩大战果。攻城部队冲进城后，紧接着就命令总预备队派一个团迅速入城，经过剧烈的巷战，才把城内敌军全部歼灭。敌人除死伤的以外全部被俘，因为惠州城四面被围，他们无法逃出。十月十四日，革命军完全占领惠州。惠州战役，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革命军占领了惠州，歼灭了敌人的主力，尔后整个东江的收复也就没有较大的战斗了。

惠州之役，双方伤亡惨重，在革命军方面，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阵亡，营长以下全部干部几乎伤亡殆尽，除勤杂炊事兵以外没有剩下几个战斗兵。当总预备队派出的一个团进城接替战斗时，因城外死尸堆集如山，用爬城的梯子架在死尸堆上才能爬过去，在这个地点流的血，变成了一道黑色泥浆沟渠，足见死伤之多，战斗之烈。

惠州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师向海陆丰、潮梅地区前进，仅在海丰附近打了一个小仗，以后就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了。至十一月底，整个东江地区的敌人完全肃清了。至此，就结束了陈炯明的叛乱历史。

战争结束后，何应钦任为东江绥靖委员，组织绥靖公署，代表蒋介石掌握东江地区的军、政大权。

五、肃清南路叛军

叛军邓本殷部执行陈炯明命令，盘踞广东高雷八属和海南岛。当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邓本殷部向北进扰，侵及阳江以北、以东地区，使广州受到威胁。国民政府派陈铭枢、俞作柏两部往剿，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把邓本殷的前进部队打退。由于邓部势力相当大，南路地势又复杂，陈铭枢等的兵力不能胜任，政府复令朱培德为总指挥，增大兵力，以求取胜。朱培德的作战部署是：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陈章甫部为右翼侧支队，几路进剿。十一月七日占领阳江，二十日占领高州，二十三日占领廉江。邓本殷退守海南岛。十二月二十日克复琼州，收复海南岛。至此，邓本殷部完全被肃清，南路地区也平定了。

从此，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完全完成了。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对于广东时局宣言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
革命的军士们！
一切被压迫的人民们！

反动军阀刘镇寰、杨希闵的武装已经解除了，他们三年祸粤的罪史摆在你们的面前，异常显明。他们自从入粤以来，假拥护广州革命政府之名，侵夺地盘，擅任官吏，占霸机关，私收赋税，私定苛捐杂税，开设杂赌，包办烟土，侵占民房，强拿夫役，封闭民船，摧残农会，屠杀工人，收容土匪，纵令兵士奸淫掳掠，勾结西南祸首唐继尧，卖国亲日的安福首领段祺瑞，背党叛国之陈炯明、林虎，屠杀中国人民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商团领袖陈廉伯、陈恭绶，国民党反革命分子马素、冯自由等，积极图谋倾复广州革命政府，其罪恶显著，其反革命行为昭彰，诚然人人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但是，这次广州政变，其意义不只于扫灭一刘镇寰、杨希闵；这次战争，其范围不只于革命政府的军队与刘镇寰、杨希闵的军队。这次政变有很重大的历史的意义。这次战争系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武装斗争，因为刘镇寰、杨希闵等敢积极图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徒以有唐继尧、段祺瑞、陈廉伯、英帝国主义者、马素、冯自由等积极的帮助、积极的耸恿。这是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的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的右派联合一致的向引导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谋中国民族解放的国民党进攻；换句话说是各种反革命的力量联合一致的向革命的力量进攻。幸而这次攻胜了，不幸而战败，则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必受一很大的打击。因此这次的战事，其范围不只于刘镇寰、杨希闵等的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军队；这次的战争，明显点说，是反革命派与革命派很剧烈〔的〕武装斗争。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们！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被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与他们勾结的反动力量的压迫摧残，已经够了！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再不能忍受！按理说，刘、杨等反动力量必被打倒。刘、杨等有武装的力量，革命的国民党同样亦有武装的力量，并且比他们还强大些。按实力说，刘、杨等反动力量也必被打倒。何况还有粤汉、广九、广三三路的工人联合罢工，断绝刘、杨等的交通；电报工人罢工阻止刘、杨等的消息；海员阻止从远道运来之徒手兵及截击破坏铁路罢工之工贼；兵工厂工人罢工，停止供给刘、杨等的子弹；海陆丰及番禺珠村之农民自卫军均派队帮助革命政府的军队；及各种政治的宣传队猛烈的宣传，和各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传单，援助革命政府；痛诋刘、杨等反动军阀的罪恶，使一般被压迫的群众明了：刘、杨等反革命的力量那有不

被扑灭的道理。在刘、杨等被打倒的许多原因中，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公然表示如此伟大的力量，一方面固然可以看见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再不能忍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各种反革命力量的压迫的热情，但同时须知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所以如此的积极援助革命政府，对于革命政府有一定的希望——希望满足他们的要求。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们！反革命的军阀刘镇寰、杨希闵等已经打倒了，与他们勾结的各种反动力量受此打击，当然要敛迹起来；广州革命政府从此减去一层障碍。假若在此次胜利之后，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新的改革，在广东开一新纪元，减轻工农等被压迫群众的负担和满足他们的要求，则失掉了此次胜利的意义，〔等〕于平常间一派军阀与一派军阀的战争！

国民党广州革命政府诸领袖们！你们平常不是说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所作为，〔是〕由于反动的军阀盘踞之广东违抗革命政府的命令吗？刘、杨等反动的军阀现在已经打倒了，你们应当明白这次打倒他们的真意义，毅然决然的实现当他们未打倒之前你们自己提出的各种政见，如军事、行政、财政统一。你们尤当了解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所以积极援助革命政府的原因，满足他们所提出来的各种具体的要求。你们更当明了要实现你们的主张和满足工农等被压迫群众的各种要求，除须你们自己要有很大的决心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们当设法很坚决的排去。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们！好容易你们帮助革命政府把刘镇寰、杨希闵打倒了，你们应有组织的继续的为革命政府的后盾，使革命政府实行有所改革。但同时你们须达到下列各种最小限度的要求：

甲、一般的：

（一）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绝对自由。

（二）统一行政，绝对禁止军人委县长，实行地方自治。

（三）统一财政，废除苛捐杂税，修改税则，绝对禁止军队霸占征收机关。

（四）统一军政，严禁军队扰害人民。

（五）实行禁绝烟赌。

（六）整理市政，开浚河道，建筑道路等。

（七）教育经费独立，增加义务及职业教育经费。

（八）切实办理剿匪清乡事宜。

（九）裁减驻防兵额。

乙、工农兵方面的：

（一）绝对保障工农组织工会农会，及罢工抗租等权利。

（二）制定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保护童工、女工利益。

（三）实行劳动保险。

（四）规定保护农民利益之法律，取消田土业佃产保证局，禁止预征钱粮，规定最高限度租额等。

（五）严行取缔高利盘剥。

（六）严禁军队扰害农民。

（七）扶助工农经济合作事业之发展。

（八）改良兵士生活，给予职业及政治教育。

（九）保障退伍兵士生活。

（十）优待阵亡军人家族。

（十一）规定残废军人年金。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们！这是刘、杨等反动军阀肃清后，革命政府应当满足你们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你们应当自己积极起来争，扩充你们自己的组织，有组织的监督和迫使革命政府实现。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中共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工人们！农民们！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当国内战争正烈之时，曾向你们表示过自己的主张和态度。

直系军阀虽然一时倾复，而现在又图重新保持其力量，把国内战争延长不息。在别一方面，反直系——奉系、安福系，最反动的段祺瑞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虽然将北京政权抓住了，但是他们不仅不能统一中国，消灭军阀战争，并且他们自己仍旧要着军阀的老把戏，争权夺地，无有息时。他们所给与人民的，不过是教工人及无数穷苦的农民更为遭殃，更为受苦！

无论直系或反直系军阀的背后，都站立着列强的阴谋，他们为着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断的援助军阀战争以与中国人民为敌。英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治外法权，在租界里面给失意军阀齐燮元等以机会，教他组织势力，继续战争。但是当另一派军阀匿居租界有所动作时，他们便把他捉住，并逐出国外。这两种行动，在表面上虽然不一样，但是其目的都是要加紧中国的内乱，都是要利用军阀以达到他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美国的军舰早已停泊在南京，近又从菲律滨调动大批海军向我们的海岸进迫。每一个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机关报，总是天天高喊什么有积极对华政策之必要，公然地号召列强用武力干涉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次国内的战争中，比较别国更会利用机会，然而也就因此引起与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加冲突。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图借口中国人民的愿望，要他的敌人（英美各国）对于他有所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者又重新要立在为中国人民"保护者"的地位，如以前在欧洲大战，袁世凯时代和凡尔赛会议时代一样。日本为掩饰自己强盗的行为和趋向，已开始宣传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和"亚洲人的亚洲"之口号。

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起来，努力对世界帝国主义迎头痛击，努力打消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世界帝国主义者确实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将中国人民沦到万劫不复的地位！

中国人民应当知道，世界帝国主义者以美国为领导，去年秋季在伦敦曾经共同筹划了一个反对欧洲和亚洲人民的阴谋。他们所定的道威斯计划是什么东西？就是一方面要把德国变成英美的殖民地，而别一方面要把德国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一销场，好教英美的银行家和工业家更加发财致富。为着要强迫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人民及苏俄购买这些商品，英美帝国主义者不顾忌一切罪恶和残忍行为，非达到此目的不已。

在欧美我们已看出反动的现象，世界的反动势力正在聚集向劳农的国家苏俄进攻。列

强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绝不能静听着他们的商品不能自由地输入苏俄，一定要把苏俄陷于奴隶的地位。他们更不愿意丢却这么一个好市场的中国！他们老喊着要保全中国的市场，他们一定要成为中国财富的主人，一定要陷中国人民为他们的奴隶！

为着要达到这目的，所以要供给中国军阀以金钱火药，所以美国要扩充太平洋的海军，所以英国要在新加坡建筑军港，所以他们都派军舰到我们的海岸和扬子江及西江等内河来。

为着掩饰自己的贪欲，帝国主义者更说他们自己爱和平，主张和平主义，最近期中战争是不可能的，应当创造世界永久的和平……这些好听的话。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家现在更加不知羞耻地说什么列强间邦交和睦，什么对中国人民怀着善意……等鬼话。当帝国主义者说这些谎话的时候，完全不看看列强军费之如何增加，军舰、飞机、军事工业之如何扩充，大家对于快要爆发的战争之如何准备。

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在这些事实之前，世界帝国主义努力扩充军备，努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及那些被金钱收买的各国的学者尽力寻找杀人的武器之时，东方的人民是如何危险！东方人民自卫的武器，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小玩意儿，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将我们的国土变为荒漠，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变为坟墓——这一种危险就在眼前啊！

但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暴动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将这些武器拿到手里；同时东方被压迫的民众起来反对自己的军阀，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国家，对外国帝国主义施以最后的总攻击，那末，世界帝国主义之破坏力量也可转变为反对其自身的工具。

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总机关——共产国际，已经组织了无数万的工人立在社会革命的红旗之下。共产国际下的红色农民国际，也已经聚集了无数万的农民环绕着红旗。世界工农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武备并排生长，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劳农与资本统治之最后的斗争日见逼近了。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责任上，很诚恳地向中国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为不断地向群众解释，用什么方法中国人民才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何才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是自己唯一的责任。

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见膨胀起来。全国各城市里面的群众现正努力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差不多都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学生现正组织这种机关，并且高叫着消灭一切军阀阴谋，反对段祺瑞所要召集的军阀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个善后会议，如段祺瑞所预料的，将成为段氏团结己派军阀的工具，借此工具以对付别的军阀而引起将来无穷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的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中国共产党不仅尽力向群众解释军阀愚弄国家之巨大的危险和帝国主义者扩张军备对于我们是如何的可怕，并且要使中国民众知道国内军阀不给人民召集国民会议及组织群众

的保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则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所加于我们的危险将更为扩充。

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无数万中国民众的命运真不能再静听军阀的愚弄了！革命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中日长一日，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锁链已经开始摇动。

英美所扶植的直系势力之崩坏，是民族革命运动进展的机会，但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又谋重新制服民众的运动。他们正在那里预备最严酷的反动，我们应当明白现在时机之迫切啊！

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我们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

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你们赶快组织起来，赶快制止军阀的阴谋，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最大多数的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你们赶快组织大示威运动反对外舰驶入中国内地，要求外兵不得驻扎我们的领土以内，要求取消一切领事裁判权！要使中国不陷于奴隶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国劳苦群众的努力，完全靠着全世界劳农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奋斗！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

推翻国内的军阀！

国民会议万岁！

中国劳动群众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全世界劳农反对资本主义的同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大会听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的报告之后，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第五次大会对于“联合战线”及“工农政府”的解释尤为详尽，一方面可以防止以后各国共产党右派对于这两种重要的策略之机会主义的曲解，他方面亦可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左稚病，如此才能确实领导各国共产党获得社会民主党下的与无党派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下之来，以联合防御现实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的猛攻并进而推倒之。

大会对于国际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专责成。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一、欧洲之所谓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不得不使社会民主派及劳动官僚（劳动党）执政的时期，业已结束，英美重新发现反动派的政府，欧洲反动潮流昂进，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更加猛进，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内发现极厉害的经济危机的很好的证据。

二、最近英美政府的更造，注意反动潮流的增高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出，所谓小协约国，简直已成帝国主义的附庸，绝无疑义。英国保守党上台和美国共和党执政之后，埃史笃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内，对于农民工人的镇压政策便格外厉害起来。波兰及埃史笃尼亚之资本主义法庭杀戮共产党员，巴尔干半岛上预备对共产党作总袭击，这种现象，都是号称“独立”的小国家，对于自己的新主人（保守党和共和党等）的贡礼，那些新主人正要吸这些国内劳农革命首领的血哩。

三、英国保守党上台之后，立刻便对埃及人民作武装的攻杀，以及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威吓，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的开始。

四、英国九个月的所谓劳动党政府——他的首领便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首领，麦克唐纳尔——对于工人执行资本家的政策，对东方民族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既没有能蒙蔽国内

的阶级矛盾，亦没有能缓和殖民地的反抗，完全没有满足资产阶级的希望；却正相反，使国内阶级冲突更厉害，殖民地民族更加毒恨帝国主义。

五、劳动党九个月的对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直到他后来因为英国贵族借口伪造的季诺维埃夫的信而攻击下台，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人运动大显左倾，群众之中对于苏联的同情确见增长。

六、英美想以道威斯计划变德国成殖民地，指定最靠得住的地方以便美国投资，想剥削德国工人以偿英法的战债，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想销售德国货品于苏联，向苏联进攻，——这些新计划，使欧美反动潮流增高，各国资本都对工人进攻。

七、世界无产阶级对抗这种反动潮流，应当有世界的职工运动的统一。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赤色职工国际，现实的职任，就是要统一世界的职工运动，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抗资本的进攻。要实行这一重大的职任，必须先有共产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统一意见，普通而论，共产党内亦是要有统一意志。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亲密结合地进行职工运动，无产阶级的前锋才能坚持自己的地位，以求反守为攻，而且使无产阶级群众脱离出卖阶级的工贼和职工官僚的恶影响。

虽然亚姆斯德丹黄色职工国际及国际的社会民主派，尤其是德国，竭力破坏工会的统一，然而英法等国工会中的少数革命派的运动渐渐兴盛，他偶和苏联的革命工会日相联合——这种现象可以保证统一职工运动的胜利——就是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原则及策略的胜利。

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

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一九一七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

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第四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增加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的时期。前次战争刚刚结束；虽然直系军阀自上至下地瓦解了，而胜利的反直系军阀外并没有一派军阀能代直系而统治中国，并且他们中间的冲突形势又日露危恶了！第二次战争又有立即爆发之可能。

前次战争的结果造成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优势，给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使日英美帝国主义间在远东的冲突又形加紧，近日英美日的备战所以日益积极。这种英美日间的冲突加紧，更使他们将利用中国军阀战争以膨涨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的趋势，于是更促进现在对抗的军阀之间的战争。

在这种国内军阀势力摇动之中及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剧烈冲突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如潮涌而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之开始。

现时在中国军阀政治崩溃的过程中，这种民众运动怎样才能使军阀不再巩固他的势力延长他的崩溃过程，怎样才能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之实施于中国，这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正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

我们知道中国现时从国民运动得到一个时期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发展的机会，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因为自从一九二三年中世界资产阶级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形势波及中国以来，就是从“二七”，帝国主义及他的工具中国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势力采取进攻的策略以来，中国的国民运动非但不因为他们的进攻而低落反而日益增高，这种中国国民运动的逐渐高涨等到北京政变后反动的束缚略加放松时，就得到一个猛烈的发展的机会了。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在事实上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以来，虽在最重压迫之下但仍旧是继续高涨而作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国民运动的发展是成正比例的：阶级斗争是以促进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亦是以增厉阶级斗争。这是在广东过去一年来的经验可以证明，并且在现时亦证明给我们看：国民运动现时正高涨而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现时在工人运动中各地都发现工贼，并且黄色工会亦开始萌芽，这是表现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方法更形厉害。所以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一般党的政治活动（其实党的这种政治活动是为发展工人运动，是使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工人经济组织可以发展），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说本党不应注意职工运动而只应注意政治活动，而是说这两种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因为他们是互相影响而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发展。

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虽然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能防止在某一时期中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本党党员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扩大执行委员会时立即纠正同志这种错误，并且自后逐渐使本党对于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于正规。

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如技术上组织上的缺欠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客观情形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

大会并望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的更多的指导。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一）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

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的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二）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其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因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各压迫阶级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斗争的力量之发展，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斗争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

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三）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他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的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命运。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并有了一万五千万以上的银行资本。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外货外资），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自己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各种工厂）之危险，比此时的军阀还要利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尤其在广东，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渡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

地，因为近来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这些争斗中，如沙面罢市及商团事件，都表现出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这样对垒的形式，在商团事件中，尤表现得十分明显，并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形式。

直系军阀倒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受一大打击，同时中国的军阀已在分裂崩溃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渐渐起来，虽然还幼稚，而要求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普遍全国，参加此运动的是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大商买办阶级及工业资本家，只向军阀政府请求加入国民会议，而不愿与下层阶级合作参加此促成运动；并且他们和军阀都已感觉得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对于他们的危险，而谋有以抑压之。因此，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四）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及其左倾右倾之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中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到了第三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三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须，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第三次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后，我们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疏忽了第三次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这种错误，以实际工作中得力的同志为尤甚；（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怀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三）以为我们应当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本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这些错误，都指摘出来，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这些错误与危险，不但现在仍旧存在，即不存在而将来也会发生，

所以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全国大会重要的职务。

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会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危险，我们的同志应当时刻警戒在心。

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或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他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这个革命的内容是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又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如督学制、雇佣军队制、政权分裂、农民屈服于官绅，人民无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的奴隶中国（强迫实行不平等条约，支配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管理中国交通，剥削中国劳动力、外侨享受种种特权，军队军舰驻在中国为其外交的后援，设立教育机关教堂及新闻愚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们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五）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

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政策，并附合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右派之间，操纵取利。在我们党的扩大会议后，我们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以抵御其进攻，同时并指摘中派之游移。自此右派不但攻击我们，甚至利用帝国主义者陷害我们，或联合社会上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和我们对抗，他们承认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还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我们的指摘，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然他们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数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合作

的经验，及本案决定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左列几项新的决定：

（1）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合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斗争的成分。

（2）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国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动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3）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4）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5）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保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6）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我们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或改良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

关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

（一）中国职工运动的过去状况及其现在的趋势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直接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间接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

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但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所以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决定中国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努力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但同时决不忘了自己的独立工作——职工运动。

中国的职工运动一开始便几乎完全在共产党指导之下，那时的斗争虽然还在一种原始状态里；然而一方面已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开始，别方面已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新起的生力军。随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民族运动的进展，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到职工运动。“二七”事变之后，中国职工运动显然已经经过两个时期，如今已到第三时期了。

“二七”以前，中国最初期的职工运动，曾经因欧战期及欧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势力稍稍减弱而取得一种初时的高潮的形势。二七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在中国北部得势才很明显地很强暴地压迫职工运动，几乎消灭所有公开的工会；同时欧战后的世界经济恐慌流人中国（尤其是纺织业）使本来已是供过于求的中国工人，几乎取纯粹的退守态度，就是南方的职工运动也几乎完全依附民族运动。——这是二七以后的第一时期。（一九二三年二七以后，一九二四年二月第一次铁路代表大会以前）

当直系军阀尚能维持均势而江浙工业勉强恢复经济上的稳定状态的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大约表面上只有局部的变化，北方铁路工人，曾经在军阀高压之下秘密进行全国的联合，——可是这种尝试，只能勉强维系各路路工领袖分子之间的关系，工会组织只有山东胶济铁路出现一次，然而不久公开的活动仍旧被禁止了。并且接着五月间京汉路又受军阀的第二次重大打击（铁路总工会及汉口职工运动的重要职员被捕）；同时，湖南水口山矿工俱乐部也被军阀摧残了。上海方面丝厂工人，纺织工人，烟业工人，以及长江一带的手工业工人，曾经屡起屡仆地开始斗争，亦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束缚，还没有巩固职工运动的基础。可是，南方的职工运动却在这一时期有相当的发展。——原来民族运动的国民党——属于英美直系压迫之下，屡试其纯粹军事行动而不成——开始倾向于求劳动群众的赞助，广东方面的职工运动，很得了些公开的发展机会（沙面罢工等）国民党的改组，不但影响南方的职工运动，并且上述的北部铁路工人及江浙工业工人的运动，也和它有些关系。不但如此，国民党已经开始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合作，——素受国民党影响的海员工会，便得公开的参加世界运输工人会议，加入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结合。职工运动在这一时期，确有由退守的地位渐进于进取的趋势。——这是二七以后的第二个时期。

（一九二四年二月以后，十月北京政变以前）

总之，这两期的情势，便是在二七严重的打击之后，工人阶级力求反守为攻的趋势。一方面，军阀、帝国主义者中间的矛盾冲突，别方面民族解放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实际上的结合。

虽然如此，民族运动既然因为工人阶级的参加而大增其革命性，帝国主义及军阀便格外要扑灭职工运动；高压的手段和强暴的政策便也日益厉害起来（广东的商团，上海的外国政府，北方的直系军阀）。再则，民族运动的进展，亦就一部分是中国经济里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认识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也就竭力想利用职工运动，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民族运动的附属品；更有那反动的竟要使他成为官僚军阀的工具（国民党的右派在各地都勾结各种派别的“工贼”以抵制纯粹的阶级斗争派的共产

党）。二七以后的职工运动，一方面遇着外部的更厉害的镇压政策，别方面发现内部的专想利用工人阶级的“工贼”，这是一种新现象，它的发现和民族运动的进展很有关系，——直接的是资产阶级奸细破坏职工运动，间接的是帝国主义及军阀减弱民族运动中的革命力量。

北京政变之后，职工运动又有开始一新时期的可能。直系军阀势力衰败后，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国民党想利用的军事势力，所谓国民军，可以说已经侵入北方。因此，政局略有左倾的现象，——国民会议的召集，临时政府也不能不声言赞成，并且有公布劳动法的拟认。而且全国国民会议的高潮里，国民党以及工人阶级自己都要求工会参加讨论国事的会议。所以至少在国民军领域内可以公开组织工会，便是其他地方，也可以有公开工会的可能。可是这期职工运动公开的可能愈多，工人势力澎涨的机会愈多，帝国主义的力谋摧残也愈急，军阀及资产阶级奸细（“工贼”）的力谋破坏或利用的方式也愈复杂。——这是最近——“二七”后第三时期的职工运动大概的趋势。

（二）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之关系

照上述的职工运动过去状况及现在趋势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而且实行上也在于能适应民族运动进展中职工运动易于发展，同时亦易于受民族主义者之利用的情形，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进展，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

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进行职工运动，往往容易混乱阶级的观点而发生种种弊病。去年五月共产党扩大中央会议以前，职工运动差不多与民族运动混在一起，有些地方职工运动完全拿到国民党，而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由此所发生的结果，一方面破坏了自己阶级的独立工作，别方面因此发现少数工人（即加入国民党者）之官僚化。同时共产党在职工运动的原始时期，本来只作经过少数特殊工人以组织工会的工作，到了和国民党接触，往往以少数特殊工人的接洽而使职工运动方面只是将就国民党的政策，而真正的工人群众便不免对共产党员发生怀疑。因此在民族革命运动时期，尤其是与国民党合作时期，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之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而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

（2）如在国民党中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起见，到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必须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不过国民党组织尚未达到的工人区域内，非必要时，不必急急为国民党组织党部。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危险，还不在于工人加入国民党，却在于共产党在真正工人群众中没有势力及没有独立的职工运动。所以在此等区域里应当以切实组织工会及阶级的为第一要务。但是遇着国民党来着手组织时，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格外加紧我们在工人群众里的工作，竖立我们的势力，另一方面还要将低层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党部，以免国民党联络少数上层工人，欺骗工人群众。

（3）至于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领

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并须组织工厂小组（或工会小组），取得群众信仰以备彻底改组这种工会。尤其在工人与企业家发生经济冲突时，我们应利用此种冲突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指出国民党的本性，使之趋向于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4）民族革命运动的时期中进行职工运动，须普遍地防止官僚化，机会主义化和工团主义的左倾的幼稚病。

民族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各有其出发点，我们应向工人群众明白解释。所以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民族革命应根据工人阶级自身的具体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决不应笼统地抽象地宣传三民主义或孙中山个人。

（三）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

民族革命运动时期中职工运动里，尤其在现时工会有公开的可能的时期，不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非常注意，便是普通的工会里也容易发现各种反动派：军阀官僚的奸细、工头等，——国民党右派现在有集中这些反共产派于自己之手的阴谋。反动派在国民党有政权的地方往往受国民党的军阀官僚的利用，假借官僚的政权，行些市惠政策而蒙蔽群众，把持工会；他们竭力排斥共产党，往往因此而有分裂工会的倾向（如利用同乡邦口等观念或组织）。我们的策略应当：1、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尤其是要使群众能自动的来力争，勿使群众觉着工会的恢复完全是国民党或所谓“进步的”军阀的恩惠；在反动之下的地方，公开工会的宣传，也同样要努力进行。总之工人阶级初步的政治权利——群众的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的要求，我们应当认为现时极须提出的口号。2、主张工会的统一——我们决不在已有派别有群众的工会之处分立同样的共产派工会，而且要加入这种工会工作，为各种具体的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以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仰，而暴露反动派的真相。3、职工运动中我们应该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过高的口号即不但不能真正引起群众自动的斗争，而且容易受反动派的中伤，在失败后藉口归罪于我们。4、工人阶级固然可以赞助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运动，然而不论企业家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私人或国家、进步的或反动的、工人对于他们在经济斗争里是一样的关系——便是劳动对抗资本的形势。所以职工运动遇着那样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我们应当指导工人对他们决不让步地斗争：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斗争的攻势，并且我们应当利用民族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联络，而得步进步地向资本进攻。此种阶级斗争的进行，必然能打倒工会各种反动派，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因为他们在这种地方必然显出他们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真相。

（四）职工运动中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取得指导的地位，但是向来我们的工作，往往偏于技术方面，纯粹的工会书记的工作。

现在必须立即开始切实的党的工作：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宣传上的政治教育在现时已经非常重要，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解释中国政治状况及时局变化的意义（根据本党政治机关报及各该地本党党部的议决案）详细说明国民党及民族革命的意义，国民党右中左三派的性质及其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系；阐明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相互关系及职工运动的阶级性，在每个经济斗争中应该指出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说明工人阶级须有自

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及策略，以具体的事实证明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共产党；浅显地解释工人阶级职工运动的世界性及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社会革命的关系。此等宣传当有经常的机关及计划。至于党的组织，则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可缓的工作，因为工人群众中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应当赶紧组织工厂铁路等处的共产党本部，这些本部负有指导工会工作或组织工厂小组的责任和普遍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工人党员的训练等的工作。我们的职工运动中，必须充分有上述的宣传与工作，才算是共产党的职工运动，而免得工会主义运动的危险。

（五）职工运动的组织问题

自从二七以后职工运动有复兴的趋势时候到如今，虽然中间本党中央扩大会议（去年五月）曾经指出以前组织工会方法的不完善，并且决定从事于“工厂小组”的工作，然而进行的工作极少。现在的时势，职工运动得更多的公开的可能，应当赶紧着手实行工厂小组的工作，庶几能真正深入群众，方才能保证我们对于工会反动派的胜利，而确立我们职工运动的基础。

一切反动形势之下固然可以先组织工人互助会，俱乐部等灰色组织，以进行职工运动，但久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努力以工厂小组的方法去组织工会，现实虽有公开的可能，一切工会仍旧应当由工厂小组组织起来，这种工会方能在群众中有深切的关系及巩固的基础，不致于象以前一样，遇着反动潮流便完全瓦解。

工会小组，在每一工厂或作坊中，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组织起来。一俟发展，就依据工厂工作部分，而分为若干小组。小组人数不定（只限于每一工作部分），倘人数过多不便开会，可组织十人团，而每组可由十人团的代表选举三人组织小组干事会（小组人数少的只要组长一人）。全厂各小组代表大会，为厂中最高机关，先选若干人（人数按情形而定）组织某工厂委员会。再由各厂代表选举若干人组织某企业或地方工会。不过在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小组应绝对的秘密，并且在反动派之工会里边最适用这种组织。

小组为基本组织，这个意义是因为工厂工作部分相同，便有同一的利害的缘故。故小组决非十人团可比，而十人团，又决非基本单位组织，因工厂基本单位是依工作部分而外，决不以人为单位，（如纱厂之细纱间、弹棉间、打包间、磅纱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打铁部……等，这各间各部都是工厂的基本单位）。我们若忽视了以上意义，便容易将十人团认为基本组织，或是将小组当作十人团。

小组为严重压迫之下的一种秘密组织，也就是我们职工运动发展的原动力，他的职能如下：（一）小组是潜伏于一工作部分的组织，不但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是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了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组织；（二）小组是一工作部分的核心，在未有工厂委员会之前，便是工厂的核心，负有组织工厂委员会的责任，随时做广泛的组织工会的宣传和鼓动，并利用工厂压迫工人的事实，引导全厂工人起来反抗，以保中群众而扩大组织；（三）工厂临时发生冲突及其他行动，在未有工厂委员会时，小组应积极参与来指挥全厂工人而奋斗，但在工厂委员会之下的小组，则听委员会之命令而活动；（四）小组在工厂里，引导部分或全厂的工人奋斗，而能得着胜利，在组织上定能有发展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五）工厂小组，

发展到二组以上，就可起来组织工厂委员会。

小组不但是训练工人的单位，也就是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养成所，其训练的方法：

（一）每一星期或两星期开会一次；（二）告诉开会的形式和召集会议的方法，使每个组员能在工厂中开会，或召集其他工人开会，或发生冲突时的临时会；（三）应取本工厂发生的事件为讨论材料，指示他们活动和活动的方法；（四）会议时各组员应有报告，而加以批评或讨论，籍此来训练组员成为健全分子；（五）灌输其常识注意阶级的意义及阶级斗争的方式，最好取浅近的事实作比喻，力避抽象的理论；（六）每次小组会应做含有批评的时事报告，以灌输政治常识，引起他对政治注意。

（六）职工运动的具体计划

在第四次大会后，本党职工运动的重要工作：

（一）产业工人的运动

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最大的产业除了铁路、矿山、海运、纺织外，其余尚在幼稚时代。这类产业工人是本党的基础，我们特别注意的。

铁路工会运动，自遭“二七”失败后，即到了消沉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中只成立了一个铁路总工会，而实际上没有获得真正群众的基础。以及铁路总工会的责任：（一）应派人到各路进行下层组织；（二）应利用各种机会恢复原有之被封各路工会（三）应在未曾组织之沪杭中东南各路速进行组织；（四）各路须努力发展本党的组织而成为各路工会的中心；（五）为使总工会与各路发生密切关系，应不时派人巡行各路并随时指导其工作。

矿工运动在扩大会议后，在山东虽着手进行，但因此处同志运动方法错误，也没多大发展，如唐山、湖北、奉山、山西、湖南几个大矿区均没有进行，固然因经济人才的限制，但本党对于以上数十万产业工人当不能随便放弃，在第四次大会后当着手进行。

海员运动，在香港、上海虽说初步进行，实际也没有深入海员群众中，在以前我们想完全借国民党来整理海员工会的政策，已不成功。现在应一面由我们直接的去活动，活动的方法：（一）在海员工会进行本党的组织，以冀由上层改造海员工会；（二）在海员工会之各帮公所及寄宿舍俱乐部去进行工会小组及党的组织；（三）联络未加入工会及公所之海员组织俱乐部这一类的团体；（四）派人到海船上去活动。以上工作进行到相当程度时，须联络起来改造现在之海员工会，而成为产业的斗争的工会。

纺织工人，在产业上亦占重要地位，单就数量上来看，亦不可忽视本党在最近已渐渐的注重这种工人的组织，并且各地着手进行起来了，各地组织进行到相当程度时，须联络组织全国产业的工会。

（二）各工业区的工作

上海、汉口、天津是新式工厂最发达的区域，我们对于这几区的工人，能完全组织在本党指挥之下，则本党职工运动的基础更稳固了。以后对于这几区职工运动应特别注意。其次青岛、无锡、南通、大连等也应注意。

（三）大城市手工业工人的运动

在工业落后的中国，手工业工人在全国成分上，实占大多数，尤其是各大城市之手工业工人，对于职工运动上更有关系，故以后对于各大城市之手工业工人，我们应以相当的

力量去组织及宣传。

（四）妇女劳动及青年工人

中国虽说是新式工业落后的国家，若就工人中妇女劳动日见增加的趋势看来，差不多和欧洲情形相同。而中国妇女又沉留于宗法社会，在职工运动发展上，实有很大的障碍。我们要解决这种困难，妇女部协同进行。

青年工人在职工运动中，占重要地位。并且是最勇敢而最有革命性的，就以前中国职工运动看来，青年工人差不多处在中心地位，以后不但对于青年工人须特别注意，并在本党指挥之下职工运动里应帮助青年团进行青年工人运动。

（五）合作社

合作社（生产的、消费的、金融的）也是劳动运动中最要紧的工作，他是经济利益之下团结工人，引导工人从事经济的斗争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同志应该在各大企业区及手工业地方努力发展此项运动。我们的合作社工作是立足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应力避小资产阶级改良的观点的熗染，这是要注意的。

为执行以上职工运动的职任起见，我们的党应当有下列的办法：——

一、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导上述的各种运动，并负切实调查运动状况之责任做成统计。

二、每地方之工农部，亦应特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专管职工动运，执行中央工农部的命令，负职工运动责任的地方委员应当和当地各工会里的共产党支部发生经常的联络关系，不仅供给他们以定期出版物，传单等指挥他们，并且要参加支部或小组会，作切实的训练。

三、中国地域很大，中央为明了全国实际情形，随时特派巡行员，并同时便做职工运运的指导员。地方工农部将每日或每次工作的成绩须向中央报告。遇必要时中央得召集全国或某区域之职工运动委员会开职工运动讨论会，审察过去的成绩，并规划以后进行的方法。

四、中央机关报里，职工运动也更占第一等地位。

五、中央工农部及地方工农部应编辑极浅近的各种小册子。

六、各地宣传部应常常注意当地职工运动里的需要。

七、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藉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而筑成统一的工人运动。

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

一、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伟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什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此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一个革命的要素。

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前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

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二、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九〇〇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三、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用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中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借贷之苦。

以上这些办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之分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及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

四、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

此后，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斗争之可能，更因国内客观条件而日多，我们的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既然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我们对于农民，更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便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迫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例如农民协会每为地主阶级勾结右派军阀官吏所压迫

或捣毁，最近广州之市长选举，竟将二十余万负担市政费的市郊农民除外。

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可是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常使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也可发见我们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三）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五、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民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以工农阶级势力影响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工作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会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用而奋斗的党。

在农民运动中，我们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对于怀疑时，我们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何为中派，何为左派，我们并须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策略。这种宜在广东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失败，反共产的鼓动散布于乡村而与大地主结合之后，更为必要。

六、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一）提出口号须切合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须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雇农的特殊利益。（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股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第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第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第三可使国民党的政策左倾，第四国民党政府如不能满足农民这种要求，可使农民对于国民党加以深切地认识。（四）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藉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皆应求国民党与以物质的帮助。

七、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

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

土匪与农民之关系亦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广东已知之事实言之：（一）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以适当的联络；（二）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对于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三）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

八、在南方日益发展之农民运动经验，我们应利用之向各地工作。以后凡本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及我们工会运动所及之地方（如沿铁路、沿矿山，及各大城市四郊等——尤其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各宜利用在广东所得之经验和本决议案之种种方法，尽可能地进行，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

九、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

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

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然而青年运动的发展应由青年自己担负，因为他们自身是青年，有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所以容易了解自身的需要对于青年工作容易发生兴趣。因此在各国青年运动的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这是为青年运动发展起见，青年运动的发展当然是发展共产党指导下的一般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此地我们要明白在许多地方，组织工作是与政治工作常相关连的，所以绝对的固守着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的原则，对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会有妨碍的。总之，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

C·P与S·Y的扩大会议的议决案上都明白决定C·P与S·Y间的关系，但是始终没有实现，而S·Y不免仍是第二党的形式。其原因是因为S·Y始终没有懂得自己的工作是那些，自己团体的性质是怎样，S·Y的团员有许多是超过年龄的而所作的工作是与C·P没有一点分别。在工人运动中是做一般组织工人的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只是用学生做一时的群众政治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代替党作工作；同时C·P也没有懂得在青年运动以外没有指导和帮助S·Y工作而有时且妨害之。这一种现象，非但使青年运动不能发展，并且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处。这是要根本改过。C·P的以后应尽力帮助S·Y工作。如派C·P同志担任S·Y重要工作及帮助S、Y训练或教育团员等。

C·P与S·Y应发生亲密的关系这是很重要而且必须的，但这又不是死条文规定所能达

到。可以达到的方法是要两个中央在实际工作上发生密切的关系。C·P与S·Y之关系的具体办法第四次大会赞成以少年国际关于此项五条之规定为根据，由S·Y第三次大会斟酌规定之。至于S·Y青年化一层也是很重要的。C·P对此也应尽力负责帮助与指导之责。怎样能使S·Y青年化，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S·Y分子的青年化固然可用机械式的办法尽量把超过年龄的团员送入C·P并且以后不再介绍超过年龄的入团。然而中心的问题还在S·Y怎样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S·Y组织。

目前S·Y的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有三方面：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

一、青年工人运动　一般S·Y同志都知道这是S·Y最重要的工作，S·Y大会与中央亦是同样的主张，然而至今没有一点成绩，是因为对于一切议决案没有懂得以致未能切实进行。所以在S·Y第三次大会对于青年工人运动应有具体的进行方针指示S·Y中央而中央能依照切实去进行。

中国青年工人运动，在一般讲起来，还刚进组织的时期，而主要在宣传的时期。如何我们的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是S·Y，是目前最重要而唯一的问题。

要使我们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我们就须组织俱乐部、学校、……等机关以与青年工人接触而得从事宣传，在无工会或有工会而不受C·P指导的地方，S·Y应利用此种青年机关援助C·P组织工会或获得领导地位。S·Y是代表青年工人的，由这种青年工人机关，拥护青年工人的特殊的经济利益，并在工会内要求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须有同等的地位，并使工会能提出青年工人的特殊的利益，同时又须调查青年工人的状况，以期得到一个明了的观念，再来定更适当的宣传，组织和教育的方针。

平民教育的运动，现在有发达的趋势，这是我们S·Y应当极端注意的。因为这是S·Y与青年工人接触的最好的机关，在这里面S·Y可以对他们宣传并可以增加他们的智识，他们一天一天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尽量吸收青年工人加入S·Y是S·Y最重要的职务。

二、　青年农民运动这种运动目前还是一种调查与宣传的工作，乡村教育是S·Y最要注意的，如何使S·Y学生分子散布到各地乡村学校中去当教师，以与青年农民有接触与宣传的机会。又须极力吸收小学的教师去负这种责任。在已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应利用这种组织做青年农民的宣传并可着手做组织的工夫。S·Y应协助C·P组织农会。

三、学生运动　S·Y的学生运动在过去都是用学生做一种一时的群众政治运动。待政治运动终止之后，学生运动就无形停顿或消灭，所以学生运动的无进步，是由于S·Y大部分同志不明白学生运动之意义与重要，以致学生运动策略多有错误。

学生运动在目前政治运动中，是重要的推动力，所以学生须参加这种群众的政治运动，然而始终这不能算学生运动最重要的目的。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S·Y在学生中的工作应有长期的宣传，根据于他们的状况的宣传，和引导他们为自己利益而奋斗。一时的群众运动是S·Y对学生宣传的最好机会。这样S·Y才能得到学生的拥护，能指导他们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出力，能引导他们做一般的政治活动。

S·Y在各国都自然要做政治活动的，而在中国的状况之下尤其是紧要的，但是最要

注意的是在政治活动中服从C·P的指导，不然，将使运动不能统一进行。

中国S·Y除掉资本制度发展目的S·Y下所担任的职务——在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宣传及青年工人经济奋斗的指导——以外，尚有领导中国一般的被压迫青年的解放运动，这种青年运动是国民革命性的，因为中国目前的解放运动是国民革命性的，而这种青年运动是一般国民运动的一部分。

因为S·Y要指导这种一般的压迫的青年运动，所以S·Y要注意于这班青年的宣传与组织（如青年俱乐部及会社等）。在中国现实已有此种青年团体之成立，如新学生社，非基督教同盟等。在各地这种青年团体发展时及青年运动扩大时，有联合各地青年团体成为一种非政党的全国青年的联合以便指导中国青年运动。所以S·Y的职任，应是在各地组织这种青年团体，并在已成立的青年团体中达到指导的地位，使S·Y在将来联合的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

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

一、本党妇女运动应以下列各项为原则：

1、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

但同时在现在的中国状况中，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

2、我们深知现代妇女所以至于被奴属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同时劳动解放运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系。因此，本党当努力在一般妇女运动中说明此种关系。

3、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宰割。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

二、在中国未解放的妇女，本无经济地位可言，她们的阶级观念更不明了，但是我们在幼稚的中国妇女运动中也可找出她们因家庭经济背景之不同而生出各异的倾向。第一，立足半封建半资产阶级观念上的贵族妇女运动在中国开始得最早，她们大概以女子参政为号召，仅注意于上层妇女运动。我们对她们一方应指出其错误，一方应与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第二，受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中国妇女运动遂亦同样地发生买办阶级化的教会妇女运动。她们的中心思想在建设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所谓幸福小家庭和做一些不彻底的妇女慈善事业。于此，我们应为促醒其觉悟计与以严重而诚恳的批评。第三，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自从五四以来在社会上已时起时伏，尤其近一年来在国民党妇女运动中，最近在国民会议运动中，我们更明显地看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特别是女学生有倾向于革命之可能。我们妇女同志除努力参加外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于革命化。第四，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极其幼稚，但三四年来女工风潮发生之多已表示出她们实具有了原始的阶级争斗能力。对于这种运动，我们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以指导。

三、为发展本党妇女运动计应有下列的三项入手办法：

1、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因在宗法社会关系未曾打破的中国，女党员担任妇女运动确有许多便利。从经济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

2、各地党部应即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一日一日地力图发展。

3、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妇女党员关于妇女运动之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

四、本党妇女部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之下，只能秘密存在，然一般妇女运动是公开的运动，固非另有公开团体不能与妇女群众发生直接关系。依现在社会状况，本党妇女部有下列两种团体可以居中活动。

1、国民党妇女，凡国民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本党须设法使女党员在该党妇女部中工作，以便施展本党妇女运动的计划。其由本党党员主持之国民党党部，其妇女部更应受本党指挥。

2、无党的妇女团体之组织有党派关系的妇女团体每易使一般妇女怀疑畏惧，不敢接近，故单靠国民党妇女部做公开的运动还是不够。吸收妇女中进步分子组织无党的妇女团体在客观上十分必要。在最近一月本党利用国民会议运动的机会发起组织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各地颇生影响，许多进步的智识界妇女和女工群众都已集中到这种组织之下。我们应勿失时机地利用现在已成立的和应向各地推广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以进行妇女的独立组织并图达到全国的妇女组织之目的，又在一般的妇女组织运动中，我们更宜注意女学校的组织运动。

至于各地工农妇女运动应与本党各地工农部协商进行。

上海、汉口、天津、山东，为女工集中地，应特别注意女工运动深入女工群众之中，女工运动的入手方法或办平民女校或组织女工俱乐部依当时当地情形决定之。在广东农村妇女运动已有比较的可能。此后凡本党开始农民运动之地方，即宜注意做农村妇女运动的准备工作。

五、为图本党妇女运动宣传工作之发展，本党应有一妇女定期刊物之筹办。此刊物内容应注重妇女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见。此外，在本党各种机关报上亦应为妇女运动作宣传文字和理论解释。在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应注重口头宣传的广大作用。并且在民族运动阶级斗争整个历程中，我们应努力指明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是以妨碍妇女运动与民族运动、劳动运动的密切关联。

妇女运动中最适用的口号应是：“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教育平等”（一切教育机关向女子开放），“男女职业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反对大家庭制度”，“打破奴隶女性的礼教”，“反抗良妻贤母主义的女子教育”，“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权”，“女子应有参政权”，“男女工资平等”，“赞助劳工妇女”，保护母性（生产期前后休息六星期不扣薪资）”。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

（一）

第四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

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

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距。固然，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尤其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和鼓吹，《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党报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大会后竟因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决议文的稍欠明了，同时复为防止党中左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同时左倾的幼稚观念也遂因右倾的扩大而存在。中间虽经一九二四年扩大中央会议之纠正，但实际上在党内在党外毕竟没有做多少宣传与解释的工夫，故一般同志对民族革命策略上的认识常常表现其非左倾即右倾的机会主义色彩。这种倾向都是殖民地运动中所最难免的一偏之见，极需要我们努力予以纠正。

今后本党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征——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

（二）

大会审核过去党的宣传工作有下列三要点可以批评

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因此，遂影响到我们党员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常常有批评本党或更有不满意或误解本党政策的奇怪议论发生——这是在《新建设》、《新民国》，《评论之评论》，《觉悟》和《平民》上可以常常看到的。

二、本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如二七工潮后京汉路的工人组织全体瓦解，各处工会运动中我们党的基础极其微小是可以此证明的。即在（安）源，我们工友党员固不在少数，但无产阶级的文化在群众中的实施是在最近数月才进行。

三、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我们党员常以只能得其同情的错误观念，很少于注意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致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中间尚很少发生影响。其实，殖民地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

（三）

根据上述的缺陷，大会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今特具体地规定下列诸办法：

一、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

中央宣传部下应有一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

二、《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应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三、在我们党的力量上说，现实尚不能发行许多定期刊物，故集中我们力量办《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以扩大我们宣传范围，实为我们目前急要之图。

四、中国工人应成为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须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

五、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

六、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

七、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

八、党的支部是我们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并且在有些支部，应该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

九、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与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应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

十、在职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我们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如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的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然后筹划的方案方不至难于施行。如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经常的或临时的讲习会皆可视各地之需要择宜设办，但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知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在重要工业区于可能时并发行定期刊物。

十一、在知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中央于此，应指挥各地于可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

十二、各地方不应忽略了利用每个群众集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

1、大会一方面大体核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而别一方面又承认该议决案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实行，在中央然，在地方亦然。除开客观的原因（经济与人力之缺乏），军阀之压迫，许多负责任的同志们之被捕，妨碍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之实行外，我们更要指出别一个原因，就是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对于该议决案之实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党员对之未有充分了解。

2、大会以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

传小团体的工作进行鼓动扩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

同时最近在中国之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上和我党对于这个运动之积极的参加，实要求我们与劳动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能以资产阶级代表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之关系日紧一日。因此，引导工农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

3、在南方反对商团奋斗的经验上，在北方的国内战争，在上海工人罢工（居然得到工人的援助，表现出阶级之真正的团结）的经验上，且屡次在南部和中部，各省之佃户和贫农之反对地主和富农的运动上，——在这些经验上，都足证明群众奋斗程度之增高，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并且反对地主和本国的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吾党欲达此目的，则有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这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

4、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在这些地方已具备对于共产主义之工作和对于我们党的组织之前提。因为在这些地方纯粹工业工人的数量很多，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

5、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办事人员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由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

6、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大会以为下列的二条是必要的：

一、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二、现在有些地方吸收党员的方法，如广东有使之经过十人团，各地有始之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入党，实与吾党之组织原则相违背，应即更改，因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

7、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8、大会指出中央对于指导地方组织之不力，所以特别在组织问题方面，认为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部，应当使之适合于每一时的实际要求之原则上面。

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大会修改扩大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为：

“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书记兼宣传部，第二人担任组织部，组织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担任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之兼职得互换之）。为增进每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组织各种委员会”。

9、我们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之机关。无论在党的支部内，工农群众内，或一般革命分子的组织内，这传布印刷品之工作都

很重要。必须籍着传布印刷品的方法，使我们与已加入职工会、互助会、俱乐部、……的工人之关系密切。我们的印刷品，应当经常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在各地各省传布印刷品机关之设立，无论该地有我们的组织与否，这的确是给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籍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更为接近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一九二五年一月）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钢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支部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遇必要时，得由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其参加地方大会，但无表决权）只有发言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四条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地方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反时，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二章 组 织

第五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讯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如各支部所在地尚无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

第六条 一地方有三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二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七条 各区有二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之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

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举选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支部干事或书记任期三个月，区及地方委员支部干事或书记辞职时，须得上级机关之许可。

第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

第十一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 议

第十二条 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若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支部书记或干事联席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各代表表决权以其所代表人数计算。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

第十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或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三分之一之区代表全党三分之一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百人以上者得派二人，二百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百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出席。

第十五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七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

第四章 纪 律

第十八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

最高机关。

第十九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服从之。

第二十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一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会议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二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支部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党纲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四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产阶级之国家的政务官。

第二十五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六条 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

第二十七条 凡党员有犯下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和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

（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不守纪律经各级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八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下各项：

（一）党费　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但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地方斟酌情形核减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上至一百元者缴百分之五；在一百元以上至二百元者缴百分之十；二百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S·Y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九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十二日）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这是偶然的事么？不是的。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呵！

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欧美各国被压迫阶级，不是常常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杀么？我们中〔华〕民族的被屠杀亦非始于今日呵，自鸦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时期之第一页呵！

年来全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之普遍的觉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侵掠家的杀机。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工农阶级势力之形成，更坚决了各强国的强盗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阶级）对于中国的铁血镇压政策。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重新表示它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隶，不准中国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役”与“铁血”的两种惨境中有个选择！

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掠中国和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如英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如日本）。这次上海事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以及青岛纱厂工人积极的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向学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残杀。美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的队伍之日，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一样的造谣，诬指这次运动为苏俄和共产党所主使，声言美国在华之三十余艘军舰将全部或大部分调向上海厮杀。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狡猾也摆在我们面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努力企图将此次事变的目标移嫁于英国，而德国驻沪领事亦向学生表示一种假仁假义的态度。

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镇压政策。所以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

主要目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决不能由惩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争斗。这争斗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惩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条件：第一、这争斗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争斗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

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争斗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织组，成功各阶级的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力。

中国共产党请全国愤激的反抗帝国主义之屠杀的人民，注意四件事：

第一、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依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段张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卖国媚外是其特长；我们虽不必拒绝政府的交涉，却不可相信并依赖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

第二、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外国大资本家大商业家大银行家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主人，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帝国主义对付我们只有奴隶地位与铁血政策，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有我们屈服他们或他们屈服我们之两条路。与其认贼为父，敷衍面子以了事，毋宁干脆的斗争、干脆的失败之光荣。

第三、在这如火如荼的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这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

第四、须谨防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第一是用种种方法捏造苏俄和共产党主使的谣言；第二是离间商界与工人学生的一致，并企图和缓商界领袖使与商人群众分离。

中国共产党敢告全国人民不要受帝国主义的暗示与欺骗。这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大运动，各阶级各党派都应当积极的参加积极的鼓动或主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党，工农阶级既不是冷血动物，又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乃是帝国主义之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中国共产党那有不参加运动的道理？假设这次运动真如帝国主义机关报之所说——是共产党所鼓动的，那末这不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前，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的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

压迫民族而奋斗。

苏俄亦然。假如帝国主义机关报所说苏俄鼓动是真的，那末不仅不足使各阶级民众畏避苏俄停止运动，反而要使他们证实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是被压迫民族唯一的挚友；挚友的帮助，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都要大大增加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与勇气。只可惜苏俄的力量现在还不能助中国民族一举打倒帝国主义，使他从野蛮残暴的列强中解放出来。然而中国全国民众正殷殷的望着苏俄及其领导的各强国无产阶级有帮助中国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呵！

中国共产党敢提醒全国民众的注意：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殒身饮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仆后继的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呵！务望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争斗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铩羽不振之打击呵！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起来，起来：

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

各阶级联合战线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原载《向导》117期，1925年6月6日出版）

中共中央 青年团中央
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此次民族运动已由局部的发展到全国的；并且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已非常明了。全中国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同时奋起，因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之援助及同情，而增其前进的勇气。同时，大商阶级之妥协，绅士学者之“速了运动”“缩小范围”，与夫军阀勾结英日帝国主义者向民众进攻，不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而且简直是要破坏这个运动。所以一方面真为民族利益奋斗的，是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等所谓“下等华人”，别方面背叛民族利益的，是大商绅士学者军阀等所谓高等华人。下等华人中，犹以“最下等”的工人为主力军，是以各处运动都以罢工为最后可靠的武器。高等华人中，犹以最高等的军阀为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以奉天天津山东上海武汉长沙的民众运动，无不遇着军阀之摧残压抑，有的地方几至于完全停顿或消灭。

当此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的时候，中国内部居然分成两个营垒，——这是现时民族运动里的特性，我们应当特别的注意。

帝国主义者因中国人民的奋起与其本国工人之反对，现时已想用种种狡猾政策，以求保存其在中国之特权及威力。譬如美国，现在主张在中国召集第二次“华盛顿会议”讨论取消领事裁判权，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在华特权比英日较少，英日未必赞成他的提议；他又明明知道他所提议的召集国际会议之先决条件，事实上中国一时不能办到，他不妨用这样口惠而实不至的方法，愚弄中国人心，以遂其垄断在华商业之欲。其实美国如果真是“对中国要求修正不平等条约及收回领事裁判权深表同情”，便应当步武苏俄自动的放弃此等特权，以身作则，为各国倡；何必一定要等什么国际会议？岂不是明知道国际会议结果难测，各国互相牵制，托辞延宕，即使有决议也可以不实行，所以送这一个空口人情的吗？华盛顿会议的决议怎样？议决后的实行又怎么样？我们受过一次骗，不受第二次骗了。中国民众只能信事实，决不能信空言的。不论那一国，如果事实上能放弃在华特权，停止一切侵略行为，中国民众当然承受这种好意，——可是骗人的狡猾政策，中国人民却不能信的！

英日帝国主义呢，很早他们便用武力侵略中国。一切割让的土地、租界、租借的港口（实际上也等于割让），以及其他种种特权，他们无不是以战争威胁等方法劫夺去的，中国因此所受的损失，所死丧的性命正已不计其数了。这次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安东等处的屠杀，不过帝国主义的小试伎俩罢了。尤其是英国，素来总是自称为“文明民族”“文化国家”“基督教的国家”；然而实际上他对于中国的政策里，只有炮弹鸦片流血甚至于

贿买中国官僚等等卑污不堪的手段，——这本是他对于东方的根本政策。随后，日本以及其他各国，亦都学着了他这种“文明的”政策了。

最近英日帝国主义者亦仿佛表面上取和缓态度，实际上都用“以华制华”政策，以高等华人来宰制下等华人，这又是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方法。

日本在欧战时候，对于中国曾经露骨的表现他那“新进的”帝国主义的贪狠；二十一条的要求，已经早成中国民众切骨痛恨的目标。此次上海事件，也正起于日商纱厂在上海与青岛摧残工会打死工人。然而他现在一方面鼓吹日厂事件单独调解，想把一切责任推卸到英国身上去，仿佛他和中国同文同种，极想亲善似的；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都和英国取一致政策；可是这种狡计，中国人民一眼便看透了，也和英外相张伯伦答复工党议员的演说词一样的。张伯伦的演说，虽然竭尽他那造谣诡辩的长技，但始终不能掩盖英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至于“赤化”“过激”“苏俄阴谋”等类的谣言诬蔑，也决不能骗着中国民众，——不论他们造什么假证据，诬告什么苏俄宣传员，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最简单的理由便是：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及压迫，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远在苏俄及“赤化”出世之前！

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从外面侵略压迫中国，同时必定利用军阀，从中国内部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运动，破坏中国。去年秋天的北京政变以前，他们利用吴佩孚做工具。如今他们又挑着了张作霖了。张作霖本来因得日本的援助取得了半个中国，今后又加上英国援助，他以为不难消灭一切政敌，夺有全中国；所以他不踌躇的以武力镇压从奉天到上海的民众爱国运动，出卖祖国，以博得英日帝国主义者之欢心！

凡是奉系军阀所在之地，民众运动最受压迫，如奉天——张作霖的老家里，如天津——张作霖爪牙密布的地方，一切民众运动及平民组织都受压制，到处逮捕拘禁人民。奉军刚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严，要禁止游行集会出版等的自由，军队占据工会机关……这种压迫和专制，并不比帝国主义势力下的租界差别到那里去！

张作霖要执行帝国主义者的命令，他不但要镇压国民运动里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甚至于镇压工人的职业组织——工会；他还要摧残学生与中小商人一般的民众；再则，他并且要毁灭领导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与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国民军。

实际上的情形如此，民族运动的策略，便当依此而定。

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之“速了”“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政府一纸哀求式的改约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

民众已经奋起抗争，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要达到胜利是不得不经过极大的困难。敌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外，还加上国内军阀，尤其是张作霖的力量，还有许多所谓高等华人也要加入中国人民敌人的伙里去；假使我们能联合，能统一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因此，应当有全国集中势力的机关，统一那散处于各地方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

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紧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及农民等各界的联合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可以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的指导，而达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号召民众一致团结，以实力赞助国民党和国民军，同时，必须要极明白的在一致反抗的中国民众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之前并指出下列的要求——这是中国民众奋斗的目的，这应当是国民党和国民军的目的；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民众才能完全积极的参加斗争去力争自己切身的利益，亦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指导者才有实在的民众力量做后盾。这些要求是：

一、宣告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废除

二、解除全国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武装

三、保障平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四、废除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之不平等待遇

五、废止厘金及一切苛税杂捐

六、限定享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逾额之田地颁给贫农及无田地之农民，限定田租之最高额，佃户所出田租须尽量减低并禁止预征钱粮

七、工会之绝对自由；承认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依生活程度规定最低工资，制定保护劳工法

八、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

九、确定全国教育基金

十、召集真正人民之国民会议

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至少须实行这些办法，中国才能得到独立和自由。其速兴起为这些要求而奋斗！亦只有这些办法能保障劳动平民的发展——劳动平民负荷着全部运动的重任，用他们的精力，用他们的血，用他们不断的斗争，筑起自由统一的中国之基础！

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奋斗到底！

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

自由统一的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5年7月10日

（原载《向导》121期，1925年7月16日出版）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

中国工人和学生的血流了不少了。自从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大屠杀之后，中国各地接接连连的屠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中国工人阶级为着争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可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却始终想用屠杀政策压倒这种解放运动。两个半月以来，被杀的受伤的已经有几百几千——上海五卅屠杀之后，汉口广州重庆等处又继续着惨杀，甚至于九龙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被枪毙，他们不过因为不肯替英国人掘战壕，帮英国人预备打广州。

全中国的民众都已经因愤激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却还在预备更厉害的压迫，更残酷的屠杀。最近又有好几次大屠杀。第一是南京和记工人——他们罢工之后和记公司的老板已经答应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这些外国资本家不但悔约不肯履行并且开枪打人，又叫了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第二是青岛的纱厂工人——日资本家直接命令他们的奴才张宗昌枪毙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将工人王伦斩首示众，并且四出拿人，捉去工人四五十。第三是天津的纱厂工人——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轰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英国帝国主义者想用炮火政策镇服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想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贿买卖国军阀和工贼，一面压迫一面破坏，来强迫中国的人民仍旧做他们的驯服的奴隶牛马。他们永不用妄想罢！从此以后我们中国民众，工人学生一定永久不息的奋斗，反抗我们的仇敌。虽然我们的仇敌还在天天遣调海军上陆，天天命令军阀屠杀工人，天天贿买工贼破坏工会；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觉悟，已经奋起斗争，几十万几百万的中国工人，广州上海汉口青岛天津开封等大都市里无产阶级，努力参加斗争的，也正一天天的增加呢！上海的五卅惨案激起汉口广州的工人，汉口广州的屠杀，又激起南京天津的工人……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日千里的发展；当然这种民众的力量同时亦便反抗帝国主义的奴才——张作霖手下的奉系军阀。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处被杀的人，固然已经有几百几千，可是全国各地因此而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人，又何止几百万几千万！

帝国主义者现在还在兴高彩烈，他们的机关报拚命的颂扬李景林，感谢张作霖，他们指使邢士廉——教他照天津李景林的模范镇服上海的工人。

工人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奴才奉系军阀真会照着天津的“模范”来压迫上海的工

人。我们应当及早的预防，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所已经签订的条件本来只是上海交涉员和日本领事的谈判，我们工人是不能满意的——可是他们自己签字的条件，也未必肯诚意的履行，亦许也是帝国主义者诳骗工人的。帝国主义者在南京青岛天津已经屡次悔约，屡次指使军阀压迫——难道在上海他们不会如此吗？我们工人应当准备自己的力量，应当准备对付他们的阴谋。工人应当一致团结，以全力拥护工会，工会组织应当特别严密，使我们团体，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等怎样压迫破坏，始终能够存在而且工人还要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

学生们！努力的继续帮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罢！军阀的压迫和残杀决不会吓退你们，只会使全国的革命运动格外发展。赶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奋斗。

兵士们！不要向工人和学生开枪，他们为全国的解放而奋斗，亦就是为你们的利益而大奋斗。你们赶快组织兵士的革命机关，反对那些使你们变成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现在矿工铁路工人还没有直接加入斗争哩！还有许多地方以工人阶级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加入运动哩！这种准备正在进行，假使全国一致的团结成功，我们的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几千几万倍哩！群众里面的这种力量正在一天天的积聚起来，准备着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决死的斗争。这是很长期的工作，要组织得好，要有耐久的战斗力的，要有统一的政治上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政见是：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然后中国工人和一般民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帝国主义者固然还很利害，他们有兵舰，有飞机，有机关枪，有种种杀人的利器；他们还有军阀，有工贼，有侦探，有种种破坏中国内部的工具。可是中国的民众，并用不着害怕。列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一天天的奋起反抗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中国民众和各国工人的联合，便可以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万岁！

推翻列强帝国主义的强盗！

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

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领袖之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1925年8月18日

（原载《向导》126期，1925年8月23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

（一九二五年九月）

亲爱的上海工友们：

你们所受奉系军阀最近的摧残——封闭了你们的总工会及各业各厂工会，这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幸，并且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不幸，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的工人群众，已经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急先锋。

奉系军阀久已公然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山东，在天津，都为了替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封闭了许多工会，杀了许多工人，现在他们又在北方压迫唐山矿工罢工的工友，在上海压迫你们了！

你们此次被摧残的原因更是复杂：第一、英国帝国主义者看见日厂工人上工，他的势力孤了，更急于要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好叫你们无条件的上工；第二、日厂工人上工后，日本帝国主义要大批的开除工人，恐怕工会领导工人反抗，所以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第三、段政府想在关税会议求外国帝国主义开恩多加点关税，恐怕人民坚持关税自由怒恼了洋大人，所以急于压迫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上海工会是人民团体之最有力最急进的部分，更要解散他以见好于洋大人；第四、江浙战争又日见紧迫，直奉两系军阀都急于各在杭州上海封闭工会，肃清内部的障碍；第五、资产阶级不但嫉视工人阶级，并且向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不顾国家和民族的死活，所以五卅运动以来，全中国的资产阶级都厌恶工人阶级阻碍他们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的道路，尤其是上海自各中国厂罢工以来，纱厂联合会更公然请求军阀压迫工会，总商会也希图破坏现在工人的工会，再由他们出来组织归商会操纵的工会；第六、工团联合会及其变相的工团自治联合会这班工贼们，一方面用暴力打毁总工会及恒丰纱厂工会，威吓小沙渡各工会，一方面向戒严司令部造谣密控总工会，这也是军阀借口摧残工会之重要原因。

这些复杂的原因凑合起来，上海各工会遂至不免于奉系军阀的毒手了！上述六个原因之中，前四个都是外来的压迫，虽然一时能破坏工会这一形式，却不能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或反而使内部的团结更加坚固起来。真正能够破坏工人团结的乃是后二项：工会由商会操纵，这种工会是为资本家利益而存在的，不是为工人利益而存在的，有工会还不如无工会；替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资本家做走狗，破坏工人团结，这本是工贼的职务；工贼破坏工人团结，或者用硬的方法，打毁工会及工人，或者用软的方法，混在工人群众中，造谣诬蔑工人的领袖及最能帮助工人的共产党，使工人孤立无援，又或鼓吹地方主义，拆散工人阶级整个的产业组织，不但使工人不便罢工，并且使每个工厂每个产业的全体工人以籍贯不同而分裂，而竞争，为资本家所利用。

亲爱的上海工友们！你们已经组织成了伟大的力量，你们的工会虽然被封了，军阀们

只能一时封闭你们的工会，不能永久封闭你们的工会，更不能封闭你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只要你们的内部团结不为商会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帝国主义者军阀外面的压迫，都是不足惜的。

现在的中国工人已成了一种社会势力，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压服了；各省都有了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全国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代表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都要实力援助你们。你们已经不是孤立无援的了，不可因工会一时被封而灰心，应该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工人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31期，1925年9月25日出版）

上海总工会告全体工友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

工友们！我们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真是到了极点；土地被他占去了，银钱被他抢去了。上海本是我们中国的上海，但是住在上海的人，都要受外国巡捕房的管辖，那么我们上海的人，便都成为亡国奴了！尤其是我们工人，更是苦不堪言！

我们的汗血，被他们剥削去了！

我们的身体，遭他们的打骂侮辱！

红头阿三，更是他们残杀我们的刽子手！

我们工人被他们逼迫死的，殴打死的，汽车压死，那一天没有？那一处没有？

我们组织工会，要遭他们的压迫禁止。同盟罢工，更要遭他们的摧残！

我们的身体，好象牛马一样！

我们的生命，好象虫蚁一样！

这两天的虐杀惨暴，比豺狼虎豹，还狠毒百倍！

小沙渡纱厂工友，被日本资本家打死了几人，打伤了几十人。

学生讲演，又被巡捕打死了十几人；市民罢市，他们更大施虐杀，打死了五十余人，被伤者数百人！

流血满街，死尸遍地！这种杀人的强盗，应该赶快起来反对他，打倒他！

从六月二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

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工友们！起来呀！罢工呀！

（原载1925年6月4日上海《热血日报》。转录自《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1958年9月工人出版社出版）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五卅"惨变以来，我工商学各界，不惜罢工、罢市、罢课；而甘掷此巨大之大牺牲，决非盲目之排外，盖深知其与上海市民之生存及中华民族之独立，均有重大之关系。今兹本会联合各界人士，郑重商定，必须对方切实履行：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巡捕、商团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各校之原状，认为有谈判之诚意。至于解决此案之正途，本会认为必须履行之条件（条件附后）。本会确认惨案之发生，一由于治外法权之存在，使无故被杀工人与被捕学生，均不得诉之公道。一由于上海市民权之丧失，致工部局有压制华人印刷附律第三案之提议。是以本会严重宣示，治外法权之取消与租界市政之收回，实为本会抗争之重心。本会确认"五卅"惨案之交涉，如不依本会所提条件为解决之方针，则我上海华人所受压抑，必将更甚；惨剧之发生，必更繁烈。本会为上海市民之生存权利，为中华民族之荣幸独立，不得不联合全埠市民，一致誓死力争，不达目的，决不中止，谨此宣言。

一　先决条件

工部局应即速履行以下四事，表示希望解决此案之诚意。

一、宣布取消戒严令；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二　正式条件

一、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赔偿。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优待工人。外人所设立各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七、分配高级巡捕。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中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收回会审公廨。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外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观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刑事案：（子）外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中国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以上十三条，由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议决，如有修改，须得工商学联合会之同意。

上　海　总　工　会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会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
上　海　学　生　联　合　会

（原载《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1925年7月出版）

上海总工会致各工会通告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月十九日总工会代表大会，各工会都有全权代表出席，一致议决，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会决不上工，坚持到底，非达到完满目的不止；如有破坏大局私自上工者，一致对付之。明天（初六日）商界要开市了，我们工界决不要受商界开市的影响，要表示我们工界的热忱毅力。反对外国屠杀，我们工人是最勇敢的奋斗者；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工人不惜牺牲一切，始终为民族利益的忠实保卫者。工友们！我们现在有全国人民做我们的后盾，又有全世界工人做我们的后盾，我们如果能够坚持，一定能得到胜利。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受商界开市的影响，要下定决心，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上。工友们须坚持！坚持！决不上工！决不上工！

上海总工会

（原载《工人之路》12号，1925年9月5日出版）

上海总工会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此次罢工之目标，已于屡次宣言、通电中详言之矣！两月以来之一切经过，也为人所共见共闻。惟我二十万工人在此长期奋斗苦战之中，种种痛苦，或为国人所未详悉，故不得不约略陈之。

夫一切运动能否胜利，首在动作言论之能否自由。两月以来外人无端破坏，而在工人方面为爱国义愤所驱使，间使有劝导破坏罢工者，则受当局之严重处罚；外人可任意造谣中伤，流言挑拨，甚至假造证据，捏造函件，强我国当局以制我，而工人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反受严厉之约束。凡此种种，言之实堪痛心疾首。即各界人士，对于

工人行动，也有偏见者，故不免不蒙谅解而遭责难之处。国外工界，本有雄厚之组织，自逼其本国政府速行让步，但其政府、党则宣传中国工人所要求者，并非改良待遇，却为驱逐外人之“排外主义”，遂使本国工人也不得为有力之援助。惟工人罢工，即本牺牲一家之生计而奋斗，所谓破釜沉舟、死中求生者是也。自罢工伊始，即屡次宣言苟利国家，虽肝脑涂地也义无再顾，尤复全体再三决议，不达目的誓不上工，处此长期之困苦万状，其所以未挺而走险者，赖有工会之约束耳。我工人自始至终即与全国各界一致奋斗，一致坚持，又受国人踊跃之救助，为国人殷殷之属望，而工人也自知抵制外力制胜外交者，专赖工人罢工之坚持；然工人等默察国内外之大势，与夫二月来奋斗之经验，既无有力之外交，又乏武力之后盾，徒以赤手空拳，与强敌相持，外人目前将乘我之疲惫而益进逼，故窃谓工人既以二月之罢工表示其决心及团结之毅力于前，当更有以继续其战斗以竟解放中国之全功于后。惟在此长期之斗争中，自不能不审定步骤，先谋部分之解决。爰提出最低条件如左：

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

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

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五、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百分之五十；

七、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工资一律发给大洋；

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

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以上九条如能有满意之达到，并且华界、租界一律解严，使上列条件可以和平履行，则当一律复工，否则一息尚存，也须背城借一。所有前次工商学界提出之条件，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要求，当力促南北政府共同严重交涉，工人愿为后盾，而一切为国家争独立自由之运动，我全体工人也必始终与国人共同奋斗，虽惨死于强权之手，也义无所惜也。谨此宣言。

（原载1925年8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

〔附〕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

超 麟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四日

截至六月四日为止，上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商民及其他市民陆续被帝国主义巡捕、商团军、陆战队屠杀，在帝国主义手枪、步枪、机关枪之下死伤的，已达一二百人之多。这一次巨大的牺牲当然要发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因此次大屠杀而起的反抗运动，无论结果如何，但一定都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此次运动已经成了普遍全中国的运动，且将引起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援助了；这就是说：此次的运动，不仅有中国全民族的意义，而且是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故革命的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首先应该明白地分析这次屠杀的真意义和因屠杀而引起的反抗运动之趋向。为这目的，所以我来略述此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因由及其经过。

（一） 此次屠杀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此次惨剧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屠杀。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成对抗形势，这种对抗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展而加紧，到最近遂达到了压迫者直接屠杀被压迫者的局势，遂达到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短兵相接的阵形。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是必然的，因侵略而引起殖民地之反抗也是必然的，反抗而至于帝国主义施行屠杀政策，又何尝不是必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起初只遇见最受压迫的阶级之部分的反抗。一直到世界大战之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压迫中国，一方面帝国主义崩溃征兆日益显然，中国民众自最受压迫的阶级以至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渐次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心理和思想。最近一二年来，反帝国主义的呼声几乎普遍全国各地，而这种反抗虽然还没有积极的表示，但势已非帝国主义惯技如“亲善”“和平”、“正义”“文明”等所能镇压的下了。这便是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之客观的原因。

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之流血的接战可见本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爆发此次屠杀直接的导火线自然也是因帝国主义凶暴压迫而起。自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亲日卖国派安福政府上台，越发在中国横行无忌。二月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已先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发难反抗，举行一次五万人的大罢工，接着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也罢工反抗。对中国工人阶级这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已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职员开枪杀死工人顾正红并杀伤十多人；二十八日，青岛海军陆战队得日本政府命令枪杀工人八人并杀伤拘捕无数。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被租界巡捕捕去施文定、谢玉树二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又被捕去韩步先、赵振寰、朱义权、江锦维四人。

被捕六学生定于三十日在帝国主义会审公堂同时开审。这便是上海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直接的动机。但同时，帝国主义还有一种压迫，兼能危害商人等上层阶级：即所谓上

海纳税外人会，要于六月二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反对这四案，亦是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题目及宣传的口号，且能够引起一般市民群众热烈的同情。

在这一日上海全体市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空气之下，为消弭这种空气，为镇压这班"不安分"分子的反抗，列强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决不是一件偶然的意外的事。

（二） 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及其继续工作

三十日。上午各校学生二千余分头出发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事并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自上午起各校学生已被捕房捕去十余人，旋即释出；但到下午讲演的学生愈聚愈众，听众亦愈多，巡捕复开始捕人；至午后三时许，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已拘留一百余学生在内，当时未被捕的学生及听讲的市民见此情形异常愤激，其时适值有一队学生通过其处，听见此事遂参加要求立即释出被捕者。至三时许，聚集捕房门首之群众将近万人，三时三十五分钟，突有一西捕向空放一枪，接着印捕即平放一排枪，华捕向空放一排枪，群众登时大乱四散。这一日计死十三人（截止四日为止），伤重在医院治医者尚有十五人，被捕者五十三人。

三十一日。大雨。学生继续至各马路散传单，讲演。捕房复拘捕学生。老闸捕房已戒严。

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全体罢市，自上午七时起，南京路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极多，发传单者讲演者到处都是。至十时许，所谓万国商团和西捕印捕各临阵备战，先以自来水注射群众，至十时五十分，遂开枪。这日死伤比前更多，状况更惨。二次屠杀后，南京路最繁盛的一段，由新世界起至福建路止，完全陷于战争状态。机关枪、铁甲炮车、马队占据各要害，这一戒严区域内除电车外，其余车辆及行人概不能经过。

二日。屠杀案到处不断地发生。南京路比前更加戒严。上午小沙渡纱厂工人罢工，被日本人协同西捕枪杀四人，都沈〔沉〕尸河底；杨树浦码头工人亦被英人雇打手打伤三人，拘捕数人。帝国主义会审公堂复于是日开审三十日被捕的学生，公堂周围外兵把守异常周密。至下午六时，遂又发生机关枪攻打新世界之事。原因据次日各报所载系有一批"某国人"假装中国学生（能假装中国学生的某国人，自然是日本人无疑了），在新世界门口射死二匹美兵的坐骑，于是如狼似虎帝国主义军队遂用机关枪步枪一齐向新世界射击，炮如连珠，历时约二十分钟之久，死伤数目，至今尚无法可查，但被捕三百余人结果虽释放，尚有二三十人现在已下狱。在新闸桥，又有西印捕携机关枪向闸北保卫团示威，欲拘捕罢工之电车工人等事件。

三日。意美海军陆战队登岸，把守电气、自来水等重要工厂，其他各舰亦陆续到来，或中途被召回沪。新世界下午被商团占领去了。是日上午，杨树浦又发生大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后，杨树浦完全变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学生或工人装束的便打伤或杀死。计三日一天杨树浦死四人，重伤六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是日并有一美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

四日。屠杀仍然继续下去。外舰来上海日见增多，计至四日为止，各国兵舰共有十三艘，其中属于英国的二艘，属于美国的三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日本的三艘，属于其

他国家的还有二艘。陆战队已经登岸的有五百五十名，尚有二千名亦即要登岸。杨树浦西捕复开排枪轰击罢工工人，幸未伤命。美日陆战队有多人带枪入华界捣乱。英国商团和印捕又有数人入华界。尤其难堪的，即四日上午陆战队包围上海大学收没一切文件，驱逐学生出校，腾出为陆战队驻扎。此种暴行到五日后复施行于大夏、同德、南方等几个学校。还有沧州、东亚、大东三大旅馆亦被检查。

（三） 各阶级之反抗运动

三十日大屠杀后之第二日，全上海即已开始罢工、罢课、罢市，截至四日为止，公共租界完全罢市，特别是四日一天，罢工尤其突然高涨，全上海各学校之罢课自无待言了。上海人民八十一年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生活，其仇恨帝国主义自不必说，尤以下层阶级为甚。所以屠杀之后，全埠鼎沸，反帝国主义之潮流普遍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尤其是工人阶级，因为此次屠杀发生的主因是为援助被杀工人而起，所以工人不惜牺牲生命务必达到各业罢工而后已。四日为止罢工总数已有二十万人。三十一日各团体在上海总工会开会时候，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极激昂慷慨请求罢市，并且当场提出日商纱厂工人要求之七条件：（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三）禁止殴打工人，（四）改良工厂卫生，（五）禁止虐待童工和女工，（六）禁用外国巡捕，（七）反对印刷附律。一日即已有数业工人实行罢工。自二日起大部分电车工人停止工作，小沙渡原未罢工各厂，如同与日华内外棉第三第四厂等都罢工，杨树浦祥泰木行等厂工人及大坂码头工人亦相率罢工抵制。三日电车工人差不多完全停工；电话电灯工人亦罢工三分之二以上，只余少数人因被压制不得已而工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二厂工人亦均停工；小沙渡则罢工者已达二十四厂，其中四厂属于华商，余均为日本资本家所开；杨树浦自当日惨案发生后，东方怡和德大豫丰各纱厂工人遂全体罢工，其余亦自动的停止工作。自三日起不但各工厂工人罢工。即在西人机关或住宅服役之西崽亦开始罢工同情于被惨杀的同胞。四日罢工风潮尤其突进。计四日罢工者有康益汉士两洋行华职员，日商绸丝厂工人，苏生洋行、慎昌洋行、葡萄干公司、柯达公司等华职员、英美烟公司及日华纱厂工人，同茂公司、立兴洋行、挪威商办中国五金物品公司、中孚银行华职员、日商伊藤烟公司、公大纱厂工人、美丰银行、大英银行、华比银行华职员、伊文思书局工人、上海总会侍者等。恒丰公司工人亦罢工。

工部局铁工厂工人、电气处职员亦因工部局之残暴，罢工反抗。其他各洋行西崽亦多数罢工。码头小工完全停止工作。印刷工人除商务中华二大印刷厂已罢工外，其他亦多罢工，尤其是西报排字工人之罢工使帝国主义机关难施其巧。西报工人并曾开会游行示威，自五日起上海西报出版异常可怜，甚至文汇报用油印出版者，可见西报之苦况了。四日上午上海总工会特召集各厂代表和少年宣讲团开会，共到五十二个工会，二百余代表；各代表报告各该厂罢工情形与人数。代表报告时俱各慷慨激昂，誓愿坚持到底，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指导者了。

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此次亦极热烈参加。在三十日和一日的被害者当中，不少小商人和店伙。代表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的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其总机关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三十日屠杀之后，各联合会纷纷投函总联合会，愤激地表示愿意牺牲愿意

罢市为学生后盾，总联合会亦屡次派人和学生会接洽。三十一日各团体在上海总商会开会时候，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站在工人和学生一边共同胁迫总商会非罢市不可，并且各马路商店不等至一日，即已纷纷闭门停止营业，这几日的罢市中，无论谁，只要到各马路巡视一过，看见商店外许多标语和旗帜，及店伙运动行人不坐电车之热情，便可知道商人痛恨帝国主义至何程度了。我们于此次运动里看出中国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革命性的表现是很强的，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支极有势力的军队。

上海的大商人阶级此次亦迫得参加运动。我们在一日上海各报记载各团体在总商会决议罢工之经过，很可看出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各阶级的作用了。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首先答应工人和学生的罢市要求，但总商会则须工人和学生及商总联合会的三催四迫才勉强签字答应罢市。三十一日午后各马路商店多已闭门，到一日早晨七时南京路大商家还有开市者，直至流血重演之后，才完全关闭。

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甚至不从总商会决议于全市停业声中，依旧开门营业，只写一封信给工部局轻轻抗议而已，一直至工部局置此抗议信不理及字林西报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后，才于三日起罢市。我们从罢市经过以及这几日来各方调和空气和总商会愿意自居于调人地位之表示看来，不啻明白告诉我们以民族运动中那几种势力比较动摇和妥协的了。

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自然是热烈参加的，首先起来援助工人的是学生，甚至于积极表示不怕牺牲反对“四案”的也是学生出头。受创最重的仍然是学生。现在上海的学校，没有一个不参加这运动，便是向来不做社会活动的圣约翰大学此次也激起义愤，与校长冲突，脱离学校投入此次之风潮，其他的学校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罢工、罢市、罢课还在扩大的形势。帝国主义的态度现在日加强硬。调和只是上层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此运动已普遍全国各大都会了，并且将引起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援助。中国的被压迫民众应该更密切地联合起来。团结便是力量。要认定，我们和帝国主义绝无公理可讲。要认定此次的反抗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革命战争的开始。

（原载《向导》117期，1925年6月6日出版）

〔附〕五卅运动中上海罢工调查

上海总工会

——自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

厂名	国籍	工厂人数	罢工人数	何日起罢工	有工会否
内外棉第三厂	日	一千五百余人	全体	六月一日	有
内外棉第四厂	日	三千余人	全体	六月一日	有
内外棉第五东厂	日	一千四百余人	全体	五月十五日	有
内外棉第五西厂	日	一千四百余人	全体	五月十五日	有

内外棉第七厂	日	一千三百余人	全体	五月十五日	有
内外棉第八厂	日	一千三百余人	全体	五月十五日	有
内外棉第九厂	日	三千余人	全体	六月一日	有
内外棉第十二厂	日	一千五百余人	全体	五月十五日	有
内外棉第十三厂	日	一千五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内外棉第十四厂	日	一千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内外棉第十五厂	日	一千五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日华第三厂	日	三千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日华第四厂	日	三千余人	全体	五月二日	有
小沙渡同兴纱厂	日	二千一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丰川纱厂	日				
上海第一纱厂	日	一千二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上海第一布厂	日	七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上海第二纱厂	日	二千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上海第二布厂	日	一千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上海第三纱厂	日	二千六百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上海第三布厂	日	一千八百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杨树浦同兴纱厂	日	二千六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西华纱厂	日				
东方纱厂	日	三千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东华纱厂	日	三千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浦东日华第一厂	日	二千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浦东日华第二厂	日	二千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裕丰第一纱厂	日	二千余人	全体	六月五日	有
裕丰第二纱厂	日	二千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曹家渡绢丝厂	日	二千六百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上海回丝厂	日	六百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公兴铁厂	日	一百零五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兴发荣铁厂	日	三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江南制革厂	日	一百十七人	全体	六月七日	有
成华玻璃厂	日	一百余人	四十余人	六月七日	
瑞和毛巾厂	日	八十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康泰绒布厂	日	二百余人	全体	六月十日	
芦泽印刷所	日	一百余人	全体	六月六日	
大康纱厂	日	四千余人	半数		有

以上日本厂罢工者三十九处，约六万三千余人。

老公茂纱厂	英	三千余人	全体	六月一日	有
老怡和纱厂	英	七千五百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新怡和纱厂	英	六千五百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浦东大英烟厂	英	万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祥生造船厂	英	二千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瑞熔铁厂	英	千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大英第三烟厂	英	百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洋琴厂	英	三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马灯厂	英	一百三十余人	四十余人	六月一日	有
隆茂花衣厂	英	五百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扬子烟捕房	英				
中国肥皂厂	英	三百八十八人	全体	六月八日	有
怡和洋行	英	三十人	二十七人	六月六日	有
通用洋行	英	四十人	三十八人	六月六日	有
万泰洋行	英	八十人	全体	六月六日	有
葛爽洋行	英	五十人	全体	六月六日	有
祥泰洋行	英	三十人	二十八人	六月六日	有
通信洋行	英	五人	全体	六月六日	有
久胆洋行	英	五人	全体	六月六日	有
华洋德律风公司	英	一千人	七百余人	六月六日	有
美艺木器厂	英	八百余人	全体	六月一日	有
泰昌木器厂	英	一百人		六月二日	
福利木器厂	英	一百余人		六月二日	
汇司木器厂	英	一百余人		六月二日	
崇信纱厂	英				
公共租界电车	英	一千四百人	七百余人	六月二日	有

以上英国厂罢工者二十六处，约三万六千余人。

杨树浦电灯厂	工部局	一千六百八十七人	一千五百余人	六月二日	有
斐伦路电气厂	同	八百三十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扬州路电灯厂	同				
海防路电灯厂	同				
修马路工人	同	一百五十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自来水铜匠间	同	一百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工部局总铁场	同	四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工部局工程处	同	一百余人	全体	六月二日	有

以上工部局罢工者，共八处，约三千六百余人。

海员	英、美、日	一千三百余人		六月八日	有
洋务职员			四千余人	六月四日	有

浦东码头工人		一千四百十八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杨树浦码头工人			六百余人	六月二日	有
太古码头工人			八百余人	六月八日	有
其它码头			三千人	六月八日	
金银业		二千五百余人	二百二十人		
怡和炭厂					
美最时牛皮厂	德	一百余人	全体	六月四日	有
西装成衣匠			二百余人		
陈顺兴水木工厂			四百余人		
美伦制蛋厂		一千余人	全体		
宰牛公司		一百余人	全体		
安迪生电气公司					
大有榨油厂		二千余人	全体		
慎昌洋行	美	六十余人	全体	六月三日	有
罗森法洋行	丹	八十人	全体	六月七日	有
汉连洋行	德	二十五人	全体	六月六日	有
西门子洋行	德	八十人	全体	六月六日	有
通信洋行	英	十人	全体	六月六日	有
汽车行电匠			二百余人		有
电气升降机匠			一百二十余人		
各电料行工人			五百余人		有
栈房工人			五百余人		
美亚制绸厂					有
茶居工人			一百十三人		有
洗衣房工人		一千五百余人	全体		
饭店职工			二千余人		
西崽			一千余人		
奶妈					
驳船工人			二千余人		
西文排字工人			五百余人		有
日文排字工人			二百余人		
中文排字工人			四百余人		有

以上各种工人罢工者，凡三十四处，共二万七千余人。

以上外国厂罢工者，总计一百零七处，共十三万余人。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六月）

秋　白

（一）

最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异常的惊惧；尤其是去年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党势力的向北部伸张，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有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之趋势。如北方铁路工人恢复工会的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青岛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北京印刷工人及汉口烟厂工人的奋起，以至于五月间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及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之，从一九二五年年初起直到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逐步的斗争，树立总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新势力，当然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反攻的高压政策；他们知道这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怕的力量，决不能放任他尽量的发展。五卅以前帝国主义者早已逐步的防范，利用他们的种种工具，如工贼买办军阀官僚等，施以压迫。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国民革命的势力，尤其是他的先锋无产阶级；别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现在占有政治权力的日本——相互之间的斗争，一天一天的激烈起来，直到五月卅日而大大的爆发。

我们应当知道，这五卅屠杀案，不但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世界革命运动，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一直在动摇崩溃的过程中，直到最近方才有略略稳定的趋势，这就因为列强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本国对无产阶级进攻不能得着象心如意的胜利，可是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近两年来，却能用着全力来经营。对于中国呢，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工业资本，进取得最为厉害。譬如这次世界纱业恐慌的期间，日本资本主义，首先便对于上海青岛的中国工人进攻。他们以为中国工人最落后，最没有组织，纱业里减少生产成本的计画〔划〕，可以从这里实行起。原来英日两国，都已在中国设有多数工厂，尤其是纱厂；而日本又靠着有亲日派的中国政府，可以畅所欲为。这些资本家以巨大的投资和残酷的剥削，来和中国资产阶级竞争，已经并吞了不少中国纱厂，这次纱业恐慌，他们以为中国小资本家禁不起，他们可以一方面裁减工人，换用女工，以减低生产成本，一方面挤轧中国纱业，乘机投巨资来收买。殊不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已经觉悟自己的团结力，——在上海及青岛两处居然举行很大的罢工，给日本资本家以重大的打击，虽然上海青岛的工人都没

有争到经济上的胜利（青岛第一次罢工，只加了一分钱一天的工资，非常有限的），然而工人的团结力已经表现出来，工会已经得了事实上的承认——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痛恨的。不但如此，这两地的第一次纱厂罢工，都还有一种政治的民族的斗争的性质：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引起中国一般社会有意无意的同情，中国商会学生会等大半都趁此鼓起一种排日的运动。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国民革命运动，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极力造谣，说这是赤化，这是中国人排外的义和团的精神之复活，一面想尽种种方法与工会挑衅，要想扑灭他；青岛和上海两处，他们用同样的方法——闭厂罢业以拒绝“不安分的”工人，抵死不承认工会，以引起工人中的扰动。他们在青岛借助于张宗昌温树德的兵力，残杀工人（死伤二三十，被逮七八十人，被堵在阴沟死者尚不计其数），并且停闭工厂；他们要摧残有组织的工人，所以趁此纱业恐慌期间，准备停歇生产若干时间后，再另招“驯服的”不敢要工会的工人。他们在上海也是如此扰动工人之后，就停闭工厂，工人要求发给薪资的时候，资本家竟开枪轰击，杀死工人顾正红，伤无数；他们更与英美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所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合作，以摧残这些工会。可是这决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斗争；工会运动，他们固然怕，而援助工会的学生，一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他们尤其怕。并且这已不仅是日本一国，而是各国帝国主义者所共同敌视的运动。这种运动随着他们的压迫而起于上海。所以日本在青岛虽然能指使军阀完全扑灭工会，而禁止中国一般人民的反抗；在上海他却不能了。

上海自从顾正红被日资本家亲自打杀之后，一般的学生及小商人的群众，早已跃跃欲试的愤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同时，工部局不但帮助日资本家，压迫罢工工人，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又提出印刷附律码头捐等，于上海的纳税外人会议，想在上海更进一步的统治中国人。这两件事：日资本家及工部局摧残工会与纳税外人想剥夺上海中国市民的自由权——凑合在一处，于是把斗争的阵势扩大了。当上海学生为顾正红被杀，工会被摧残，并且反对印刷附律码头捐，而出发演讲时候——列强帝国主义者便大自惊扰起来。他们不想一想：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怎样扩大到各国帝国主义者共同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抗，共同压迫一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之自由；他们却只看见中国人民一致的从排日而进于排外，从阶级斗争扩大而为民族斗争，“奴隶都想要自由了”，他们便毅然决然施行屠杀政策。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响了，中国学生工人市民的血流了，帝国主义想用这枪声血泪巩固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统治！

（二）

虽然，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了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上海五月卅日南京路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英美日意法等国的军舰都开来了，海军陆战队都上岸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武装“打手”——所谓上海万国义勇队都出巡了；上海市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西捕水兵义勇队，通衢大衢都放着机关枪大炮铁甲汽车。接着汉口九江镇江天津安东，凡是列强有驻军的地方，无处不实行这屠杀政策和炮舰

政策。——各地死者百余人，伤的无数，被殴辱的更不计其数。越界捕人，强占学校等的寇盗行为，更是时有所闻。这种强暴的政策，帝国主义以为可以镇压住中国民众的反抗，可是事实上适得其反，上海市民立刻便全体罢市罢工，没有三天，反抗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城市的示威游行及市民大会一致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各埠租界上外人工厂及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已经继续起来，实行罢工反抗，天津汉口广州的工人已经发动。“假使五月卅日以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那么，五月卅日以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我们听说上海街头巷口无一处没有不反对外人的招贴，无一处不唱反对外人侵略的歌谣，——便可以知道了。

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

可是这总的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立刻发现出内部的分化，这是不可免的。因为中国在列强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等受某一帝国主义者的驱使；有许多妥协软化的分子，不敢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却只想求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出来主持公道；亦有大多数的平民，小商人和劳动者，认清这种屠杀政策出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合谋，所以坚决的主张，要从此开始中国民众的大组织，实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有这种分化，所以在这次国民革命开始急进的过程里，可以看出：一、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二、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三、反抗运动的范围，都有不同的主张。

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纯粹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或者替日本反对英国人，替英国反对日本人，表面上似乎投合一部分的思想潮流；实际上他们完全是反动而压迫民众的：譬如英国的萧耀南派兵保护外侨，出告示说“排外的格杀勿论”，禁止民众运动。他并且已经嫌英国人杀得不痛快，又帮着斩了七个“过激派”的头。日本的张宗昌严禁学生市民提及青岛的事，却也不得不准人民对沪案表同情。这种人我们只能当他就是帝国主义者，一致的反对。至于其余两部分同在反抗运动里的人，他们的主张很值得分析一下。

反抗五卅屠杀案的各地各界的要求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最正当和最彻底的主张，便是要求：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

三、收回海关及盐政管理权

四、收回领事裁判权

五、永久撤退驻华的一切外人的武装势力

六、中国人民之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见一派的主张，便是只要求：

一、收回上海的会审公堂

二、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的参政权

三、停止越界筑路，收回租界外之工部局马路

四、道歉、惩凶、赔偿、罢业者不扣薪等

前一种的要求是革命派的，后一种，是妥协派的。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见妥协派的要求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争回外人在不平等条约以外所侵夺的东西，再则这种要求只是代表少数上海富商的利益——纳税人才有参政权，而且不敢剥夺外人在中国领土内的

干预市政权；三则争一个空面子，速图了结上海五卅事件。革命派的要求呢，却是着眼在民族的利益，根本要中国的解放独立，脱离殖民地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自己的实业才能发达，中国平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即使说不能以罢市罢工的手段达到，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中国可以立刻提议召集国际会议，重新审定一切条约。如果中国现在的政府不能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全国民众正在奋起，很可以自动的组织工商学农各界，推翻军阀的政府，而以革命政府来实行这种使命。再让一步说，我们即使现时还没有这种实力，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力争中国平民的政治自由，力争撤退外国驻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使平民有组织自己力量的自由，以为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准备，以进行国民革命的运动。如今上海总商会的主张就是那妥协派的要求；而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民的主张，却是革命派的。尤其是上海的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如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很明显的要求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这种革命派的要求，实在代表全民族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因为帝国主义暴行的代价，决不是道歉赔偿等所能了事——平民群众在这次斗争再不能取得这最小限度的自由，日后帝国主义的屠杀还要肆无忌惮，而中国方面却绝没有组织团结的力量去抵抗。

至于反帝国主义的战线问题，亦有妥协派和革命派的分别。妥协派以为我们若只对一两国进攻，我们的力量还够，如果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合力压迫，说我们是排外，我们便抵拒不了。殊不知道：（一）现时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利益互相冲突，此次事变中，决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二）如果我们窍定名实反抗公共租界的各国，他们之间，自然互相推诿，各求卸责而卖好，而后我们的交涉能得着胜算，否则我们自己先唱甚么“中美亲善”，美国水兵杀了人，他们的领事却反过来问：为什么在美国人那里做事的也罢起工来；（三）此次案件，事实上是各国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以求巩固其统治权，我们正应当指明出来，使民众一致起来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假使那一国果真要“亲善”，他便应当抛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派的主张，亦并不是一定要扩张战线，反对一切外国人，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应当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无产阶级联合，要求他们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他们主张缩短战线，不但只反对英国日本等，并且只反对英国日本等的军阀财阀。妥协派的缩短战线政策，却是向民众掩没了法国派军舰，美国水兵杀人等的事实，去说中法亲善或中美亲善，希图美法主持公道。这结果“公道”是没有人主持的；民众却受他们蒙蔽了！所以妥协派只想速了，如梁启超江亢虎等，竟要蒙蔽民众，把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变成对英对日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甚至于变成反对工部局巡捕杀人的简单口号，这简直是代帝国主义想法，替他们巩固这种统治制度，把群众的目光只放到杀人问题上去，仿佛只要帝国主义不杀人，我们便无论甚么，都愿意容忍的。至于现在有一派人甚至于只主张反对英国而忘了日本，那就太明显了！——日本是这次事件的正凶，是摧残工会，摧残中国平民自由的首犯，如何可以放过，除非是受日本人及段政府的暗示——想把一切罪名脱卸在英国人身上，让日本仍旧实行他的压迫工会政策！

其次，关于反抗运动的范围，妥协派现在已经尽着叫——“这是地方问题，汉口上海各自解决！”事实上枪杀市民和压迫工人是同样的形势，而且汉口是为援助上海而起的。全国的民众已经本能的自觉的起来一致奋斗，应当联合起来实行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运

动。正因为帝国主义在汉口安东等地方，到处实行屠杀政策，我们更可以提出总解决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然而妥协派却只是为帝国主义者想法，务求速了，就地解决。

总之，妥协派的主张：一、是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牺牲平民的自由；二、是缩短战线，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三、是缩小范围，只求就地解决。同时，他们尽着争一个表面上的妥协和面子，使五卅大屠杀案早日了结，只求"平平民愤"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继长增高的起来，他们违背民众利益，已经显然，而间接的帮助帝国主义者，蒙蔽民众的民族意识，消弥革命潮流的"功绩"也就不小了。五卅大屠杀案之后，国民革命是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政策不能镇压他，而妥协派的国民政策却想破坏他。妥协和革命派的分别，正在于：妥协派，看见国民革命开始，赶紧想法抑遏民众的自由，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这革命运动的进行；革命派呢？力争平民自由的保障，揭发各国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国的真相，联合全国奋起的民众，一致向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攻击，以发展这革命运动，而求达根本解放中国的目的。

妥协派虽然表面上似乎还站在人民一方面，实际上简直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因为中国民族假使不能觉悟革命的必要，假使只争着租界上些小的参政权，承认外人的统治，那么，以后的被屠杀，还多着呢。我们不能立刻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要紧；最可怕的，是我们忘记自己的目的，故意欺骗民众，阻止民众进行革命运动。革命派的要求和主张，才是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引导革命运动的进行。最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之中，我们应当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否则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终要被他们破坏掉的。

最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指出，现时除萧耀南等反动的军阀，直接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之外，段政府外交官僚的抗议交涉，也都是一时的装腔做势，妥协让步的端倪早已暴露，还有上海总商会内少数买办阶级及富商，亦是只看见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民众。我们真正的平民，不依靠他们，应当独立起来力争我们的自由，团结我们力量，至少要商人、学生、工人，等各自团结起来，甚至于有武装的准备，有全国的联合，——这是现时盛行的经济绝交口号之外的更重要更切实的工作。中国的国民革命开始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快要崩溃了！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

(原载《向导》119期，1925年6月22日出版)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九月）

瞿秋白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上海方面日商纱厂的工人早已在二月间便开始斗争，因此而顾正红被杀，南京路发生屠杀——全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宣布总同盟罢工，甚至于英日各厂之外，各国的工厂企业以至于华商工厂的工人，都以同情罢工加入；这次罢工的性质，便从内外棉一公司内的经济罢工变成政治罢工。汉口的屠杀，也起因于码头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广州香港的罢工，更是响应上海的极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经过英法帝国主义者残忍的大屠杀之后，工人民众的坚决勇猛的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青岛方面，同样是发生于日商纱厂的工人，虽然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经经过帝国主义走狗张宗昌的一次残杀，他们始终还能联合胶济路工等各业工人第二次的起来发难；如今他们艰苦的斗争又被张宗昌摧残了。南京方面英商和记工人响应上海的五卅惨剧，而引起社会上有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随后又遭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而压迫了。天津方面，到七月初海员方首先加入罢工，日商报馆内的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陆续的参加；美商宝成纱厂及华商北洋纱厂罢工相继胜利；最后日商裕大纱厂罢工，外国资本家指令走狗李景林加以空前的屠杀和逮捕，方才把工人及一般民众运动镇压下去。河南方面也到七月初，焦作英商煤矿工人才能发动罢工。其他长沙安源水口山汉口厦门等处，凡是运动的范围及力量比较扩大的地方，无不是工人做先锋队。这次总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这次总运动的发展，从上海青岛开始，而渐渐波及全国，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工人阶级最勇猛最积极最持久的阶级斗争，做一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骨干。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有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力量，又因为它的阶级地位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得最利害的，它的奋斗，自然而然一开始便在阶级争斗中含有极彻底的政治意义，——它不但实行阶级斗争而已，而且它的阶级斗争亦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所以这一发难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立刻便结合革命的学生群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譬如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以结合二十余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为主干，一开始便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撤退驻华的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等。随后各地的民众，尤其是南方国民政府之下的工农群众，渐渐集中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总要求，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的呼声普遍全国。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努力，不但能结合一般革命的各阶级，甚至于使比较反动的资产阶级，也不能不加入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譬

如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尚且敢于站出来主张关税自主、收回会审公堂等等。

中国这次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领导之下，如果没有卖国军阀的摧残，而能充分的发展，——那将不难结合全国平民的革命实力，国民党国民军等，集中于一真正人民的全国会议，建立统一的人民政府，统一的人民的国民革命军，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至少，这种运动应当使中国工人阶级及一般民众得着充分的政治自由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使中国的民众得以团结并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继续斗争以达根本解放的目的。

可是，中国现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遇见很大的阻碍。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使它在沪汉粤等处大屠杀之后，再在青岛与天津等处直接实行军阀的屠杀，在奉天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或者严厉的压迫，或者示威的逼胁，禁止一般民众运动。这种反动势力，现时正在预备以武力并吞全国，以竟其媚侍帝国主义的全功。不但如此，五卅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从部分的反对外国资本家压迫的斗争，直接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然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想利用这全国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大多数民众的要求，间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它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求自己利益的满足，而赶紧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因为它的利益是与大多数民众相冲突的。便是小资产阶级，在这反帝国主义运动里，也是动摇不定、组织不固、战斗力量非常薄弱。于是帝国主义者便能利用中国民族运动中这些弱点，而逐渐反攻；他们利用军阀的帮助，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来摧折工人阶级的运动，——如今他们竟想以关税会议等欺人的奸计，缓和资产阶级的“排外”情绪，而“结束”五卅运动了！

军阀摧残民族解放运动及工人阶级的事实以外，在五卅运动发展的前途上，还有种种障碍；这些障碍在这三个月的经过中，表示得非常明显。现时对于反抗奉系军阀，反对这帝国主义走狗的争斗，固然无论什么人也不能否认它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必需的。可是等到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学生群众，再进而反抗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阴谋，那我们就可以听见许多“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的闲话。其实，这些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一、最早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件，抛弃撤退外国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承认工会等的要求。在工人阶级以全力来力争民族利益的时候，大资产阶级却先自妥协，并且竭力摧残工人阶级的利益。第二、在上海开市的时候，总商会便亟亟宣言，说对日问题限于上海纱厂，上海纱厂罢工解决，就可不必抵制日货。他们为日货商的利益起见，不惜抛弃全民族的利益，——十余年来日本压迫中国的种种政策及事实，所谓二十一条，五七国耻……完全忘了。并且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于号称沪案后援会（如北京）也都到处高唱“单独对英”的论调。甚至于国民党的领袖戴季陶先生，不但表示同样的主张，并且认这种政策是“中山先生的策略”，“希望日本作‘回东方来’的运动”！这样的四方八面逼迫，使上海日厂工人竟不能不签字于极让步的条件上而悲痛上工。第三、上海工部局电气处停止供给华厂电气的时候，中国资本家一致压迫工人不给津贴费；同时各方面逼迫利用军阀官僚势力，要使电气工人无条件的去上工。他们也和帝国主义者一致的不肯承认工会；也都要“等工会条例颁布”。甚至于与帝国主义一样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杀害工人（如穆藕初在河南），利用帝国主义捕

捉工人（如上海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华厂）。第四、一般的抵制英日货运动里，许多奸商私自偷运偷买；甚至于以罢市要挟，雇打手捣乱（如太原等处）。

中国的工人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这种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无一次不联合一般革命民众竭力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既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别方面同时亦是为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如今资产阶级的政策，一部分占着优势，已经使五卅运动的力量减少了不少，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得以反守为攻的开始在广州方面对中国进攻，并且在交涉上的态度日趋强硬，——这种事实尤其证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不能不反抗，不能不实行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在五卅运动的经验里，可以的确的知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亦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

现时总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一方面直接受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所摧残，别方面又被大资产阶级及一切妥协派所遏抑，它的发展确有不能急转直下而达到多量胜利形势。可是，这次运动里的主干——中国无产阶级，既然能持久到两三个月的总罢工运动，组织极大的群众的工会，从上海青岛香港广州一直发展到全国各大都市，引导着全国几千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么，民族解放运动更广大的发展和胜利，当然还是要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并增高起来，要它的经济地位改良起来，才有希望。

事实上，中国的工人阶级也的确觉得它自己的这种责任。最近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期——一般的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罢工潮流。中国的工人群众，在五卅以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一天天增加起来，民众的力量一天天膨胀起来。极普通的，不识字的工人，都亲身觉到团结的力量，深切的觉悟到反抗剥削者的必要，并且看到了反抗的方法。他们切身的经验到：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手段是一样的残忍狠毒狡诈，决不能等待戴季陶先生等去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也不能等戴季陶先生等去运用"回东方来"的策略——劝日本对中国亲善，而只能坚决的实行斗争，得到一步胜利之后，立刻积极的预备第二步作战。他们也切身的经验到：这种运动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争解放自己和民族的斗争，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争不到，甚么"民族"利益也不会有——不能争得中国资本家承认工会，便更不能争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工会——他们实在不能懂得，为什么外国人的压迫和剥削要反对，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便不要反对，实在不能懂得，戴季陶先生等的所谓"民生哲学"，所谓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抛弃了大多数中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不知还有什么"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的大潮流里，"以事实做基础"找着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了：便是实行斗争，实行阶级的斗争，以达到解放的目的，这种潮流一天天的发展出去，——或者因为中国经济上交通上的条件，还不能有很集中很一致的组织和运动，不能立刻便打倒一切卖国的军阀和买办阶级，建立自由的独立的平民国家，推翻帝国主义束缚我们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个潮流正在汹涌着，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着呵！

上海邮差罢工，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华书局罢工，石印工人罢工，河南豫丰纱厂罢

工以及上海总工会最近发表要求总的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现象，便是五卅后工人运动中的新时期的表现。五卅运动三个月的经过，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能不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已经不容忍以前的牛马一般的劳动条件和困苦的经济状况。况且，政治上的情形，也已经明白表现：卖国军阀和大资产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一般所谓中国小产业家，也大半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而不肯对工人让步；中国民众的利益都被他们所牺牲。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尤其要对他们斗争。现时工人中罢工运动组织工会运动的进行，便是积聚更多的力量，要求工人阶级地位之一般的增高，以发展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是中国国民革命中很重要的阶段：现时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

（原载《向导》129期，1925年9月21日出版）

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秋　白

沪案重查已经完结，各国所派的司法调查委员也已经走了，在这战事倥偬的时候，政府以及商会等类的高等华人仿佛早已把五卅以来的屠杀，忘在九霄云外。因此，四围竟绝无声响，让帝国主义者背着我们中国民众，判决了五卅所杀的人是该杀，以后还要照例狠狠的屠杀。

这次所谓司法调查，本来是帝国主义者“结束”五卅事件的手段。若论五卅屠杀的真相，以及五卅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众的种种压迫，中国人民早已完全明了，用不着什么调查。中国民众已经完全明了五卅事件的经过和意义，并且早已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关税自主……，具体点说，便是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即使退一步说，就算当初外国老爷们不知道屠杀时的情形，不知道究竟是杀人的人有罪，还是被杀的人该杀；那么，五卅之后一星期内帝国主义的会审公堂已经判决群众无罪，况且早已经六国委员的一度调查，难道还能说不知实在情形？实际上帝国主义者的列强政府，北京的所谓外交团，上海的各国领事早已完全知道五卅屠杀的内容和动机。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事，并且是自己审判自己调查过的，怎样不知道，怎样还要调查？原来，第一次六国委员调查之后，法国委员遽然将调查结果在巴黎发表，英国还以为加重了他们罪名，还以为诬蔑中国学生和工人太轻，坚持不应公布，不合事实。于是发生重查这件事。可是所谓调查，并非要求事实的真相，只不过是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要想协商出一个一致的态度，来压迫中国罢了。所以与其说这是沪案重查的委员会，不如说他是国际协商一致压迫中国的会议。五卅屠杀案中，英日的凶犯，美意等等帝国主义国家是帮凶。然而比较站在事外的国家，如法国——后来还有美国，甚至于日本——都想把屠杀的罪名推到英国身上，英国却偏偏要把列强绑在一起对付中国。这种互相推诿互相冲突之中，便有一查再查的现象发见。五卅之后两三个月，列强之间对华政策的冲突一直不能协调，因此也就无从“结束”这个所谓五卅事件。一方面，因为五卅案里，如果英国受着屠杀首犯的判决——就算只答应中国人民一部分的要求，对于英国在华的侵略势力，也是一个很大打击。所以英国不但不肯轻易承认屠杀的真相，甚至于象法国委员所公布的调查结果，也不肯承认。别方面，因为那时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潮流很高，如果法美等国完全老老实实帮着英国说话，如果他们不设法把自己共犯的罪名抵卸到英国一国身上，他们的命运就也和英国一样。所以法美等国，不但为着要在中国趁此机会和英国人的势力竞争，而不肯表同意于英国所要的“调查结果”，并且美法日本相继的假意表

示同情，表示赞成中国人民的要求，送一个空口人情，以缓和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空气，在这样情形之下，当然在帝国主义的列强之间不容易有一致的意见，有公认的五卅“真相”，不容易协商出一致蒙蔽五卅真相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之下，重查当然一时不容易实现，帝国主义的列强当然一时不容易一致进攻中国。五卅事件也就一时不容易“结束”。

五卅案初起的时候，列强这样互相冲突不能协调，因而不能一致进攻中国，使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得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情形，完全因为上海香港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全国一般的革命群众，坚持着反帝国主义的彻底的要求，有很明显的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旗帜。这种情形的继续，当然全靠中国民众的积极斗争，极广泛的罢工抵货的运动，极巩固的群众组织和宣传。中国人民所要的五卅事件的“结果”，当然不是帝国主义者延宕敷衍的调查，更不是他们一致蒙蔽事实，判决被杀人的该杀……而是彻底推翻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关税自主，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的力量一天不涣散，中国人民的要求一天不妥协让步，中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一天不受摧残，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一致进攻是决不可能的。可是，到后来，事实上，不但五卅以来中国人受屠杀的耻辱不能洗雪，而且列强居然敢不顾政府和人民的抗议，断然实行重查，居然敢以各国杂糅的法律来裁判已经被杀的中国人的罪名，居然敢在中国境内，在全国民众奋起反抗的时候，开国际法庭。虽然此次重查的结果听说各国委员的意见仍不一致，然而列强一致进攻的形势已经在重查之中表现出来。这是甚么缘故？列强之间何以能得到这种一致，何以竟能想以司法调查结束五卅事件？

第一、当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之后，上海总商会擅加修改，另提十三条，删去撤退外国驻华的武装势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中国人民方面的团结和力量，经总商会这样一来，便第一次暴露自己的涣散。总商会删去这两条要求，无异告诉美法意比等国，说中国人民中已经有一部分高等华人，并不反对你们驻扎海陆军，使用武装巡捕和商团来杀中国人，并不要求根本取消领事裁判权。于是这些国都放了心，只管可以在中国横行，只管与英国共同来“维持”这国际殖民地上的“秩序”，不会惹起中国人来反对自己的。这就是列强得以共同进攻的第一次机会，亦就是他们之间达到一致的第一步。

第二、戴季陶等的单独对英论渐渐宣传起来，总商会在开市的宣言里，说日本纱厂罢工解决后便不反对日本。这种空气占了优胜之后，首先屠杀中国工人的日本资本家也就放了心。尤其是到了谈判解决日本纱厂罢工的时候，总商会以及日本的种种买办——直接的间接的——都一致帮着日本压迫工人，竟用一二万元的恤金，空口允许三个月后加工钱等类的条件，便解决工潮；中国的这些高等华人不但在对外的条件中删去工会自由的要求，并且华商工厂对于承认工会，也与英日一致的坚持等待政府公布工会条例。对于英日，尤其是日本，这样妥协让步，真不愧孔仲尼戴季陶道统的和平谦让仁慈的美德，可是对于工人却和外国资本家勾结一致行使极残狠狡诈的威迫欺骗手段——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这种高等华人的政治道德，便大大安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心——从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不至于和对于英国一样的反对，日本已经可以无所顾忌，尽可和英国一致维持帝国主义对华的威信。这就是列强得以共同进攻的第二次机会，亦就是他们之间得到一致的第二步。

第三、中国人民的内部既然屡次发现团结力的涣散，帝国主义者方面又得着卖国的奉

系军阀做助手。奉系军阀在青岛天津上海等处封闭学生会工会，逮捕学生工人，宣布戒严。五卅运动中的主力军既然受着这种摧残，又有许多买办工贼受着高等华人的指挥来捣乱，这一劳动群众被压迫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商界的抵制英日货运动也早已烟消云灭。这种情形之下，帝国主义的列强自然能更进一步的一致行动，共同进攻。沪案重查，便实现在这个时候。“高等华人”是已经软化了，妥协了，甚至于联合军阀和帝国主义来压迫工人破坏民族解放运动了。“下等华人”又已经被压到不能有公开的组织和运动。列强的欺压中国，自然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第四、等到奉系军阀的邢士廉被浙军赶走，上海的革命民众，工人和学生要重新起来，扩大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浙军和上海大资产阶级仍旧继续奉军的压迫。这正是沪案司法重查的时候！这次全国反奉的战争里，不但上海，全国的民众都要起来继续爱国运动，因为在民众的眼光看来，反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奉军已经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爪牙。然而不但浙军在上海，吴佩孚在汉口仍是继续的高压革命群众，甚至于上海的保卫团都帮着军警封禁爱国团体，查缉学生工人的宣传和运动。所以联军商会等等，虽然表面上都发了不少反对沪案重查的宣言和电报，事实上他们是帮着帝国主义者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复兴。上海以及全国的民众既然因此而不能巩固自己的组织，不能广泛的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的司法调查委员当然能安安逸逸来审判死人的罪名，实行国际共管中国的第一步。于是沪案重查便在这“戎马倥匆”之中偷偷的完了！这四种情形，便是列强敢于重查沪案，敢于用这种侮辱中国的手段“结束”五卅事件的原因。

可是五卅事件真正便是如此结局了吗？

中国的民众不但决不承认这种调查，决不承认五卅屠杀便可以如此结束，并且在这种重查之中民众得着更重大的教训：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完全由于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由于高等华人的压迫民众。因此，民众更加要努力奋斗，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军阀的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众的罪恶，在这次已经彻底的暴露。商阀的只顾少数人利益，剥削压迫民众，种种狡猾狠辣的手段，也已经现出他们的原身，对于劳动民众下全力的实行阶级压迫，对于帝国主义者却甘心妥协误国。可见要求中国的真正解放，必须要实行反对军阀商阀的阶级斗争，必须要使中国的政权握在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手里。因此，民众更加要推翻军阀和商阀，要力争国民会议，建立真正统一的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政府。中国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决不会停止的。现在香港沙面的几十万人的罢工运动还继续着。正因为广州民众以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许多反动军阀，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武力，所以不但一般劳动民众能继续着奋斗，而且连商人群众也有觉悟，不让商阀把持；虽然英国人同样的派陈炯明邓本殷和永绩等军舰去打广州，而广州国民政府受工农群众的赞助，始终能战胜他们。并且江浙和北方战争的发展中，北部中部的人民也在继续团结自己的力量，并督促国民军参加。全国民众的解放运动不但不停止，并且要使反奉的战争，变成民众反抗军阀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扫除一切卖国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众政权，打倒买办商阀的势力，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这才是五卅屠杀案的真正结局呢！

（原载《向导》137期，1925年12月3日出版）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瞿　秋　白

（一）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政治上是以孙中山先生入京开始的。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不满一年，满清遗孽的北洋军阀，便重新恢复其统治地位；从此以后，所谓的中央政府便一直在军阀手里，从袁世凯一直到曹锟，中间虽然经过直系、皖系、奉系等的战争、政变、毁法、护法、制宪、贿选种种斗争，然而除西南以外，差不多完全是军阀内部的斗争，也就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互争间接统治中国的现象。国民党早已被军阀政府认为乱党，在中国北部和中部没有行动的自由，甚至于也说不着和军阀短兵相接的斗争。可是经过了五四以来中国民众的社会力伸张的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觉醒起来，他们的阶级斗争一开始便迅速的从经济斗争进于政治斗争，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的国民革命得着了新的力量，绝大的生力军，自然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一九二〇年后，各地的社会运动，从学生运动的性质转入工人运动的性质，象湖南的纱厂罢工（黄、庞的被杀），安源的矿山罢工，香港的海员罢工，京汉及其他各铁路的罢工，唐山等北部工人的罢工，上海香烟厂及江浙一带手工业的罢工，——一直到二七京汉大罢工的流血，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社会里，新的革命力量正在这一时期渐渐的形成——知识阶级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然地随着笼统的新文化运动，德谟克拉西的要求，和反宗法社会的斗争而普遍的广泛的发展。一切社会阶级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等等的斗争里得着民族意识的自觉，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切身所受的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宗法社会、资本制度的侵略压迫束缚剥削，比任何阶级都要厉害。所以只有无产阶级能在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解放运动的总口号里，本着他们善于组织、善于一致的阶级性，首先表现实际的行动和力量。这种社会力的伸张，当然趋于团结扩大革命的势力——工人阶级已经在这一时期组成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有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一面肃清辛亥以后这一党内的官僚化、军阀化的反革命分子，一面汇合一切新生的革命势力。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便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尤其是他们两三年来自己阶级斗争的经验，输入国民革命的政党而和民族斗争汇合为一，不期然而然使中国南部的农民觉醒起来，在广州革命政府协助之下，大

大的发展他们的斗争，赞助政府反抗反革命的军阀，香港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买办土豪等的武装势力（所谓商团和民团）。广州政府，从护法以来，历受南方军阀买办土豪的破坏内哄，到此才第一步得着平民群众的赞助，而后他的政治势力才对于全国有革命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最少限度政纲，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产业国有、平民政权的确立、劳工保护等等，开始提议于一九二一年冬天的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曾出席），最终决定于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以及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的策略，都在国民党改组之后（一九二四年），成为国民革命政党的政纲和策略。国民党的政治威信，因此在全中国范围内得着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社会里革命力量的集中，别方面革命政纲的明确规定，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宣传，重新遍及民众而影响北方的政治，一扫以前国民党内部官僚化、军阀化的耻辱，及北方军阀政客（如研究系之类）的诬蔑。

因此，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战争中，军阀内部受了国民革命运动潮流的影响，不能不开始分化和崩溃——北方国民三军的形成，正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国民军表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赞成国民会议的召集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论他们的衷心如何，始终是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政治势力发展的明证。向来中国的军阀总是受某一帝国主义的驱使和雇用；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这种间接统治中国的制度才开始崩溃——直系军阀，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既然因为战争失败而瓦解，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也因为国民军的崛起，不能顺水使船似的攫取中央政权；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既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既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

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于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重新发展到北方。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要求各种人民团体，商会、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大家都应派代表参加，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觉悟到国会制度、法统问题、护法口号的不是引导民众向革命的道途上去走。国民会议的运动从此开始。中国民众见着自己的力量——历年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罢工运动，到此仿佛万流汇集而成彻底改革政治制度的总要求。不但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以全力促成这一斗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向来逆来顺受的受军阀的压迫，或者只在地方上，如上海等大城市之中，稍稍表示些抗拒，到此也看见了推翻这一统治的道路。

北京政变之后，北方的军阀势力，大致是这样一个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御用的奉系军阀想要攫取北京政权的全部，因此排挤国民军的势力；国民军便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联合起来反抗；同时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早已完全崩溃，只剩山、陕间的刘镇华、憨玉琨和山东的郑士琦，势力微小薄弱，虽然竭力献媚列强，表示"外崇国信"，以与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对外政策相竞，以官僚军阀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相抗，——可是，因为他的力量决不足以替帝国主义者肃清中原西北的"赤化"的国民军，所以一时不能在日本或英美帝国主义之前固宠；直系遗孽仍旧盘踞长

江中部。于是最初一期段祺瑞的临时执政，仿佛是帝国主义者与中国人民之间，奉直系军阀与国民军国民党之间的一个缓冲机关。段祺瑞的第一步政策，便是暗中联络直系的长江各督和西南联省派的军阀，想造成自己的势力，亦就是勾结帝国主义的资格，第二步便是指使刘镇华、憨玉琨进攻国民二军。他的第一步政策虽然有部分的成功，可是第二步政策却完全失败；——胡景翼和憨玉琨的战争里，中原的工人和一般民众因为国民军比较的开明，同情自然在国民军方面，国民二军这次的胜利，大得力于京汉工人的赞助。段祺瑞同时又对于广东，和英帝国主义者一致的采取援助陈炯明攻粤的政策，可是广东自从国民党改组，工农运动勃兴，黄埔的革命军成立以来，政治军事势力大非昔比；以前反动的军阀，如杨希闵之类对于东江战争故意怠工，如今国民革命军，在东江农民群众赞助之下，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边起到三月初，不满四十天，便肃清东江的反革命军。虽然屡次反攻，然而林虎、杨坤如等终竟是败的败，降的降（三月二十三日林虎败退闽边；四月二十日杨坤如以惠州降）。第二次，段祺瑞、张作霖又利用唐继尧，使他声称就广东副元帅之职，并侵入两广，广州内部杨希闵、刘震寰亟起内应（开始在四月初）；可是这步计划也归失败。同时，张作霖的势力渐渐向关内进展，他的李景林占领直隶，排斥国民军在保定、京兆的势力，张宗昌占领山东，郑谦占领江苏，处处实行极反动的压迫。这种局势，可以说是段、张合作排斥国民军国民党的过程里，互相争权夺地，并在帝国主义者之前争宠，——段政府在奉张驱使之下，不但外崇国信，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解决金法郎案，损失国库六七千万元，借以取得余款，供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段祺瑞的压迫和段祺瑞自己的阴谋，无一不是把这“缓冲机关”，在几星期内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

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正是全国反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和人民的国民会议呼声最高的时候，也正是段祺瑞初上台，还当着缓冲式的工具，表面上赞成召集国民会议的时候。可是孙中山先生入京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五年的第一天，段祺瑞政府早已成了奉张帝国主义所牵制指使的走狗。段政府不顾孙先生的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意见，悍然召集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当然只有几个人）的善后会议。经孙先生及国民党及群众的坚决抗议，主张人民代表参加解决国是会议，段政府竟只允许商会等所谓法团代表的参加，并且是只有发言权的专门委员。他这种政策，原本是和设立淞沪特别市的政策一样，算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而撇开大多数劳动平民。分散革命势力的奸计。可是除开各大城市的买办商阀（所谓总商会）以外，大部分的小商人群众，对于这种会议，很明了他的军阀官僚性质。尤其是工人阶级、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占全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经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先生之国民会议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纲之宣传之后，已经完全汇集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不幸中国第一个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在这个时候逝世。然而国民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大会于三月一日在北京开会），俨然与善后会议对抗（二月一日开会至四月二十日闭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集中中国最觉悟的农工平民以及妇女的革命分子，决定对外对内的革命政纲；继之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追悼宣传——国民会议重建民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正在此时普及全国——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了的切实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规定，并且是将来中国平民共和国的新建设——国民会议制度之第一次确定的关键。

（二）

中国的劳工运动，自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之后，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蛰伏之中，虽然上海、广州、香港等处，还时时有罢工的暴发，——尤其是前年的沙面罢工，然而概括而论，在中国的范围内，始终因受直系军阀及英美帝国主义等强暴的压迫和屠杀，不能有勇猛突进的发展。直到北京政变——两年来以无产阶级运动之酝酿为"底力"的国民运动之结果——社会上的革命力量才得着了一个开展的环境，尤其是无产阶级，处于严重压迫之下既如此之久，当然稍有可能便要乘机奋斗。北部铁路工人的组织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处恢复过来；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国工人群众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奉张势力的复盛，一面赞助他压迫国民军，一面便因棉纱市场的恐慌，以增加工作、减少工资、裁减工人的方法向中国工人进攻。于是上海（二月初）的内外棉厂及其他日厂，青岛（三月间）的日商纱厂相继罢工。中国工人在这几次罢工里，都因组织巩固得到相当的胜利。全国劳工运动从此又得了勇猛突进的形势——如北京三月间的印刷罢工，汉口五月间的英美烟公司的罢工等等。帝国主义者当然继续着以屠杀政策威慑政策和中国人民相周旋：福州学生（四月间）抵制外货，美国军舰十二艘便抵厦门，以武力干涉。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在第一次罢工之后，千方百计悔约压迫工人，故意挑衅，要想趁势夺回工人的胜利。日商工厂里的压迫专制，向来便是绝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工人所得的"罢工胜利"，也不过是比较上说，其实便是罢工之后，工人所受压迫，当然还仍旧是统治殖民地劳工的特别奴隶制度。日本资本家这样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厂里的工人时时刻刻在愤激怠工之中，因此，他们便任意的敲打强迫，结果，在上海内外棉厂里的工人顾正红，因要求发给欠薪而被杀（五月十五日）；在青岛日本人指使张宗昌杀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强迫怠工工人离去工厂（五月二十九日）。

帝国主义者这种屠杀政策，引起中国人民一般的愤激；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惨案，便因中国学生工人的抗议这种屠杀和列强帝国主义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之印刷附律码头捐等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奋起时期中，看着他们向来利用军阀的间接统治制度逐渐动摇，便想以直接屠杀威胁的政策来扑灭"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等的"过激派运动"，并且想在上海直接统治地的租界上，钳制中国人的舆论，进一步的压迫中国人（如印刷附律、码头捐等）。然而现时的中国——从五四、二七以来的中国，决不是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屠杀政策、"惩罚战争"征服得了！五卅的屠杀，立刻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罢工，学生的罢课，商人的罢市。虽然帝国主义在六月初旬继续的施行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武装商团出防，军舰云集的来威慑，然而镇江、九江、汉口、南京、重庆、青岛、广州等处的民众，都还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来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广州工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处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

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

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五卅运动的第一点特性，便是使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列宁说，平时过问政治的只是几百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人，可是真正的政治运动，真正的“民权”，只有劳动平民的革命政治，只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所过问的政治。五卅以前，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等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差不多连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邹鲁等，都认为是过激派的赤化宣传，是离间国民党与“友邦”“友军”的奸计。可是，到了五卅之后——一般民众以至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都觉国民革命的实力已经实现，或者存心利用以达自己的阶级利益（如大资产阶级）或者受着列强侵略的刺激和平民力量兴起的兴奋，都一致的趋于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本来是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间之冲突，尤其是国外资产阶级与中国劳动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帝国主义者因为不能痛快地继续他们的统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卖国军阀——直系势力一经摧败，奉系势力之发展又遇见国民军和劳动民众的障碍和抵御，于是从上海五卅起，竟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汉口（六月十一）、广州（六月二十三）、九江、重庆、泸州、青岛、福州、天津、大连，……暴露他们向来的种种假面具，惊醒了一般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之发展早已使中国社会里发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酝酿着三四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断然不能再容受这种强横的压迫。于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实现，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这是五卅运动的第二点特性。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等，从此已经为一般群众所了解，从此便有了实际上的意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条件，就足以证明联合战线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运动初起的十几天内，不但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积极的参加这一斗争，全国各地的平民商人，没有不赞成这些条件，同情这一斗争，就是半买办半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至少也以消极的态度参加这一战线——上海总商会的破坏联合战线，在他表示参加运动，组织所谓五卅委员会起，他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且没有表示态度的时候，虽然可以说是有意的怠工，可是实际上是他没有影响总的运动，没有敢来争这一斗争的指导权。上海而外，汉口有工学联合会的组织，北京、天津、河南等处也有类似的组织；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正在寻找他的党的组织形式。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在头两个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虽然组织上没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商会、教育会、教职员，甚至于省议会等官僚机关，无不随着五卅运动的总潮流而随波上下；可以说，这一开始于日厂工人的运动，开始于无产阶级全国

大罢工的实际斗争——领袖着暴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则，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也在这一次实现出来——苏联、英、法、德、日等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都奋起援助。全国各阶级，如果能持久继续这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诚意的参加革命，承认劳动平民的一切罢工结社的自由权，赞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艰苦斗战，——并且有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不难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军阀。

现时帝国主义的世界里，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大殖民地，决不是对于某一强国的打击，却是对于帝国主义制度的致命伤。因此，英、日、美、法等国都是想一致的进攻，他们不能不以种种卑劣欺诈的手段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国民革命有巩固的联合战线，并且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潮流高涨到顶点，举国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制度的统治，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冲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华人的同情”，不能为英国所牺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时候，除英国以外，都不敢公然进攻，无不竭力声辩，甚至于倡言赞成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六国委员不一致，不肯公布调查结果，美国立刻解决蔡继贤案，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证，这恰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呼声最高的时候。再则，段祺瑞的军阀政府，恰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种种方面表示自己的“爱国”；张作霖原本在五月底要想进京攫取政权时，五卅运动一起，只能退出关外，张学良到上海来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也不得不先捐给学生会两千块“买路钱”，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军阀的统治，在这时候显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至少也在极端动摇的状况之中，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三点特性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军阀统治根本动摇。

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过继续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商阀——总商会——“积极”起来了。国民党的右派“站起来”了。总商会的积极，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要求，抹煞工人的罢工结社权利，取消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的条件——出卖平民的权利以谋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一般高等华人，不用说研究系的梁启超、丁文江等卖弄他们的“学问”，主张妥协和平渐进，甚至于反对抵制外货。就是所谓“站起的”国民党右派，如戴季陶先生等，在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通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议案之后，立刻公布他们单独对英的主张，希望日本“回东方来”（见季陶之“中国独立运动之基点”）。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理论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论，以及北京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种种右派的宣传，事实上便有上海总商会方面的买办分子竭力压迫上海总工会和日厂谈判，如此四方八面——戴季陶、大学教授、反动的右派、买办资产阶级、交涉员等——强迫恐吓欺诈种种手段的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竟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

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一方面驱使奉系军阀到处开始屠戮革命的平民（青岛、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面便因为中国国民运动的目标单集于英国，其他各国无所顾忌，正可一致进攻，同时利用机会以稍稍挫折英国在远东的气焰，而且用空且口的人情诱惑中国的高等华人以破坏联合战线，于是所谓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的提议都通过了。威慑劳动平民利诱高等华人以一致进攻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帝国主义政策，便在总商会、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之后完全实现了。并且奉系军阀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七月间）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不准许启封，以示恩威于资产阶级，同时极端戒严，压迫工人。帝国主义、军阀的这种离间政策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策略之下，上海总商会第一步修改条件（六月十三日），第二步先行开市（六月二十五日），第三步压迫日厂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与十一国上海侨商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使封闭总工会（九月十八日）。全国小资产阶级逐渐受军阀资产阶级的暗示和压迫，一方面倾向于妥协，别方面畏怯革命的斗争，于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战线——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总工会封闭之后，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这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自然可以安心的一致进攻，沪案重查便公然实现，英美日三国一致判决五卅以来所杀的人都是该杀的。——五卅重查的提议（使团领袖的照会）还远在十月一日，即离上海英厂工人上工不过一星期，离总工会的被封不过两星期而已。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是何等的明显呀！同时，上海总商会在总工会被封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开始募所谓爱国募金，名为接济英厂工人，实则五卅以来总商会所经手发的罢工维持费，大部分是各地捐来的，小部分是总商会办事人垫出的，爱国募金的作用，不过是办这些办事人弥补自己的“损失”罢了；况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厂工人，已经因总工会被封，没有革命行动的公开指导机关和自己的组织，因为总商会克扣募金，不发维持费，又被压迫、“调停”而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当然再明显也没有，外交部、总商会口头上尽管抗议沪案的司法重查，实际上他们每一步的行动都是成就这一沪案重查的；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退缩懦怯，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为他们可以减杀革命派方面的势力。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四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中国一般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斗争，目的在于解放中国民族，当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资产阶级阻挠、障碍、压迫这一斗争——否认工人的罢工结社自由，保留外国驻华军队以备压迫平民，强制群众，对日妥协，而只想借对英罢工之力达到仅仅利于高等华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国轮船公司和英日竞争的优势等等——劳动平民的反抗目标自然同时要注射到中国资产阶级方面来。帝国主义者方面的毒计，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上海租界的电气处本是垄断上海的电气业的），当然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愤激的反抗，而是使他们急速的倒到外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去，帮同着压迫工人阶级。短视的浅见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几万元（就算他几十百万元！）的利益，居然甘心卖国卖民，实行摧折上海总工会。五卅国民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无产阶级的势力在政治觉悟上在组织上都是非常之澎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切的觉悟——阶级的觉悟：“压迫禁止我们的自由结社，克扣

我们的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因，本在于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五卅以来中国华商工厂里的罢工，突然由对外示威的性质，变成切实要求经济政治地位改善的罢工。——八月中旬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便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之答复，随后全国电报局的罢工，天津、河南、山东的中国纱厂罢工，都是同样的性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市侩，是中外资本家走狗的工贼，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他们只准工人为着争民族利益国家体面而罢工，不准工人要求加几分工钱承认工会而罢工，此等论调，决不能使工人相信的。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一方面要求工人为“民族”而流血牺牲，别方面这个“民族”又不许工人加几分钱几角钱的工资，不许他们结社罢工的自由，不承认工会，这是何等的矛盾！无产阶级正因此而要扩大自己组织和奋斗力，在五卅运动对外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渐次失败的过程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五卅以后，全国罢工波及中国企业的潮流，不但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总的民族斗争里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备在后来更伟大的斗争里，整个儿的负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五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的过程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明确坚决之后，才能引导一般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

五卅运动的发展，开始于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开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震荡到了大资产阶级，甚至于官僚军阀。不但全国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一开始便站在革命派势力的一方面，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甚至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直隶、江苏（苏州、角直、宜兴、江阴乡下）等处的农民，也渐渐的开始活动，成立农民协会，反对苛税杂捐及预征漕粮，反抗地主，有些地方农民的运动往往是工会或学生会引起的——这亦是五卅运动间接的影响。总之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重大的关键，他引起了一般下层的民众的积极斗争。可是，不用说，许多小城市里的五卅运动，往往限于抵制英日货或者捐款援助工人。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在上海就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怠工，内地（如太原、福州等处）甚至于因此而引起学生会国货商和洋货商的武装斗争。捐款虽然有些力量，始终便宜了上海买办阶级，使他们可以不出一钱而坐享“盛名”。因此，我们要知道：中国现时资产阶级内部虽然还是买办分子占优势，而在五卅运动后，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对把持包办商会总商会的少数买办分子之对抗派，也在逐渐发生。革命运动自五卅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农民、学生、小商人之中，是绝无疑义的。然而：一则各地的罢工运动第二次起来——八月十一，唐山罢工的暴发——八月中，南京工人的流血——八月初，北京英使馆的罢工——八月六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厂罢工结束，工人阶级已经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工贼等四方八面的压制逼迫捣乱的时候；二则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三则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为民族利益争斗的资产阶级分

子，还在买办分子或顽固派包办的商会势力之下，不能脱离妥协政策的影响和卖国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诚意的彻底的和无产阶级合作；四则各地工商学各界的联合斗争，还只是所谓纯粹对外的反抗宣传，没有能力推翻当地的军阀政府，处处受军阀政府的压迫而零零碎碎的摧败。再则，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虽然以“中国革命运动”占第一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同时还有埃及的解散国会问题（三月廿三日），印度的纱厂罢工（九月十六日），非洲坦及尔因地方的罢市（七月三日），摩洛哥战争（六月廿七日），叙利亚革命（八月六日），波斯政变——殖民地革命已经开始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五卅运动都还不能和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直接联合，互相呼应，始终还是各干各的。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六点特性，便是在实际行动上证明：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五卅运动实际的具体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

帝国主义者在伟大的五卅运动的时候，自己觉着对中国的统治和他们走狗的军阀政权日益动摇，他们的屠杀政策，实际上不过是自杀政策而已，于是一转变而注全力于宣传反赤化反共产的政策来，并且用种种方法破坏联合战线，这种政策在中国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绩，可是在南部却完全失败。杨、刘、唐继尧等里应外合的进攻广州革命政府失败之后（六月十三日），不过一礼拜，英帝国主义者已经用离间政策，挑拨许崇智和蒋介石，使许崇智宁可放弃潮、汕与陈、林妥协（六月十七）而回广州与蒋介石争权。可是五卅运动暴发于广州（六月二十一罢工，二十三日沙面屠杀）之后，民众方面既然一致对外，内部的冲突自然不易暴露。国民政府的成立（六月二十五），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相差不过六七天；这亦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之政治的内容，便是代表农民、工人、大多数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国民革命军。他与上海工商学联合和上海总商会共同管理对外斗争的差异点，就在：他——国民政府，有农民群众和革命武力的赞助，而上海是总商会的武力（保卫团）和军阀相勾结。并且国民政府之中是劳动平民占优势而不是买办分子占优势。广东的农民工人，不用说是争得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数商人，自从商团叛国之后，渐渐觉悟买办商阀的罪恶，而自己组织起来，尤其是革命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军阀之后，他们都一致的拥护这一政府。广东国民政府和香港罢工委员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能以全力坚持五卅运动的总罢工，与香港空前的打击（外国新闻记者詹密士的谈话，说香港因罢工而损失的每月在七千五百万以上），尤其是黄埔的开港，足以争回中国的经济独立和交通独立。虽然帝国主义者和上海一样的勾结军阀、妥协派、右派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四五次的尝试无不失败：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右派军阀刺死；九月十五日许崇智完全放弃潮汕，陈炯明因此复图侵袭广州；九月二十日许崇智部下莫雄、郑润琦又在广州谋叛，私自释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叛谋发觉……随后，段、张派“永绩”等军舰，帮助邓本殷从南方与陈炯明（东江）及熊克武部下（北江）三方夹攻广州（十一月间）。然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推翻，并且已经统一全粤，把这些反动军阀完全肃清：苛捐杂税烟赌拉夫完全消灭，农民协会、工会有充分的斗争自由，财政军政统一……成了模范的国民政府。对外的交涉，虽

然沙基惨案还没有最终的胜利，然而日、美等国看见这样的巩固的国民政府，境内的革命运动又确没有明显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自然都软化下去，不敢与英国一致进攻，美国煤油税问题，黄埔戒严区域枪毙违法的日本水手问题，汕头日人行凶问题，广东政府都得到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所未有的胜利。就是英国，现在也已经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罢工不但没有失败，并且还有中国商人预备以罢市促港督的觉悟（今年一月）之消息。固然，广州的国民政府，种种方面的革新计划和建设事业还做得很少，内部亦许还有种种缺点，可是在二三十年骚扰压迫的中国政局之中，他实是唯一的一线曙光。中国的人民现在没有不希望在全中国有这样的中央政府的。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只在广州一隅给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会流并进的联合战线而后能胜利成功之缩形——打倒代表买办土豪阶级的右派，肃清反动军阀，然后劳动平民工农小商的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政府的武力才变成平民的武力，然后对外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才能充分的发展，而得着胜利的形势。

（三）

五卅运动之中，奉系军阀在山东、直隶、江苏、上海到处施行屠杀压迫政策，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能进展，段祺瑞和直系军阀肖耀南等，虽然急急忙忙提出对外抗议，拟议工会条例，公布“人权保障条例”等等，然而不久就使人民完全觉悟：他们这些“作为”，仅仅是为保持自己权位的假惺惺；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虽然貌为赞助工人，实际上处处妥协以求外人“谅解”，出力帮助军阀帝国主义者压迫屠杀工人，而结果五卅案重查，上海工部局的董事也不能到手，关税会议不能给中国以自主权，法权会议同样是装腔作势——一般小资产阶级，向来受妥协派的催眠的，当然要有最后的觉悟；工人农民中的运动仍在深入开展，积聚着集中着自己的战斗力。从上海总工会封闭之后，虽然工人运动屡受摧残，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被杀，各地亦均继续压迫，然而上海及各地的工人农民（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同兴怡和及其他纱厂、漆匠、木匠，车夫，石印工人等的罢工怠工，河南杞县、江苏江阴等地方的农民运动，反抗县官地主，要求组织农民自卫军……），仍在勇猛斗争。五卅运动所开始的国民革命，不会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破坏就停顿的。革命的前途正很远大，革命的后备军正在征集呢。不过五卅运动中最明显的卖国贼无过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他不但压迫人民，做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并且趁着五卅运动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南京……这和直系军阀的利益已经大有冲突。于是孙传芳于十月十一日——上海工人运动已经由奉系军阀代他完全压迫下去之后——宣言反对压迫工人复工，随后吴佩孚等也表示反对关税会议……总之把一切罪名都归到奉系身上去，而借此名正义顺的开始反奉战争。北部的中国民众，在这种时机：一、正是感觉民众武力的缺乏，就连广东国民革命军一样的军队亦没有；二、看见比较开明的冯玉祥等的国民军与奉军势力早已冲突，渐次加入战争，当然积极督促这种所谓国民军彻底的先扫除奉系军阀。五卅运动后的革命民众，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他们不能再容忍自己消极旁观军阀战争的心理，消极的要求和平的心理，在这一次已经明显的发出“变军阀间的战争为人民对军阀的战争”之口号。假使五卅以前历年来国民革命的预备运动足以使军阀之中发生所谓国民军，那

么，五卅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当然能使中国现时最巩固强盛的奉系军阀内部也起崩溃——郭松龄的倒戈，显然是受民众的国民运动的影响。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派兵到满洲，亲自下手杀掉这一“赤化”将军，巩固了奉系军阀的势力，在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方面，亦与以实力援助，把这次反奉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国民军与日本帝国主义之战——然而对于民众在五卅失败之后又加以帝国主义者公然的对奉张助战，只有使我们更深切的感觉武装自己实行打倒军阀统治之必要。

固然——五卅以后，国民运动内部起了剧烈的阶级分化的现象，不但资产阶级直接的压迫束缚工人阶级，而且政党界、思想界也因此而发生分化：这一分化开始于戴季陶先生的反对阶级斗争及所谓“右派国民党员站起来”的运动，结果是极右派利用戴季陶先生的领袖，召集西山会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右派会议；学生界里也发生所谓国家主义的运动，成立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西山会议中的主持力量实际上是极右派的邹鲁、林森以及叶楚伧、邵元冲等犹豫分子，这一会议的意义，重要之点在于反对广州中央及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其余开除共产分子等是连带的问题而已。国家主义的“运动”，主要之点也在谩骂广州政府、国民军及苏联。五卅运动之中，因无产阶级劳动平民战线的巩固，而坚持到现在还没有屈辱的，只有广州的运动，广州的国民政府。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妥协取媚于列强而不肯牺牲几分钱的工资和工会罢工等自由给工人；所以他们的思想家和政治代表用种种诬蔑手段毁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广州的国民政府一样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最毒恨的。现在问问：谁要汪精卫离去广州，谁要驱逐很得力的苏联政治军事顾问，谁要反对共产？——唯一的回答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这一句里的“国民”、“国家”等字样，我愿意是我写错的！）因此，全国民众反奉运动之中，我们在最初一期，听见许多仿佛是很体面的口号：“内不妥协，外不亲善”，这意思是说：一切武力不是到帝国主义方向去了，如张作霖（我们国家主义者当然不便和他妥协），便是到苏联赤化方面去，如蒋介石、冯玉祥（那又是我们国家主义者不愿意妥协）。殊不知道这些所谓“赤化”将军，离赤化还远得很呢。国家主义派亦未始不知道；不过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劳动平民解放，中国劳动平民在创造自己的武力之过程里，先因倾向民众的武力之比较的放任，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得着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些须不利而已。可是，因为劳动平民政治势力之普遍发展和帝国主义者的强横压迫。——一般人民对于广州政府便日渐明了真相而想望他：有具体的实际的胜利放在眼前。再加之帝国主义的日本公然出兵满洲，五卅运动中妥协的失败，渐渐使资产阶级的学者悔悟，资产阶级的政客改变策略。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之中，居然发现些人，大谈其劳动问题、罢工自由的法律基础等等；——戴季陶先生对于这些自然早已知道，始终他是较远见的资产阶级学者；他并且要讨论到合作的方法共同反日的行动。联合战线的恢复便成了目前最切实最紧迫的问题。

同时，这次战争里，军阀的崩溃，亦因民众运动的发展，普遍的国民革命政府的要求，而愈加急速——郭松龄、魏益三称国民第四军，山东方振武最近自称国民第五军（今年一月）。一般劳动平民经过五卅失败的巨创，看见广州国民政府的模范，都一致的要求组织国民革命委员会，推翻段祺瑞的政府（北京上海等处的示威）。就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也已经觉得没有出路。不但如此，军阀崩溃的过程影响到全国政局——帝国

主义逼得不能不以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等，延宕敷衍；军阀之中没有一派能维持住“中央政权”，北京简直成了无政府的状态。现时在全国人民之前，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还是民众在劳动平民领袖的联合战线中取得政权，组织革命政府呢，还是由帝国主义指拨着奉系和直系妥协，联合而攻国民军，当然更加压制民众，以成就奉直联合的反动政府呢？这种时机——军阀帝国主义统治极端动摇的局面，实际上是五卅运动所造成的，民众反奉运动和反对奉直联合的斗争，实际上是五卅运动更深一步的继续。现在国民第一军的首领冯玉祥，他曾经拒绝与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共同领袖反奉的临时革命政府，他曾主张暂时保留段祺瑞，他现在下野了；国民第二军和第三军内部非常复杂，然而他的左派至今还主张去段祺瑞，成立临时政府，立即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他们这些主张都是对抗张作霖、吴佩孚、章太炎等“法统”主张的，奉直联合的主张是要恢复军阀的统治，恢复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均势。国民军反抗他们的斗争，不得民众的赞助是决难胜利的，民众以要求一切政治自由、斗争自由的保障为条件，当然可以并且需要对国民军和国民政府加以赞助。民众的政治主张，在五卅经验之后，自然一致倾向于国民会议、重建民国的要求。只要看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的领袖以及国家主义的“醒狮周报”，都不能不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便可以知道民众要求的压迫，到何等程度了！国民党现在的新右派（与邹鲁、林森、冯自由等的反革命当然不同），也许真有明白的分子，便是国家主义者的青年中，未始没有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不能再容许他们的领袖专以反共产为职志了！现在的问题，完全在于平民方面联合战线之中，增加武力的后盾和正确的政治指导，所以上海总工会等的真正群众团体，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恢复运动，主张以人民代表和国民军、国民政府立刻组织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这一运动不久便要普及于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复兴运动里重要的职任，在于切实的结合一切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力量；资产阶级在妥协失败之后应该觉悟，小资产阶级在受了妥协政策的迷误之后尤其应当立刻站到革命的平民一方面来，——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既然都赞成国民会议，何以不赞助首先提议以国民会议预备会解决国是和五卅条件的广州国民政府（七月二十二日）？现在应当两方面同时进行：一面各地工商学农各界，国家主义，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左派，共产主义派，大家联合起来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就当地实行民众的意志，组织武装力量，反抗军阀的统治，同时精密组织各种职业的平民，以为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的单位和基础；别方面，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应当以自己的武力拥护民众的利益，立刻派出代表和全国各界人民代表开联席会议，即时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统一中国，肃清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然后真正的国民会议可以召集成功，真正的共和国可以建设。这种行动的方针，难道不是一般劳动平民以至于资产阶级所应当采取吗？总之，五卅以后，国民会议的运动已经从宣传的口号变成实行的方针；这种运动已经有极大多数觉悟的民众做他的基础，无论甚么力量都不能摧败他的，——除非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因为这太对于劳动平民有利益了而从中破坏，破裂联合战线或者故意怠工，那时，这种运动的成功或许要比较多的时间，比较更加艰苦些的斗争。他们的怠工破坏或许要成就暂时的直奉联合之胜利，而变成反动的局面，然而胜利始终是劳动平民的！五卅所开始的革命不能停止的了！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国民革命史上，在世界的社会革命史上，实在占着和欧洲一八四八

年及俄国一九〇五年同等的重要地位呵！

一九二六·一·二二

（原载《新青年》3号，1926年3月25日出版）

〔附〕实业界对于学生之希望

（一九二五年）

穆 藕 初

五四以来。学生爱国热诚。达于极点。痛外交之险恶。睹政象之日非。徒手奋斗。牺牲无量数宝贵光阴。以求内外军阀之觉悟。早为各方所共谅。钦敬咸深。然外交情势。非但无有转机。而且势劫利诱。进迫不已。于是乎莘莘学子。继续执争。苦乏良策。依旧以罢课为要挟之利器。罢课之外。继以演说。未曾唤起群众。已受军警之蹂躏。夫前此之稍有贯彻。不得视为胜利。今回之重受痛创。不得视为失败。有挫折而后有大进步。有磨炼而后有真精神古来无数伟人奇士之不坏金身。无一不从烈火中锻炼而来。今最大多数爱国志士。遭此痛苦。以生于忧患之哲理观之。安得不为多士庆也。玥厕身实业界中。知我实业界之期望于青年。至深且挚者。不等玥等也。用敢不揣鄙陋。出其愚者一得之见。贯诸全国青年学生之前。处事尚实力。学生徒抱赤诚。以罢课表示民意。然而借兵力以固地盘。吸外资以肥私囊者。比比皆是空言要挟安能有效况乎青年学子年少气盛受爱国二字之激刺一往直前更无顾虑。疏于观己。更忽于观人。以为利刃在手。可无怯惧。不知宝此锋芒。以专用于批却导窾。遂致摧折。非不幸也。实处必然之势也。

玥尝综核时事。默察我邦人士。惟一之主张。大都为消极的对待。而绝少积极的互助。夫人生在世。惟互助主义。为最有裨益。互相助力。则人群进化愈速。而社会亦因之而日趋于善境。反是。未有不沦于危殆者也八九年来。政府政党。官吏人民。无不纷纷然用对待法以相牵制。以致政象日非。国本益危。忍令全国人士有为之脑力。可宝之光阴。不知觉。竟消磨于对待之中。殊可痛也。对待则骨肉竟变为仇敌。互助则吴越亦化为弟兄。二者得失之相去既如是。学生中深明互助之有益者。已不乏人。惜尚未充分豫备。广而善用之。进求更大之成功。玥甚望学生诸君。自今以往。益将互助精神。发挥而扩大之。然余所虑者。不但学生界内部微呈分裂之状。足致危害。即全中国内部偶呈分裂之状。亦间接足以危害。学生爱国之运动。此不可不彻底觉悟者一也。

科学入门有三要点。一视察力。二推想力。三公平之判断力。各种学业。无不由此三者而精进。世人但知科学系一种学问。而不知科学家。出其科学方式。以处理一切人事。更有莫大之作用。故科学精深之国。其普通国民之视察力。推想力。及公平之判断力。亦较富。健全之舆论。于焉曾出魑魅魍魉之辈。自然绝迹。而政治社会。遂于上进之轨道。我国国民之普通病根。在乎缺乏此三种真力量。故是非黑白。无有定论。而中原鼎沸之祸

患。遂由此酿成矣。今日一般青年。即来日国家社会中中心人物。国动之否泰。群治之升降。胥于三种能力之足不足上判之。此不可不充分修养者。又一也。

救国之道不一。有政治、教育、实业。及种种方法。并行不悖。当各界应尽之责任。蕲万矢一鹄。达此救国之大目的。青年当求学时代。故青年最大之爱国表示。尚在来日。而来日最大表示之豫备。在乎专心向学。作他日献身社会之整备。玥并非谓学生研究学术外。不应借他事以发泄爱国热诚。如前此之爱国运动。偶一为之。本无不可。然于国民方面。种种之弱点与各界周围之情势。不十分审量。仅凭一往直前之气概。屡次演此一成不变之手法。挫折之来。其又奚免。虽然亢进固为失策。受微挫而灰心。因外铄而变志。尤当力戒。青年奋斗之大成功期。固在他日。而不在目前。诸君等所以终抵此大成功之境界者。全在乎各人意志之坚定。宗旨之不变。回忆十五年前。对俄对日等同志会发现时。热诚慷慨。不亚今日。而今何如乎。由此可见我辈青年。淬厉自己志气。尤为前途成败生死关头。因此而祐更有忠告青年之前者。爱国热诚。宜深蓄而不宜轻泄。俾日后蔚成大材。为国效用。将来任处何事。不变初衷。此不可不夙夜自励者。又其一也。

诸君乎。国际竞争。于今为烈。经济之战。甚于铁血。东方大陆。原料丰富。市场广袤。万国视线。群相集注。为主人者。苟不善自谋。则巴尔干半岛之战祸。或不免见诸东方。然则我国人而能努力，振兴实业。非但足以图本国地位之安全。亦足以消弭他国之侵掠与冲突。而间接造世界之公福。虽然。振兴实业。谈何容易。今日我国实业之不昌。患不在乎资力之不足。而在乎主干人才之缺乏。主干人才既缺乏。即一切有望之新旧事业。不足健进。而坐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会。诸君乎。我中国实业前途。未可限量。玥深愿我全国青年学子。以此所受之挫折。作良教训。益自奋励。力求实学。以养成有用之全才。并熟观世界大势。洞悉社会真相。扩充互助精神。发挥视察推想公平判断之诸能力。更济之以百折不回之节操。投身各界。本诸所学。力谋发展。则中国未来之新命运。与学生诸君事业前途。俱无限量也。曷胜馨香以祷之。

一九二五年前后

〔附〕解决五卅案之我见

穆藕初

自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第七厂。击毙工人顾正红后。酝酿半月。未有解决。遂有五卅南京路之惨剧。且续有伤毙者。此案伤亡之众。当局之残忍行为。亘中外古今所罕见。群情愤激。莫可言宣。于是遂有六月一日英租界全市罢市之举。迄今已一星期。中外人士之愿任调停者。颇不乏人。而双方各走极端。不但无解决之希望。并此接近之方法。亦无所闻。良可慨也。虽然，欧战血战五年。卒归解决。况此种惨杀案乎。是在双方之揆情度理。推诚相与。并愿鲁连其人者。弗辞劳瘁。继续进行。则燎原之火。势或可少熄。而中外之感情。庶几不致过损乎。玥不敏。谨援各言尔志之义。就法理事实。以研究此问题。

及进行之步骤。本其一得之愚。贡献于邦人君子。幸垂览焉。

（一）负击毙工人学生市民之责者。应依法惩治。

（二）发令枪击之总巡捕头。应暂行停止职务。

（三）被押各人。应即释放。

（四）嗣后工部局应负责。声明不再有随意枪杀之举动。并不准西人越界掬人。及借口戒严。而随意搜检行人。

（五）撤消戒严令。

（六）撤退海军陆战队。及商团等。

（七）倘工部局允许实行二三四五六条时。各商行号。应一律开市。静候法律解决。盖此项惨案。关系至巨。亟应详搜证据。调查事实。手续甚繁。决非三数日所能竣事。故应取治标治本两法。而上列第七条。即治标之法。至其他惩凶、抚恤、收回公堂、要求市民选举权、及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项。此种要求。性质既各殊。而各国主张。势难一致。自应由吾国外交当轴。根据民意。赶速进行。以图圆满解决。此治本之法也。况罢市非制人之死命。实制自己之死命。虽能持久。牺牲太大。且沪地为全国金融枢纽。影响于全国商业实业者至巨。稍有常识者。不难推想而知。况目今所罢者。尚有其他之工与学乎。或者谓一旦开市，而民气即散。将来无良好结果。玥敢谓一鼓之气。不足为气。浩然之气。斯为真气。恐开市而气散。得毋太轻视我商人乎。玥并望吾国人。处事有区别力。推想力。组织力。坚忍力。则事无不成。而成无不满意矣。并望吾关系密切之重要商人团体及各业。勿依违两可。而无所适从。勿噤若寒蝉。而甘自暴弃。切肤之痛既身受。补牢之计安可忽。不识吾商界同人。其亦计及此乎。

〔附〕我们该怎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摘录）

梁启超

关于上海惨杀事件，我曾随同住在天津的几位朋友，用英文发表一篇宣言①，对于惨杀责任所归，及办理交涉最公平的手续，与夫外国人应具之根本觉悟，都有所论列。那篇宣言，是预备给外国人看的，有许多话不便说。事件一日未了结，对手一日未觉悟，只有继续我们的工作，以求达最后目的。我们的工作该怎样做法？我也有一点意见，试写出来求国人商榷：

（甲）作战计划

我们现在与强敌相持，完全在“平和的战争”之状态中，一着不能松，一步不能错。怎样才能“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我们须有一定的计划。

①梁启超等人在1925年6月初为五卅事件发表了一篇“对欧美友邦之宣言”，载6月10日北京“晨报”。——编者。

（一）战略　战略要取攻势，自无待言。但攻势要取最有效的，——能攻着敌人要害的，所以游行示威不能算攻势，只有罢工才是真攻势。现在上海差不多已达到总罢工程度，可谓深得战略要领。我们应该是全力援助罢工，增加他强硬和持久的程度，惟上海方面，却不必再为罢工以外之示威行动，不独是血肉之躯，犯不着和虎狼相搏，尤恐群众聚集，感情冲动，万一闹出点事，给敌人加我们以暴动的罪名，有理反成无理，那却值不得了。至于上海以外的援助运动，对于这一点，尤宜兢兢注意。

（二）战线　战线广漠，非惟难得照顾，而且易生破绽，所以范围愈缩小愈好。——后方援助，固然以多为贵；前线对垒，总要集中一点。——我们要认清题目，这个义愤是专对"上海英捕房"。所以：

（1）英国以外的外国人，当然不是我们敌人。作战计划，总要神不外散，战锋专向英国一国。总而言之，能减少一个敌人，则我们多得一分利益。

（2）上海以外之任何都市，我们绝不拿做阵地。——这回事件，纯属上海市民自由权之争，犯罪的是上海租界行政当局，故此我们不得不忍痛加以惩创。至于住在上海以外的，虽英国人，倘使他不直上海英捕房之所为而和我们表同情，我们原乐得认他为友；即使他没有什么表示，我们亦可以暂且不认为敌。所以各都市宣传事业经过唤起各地市民合力援助上海市民，我以为是必要的；若在上海以外各租界各自和英人宣战，在他们可以说罚不当其罪。在我们则势分力薄，倒反会把上海松劲了。所以对上海以外之英人罢工，我以为也不必鼓吹。至于上海以外各都市之罢市，我不能不极端倡言反对。上海法租界尚且不罢市，华界更不用说，此外都市罢市，究竟目的何向？若说借此对英人示威，试问北京南京……等地罢市，于英人有何损失？他怕你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个地方罢市一天所招的损失，最少足够供给上海罢工工人一天伙食而有余，三十个都市各罢市一天，便是减少援助上海工人三十天的力量！我们何苦消耗自己实力为敌人窃笑呢？至于"罢课为学生自杀"，这句话早已经多人提醒。若说借此为示威手段，则敌人最愿意我们的青年从此不进学校，他们才得有永远驯良的奴隶！他只有拍手大笑，点头赞成，何威之可示？所以我以为上海以外各都市之市民，只宜努力于宣传事实与募集战费，若在本市直接作战，无论采何种战术，都是无益有害。

……

（乙）媾和条件

战争不过一种手段，为什么战争？当然有最终目的。非达到目的不肯停战，目的所表现出来的便是媾和条件。战争胜负虽不能预期，媾和条件则不可不早决定。

……

根本条件，如收回租界……等等，一了百了，当然爽快。但刚才说过，我们会要价，人家也会还价，到底还是采"漫天要帐不买拉倒"的态度好呀！或是采"格外克已言无二价"的态度好？此中颇费商量。依我看，与其卖不成，宁可吃亏卖。据我个人私见，该提出不能再让的根本条件三条如下：

第一，租界内须有一个完全立法机关，纳税华人须与西人有同等的选举权。……

第二，废止会审公堂。……

第三，租界内任何国人所设工厂，关于劳工待遇，都要遵守我们政府所颁的劳工法

令。……

以上三个条件，或为各界所已提及，或未提及。依我看，这回事变，本来在上海闹起，因争市民自由权问题，因抗议恶税闹起，因援助劳工闹起，我们要认清脉络，抱定本题，方为名正言顺，不骛虚名，专求实益，所提者为对手方没有可以驳回之理由的条件，而办到后，我们国际地位可以改善几分，以全力持之，务求必得，如此才不枉费气力。我所提这三件作为不能再让之根本条件者以此。是否妥当，还望全国人士精严讨论，督促政府实行。

（原载1925年6月10日《晨报》）

〔附〕高调与责任（摘要）

（一九二五年六月）

丁文江

梁任公说，"社会上只爱听慨慷激昂的话，不爱听条分缕晰的话"。我要大胆的再引申几句说，我们的知识阶级最喜欢唱高调，不知道负责任！

…………

唱高调的人只用感情，不顾利害；只凭理想，不讲办法；只图目前说的痛快，不管将来如何结果。这一次上海的惨杀案，我认为是不难解决的——不难得到胜利的；无奈因为全国人好唱高调，已经把很好的机会错过了一半，把难得的同情丧失了许多。若是照这样相持下去，枝节越多，交涉越没有结果，我们又如何对得住流血的学生，失业的工人。

唱高调第一步的失败，就是上海的罢市。对外群众运动，不外乎两个目的：一个是对于敌人表示一种严重的抗议；一个是使得敌人受实际的损失。罢市不过是抗议的表示，外国人的损失小，我们的损失大，所以能暂而不能久；罢工则两种都有，而且外国人的损失大，我们的损失小，但是一定要能持久，总可以发生效力。所以当日上海方面应该只罢市一天或两天，使得外国人知道，上海全体的市民对于此件案子，一致愤慨。然后工商学三界联合起来，运动罢工，组织有系统的机关，来救济工人。如此见上海的中国商人，依然可以营业，才可以有余力来补助罢工，罢工才可以持久。无奈当日上海的学生，把罢市罢工当做一件事，同时举发，同样延长，到了现在已经两个礼拜。最有力量援助工人的商人，同时精疲力尽，再不开市，则营业损失，无法可以支持。况且端午节就在目前，节前各家都要结帐，若是开市，则明明示人以弱，交涉的后援，自然要受重大的影响。则不是只用感情，不顾利害的结果么？

唱高调第二步的损失，是北京方面不赞成组织中外会查委员会，使外交当局乱了步骤。当上海事变才发生的时候，梁启超朱启钤顾维钧等主张这种办法。因为我们既然不能向人家开战，自然要用交涉的手续来解决这种问题。不但我们自信上海惨杀的案子，我们方面万分有理，不怕调查；而且我们认为会查的办法对方不能不承认，承认了以后，中立

的友邦才有机会帮我们出力，我们的要求才有了确实的根据。所以会查是贯彻我们主张的最厉害的手段。况且上海工部局向来是无法无天，不受监督的。会查的性质，同前清查办差不多。他们一承认会查，就是承认我们政府可以干涉租界当局的行为。在外交上就开了一个绝好的先例。那知道北京方面的舆论完全不了解这种办法的利害。先说事实已经确凿，用不着查。以后又说上海的案子，是法律问题，解决不解决，没有多大的关系；最要紧的是先解决政治问题，先收回租界，先废除不平等条约。（参观十六日晨报北大教职员宣言）我先不承认上海案子是法律问题——果然是法律问题，我们政府就不能加入会查的机关——租界巡捕所以敢枪杀中国的徒手市民，直接的原因，是因为租界的中国人没有选举权，不能监督巡捕，会审公堂不是中国政府的机关；这本来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现在北京许多人的态度，以为政治问题全部不解决，那一部分都用不着解决，同时又绝对没有解决全部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手段。结果外交部变成功内交部，除去了向公使团发照会，敷衍国民以外，一点之手腕没有。眼看见上海罢市罢工渐渐不能支持，坐等着外国人由恐惧变成轻视，把大好的光阴，虚掷于笔墨官司。外交当局的责任固然是不能逃的，但是这种责任唱高调的人至少也得负着一半。难道他们真真相信，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是一时三刻可以办得到的，是上海罢市罢工时期以内可以有头绪的么？这不是只凭理想不讲办法的结果么？

…………

还有一种高调，可以叫做“主义高调”。好几年前胡适之在每周评论上做一篇文章，题目是“问题与主义”；劝人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一次上海惨杀案发生，有一班人不去研究经过的事实，具体的办法，来解决这件问题，却口口声声谈某某主义——骂人家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我们是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甚至于有北大的一位教员对人说，“上海被杀的学生越多越好；再多死几个，就有办法了！”在他们的意思，为了主义，甚么都可以牺牲，不过牺牲的是旁人，不是他们自己！

上面所列举的高调，都是只图目前说得痛快，不管将来有何结果；换言之，就是不责负任。唱高调固然可怕，不负责任，尤其可怕，我最痛恨的是有一班人躲在安稳的地方，大声疾呼的鼓动人家出头。这一次上海汉口两处死伤的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没有一个知识阶级年纪稍大的人在里面。牺牲是必要的，无益的牺牲是不必要的。上海的罢工是必要的牺牲，汉口的被杀是无益的牺牲。我们现在同心竭力，维持上海失业工人的生活，还恐怕来不及；又如何可以把罢工罢市之政策，遍及于全国？唱这种论调的人，如果他真正有牺牲的决心，最好到上海去对准了公共租界的巡捕用功夫。若是自己不肯牺牲，却提倡人家罢工暴动，这种人真是没有人心。

我要以最诚恳最严重的态度，劝告国人：慎用感情，研究利害，放下理想，讨论办法，少谈主义，专讲问题，外交总可以有成功的希望。

……

梁任公说学生罢课是自杀，这句话我们当然是承认的。然而平心而论，学生这种举动，也是知识阶级不负责任激出来的。假如上海这件事体发生以后，学生以外的知识阶级立刻有一种具体的组织，努力的为政府后援，那么学生方面，觉得国家大事，已经有年纪大一点的人负责任去担任，用不着他们出头运动，到现在还依然上课亦未可知。现在这班人

既不能替代学生，出头任事，又不能指导学生，使他们不致于白费精神，而且还要迎合青年的心理，说许多一无结果的感情用事的话，真正要令人痛哭。……

（原载1925年6月19日北京《晨报》）

〔附〕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

——对中国少年卫国团的演讲——

（一九二五年六月）

胡　适

沪汉事件已经发生好几天了，我都没有发表意见。我之没有发表意见者，一来是因为我们作学问的人，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就是事事不敢忽略事实。这件事情发生的头十天，我还不很知道事实的真相。无可疑的事实固然有几点，其他的有好些不敢相信，有些竟至于矛盾，所以不便随便妄下判断。二来因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门，不知道甚么，所以也无从说起。三来因为我病好一点出门来，各界的意见和议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也没有说甚么。现在事实已较明了了，我的身体也较好了，而在各种意见当中，主张较和平一点的人，似乎很是不能见容的样子。所以我想说几句话。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在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我的话也很平淡，没有甚么出奇了不得的地方。听说有人在执政府提议要把梁任公先生驱出国境，我觉得这大不好。我们不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吗？真正的自由精神在那里？出版有自由，言论也有自由。一个人只要他有种意见，在他自己总有发表出来的权利。在我们总不能禁止别人发言。意见的对不对又是一个问题，就算不对也尽有商量讨论的余地，何至于就说不爱国了呢？譬如昨天报载说我介绍学生与英公使见面，并说我与英国人勾结起来了。其实这件事是平常的。格里博士在英使馆作事二十年了，他很熟悉中国情形，中国朋友也很多。他托欧美同学会秘书章元善先生，章先生又再三向我说英使很想见见学生界的领袖，看看彼此的意见究竟如何。我想这也没甚么坏意，一面又是受朋友的再三委托，所以我才把此意写信到北大学生会的。同是中国人，我们是一样的爱国的。

今天是为中国少年卫国团说话，既是少年来找着我们中年人说话，无论对不对总得贡献一点意思。我的意思大约可以分为三层：

（一）要调查事实

（二）要有负责任的态度

（三）要认清楚步骤

（一）事实问题　据报上所载说：“巡捕房之首领爱伏生亲自供开枪之前只有十秒钟的警告，警告是用的英语，而所发之枪四十四响。”这是无可疑的。六月一号以后的事实，至今尚不十分明了。那一部分的参加活动，如何抢，如何打，亦不十分清楚。汉口九江之事亦然。既然事实上有许多困难，故不容易加入动机与判断。梁任公先生的意见与北京大学教授的意见所争的就是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我以为主张调查事实，不一定就是主张的只是法律问题。因为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都要交涉才行，而交涉则非有事实为依据不可，可靠之事实则非详细精密的调查不可。至于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同时进行的。总之我们于热烈之中当存理智，尊重事实。

（二）责任问题　何谓负责任？就是将主张的效果先想象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对于自己的主张负责任，就是有负责任的态度。

譬如主张宣战，就把宣战的效果想出来是怎样，有如何的影响。不要只是口里说一阵宣战就完事。谁去打战？怎样战法？陆军怎样？海军怎样？军械怎样？军费怎样？既是主张宣战，总得要筹画一下才算负责任罢。

又如主张经济绝交，这四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是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于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交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不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象银行在事实上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批评其主张的原故。

又如主张派兵到租界去。看起来调兵是很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兵到租界或租界的四围如象汉口所作的事，是不是与我想派兵去维持治安的意见一致呢？肖耀南的兵随便杀人，随便禁止。汉口还算统一一点。而上海有奉直的关系，孙传芳，张宗昌，郑谦，各有其用意。于此割据状况之下，调兵是如何呢？如果都象冯玉祥的兵队或者还可以。你们不看见中国的军队为烟土的事，就自己打战吗？

又如罢工罢市，在上海的人目睹惨况，身受其殃，他们罢市罢工，可以不谈了。其他的地方，如北京英使馆内或其他英人办的小工厂，运动罢工或者可能。但是这些地方罢了工，除了自己受极大的痛苦而外，而仇敌并受不到多大的害处。

（三）步骤问题　何谓步骤？就是我们作事要有一定的手续。关于这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以为应该分成两步去办。

第一步就是上海惨死事件及连带的汉口等处事件之解决。

第二步就是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解决。

一为暂时的问题，一为永久的问题；一为局部的问题，一为全体的问题。第一步比较容易一点，可以用很笨的武器——罢市罢工——去办。至于第二步可就不容易再用罢市罢工的手段了，用之效果小而易自蔽。何以说呢？因为这种群众运动，罢工罢市很不容易维持。比如上次五四运动全靠蒋先生他们在其间领袖一切，而目的又只在罢免国贼三人。今年的民气比较还是那年留下一点的好处。在第一步里面我们可以分做两层去办：

一层就是我们解决上海事件所提出的条件，至少要包括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保障此次罢工工人，制止越界筑路，取消印刷附律等项法律，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工部局投票权等，因为这些都是上海亲受其痛苦的人提出来的，我们非尊重之，替

他们争得不可。汉口等地的连带事件，也应照样的进行。如果这点都办不到，我们当然继续的罢工以及经济的抵制。

一层就是我们在解决上一层的时候，要附一个觉书，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这事很多人以为不可能，在我看来却是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为什么呢？那些条约或是利用他们的武力，或是利用我们的愚痴，其不公平而应该修正，理至明显。而且条约也总含有一点时代性，过了这么多年，还可适用而不修改吗？就以今日六国使团的通牒而论，说我们有排外的运动，他们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那里来的，完全由于他们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所以我们提出修改也是极正当的。其他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是赞成的了，所以我说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有修改条约的必要。以上为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根据第一步的要求，开修改条约的会议。我们应当用全力为此事奋斗。我们应当有国际公法学者的组织，研究不平等条约为修改条约的预备。我们应当设立对外宣传机关，以表示我们的决心与理由，而得各国人士之了解与同情。我们工商学各界应当有严密的组织，以为外交的后援。这样一来，不患不成的。

大家能够容忍我这一番话，我很感谢。

（原载1925年6月26日北京《晨报》副刊）

中共中央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全国的民众！抑知今日严重时局及其由来否？原来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五卅以至郭松龄反戈攻奉，中国的民众已有胜利的希望，帝国主义者发了恐慌，不得不亲自出马，援助他们的走狗向中国民众反攻。第一个反攻即是日本出兵满洲，帮助卖国贼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第二个反攻即是英国以大批军械帮助吴佩孚攻打河南，日本以大批军械帮助李景林张宗昌攻打直隶；第三个反攻即是广州英国帝国主义藉税务司利用中国海关封锁广州海口，为摧残广州国民政府和饿毙广东人民之计，并隐藏着藉此发动炮击广州的阴谋，英报且明白宣布将以十万大兵征服中国的计划；第四个反攻即是日本公然派遣舰队掩护奉军兵舰进攻大沽口，且炮击大沽炮台；最近第五次进攻即是他们反来借大沽事件以最后通牒威吓中国，且指使段祺瑞屠杀反对此项最后通牒的学生与市民，以形成今日严重的时局，即英日段张吴联合屠杀中国民众的时局！

全国的民众！我们觉得目前时局的急转直下，比之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件的最后通牒时，民国八年五月巴黎和约签字时，及去年五卅上海租界政府屠杀爱国同胞时，更严重十倍。五七、五四、五卅——这三时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屠杀同胞因而引起全国民众热烈的反抗运动。经过这三时期，中国民众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才形成了布满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可是现在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用枪炮军舰大队人马间接以实力扶助卖国军阀，企图根本消灭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全国民众历年牺牲的结晶，甚至稍具民族色彩的势力。消灭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实行屠杀全国民众，使全国民众永无翻身之一日，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目前这一时期是再危险没有的了。

正当全国民众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时，帝国主义者却用最后通牒拥护剥削中国主权最甚之辛丑条约。甚至在天津禁止中国当局检查外轮，超出已有的不平等条约范围之外。英日等帝国主义威胁中国的最后通牒，固然给中国民众以莫大的耻辱，同时亦是援助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等实力压迫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帝国主义者为什么援助张吴？当然因为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两派军阀统治中国之障碍，冯玉祥之失败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之胜利，这正是此时中国民众应该对冯军表同情的缘故。民众对冯军表同情之意义，不是拥护一个军阀，乃是督促他们与全国民众共雪帝国主义者所给予中国民族的耻辱。日本军舰在大沽枪杀中国许多兵士，虽然他们是国民军，可是也是中国同胞，亦不好任帝国主义者自由杀戮吧！

全国痛恨的段祺瑞为什么敢于枪杀大批学生市民呢？为谁枪杀他们呢？自然明明白白是老卖国贼段祺瑞受了英日指使，为拥护辛丑条约而屠杀爱国同胞！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

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全民的民众！我们能不为这些死者复仇么？我们能不讨伐这个杀人的卖国凶犯么？

全国的民众！帝国主义者已从各方面用最后手段对付我们了，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等已是显明的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了。他们所要摧残的目的物，自然是全国要求民族自由的民众，他们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首先要扫除达到这个目的的障碍物——广州的国民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因此广州国民政府和北方国民军与全国民众发生了生则共生亡则共亡的关系了。在此种时势之下，民众或则坐以待毙，或则急起直追，杀出一条血路，除此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据我们想像，无论平时有何政见不同，无论是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富商大贾、研究系、进步的军阀官僚等等，在此次斗争，即对于讨伐段祺瑞取消辛丑条约和洗最后通牒的耻辱这三件事，都应有所动作，若有人坐视不动，无论平时说得如何爱国，无论是否以反赤为口实，都是中国民众中的败类。

苟安的心理是再不能有了。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打倒了段张吴，中国才有和平的可言。否则苟安就是送死。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告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

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

肃清一切卖国军阀！

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

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

欲达上列四项目的，真正爱国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们北伐使命，同时亦不惜以重大牺牲，实际援助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最后的时机到了，我们再不能犹豫了。或存或亡，在此一举！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共中央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全国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兵士各界民众们！

在帝国主义者所称“赤色的五月”，尤其是赤色的“五卅”，无论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怎样诅骂我们，恐吓我们，如果我们中国人，心还是赤的，血还是热的，便不能不拿出一百二十分热诚，来纪念去年今日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运动，即赤色的五卅运动，并继续这一运动，一直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完全解放，才算是完成了五卅运动的工作。

去年今日的五卅运动，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压迫者帝国主义作大规模反抗之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帝国主义者知道这一联合战线的运动，足以使他们的在华既得权利根本动摇，并且民权将因此伸张，拥护他们权利的中国军事独裁政府，也要根本动摇。所以五卅运动一开始，帝国主义马上便采用分离这一联合战线之政策，如以关税会议增加二五，贿买北京政府，使它离开这一战线；以上海西商会容纳总商会要求的口惠，谎骗中国大资产阶级，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赤化过激等头衔，恐吓知识分子及小商人，使他们离开这一联合战线；最后则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老实不客气的压迫由奉天到上海之一切民众运动，并破坏其组织——工会、学生会、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等，而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

五卅运动中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既为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所破坏，又加以奉系军阀之高压，中国的革命形式，由五卅运动一转而为反奉运动。反奉运动中，因为有国民军及直系军阀之加入，其声势颇大，尤其是郭松龄反戈时，直系军阀至于急急向国民政府及国民军联和；然而卒以没有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充实这一运动，以致郭松龄败亡，国民军溃退，北京便发生了空前的“三一八”大屠杀，反奉运动失败，反动政局遂自此开始。

同时，在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方面，已经由破坏我们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建立他们所需要的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即反赤联合战线，由英日帝国主义者结合奉直两系军阀及一切反动派，向一切所谓赤的势力进攻，由郭松龄败亡，到北京“三一八”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反赤联合战线运动之开始成功。

并且帝国主义者反赤运动全部企图及其成功，还不止此，现在已经可见的是：（一）以反赤口号结合了奉直两派军阀，又以实力援助他们将所谓赤的国民军驱逐到长城外，他们的烧杀、强奸、抢掠、强用军用票、增加苛税杂捐，枪毙记者、搜查学校、查禁工会农会等“反赤政纲”，已经在北京及直鲁豫各省实行起来；（二）集中了奉直两派军阀势力，统治了中国北部及中部，并想组织直奉两派的联立政府——比段祺瑞时代更反赤的更巩固的

军阀独裁政府，来大借卖国外债，来有组织的压迫民众；（三）嗾使直系军阀由湖南、江西、福建向赤色的广州国民政府包围进攻；（四）更准备一点小小恩惠（如汉口上海租界工部局增加华董，上海租界公园开放增加华董，表示上海会审公堂可以交还，停止越界筑路可以商量等），引诱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加入他们的反赤联合战线；（五）收买一班失意政客、高等流氓及所谓老民党，到普遍的反赤宣传，一直影响到赤的营垒内部，使赤之自身也有意的或无意的发生了反赤的倾向，若国民军主张整顿学风及放任段氏之“三一八”大屠杀，若国民党左派竟接受了右派西山会议的理论及主张修正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如三月二十日事变及五月十五日会议的精神所表现。帝国主义者反赤运动之成功，现在已经可观了，由去年五卅至今年五卅这一年中，已经使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变成全中国的反赤运动，已经使中国革命的高潮，变成了反革命的高潮，并且将来他们必然还要继续干下去。总之，帝国主义者为他们自己在华既得权利之保障及继续发展，其势必然要尽量利用一切反赤势力联合，以铲除中国所有赤的势力，好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永远消沉下去，不至死灰复燃，这才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赤运动之全部企图及其成功。

可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虽然很强大，而他们当中利害冲突也很大，他们自己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发展，更是他们的致命伤；直奉两派军阀虽然比民众有强大的武装，而他们当中有旧的历史仇怨和新的利害冲突，决无长期合作之可能；至于一班反动派的反赤宣传，已经由反赤军在北方之行动，渐渐使一般社会感觉得反赤比赤实际可怕，因为赤的行动与宣传，并未曾实行或主张没收人民财产，而反赤军却以派捐派公债军用等名义，没收了北京及直鲁豫各省人民的无数财产，因此他们的反赤宣传已渐渐失了效力了。以上是反赤战线这一边的形势。

赤的战线这一边的形势又是怎样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事实一天不消灭，中国革命的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也一天不会停止，即最和平稳健的大商资产阶级，以实际利害关系，也不至无条件的变成不复燃的死灰，况且现在这灰还未死；国民政府及国民军，虽然有了一些右倾的错误，在客观上终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及破坏军阀势力的力量，他们若能得着赤俄及全世界赤党、赤色工会更有力的援助，他们是能够为各阶级革命的民众扩张地盘的。

由这两条战线的形势看起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赤运动之全部企图，能否得到最后成功，当然是个疑问。不过依我们从去年五卅到今年五卅这一年中的经验，赤的战线即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要想不为帝国主义的反赤战线所破坏而获得最后胜利，第一要紧的是充实巩固自己的联合战线，大家都要认清自己的战线和敌人的战线，认清那些是自己战线内的友军，那些是敌人战线内的敌军；并且要认清敌人战线内的敌人终是敌人，不可因其笑脸甘言，遂以为可与合作；更要认清自己战线内的朋友终是朋友，不可因细故而分裂战线，为敌所乘；不可宽待敌人而苛待朋友。

从去年五卅到今年五卅，赤与反赤这两条战线，都分明列在我们面前，赤的战线之胜利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胜利，失败的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反赤战线之胜利即帝国主义与军阀之胜利，失败的是中国民众；最近北方反赤战争之结果，已明白告诉我们是这样，已不再由我们犹豫再思索了！

全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兵士各界的革命民众呵！血肉模糊的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啊！各阶级的革命民众都应该挺身奋起，

以满腔悲愤，恢复去年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并扩大巩固此战线，以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只有实现真正代表民众的国民会议，接受政权，才能够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这两件事都不是结托帝国主义而存在的军阀政府与代表军阀的国会所能够办到的。我们今年五卅纪念的口号是：

赤的五卅烈士精神复活起来！

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复活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的反赤运动！

打倒直奉联合的反赤！

实现国民会议！

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

（一九二六年二月）

邓　中　夏

中国职工运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他却有惊人的进步，特别是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可以显明的表现出来。现在把五卅屠杀后的几种新现象指出，就可以知道了。

第一种新现象，工人阶级事实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

在一年以前，我们曾说：“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不消说是领袖，就在国民革命中他也是领袖。”当时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此理论一出，一般所谓“高等华人”和大学教授以及短见的知识界青年，无不嗤之以鼻，以为工人阶级又在吹牛。可是经过此次五卅反帝国主义之空前大运动，我们的理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件事实在上海、广东两地罢工证实得格外明白。当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总指挥机关，其中有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中等商人的组织，一般大商买办阶级，另有其团体，叫做上海总商会，是未曾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的。大商买办阶级简直没有诚心和勇气参加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在运动初起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然而他们参加不是自动的，是受工人和学生用恐吓式的乞求才做的。在工商学联合会中，上海总工会做了中坚势力，差不多一切政策，都是上海总工会定的，商人、学生及一切民众都只跟着走。此次运动维持数月，其中表示最有力量的，只有工人；学生罢课，也不能使帝国主义受何等重大的影响；商人罢市虽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然而仅仅二十三天，他们就开市了，半途退出战线了，软化而妥协了；只有工人罢工，坚持三个月之久，誓死奋斗，奋斗到援尽粮绝，方忍痛罢休，因而失业者数千人。由此可见工人阶级革命精神是何等猛勇而坚决。广东方面尤其显然了，省港罢工中，香港全体工人罢工，学生只有一部分罢课，商人则漠然不动。在广州只有沙面工人罢工，教会学生没有声息，商人更不用说了。工人差不多孤军奋斗，至今七个半月，始终不敢言疲。举此二大例，便可证明工人阶级在事实上已经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从前一般“高等华人”、大学教授及短见的知识青年笑我们理论为吹牛的，现在也很小心的恭顺的在他们的报纸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袖地位了。因为事实还是事实，虽有百喙，是抹杀不去的。五卅屠杀后的时局，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动机，我们敢担保此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当益见崇高而巩固。

第二种新现象，各地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

“五卅”以前，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还不是普遍的现象，湖南、湖北各有一个工团联合会，广东、香港虽有一个总组织并未统一。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事实上无处不一致行动，于是团结二字在工人群众中已无形中承认其必要，而要求一个地方的总组织。如上海工人在此次运动中，组织了一个上海总工会；河南工人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济南工人组织济南总工会；天津工人组织天津总工会；就是历为帝王之都专制压迫成为惯性的北京工人也组织了北京总工会。这些地方的总组织，从前都没有，都是在“五卅”后才发生的。就中尤以上海总工会为最有成绩。上海从前招牌工会倒不下二、三十，实际上有工人群众的只有一个海员工会，一个印刷工会，五个纱厂工会，两三个地方主义的联合会，和一个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南洋职工同志会与资本家合组，严格说起来，算不得纯正的工会。那时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不过二万人。“五卅”后，工会增加至七十余个，有组织工人实数增加至十二万余人，同性质的产业工会还组织联合会，如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之类。这些工会统统在上海总工会统率和指导之下。河南、天津、济南、北京各地的总工会，亦皆名实相符，有许多新旧工会为其基础。就是广东、香港亦有一种新气象，大家都知道广州有工人代表会、广东总工会之分，香港有工团总会、华工总会之别，而且香港还有许多大工会还未加入总组织。各树一帜，互不相谋。但自省港罢工后，而统一工会之呼声随之而高，异口同声要求一个统一的地方总组织。由此可知工人群众不仅要一个自己产业的或职业的组织，而且要一个联合各业工会的地方总组织，集中势力，谋全国的大联合了。

第三种新现象，资产阶级更深刻觉悟而向无产阶级进攻

本来资产阶级在争政权或反对国内外压迫势力于他们自己有利益的时候，会与工人阶级携手的，如法国革命、俄国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曾利用无产阶级，可是一达到自己阶级的利益或工人行动与自己利益冲突时，则压迫无产阶级之事便发生了。再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携手反抗外力的时候，如果无产阶级同时要求自己经济的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他们就立刻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如印度资产阶级就是一个好例子。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这次五卅运动，资产阶级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抵制日货、英货，抵制外国轮船，都是于他们有利益的，所以开始时赞成罢工。后来发现工人阶级势力澎涨了。又且工人有为改善经济地位向中国资本家罢工的倾向，所以他们越发害怕起来了。论理，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的利益而奋起斗争，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即就国民革命的观点说，亦是应该的，且是必要的。此一层道理，资本家因为于他自己荷包有损失，固然不懂得，就是大学教授也不懂得（如北京“现代评论”），国民党右派也不懂得（如戴季陶之反对阶级斗争论）。他们这些“对外好了何必对内”、“为了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幼稚得可怜、荒谬得可惊的议论，却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护身符，而压迫工人则愈演愈凶了。河南豫丰纱厂罢工，穆

藕初公然用武力打杀工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罢工，也出其酷辣手段摧残工人了，资本家“仁爱的性能”那里去了？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有更深一层要求政治势力的觉悟，譬如上海华界政治势力向在军阀手里，及奉张败退浙孙入沪之时，上海大商买办阶级因利乘便，不仅拥有保卫团的武力，而且居然取得警察厅长，又握有警察的武力，一朝权在手，对于工人之集会、结社及一切爱国运动，压迫得比奉系军阀在沪时尤为利害，尤为惨酷。一方面扣着各处为罢工寄来的大批捐款不发给工人，以经济困之；一方面又利用权力公然暗中枪毙工人领袖刘华，不宣布其犯何罪，以政治势力压之；再一方面又招集一班流氓组织暗杀团，专门伺击工人领袖及捣乱工人集会，以法西斯团摧残之。资本家比军阀聪明得多，利害得多呵！

第四种新现象，工人阶级战术进步已有压迫不下的战斗力

“五卅”以前中国工人组织固然薄弱，战术亦极幼稚，什么是政策，在工人脑筋中是没有这件东西的。如京汉“二七”之役，一经严重惨杀，遂至无法再与军阀斗争，差不多经过一年才渐渐复苏。自前年北京政变曹、吴倒台以后，工人阶级乘时为恢复工会之运动，应用他们已有之经验与知识，于是而战斗能力突增，经此次五卅运动，他们的战斗能力更为充分表现出来了。如此次上海与省港两地之大罢工，他们不仅知道紧严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势力，而且知道应用一切于罢工有利的政策，并且应用政策亦极适当而完满。在上海方面，开始便联合学生及中等商人一致胁迫大商人共同参加爱国运动，并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反帝国主义之总指挥机关。随后大商人中途妥协而反动，工人能密切联合学生及中等商人以作对抗。当时工人所最感痛苦的是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加以政治的压迫；大商买办阶级把持各处捐款加以经济的窘困；以及走狗、流氓、工贼捣乱总工会暗杀工会领袖加以暴力的胁击，然而工人对于此等横逆之来，皆能应付裕如，终至维持战线迄三月而不溃。随后江、浙战起，奉军被孙传芳赶走，大商买办阶级遂联系而攫取上海政权，起而代之。一班人总以为孙传芳反奉通电，曾以奉军压迫爱国运动为奉张之罪，孙军到沪，人民爱国运动当可自由，孰知适得其反，而且变本加厉。大商买办阶级是很聪明而精细的，地方情况既周知无余，压迫方法亦推陈出新。禁止示威巡行，禁止派散传单，禁止当街讲演，禁止聚众开会，这是军阀亦想得到，不足为奇，不过大商买办阶级更为利害些严厉些罢了。最出奇的，是组织法西斯团狙击工人领袖，严拿共产党人，确系大商买办阶级的拿手好戏。但是工人却并不因此而畏缩，再接再厉，屡仆屡兴。上海总工会被封一次，又要求启封一次，甚至副委员长刘华被杀，同时他们却自动启封总工会，继续办公。一个重要领袖之死，是如何可以惊心动魄的事！若在“五卅”以前，工人处此险恶情形之下，早已豕逐狼奔纷纷溃散了，然而现在他们并不如此，一面固为领袖被杀抱无限之悲愤，一面却努力恢复总工会作从容之应付，泣血饮恨，待时复仇。这是何等沉毅勇决的工夫，岂无训练的工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吗？在省港方面，工人所用政策皆根据特殊环境规定出来，自工商联合善后条例出，而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乃破，日、美轮船直来广州，商店迁出沙面。自经济独立沪航沟通之策定，而工商之联合战线愈固，广州商务逐见畅旺，黄浦开埠指日可期。自肃清反革命派之议起，而工人与政府之合作益密，东江收复，

南路敉平，广东统一，北伐有望。种种政策，不仅稳固了罢工营阵，而且大有造于广东发达，这岂是“五卅”以前工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吗？无怪香港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干涉广东之恫吓政策，勾结反革命派之谋乱政策，欺骗中国商人之挑拨离间政策，著著归于失败，而罢工维持八月而不疲。其余如天津、湖北、北京等处，工人皆有同样的表现。根据种种事实，可断言中国今日之工人，决非昔日之工人可比了，越加压迫，越起反抗，况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势力日就崩溃，要想打灭工人势力如“五卅”以前一样，黄河西流，白日东逝，那里有可能哩。

第五种新现象，工人阶级需要政党

从前中国工人不仅听着“共产党”三字要谈虎色变，就是听着“国民党”三字也要掩耳而走（自然广东除外）。自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后，国民党算是不令国人那样可怕了。然而共产党仍然令人可怕。帝国主义者诬蔑共产党为“过激派”。一般人心目中想象过激派不知是如何凶猛的怪物。况且在西文报上往往看见过激派的影片，大抵蓬首垢面，胡须鬆鬆，与原始时代的野人相差不多，一望不禁令人生畏。其实这照片多是所谓过激派出狱时所摄的，被捕下狱，动经十年八载，须发不加修剪，西人故多须，年长不剃，自然毛松松一个了；一般人见此类照片，以为过激派皆是如此（其实过激派固不少美秀而文的少年哩，一笑！）乃其错觉之过。并且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对于所谓过激派，故以神来之笔，加以灵动描写，真是过激派不知是什么一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般人为帝国主义者的反动宣传所迷惑，分明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牺牲的战士，对之反表示深恶痛绝的样子。从前一般工人自然亦不免有此错误的见解。但是自经共产党历年来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牺牲，兼且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京汉罢工杀了施洋、林祥谦，此次五卅运动，上海杀了何秉彝、刘华，青岛杀了李应农，安源杀了黄静原，其余被杀被捕者尚难指数。共产党是革命前线的先锋。工人群众觉得共产党是很可亲爱的，觉得共产党所指导的政策是很好的，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益的。所以不论“反共产”之潮流是如何高涨，然而愈坚定工人对于共产党的信仰。你不看见现在反共产的微菌弥漫了全中国吗？帝国主义为反共产之指使人，不待说了。军阀方面，在南方，杨希闵、刘震寰反共产，陈炯明、邓本殷反共产；在北方，张作霖反共产，吴佩孚反共产；买办阶级大地主方面，广东陈廉伯、陈恭受反共产；上海张謇、虞洽卿、穆藕初反共产；官僚政客方面，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反共产，国民党中反革命派如邹鲁之流反共产；知识阶级方面，北京一部分大学教授反共产，上海一部分遗少的国家主义派反共产。论理在这种四面包围严重压迫之下，共产党早应摒诸四彝，绝迹于中国了，然而此种反共产之呼声，不仅无损于共产党的毫末，而且增进了共产党的信用，特别在工人、农民一方面。工人群众从前觉得毛松松的过激派可怕，现在他们自己也很兴奋的要做毛松松的一个了，相率要求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只有共产党是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谋解放的党，所以他们对共产党关系之亲切，简直超过他的家庭之上了。

第六种新现象，中国工会与各国革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

此次五卅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势力，而且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上海总

工会直接指导之下，以致造成震动一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帝国主义受空前未有的要害打击。原来工人阶级由经济关系悟到政治关系，这其间有一个长距离，很不容易跳过的，只有一九〇五年之俄国革命有过一次□□□□工厂的经济关系悟到国际的政治关系，尤其不容易了。中国职工运动历史虽短，然而它却跳过这一个长距离。此次五卅运动，起因于上海日商纱厂里之经济事件，打死工人顾正红，不久发生南京路之大屠杀，遂急转直下变成国际间之政治事件（民族事件），于是而引导全中国人民一致作反帝国主义广大的剧烈抗争。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中国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确实表现了它的惊人的能力，亦因有其相当的组织与训练，和有全国联合的集中的总组织，所以它的能力才能这样充分表现。这一点是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和钦佩的。此次五卅运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都曾有过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不用说了。赤色职工国际为全世界革命工会之大本营，曾为中国此次运动对所属各国工会发了一道训令，其文曰：

“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团与苏联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和日本回来后，报告云：‘中国的职工运动，现已大有进步，而且已有政治的成熟，与赤色职工国际，完全相同。’代表们又报告许多事实，皆足证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尽力压迫这种幼稚的职工运动。

本执行委员会以为苏联全国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两者近来的密切接触，即是使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际职工运动的大进步。所以本执行委员会想要所属各国工会，与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联合，并预备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幼稚的工会运动，给以灵活的帮助。……

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者！

…………”

这一篇短短训令，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一个最可宝贵的纪念。因为中国职工运动已有数年历史了，从未得到过赤色职工国际这样使各国工会与中国直接联合的训令，由此可以证明中国职工运动自“五卅”后确在世界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赤色职工国际训令各国工会与某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定要它那一国职工运动确有相当成熟的能力，才能与各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中国工会从此经常的与世界革命工会相见了，这也是“五卅”后发生的新现象。

（原载《人民周刊》1、3期，1926年2月7日、24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们：

去年第二次劳动大会后接着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在此次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上海和香港工人，表现出惊动世界的战斗力，不但使帝国主义及军阀震恐，并且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震恐；香港工人至今尚能支持一年的政治罢工，上海工人也能保持为从来所未有的群众组织，这是使今年的大会比上年的大会，更有新的生命。

现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虽然还很幼稚，而在政治争斗上，弱小的中国工人运动，已在世界革命影响上收了很大的结果；这是因为工人运动一开始，不但有静的组织，而且有了动的政治争斗——民族革命的争斗，使计算世界革命力量的人，不得不把中国工人的力量列入。

现在反动军阀的势力又布满了北京，使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是路工和矿工运动受很大的打击；然而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决不能长期的维持其统治地位，我们工人群众正应在此反动时期中，格外努力积聚我们的力量，即静的组织力量，以备马上将来的动的政治争斗——与军阀决死战的最后争斗。

我们以后积聚我们的组织力量，不应仅仅是产业工人，并要普及于一般劳苦群众，以扩大我们在数量上的战斗力；我们的力量在数量上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在争斗的质量上也是会增加的。而且，我们不但要组织一般劳苦的工人群众，并且要和劳苦的农民群众组织亲密的同盟，领导他们参加一切经济的政治的争斗才免得工人阶级孤军独战之困难，因为现时中国工人的数量在全中国人口比例上还是很小。

总之，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及巩固全〔体〕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才能够抵抗一切特权阶级的压迫，以至获得我们政治争斗的初步胜利——民族革命的胜利。

本党是代表中国工人及农民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责，是领导中国工人农民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争斗；同时，在民族革命中，代表中国工人农民利益而争斗。

本党和工人同志们携着手奋斗已经四五年了，现在方开始和农民携手走上战线，因此，在此次大会提出“全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大团结”的口号，以贡献于大会，并祝大会之成功。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

中国劳动运动万岁！

中国工农大团结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原载《向导》151期，1926年5月1日出版）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

——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

（一九二六年五月）

刘 少 奇

各位代表：今日主席团要我来报告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我所报告的范围，只限于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自第二次劳动大会至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情形。

一、第二次劳动大会前后之中国职工运动概况及第二次大会之意义

（1）政治状况　当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之前，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发生了利害冲突，此时北方之奉直战争，吴佩孚被张作霖逐到岳州，表面上虽是中国国内战争，其实是英日两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英国帝国主义之工具——吴佩孚的势力已消沉下去，张作霖则依靠日本势力而伸张兵力于长江一带，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利用其老工具段祺瑞执政中央。如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一时衰落，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势力则极为伸张。英日两国在中国的利害冲突起来，造成中国的内乱，中国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得一个发展的机会。

（2）中国军阀政治之动摇　此时段祺瑞虽执中央政权，但并无实力，不过做奉张的傀儡而已；同时，国民军亦甚有势力，比较与民众接近。那时张作霖因无统治中国的能力，段祺瑞更无法令任何军阀；同时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也产生了。当此军阀政治并未稳固之时，所以无论任何派军阀，对于民众，尚不敢十分压迫，而中国职工运动得有发展的机会了。

（3）国民革命潮流之高涨　奉直战争发生，国民革命的空气普遍全国。各处都有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组织。斯时孙中山先生乘机北上，极力宣传，国民革命的潮流十分高涨。还有一事，即孙中山先生之死。固然，中山先生死了，中国革命要受很大的损失。然在各地纪念会之举行，全国民众对于国民革命的意义，益更明了，革命运动的空气，反因是而更加高涨。国民运动潮流之高，当然影响职工运动之发展。

（4）中国职工运动自二七失败后，至此已到复兴时期。在此时，上海有二万工人之大罢工，青岛亦有万多工人之罢工，“二七”后在北方被封之各铁路工会，亦于此时恢复

起来，湖北一带工会，亦渐次恢复而发生罢工，又广东之铁路工人罢工，兵工厂工人罢工，援助革命政府，肃清刘杨，此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之现象。

（5）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工作及其影响　各位或有参加过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此次大会的重要议决案是什么呢？一，工农联合　固然现在工农联合不成问题，此大会后或许更加发生密切之关系。但在第二次大会时却是很有意义，因在中国工农联合的议决案以此为第一次，故自后中国工农的关系更趋密切。二，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发生正式关系自此始。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即得了良好亲挚之助友。三，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因为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做中国工人的总机关，即使全国工人有了统一的总组织。如此，全国工人的团结更加坚固，各地工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实有重大的影响，其次关于统一广州工会组织与统一香港工会组织等，均为第二次大会决议案最紧要之部，到现在广东香港工会之能可进行统一者实种原于此。

至于第二次劳动大会在中国职工运动中之影响亦非常重大。我们在第二次大会中对于革命的工作，奋斗的方针，已经确定了。这次大会的精神，各代表都带到各地方尽量宣传，把大部分中国工人都影响遍了。因为有此关系，所以中国职工运动的潮流，已高涨至相当程度，能在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能领导社会各阶级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道路，省港罢工能即刻实现，广州香港工会组织之能进行，可说是第二次劳动大会影响之结果。

二、“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中国有历史以来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运动；也是中国职工运动自有历史以来一个最高涨的时期。这次运动，差不多全中国的民众，通通参加了。其影响之大，情形之复杂，我固不能一一详细报告。据统计，全国直接参加五卅运动的人数，约一千二百万人，间接参加者，乡村僻壤均有参加，至难以统计。我现在分别报告：

（1）五卅运动之起原　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时候会发生这样大的“五卅”运动呢？一，因为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急进，我国人民受帝国主义者压迫过甚，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之情绪亦十分激烈。二，因段政府之反动，对于民众运动非常压迫，如禁止“五一”“五四”等示威巡行，又无条件解决金佛郎案，以引起人民极大之愤恨。三、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产生。四，中国职工运动已在此时复兴，并有坚固的组织。五，因为革命潮流之高涨，全国民众已知反对帝国主义之方法。有以上各种原因，所以“五卅”南京路之惨案发生，而轰轰烈烈之反帝国主义运动即因而兴起。

（2）五卅运动各地之最初形势　一，上海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参加罢工者有廿五万工人。所有英日两国工厂之工人及洋务工人，莫不加入。有此罢工，上海形势异常严重，帝国主义者发生极大之恐慌。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入于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亦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此是中国境地之情形。至于在租界内，则大不同了，我们只看见工

厂闭了门，商店闭了市，侦探往来，巡捕满街，机关枪大炮布满街口，都作射击之状，此为租界恐怖严重之情形。

二，在此期间，第二个大事件发生，就是省港罢工。我们知道省港罢工，系援助上海五卅惨案而罢工，亦是“五卅”运动之最紧要的事实。自五卅惨案发生广东政府肃清杨刘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即派人到沙面及香港运动工人罢工。自罢工后各工人都返省城，并将港口封锁。因为香港系无出产之小岛，粮食即已断绝，居住的人，自然远迁；商人无贸易，房屋无人居住，街道之中，污秽不堪，所以有人说香港变成臭港了。沙面形势亦是如此。但在省港罢工后，六月二十三沙基惨案又继五卅惨案而起，所有英国帝国主义者货物不能再到广州，即沙面与广州虽仅隔一河，而沙面货物，如欲转运广州，非先运往香港上海，而后才能运至广州。香港英帝国主义者自侵略中国以来，所受之打击，以此次为最大。此为省港罢工之大略情形。

三，其他各地形势，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全国各地形势，亦非常紧张，非常严重。比如北京：所有的学生，工人，商人，亦非常愤激而参加。北京的工人群众虽然处在压迫之下，亦开会巡行，演讲募捐，十分紧张。北京英国公使馆之工人，起而罢工，英使馆极感不便。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在五卅案未发生以前，已发生二次罢工，五卅后又起第三次罢工，复遭一次大屠杀，参加此次运动者有万余人，除纱厂工人之外，还有铁路工人参加，不幸遭帝国主义工具张宗昌残杀，工人领袖李慰农亦被害，还有许多因为参加运动，而被捕拿监禁者。青岛工人这种牺牲精神很有价值；各工友定要继续此精神而奋斗！

至于武汉在五卅后，各界民众甚为愤激，曾有四十万人之水陆之大巡行。汉口外国码头工人，此时起而罢工，复遭英国水兵枪杀，死工人八九人，同时军阀萧耀南，亦助桀为虐，枪毙萧英，被通缉者数十人，而武汉大运动，即因此沉寂。复次，天津在五卅后所有民众运动亦极热烈，海员及大多数纱厂工人，均同盟罢工。这些罢工，虽然有的是为本身利益，而大部分实为反帝国主义运动。不幸在罢工后，又被军阀李景林之大惨杀，对于工人各界群众集会结社种种自由，均被剥夺，并且逮捕各界及工人领袖五百余人，枪伤学生百余人，一切团体，概被封闭，天津运动，卒为军阀所压下。唐山开滦之英国煤厂，在五卅后，亦同盟罢工，亦为李景林派保安队，封闭工会，捕拿数十人，用武力压下。南京方面，在五卅后，也有极热烈的运动，英国和记公司工人罢工而得胜利复工。后因英人不履行条件，而举行第二次罢工，又为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压迫下去，死伤数十人。其他如九江、长沙、重庆、河南等处，五卅后，均有罢工运动。而无处不遭帝国主义与军阀枪杀，无处不有工人死伤。

此外还有一个例外的地方，就是东三省，东三省的民众，对于五卅运动，本非常热烈，但被张作霖严重压迫，巡行演讲集会结社等自由，均被禁止。故运动异常沉寂，即民众捐助罢工之款，亦被政府勒令发还，如此足见奉系军阀之压迫，以上所说为五卅运动中，各地民众及工人阶级之奋斗情形。从以上的情形，可以看见各地均有极热烈的运动，和巨大的牺牲，此种运动与牺牲，以工人为最多，而又以工人为最力，处处都有罢工，处处都有惨杀，而惨杀之结果，死伤者多是工人。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实际地处在领导地位，此时工人阶级，几成全国总罢工的形势——统计全国在五卅运动中，工人罢工者有五十余万人。

四，帝国主义者应付此次运动之策略。英帝国主义对付五卅运动，始终是强硬的。其初以武力在南京路惨杀我们之后，又继续在沙面，九江，汉口，重庆等处，施以枪杀。在交涉方面，他们总是不负责任，希图抵赖，同时又四放谎言，谓此次运动是"过激"是"赤化"，冀以离间中国民众之结合。并竭力勾结军阀及中国资本家压迫工人。至日本帝国主义又怎样呢？五卅后，日本的表示，总是狡卸，而欲完全将五卅的责任，推到英国身上。他说纱厂罢工，是一个问题，而南京路之大屠杀，又是一个问题。南京路事件，是英国的责任，他们又在日本国内的报纸上说，中国反抗英国的运动，是对的。而英国对中国人之屠杀，是不对的。同时又提倡大亚洲主义，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人，应该联合反抗白种人"云云。其他在五卅后，对于日本纱厂罢工风潮，鼓吹单独解决，并向中国人表示好感，以促纱厂风潮之早日解决。此是日本帝国主义希图狡卸五卅责任之表示。至美国呢？他就说"我们与中国素来有好感，此次罢工，美国之洋务华工，不应参加，我们美国总是帮助中国独立的"。由此可见美国的假面具，更戴得好看了。至法国呢？也是向民众表示好感，希图民众不反对法国，比如五卅后，群众能在上海法租界巡行，民众的机关，他亦不禁止。这亦是他的狡猾之表示。以上是五卅运动起初时，各帝国主义者的态度。观此，其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实各自为战，并无一致之结合。到后来，各帝国主义国家，渐趋一致了。英日法美渐有联合进攻中国民众的形势。尤其是日本与英国的结合，更为明显。比如张作霖初为日本走狗，"五卅"事后而张作霖竭力在各处帮助英国残杀中国爱国工人及一切民众，禁止英国工厂及海员罢工，即此可见英国日本已经结合向民众进攻，这是"五卅"事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民众之态度改变的表示。

五，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上海在"五卅"事后，中国大商家也同有罢市的举动，但非其本意，完全是受工人学生之包围而罢工的。在此即可见中国大资产阶级之革命性不充分，并有很多事实，可证明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比如"五卅"事后上海革命民众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请总商会（资产阶级的团体）参加，而总商会并不参加，他说，"我们要居在调停人地位才好"。这可见大资产阶级之妥协性。追后工商学会联合会提出要求条件十七条，全上海民众均拥护，而总商会则独反对，另提出要求十三条，把"撤退外国海陆军""工人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收回领事权"条删去。这又可以证明其妥协性，预备把工人学生拍卖了。他们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主张无条件解决日本纱厂罢工。其后，他们罢市廿三天，急于运动开市，虽有工人学生小商人极力反对亦不顾及。这种种事实足以证明中国大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上海开市后，大资产阶级更变成反动了。因为英国人把上海电力截断使上海各中国工厂不能开工，大资产阶级反因此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并破坏罢工。此种事实很多，如华商纱厂联合会。请奉军戒严司令部及电段祺瑞政府，解散工会，压迫工人上工；又如纱厂于穆藕初献计日人，不承认工人条件，增加工资及组织工会，并勾结流氓工贼，以破坏罢工，捣毁工会，殴打工人领袖，而且总商会，又把持工人救济费，以断绝工人粮食，希冀罢工不能坚持；又勾结军阀，通缉工人领袖；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各工会等等，皆为中国资产阶级反动之事实。

其次在北京的大资产阶级，亦是十分妥协。主张单独对英，不肯对日经济绝交，武汉长沙大资产阶级主张，亦与前同；汉冶萍资本家更勾结军阀，惨杀安源工人，枪毙黄静源。在此全国"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处处都表示中国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

六，小资产阶级在“五卅”事运动中之地位。各地小商人学生在“五卅”当中都积极参加，比如上海小商人与学生每一次运动，均热烈参加，他们并愿意罢市，大商家要开市，而他们却反对之。这可见其革命性比大商丰富得多。其次，上海小商人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工学商联合会，并极力反对总商会所提出之十三条，删改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条件，即如各种巡行捐款等，小商人均极热烈。后来小资产阶级，因为中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离间而渐渐消极，终至同大商人一路走去了。然而学生则始终与工人一路走。又于省港罢工人亦有组织参观团，恳亲团等赞助罢工，极力反对英帝国主义，而香港学生更至今亦随工人罢课。他如南京武汉长沙等处的小商人，学生莫不赞助工人，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由此可见中国小资产阶级是能革命的，但同时又充分表现其游移的根性。

七，工人阶级之坚决。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差不多处处都站在领导地位。比如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纱厂工人之经济罢工，而引起顾正红之被杀。顾正红被杀了，罢工工人即向小商人，及学生，各界民众，鼓吹反帝国主义，由其本身之经济争斗，引至“五卅”政治争斗，这是上海工人所做的。上海工人除自己参加斗争外，还引导学生小商人参加，并能集中自己的组织，举行极大的游行示威等，对于包围捕房，截留粮食，捉拿工贼等，工人无不勇往直前，数十万罢工工人，艰苦坚持至三月之久，尚无倦容，虽因军阀帝国主义之严厉摧残和压迫，工贼，流氓的捣乱和破坏，救济费时常断绝，工人并无退缩之表示。工人虽然受了极大的牺牲，空前之痛苦，然其主张，最为急进，最能彻底。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最能坚决，即在商人开市了，学生开课了，工会封闭了，领袖逃亡监禁了，尚能罢工一星期以相当条件上工。即在广东省港罢工，亦充分表示工人反对帝国主义之坚决。工人罢工至十月之久，尚能茹苦含辛，坚持奋斗。他们这次罢工，把香港变成了荒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政府，促进了自己工会的组织，他们的纠察队在各处封锁港口，与帝国主义军队走狗直接奋斗。其他各处工人在“五卅”运动中，均有工人起来罢工，均能拚命与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均能给敌人以极大之打击，均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奋斗。此为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大略之奋斗之情形。

八，军阀之压迫与摧残。中国军阀对于“五卅”运动十分压迫，极力摧残，充分表示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奉系军阀，在上海设立戒严司令部，到处干涉工人行动，禁止一切集会结社自由，禁止封锁租界及封闭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等三团体，逮捕工人领袖，勾结工贼流氓，捣乱工会，及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工会等，均为军阀摧残“五卅”运动之事实。他如天津，唐山，山东，武汉，南京，安源，北京，重庆，九江等处都有很多军阀摧残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及枪杀运动领袖之事实。

九，工贼之猖獗。“五卅”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固十分发展，而工贼在此时亦非常猖獗。比如上海工会的工贼，借了工会的假招牌，如上海工团联合会，工人俭德会，制赤会等，专门以破坏工人组织，捣乱工人秩序，替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军阀作侦探，如上海总工会之被封，刘华同志的被杀，均出于工贼之破坏，其他各地，如香港之工业维持会，以及北方铁路等，无处不有工贼破坏工人，这是工贼猖獗的大略情形。

十，国外之同情。“五卅”运动起，国外华侨十分同情援助，捐款援助上海及省港两处罢工，达二百余万元。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亦无不竭力援助，英，法，德等国工会，均有文电到中国，表示同情，又有群众运动，援助中国，捐款援助者亦属不少，英国各地

工人，更有极大之示威运动，援助中国工人罢工，俄国日本更不用说，日本曾派数次代表到中国，俄国总工会亦派代表四人来华访问工友，并捐款五万余元。中国工人，有了这次大运动后，已引起全世界工人阶级大注意，而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之联合，益加进步。以上所讲为社会各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之态度，及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之奋斗情形。现在再讲反奉战争。

三、反奉战争

（1）五卅运动，本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之大运动，但在此运动中，处处均遭军阀之摧残和残杀，于是全国工人，及一切民众，深知欲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胜利，必须打倒国内军阀，故五卅运动，虽被奉系军阀所压落，然因此引起反奉战争，此乃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压迫民众运动之反响，而孙传芳不过乘此机会，举发反奉战争罢了。

（2）孙传芳将奉天军队逐出上海以后，上海的民众运动，复因之而起。此时民众的口号除反对帝国主义以外，并极力反对奉系军阀。在此时期，上海工人阶级，十分要求恢复上海总工会，但此时上海政权，落于中国资产阶级之手，资产阶级，对于工人运动的压迫，更甚于奉系军阀，一切由工人自行启封之工会，及工人的秘密机关，均遭资产阶级之警察及保卫团，严密搜查。上海总工会虽已恢复，但侦探满布，重要人员，均不能□会办□，而刘华同志，亦在此时被杀，虽然如此，上海工人之组织，反更能严密进步，并能为各种问题，举行奋斗及罢工，此为上海之大略情形。

（8）反奉战争一起，全国各地工人，无不参加反奉运动，处处均有游行示威，各工会无不宣言反奉，北方铁路工人，更实际参加反奉战争，如京奉铁路工人之离职，以打击奉军，及信阳铁路工人之拆毁铁路，以断吴佩孚军队前进之路，及帮助国民军之军事便利等，均为明确的事实。

（4）天津，河南，北京　职工运动之勃兴，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大会，均为此时职工运动发展之重要事实。此时天津亦被国民军占领，所有以前被李景林封闭之工会，概行启封，天津总工会亦已恢复，以前被李景林监押之工会领袖，亦均释放，如是天津职工运动，大加发展，此时工会组织，较前更为严密，在天津总工会组织下之工人，凡三万余人。唐山的煤矿工会，此时亦恢复，但英国资本家，借以停工，以阻碍工会及发展，全国铁路第三次代表大会，亦于此时在天津开会，所有各种重要议案，关于职工运动之前途，十分重要。北京职工运动，亦于此时兴起，组织北京总工会，共有工人万余人，为北京从来所未看见的现象。河南职工运动此时非常发展，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凡四万余人，更时常发生罢工运动，胜利者居多。

（5）粤港罢工之坚决　广东因有政治的自由，及有国民党帮助农工运动，所以粤港罢工，尚能再接再励，坚持下去，工人阶级此种奋斗精神，在全世界职工运动中，实所仅见。

四、全国职工运动之现状及其趋势

（1）各地工会秘密组织之概况　现在北方政权，已重入反动军阀张吴之手，所有工

人一切组织和运动，无法公开进行，而中国职工运动，又进入一个难关的时期了。现在各地工会秘密组织概况，略述于下：

上海　上海总工会，现在虽能公开，但实际运动均须秘密进行，所有工人各种组织，也在军阀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但上海总工会之力量，反能增加，上海工人之组织，较前更加进步，各工会除工会之委员外，还有干事会及小组之基本组织。现在上海总工会组织下之工人，有廿万零九千四百人，能收会费者，有七万九千七百四十人。他们且不时为他们本身利益及民族利益举行奋斗，统计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四个月中上海罢工有十八次之多，参加人数有三万余人，罢工的时间，有五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小时，要求条件五十三条，要求次数五十四次，胜利者三十五次，失败者十九次，由此可见上海工人的奋斗精神，胜利者居多数。故上海职工运动虽在严重压迫之下，实有发展之趋势，将来一有公开机会，上海职工运动之勃兴，当更非五卅运动时之上海职工运动，所能比拟也。

山东　山东各地工会，完全不能公开，征收工人会费，亦极困难，但工人十分信仰工会，团体尚能保存。现在各地均有工会小组，以胶济铁路，及溜〔淄〕川煤矿，工人为好。

河南　自吴佩孚占驻河南后，所有工会，均被占驻，现在河南工人之有工会小组者，铁路，兵工厂，铜元局，纱厂，煤矿等处。

湖南　自赵恒惕被驱逐以后，湖南职工运动因而兴起，工会的组织，均能公开，现有组织之工人八万余人，工会廿余个，并有全省工团联合会之组织，所有纱厂，市政，码头，及轮船，矿山，铁路均都在组织之内。

其他各地　现在天津，武昌，南京，哈尔滨等处均有工人秘密组织，工会情形均好。

至广东，香港，广西，职工运动之发展，因国民政府给以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所以两广之职工运动，均有发展和进步，广东各县均有工会组织并成立县总工会也不少，比如现在汕头，亦有工人代表大会实现，广西梧州，桂林等处，亦组织工会甚多，广西有组织之工人，已增加到十九万人，工会内部的组织，较前亦有进步，以上系中国职工运动之现状。

五、结论与进行方针

（1）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之发展，尤以五卅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更有长足之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均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及军阀进攻，譬如各地惨杀案均因工人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为最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示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2）一年来职工运动，均被军阀之压迫与摧残，尤在"五卅运动"时奉直军阀摧残工人阶级更为惨酷。由这些事实，更可以明了国内军阀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和走狗；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亦即是国民革命的对象。

（3）中国资产阶级，本来是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久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而且当无产阶级起来参加革命

时，或要求生活改良时，资产阶级就马上反动起来了，五卅运动中，上海中国资产阶级之运动行为，已十分够我们领教了，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期，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时，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

（4）中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过去一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证明小资产阶级是有力量的，能革命的，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并应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

（5）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各处的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在农民一切的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工人并须顾及农民的利益，以确定自己奋斗的方式。

（6）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之进步及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现在各处工人群众，都有统一工会组织之呼声，譬如香港，广东工会之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二十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

（7）工会为工人群众之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现在中国的工会尚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社会的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要发展中国的职工运动，必须积极的公开的作争工会条例的运动，虽然不能争得工会条例之颁布，亦可引导中国工人群众，走到政治争斗的路上，中国职工运动，必因此种争工会自由的运动而发展。

（8）过去一年的职工运动，因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争斗，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争斗，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争斗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

（9）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一年伟大奋斗中，已经惊动了全世界。因此世界工人阶级，均起而注意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因此更加密切。如在五卅罢工中，各国工会之来电援助者，示威捐款援助者派代表来华联络，已不知若干起。今后中国工人阶级，应在各种行动及组织中，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筑更亲密之联合，进行世界革命。

（10）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工贼亦同时猖獗，在各处工贼破坏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应设法对付工贼之破坏，工会中并应有自卫的组织。

各位代表，现在我的报告已经完了，我们高呼下列各口号：

努力国民革命！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

打倒资本家！
颁布工会条例！
增加工资改良待遇！
中国职工运动万岁！
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万岁！
全世界工人大联合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政治周报》13、14期，1926年5月出版）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年五月）

全国工友们！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集会，参加者全国六百九十九个团体（总会及分会），到代表五百零二人，共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人，在此大会上最重要的问题是结算“五卅”以来全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工人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并规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切斗争的策略。

全国工友们！我们这次大会是经过五卅运动后的第一次大会，便是我们工人阶级经过最猛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后的第一次大会。我们知道五卅运动不仅是中国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并且是中国工人阶级全体直接参加反帝国主义和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一个空前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工人虽牺牲了不少的生命，牺牲了无限的精神，受了无限的痛苦，然而在这些牺牲和痛苦当中，在艰苦的奋斗当中，却得着了许多的经验，许多宝贵的教训。第一：在事实上证明了我们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敢的先锋；第二，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先锋，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队伍里的一支有力军队，是世界革命的一支有力军队；第三，对于帝国主义的凶恶和帝国主义之与反动军阀的勾结，得到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第四，在工人阶级起而参加和领导的真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时，大资本家因阶级利益、阶级偏见而离开联合战线；第五，农民是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真正同盟者（广东农民的表现是显然的事实）；第六，在国际上真正帮助中国工人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只有苏联和世界的工人阶级（如各以经济援助我们罢工和示威反对中国政府等）。此外，我们在组织上增加了工人的新组织，第二次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人，现在有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人。尤其学会了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方法。所以大会认定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将来斗争的最好武器，是我们工人得到解放的指南。

现在正是英、日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奉、直军阀的反动势力在北方胜利了，便是在五卅运动革命高潮（后），又回到反动势力的高潮来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又用种种甜言蜜语向中国资产阶级让步，企图联合中国资产阶级共同压迫中国的工人阶级，恢复它们“五卅”后所丧失的威权，破坏“五卅”后我们工人阶级所成功的力量。全国工人们！帝国主义者此种阴谋和进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一般危机，并且是我们工人阶级自身的危机。我们工人应起来认识此种危机之严重。因此，我们在政治上要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肃清北方的反动势力。要求最低限度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经济上我们要求最高限度的工作时间和最低限度工资的规定。全国工人们！一致团结起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本着五卅运动以来宝贵的经验，提携着全国的农民，共同努力奋斗。

（原载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12月出版。轉录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时期的工人运动》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

（一九二六年五月）

为请愿北伐事。窃自“五卅”惨案发生，我全国工人阶级为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举行总同盟罢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年以来，成效卓著。不料帝国主义者竟利用其工具奉系军阀，到处残杀工人，封闭工会，压迫民众运动，监禁各界领袖，种种残酷行为，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无由得到胜利。奉系军阀各种卖国行为，久为全国人民所痛恨，而我工人阶级更知欲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胜利，非打倒国内军阀不可。如是反奉战争因之而起；当此之时，英、日帝国主义者复进兵满洲，并促成张、吴两大军阀之联合，共同攻打接近民众之武力国民军。自国民军在北方退却以后，北方各省重入反动军阀张、吴之手。全国工人阶级除国民政府势力所及之地外，均在军阀残酷压迫之下，所有工人团体概被封闭，各种自由均被剥夺。工人领袖之被惨杀者，有刘华、黄静源、李慰农、高克谦诸人；被监禁于军阀、帝国主义者之囚狱者数百人；被通缉逃亡者千余人；被开除失业者万余人；受伤残废不复能工作者百数十人。我中国工人阶级为中国民族解放及自身生活改良，而竟遭如此之惨杀与牺牲，是而可忍，尚何生为？不独工人阶级如此，即全国农民、商人、学生以及各界民众，无不在张、吴两大军阀之拉夫、搜索、查办、苛税种种敲诈压迫之下。现我中国工人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唯一出路，即在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以与军阀、帝国主义者作殊死之斗争，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方能保证我被压迫民众之生存。钧府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心，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奋斗，为我全国工人阶级久所爱护。敝大会谨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钧府表示最亲挚之同情与拥护，特此前来请愿，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拯我人民于水火，解我领袖于囚狱。为工人复仇，为民众伐罪。敝大会全体代表当领率全国工人一致参加，以为钧府后盾。谨此上书请愿，务祈采纳施行，无任盼祷。此上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原载“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6期，1926年5月8日出版。轉自《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

〔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

（广州通信五月十三日）

乐　　生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自五一节起至十二日止，开会于广州。这个集合全国工人阶级之领袖与战士的大会议，现在已经闭幕了。这次大会的经过和结果，如若只当作普通的例会看待，便会失去大会的重要意义，而只能从议事日程里，找得出一些报告和决议案来。实际上，这次劳动大会不只于是个例会，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自“五卅”以来一次长期大战斗后的会议；亦是五卅运动的长期潮流，即省港罢工尚在激荡不已为五卅运动最后砥柱时之会议；亦是帝国主义、军阀、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等联合战线成立，向革命势力进攻时之会议。所以这次大会的成绩，实际是数十万参加战斗的工人阶级，根据经验，结算成绩之总合。中国自有劳动运动以来，这次劳动大会在工人阶级本身的历史里，要算最重要最有意义了。

大会到会代表共五百零二人，代表有组织的可统计的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工人，共四百余工会，其中会员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者有两个工会，在一百以下者两个工会，在一千至三千者九十四个工会，在五千至一万者三十七个工会，在一万至五万者十六个工会。代表职业以运输业为最多，次为食品、纺纱、织造、建筑、煤矿、印刷、手工业等。在组织上，这次大会与第一、二次大会比较起来（第一次大会有组织工人二十万，第二次大会有组织工人五十四万），是进步而有成功的。即以罢工运动而论，一年中上海与省港两大罢工运动，固是十分伟烈，充分表现中国工人阶级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力量，他如青岛、天津、济南、郑州、焦作、汉口诸地，均有浩大的罢工运动，总次数在二百次以上，时间最短者一周，长者至数月，由南而北，参加罢工者过八十余万人。这都是这次大会工作的结晶，这都是这次大会旗帜下的战斗员啊！

什么是大会的本身成绩呢？这不能离开中国工人阶级目前政治的与经济的要求以外，所以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案是下列诸件：一、职工运动之总策略；二、组织问题及其运用之方法；三、经济斗争之最近目标及其步骤；四、罢工的战术；五、工农关系；六、宣传教育问题；七、女工童工问题；八、劳动法大纲（附工会条例）；九、失业问题；十、合作社问题。作这些决议案的材料，指示中国工人阶级之正确的政治、经济、社会与职工运动的观念和策略的，有下列各种报告：一、一年来职工运动之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二、全国政治与社会状况；三、国民政府现状；四、世界革命状况；五、世界职工运动；六、苏俄状况；七、全国总工会报告；八、上海总工会报告；九、省港罢工报告；十、各地代表团的报告；十一、工农兵大联合的报告；十二、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报告。这些报告包有中国工人应具知识之全部。担任报告者，有国民政府委员，苏俄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职工运动诸领袖。大会中对于各报告俱有讨论与决议。有几种报告是劳动大会与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合同开会的，所采的是共同的决议。总计大会通过正

式决议案九件，报告后决议案十件，提案与其决议四十七件。决议案中最重要的，要算总策略的规定、组织的方法、经济斗争的目标及罢工战术诸项。在总策略里，大会指明“五卅”后与“五卅”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同的地位，提出工人阶级最近之目的在求经济改善与自由，而责任则在促成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死亡。又指明工人阶级之组织形式，一为政党，一为工会；政党乃阶级的最高组织，工会须从原始的简单的形式，进而作严密的团结。又确定与农民的亲密携手及与城市中各阶级革命民众建立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大会一方面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另一方面亦警告惟有广大的组织与革命的联合战斗才能达到目的。在组织方法决议案里，详细说明下层组织、工厂支部、支部干事会、工厂委员会、产业联合会会议、秘密组织等的规律和实际。在经济斗争问题里，提出最低限度工资与最高限度工时，劳动保护，改良待遇，优待女、童工等目标与进行步骤及斗争的指导和经验的交换。罢工战术在本届大会中是一个新的问题，引起到会代表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决议案中分析罢工的性质，决定的条件，准备的步骤，注意的问题，敌人的破坏之估计等等。这些决议性质之重要，绝不止于是白纸黑字的，乃是从经验与实际里产生出来。全国劳动大会是全国各工会的最高会议组织，所以每次大会的决议案成为最切近的政治与经济的战斗纲领。

正当大会开幕之前一日，增加全国工人代表一个世界的教训，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厄运再度表演，大英帝国之总罢工爆发了。大会闻此消息后，立拍电表示深厚的同情与援助；在战斗中的英国无产阶级，接着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同情援助之声，应当愈加愤发罢。广东与香港的工人，又联合大会请代表举行援助英国罢工周，实行号召物质的援助。尤其是粤港的工人，他们将近一年来站在英国帝国主义之对垒里，困苦艰难，到目前当然意外的感觉欣幸，愿祝英国无产阶级之成功。大会又特别致电英国工人，请援助省港工人，督促英政府承认罢工条件。这种事实，不仅证明国际工人之联合，而更证明中国工人确是世界革命里一支有力的军队。在英国矿工罢工以后，各国的无产阶级，都纷纷起而援助，但在此罢工前，远东一支有力的军队，已经七、八月长期在战线上冲锋陷阵，应当为世界无产阶级所赞许且敬重的。

在组织的意义上，此次大会固然是进步而有成功的。同时，在政治意义上，姑无论全国此时大部分境域怎样的陷入恐怖之窟，然而对准此黑暗的恐怖之窟下攻击，对于全国反动政局作有力的抗议者，便是此次的大会。所以大会全体代表，一面亲身请愿国民政府速行北伐，另一方面又号召全国工农与一切革命民众，自珠江流域以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直至东北，应为北伐军布胜利的战线，期国民革命之早日完成。本月（五月）十一日，黄埔政治军事学校欢迎劳、农、教育三大会代表、国民革命军代表即席提出各界民众合作镇压反革命为北伐条件，而劳、农代表即以此为答词。扫荡反革命的北伐工作，现在已不是宣传而是实际了。因此在广州开会的劳动与农民两大会代表，严重的提出拥护革命军北伐与拥护国民政府两口号，又在广州城内连次举行工农兵、工农学、工农学商的联欢大会，在各联欢大会里，充分表现各界革命民众在国民革命里之合作与拥护国民政府的精神。尤其切实的是工农学商之联欢大会，提出有关商人利益，拥护省港罢工，巩固革命基础的决议案。由这次联欢大会所产生的各界全权代表之联合委员会组织，将成为有力的团体，不仅使反革命派的阴谋不得逞，且可以使香港帝国主义之阴谋（离间工商感情，挑拨工学冲

突，贿买反革命军阀与土匪作乱）失败，而令国民政府的根基更加巩固。这亦是本届大会期间内的革命策略之成功。

虽然全国大部分境域在反动势力之下，但是工农阶级仍然保有其力量，各阶级民众，仍保有其革命势力于社会各种组织里。在这次大会里，从各种社会团体对于大会的拥护声，可以看得出来。大会接到拥护的函电，多至六七百种。尤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亲切的表示出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希望和责任。大会亦议决致书国民党与共产党，表示明确的态度。这种信件不应只当作普通的文件看待，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表示，较其他决议还觉重要。此外自五卅运动以来，尤其是省港罢工后，中国工人阶级已开始其政治的与社会的治理实验，所以此次大会中各种组织，亦远较以前的组织为进步。从各地来的代表，都惊叹省港罢工组织之发展，与武装纠察队之有训练。这都是在大会以外有益的实际教训。

我们难以在一篇说明里将大会的内容包含详尽，这以上所述，自然只不过是指出其重要者。最后，我们总括大会的结果，应总合的有下列几点：

（一）自“五卅”后长期大战斗自身力量的总检核；

（二）最近政治状况与革命联合战线及职工运动总策略；

（三）组织上的进步与此后更大的团结。

所以大会的结论，在政治的与组织的意义上已十分明显。这样的结果成绩，并不只是大会本身的成绩，而是全中国工人阶级之成绩，因为大会的经验就是全国工人阶级的经验。

（原载《向导》155期，1926年5月30日出版）

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

（一九二六年八月）

邓 中 夏

一

“五卅”长期潮流之省港罢工。罢工的原因。罢工宣言。罢工要求。罢工的意义。

省港罢工是中国五卅运动长期潮流中之最后砥柱。虽说在中国北、中两部所有因五卅惨案而发生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概归沉寂，然而南中国之省港罢工却屹然独存。屈指至今，转瞬一年又两个月了。这样长期的罢工，在我们身历其境者并不觉得什么，在所谓“泰西”，据说自从亚当、夏娃创造人类以来尚未有过。就此一点，我们已足以自豪了。

“八十年来的奴隶待遇已算受过了”，即使无上海五卅屠杀之事发生，香港、沙面奴隶们也会有起来对不起“深恩厚泽”（？）的皇家的一天的；既有五卅屠杀，奴隶们再也忍不住了，一声吆喝，大家抛了工具，拍拍手，端正了帽子，成群结队离开了他们生活所托的香港和沙面了。这就是历史上可资纪念的六月十九日。

宣布罢工时，登即发表了一篇宣言，大意是说：“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之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无畏惧，愿与强权阶级决一死战。”诸君试听，这是多么激越悲壮的声音呵！

宣言之后，附以要求，分为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屋租、居住自由六项。

由此我们知道省港罢工不是什么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之经济斗争，而是为争民族生存与国家体面之政治斗争。这便是它特殊的严重的意义。

我们认识了此种正确的意义，进而叙述一年来经过的事实。划分为四个时期。

二

罢工之酝酿与爆发。罢工情形。香港之高压。沙基屠杀。罢工组织与封锁。

香港经济之损失。激怒政策之失败。香港恐慌与纷乱。武力恫吓。勾结反革命。

特许证与海外交通。修筑中山公路。特别法庭运动。

第一时期，从六月十九日罢工开始起至八月二十日廖公被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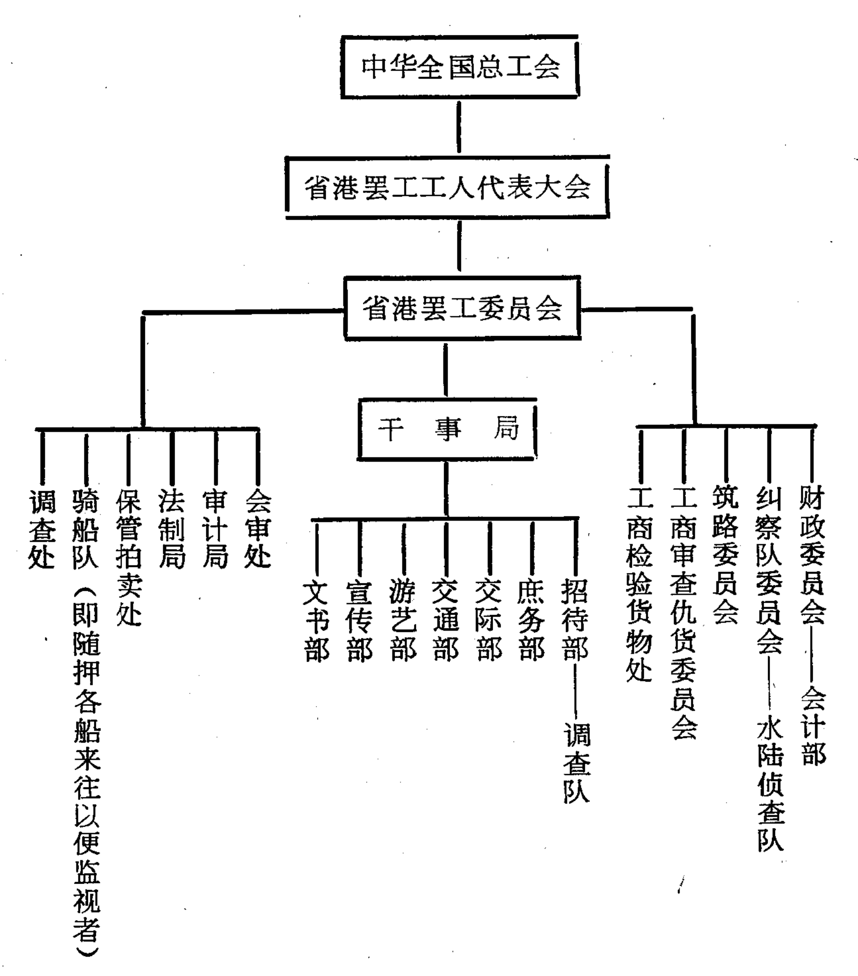
未罢工之先，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代表落港，与全港工团秘密的开了两次联席会议，一次是议决临时指挥机关与宣言条件；一次是议决发动时日与离港方法。此时香港政府已缇骑四布，水兵登陆，煌煌文告，缉拿“首凶”，杀机弥漫，一触即发。然而工人仍毫无畏惧，很敏捷谨慎的传达罢工命令。六月十九日晚九点钟，香港与日本当年大地震一样，震得人人惊惶，手足无措，最后哇的一声哭了。

最先发难的是海员、电车、印务工人，接着就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各种工人相继踵起，机器船坞工人殿后。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而罢工局势遂以大定。工人从火车、轮船、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返省。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并起。

香港政府因此宣布欧战所无的戒严令及禁止粮食出口令、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一面欲以铁血政策镇压香港，一面欲以封锁政策饥饿广东。然而工人激于民族义愤，万死不辞，蜂拥离港，沛然莫御。素以凶残著称之军官总督史塔士，虽捕获领袖数十，究竟无济于事。于是“东山崩裂，洛钟响应”，沙面英领事杰弥逊遂于六月二十三日对沙基巡行民众施行比上海犹为惨酷之大屠杀了。

沙面方面的机关枪，在沙袋背后瞄准中国民众扫射，二十分钟后，五十二个中国人倒毙在路上，此外有一百七十多个受了伤。此外白鹅潭兵舰发炮，准备轰击广州城。帝国主义者残忍成性，于斯益信。

沙基屠杀以后，广东人民莫不悲愤填胸，厉行经济绝交。罢工工人更一面努力于自身组织与封锁海口。组织方面，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机构见下页附表），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举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会选举十三人为委员，为最高执行机关。其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保管拍卖局、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皆直隶于罢工委员会，分头办事，秩序井然。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封闭各赌馆、烟馆、空屋，以为罢工工人饭堂、宿舍，划分八区，每区置登记处，登记返省工人，工人宿食，虽不周全，幸得安定。封锁海口方面，成立纠察队，共人数二千余人，每十二人为一班，置一班长；三班为一小队，置一小队长；三小队为一支队，置支队长，支队副，训育员各一员；三支队为一大队，置大队长，大队副，训育主任各一员；五大队统属于总队，置总队长、训育长各一员（后改为委员制），为全队之统率与指挥者。布置粗定，请黄埔学生加以军事训练，分派各海口驻防，其责任为维持秩序，严拿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从此省港交通，完全断绝，继以澳门附和香港，亦宣告断绝。省港罢工工人与香港沙面帝国主义两军对垒，严阵相持，而香港经济上受空前未有之打击，从此就开始了。



上表原载“政治周报”第九期，张秋人著“省港罢工的过去和现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

香港每年出入口货价值一亿五千万金镑，约合华币二十五亿二千万元。罢工以后，航业商务，尽行停止，平均罢工一月，损失二亿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罢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沙基惨杀以后，英领事送来一函，大意是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继乃考察，原来英货每年输入广州每年不过三、四千万，罢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货一年。虽英帝国主义者答复我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函，措辞极尽侮辱嘲笑之能事，对于沙基惨案，则曰“中国先开枪”；对于我方所提条件，则曰“不能考虑”；对于外交部胡汉民先生，则曰：“未习外国言语文字，不识外交惯例礼节。”种种横蛮态度，粗率答复，讥笑口吻，无非欲以激怒我方，其用意不消说在求一战。其时我方刘杨战争方毕，广州地方甫定，反动势力环伺，政府尚未巩固，故皆隐忍，而以坚持罢工与排货抵制与反抗帝国主义之策。

香港罢工后，做饭和洗衣都要自己动手，固不待说。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裹粪，抛掷街中，加以炎日蒸炙，臭气薰天，故群呼香港为“臭港”。交通既绝，内地肉食菜蔬，无从运至，猪肉涨至一元余，鸡蛋涨至五角多，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故又呼香港为“饿港”。轮船阻滞，船坞停废，商店歇业，银行挤兑，一时社会秩

序，纷纷大乱，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香港）帝国主义者不觉怫然大怒，无可再忍，七月二十七日，召开公民大会，电请伦敦英皇，立即用武力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说广东人都是过激党。同时又积极勾结广东反革命派梁鸿楷、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辈，供以银械，推翻新成立之国民政府。关于前者，伦敦英皇因本国无产阶级之不稳，各殖民地之环伺，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结果对于香港请求用武力干涉广州，置之不理。关于后者，被罢工工人发觉，举行大示威运动，请愿政府肃清反革命派；只刺杀援助罢工最力之政府要角廖仲恺先生，算是他们一部分计划之实现。此时罢工和政府都到了一个危急存亡的境地，是罢工以来最紧张的时期。

我方已经看到省港交通断绝，有两大问题须立即解决：其一，即广东粮食、燃料不足；其二，即预防各帝国主义协以谋我。于是实行“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首先将上海与广州间之航线打通，其次将暹逻、安南与广州间之航线打通，并准日、美等国轮船来粤。原来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户，如不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必成坐困；再则此时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如不特准日、美等国货船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特许证制度，一在图谋广东经济之独立自存，一在撤散帝国主义间之联合战线。此特许证由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罢工委员会共同审查签字发出。此特许证制度实行后，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要求领证复业。于是商船直达黄埔者，每日平均四十余艘，为亘古以来所未有。这也是使得香港帝国主义眼红气愤，坚决再求一战。我们要在此地郑重声言的，就是“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个政策上的原则，是此次省港罢工能够坚持如此长久之第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应连带说及者二事：

一、修筑中山公路。罢工委员会的眼光，不仅敏锐，而且远到。认为打倒香港根本办法，即为黄埔开埠。孙大元帅在时，再三注意及此。故提议修筑从广州至黄埔之马路，凡长七十五里，定名为中山公路，兼以纪念国父也。筑路工人凡三千余人，有筑路委员会管理之。

二、特别法庭运动。罢工起后，香港帝国主义派遣大批走狗溷〔混〕入广州，造谣捣乱，破坏罢工，罢工委员会爰设会审处以审讯此等走狗。有林和记者，运动海员复工，会审处以其情节重，判以枪毙；自然须送政府法庭复审执行。其实广东检察厅长卢兴原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辞，提出抗议，罢工工人大愤，以为此次罢工，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非常时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宽宥国贼。况中国国民党党纲明明确定：“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及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林和记“不仅卖工，实属卖国”，“即使戮之于市，亦足大快人心”。故要求国民政府另设特别法庭，以处断此项破坏罢工人犯。结果，政府准予所请。不过可惜特别法庭成立之后，仍落在卢兴原手里，一切走狗汉奸，他为之设一专门辩护的律师，什九宣告无罪。罢工工人又无所谓法律知识与政治权力，除掉事后干骂两声卢兴原庇护走狗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哩。

三

廖仲恺被刺的原因。肃清反革命。左派执政。如何渡过难关？取消特许证。工商联合。预祝升平运动。北上外交代表团。香港总督换人。金文泰变本加厉。提出解决罢工条件。东征与南征。罢工运输队。四代表之派定与八华商之来省。纠察封锁线扩张及其牺牲。

第二时期，从八月二十日廖公被刺起至一月一日国民党大会止。

廖仲恺先生为什么被刺？此处不能不略述当时的政治环境。自从打败刘、杨以后，国民政府成立，在政府中显然分成三派：一派以许崇智为领袖，而魏邦平、梁鸿楷及所谓粤系军官属之；一派以胡汉民为领袖，而一般官僚及失意政客属之；一派以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为领袖，而左派党员及工农群众属之。这三派开始便明争暗斗。其时第三派主张军政、财政、民政统一最力，其议案经过若干波折终归通过。这自然于一般反革命之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大大不利——不是于他们割据地盘不利，便是于他们霸占税收不利，或是于他们贪赃枉法不利。廖先生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及省政府财政厅长，财权在握，并且雷厉风行进行财政统一决议案，于是遂遭反革命派之忌，而买凶杀之心以决，许、胡高高在上，其部下军阀官僚政客协谋刺廖，亦不能洞烛几微，预为防范。反革命派一面在报上捏造共产与反共产之争（其实刘杨造反，亦以“反共产”为口号），一面从暗中煽动主军与客军之分，而暗潮剧烈，已达极点。香港帝国主义者见此弱点，乃从而勾结之，资以金钱枪械，文华堂二百万元之贿赂，江门梁鸿楷部新军械之发现，皆其证也。帝国主义及反革命之军阀官僚政客团结一致，而廖先生死矣。于是而有八月二十日中央党部门首之喋血。

先是反革命派阴谋，国民政府委员未尝不知，然以派系复杂，无法处置。罢工工人虽有八月十一日之肃清内奸大运动，壮政府之胆，而政府终不敢动弹，懔然袖手。及八月二十日廖案发生，方下最后决心，解散梁鸿楷、魏邦平、郑永琦、莫雄等部，并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诸人。随后许崇智请假赴沪，胡汉民出使苏俄，而广东政权完全递入左派之手。此一时期，可说是左派执政。

在此时罢工工人与国民政府差不多相依为命，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势。其所处的环境，异常恶劣，异常危险。在广州，是谣啄繁兴，反侧蠢动；在全省，是陈炯明陷落潮、惠，邓本殷进攻江（门）、台（山），中山县土匪占领县城；在省外，是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全国，是各地运动摧灭，反动势力益展。我们要怎样渡过此一难关呢？

比方特许证除为图谋广东经济独立与撤散帝国主义联合之作用而外，实在还有使得广州商人有生意可做的重要作用，这是可以公开说的，在沙基惨案发生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等到时候稍过，热潮稍低，商人必蒙头一想，自言自语道：爱国好呢？做生意好呢？料想大家的结论，必是爱国固好，做生意更好。省港交通既经断绝，如不另辟航路，那有生意可做。另辟航路，如不加以限制，势必影响罢工。此时一面“体恤商艰”，一面“保障罢工”的法子，只有特许证。不幸当时有一部分商人，

不体谅罢工委员会此层意思，"聪明一世，蒙懂一时"，竟受反革命派政客官僚所挑拨愚弄利用，挺身出来反对。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这本是枝节问题，罢工委员会准予减免，惟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决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但工、商为社会两个有力基础，何能发生分裂，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所乘；并且香港帝国主义者正在打算勾结商人，借以反对罢工。罢工委员会有见及此，廖案发生后数日，自动取消特许证，并进一步而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定善后条例，仍以"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本来中国工商业不能自由发展，即在帝国主义之侵略与束缚，帝国主义实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广州大部分商人幸而深明此义，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之提议，积极进行，于是商人亦一同站在反帝国主义之战线上了。我们又要在此地郑重申言的，就是省港罢工能够维持如此长久，工商联合政策，亦是各种原因中之一重要原因。工商联合会以后，算是内部冲突问题，得一解决，我们方放心，聚精会神于抵抗帝国主义与肃清反革命派种种工作了。

不过此时广州市面，谣言四起，杯弓市虎，人心惶惶，镇定人心，是此时当务之急。于是乃有统一广东预祝升平之运动，举行提灯大会，以"反革命肃清，广东得太平"为口号，经过此次广大宣传，人心方暂安定。

再则北方各地运动，依次降落，广东孤军奋斗，如何做得；况且沙基惨案真相，全国尚未周知，沙基惨案条件，亦须联络全国力争，于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团之发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罢工代表八人组织之，一面为省港罢工减轻负担，一面也是想扩大全国联合奋斗。

香港帝国主义者，八月二十五日还开了第二次公民大会，以前次电报，英皇置之不理，乃改电首相，仍请用武力干涉广州，措词极其哀婉，意态极其愤懑。结果英伦首相答复："香港苦处我是很系念的，不过现在无法出兵。"老鼠跌在糠缸里，空欢喜一场。总督史塔士以处理罢工不当，此时也滚蛋了。继之者为金文泰。据说金文泰通晓华语，人甚和平，服膺孔子，主张读经，常说："假使华人读经，此次罢工不致发生了。"一般空想家，预言以金（文泰）易史（塔士），罢工可望解决。谁知此公下马，就说："伦敦既不赞成向广东宣战，我们尚可用别的法子对付。"什么法子呢？拿出大把花白的银子，大批明晃的枪炮，左手递给陈炯明，右手递给邓本殷。准陈逆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并准其在香港市上，得自由捕拿过往的汕头罢工工人、海陆丰农民以及革命学生，达二百余人。一面又勾引北洋四舰南来，围困广东；一面又嗾使林警魂、袁带率领土匪陷落中山（县）。眼光四射，运筹从心。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华商冒昧来省，进行调停罢工，罢工委员会将对香港沙面及学生要求之三十条件交其带港，金文泰板着面孔对华商说："谁叫你带回条件来！"此次却不大和平了，或者只此一回，下不为例罢。

廖案发生后，一方面以其时政府方从事于肃清反革命派及东征南征之准备；一方面以上海北方各地运动低落，省港罢工势成孤立；罢工委员会本可在相当条件之下收束罢工（因为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沙基惨案条件已经交付北上外交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九月二十二日，政治委员会亦认为提出解决罢工条件之时机已到，谓"此条件之提出，于国民革命运动至有利益，如对方能承认吾人之要求，则国民革命运动必因以日臻强固；如对方表示拒绝，则世界知曲直所在，于国民革命运动亦有促进之效能也"。恰巧九月二十八日香港各

邑商会联合会代表十余人来了，罢工委员会即将条件（见本节附录）交去。但是金文泰正在大规模的指挥如意的捣乱广东，虽明知陈、邓等是些破烂的工具，不值所向皆捷的国民革命军一击，但这是帝国主义者利用恶势力对付敌人常用的惯技，在历史上是有前例的，如前年英人利用希腊攻打土耳其，俄国革命时帝国主义者利用白党攻打苏联政府，不管他们准备够不够，只管自己需要，强迫他们去打，故结果都失败了。金文泰此种计划尚未试一试，如何肯罢手接受条件。“谁叫你带回条件来！”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我方也准对着香港帝国主义此种计划而反攻。此时广州市内及附近反革命派军队都肃清了，国民革命军放心的一支大军东征，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头，东江以次收复。再以一支大军南征，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琼崖，南路以次底定。前后不过两月。罢工工人更为兴奋，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接济前敌；组织宣传队，随从大军向民众宣传；组织卫生队，救护战场伤亡将士。罢工纠察队请缨出征，上阵杀贼，政府责令巩固后方。是役也，计罢工工人死者数十，因劳致病者数百。国民革命军以“不筹饷，不拉伕”为口号，但一般市民向存兵凶战危的观念，谁肯应募去冒生死不测的危险，罢工工人担任运输，一方面使革命军宣言的实践，一方面使革命军行军的神速，也是使得东征能够容易成功的一个原因。

东征、南征将近胜利的时候，香港帝国主义戏法为之一变。因为陈炯明占领汕头时，汕头罢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已为恢复，革命军一到汕头，罢工工人又卷土重来了。邓本殷受香港八十万元，专雇轮船八艘，载运粮食赴港，赖以苟延残喘，革命军攻入南路，此项接济又被我们截断了。勾引南来之北洋舰队，又复逡巡沿海，不敢进窥虎门，只得悄悄的率队北返。香港买办阶级固然依附香港政府，惟其意旨是遵，到底罢工太久了，中、小华商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惨痛，乃忿恨香港政府，同情国民政府，于是而有恳亲团之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来省，共有三百余人。继华侨又有参观团之发起。香港帝国主义在此时，外既军事失利，内又居民叛离，心生一计，宣布派遣遮打、宾那、周寿臣、罗旭和四人为赴省解决罢工代表，但是始终不见出发，无非借以欺骗华商，缓和其反感而已。恳亲团抵省以后，香港政府恐其有变，突然另派华商代表八人来省，问其是否代表香港政府？则曰不是，只代表华商。问其是否有权解决罢工？则曰无权，只商量经济条件。罢工委员会答复：“我们是反对香港帝国主义，并非反对华商，华人与华人谈判，太不好看。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亦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何能谓为根本解决。诸位同胞来省，我们很欢迎，很感谢，请转告香港政府，所派定之四代表，放胆来省，我们早就准备诚意解决罢工了”。这就是香港帝国主义变戏法之又一幕。

东江南路收复以后，罢工纠察队的海口封锁线也扩张了。从前，纠察封锁仅限珠江口一带，东起深圳，西迄前山，现在则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了。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声相闻。其防区大概是这样的，白鹅潭之附近河南、芳村、花埭、黄沙、沙基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陈村、大良、容奇、潭州为一区，以一支队驻之。江门、公益埠、斗山、广海，沿宁阳铁路一带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石岐、前山为一区，以两支队驻之。深圳东至沙鱼涌西至宝安南头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太平为一区，以一支队驻之。汕头为一区，以一支队协同汕头罢工委员会纠察队驻之。其余则于淡水、阳江、水东、雷州、北海、琼州岛等处设办事处，配以纠察数班数小队不等。水面有小舰十二只，往来巡

查截拿。从此"广州表面发达，河内有各种旗帜之船，但无英国的；此种船与上海及别埠交通，而不至香港，因受罢工领袖严格的命令，香港无可奈何"。"因之香港在本国许多定货只有搁置。此六月间，实际与国内工厂无新的贸易，地价及股票跌落至百分之五十，地方的公司减少。"（录香港某西记者对伦敦之通讯）这样一个队伍，虽说二千余人仅只二百枝枪，但在香港帝国主义者的碧眼黄瞳中，是值得惊惧的。始则大骂纠察；如何勒索，如何受贿，继则直接的或间接的勾结土匪奸商甚至不良军队对纠察队加以袭击了。如沙鱼涌之役，纠察与铁甲队死者数十，便是香港以兵舰飞机巨炮协助土匪罗坤干的。太平之役，纠察死八人，便是香港指使当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役，纠察全军复灭，便是香港以枪械资助土匪袁带干的。其余各地，尤难指数。最近还有白鹅之役，淡水之役，前山之役，此乃后话不提。纠察在我们眼中却是值得钦佩的，为什么呢？他们武器虽少，大部分虽赤手空拳，然而他们不惜牺牲生命而忠于职务（亦正因忠于职务而为一部分名虽中国国籍实则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人所不喜），前者仆，后者继。在上头指挥者通盘筹算，嘱纠察要严密封锁与避免冲突（其实此项原则已经自相矛盾）。但是枪声一响，队员则争先恐后踊跃应敌了，大队长或支队长，遵奉上头命令加以制止，队员悻悻然说："我们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吗？何以帝国主义打来，我们还不去打？"我书到此，我泪夺眶而出了，假使中国有充足武装，收回香港亦是容易的事，然而现在国势有所不能。

〔附〕此条件即"香港罢工工人恢复工作草案"，全文如后：

一、香港华人应有集会、結社、言論、出版、罢工、教育、居住及举行救国运动与巡行之絕对自由权（凡被解散之工会須恢复之）。

二、香港居民，不論中籍西籍、应受同一法律之保障与待遇，务須立时取消对华人之驅逐出境条例，笞刑、私刑等之法律及行为。

三、香港定例局之选举法，应行修改，以增加华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四、香港政府应制定劳动法，規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資之締結契約权，废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劳动保险之强制施行等。制定此項劳动法时，应有工团代表出席。

五、不論公私机关服务人員及职工，皆一律恢复原有工作，不得借故拒絕或开除。以后并不得有政治的或經济的压迫及报复等事。

六、不論公私机关服务人員及职工罢工期內工資照給。

七、所有因罢工而被捕者，应立即释放，并不得驅逐出境，及因罢工或嫌疑而被驅逐出境者，应一律恢复自由。

八、所有罢工期間因欠租致被香港政府及业主拍卖家私等項者須賠偿其損失，并准其居住原屋，免收罢工期內之租項。

九、香港政府公布七月一日之新租例，应立即取消；并由宣布取消之日起，实行减租二成五。

十、在香港各国代表与中国工人代表組織賠偿委員会，应由香港政府負賠偿香港中国工人在罢工期內之损失。

十一、凡轮船工厂公司一切大小职务，华人皆有平等享受之权，香港政府应不分中籍西籍，一律平等凭証（如客船往返口岸，中国人有权行使船主及司机职权）。

十二、未罢工以前，香港政府所給予华人一切凭証及牌照，应继續有效。

十三、凡工厂及大公司貨仓有一百人以上者应設立工人宿舍，免收租項。

十四、凡未参加此次罢工运动之工人須一律开除，俟用尽罢工工人，方許再用未罢工者。

十五、香港境内，应准自由行使中国貨币。

四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左派地位一时动摇。香港帝国主义之幻梦。国际形势与全国形势。香港宣布停止解决罢工。广州商人之忿怒。罢工工人之苦况与援助罢工周。香港商人酝酿罢市与第二次罢工。黄埔开埠之促进。十万大兵之恫吓。勾结右派之袭击。嗾使海关之停关。

第三时期，从一月一日国民党大会起至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止。

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广州，这件事为什么与罢工有绝大关系呢？就因经此次大会之后，国民党左派地位隐约的发生了动摇。本来廖案发生以后，左派掌握政权，取绝不妥协态度，于是一般右派赶赴北京而有西山会议之召集，继又在上海而有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设立，专门与广东政府左派对垒。广东此时亦有一般曲解中山主义有意无意的与上海北京右派遥为呼应之组织。右派的口号虽然是反对共产党，其实是反对左派专政。共产党此时忠心于国民革命，并未在广东政府取得主席位置，何可反对；其可招反对者，不过他竭诚赞助左派而已，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表面左派仍极强硬，实际已对右派让步。此时上海右派又分两派：一派主张维持伪中央反对广东左派到底；一派主张站在外面反对无济于事不如回粤活动较有效能。大会开过了，右派或明或暗的来粤。左派在此时似进似退的而无一定应付和处置的坚决主张。此种政治情形，香港帝国主义者那有不胸中雪亮之理。于是幻梦就开始了，以为广东不久就有政变，左派倒塌，右派登台。既然如此，又何必急于解决罢工呢。与其今日接受左派执政时之厉害条件（其实并不厉害），何如将来接受右派登台后之便宜条件（甚至于无条件）。所以香港帝国主义者天天向世界宣传，广东有急进稳健两派，稳健派不久就会得势。

况且，从国际形势看，罗加诺会议方告成功，英国外交大告胜利，张伯伦踌躇满志的认为帝国主义间从此可以联合了。再从中国形势看，英、日两帝国主义正从事张、吴之联合，变反奉战争为反国战争，打败国民军，重建张、吴统治下的反动政局，以分讨南、北二赤。这样，又何必急急解决罢工，所以香港帝国主义者卒于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停止解决罢工。

香港帝国主义这个宣布很巧妙，把无诚意解决罢工责任轻轻推在国民政府身上。其实此次罢工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惨杀，工人自动罢工，与政府无关。可是政府早就希望罢工早日解决，其诚意表示：第一次，曾派重要官员到港。第二次，港官到省表示将罢工条件分为政治经济二部，政府答应如经济方面原则若能承认，分开亦无不可。第三次，港方对于恢复工作一层，商店倒闭，完全复工有些困难，我方也表示可以相当让步，其委曲求全，可谓至矣尽矣。一月二十五日交涉署将此真相露布于世界。此时广州四商会看到香港政府宣布停止解决罢工，是很愤怒的，通过一决议案，说："此次罢工实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天气寒冷了，几万罢工工友住在空洞无遮的房里，睡在塞门德土（水泥）的地上，罢工委员会因经济关系，又不能为置床板，置草垫，地上只是一张装货的草包。两个人共盖

一张棉被，又短、又窄、又薄、材料又不好，两人共盖。每人发给棉衣一件，“僧多粥少”，尚有万余人取不到。只有棉衣，没有裤发，有的因裤破不敢出街。又如罢工医院，通常每日门诊者五、六百，留医者三、四百，死者约二十人。其病多半是脚气病，因为睡在塞门德土的地上的缘故。有些是痨病，因为东征南征操劳过度的缘故。女工在医院产育，因设备不周，往往发生危险。罢工工人的苦楚，真是一言难尽。不知真相的人，以为罢工工人有饭吃，是住在皇宫里享福哩。此真相宣布后，广东各界既愤英国帝国主义之无诚意解决，又见罢工工友之如此牺牲，于是发起举行“援助罢工周”，宣传演讲；售章捐款；授旗慰劳；游艺娱乐；给奖鼓励。

阴历年关到了，即商店收债的时候到了，香港自罢工后，报穷案日必数十起，收盘倒闭者日有所闻。十一、十二两月倒闭者三千余家。有些勉强支持的，一到年关，这个年头儿，怎样得过。香港政府本来从伦敦政府借来三百万镑，以为救济商业之用。但是这款是不好借的，譬如商家欠债二十万，而十万最急，银行存款，因罢工关系政府不准取出，只能向政府借，政府则以商业产业作按（押），而减低其成数；同时政府向银行将款取出（实际即商人存于银行者）付与商人。这样一来，政府一文不出，而得按业；如到期不还，政府得没收其按业，危险一。借得十万后，债主听到消息了，纷纷临门催讨，二十万都要还，商家无法应付，只有倒闭，危险二。这些都使得商人恐惧与愤怒。原来香港华商的派系是这样的，一为老派，华商总会属之，此派完全是绅士、退伍官僚与买办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前时所谓公民大会电请伦敦用兵攻打广州，他们是赞成者之一；电致海外华侨截止援助罢工款项，也是他们干的。二为中派，南北行属之，他们只顾做生意，不甚管事。三为新派，各邑商会联合会属之，以地方主义相号召，多属中小商人，颇倾向国民党；就中以新产生之恳亲团一般人为最左倾；惜乎此派有些人为何世光收买变节了。罢工半年余了，先后不免错怪罢工工人，后见罢工工人及省城政府充分表示诚意解决罢工，而香港政府不肯，于是新派就不觉发生反对香港政府之情绪了；中派亦有同情之趋向；特别在此年关更促进他们之激烈。香港罢市之风传，遂一时陡盛。罢工委员会自然绝对赞成，去年罢工开始时，本拟联络商界一致行动，今罢市虽晚，仍可为助。并准开一特例，年关前后，准省港交通暂时恢复，予华商回省以便利。同时又派人落港运动第二次罢工。结果因香港帝国主义之严厉压迫，声称如罢市则没收财产，捕拿监禁；并不准港轮上省。商人终竟胆小，不敢动弹；只第二次罢工，回省者约一万人。

广东经济不能发展，在于受香港之限制垄断压迫，凡稍有民族思想的人，都知经济独立之刻不容缓；况乎罢工已成为长期之奋斗，亦有安插工人作工之必要。从前孙大元帅在时，已有黄埔筑港规划，此时广东各界更努力于黄埔开埠之进行了。首先成立“黄埔开埠促成会”，一面从事宣传，一面从事计划。

上面说过香港帝国主义者幻梦开始了，但是帝国主义者幻梦之中又出以毒辣之手段。

第一个就是十万大兵之恫吓。不久以前，日本出兵满洲，香港帝国主义者极力加奖，说这才是办法罗。其跃跃欲试，已可概见。果然天从人愿，上海“字林西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转载伦敦消息，说：“英国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十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北京二月十九日专电，英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究竟是否有力制止粤省排英？否则，英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

将来每日对粤军费一百五十万。”这是多么可吓的一个消息呵！香港帝国主义者更大张其辞，仿佛八十年前炮轰广州城的血幕就要开始了。在无世界常识的人们，一听着定要屎滚尿流。在我们呢，X光线的眼睛，乃高声叫道“欢迎”。英帝国主义此种政策的作用，显然是恫吓民众，以便于所谓“稳健华人”于民众惊惧无措之余，好提议解散罢工。不过这个纸老虎被揭穿了，恫吓的作用也就烟消雾散了。

第二个便是勾结右派之袭击。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前，留省右派与香港帝国主义者还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大会以后，却是“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了。他们经过香港，照例是“酒阑灯灺，情语缠绵”。临别之时，又是“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特别是有名的中国公使伍延芳先生之公子伍君朝枢，最受赏识，推为稳健华人之巨擘。自香港辅政司来省“惊艳”之后，接二连三就是交涉使傅秉常秘密“递简”。往来奔波，委实难为了他。结果一万万贿赂终于成功了。伍君在政治委员会席上，这一个月来，别的问题一概不管，每次只从怀里摸出一些高鼻子的函件来，不是说罢工会留难，就是说纠察队索贿。他极乖巧，摸出来给大家传观，却不下断语，让左派去愁眉皱眼，慨叹连声。此时他方嫣然乘机说道：“政府应予以裁判呀。”左派当时堕其术中，有时也发发小雷霆。譬如德国船被扣两只，是伍君告发于政治委员会的，左派果然认为违反政府的外交政策，对罢工委员会深致不满，大加声斥。幸而罢工委员会在港截获的电报，其中有云：“英商因华经理及德国公司的帮助，也做一些贸易，但一切英国商标均须除去，以免纠察繁重的手续。”这明明是德商瞒运英货，罢工委员会何得不予扣留。左派见此电后也就释然了。不过东江南路都收复了，广东统一而稳固了，危险时期已过了，确实不十分需要罢工工人帮助了，左派意态动摇，亦固其所。况乎忽而浸润之潜，忽而肤受之愬，纵然心硬也会软化几分呀。显然的，自经右派之袭击后，政府与罢工工人中间有了一道鸿沟了。此外吴铁城更是点兵派将，向市民大做其宣传：“你们看，罢工工人简直比刘、杨兵士还凶。”后来索性仿照上海工部局伊文生的办法，不加警告，向罢工工人开放排枪，结果死一名，伤者数名。还是罢工委员会以为在国民政府下而有向民众开放排枪之事发生，太不名誉，与政府协商阴消，故未见报。

第三个是嗾使海关之停关，中国海关税务司都用英人。其名虽是中国政府之一机关，其实是英帝国主义之一府库。中国海关监督，不过“腊则季氏，祭则寡人”，摆摆样子罢了。粤海关税务司卑路，原本是一军官，二月十九日从香港回来，二月二十日（星期六）十一时访交涉使傅秉常陈述：“罢工纠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查验，纠察如此做法，彼实不能执行职务。”晚八时又送来一公文，称“因纠察扣留未经海关查验之八艇货物，妨害其职权之行使，只得于二十二日（星期一）起停止验货起卸”。星期日政府照例不办公，卑路在这当儿寄此公文，使政府来一个措手不及，多么巧妙。入口船只不经关验不能卸货，即能卸货，如未得海关发给凭证，该船到其他口岸时，该地海关以其无开行地关单必将该船扣留；卑路此种对付广州的手段，多么厉害。卑路对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对商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察之压迫。”这种离间政府、商人与罢工工人之感情的言谈，多么动人。二月二十二日终因税务司英人卑路一纸命令而停关了，广州口岸被封锁了，这一个蛋捣得不小，不用说是香港帝国主义之预定阴谋，而同时亦有右派之同谋合作。卑路由港回粤两天，此事便发作，此显而明的事。

右派暗与卑路商量好，借此难题给左派做，左派果然狼狈不堪，而大骂罢工工人之不对。（其实从前所定纠察检验货物原则，并未有须经海关检验后方准纠察检查之规定，罢工以来便是如此，左派初无异言。）此却是隐而晦的事了。结果还是罢工会放还八艇货物于海关，又经商会向海关严重抗议，各界一致激昂反对，卑路既已无口可借，又见外间反对太烈，只得开关，此事告一结束。

五

中山舰事件。香港之幻梦又复沉酣。香港宣布对经济问题之态度。英国矿工罢工。全国劳动大会。工农商学联合。拥护省港罢工获得胜利解决。香港勾结吴佩孚侵粤。出师北伐。组织北伐运输队。中英谈判。谈判延期。工会统一运动。教育宣传运动。

第四时期，从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起至七月二十三日中英谈判延期止。

三月二十日，罢工委员会突然被兵包围，当时大家莫名其妙，后方知为中山舰事件。蒋校长事后声明，此系其部下不听命令所致，经将带兵某连长撤差。惟自此事发生后，罢工确受相当影响，特别在香港帝国主义一方面。

先是香港帝国主义者与右派夜半私语海誓山盟以后，客观上右派势力异常活跃。右派亦屡屡切实劝慰香港："你们莫急急于解决罢工呀，我们就要登台了。"但是，佳音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香港帝国主义者之幻梦不能不稍醒觉。等到不耐烦，三月十九日派杜应坤医生来省。杜医生本是廖仲恺先生之妹夫，但他是满口"港宪大人"，廖夫人何香凝先生听了作呕，曾当面锡〔赐〕以"走狗"的嘉名的。杜向政府说，"港宪大人"有诚意解决罢工，已内定辅政司、律政司、华民政务司为代表，只须汪精卫①亲笔写一函去，三代表就可来省。汪精卫以此小节，当书一函付之，书函已在二十日事件发生之后。汪从此长期病假。杜医生怀函返港，送给金文泰，金文泰乐不可支，大有谢安闻淝水战胜过门折屐齿之概，出席西商会议，说："汪先生已来函提议解决罢工，已派定代表三人，我亦照派三名代表就是"。分明是他自己提议，今则反谓汪提议，显见帝国主义者要在外交上占上风。金文泰笑嘻嘻又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听众亦报以欢笑，高呼万岁。于是香港将醒之幻梦又复沉酣了，三代表仍不出发，自然是等广州政治上轨道之佳音。四月九日不得已方派辅政司来省刺探消息，与伍朝枢作非正式之谈话，返港以后，香港政府正式布告："本年四月八日、九日，律政司金培源君，在广州与伍朝枢君于解决罢工正式会议之前，先行非正式谈话。彼此尽情披露，接洽甚欢。于是金培源君遂表示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的赔偿，均不给与；亦不容许此项办法。……"所谓尽情披露者，金培源还提出实业借款与广九、粤汉接轨问题，不过此布告未经叙出耳。关于经济问题，在以前香港政府因为面子关系，虽不愿意出钱，然而并未正式宣布决绝，香港商人出钱。香港政府至少已经默许，如去年终派八华商代表来省谈经济条件可证。今则露骨的不承认赔偿原则，而且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态度何等鲜明！

①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编者

何等强硬！香港帝国主义者为什么突然如此呢？不用说，因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右派未即联翩登台，尚嫌美中不足；然而右派此时确实乘机蜂起，到处分裂民众势力，究竟不无希望。

此时英国矿工大罢工已起，我们在去年十一月已经在罢工代表大会断言英国六个月后必有大罢工，果然言中。矿工罢工，震动了英国社会的基础，这自然给予罢工工人以巨大的兴奋；而最后胜利终属我们之自信心更为坚决。英国十万大兵进攻中国之余惊，自然完全消灭。罢工工人与广东各界举行援助英国罢工种种运动甚力。

五月一日至五月十四日，开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于广州，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亦同时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全省农民教育代表群众聚于此，革命空气异常紧张；慰劳罢工工人；罢工工人自然大为兴奋。在四商会欢迎席上，提议改为工农商学联欢大会，并通过七条决议案。第二条即为拥护省港罢工使得胜利解决，主张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及罢工工人五方面举出代表组织委员会，商量解决罢工。省港罢工原为民族问题，并非罢工工人私人问题，故应由各方面共同解决。再则自香港政府布告不承认赔偿原则以后，旋见广东政局并无纷扰，国、共两党仍然合作，乃改变其口吻说：“香港出钱未为不可，不过恐其落在罢工领袖及过激派手中，仍用为继续反对香港之用。”此五方面共组之委员会，亦含有打破此种阴谋说话的作用。后来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执行此决议案，曾请四商会派两代表落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转征香港政府同意，结果是香港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亦可见其顽强已极了。此时广州工农商学联合运动特盛，因而“国民的联合战线”日臻巩固。

香港帝国主义者幻梦右派登台，前面已经说过。谁知天不做美，中山舰事件旋即大白，广东政局依然无恙，不久而伍朝枢以出走闻，傅秉常以私逃闻，吴铁城以被囚闻，莺莺、红娘、惠明都没有了，香港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惊梦”了；由是乃转而求之于北。其时英、日、张、吴联合，已经成功，所谓“讨赤军”攻入北京，国民军退守南口，吴佩孚势力有稳定的趋势，香港帝国主义者以二千万元助吴作军费，信使往还，催其早日攻打“南赤”。此时我国民政府基础既固，桂湘先后向风来归，为防御吴贼南下，亦决意出师北伐。本来北伐准备已久，故出师异常迅速，一鼓而下长沙，再进而占岳州，会师武汉，料也非难。罢工工人仍组织北伐运输队，三千余人，湘、粤之交为五岭山脉，崇山峻岭，异常险阻，当此浔暑炎蒸，重担渡岭，其困苦可知。罢工工人因而致疾者凡四、五百人。

这里要叙到中、英谈判了。我政府因“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故应人民请求，六月五日，毅然致函于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香港帝国主义者则答以罢工已成过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货问题之解决。我政府回函，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之排英货运动解决之方法与手段。此外关于技术上有所询问。七月十五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外交部实现了。我政府代表为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对方代表为香港律政司凯普，华民政务司哈利法斯，沙面英国总领事白利安。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只我政府代表致了一篇欢迎辞。第二次会议（十六日）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见书，大意是说广东人民发生排英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

以相对待，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中国以民族主义与外国办交涉，这算第一次，也算是外交史的新纪元。此外并质问为什么香港对广东实行经济财政封锁？为什么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所提议的解决条件？第三次会议（十九日）英国代表提出答复书，谓五卅屠杀系自卫行动，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香港并未封锁广东。第四次会议（二十一日）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书，引证据理，指斥其推诿图赖。谈判到此，我政府代表提出解决办法，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按即国际仲裁）。惟此事须延宕时日。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计，主张两方协力分任担负：第一，应保障不再有沙基惨案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抛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赔偿沙基惨案死伤家属；第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英国代表对组织第三者考察法庭案，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之三条件，表示反对，并声言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我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应行借债，此项借债，双方分别担任，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到胜利，香港担负之借债，由国民政府偿还。此种让步，可说让到极点了，英国代表仍表示反对。英国代表提议，欲以实业的借款，贷与中国，以为开辟黄埔港口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此日，我广东工、农、商、学各界召集十万余人之示威大会，发布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的宣言。第五次会议（二十三日），双方以其提议写成条文，继续讨论，结果是英国代表对于第三者考察法庭案，表示请示本国政府，我方代表对于实业借款案，亦表示请示本国政府，而中、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虽非破裂，实已延期。延期要延到何时，这当然要看将来全国政局如何方能决定。英国帝国主义真聪明，他的实业借款提议，不仅不肯丝毫失本，而且还要从中得利，既想黄埔新埠造成英国管理的租界，又想两路接轨造成香港商埠的需要，世界上打铁算盘的，怕只有英帝国主义第一个会打罢。

此期尚有二事应该叙及：

一、工会统一运动。香港未罢工以前职工运动的弱点，即在工会未曾统一。可说分为三派：一为工团总会派，有七十余工会，概系手工业，只海员工会算是大产业组织。二为华工总会派，约有三十工会，亦系手工业，重要的只电车工会。三为无所属派，约二十余工会，多系大工会，为机器工人，起落货、煤炭、洋务等。故发起罢工时，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指挥全港工会，不能不召集联席会议，另组临时指挥总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及返省以后，大家都知此种状况不好，而工会统一运动之宣传，甚为普遍。究竟因历史与习惯关系，终归不易统一。后来日子长久了，工会统一的意义与利益彻底了解了，而且有许多实例证明了，方努力进行此种统一工作，首先联合的是机器工人，叫做机工联合会，后改名为金属业总工会。其次是运输工人，叫做运输工会联合会。这是以产业联合的。四月十五日，香港总工会成立，从此工团总会、华工总会无形消灭，而所有香港工会统一于香港总工会之下了。此后联合成功的，尚有洋务工人，定名为西业工人联合会。而建筑联合，街市联合，现在进行中。

二、教育宣传运动，原来教育宣传是很重要的，罢工开始便办了一个宣传学校。但仍不过以养成一般宣传人材，为罢工时期对内外之用，故不久停办。此后因环境紧张，我们

工作更为忙碌，遂不暇注意于此了。本年四月中旬成立一教育宣传委员会，乃决定一大规模之教育宣传计划。设劳动学院一所，以各工会领袖为学生。分区设补习学校八所，以成年工人为学生。附设子弟学校八所，以工人童年子女为学生。另设妇女劳动学校一所，以女工为学生。各补习学校并附设俱乐部，日间上课，晚上娱乐。

六

罢工能够持久的原因。客观条件有三。主观条件有四。罢工之将来如何？三条出路。请海内外同胞有个回答来！

现在我们来作一个结束了。此次省港罢工得到一些什么胜利，和这些所得胜利的意义，我另有一文叫做“省港罢工的胜利”，说得非常明白，此地不再赘及。

如有人问省港罢工支持一年零两个月的长久，其原因安在？我们的回答：在客观方面有三：

第一，英帝国主义之衰弱。欧战以后的英国不象欧战以前的英国了；战前是壮年时期，战后是暮年时期；风前残烛行将就木之年，那有精强力壮好勇斗狠之能。经济之衰落，无产阶级之左倾，各殖民地之觉悟，都是使得英国诚惶诚恐寝馈不安的。假使在欧战以前，两次武力干涉之请求，十万大兵进攻之恐吓，决不会仅是造造空气，必定会如鸦片战争之役，英法联军之役，炮轰广州城，或者国民政府诸公有人做了叶名琛第二亦未可知。

第二，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帝国主义之冲突，是它的本性使然。广东诚然是一块肥美之肉，那一个帝国主义不想争尝一脔哩。近年来英、日、美在广东的市场上竞争得很厉害，可是英货则逐年递减，日、美却逐年递加。广东排英，在日、美便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果然香港电请伦敦用武力干涉广州时，美国提出异议了，大意是说因广州一隅局部之事而引起战争，似乎不是良好办法。又说恐怕因此局部战争，会引起日本之参战，引起俄国之参战，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说此不幸事情最好不要发生，美国应调集兵舰在南洋及中国沿海一带巡弋，如果此不幸事情发出，应作武装调停。所以罢工委员会特许证条例宣布以后，日、美两国公司首先要请复业，并愿将香港、沙面商店迁移广州贸易。香港帝国主义者在报上泪流满面的说：“为什么我们帝国主义者不联合起来呵！”

第三，国民政府之强固。国民政府是打倒刘、杨以后才成立的，这个小娃娃虽然经过许多灾难，究竟“吉人天相”，日见壮健。它有身经百战的国民革命军以作巩卫，它有生死与共的民众组织作基础，它有每月七、八万之正当税收以作营养。它不仅可以自立，而且有力量攻打军阀，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党纲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的。省港罢工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政府当然不能象张作霖一样对爱国运动加以摧残，而应该是加以爱护的。

在主观方面有四：

第一，罢工工人之觉悟。为民族利益而不掺杂自己利益，这是世界之上少见罕闻的事。我们举一件很小的事，便可见罢工工人觉悟之普遍与深入了。有一次在某罢工宿舍门前，两个工人的儿子，约莫八、九岁，不知何事起了争端，先则口争，继则扭打。问何以打架？一个说，他骂我的爹娘，骂我的妹妹，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

他。一个说，他骂我是地痞，骂我是兔子，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

第二，罢工组织之完善。罢工组织，已在第二节约略说过，假使组织不好，阵脚既不稳固，何能杀敌致果？其中尤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最得力，因以人数为比例，五十人举一代表，共约八百代表。这样组织，一方面可将罢工消息与政策普遍传达于所有工友得知；一方面对于各种问题以大多数公意取决，不致为少数腐败领袖垄断；一方面对于职员加以严重监督，不使其违法舞弊，变节捣乱，以破坏罢工。一年以来，内部发生一、二次小小风波，都是靠代表大会镇压下去。

第三，罢工政策之适当。罢工政策已在上面各节中错综说到，读者可以自去领会。就中尤以"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一原则，为稳住此次罢工之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其妙用不可胜言，一方面可以打击香港；一方面可以解决广州经济之困难；一方面可以拆散各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一方面可以使广东商人对外贸易不致停顿。此政策之精义，先是采入特许证条例内；特许证取消后，被采入于工商善后条例中。

第四，罢工援助之广大。罢工维持，自然要靠海内外爱国同胞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不断的援助，然后罢工工人觉得后援不孤，更能安心作战。此次罢工费用，计开：国内捐二十五万，华侨捐一百一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仇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余万元。至于精神援助，随时俱有，那是不可论件的叙述了。

（原载《省港罢工概观》，1926年8月出版）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

（一九二四年七月）

恽 代 英

在共产党员经过长期辩论，决定了加入国民党以后，国民党内部于是发生了容受或者排斥共产党员的问题。为了这个问题，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有人提议禁止党员跨党，想以强迫脱离共产党的条件消极的阻难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到了现在，又有些人责难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占据了国民党的重要地位；为了排斥共产党甚至于印刷传单，秘密开会，凶殴党员，闹得象煞有介事的样子。

对于这一件事，我愿意发表以下的意见：

第一、国民党倘若认定了他自身对于国民革命的使命，倘若认定了他自身应当提携全国进步的民众以从事于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今天革命势力还很薄弱的时候，正应当多向各方面活动联络，本不应当有排斥共产党不使加入合作的道理。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交谊如何，今日诚无从断言，然而便令将来或者两方面有不能合作之一日，这究竟是将来的事，在国民革命未成功以前，便闹甚么分家问题，未免太早得很。

第二、国民党倘若定要排斥共产党人，亦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过至少国民党为了这样，更要自己认清楚自身的使命，更要加重些自己的担子。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为甚么革命？为谋广东军政界地盘的扩张而革命么？为拥戴孙中山先生个人而革命么？倘若是这样，那便与南北一般不顾民众利益的军阀有甚么区别？我们只知道三民主义是为全国民众谋利益的；孙中山先生与他所统率的民党，是为全国民众的利益而奋斗的。然而现在一般排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居然会说出共产党员要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妥协，这是破坏国民党；然则自认国民党是对帝国主义妥协，对军阀妥协的政党么？果然如此，那便与头发党、马蜂党有何区别？拿这样立脚点来排斥共产党，那便无异自己证明他们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甚么都闹不清楚了。

第三、国民党纵然要排斥共产党，亦只好就那些确实已经名隶共产党籍的人使他退出国民党，至于对于那些明明是纯粹国民党而略略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乃至那些明明是纯粹国民党而仅仅主张容纳共产党合作的人，没有因为排斥共产党的原故一并加以反对排斥的道理。然而现在那些主张排斥共产党的人，把一切反对他们的人都指为共产党，又立一些共产派、准共产派的奇异名目，欲为一网打尽之意。因此，不但一般思想比较清醒进步的青年都被目为应排斥的共产党员，不但邵子力先生被指为甚么共产党的副委员长，便是与孙中山先生多年患难相从的汪精卫胡汉民先生等亦会被指为共产党。这显然可见所谓排斥共产党不过是他们威胁异己的一个武器，根本便是要扫灭国民党中一切比较进步的势力

罢了。

第四、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由是很显然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甚么时代甚么产业状况之下都可以实现的。他们的大师马克思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学者，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大生产业发达以后必然的趋势，然而亦只有大生产业发达以后才能够达到此境地。共产主义并不象一般唯心派的乌托邦论者，他们并不相信在中国未能打倒外资，发达自国产业以前有任何方法实现他们的主张；所以他们因为热心蕲求他们主张的实现，还是不能不希望外资的早早打倒，自国产业的早早发达，因此，他们认定了眼前最大的急务，是尽力与国民党合作，而且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势力于全中国民众。这中间虽然动机是与纯粹国民党不同，然而他们对国民革命期望心的真诚，恐怕不是那些靠国民党招牌以自营利益、自植势力的浪人政客等所可望其项背罢！

第五、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并不曾禁他们跨党，亦并不曾要求他们将党解散，那便他们这些议案，与纯粹国民党员在党内另有小组织的完全不同。而且便就国民党员所获得他们的议案印成小册子的而言，他们并没有一句话要引导国民党做不应当做的事情，他们无非告诫他们的党员要谨慎和平的与国民党员相合作，应多做切实工夫，少作无谓争执。象这样的话，亦可称为是破坏国民党的证据么？他们为促成革命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不能不尽力使国民党的内容更充实更进步，然而这样都居然会不见谅于少数国民党员，他们不但认这是破坏国民党，而且在他们在南方大学秘密开会时所发的传单，更在小册子原文以外自己加上一些煽惑一般国民党员的话头，又写上许多“注意”“大注意”，似乎表示共产党人要督促国民党实践国民革命的工作、要设法与国民党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通通是大逆不道的样子。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还是一句骗人的话呢？还是真有这个决心？倘若真有这个决心，会怕人家督促自己做这种工作吗？会以为人家有这种督促是侮蔑了自己吗？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

第六、共产党人现在需要与一种国民革命的势力相联合，他不能不注意到十余年为国民革命支柱奋斗的国民党；然而他不能笼统的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国民党的明达领袖，确实是真诚勇猛为他们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他们的言论行为都表示着他们坚忍不挠的精神；然而一谈到他们党的活动，却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这样的原因是很易知的。有少数老资格的党员，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年龄一同老大了，所以他们失却了少年时的革命精神，不知不觉的倾向于苟且妥协的方面；而另外一般偶然归到南方势力下的政客官僚，他们本来做梦都不知道革命是一回什么事情，在他们的脑中，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只是一个骗人幌子，实际只是与头发马蜂等党一样是争饭碗的东西。他们这样的人与这样的思想占据了国民党内部，于是实际上国民党几乎没有法子与那些私党分别了。然而这是不足以污损国民党的。孙中山先生等百年如一日的少年精神，曾经屡次为要刷新国民党内部而改组国民党，这一点令一般共产党人明白国民党终究有代表国民革命势力的可能，所以终究认定了有他们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完成孙中山先生等志愿的必要。他们加入国民党，是根据于他们的要促成国民革命；那便国民党只要一天还真有志于国民革命，在他

们自身方面，终是要加入的。实在说，只要国民党一天不变成完全象头发马蜂等私党，共产党人终不肯放弃国民党方面的工作的。你便明白的排斥他们出去，他们为了促成国民革命，终究不免要秘密的参加进来。他们总要帮助国民党，督促国民党，早些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除非国民党真个不做国民革命的工作，把广州一隅自认为与奉张浙卢一例的事了，然后共产党才会死心，设法另谋创造国民革命的势力。

所以本于上列的各种理论，可知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他们的加入国民党而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这是不足奇异的事情。为国民党计，倘若是真心要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呢，在今天没有惧怕，或者嫉忌共产党人的理由。共产党在今天，任便有什么神通，他们只能做成国民革命；然而利用他们帮助与督促的力量，国民党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正可以早期完成，何至于因为他们的帮助与督促，反对有什么亡党之痛呢？

然而在根本并不要革命的那一部分国民党员，他们的思想方式完全是两样的。

他们自己不作革命事业，人家要求帮助他们时，他们说这不是亡党了吗？于是不但共产党人来帮助他们，谓之为亡党；便是纯粹的然而进步的国民党员来了，亦谓为亡党。醒醒罢！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存在的；倘若国民党根本忘了国民革命的使命，这才是亡党呢！我们还是祝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万岁！

（原载《中国青年》41期，1924年7月19日出版）

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广州通讯）

巨　缘

这次扣械风潮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从前广州政府对于列强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实质上也和奉张、浙卢、湘赵差不多的一个所谓独立的地方政府罢了。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一方面右派抵拒国民党革命化的势力虽然紧张起来，别方面却正因为国民党中渗入了左派革命分子，无论左派还怎样微弱，始终已经不是从前的国民党。广州政府之下左派最初的能力虽不过指挥群众运动，稍稍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气势；然而广州政府本身接近苏俄的事实，却大足以使英国恐慌。所以从广州关余问题直到沙面罢工，虽然主观方面看来，广州政府不能算得有力的有决心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而客观上对于英帝国主义虽还不可怕，却已经是一个讨厌东西了。

何以说国民党政府还算不得有力的有决心的反帝国主义政府呢？因为实际上广州政府不是整个儿的。广州政府并且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它的成立和存在完全靠国民党首领孙中山先生与南方各色各派小军阀的应付；所以实权并不在国民党而在军人。各军擅收税捐，自蓄饷械，大多数只想造成个人的羽翼。这次运械问题中便有滇军廖、范等与商团勾结的事实。械运到时，商团曾经想贿买李福林，偷卸上岸。

何以说客观上始终英国帝国主义看着广州政府是一种反帝国主义力量呢？沙面罢工风潮便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国民党左派分子的指导坚持，着实使英帝国主义受些打击。国民党右派及中派虽然用种种方法回避公开的赞助罢工，然而普通党员中的左派，曾经求得市党部的名义，做很热烈的宣传。于是英国方面便分两路进行：一路，勾结右派调和派；一路，趁商团运械暗中与以赞助，又自向政府告发，以挑拨商团起而推翻政府。

于是商团事件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如今政局动摇的危象，还很显著，其形势已经逼到如此分明：即孙中山若不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反革命到底，则广州政府势将被迫而完全失其反帝国主义性成为国民党首领主持之非国民党政府，——这本是帝国主义的目的。

沙面罢工将了的时候，领事团与罢工者双方的争持，已经只剩得一点：就是巡捕的复职问题。国民党及政府方面的右派居然暗示领事团，说巡捕复职之后，管理他们的权始终在领事方面，何必现时坚持不准复职呢。同时吴铁城、伍朝枢、马超俊等，竟说领事方面斥革巡捕之后他们担保收用这些巡捕，另编特别警备队。这种破坏罢工的方法可以算得巧妙极了。而且他们对于英法巡捕，很有些歧视。因为马超俊个人与英租界巡捕头有关系些，等到工人觉察这种现象，绝对不信任马、伍等的时候，马、伍没有办法，便趁着商团

扣械事件，拿商团威吓工人，并且假借中山名义高压工人。于是实际上马超俊、伍朝枢等右派分子适成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手里的绝妙工具。

沙面罢工就此了结。可是刚刚要上工那一天，商团事件已经吵得非常热闹，满城是明天开始罢市的谣言。英法领事便突然翻脸不准工人上工，要想和商团互相呼应，两面夹攻政府——帝国主义的阴谋显然可见。

因此可以说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

广州罢市之前，佛山方面有陈恭受的指导，已经先行罢市，要求无条件发还枪械——当地土豪所组织之民团都有武装，威胁小商，使不敢开门。当地的政府军队竟不能有丝毫处置，迹近故意放纵。于是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即左派）极端主张严厉对付，要在政府方面，趁商团预备未周，后援尚无确实担保时，先行挑战。政府方面，不但有军官学校四处，共二千人，而且有农民工人之赞助——当时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工人代表会都起而斥责妥协派为反革命所利用，要求解除买办商团之武装而武装平民——工人与农民，其中市郊农民的农团军原有三千枝枪，工人则可以以扣留的军械立刻武装起来；这种要求当然受国民党中革命派的最热烈的赞助，革命派说，现时商团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北通曹吴，东连陈炯明；因械案发生之后，必然赶紧请援于两方，所以虽然罢市谣传很甚，而始终迟迟六七日不发，便是有意等援兵；假使等到东江或英国方面有所动作，国民党就只有束手待毙了。因此，应当趁早挑战，就有人提议派人到佛山组织市民大会，工人都愿意拚死奋斗。若商团方面敢于殴杀示威运动者，便可以立即强迫商团缴械而武装工人。革命派又提议由国民党发一宣言，以为宣传的方针，内容应当说："商团军纯粹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商民尤其是店员，不应当受帝国主义的雇用。农工阶级屡次受商团的摧残，必然要赞助政府。一切国民的最正当的主张便是不但扣械不能发还，而且要解除商团现有的武装。凡是罢市赞助陈廉伯买办的，国民都认为民贼。"

可是实际上佛山虽然开市民大会，而国民党中并没有命令军队采果决手段；右派的军人，在示威运动时名为保护市民工人，事实上却举枪禁止工人通过商团团部的地方——竟是保护商团。革命派所提议的宣言及武装宣传方法，都不曾采用。过了几天，忽然发现国民党中央的告商人书，说得不痛不痒，仿佛政府得罪了商人似的。最后，才勉强召集市民大会于广州；然而武装宣传不实行，党员不能积极在群众中及市民中根据革命派所拟之宣言活动，偶然的一次市民大会，劳动群众虽然能表现他们的奋斗精神，却事实上没有预备好。于此便发见国民党中派诸首领不能负指导群众，组织群众的重任；并且没有政治的眼光，不能当得革命的领袖：——劳动群众愿意赞助他们，他们却怕群众，不敢接受这种赞助，因而不能指导群众，预备决心和反革命奋斗到底。

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恭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这是罢市之前的形势。当时的斗争，简直已经明显着从党外的反映到党内的局面。我们若分析出这一方面的情势，对于以后政潮的变

迁便可一目了然。

右派国民党员陈廉伯、陈恭受等是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其间有许许多多游移分子，如政府中之右派军人，主张调和的官僚，无异乎帝国主义间接的工具；幻想维持政权而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的中派诸要人，便间接而又间接的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动派的气焰。这几派的斗争便成功这一次的政潮。

广州市民大会之后一天便罢市了。当时右派诸叛徒的策略，第一便是放出“共产即在目前”的谣言；第二用什么“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名义发出政纲，否认三民主义的意义，主张不党主义；第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命令他们驱逐县长，宣布独立。武装商团差不多完全改换便装，到处检查不罢市的商铺；在团的不用说，不在团的便用强迫手段，再不成，便故意捣乱：譬如聚着三五人，带着手枪到不肯罢市的茶店或铺家故意寻事或假作互打；再则收买中央银行纸币持向不肯罢市的店家强迫使用。他们自己尽发反对政府的传单，而国民党所散传单以及其他团体攻击商团的传单，他们便以强力制止商家不准阅看；甚至西关一带之政府布告，也随贴随扯，不准市民观看，常用武力驱散看众又派人殴打派报工人，不准市民阅报。总之完完全全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法西斯蒂的暴力政策。因此许多小商人虽然不愿罢市，也不得不罢；然而至多不过全市十分之六罢了市。后来因为劳动市民的反对，政府的查办，剩得只有少数大商铺插起外国国旗闭着大门。商团军就专保护这些各国商铺，反抵中国政府，以罢市勒索枪械。——这是当时显然的景象。所堪注意的是这“外国军队”——商团军的首领，却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陈廉伯。可是政府方面的军队中间也有外国买办的奸细，竭力主张调和，不肯尽力镇压商团，而托名于“和平调解”。伍朝枢在第一天便想调停，以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想和假借中国商民名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军订城下之盟。所谓商会，以至于善堂也四方八面的找汪精卫等以及各总司令出来说话，有以二十万元“供献”政府，由政府“依法”发还枪械的传说。国民党右派的这种行动可以说是最巧妙的反对政府的手段：他们表面上说是怕帝国主义直接来干涉，所以应当如此；实际上却是不用帝国主义费力而由他们赶紧代为履行其政策。市民的劳动界都非常愤慨，声言如果真正赞助革命政府，只有解除商团武装之一法。并且各举代表会集于省长公署，组织平粜委员会，预备收管粮食以及重要的公共消费品，使商团不能以罢市要挟，尤其要使他们不能以饿死平民的手段胁迫革命政府妥协。当时农民自卫军及工人代表会都曾积极预备。那时候，冒充工人首领的马超俊，唯恐革命派果断实行，亟亟自夸可以一手办成管理食粮事务，可是工人群众因为他屡次压迫欺骗恐吓工人，到这时已经绝不信仰他。结果管理食粮队，预备武装保卫民食队仍然由革命派完全预备妥当。当时提议须急速进行：一面实行收管米粮作持久之计，一面即刻解除商团武装，肃清政府及党内的反革命派。然而国民党最高党部中派诸要人始终找不出这样一个决心，迁延复迁延，坐令商团和英国海军及右派军人勾结妥当，于是局势便突然大变。

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居然以武装调停的威风提出六个条件，要政府受五十万元发还枪械。——这无异是将三十年来国民革命的首领孙中山廉价出售于商团。同时英国领事通知政府说，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命令，若政府对商团开火，驻广州的英国海军便将立即攻打政府。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陈廉伯、范石生等对于中山政府可以说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亦就是国民党自己的右派党员及军人对于革命政府的大蹂躏。

当时革命派的主张是：商团枪械完全没收，分发真正之政府军队及广州之农民及工人自卫军；买办阶级之武装队不准存在，另编平民警备军以劳动平民为根本。此外更主张取消一切杂捐，统一财政——使作乱及反革命的军人无所凭借，并且真正减少贫民的负担。再则，便是民选市长，使当时广州市民间商民间的分化，都有政治上的表现。

当时商团之中早已有了分化：一部分勾结李福林的，如河南商人便没有罢市，大名鼎鼎的药铺老板李朗如也没有"参加反抗政府的行动。"一部分已经勾结好廖、范及英国帝国主义，如邓介石等，愿意出五十万元收买广州政府，愿意使陈廉伯通电"悔过"，以保留即刻继续活动之可能；一部分主张陈廉伯"无过可悔"以为五十万元太多，应当无条件发还枪械，即刻以激烈手段对付政府，于是乎右派分子如孙科等，便以为政府方面不应组织工团军，不应倡议管理食粮等政策，应急急与邓介石等妥协，允许履行条件后从速发还枪械。然而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上（八月三十一日），早已宣布范、廖之反革命行为，不服从政府命令，并且声明绝对否认允许调解条件。此后各劳动平民团体，尤其在"九七"纪念日市民大会上，都很急激的要求解除商团武装，否认允许条件。因此，右派的政策既与中山的声明相左，又与民众的要求大相违背。——当时的政府若真有决心，很可以立刻武装平民以卫广州，预备作战，实行减捐民选。可是中山声明只管声明，而中派要人竟别出心裁想出这样解决的方案："最好暂时瞒住真消息，与商团之最接近政府者联络，再设法使商团'就范'改组，使实际上得着同样的结果，而表面上不露痕迹"。于是这政潮的结果便成奇突的现象：

趁着旧市长去职新市长未选出以前，李福林竟做了市长，李朗如竟做了公安局长。表面上是这一部分商团代表因与政府妥协而取得政权；实际上他们有了政权——一切改组商团、民选市长等条例便在他们手里；这种妥协实在有利于反革命派。最要注意的便是胡汉民先生上台做省长，廖仲恺一面声明自己非共产党员，一面仿佛引咎辞去省长。这一方面便已经确实是政府向反革命的妥协。农民自卫军及工团军的枪械一直没有发出来；而枪械"依手续发还，改组商团"等消息，广州各报尽着宣传，仿佛是故意反对中山先生的声明，而受中派某要人之指使似的。然而为左派及群众的反对，不时又散布"政府要求三百万军饷，商械中长枪已经用于北伐军，令兵工厂赶造偿还"等消息以乱观听，似乎又想实现中山声明似的。这都是中派态度动摇不定的反映。由上看来，那想不露痕迹偷偷摸摸实行自己的政策——即避开革命的道路而想利用商团之一部分的中派，毕竟要受商团的利用，毕竟要丧失自己的政策，结局不过是仍旧承袭右派的衣钵！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的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单想用暗渡陈仓方法去回避革命，无论口头上怎样拚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

（原载《向导》85期，1924年10月1日出版）

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向导》社记者

昨日本报驻粤通信员由粤归来，携最近广州“民国日报”一卷，同人等披阅之下，发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警告“向导周报”二函，兹依次答复于下。

第一函之要点有二：（一）谓本报第八十五期强分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二）谓陈廉伯陈恭受并非国民党党员。请先言前者：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声辩及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都否认国民党有派别之分，照他们的意见，国民党内是没有派别的；所谓三派云云，完全是“向导周报”的“强分”。国民党中有无派别，这完全要看事实来断定，空口说有或空口说无俱不作凭。如实际本没有派别之分，是不会因人家“强分”便真有了派别，我们用不着畏惧；实际若真有派别，便是否认也没有用处的。国民党内有派别之分，其右派是倾向反革命，这不是“向导周报”主观的“强分”，而是半年来种种事实使他不得不作如此结论；而且这也绝不是本报一家之私言，凡知国民党的类能言之。稍远的事实我们不必举，独秀同志已于“我们的回答”一文中择要举过了，我们现在只就最近的两件大事来看。

对于江浙战争的态度，国民党内是一致的么？在战争的开始，左派即认定此次战争不仅是直系与反直系两派军阀的战争，而且是美日两派帝国主义在华的战争；在此战争之中，人民只有受屠杀受损害，战争的结果，无论那派军阀胜利，都不能与人民丝毫利益。故坚决的号召人民团结起来自决。以国党名义发表的“北伐宣言”，则表示为推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独立的加入战争，仅认浙奉为反对曹吴之友军；同时希望战争的结果，胜利要归之人民，且使永无继曹吴而起之人。而“热心国事”的右派诸先生，则取直接帮助浙奉两方之态度，楚伧先生且于“民国日报”（上海）公言浙卢为正义而战，大呼“义存卢存”、“义亡卢亡”，完全送掉国民党独立的本色。再就此次北京政变来看，左派认为政权并未出双重宰制者之手，仅不过是派别的移换，此时国民党重要责任仍在号召人民之自决，而且此时尤是宣传之最好机会。在中山一方，经过许久日子方决定召集国民会议，且毅然放弃在粤之地位，以国民资格北来做全国的党的宣传，此实是国民党的大关键。然而在右派一方，对于北京政变则另有高见，政变消息初传到的时候，在上海的张继等纷纷兼程北上，广州的市党部则燃炮庆祝，大家都以为曹吴已倒，国民党业已成功，此行只要入京取得位置。于是乎由卢永祥打出来的“正义”，如今便跑到北京国务院去了！

国民党中有派别之分，其右派是倾向反革命的，事实使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不必将一切事实都搬来作此文的佐证，更不必提到那些令人十分气愤的罪恶（惨杀黄仁及李福林助

商团杀工农二案），因为此文之要旨不在指责右派可悲之行为，也不在替本报作辩护，证明他并不是"强分"派别，借以"挑拨""中伤"；此文要旨还在贡献国民党中央诸君对于党内派别应有的责任及应持的态度。国民党应当是个团结一致的革命党，内部有派别之分当然不是我们希望有的现象。可是到了业已发生派别，我们却也不必遮掩否认。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同时也要知道：国民党是一个党，不是宗法社会；他所代表的是国民利益，不是党员的利益。不要以为有派别尽是丢脸，不要以为国民党是党员的私产，不要讳疾忌医，以为"家丑"不可外扬，而陷于事实的欺瞒民众。国民党中央诸君，对于党内派别的唯一责任，只有依据党的纲领和纪律来评判党员之言动。党内行为有违反党的纲领或主义的，应马上纠正之；党员有违反党的决定或纪律的，应毫不容情加以责罚。只有这样才能肃清反革命分子之异动，才能吸收革命分子之信心，才能使派别的界线消灭，才能约束党员一致奋斗。若只知遮掩否认，结果只有使派别的界线加深，党的组织愈趋松懈，而完全同化于眼前的社会。本报之所以一再根据事实，指出国民党内派别之分，不仅在使民众了解国民革命之必然的方向，亦在唤起国民党诸领袖之注意，对于党的组织有所整顿。可惜诸君对此重要并不能了解！吾人今敢明白答复诸君：诸君只知否认派别的态度，实际即不啻包庇违反党纲及纪律之背叛分子而奖励之；表面好似站在卫护党的地位，实际上却遮盖耳目，任其暗中腐败而不可作为，其结果不仅不是卫护国民党，反而是破坏国民党！

至于陈廉伯等是否为国民党党员，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国民党和本报都没有什么重要：第一因为挂名或冒称国民党党籍者自来没有什么严格的取缔，远如赵秉钧、赵倜、张敬尧、温世霖等之自称或被称为国民党党员不消说，近如孙岳胡景翼等又以民党巨子之资格见称，最近右派且宣传此次孙科赴奉之最大成绩为张作霖父子表示中山若能驱逐共产派出党彼等皆有加入国民党之可能（见"商报"本月十八日广州通信），那末不久张作霖父子或者也要自称或被称为民党巨子了；第二，国民党肃清内部的工作若永无实现之日，贵党的荣辱决不系于多一陈廉伯或少一陈廉伯，因为反革命的右派领袖十有九个都是现在和将来的陈廉伯，现在贵党以内如陈廉伯其人者还多得很呢！单举一个例子来看，现在北京以老民党资格招摇的冯自由与陈廉伯有什么高下？陈廉伯不过秘密的在广东暗通帝国主义以图推翻中山在粤的地位，冯自由则公开的跑到北京向帝国主义及外交团告发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北京"顺天时报"八月八日载冯自由对日本记者谈话，略谓苏俄月助民党二万五千，军官学校二万五千，已共交二十五万云云）企图推翻中山在全国的地位，以故近来北京东交民巷及外国报纸广布中山与苏俄订约"赤化"中国的谣言（见本月以来北京"东方时报"、"顺天时报"及其他外字报），日英法美且协议通牒摄阁保证条约神圣，以抵制中山北上的宣言。然则可见一个陈廉伯是否在国民党以内的问题实在没有什么重要，唯有众多的陈廉伯之右派永久存在国民党以内才真是重要呢！总归一句：本报对于这个问题虽极其希望所闻非真，所记载一如贵会来函之所更正而非事实，但同时为中国革命及国民党前途计，更希望贵会注意其重且大者，勿纵容众多的陈廉伯（右派）得长存于贵党以内，继续破坏国民革命，排斥并仇视真正的革命分子而令国民冷齿！

现在请进而答复贵会警告本报的第二函。本报第八十七期"广州反革命之再起"一文，其要旨在批评十月十日政府军警协同商团压迫工人之一点；所引"新申报""时报"

“申报”之各专电，着眼只在李福林军队怎样协同商团军压迫工人及惨杀后福军怎样逮捕工人百余名之多，至于“与商团冲突开枪互击”等语不过为该各专电中连带之字句，而不为该文批评之对象。今贵会对于该文批评之对象（即李福林军队协同商团压迫工人）一无申辩，独截所引上列各报专电中之“与商团冲突开枪互击”等连带字句，巧指本报为“捏造事实”、“冤诬工人”、“助商团为虐”，这样巧为反噬的滑稽艺术，一经质诸读众之前，谓不哑然失笑，其可得乎？至于双十惨剧之实况，徒手游行队之无故被商团迎头痛击一层，本报于八十九期“广州通信”栏及“来件照登”栏中，业已详载无遗，贵会诸君谅早寓目；现在本报不妨以上项登载之有关于辩证者转质于贵会诸君：“……被捕的工农团军当晚有一百四十五人，先被商团军施以毒打，及移交福军又遭痛击，然后缚至河南解送福军本部……以重数十斤的铁链连锁两人颈上……”这是广州三十个团体告“全国国民”（见本报八十九期）的叙述，足以与本报八十七期“广州反革命之再起”一文中所引上海各报之专电及其批评之对象相证实，贵会对于此层曷不申辩而否认之乎？

复次便是本报八十五期以至八十八期关于广州政府及留守广州者对于商团态度之批评。这类批评本报同人一以革命的忠诚耿直之态度出之，不意忠言逆耳，竟以此获罪于贵会诸君。贵会第二次警告本报之函，一则曰捏造事实，再则曰诋毁中伤，而所谓诋毁中伤者即系指本报以上各期中批评广州政府“姑息态度之失策”，以及“广州政府若早日采取断然手段解散商团，其牺牲与损失决不若今日之巨大可怖。”其实这种批评不仅没有丝毫恶意，而且非常忠实近情。贵会认广州政府对付商团的态度不是姑息么？胡（汉民）省长的布告亦自承为“不惜委曲迁就”。贵会认姑息态度不是失策么？胡省长的布告亦自承为“有识之士已以姑息养奸为政府危”。商团本来不过是几个买办包办的纸老虎，起初并无若干商人群众的后援，若早采断然处置，牺牲的不过是几个买办，解散也用不着要开火打战；唯因政府委曲迁就，坐令反革命的宣传一天发展一天，商人阶级的联带煽动一天扩大一天，殆至不能并立之声势既成，然后才不得不下手，所以演出十月十五日之惨剧，然而被其牺牲者究不是买办而是小商人与一般无辜之市民。此而谓为得计讳言失策，诚非本报同人之所能理解。至若不满意于本报对于乘机焚劫的军队之攻击，谓为放过商团而完全归狱〔咎〕于政府军，殊不知革命政府有革命政府的责任，反革命商团有反革命商团的责任，本报抨击焚掠军队，希望革命政府有以严重惩处之，正所以尊重革命政府的责任，挽回已失之民心；至于商团故意纵火嫁祸工人之罪恶，本报八十九期又已揭载无遗，何得谓之“唯一意摭拾与政府不利之材料……其为一种阴谋毒计了无疑问”？至贵会申明政府对于焚掠军队已执法处分一节，本报当然代表广州市民认为满意；但有要转问的，不知李福林、范石生之军队亦在执法处分之列否？

来函大意，回敬已毕。临了，本报同人所欲郑重警告于贵会诸君的：即本报与贵会素无若何关系，贵会并非本报上级机关，本报言论方针，自有权限，绝不容贵会之干涉；贵会欲在贵党以内执行任何手段便执行任何手段，自是贵会所有之权限，亦与本报绝不相涉；至来函威吓无礼诬构漫骂之失态，同人不敏，恕不裁答！

（原载《向导》92期，1924年11月19日出版）

中山北上后之广东（上）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广州通讯）

周 恩 来

△右派的见猎心喜
△胡汉民统治下的市选
△各派军阀的分道扬镳

中山北上前后的广东，显然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现象。在中山北上前，一般国民党右派以及广东各大军阀群聚于广东，争权夺利，占据东江的陈炯明并更内结反革命的商团，外托英国帝国主义阴谋袭取广州推翻中山政府。这样的政象，差不多自国民党改组大会后直至解散商团事件止，永远一贯地表现于广东的政治竞赛之场。及北京政变起，霹雳一声震醒了这一群人在广东作政治竞争的好梦，引起他们转变眼光到全国的争权夺利之场。所以当着政变初起，冯玉祥等联名电请中山北上时，在中山尤其是沉机观变的中派诸领袖尚徘徊于北上的利害之间未能自决，而右派诸巨子便已迫不及待，纷纷以中山北上必能为他们造升官发财机会的私意怂恿中山北上；尤其表现得露骨的则是蛰伏在沪上的民党右派，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向奉张京冯津段各送其秋波，例如某君在北京政变以前浙卢小徐相继离沪的期中，眼见反直系之无望，他将无所用于国民党，于是径以“耻与共产党人为伍”的借口请中山开除他的党籍。中山得报批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他的党籍并宣布他的罪状。但中央诸人自然不会作这样的断然处置。这件事方将压下缓办，恰巧北京政变起，某君喜后〔从〕天降，认为是乃千载一时之机，而国民党的名义更可动北方各派武人的注意，于是一方他的党友为他电广东中央取消他的退党呈文，一方他便先中山而欢然北上了。同他这样情形的，自然在北方参与过贿选的旧国民党议员也便自认恢复了国民党党籍，在上海在广东有省长总长督理资格的右派分子自更跃跃欲试欣欣然以国民党这块招牌可招摇过市了。但是他们这般热望，禁不住张冯冲突的不利打击，段祺瑞与以排斥的冷水浇头，尤其是中山不许党员北上猎官的训令当然使他们感到不少“坐冷板凳”的滋味。然而这些失望的朕兆，在右派分子终不肯承认是他们北上猎官的死兆，故孙科李烈钧虽相伴回粤希图另辟途径，张继虽因段祺瑞的冷落而气愤愤地回沪，但其余的恐怕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呢！

一些右派分子纷纷北上猎官了，剩下的右派在广东作如何举动呢？他们乘着中山北上无人监督的机会，群起攘夺广东的权利地位，其中最活跃的自要算代行大元帅职权，留守广东的代帅兼省长的胡汉民。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便是民选市长。原来民选市长一事自中山扣留商团军械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宣言以后即决意将市政还诸市民管理，许市长出自民选，

并将孙科撤换以示决心。在中山本意，认定市民对于政府之不了解全因隔阂所致，果使市民得有参与市政管理的机会，至少能使他们明了广东政府的困难地位与各军阀的跋扈情形，远离军阀的勾结利用，逐渐同情于中山政府的施设而断然抛弃一部分市民妄想引进陈炯明及英国帝国主义建立商人政府的错误观念。这样的好意，右派分子是不能了解的，并且不愿照着进行的；因此，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古应芬起草了一个极坏的市长选举条例：市长选举行复选制，并包含有官民合办的古怪办法；附郊受市政厅管辖的二十多万农民竟无选举权；强分市选为士工商三界，许多市民被摈诸选举条例之外。条例订得这样坏，但是胡汉民还依然压着不执行。直至中山临离广东时，汉民被催不过，一方也正因为这是予他以操纵市选为所欲为的好机会，于是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于中山动身前五日——十一月九日宣布实行市选，并通告十一月十七日即为造选举人名册截止的时期。如此短促而又夹以欢送中山北上事件容易引人视线他移的时期，不但市民对市选条例的反对将措手不及，便是选举人名的调查亦赶办不及。胡汉民设此圈套，正为他的老弟——胡毅生运动市长预留地步，同时自亦醋起了右派巨子伍朝枢谢英伯，林云陔等一干人，欲在这最短促期间获得市长被选人的资格，明争暗斗，撕作一团，活现出一些同隶在国民党旗帜下的右派党员互争市长的怪现状。争市长的既有人了，自然市民请修改市选条例，延长造册日期的呈文，愈值不得胡代帅之一顾了，因为他原本无意于市长真正出之民选的。尽管工人呈请修条例延选期，尽管农民极力争市选权，尽管教育界有伍朝枢贿买民权社的黑幕揭破，尽管商人对于市选万分冷落，但胡汉民依然壹意孤行，十七日截止名册造送，接着便举行投票选举。在投票前，左派组织的广东民族解放协会曾发表一篇对于广州市选宣言，原文如下：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革命的民众原应得着自治权的；在依着国民党改组宣言实行民选市长的原则之下，广州的革命市民应无差别的获得普通的直接选举权。可是事实上给我们的证明，却不是这样。政府公布的市选条例中，只有士工商三种团体的人有选举权，而拥护革命最力受市政厅管辖的市郊农民竟被列为"化外之民。"市长的选举法非直接选举且有指派的作用参杂其中。选举的投票所士界定在广东省教育会，工界定在广东总工会，一方既与此两个省的机关有操纵市选之可能，一方也使广州市教育会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完全失其作用。上述三项是市选条例完全失掉革命政府下的普通选举意义。

及在现时市选筹备期中，政府指派的市选事务委员会所造的选举人名册，更多残缺不完：工界得四万余人，士界得一万余人，商界二千余人，我们固承认市民对于市选之不踊跃，一部分因子是其政治观念薄弱之表现，但我们同时更承认：大元帅实行民选市长的命令颁布好久，省政府延不执行，直至最近忽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造名册行市选，使政治观念薄弱的市民仓促不知所从；这不能不说是失掉革命政府下的政治训练意义。

在市民方面：市郊农民协会因呈请修改市选举条例被驳致有今日请愿运动，要求实现革命政府下的普通市选。工界市选既完全为失掉工人信任只包有少数工会的广东总工会所把持，于是广州市工人代表会一面登报否认广东总工会有此资格，一面标明工人市长的四项资格，促醒工人的最大觉悟。士界这个名词已属万分不妥了，不料此

万分不妥之士界中更闹出极少数学生组织的民权社（右派组织的）包办士界市选的怪剧，假借名义召集士界市选筹备会；沿街散放替人捧场之肉麻传单，坐汽车放鞭炮摹仿军阀扰乱街市的可厌的行为；集少数人开会，强各学校一致选举伍朝枢为市长；国民党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载此中已含有金钱运动作用；种种举动，真十足表现广州士界之"士气"！商民因为商团事件受了买办阶级军阀帝国主义者一个大大的欺骗后对于此次市选竟变成一种消极的反动。在你们以为可以离开政治生活了，其实政治还日日来过问你们——军阀的苛捐是不是政治上的产物？是不是由市民自治和自卫——工农商联合的自卫，才能铲除？还有所谓公开运动的我们既已领略了民权社拥戴伍朝枢的用意，同时我们更知道谢英伯也正在于运动广东互助社之外，还要侵入士界的远东学院，两位先生或明或暗的竞争，却又都是应受同一纪律的国民党员。

这样的市选，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不愿责国民党政府以过分的难题，但国民革命中最小的限度，我们认为有实现之必要和可能：

市选要加入农民！反对包办！市民要直接选举！反对收买！主张自由投票！"

及市选初选结果，胡毅生的票额果然超过伍朝枢林云陔王棠之上，但黑幕中的争斗却颇可观。当选举日期公布后，在社会上闹得最热闹的要算伍朝枢与谢英伯的所谓公开选举运动。其后林云陔亦作后起的竞争者。最寂然无声的要算胡毅生，殊不知他暗中实已勾结了几个工会首领为他雇人捧场，同时并更指挥选举事务委员会故意挑剔为谢英伯及伍朝枢捧场的互助社和总工会的名册。而右派邹鲁在广东大学方面又实暗助胡毅生牵制伍朝枢的票额增多。故当投票时，不及造送名册的各工会联合组织监察团在工人投票处发现了许多受贿舞弊的事件——总工会职员更将受买工人拘至总工会拷问其被胡毅生收买的实况。实际上有票可投的工界士界在当日竟不及一万，商界只有五百多人投票这便是投票之总数。工界的诉讼接着初选开票后便提向司法机关告选举事务委员舞弊，风声传至天津中山也听着气恼，于是电命廖仲恺等查办。胡汉民先本因廖仲恺助农民争选举权而深怨其不为己助，有廖做了农民部长便为农民争选举权的说话。及中山重廖远胡，故更不快意，不过在表面上胡又不得不因市选诉讼事将市长复选暂行停顿以敷衍中山一下。现在诉讼事已依着官官相护的惯例，尤其是依着胡的意旨，将工会告发人判输了，胡毅生正可准备登复选之台，只是事缘不巧，顶门的对头孙科将回粤来了，不管照着传说他是来抢省长还是回市长任，他终是胡氏兄弟的冤家。我们不久必可看到右派在广东抢官的第二幕活剧，然而与中山市政还诸市民的主张却愈趋愈远了。这便是所谓忠于中山的右派行径！

离开右派竞争的事实，广东更有各军阀的暗争。我们说北京政变给全国各军阀一个争利的绝好机会，同时任何一派军阀也不会有统一全国武力的能力，同样的机会自然也不会见外于广东。本来在广东的军阀除去东江陈炯明南路邓本殷属于敌军方面者外，亦依然是各树一帜积〔极〕不相能。这次政变一起，中山继着北上，久困在广东的各军阀，都看透了久留广东无益，机会不可复得，群思向外谋更大的发展。于是谭延闿奖〔樊〕钟秀等极力攻赣，程潜努力谋湘，刘震寰借着中山任他为广西省长的机会想立即回桂，范石生廖行超更作更大的雄图希冀与刘震寰合作长驱回滇。平日表面上都是自命为国民党员的龙虎将军，现在乘着中山北上群龙无首的时期都十足地表现出他们与国民党尤其是与广东国民党政府无关了。然而这样一来，却着实急坏了胡代帅，客军走了是小事，东江陈军反攻，粤军假使抵

挡不住省长位置丢了是大事。因此，帅府司令部的几次会议，广西黄绍雄李宗仁对刘震寰的敌意，唐继尧的拒绝表示，西江归路粤军的严密防守，都足使滇桂两方军阀有一时行不得也之叹。并且攻江西的军队除掉樊钟秀带领他的豫军直趋回豫外，大都因方本仁与林虎之图夹攻，已逐节由吉安赣州改进为退改攻为守。目下这样一个情势，陈炯明与林虎在另一方已商定各向其目的地——广州与江西进发，广东政府下的各武人或又有一时联合攻陈的比较可能。但破裂的朕兆却时时藏在这联合的行动里。

上述各节，完全是中山行后的各幕写真。我们于此要问问有革命倾向的中派和国民革命领袖的中山先生：你们究看看这些右派分子是在为国民党工作啊，还是为了他们自己？

（原载《向导》98期，1925年1月7日出版，署名伍豪）

国民党底分析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陈 潭 秋

一 国民党底前身

国民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其组成分子为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及同盟会；同盟会实为国民党底骨干。

同盟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东京），其组成分子为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此三会各有其特点，而其合并为同盟会，则又因其有一共同之目标。试略述之：（1）兴中会为孙中山等所组织。孙为广东人，最先感受列强之侵略，同时感觉满清政府之不振，遂有排满思想，此即孙氏倡民族主义之动机。广州与欧西通商最早，广州商民及南洋华侨，渐形成商业的资产阶级，而有取得政权的要求，是为孙氏倡民权主义之动力。孙氏自身遍游欧西各国，为社会主义思潮所鼓荡，是为孙氏倡民生主义之发端。孙氏三民主义在兴中会已植其基。（2）华兴会为黄兴、宋教仁等所组织。黄、宋系湘人，湘省在洪杨变乱中为南北冲要地，屡经战乱；反清保清的观念，在湘省人民均有较深刻的印象。黄、宋排满的思想，即是沿袭反清的印象而发生的。清末失政，国困民穷，易使人发生刷新政治的思想，所以华兴会之成立，亦含有政治改革之元素。他们个人地位之降落，非革命不足振拔，亦引起他们的革命思想。（3）光复会为章太炎、徐锡麟等所组织。章等专攻汉学，承继明末遗老之光复思想，而有光复会之组织。所以这纯粹是复仇——反清复明——思想之组合体。

三个团体虽各有特点，而“排满”为其共同之目标，故三会有联合之可能。“排满”是当时清政府所不容的，三派分子皆因受压迫而东渡，而同盟会之组织遂以产生。而三民主义，亦正式定为同盟会之纲领。

自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知革命工作还未完成。然华兴、光复两派以为目的已达，可以终止革命工作，遂与北洋派妥协，而谋夺取一部分政权，将同盟会改为公开的政党组织。未几与统一共和党等四团体合并而成国民党。

二 国民党改组以前的经过

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

国民党成立后，一般非革命分子想籍议会政策掌握政权，故在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因是引起袁世凯之忌妬〔妒〕，遂联合、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而成立进步党，与之对抗，并极力破坏国民党，使之内部分裂(如刘揆一之叛党)。国民党受种种压迫摧

残，各省民党督军均被裁撤，同时宋案发生，遂有癸丑湖口之役——二次革命。彼时孙中山号召党徒，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仍持妥协态度，主张静候时机。黄兴死后，黄之部下多依附于岑春煊而成为政学系。中华革命党因政策错误，以十余年之努力未得若何效果。欧战后，国内劳动运动蜂起，孙中山感受革命新势力的影响，遂有改组之动机，他们于一九二三年发表宣言和党纲，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始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

三　国民党历年来之教训

国民党最初取用议会政策，滥收党员，竞争选举，而于党底根本问题——组织和训练——毫未加以注意。故在议会中虽能占得绝对多数，而一经压迫，全国解体。这是第一次的错误。

国民党鉴于议会政策之失败，遂改用军事行动，想借武力打倒敌人。国民党本身并无可靠军队，故其军事行动，不过是收买退伍军人，勾结各地土匪，以图暴动，争夺地盘；对于党的主要工作——组织和宣传——仍未尽丝毫力量，党底内部完全是一般散沙；而其所标举的三民主义，不但民众毫不了解，即党员自身亦多不明其真谛。当国民党努力军事行动的时候，其饷械之供给与各方之勾结，均以陈其美一人为主干。迨陈氏被刺，国民党之军事行动，自不能不因此失其活动。这是第二次的错误。

军事行动这条路走不通，于是改换途径，联美联日，想藉帝国主义者帮助，以殄灭敌人。帝国主义者是决不愿中国资产阶级兴起的，当然不得给以援助，所以国民党联外的政策，又归失败，这是第三次的错误。

国民党至此时，仍未知从党底基础上用功夫，汲汲于想夺取政权，于是又走上了第四条错误——与军阀妥协，利用甲派军阀以倒乙派军阀。此时党内握有兵柄的党员，也多是与军阀的行径一样；致中国的政局，终只能成为军阀嬗递的局面，这是第四次的错误。

四　国民党改组和党内现在的派别

国民党自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将三民主义加以切实的解释，重定了党底意义。自改组后，全国各地党部均注重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党底内部亦较前紧密得多，民众对于党也渐能了解和同情。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有了新生命了。但因党员底阶级性不同，党内形成左、中、右三派。

国民党本是各阶级联合组织的政党。因各阶级底经济背景不同，故其阶级性也必然不同，所以党内分出派别是必然的现象。这并不是各阶级主观上故意分出来的。现在根据各阶级底经济背景，确定其阶级性，更依其阶级性分析其派别：

（1）左派——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他们是被剥削的阶级，其经济地位是最低级的，其阶级最富于革命性。这一派党员，大半是改组后加入的，完全接收党底宣言和政纲，竭力做党底切实工作，反对军事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主张用民众的力量以实现国民革命，不与任何反动势力妥协。

（2）中派——代表知识阶级、工商业家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其经济地位不固定

的，其阶级性因之也是动摇的，所以最富于妥协性。这一派多系旧党员，多系旧党员中所谓元老派（大半是知识阶级），人数较右派少。他们也能看清革命的正当途径，他们也觉察了以前的错误，但终因其无固定的阶级性，又因实力太差，所以不得不屈伏于右派包围之下，时与反动势力妥协。

（3）右派——代表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大商人（如华侨等）、地主、军人、政客及洋行买办等。其经济地位虽不免有时被剥削，但同时他们是居于剥削者的地位，其阶级最富于反革命性。这一派党员，多系旧党员中所谓太子派。他们大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的军阀以图存。他们忘不了军事行动，利用军阀以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等传统的政策，他们时常利用恶势力，故做出反革命的行动来。

（原载《中国青年》59期，1924年12月27日出版）

〔附〕邓泽如写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总理钧鉴。敬肃者。窃以本党改组。其动机虽出自我。

总理之乾刚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庭之指挥。然此表面文章。尚有大害。惟探闻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陈与苏俄。本有密切之关系。其所组织之共产党。为苏俄政府所给养。此回改组。陈独秀因粤人对伊感情太坏。乃避去。而以其党徒谭平山出而任事。陈独秀则在暗中牵线。内里隐阴谋。经为其党徒范体仁因争权利而冲突。遂向国会议员徐清和详细陈述。兹谨转述徐议员之言。及他方面探得者。密报于我。（孙中山批语：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总理。以免令外人弄我如傀儡。此为党员等天职所在。势难容已。非敢反对此回改组也。党员等自问爱党爱国。断不减于陈独秀。亦当为总理信其无他也。（一）此回共产党与我党合作之动机。此动机发生于木司寇第三国际大会之后。其表面宣布者。则谓对于资本主义成熟之国家。则鼓吹阶级斗争。促成社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幼稚之国家。则主张联合工农及中产阶级。以完成民主革命。近东则协助土耳其。远东则协助我国。果然如此。亦未尝非友邦之好意。不虞陈独秀之共产党。则利用此机会。而利用我党矣。陈独秀本为陈逆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孙中山批语：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初，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及后与列强奋斗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实为对于民族主义。）

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知其别有怀抱。党员等致疑者久矣。今已探得其利用方法。（二）陈独秀的共产党利用我党之阴谋。陈独秀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当未加入之先。曾在北方某地（似是海参威）开大会议，决定利用我党之方法。其大前提。则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方略。（甲）则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乙）则使吾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乃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夫此二标语。实堂堂正正。无可非议者。然运用之。制为具体政纲。（如政纲草案之一二两条。即阴谋所在。）宣示世界。则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其同情之一日。更我华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我党对于军阀之攻击。只限定于曹锟吴佩孚。今陈独秀派替我党立言。则连及于张作霖段祺瑞。务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使我党限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其他种种诡谲行为。实不胜数。查陈独秀受苏俄给养。组织共产党之后。自知其共产党人少力微。不能活动。其初乃依附吴佩孚。日颂吴佩孚之功德。指吴为社会主义实行家。无耻之言。为国人所共闻。至今年三月。京汉工潮发生。吴佩孚残杀工人之惨剧出现。陈独秀利用吴佩孚之假面具。乃遭揭破。因此转而利用我党急急。人寇亦益深。故此次改组。陈独秀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孙中山批语：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这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吾党。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

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助矣。）

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又党章草案。定总理一职为选举权。窃恐事实随环境变迁。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党员等不予承认。则有违党章。若予以承认。则辱及全党。我党无形消灭。即在此时。思之实为寒心。至苏俄政府之协助我党改组。与陈独秀是否同一鼻孔出气。党员等未敢断定之。惟陈独秀利用我党改组。而施行阴谋。则凡党员皆能共见矣。抑尤有进者。本党向用委任之制。各局部首领之智愚贤不肖。由（孙中山批语：民权主义发端于选举，若因噎废食。岂不自反其主义乎。若怕流弊。则当人人竭力奋斗，不可放责任。严为监视。如察悉有弊端。立为指出。以后我每两礼拜与各人集会一次。如遇有问题，可公开解决之。因一人所见有限。故不得不付之公举。亦自觉所任常有不当之处，故不得不改革。）

总理审定而别择之以大公无我之心。自收用当其材之效。今一变而为普通选举之制。尝见本党人数众多。品类不一。选举运用。偶有不明。即易为奸人所利用。即如此次组织各区分部。陈独秀之党徒谭平山。曾预先收罗去年请

大总统下野之逆徒。使之改名。介绍入党。迨至区分部选举之先。乃预约其徒辈选之为委员。有此事实的证明。可知本党试行选举制之初期。即发生为奸人利用选举之弊病。推其流弊之所至。他日选举一省之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亦何难再施其伎俩。以愚弄党人。党员等思之再三。以为本党即采用选举制。亦宜加以限制。拟请用复选举法。假如选举一省之执行委员。先由各县分部选出初选当选人。继以初选当选人之名单。送呈（孙中山批语：不能以彼往时反对吾人，则绝其向善之路。种种方法有不善者。自当随时改良。方期进步。吾党自革命以后，则日日退步。必有其故。则不图进步改良也）

总理审定之。以该名单中若干为候选人员。然后由众于候选员中选出一省之执行委员。其他如中央委员会之选举。及各部之选举。亦皆仿此办法。几经过一度之审查。而奸人乃无术施其运动。此党员等所以主张限制选举也。要之奸人谋毁吾党。其计甚毒。不可不防。党员等心所谓危。不得不揭发其诡计。密陈于

钧座之前。冒昧陈词。伏维

鉴察。恭颂

钧祺

吴荣新 印　陈占梅 印　曾克祺 印
赵士觐 印　林达存 印　林直勉 印
黄隆生 印　邓慕韩 印　邓泽如 印
黄心持　朱赤霓 印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甲）呈 总理文

敬肃者。职会本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一件。兹谨依照原文缮具一分。备函缴呈

钧座。请为

察阅。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本党幸甚。肃此。敬颂

钧祺。谨呈

总理孙

附呈原弹劾书一件

邓泽如
中央监察委员 张继 谨肃
谢持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乙）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

中央执行委员会公鉴。现查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团刊第七号。即扩大执行委员会特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刊行。）及其他印刷事实。经本委员会审查。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本党改组以来。首重纪律。今共产党社会青年团加入本党之诸党员。如上述认定其违反纪律之处。尤为严重。关系巨大。不敢忽视。特别举事实。加具拟见。提出

贵会。希即从速严重处分。俾本党根本不致动摇。不胜迫切企望之至。事实及意见条举于后。此致

中央执行委员会

事实

第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

甲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摘录

本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革命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大会提出本团尤须注意强烈的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实际的行动。（如示威及政治罢工等）原案第二节第一段摘录原册第九页第六行至第十行，原册每页十三行。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

（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

（2）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原案第二节之第二段全文

原册第九页第十一行至第十页第二行

乙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摘录

（此案系附录于决议案及宣言册中者）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原案第五节全文原册第六五页第九行至第十三行

按此节所述，与本党本无妨害，特录之备考。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原案第六节全文原册第六六页第一行至第四行。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

（一）在政治宣传上的。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在青年团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原案第七节原册第六六页第五行至十一行。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的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而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原案第八节摘录原册第六六页第十二、十三两行又第三行至第八行。

第二　团刊（第七号即扩大执行委员会特号）

附注　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开会期。系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同年四月一日止。共议决十六案第七号团刊系同年四月十一日发行

甲　北京报告决议案

我们加入国民党合作。要注意下层切实的工作。宜积力避免无益的竞争。我们于民党中高级机关位置之竞争。对内既使易发生不良之影响。对外又引起其他团体的反动。于不十分妨害本团活动范围之内应。采取容让的态度。而致全力于区分部或市党部等切实工作。原案第九条全文　关于国民党下面的各种团体。我们同志应注意联络其感情。非必要时。不宜取敌视态度。原案第十节摘录

乙　上海报告决议案

应注意学生运动。设法整顿上海学生联合会。此种工作。最好督促国民党青年部。要他们命令在校党员。向各校活动。改组学生联合会。原案第六节全文

丙　关于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本团为求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以督促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对于CP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此项之决议案。完全接受其指导。原案第一节全文

丁 （附CP议决案）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与工作详加讨论办法。以为我们的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收良好的效果。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原案第四节摘录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以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原案第七节全文 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原案第八节摘录

第三 其 他

（一）此次中俄交涉。凡由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之党员。不顾本党党义。无论在何地者。皆一致主张北京伪政府承认苏俄签字于王正廷加纳罕所议之中俄协定。（即承认北京为正式政府）

（二）崔文成所著“中国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一文。所说无产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可有下列几条好处。其第二条云。“无产阶级若参予国民革命运动。可以实际上感受到资产阶级革命之不彻底。猛勇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此种宣传。何能出诸本党党员之口。乃崔党员竟作此文。且硬要揭布于本党上海民国日报之附刊觉悟。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刊行，是不仅本党党员自毁本党。且欲以民国日报为共产党宣传机关矣。

（三）本年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李大钊在大会说明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的意志。并印布意见书。其中最扼要之语。“我党之加入本党。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员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查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是本年一月。（即一九二四年一月）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之发布。业数月矣。李大钊等知其决议。且遵行此册附录之中国共产党决议。而乃发此意见书。此欺蒙本党总理及全国代表。其不忠不德。险诈不信。真令人不可想象。扩大执行委员会议。是今年三月第七号。团刊发行。是今年四月。距李大钊在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意见书之期。亦数月矣。大会代表中有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者若干人。皆耳闻李大钊之演说。目睹李大钊之“意见书。”何为其扩大委员会议之决议又如此。合先后而观察之。其用心积汇。令人不寒而栗。

（四）新青年向导两刊物。对于本党之不满言论。不胜枚举。

意见

本委员之意见如下。

（一）本报告书之提出

（1）非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

（2）非反对或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之个人。

（3）完全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4）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纯系共产党在本党中之一种党团作用。即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秘密之议决如彼。李大钊发表之意见书如此。）

（二）本党

总理允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跨党。系为联络世界革命起见。然界限积明。观李大钊在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表之"意见书。"足见当时彼等之陈说于
总理者。亦确如此。在彼等之计。以为共产党之议决社会主义青年团之议决。皆属秘密的。今既为本党查得。谋诈毕露。与准其跨党之旨完全相反。欺蒙
总理。以求售其计划。可谓阴狠积〔极〕矣。

（三）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既全体加入本党。彼等时欲以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而强本党办理。即如中俄交涉主张北庭签字恢复邦交一事。彼等只知有第三国际共产党。何尝计及本党耶。虽跨党尤恐不免发生此类抵忤之问题。况固有党团作用乎。

（四）彼等既为本党党员。则无论在何种印刷物中。对于本党主义及本党政府军事政治之行动。均不应妄加指击或批评。向导新青年等刊。对于本党之议论。瑕瑜互见。尚可曰两刊物者。非本党之报。至觉悟固本党民国日报之附刊也。竟有"国民革命为资产阶级不彻底之革命"之宣传。此等宣传。实于本党不利。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本党根本。未有不摇动者矣。

（五）即退一步言。不课彼等以本党党员应具之义务与责任。而但言合作。此种行动。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

本委员会有上述意见。认为关系重大。非速求根本解决。不足以维持本党之存在及发展。故提出报告书。希贵会从速处分。是为公便。

附陈

彼等固有之党。既有"在发展本党组织时。对于彼党组织之发展不能停止"之决议。故社会主义青年团于粤湘鄂等区及北京上海安源。皆有组织。即就粤区而论。广州香港皆有机关。粤汉路及兵工厂青年工人补习学校皆有支部。东莞顺德香山新会亦有支部。（此系截至去年四月十一日之状况）此种办法若就党言。为彼党本分上应有之工作。然

（1）彼党党员固已全体加入本党。

（2）由彼党加入本党之党员。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重要职务者。实非少数。

（3）学生青年妇女工人农人各方面之活动进行。本党与彼党实立于同一之进行线上。

（4）本党进行。取公开。而彼党进行系秘密。

此四种关系。实属特别。而半年来。本党派出组织党务之专员。有共产籍者实占多

数。以跨党之人。同时办理两党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固于有之党。其结果可以想见。试举一例以明之，彼党“粤区议决案”有曰“广东农团特别发达。此种武装势力。不可忽视。应注意调查。相机活动。”

本党对此决议将如何。本党委任有共产党籍又有党团活动之党员。出而组织农团。其进行与结果又将如何。是诚不可忽视之事也。此关于党务进行上之影响颇巨。故附陈之。

邓泽如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张　继
谢　持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结果

本案经十三年七月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一）须有表示态度宣言。（二）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呈请

总理决定。并加说明如下。

以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凡入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旧斗。同时并请总理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办法。推定汪精卫邵元冲两委员担任起草宣言。

〔附〕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至五时半在广州东山鲍寓）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与俄人鲍罗廷谈话。孙科翻译。

监察委员曰。今日吾二人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与君说话。

鲍罗廷曰余以中国国民党训练员资格与君等说话。

监曰。君见过此等小册子乎。（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及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团刊第七号而言。）

鲍曰。未见。

监曰。君知此次发生问题之真相乎。

鲍曰。只在上海闻陈独秀君云党内发生问题。昨日胡汉民汪精卫二君来。亦提起党内问题。

监曰。即是一个问题。

鲍曰。指“非必要时不宜取敌视态度”之谓乎。（团刊中语）

监曰。非尽如是。乃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党团问题。

鲍曰。此问题须由根本上解决。勿论及枝叶。

监曰。诚然。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自己作主。须受第三国际指挥。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造。又须受苏俄指挥。然则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否只求友国民党。抑同时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乎。

鲍曰。余先述国民党之真相。再提此问题。遂列举金佛郎问题。德债问题。中俄协定问题。吴佩孚捕杀工人问题。皆关系极大者。不见国民党有何等主张。中央执行委员。已开会数十次。不见议事日程有关于国民大问题之讨议。……

监曰。请君不必历数此等缺点。本党确不能免。或尚可加举数十条。今春改组。全由于此。今既改组。先须解决组织上之大问题。本体上既发生问题。作用如何。可暂不提。组织上最重要问题。是否承认党中有党。即指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而言。

鲍曰。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

监曰。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在党内作党团活动。认为合理乎。

鲍曰。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鲍又曰。小册子何时发刊。

监曰。一为去年八月。一为今年四月。

鲍曰。不错。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监曰。依吾辈见解。君所用方法。欲令国民党复活者。实足以使国民党死亡耳。使多数小团体在同一范围内相倾轧相竞争。乃致死之道也。

鲍曰。诚然。成可致国民党死命。惟不希望如是结果。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监张曰。余个人素来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同从事革命。此次问题发生。仍主张友谊解决。今闻君之言论。则不能不变更主义。国民党是一腐败革命党。余亦不能全否认。假如君所说共产党是新生革命团体。如斯则两种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腐败者团结起来。加以改良。新生者一往直前。两无阻碍。分作两起。岂不更佳。

鲍曰。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令者。则认为违反命令。

监曰。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否全体加入本党。抑则加一部分。

鲍曰。不知。按原则说。应该全体加入。

鲍又曰。假令将共产党分出去。共产党或者更换党名。而主义仍与国民党同。徒分离革命实力也。前途必不利。

监曰。吾辈亦非绝对主张分离者。惟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耳。

鲍曰。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监曰。此为一重要问题。正愿与君明言。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提携。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结果。如只有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

鲍曰。中国共产党历史甚短。在中国社会无十分势力。假使只有一个共产党人。为国民党计。亦当招之来。不可挥之去。

监曰。中国共产党。原无足轻重。因其不过第三国际之差遣。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俄国认中国共产党为俄国之子。中国国民党或可为俄国之友。尚不可知。余之观察如是。

鲍曰。误解。然吾知国民党人许多反对与俄国共产党合作。

监曰。社会主义青年团决议案及团刊第七号所登载关于国民党者。君是否认为正当。

鲍曰。此两种印刷。未经莫斯科本部审查认可。尚不能承认。

监曰。如君所说。国民党已成待毙之人。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一复活剂。将打注射针而救济乎。

鲍曰。事相类而话不能如此说。我们合作。我们合作。

监曰。国民党腐败分子。仅而退步的而已。并未表明反对民党宗旨。亦未组织团体与本党相抗衡。即使有一时的组织。亦不过一时之作用而已。并未将国民党作一对相的研究物。照此两种印刷物观之。共产党持永久之计划，将国民党作一对相。日日以如何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国民党不能不认共产党团为本党本体上之大问题。

鲍曰。无妨。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

监曰。国民党与共产党只能说是两党。不能说是两派。君如认之为合理。吾不料所谓组织者。竟如斯。直欺人之谭〔谈〕耳。

鲍曰。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假使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吾亦不赞成。只有提皮包离广州。

监曰。诚如君所言。反面说。在中国行共产主义。尚须待至一百年之后。共产党全体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耶。

鲍曰。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又未能对全国最有关系之问题。时时有所主张。共产党不能取销自己的组织。

鲍又曰。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的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不希望如此作。

监曰。今日谈话只如是。改日再接续讨论。

〔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

（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

吾党自提倡革命运动以来，内审本国之国情，外按世界之趋势，几经斟酌，始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根据。三民主义之革命，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途径，而最适合于中国之国情及环境。奋斗既久，信守弥笃。惟以向者组织未善，运用之际，效力遂减。本年全国代表大会，即根据吾党固有之三民主义，而改善其组织运用之方法，俾

革命事业，得以早成。同时又以中国现在大多数人民，皆陷于压迫痛苦之中，则革命之基础，自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故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态度本极明显。惟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而发生隔阂。社会群众之莫明真相者，更觉无所适从，减少其对革命运动之同情及赞助。此种情状，若不亟事矫正及补救，恐直接影响于党务之进行者，间接亦影响全民革命之发展，关系实至深且巨。中央执行委员会，负有指导党务及解释党义之责任，兹为解免党内外之误会及隔阂起见，不能不再为郑重之声明：即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同时又为谋慎重的及周密的解决起见，特呈请 总理于短时期内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以期讨论周详，妥筹解决。仍望我诸同志在此时期中继续努力，本革命之精神，为主义而奋斗，屏除疑惑，奋励进行，以静待全体委员会议之解决，俾革命工作不致中断，此则本委员会同人殷殷相企者也。特此宣言。

〔附〕与共产党奋斗和北上侍疾

邹　鲁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改组党务，结果产生了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奉总理之命，兼任青年部长，后来又兼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当改组时，我曾请教总理，说："苏联之法，我国古有行之者"。总理说："对的，洪杨时曾行之"。我知道总理还没有明白我的意义，便立刻申说："非言主义，乃言组织。盖商鞅治秦，其法之密，与苏联等。以商鞅己身聪明，亦不能逃，至叹作法自毙；其重法不重情，于此可见。沿是非不并吞六国，但一夫揭竿，天下瓦解，不旋踵而亡。较之姬周向礼重情者，东周虽弱，犹赖诸侯尊土，延数百年之祚，究何以得其利，而无其弊乎？"总理说："吾党之情感至重，同盟会以前之党员，亲如骨肉，勿论矣；即至现在党员数十万，散处国内外，仍能精神脉脉相通，共向革命，完全在情感。今日改组，应保持本党原来之情感，采取苏联之组织，则得其益而无其弊，直可驾苏联而上之"。这可见总理对于改组的立场。

改组时期中，本党有一极重大的创设，就是成立了黄埔军官学校，由总理任蒋先生为校长，树立了党军的基础。以后肃清内部，统一全国，而至现在的抗战，都靠这力量为骨干。

稍后，总理以党、政、军务，须分开办理，所以先成立政治委员会，并规定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如下：（一）关于党事，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由事

前报告及事后请求追认；（二）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由总理办理。

还有，在改组其中，联俄容共实为一大问题。联俄是因为苏联承认中国革命，须要三民主义，同时表示废除不平等条约。容共是由于共产党分子，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愿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在本党指挥之下，共同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但是事实上却剑拔弩张，即以青年论，除其内部有组织外，复有新学生社多方引诱青年。当我就青年部部长后，对于青年该取什么态度，不能不有所决定。因此我请示总理，问明对于共产党，应持什么态度？总理说：“容共只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实行本党主义，断不能让他们在党内做不合于本党主义的活动。所以你办党和办教育，应该坚决保持本党的立场，如若共产党有法外的活动，当加以严防”。这时在青年界里，共产党组织了一个新学生社，非常活动。于是我秘密叫各校员生组织党团来对付它。广大方面，各院都有党团的组织，由我及教职员和各单位学生的代表，混合组织一执行委员会。当时执行委员除我外，有黄兆栋、梁明致、莫耀焜、刘克平、王绍祐、郑家鼎、吴荣榍诸同志，孙甄陶同志则为执委兼秘书；其余中坚分子，有苏鹗元、陆中骐、刘范、余日焜、毕磊、陈殿邦、余祖明、谭创基、李悦义、李秀然、彭展义、屈凤梧、黄炳坤、姚锐、张农、姚宝猷、杜哲全、陈东荣、邓瀚藻、张祖培、谢申、许庆之、罗叔明、黎钟等同志。此外另有女员生的组织，其中坚分子为刘衡静、钟婉如、陈逸云等；钟婉如复主持女权运动会，以抵抗共产党。学生私人方面，更有民权社、民社等，与新学生社对抗。民权社的中坚分子为赖特才、莫耀焜、阮绍元、陆宗骐、苏鹗元、张农、王绍祐、林翠芳、邝家鼎、刘克平、陈殿邦等同志；民社的中坚分子为孙甄陶、黎钟、吴荣榍、邓瀚藻、黄佩伦、陈东荣、杜哲全、谭创基、黄振家、林应连、岑麒祥、谢申、梁应能、彭展义、余日焜、黄炳坤、李秀然、邹晃曦、李震、罗叔明、张祖培、许庆之、胡文、胡文耀等同志。而民社的组织，不纯粹学生，所以还时时到农工方面去工作。同时我不断地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他们的情形。所以共产党的一切情形，我都很明了，因此共产党在广东大学及其他青年界，都没有方法酝酿重大的事情。

但是共产党加入本党之后，却假借本党名义，扩展该党的势力；所有行动和言论，都违反他们最初的诺言。组织部是党中最重要的机关，由共产党的谭某主持。本党一切的组织章程，由他拟订；各地组织方面的人员，由他委派。而各地党务的筹备员，有共产党的就派，没有共产党的竟不派；并且派出去的人员，只收容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弄得本党的忠实党员，都不愿登记，普通人入党的，更被拒绝。这种事情，各地常常发生。中央党部得到这个消息，曾由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中，迭次提出。因为这事属于组织部的职权范围，当然交组织部查办，但组织部概以“搁”字了之。共产党人数不多，各地可派的人，事实上很少，所以各地能够成立党部的，为数寥寥。即以广东而论，党员的众多，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自十三年改组到十四年五月底，当第三次全体执行委员会开会时，仍不能成立五个县党部，以组织省党部。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便设立讲习所、宣传所等等，以造成他的爪牙。

在工人部方面，部长是廖仲恺先生，而他的秘书是共产党的冯菊坡。当时廖先生身兼十三职衔，因为容共的关系，他总想得到共产党的同情，所以一切部务，都由他的秘书主持。操纵情形，千奇百怪。那时各部都设在中央党部之内，工人部竟在门口，贴了一张

“非工人部中人，不准入内”的字条。跋中情形，可见一班。

农民部部长初为共产党党员林祖涵，继为彭素民同志，而他的秘书彭湃，则为共产党党员。一切部务，都被彭湃所把持。彭素民同志逝世后，黄居素同志继任。彭湃公然说：“若非就我范围，则不能居此部长职”。因此黄同志请免彭湃职，但结果黄去而彭留。后来廖先生兼农民部部长职，彭湃更把持一切。该部欲立农民讲习所，突然提出党部，通过招生，数日后即举行考试，阅卷时只看卷面名字，凡非共产党的人，悉予弃置。

妇女部初设时，部长为廖冰筠先生，秘书为唐允恭先生，均系本党党员。部长为何香凝先生，共产党遂有渗入，其时提出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口号，风狂一时，后乃自取消。当时有女权运动会，始终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活动大生阻力。

宣传部部长戴传贤先生，以后继任的都是本党人，可说共产党没有把持的可能。

海外部部长林先生，当时鲍罗廷蔑视华侨说他们是亡命之流，国家不应予以保护，便不注意该部，因此未被设法夺取。故除法国日本外，其余各海外总支部，支部等，尚能按步进行。

在这种情况之下，戴传贤先生到上海之后，即遄返广州，向党部陈说共产党的活动，应极力防范；并且表示上海方面的同志，都有这种意思。本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邓泽如先生等，亦发觉“中国共产党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法，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妨害”，（注一）曾列举证据，提出弹劾案。总理宽大为怀，仍希望该党觉悟，所以未加深究。

十三年六月，北京直系军阀曹琨逼走黎元洪，勾结议员王家襄、吴景濂等，贿选为大总统。总理一面通电致讨，一面计划北伐。当总理北伐驻韶时，吴敬恒先生适到广州，见我说：“关于陈炯明的事情，总要设法补救，总理北伐，不能无后顾之忧。我们最好到韶关去，面请总理恕陈炯明已往之罪”。我表示同意，即与同往，在韶关车站总理驻节之所，谒见总理。吴先生申述来意后，总理非常愤怒，并且说：“陈炯明叛变，要杀我，人人可恕，陈炯明不可恕”。吴先生立刻向总理跪下，对总理说：“这事关系北伐前途很大，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总理一面拉他起来，一面说道：“快快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吴先生见总理这样宽大，非常高兴，就立起来。那知吴先生到汕尾叫陈炯明写悔过书，陈不允，以致自取败亡。由这事看来，可见总理胸怀之宽大，与吴先生之高义。

自本党联俄容共后，苏联政府屡向本党表示，不欲承认北京政府。但这时苏联大使馆，竟在北京成立。总理为明了当时北京政府内外勾结的真情起见，想用接洽苏联退还的庚子赔款以补助教育经费的名义，派我到北京去调查。适总理准备北伐，觉得我到北京去，恐怕不妥。于是我就建议在我没有到北京以前，派易培基代理我这个职务；因为那时他是我派在北京做广大代表的；这样可避免北京政府的注意。后来段氏组织政府，觅本党的人参加；因为他有这种任务，便做了教育总长。

到了冬天，曹锟被北方国民军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推倒；奉军张作霖亦已入关；段祺瑞随着局势的改变而再起。冯先生回来服膺总理，胡、孙两位系本党党员，段氏这时和本党常有联络。他们都电请总理北上，主持大计，而北方党员，更催促至再。总理

乃应邀离粤北上，临行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那知段氏于总理北上途中，竟宣告就任执政，首先通知各国，尊重历年所订条约，并开善后会议，和总理的主张完全相反，总理到了天津，听到这个消息，甚至愤忿，声色俱厉地对段氏派来迎接的代表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偏要尊重那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何必来欢迎我呢！"兼以旅途劳顿，身体就感不适，肝病爆发。广东中央及政府同志得电后，派我北上侍疾。总理复由津入京，在协和医院治疗。后来病势日重，移住于铁狮子胡同行辕，我们天天随侍左右。不料总理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溘然长逝。党国失了领导，全党同志及全体同胞都同声痛悼。

当总理病重的时候，为防万一起见，早草拟好了遗嘱，由汪兆铭读给总理听。读毕，总理点点头说："好。但是你们不怕敌人软化吗？"当时我们听了，有些莫明其妙，由今看来，知道总理已经看穿汪兆铭要被敌人软化了。遗嘱预备好后，一方面因为孙夫人的悲痛，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断的希望，总不忍使总理签字。总理病室之外，系一大厅，这是我们侍病的人日夜轮流倍伴的地方。到了三月十一日，孙夫人告知总理要签遗嘱。那时我们一班人，立于室门，由孙夫人托着总理的手签字；签好后，吴敬恒、戴传贤、邵元冲、宋子文、孔祥熙、孙科、戴恩赛等先生和我随即署名证明。当我签证明的时候，心里的惨痛，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同时我感觉到以后责任的重大，应该怎样努力，才不负总理的重托。我想所有证明的人，都有同样的情绪。

总理遗体，先在协和医院用法保存，再行入殓。十九日，由亲近同志二十四人，分为三组，举柩至中央公园；我亦其中之一。这时我体会到已往总理所负的一切重荷，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当继续努力，不断奋斗，造成总理所欲实现的中华民国，以慰总理在天之灵。二十日后，分日在中央公园祭奠，瞻仰遗容者，日逾十万人。至四月二日，移灵于西山碧云寺。

移灵碧云寺后，苏联大使加拉罕请我们在北京的中委和党里的重要分子，在苏联大使馆会谈。在座的除主人外，本党有吴敬恒、戴传贤、于右任等先生和我，俄人鲍罗廷，共产党的李大钊和于树德，以及所谓库伦政府的外交部长、政府委员等等，共有十余人。坐定后，加拉罕就立起来致词，并介绍我们和所谓库伦政府某某部长等相见。当时我就发生了一个很不快的感想：为什么加拉罕这样荒唐，把我们〔和〕所谓库伦政府的人员相等对待？介绍完毕，他便提出他的主张，说道："苏联很希望我们中央及政府能够承认库伦政府。"我们公推一位起来答复他，只表示感谢他招待的盛意，却没有提到承认的事，这样含糊敷衍了一番。在谈话之中，加拉罕和所谓库伦政府的外交部长，又再三声明，并且说什么请中央及政府承认所谓库伦政府，完全是根据总理的民族自决主义。我忍无可忍，便立起来驳他，说："总理确有民族自决主义，不过跟着有一句话，民族自决是造成中华民族。总理民族主义的意义，固然不是大家来分割中华民国，更不是民族自决之后，把中华民国的土地，并入他国的版图"。我讲话的时候，加拉罕和鲍罗廷恨恨地看着我。我心中默想：苏联这种政策的表示，所谓帮助我们国民党的用意，恐怕不是单纯的。从此我更怀疑苏联和共产党了。

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议决将遗嘱原件，由我带回广州，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保存。动身之前，为商量退回庚子赔款以补助我国教育的事情，曾赴法

国公使馆约会一次。想不到这种约会，后来竟有人诬为勾结帝国主义。

我到了广州，续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接受总理的遗嘱。我郑重地把遗嘱交给大会保存；于是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

当我在北京侍疾的时候，蒋先生率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及粤军，东征陈炯明。捷报频传，总理虽在病中，却非常欢喜。东征结束后，因为滇桂军往往不听命令，后来复有勾结军阀的情形，蒋先生即回师讨伐。我回到广州的时候，军事情形，已相当紧张。滇桂军是由我为了讨陈而策动他们来粤的。我总希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尤其对于桂军刘震寰，因为在秘密时期里就是同事，后来也屡次为党建功，更有意救他，但力与愿违，到了不得不解决滇桂军时，我便前往香港。因为我不愿亲见招来讨贼的部队，自趋于复亡的末路。

总理逝世后，共产党更为猖獗。所有共产党把持操纵、越规、违法和压迫的行为，不论是党务、工人或农民方面的，都向常务委员会告发。当时三位常务委员，一位是谭某，他原来是共产党；一位是廖仲凯先生，虽然不大过问会务，但是有些袒共；另外的就是我了。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我的痛苦，不言可知。在党务方面，凡各地已派筹备员的，共产党对于非共产党的人入党，不发党证，使入党者在正式党部选举时，不得选举权；通告选举期，"对于非共产党的党员，故意迟发，以致收到时则选举期已过，使他们无从行使选举权。选举结果，如若共产党获胜，就是因违法而诉诸组织部，组织部仍断为合法；如若共产党失败，必借事捣乱，就是合法，组织部亦断为违法。甚至于不惜加以'反动''反革命'的罪名，以相陷害。入其者，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不免杀戮。这种跋扈情形，笔难殚述。为保全本党起见，于是我们策动各处党部，积极和共产党奋斗；最热烈的国内有武汉、北京、南京等处，海外则有法国和日本。

工人方面，共产党挂了有名无实的全国总工会招牌，以吸收同情共产党的工会，压迫反对共产党的工会。共产党操纵工会的方法，就是对于共产党的工会，则直接用共产党训练指导之；非共产党的工会，则用工人部追挟之；至于用了这种方法不归顺或不受利用的，则另立同业工会以破坏之。看见这种情形，我就秘密运用各种工会来对付共产党。当时所有正式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其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机械工会。结果大家奋斗得非常厉害；所以那时广州的工会，无日无事，非格斗，即残杀。而我们卒能保持精神，不被消灭，是经无数的牺牲，才有这种的成绩。

农民部设有农民协会及农团军，尤为共产党所包办。这些组织里专收土豪、土匪以扩展其力量。凡是加入农民协会和农团军的人，不但以前的罪恶悉免，以后也可无所不为。广东各地素有民团，实为自卫的团体。平日捕匪，既有匪所疾视；而共产党更不欲地方有自卫的团体，以妨碍农民协会的工作。于是就与各地民团为难。我便秘密协助各地民团，和共产党努力奋斗。但是共产党把持政府，总是帮助农民协会和农团军，来压迫民团。宁四会，因农民协会被民团所败，鲍罗廷竟使政府于滇、湘、桂、粤、豫各军中，各抽调一团，加以大元帅府的铁甲车以会剿之，其气焰可知。

至于青年方面，因为青年部部长是我，最高学府的广大校长是我，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是以前和我在一起办事的萧冠英同志，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是我的族弟邹卓然，而所谓广州中等以上七校的校长，除女子师范外，都和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极力防范共产党诱惑青年，他们都同样小心注意，广州如此，各地亦如此。当时广州方面，三日一游

行，二日一开会，都要学生参加，想来摇动学生，但终无效。所以共产党分子向该党的秘密报告中，曾有“组织完全成功，工农大半成功，学生成绩甚少”的话，可以证明。因为以上种种，共产党便视我为眼中钉了。

当时第三国际派来广东主持共产党的是鲍罗廷。他又是政治会议的顾问。他托庇于联俄容共的政策之下，又有党内共产分子的撑持，更联络汪兆铭等，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而本党同志因总理逝世不久，为顾全党的团结，都抱着宽大的态度，他便利用这种良机，赖政治会议以操纵中央的党、政、军。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便有组织国民政府的决议。总理逝世后，同志以党国失了重心，尤不得不组织国民政府，进行革命。鲍罗廷就把成立国民政府这件大事，拿到政治会议来，以便操纵。所以国民政府组织法及国民政府人选，均由政治会议先决定，再呈常务执行委员会补行通过手续，当政治会议通过了组织法，并由常务执行委员会加以追认，政治会议就根据组织法，选举国民政府主席。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于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诵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这样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满面通红，当晚伍先生把详情告诉我，我对于汪本来相当敬重，因为他一贯地主张不做官，不做议员，自命清高，但由此次选举看来，完全表现他是个热心利禄的人，言行绝对相违。我从此就鄙薄汪兆铭了。

七月一日，照例我天亮起来，看书阅报，见广州民国日报登载了国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开首说明这是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我看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是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且是常务委员，每天下午都在委员会办公厅，直到六时才离开，在会中并没有见到这个议案；怎样会有这个决议？并且还在本党党报上发表？正在诧异的时候，忽然听到很重的脚步声，直冲上楼，到了我的房里。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林先生，我请他坐下，并且问他有什么事，要这样早赶来？他没有答复，就坐了下来。我再问他，他才气愤愤地说：“你们常务委员，为什么不把我们普通的执行委员放在眼里？”我惶恐地说：“我向来对先生是很尊重的，决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先生为什么说这种话呢？”他说：“国民政府成立，为什么我们执行委员都不知道，就已经发表了？”我说：“我也莫明其妙。因为昨天下午六时我才离开党部，并没有见到议决成立国民政府的一个字，正怀疑党报里为什么发表这个消息。你来得很好，今天刚是常会，我们一起吃完早餐，就去开会，问明这个决议究竟是怎样来的”。他很惊奇地说：“你们常务委员也不晓得吗？”于是我们吃完早饭同去开会，那时我拿了报纸，起来责问：“今天民国日报公布国民政府成立，说是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究竟这个决议是那里来的，大家晓得不晓得？”汪兆铭立起来答复：“这是政治会议议决的”。同时他声明：“政治会议议决的紧急事件，是可以先发表的”。我立即驳他：“虽然政治会议，对于紧急事件决议后，可以先发表；但是国民政府的成立，是重大的，不是紧急的，如果这种重大的事件，可以由政治会议议决，立即发表，那末是抹煞中央党部了”。汪兆铭急切地问我：“是不是你想推翻这个案子？”我说：“国民政府的成立，既经全国代表大会议决，近来又决定组织，我绝对没推翻的意思；但是这种违法行为，我是不能不问明责任的”。汪就说：“既然这样，今天就请大家

追认通过”。我说："追认通过是一件事，以后不许再有这种事发生，是另一件事"。汪说："你已经提出注意，以后再不会有这种情形了"。我说："那末很好，请秘书把上面所说的话，详细载在议事录上以作定案"。于是就追认通过了这个案子。散会后，邓泽如先生起草了一个正式的弹劾案，政治委员会的委员，连名请他们撤回。邓先生说："我只能提出弹劾案，却不能撤回弹劾案。假使为顾全大局起见，那末可以由中央党部备一封公函给我，把弹劾案附在里面，借此亦可作为存案"。这样，这桩事件总算了结。但是汪兆铭由此对我怀恨，鲍罗廷尤甚。

从那时起，鲍罗廷对我的态度，更是顷刻难安；而我对于鲍罗廷的轨外行为，也绝对不轻松放过。这样愈争愈厉害，于是共产党遂决定要推翻我。这至少给与他们两个明显的好处：第一，减少鲍罗廷操纵工农及党政的一切阻力，第二，可以补救"学生成绩甚少"的缺陷。

这时共产党党员常常在书报上发表文字，攻击广东大学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又说："广东大学不革命"。用意是想假借这种罪名，来强迫我自动离开广州。我一向的主张，就是功成身退，决不和他人争地位。但是为着党为着主义则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所以我对于这种攻击，毫不气馁：反乘机加以驳斥，揭破他们的假面具。对于这事我说：

"第一责备广大不能培养革命人才。大学要培植甚么人才？我今以革命党资格来说，确为要养成建设的革命人才。如若不然，那么只办"宣传所"便够了；何必要设这许多学科的大学呢？若说："不能充满紧张革命之空气，"我敢断言，"广东大学确没有充满紧张共产主义的革命之空气；但中山主义的革命之空气，确是充满紧张了"。何以见呢？广东各处的革命运动，没有一处没有广大的学生在内，想谁也不能否认。最近各地惨案发生，广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尤为激烈；除在省参加各团体筹款演讲及种种运动外，还有百余队到各县各乡，巡回演讲，民国日报，曾经有过详细的记载。难道这种种充满革命的空气，攻击者竟忘了吗？并且去年，党部定广大教育方针，取"感化主义"；以取"感化主义之成绩能够如此，我以为可告无罪了。……若说："所养成之人才，不能供党及政府的需要。"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广大所养成的中山主义的人才，完全被排斥不用。观于去年与今年毕业的学生，送至政府几无一用，岂非证明？若说非党员，则大多数是党员；若说不明党义，则随时随地有广大学生拿着三民主义号召。难道三个月养成的甚么讲习员，尽数用完，便是真党员，真明主义吗？不过是"共产"与"非共产"的分别罢了。若说："不能肩此发扬光大孙先生主义之责。"试问现在广东方面，日日宣传，日日图谋实现孙先生主义者，是不是广大学生？若别立机关，到俄国以培养人才，则共产党别有用意，与广大肩起发扬光大孙先生主义无关。恐怕广大愈肩起发扬光大孙先生主义的责任，共产党愈要别立机关及到俄国培养人才呢？"

他们无词以答，于是想从取消学校经费的独立，来为难我。可是广东大学的经费的独立，系总理所规定；而本党政策，也有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的条例。想取消广东大学教育经费的独立，却是一桩不容易的事。鲍罗廷乃亲自出马，向政治委员会建议，说："教育经费之独立，比较军队盘据财政，为害尤烈。"政治委员会承其意志，就以统一财政的名义，来接收广东大学的财源。我立刻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统一财政与教育经费独立的解释，结果全案通过，交政治委员会复议。政治委员会受鲍罗廷的指使，复议文中第一句就

说："国民政府之成立，即教育经费独立之保障。"我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书面答复，切实驳斥一番。其中我说：

"若云'教育机关直接征收财政收入，破坏财政统一，决不可行'则尤属过虑。夫'财政统一'，政府应办之普遍事件也。'教育经费独立'"，本党政策之特别规定也。从法律通义言之，特别优于普遍法，则"教育经费独立"之特别规定，其效力固强于"财政统一"之普通事件，自无待言。而独立界说，则非直接收入，无以完成。总理在日，于教育经费之独立，许组织管理中上七校经费委员会，并许国立广东大学，依拨定之财源收入。命令积寸，对于教育经费独立，事实上之解释，意志明了。何至云"直接征收财政收入，"即"破坏财政统一？"欧美各国财政未尝不统一也，而教育机关直接征收基金收入，并未有为破坏财政统一者。况无论财政统一至如何地步，终亦有事实须例外者。各国之有特别会计，固无论已；即以广东而论，房捐警费，固未尝不许警厅之特别收入也。若谓总理在时之直接收入，不限于教育机关；今若仍许教育机关直接收入，恐人援以为例，将至财政不能统一，是大不然。盖总理在时所许之教育机关直接征收，系本于教育经费独立之政策，与军队之占收截留，破坏财政统一者不同。甚而至于总理所许之独立教育经费，亦为人所截收；故讨杨、刘时，四处号召，皆有"增高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独立"之标语。方冀肘腋之患既平，教育经费已独立者，保其现状；未独立者，益得独立。何图国民政府成立之第一声，即将粗具雏形之教育经费独立，存名去实？纵国民政府能为教育经费之保障，其如全国未尽如国民政府旗帜下何？其又何以树厥风声，为教育前途畅展生机乎？是则不能不望政治委员会，加以慎审之考虑也。"

最后我建议办法二则：

"（一）将原来拨定之教育经费财源，悉照原案，拨为各该学校教育基金，一切由各该学校管理之。（二）原来拨定之教育经费财源，仍拨归各该学校。各财源之定案，归财政机关；各财源之征收，归教育机关。

在我看来，以上办法的第二项，总要算是委曲求全的了。我素来希望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以内，不和任何人发生争执；可是于理于法说不过的，却不愿缄默。这意见书提出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再交政治委员会去议，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看见这个驳文，语气这样强硬，这还了得，立即提出三个理由，要撤换我的广大校长。

他的理由，第一是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曾赴法国公使馆的约会，这是和帝国主义勾结。第二，刘（震寰）杨（希闵）之役，我主张调停，这是和军阀勾结。第三，反对这次政治委员会教育经费独立的解释，这是反对政府。这些理由，谁都知道不成立。我在北京时赴法国公使馆的约会，完全为了商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怎样来补救我国的教育，非与帝国主义勾结，不辩自明。刘杨曾效忠是本党；而我所主持的讨陈之役，他们尤其出力。总理待人，宽大为怀；这次我出来设法调停，亦不应视为另有用意。这个勾结军阀的诽谤，不攻自破，至于教育经费独立的意见书，中央执行委员会曾经通过；反而说我反对政府，岂非奇论？因此，政治委员会不敢照办。鲍罗廷就愤怒万分，以去就力争。由下午三时相持到晚上十时，汪兆铭复鲍，于是不得不采折中办法，就决定由政治委会员用书面向我严重警告。

当时我不明了汪为什么袒护鲍罗廷的缘故，后来张学良在北京搜检苏联大使馆的时

候，在文件中发现一个鲍罗廷的报告，其中说："汪兆铭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共产党因此利用汪以除异己，来扩展势力；而汪则借共产党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鲍胶漆相投了。

翌晨，汪亲自来向我解释，说："昨晚的事，因鲍罗廷力争，不得不这样决定，实在对你不起。"同时他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不要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冲突；第二、我驳复政治委员会的意见书，不要向外发表。

我答复他道："第一、我先要问政治委员会所议的事，最高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能否再议？第二、我驳复政治委员会的意见书，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那末这篇文字的责任，已由中央委员会负了。这样，政治委员会对我的警告，其实不是警告我，而是警告中央执行委员会。试问政治委员会是否有这种权限？第三、须知鲍罗廷必欲去我，乃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的政治问题，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试问本党今日，是否非共产党的派的就要离开？请你想想！第四、关于教育经费独立，是总理的意思，本党政策也有明文规定，我不必多说，至于我个人问题和那篇驳复的文字发表与否的问题，都是次要 。"同对我还声明："教育经费独立是本党政策所规定，也是全国及广东教育大会的议决案。我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且为大学校长，若不力争，实无以对天下后世。现在因力争而受警告，我心甚安。天下事有受功而心不安，有受罪而心泰然者，即此便是。"

不久，廖仲恺先生被刺案发生，中央派蒋先生许崇智先生和汪兆铭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来查办这件事。鲍罗廷认为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实同志的绝好机会。廖先生被刺的第二天，他开了一张名单，叫特别委员会拿办我和胡汉民、邓泽如、谢持诸先生。事前有一次，我和邓泽如先生在胡汉民省长公署谈话，我说："我看历史，苏联对于皇党，可以放松，但对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绝对不肯放松。恐怕现在共产党对于我们也要同样处置。"这天邓泽如先生对我说："你以前所说的话，现在都成为事实了。"特别委员会看了这个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样拿办。"他竟说："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幸蒋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我和胡、邓、谢诸先生才能够免膏虎口。

鲍罗廷最初利用造谣中伤的阴谋，想加我以不革命反革命的罪名使我自动离开广大，继则利用间接使我为难的诡计，取消广大独立的经费，迫我无法继续维持；三则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想撤换我的广大校长，使我不得不离开广州；最后他老羞成怒，一不作二不休，想出了斩草除根的毒计，利用廖案加我以莫须有的罪名，使我根本无法活动。但是结果一件都没有成功，鲍氏内心怎样懊丧，不难想象。当时我一个人在中央党部竭力和共产党奋斗，实际上就是和第三国际奋斗，而汪兆铭辈更左袒共产党来压迫我，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了。

然而鲍氏对我，直同芒刺在背，一天不把我排挤出去，便一天不停止想对付我的办法。适逢五卅惨案之后，继有汉口，广州等地惨案的发生，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十分热烈。鲍氏便示意中央，指派我和林先生为北上宣传代表，率领一班农、工、商、学各界的代表，北上宣传。我接到这个命令，知道就鲍罗廷借刀杀人。他自己想做曹操，把我当做祢衡，叫北京政府做黄祖。但是我想鲍罗廷虽然有意把我当做祢衡，我何妨借这个机会，做一做带三十六个人入西域的班超呢。于是我毅然就和林先生率领着各界代表三十余

人北上。

在广州出发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为沪汉广州各惨案对世界民众的宣言（注二），用英、法、德文译出，以国立广东大学校长的名义，对世界各国说明惨案的发生，实根源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而为维持世界永久和平与谋民族间亲挚的交谊计，应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条约。我说：

"吾人为消除帝国主义之毒害，巩固世界国际之交谊，而使此等不幸事件不至再见，则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实现，认为非常迫切而需要。盖就此次各地惨案而言，倘使不有上海、汉口、沙面等租界，倘使外国兵士无在中国境内自由屯驻与行动之权能，则此等惨案将无由发生。是以此等惨案之成立，其近因虽起于工人之罢工与学生同情之援助，而祸患之根源，实在于种种不平等条约也。此等不平等条约，远者订于七八十年前之满清时代，近者亦订于民国罪人袁世凯执政之际，其非出自国民真意，至为明显。以至今日中国与世界情势之回异，此等条约，其不能自然顺利发生效力，盖已无疑。吾人深恐留此种邦交之障碍物，贻国际以未来之纠纷；故为维持世界之永久和平与民族间亲挚之友谊起见，最后谨以最坚决之态度主张，将此种种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之，而与各国重新订立双方平等互尊主权条约"。

到了上海，会到一部分同志，如戴传贤、谢持、叶楚伧、邵元冲先生等。他们对于共产党的阴谋和伎俩，都很清楚。大家商定后，先由谢持先生乘津浦车至北京，准备一切；而我和林先生则溯长江，由汉口至北京，以便联络各地同志。于是我和林先生带着三十几个代表，浩浩荡荡，到南京，到九江，到汉口，然后乘京汉铁路人北京。一路民众热烈开会欢迎我们。我们就随处领导他们，展开反帝运动；更用宣传的力量，使这种民众运动和本党的革命运动，衔接起来。因此本党主义，更深入长江黄河流域学生和民众的心里。

在北京，情形也是相同；尤其是北京国立八校在欧美同学会欢迎我和林先生的会，使我有更深的印象。参加这会的北方重要教授有李石曾、顾孟、王世杰、谭熙鸿、周生、王星拱、徐炳昶先生等。除讨论北京国立各校和广东大学如何切实联系外，还到南北教育互通声气的一般问题。并对于我中央，表示同情。再向来沉息的教育界中，骤现曙光，是全国思想一大转变的枢机。

（注一）引弹劾案中语。

（注二）为沪汉广州各惨案对世界民众宣言："吾国自被帝国主义迫签不平等条约后，饱受政治经济之侵略，迄今已历八十余年。吾民族以素具爱和平之特性，始终持退让容忍之态度。岂意吾人容忍之量愈宽大，而帝国主义之压力乃愈加重。本年五月以来，竟有英、法、日人惨杀华人之事接踵而至。彼惨杀之主动者，方且以'排外'相诬，意在挑拨国际间感，以饰其罪恶，且延续其凶残之行为，而吾华人之生命，乃无时不陷于恐怖之中，吾人为使世界民众确切了解此类事实之真相，与我国民众真实之意志起见，谨将五月以来英、法、日帝国主义者惨杀华人之事实，与吾人予防此后发生相同惨案之建议宣布于世界民众之前。

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忽发生英巡捕惨杀华人之惨案，在未发生此案之前，日商

在沪设立之纱厂，因工人不堪虐待而罢工，其管理员于五月十五日枪杀华工一名，伤者十余名，上海学生出外演说募捐援助工人，被捕房捕去十余人；同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在六月二日实行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与交易所注册等苛例，是皆有害于上海华人之出版及营业自由者。故上海全体学生定于五月三十日在租界游行演讲，意在引起西人士之同情，以援助罢业工人及被捕学生，同时并反对工部局新订之苛例，此本极文明之举动。而工部局竟因此捕去四十余人。未曾被捕之学生，齐至工部局请其释放。乃工部局不问情由，竟用武力驱逐。据英捕头爱拂生供状，群众离捕房六尺之时，彼以英语下警告令，警告令下十秒钟，即下令放枪，且射击要害。当时徒手群众死于英巡捕之排枪者四人，伤者数十人，其中重伤而死于医院者七人。然而英人之凶焰犹不口，自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五日，更遣巡捕及商团四出行凶，惨杀华人之事接连不断。数日之间为英人所枪毙者，有学生工人及商民，其数达四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而死者所受之枪伤，大都在其背部。此长时期间，英巡捕却未有一人受伤也。是则华人排外，抑英人故意欲置吾民众于死地耶？即六月六日驻沪法领事致京之电文，亦谓此次示威运动，完全因杀死——罢工工人而起，并无别种原因。可见英人强诬吾人"排外"，盖完全背于事实矣。

上海事件尚未解决，而汉口六月十一日之惨案继起。此案发生之原因，则由于十日英巡捕殴伤工人，致惹起罢工风潮。于是英领事立调海军陆战队登岸，并会同各国商团于华界毗连处均架机关枪，遮断交通。十一日下午学生与工人正在列队游行，经过英租界毗连地方之际，英巡捕上前制止，继即令陆战队以机关枪向群众扫射，当场击毙华人八名，伤者无数。夫手无寸铁之群众，以声援罢工之故，出于游行示威；此种举动，在文明各国，亦必不以武力制止。今英人对此群众竟任意枪杀，其凶残无人道，较之生番野蛮，殆有过之无不及也。

以如斯重大事件连续发生，英国驻华官吏，竟毫无悔祸之心。至六月二十三日，而更有广州沙基之绝大惨案。缘是日工、商、农、学、兵各界，哀沪、汉各地工人、学生，横被英、日人之惨杀，故集众开会，一致通过取消不平等条约之主张，更继以谨严有秩序之巡行。距行至外，居留地沙面对岸沙基马路之际，（沙面为一小岛，与沙基中隔一约七十至一百尺广之水道）。即被对岸英、法兵警以机关枪向游行群众及两旁站立之市民扫射，而泊于附近水面之法舰，复以大炮向群众轰击。当时死者六十余人，伤者百余，事起仓猝，后队之军官学生乃趋前救护；不然当时死伤人数，或不止此。事后英领事尚复狡词脱卸，谓我华人首先开枪。查是日巡秩序，首工人、农民、次商人，次各校男女学生，最后乃为军官学生。今英兵最先枪杀者为列队之徒手男女学生，而路旁站立之市民妇孺，亦皆有死伤者。设使军官学生首先开枪，而英、法、兵警还，则巡行群众方面之死伤，当仅限于军官学生。何以竟先及于前队徒手学生及市民耶？且当时以稠密之群众，过狭隘之街道，岂能与人用武？况隔水相望，势难飞越，而沙面桥头铁闸紧闭，本无闯入之虞，沿途且有警察多人，手持白旗维持秩序，更无可以惹人误会之处。乃事后调查，得悉英人于我民众巡行之前，已调到兵舰数艘泊于沙面附近，在沙面更重迭沙袋，架设枪炮，使非有意屠杀，何至准备如此之严。且其射杀巡行群众之枪弹，又为万国悬为厉禁含有溶展性之铅弹。此种弹贯穿肉体，入口数分，出口数寸，使重伤者立死，而轻伤者不治，其残暴无人道一至于此。以故旅粤之美、德、俄及他国人士，均有宣言反对此等残暴之行为，可见公理尚在

人心也。

上述沪、汉、广州之三地之惨案，为本年外人惨杀华人事项中之最重大者。此外若青岛、九江、安东等地，日本帝国主义者时势行凶，视华人生命若草芥，而任意摧残之，以致被枪伤致命而死者已有多人，是亦性质相同之惨案，特为较轻者耳。要之，自本年五月以来，此等惨案接踵而起，几遍于各地。吾人对此始终保持容忍态度，谨守文明秩序，未有暴动；在事实上已证明吾人本无“排外”之思想与行为矣。盖吾民族数千年来，涵濡于先哲和平礼让之思想；已养成宽容大度之国民性；故屡受横逆，仍不屑取狭隘的复仇手段。此时国内因惨杀案而引起运动，其主要目标仅为打倒帝国主义。所谓打倒帝国主义者，绝非排斥任何外国人，特反对帝国主义之行为而已。

总言之，在普遍方面，决意反对帝国主义之制度；在特殊方面，则分别认定上述惨案之负责者，而以相当的和平手段对付之；此则吾人最近对外之态度也。吾人根据事实，认定上海惨案负责者为英、日，汉口惨案为英国，而广东惨案则为英、法。故目前吾人所建议者，除要求英、日、法当事人负赔偿抚恤之责，及英、日、法政府予此等，祸首吏以严厉之惩罚外，吾人为消除帝国主义之毒害，巩固世界国际之交谊，而使此等不幸事件不至再见，则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实现，认为非常迫切而需要。盖就此次各地惨案而言，倘使不有上海、汉口、沙面等租界，倘使外国兵士无在中国境内自由屯驻与行动之权能，则此等惨案将无由发生。是以此等惨案之成立，其近因虽起于工人之罢工与学生同情之援助，而祸患之根源实在于种种不平等条约也。此等不平等条约，远者订于七八十年前之满清时代，近者亦订于民国罪人袁世凯执政之际，其非出自国民真意，至为明显，以今日中国与世界情势之回异，此等条约，其不能自然顺利发生效力，盖已无疑，吾人深恐留此种邦交之障碍物，贻国际以未来之纠纷，故为维持世界永久之和平与民族间之亲挚交谊起见，最后谨以最坚决之态度主张，将前此种种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之，而与各国重订立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

（训令第十号）十四年七月

本党自改组以来，显呈活泼气象。其最重要之发展：（一）宣传能力之增加，与宣传事业之扩大。（二）本党同志及全国民众，认识本党主义及政策的程度，均有突飞的进步；而北方民众接受本党主义政纲者，日益加多之事实，更足证明本党以革命的方法，统一中国之机运已将成熟。（三）民众受本党之感化，其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觉悟；日渐明了。在觉悟的农民工人中，因接受本党主义和政纲，在本党指导之下，其自身组织亦逐渐进步。（四）国内青年因受本党之感化，而得一新觉悟，认识革命救国之必要，相携加入本党，本党得此无数的革命后继者，前途益更光明。（五）全世界革命的民众，一致注意本党，认本党为领袖最大的压迫民族；而为革命奋斗之唯一的政党。由以上五点，可

以证明本党在改组以后，所及于全国及全世界之影响，实至多而且大！同时在党外和党内，有足使吾人忧虑之事实：（一）帝国主义者，因对本党生出绝大恐怖，其直接的压迫方法，不易普遍行使。于是造作种种诬蔑与挑拨的谣言，企图离间中国国民的结合。在帝国主义者所占领的殖民地，及租界之内，更借其政治之经济的势力，尽量传播。一方面压伏中国国民正确的舆论，使不易成立。大多数不了解真象的国民，因而相惊怕，有自走恐慌；国内反革命的恶势力，更乘此国民之弱点，勾结帝国主义者，助长诬蔑挑拨的谣言之传播；于是国民对于本党从新起一番疑虑。（二）吾党虽有二十余年之历史，然过去二十年间，党员实缺乏政治训育，及组织训练；因此之故，党员对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不尽明了。改组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虽继为最善之努力；然以人才缺乏，及其他种种习惯，一时未能尽革之；故尚未能收严密的组织之效。在四围诬蔑挑拨的簸荡之中，其不明了本党主义政纲和实行策略之同志，尤易被其四围境遇所同化。一年以来，本党党员中，公然敢于叛党者如冯自由马素江伟沈等是。此外更有极忠实于本党之同志，因理论事实未尽明了之故，亦不免常发现左倾右倾之状况。

以上五者，足以证明本党之发展，及足使之人忧虑之事实，此皆本党改组后之特殊现象。本党既努力于国民革命，凡我国民中之革命分子，自当来集于本党旗帜之下。然因容纳中国共产分子加入本党之故，社会对于吾党之疑虑，及吾党同志间之纠纷，由是引起。前述二点，仅为其表象，实则所以发生此疑虑纷纠之故，约可分为五种：（一）帝国主义列强，甚明了国民革命不利于彼等之侵略。及见吾党大集革命分子，实际上足以引起帝国主义者之恐慌。（二）军阀官僚，其视国民革命为不利亦与帝国主义者同一眼光。革命分子之加多，即革命力量之加大。故对于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吾党，遂亦引为莫大之恐慌。（三）回避革命之徒，早已视革命为畏途，而不敢涉足，对于本党惟求得避免奋斗，为可得个人之小安。及见共产主义者加入吾党，即引为口实以达其回避革命之目的。（四）本党同志中，夙受帝国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之反宣传，自身对于本党主义且缺乏研究，自不能了解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异同；由是彷徨，疑为变态。(五)一般社会，早已先入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洪水猛兽”之宣传，任何阶级无不闻共产二字而却走。及见本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加入率惊恐相顾，以为大祸之将临。综是五者，帝国主义与军阀，实利用各个方面之弱点，以肆其分裂革命分子团结之阴谋。诬蔑挑拨之种种，实渊源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相勾连之利害，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原为革命之敌，其攻击之手段，何所择而不施。即于回避革命之徒，亦惟有听其自弃。但在忠实的本党同志，未能完全了解国民革命之任务者，及一般社会之蒙昧未觉，本党皆负有振发之责任。在本党同志或因疑惑而长事纷纠，或因避免纠纷而流于消极，此皆非同志间应有之态度也。凡此状况。当总理在时，曾经屡次剀切晓谕说，说明本党所以容纳共产党员加入之故。去年八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此事曾有决议，其要如下：

一、现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之下，各阶级中自有力求解放中国，要求独立，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之共同倾向，中国国民党即为代表此等阶级之共同倾向，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三民主义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

二、本党章程规定：“凡志愿接收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加入本党所辖之党部，

依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故凡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此章程之规定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至于行动违反党纲章程，不愿积极从事于三民主义之革命运动，既不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又不赞助劳动平民者，则不问其思想上属何派别，概当以本党纪律绳之。

三、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因本党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只应就本党政纲与章程，以管理一切党员。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

我全体同志，读此决议，便可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加入中国国民党，系为接受本党之主义政纲，而负实行国民革命之责任者。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从前中国革命同盟会时代，即系如此。惟既加入本党者，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此则至为重要也。

本党为民主的集权制之组织，但本党之为民主的集权制，有一最高原则，即本党乃总理孙先生所创立，总理所创行之三民主义，为本党始终不渝的主义，而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施方针，更必须以总理自著之“三民主义”为标准。总理在时，党员之行动，一决于总理。总理既没，党之行动，唯有完全取决于总理之遗教。如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教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制之。且以后无论何时，决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此则全体党员所应确实信守者也。

全体同志须知我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史中，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有重大之历史的任务。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民族，因民族精神衰颓，而至于文化破产经济落后，受压迫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中国之国民革命，既含有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多方面之意义；而综合此种矛盾的历史事实，于最短时期中，欲以一个统一组织的政党，完成吾国民之历史任务；则包容各阶级的革命分子，一致进行，实为绝对的必要。且在全世界的进行中，任何一国的革命事业，实皆为世界的革命事业之一部。离却世界革命的民众之互助提携，绝不能完全成吾人历史的革命事业。吾国国民革命的成败，不特为全世界四分之一中国民族存亡所关；亦实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安危所系。吾党负此伟大之历史的任务，且欲举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矛盾同时解决之，惟有恪守总理之遗教。此外更无一最高原则，能解决横亘于吾民族之前之一切矛盾的事实也。

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切感受此责任之重大，认此为吾党生命所在，曾决议发表完全接受总理遗教，努力以求贯彻的宣言。更决议关于接受遗教的训令，关于党军队及军校训令。兹更郑重决议此训令，昭示我全体同志。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独　　秀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简单的和你谈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时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畸”，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

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知造因了。我们究竟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

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钞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公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

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织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之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的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戳〔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阶〔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侨〔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厉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是以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

党，必须有根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都比现在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硬〔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P.和C.Y.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象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P.和C.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P.非C.Y.的国民党员得着失却训练的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P.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组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P.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C.P.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P.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

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所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　　　　○　　　　○

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么？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甚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原载《向导》129、130期，1925年9月出版）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一九二五年九月）

瞿　秋　白

一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戴季陶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二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三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膨胀。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是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甚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甚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己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知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

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国〕家，那〔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上经过李征五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谎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选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赋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

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杂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己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要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P.。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它不致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面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北京的杨德甫，上海的王光辉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

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P.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P.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P.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P.，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七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中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C.P.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要主张"中心思想"。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戴季陶还主张C.P.公开出来与国民党共同组织联立的中央委员会。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一、他说C.P.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事实上从一九二一年海员罢工，"二七"屠杀，广州的农民运动……一直到最近的五卅运动，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戴季陶说：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实则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发展，还当从民族中大多数之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上奋斗，而不是保留什么古文化。第二、他说C.P.自己的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也只是参加国民革命那么C.P.用不着存在。其实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的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无地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独立的政党。C.P.的主义是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都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因为争中国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农工大多数民众的民权和“民生”，便是这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义及政策，没有丝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救国的党，可是他又反对农工阶级的阶级斗争；试问农工阶级连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争，所谓“民族文化”“孔孙道统”能使他们起来力争吗？农工阶级不来积极参加，而想国民革命成功，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第三、他说C.P.自己不能公开，“心里想着共产革命，口里说的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不把C.P.的名义拿出来。这更错误。C.P.组织上的不公开，不过是因为军阀政府之压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会，此时在反动军阀势力之下的国民党，又何尝公开呢？至于政治上，三四年来C.P.的政策、主义——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中农工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去努力参加，以此解放中国，同时亦就是进行世界的社会革命，以进于所谓“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都是彰明较著以C.P.的名义发表宣言政策的。就是C.P.加入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于说不用唯物史观，不用进C.P.也可以为工农而奋斗。那么，不用说右派工贼的成绩已经斐然可观，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义，也就够受的了。第四、他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C.P.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自己主张起来”。共产主义的步骤及中国C.P.现时的主张“计划”既如上述，那么，中国C.P.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制度，已很明显；季陶现时所不肯苟同的，当然不是这一点，而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见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缘故，并不在于条件具备与否，却在于他自己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然怎会把C.P.“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政府，以阶级斗争工农生活改善”的主张，认为揠苗助长的拙策！

八

以上四点都是关于理论上及政策上的问题。至于国民党组织上的问题：第一、他以为“大团体内包含小团体”，C.P.“只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本身组织”。这句话很错误的。事实上C.P.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自己的“躯壳”，何必借国民党的。两年来的事实，只是C.P.同志在国民党中工作，努力替国民党增加了不少真实党员，其中有许多是并没有进C.P.的。至于说C.P.及C.Y.不应吸收国民党的党员，那更是奇怪。国民党党员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人，他自然要进C.P.和C.Y.；没有阶级觉悟的人，C.P.及C.Y.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会进来。戴季陶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何必舍不得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进C.P.？第二、他说C.P.在国民党中主张上选举上等都用“手

段”。其实这所谓手段，不过是行动比较一致些。一则思想相同，一致是当然的事；二则C.P.既为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主张上选举上当然以此为目标。戴季陶自己亦骂右派糊涂，主张要肃清他们；譬如现在这种分子还未肃清之前要有选举，季陶要使这些反革命的糊涂分子不能握住党里的事权，他一定不选他们，并且一定要教别人也不选他们。这算什么手段。戴季陶在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时候，说党员应走的道路是在党内“争决议”。这是很对；为什么一个人争决议便可以的，几个人一致争决议或选举便不可以？第三、他说C.P.对于国民党有二心，不忠实，因为另外有团体；又说同盟会时代也有“各种主义者”，可是因为没有团体，所以始终对党忠实。其实季陶自己说的，同盟会时代有种族革命派，有民主立宪派（政治革命派），后来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党了，……“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可见，对党及革命忠实与否，并不在于有无另外团体，却在于主张合于革命的过程与否。第四、他说，C.P.用利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和经济维持力。这更是笑话。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义，当然对于工农民众的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人的政党，应当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权。难道国民党主张民权，等到平民有了“权”，又可惜起来了吗！至于说经济维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P.的组织，决不能用国民党的钱。这简直是造谎。总之，季陶这些理论和组织问题上的攻击，其目的只在于打倒C.P.，最后竟不惜用造谣的手段。季陶说，C.P.当国民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其实季陶都已经当C.P.是自己现在的敌人了，所以不惜用这种手段。

九

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请看：一、他说，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内国民革命成功后，政权总还握在“三民主义的青年”手里。这就是说：“纯正的三民主义青年”是能握到政权的，不纯正的当然不准。这是一种权力的诱惑。其实，五十年内要想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能实现，完全是梦想；单只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闵的胜利，没有农工的赞助，没有C.P.的出力，决办不到。何况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压迫阶级的精神勉励党员，却以政权在握去诱惑。这真不知是何等的“团体道德”，革命道德。二、他说：“第三国际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产政策太过棘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所〔可〕能”。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三、他说，某某同志因是C.P.而使国民党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C.P.所以虽有大才亦不能开展；又说那都是“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一个人的主张，害了C.P.的青年。这岂不是纯粹的挑拨离间手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不是利诱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离间。他们造谣离间之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

的民众怀疑他们的指导者。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了！

附注：季陶挑拨离间C.P.与国民党的感情，这有几件事实问题：

一、谭平山的文章。平山那篇论文，即如季陶所举说国民党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为过。国民党及广州政府是否确有许多受右派的官僚军人所支配的反动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平山的论文指出来，正可以使群众的党员起而注意纠正，挽回民间的信用。季陶却一笔抹杀，只说平山“说国民党的坏话”。

二、所谓某区党部的一封信。事实上是广州有几处发生所谓“中山主义研究会”，实则是右派的结合，日以讨论反对C.P.为事，并非什么研究主义的团体。先有C.P.同志几人与廖仲恺谈及，廖遂禁止他们，究竟有无此信，虽不可知，然决不会象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据季陶说，此信已被毁掉，我们推想，那信至多只会说：“有人假借中山主义研究会名义，实则专事捣乱反对共产派……”或者信上措辞不好，然决不至如季陶所引的那样。其实我们决不反对理论上的讨论或对于共产主义之批评，可是在国民党党部中一味反对C.P.的人，做反动的右派宣传，我们当然要抵抗的。而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辞以挑动感情，明说左右派都不好，实则完全帮右派。

三、“向导”上批评胡汉民等。这些都完全是事实；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分析，是应当根据事实说的。我们的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季陶却以挑拨的罪名归之于“向导”，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C.P.。

十

总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义，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力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他们都变成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大部份有力量的，现在还只是买办阶级，他们真有反动的实力，所以纯粹右派倒是有社会基础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只能和无产阶级携手，方能进行革命运动。如今季陶却想代表民族的资产阶级，纯粹站在所谓“爱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份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季陶这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能有社会的基础，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开始攻击左派，右派的买办阶级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实。现在在上海已经见了几件事实。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戴　季　陶

何谓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是信奉中华民国创造者孙中山先生所主倡之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在民主的集权制之严格的组织训练之下，集合全国各阶级中，具救国热诚的革命分子，造成强固的团结。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权。遵照孙先生所定的三程序，运用政治的权力和方法，完成中国之国家独立，民族平等。改造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完成民主的国家组织，图人民食、衣、住、行、育、乐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满足，国民文化之世界的发展。并为达此目的，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反抗掠夺世界大多数人类利益，阻碍人群进化世界大同的帝国主义，而消灭其势力之革命的政党。”

把上面所述的这一个定义，分析开来，可以得下列几种概念。

（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政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

（二）中国国民党的最高原则，是信奉中华民国创造者孙中山先生所主倡的三民主义。

（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是民主的集权制。

（四）中国国民党的组成分子，是要集合全国各阶级中具救国热诚的革命分子并要施以严格的训练，造成强固的团结。

（五）中国国民党的努力方针，是要取得政权，必须是要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权。

（六）中国国民党的目的，是在遵照孙先生所定的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个程序，运用政治的权力和方法完成下列几件事。

甲　完成中国的国家独立，民族平等。

乙　改造中国的政治，完成民主的国家组织。

丙　改造中国的社会，图人民食、衣、住、行、育、乐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满足国民文化之世界的发展。

（七）为达此目的，须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以反抗掠夺世界大多数人类利益，阻碍人群进化世界大同的帝国主义。

如果要把这一个定义，和定义中所含概念，很细密的解说明白，决非这一本小册子的纸数所许。只好暂时放下，候将来有机会时，再逐条细细做一本解说。但是我很相信，这一个定义，是从今天以前，一切说明当中，最完全而正确的定义。我们同志，必须要照着这一个定义去的工夫，才不会走错路。能够把这一个定义彻底的了解，就是认识清楚了中国国民党的使命。能够从事实上完成了这一个定义所指的工作，就是完成了中国国民之历史的使命。并且我相信，就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要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也要把这一个定义所包含的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才可以了解中国现代的政治问题是甚么。尤其是要研究孙先生之实际的政治主张，必须要在这一个系统下面，才可以研究得清楚。——我个人的时间太少，我盼望同志当中的著作家，能够照这一个系统，把孙先生的著作和讲演当中

的要点，编辑起来，这是目前一个最大的需要。但是最要紧的，是以孙先生的思想和行为为根据，说明孙先生的主张。如果随便自立一说，就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义。

中国国民革命之历史的因缘 我们中国现代的国民革命，是由创造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孙中山先生何以发起革命，何以要发起以三民主义为信条的革命。须知这一场革命史剧的背后，有几重极大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民族力的消失 我们中国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很古的文化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民族，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封建制打破之后，由极端个人主义的专制愚民的帝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把过去由上古游牧时代以来，经过单纯的农业经济，而刚要进入到农工商业的协作经济，之经济文化，由部落的权力组织而已进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世界国”组织之政治文化，由老死不相往来的自足思想，而已进入“世界的社会连带责任主义”之道德文化，从根本上施以极惨酷的破坏。后代帝王，在形式上虽然变更了这一种残忍的手段，但是奉老子的个人主义为唯一宗旨之愚民政策，虽不伤害民族的身体，而把民族的智识和思想，压伏得干干净净。自此以后，失却了创造文化，组织文化，能力的中国人，抵抗异民族的能力，渐渐消失。东晋以后，由战败而南迁的亡国的昏君，奸臣，贵族，富豪，败将，残兵，宫女，官妓，以及为贵族造娱乐品的文人墨客，更把黄河流域的文化精神，抛弃干净，造成日金夜粉的金粉文化。民族的创造力与组织力，便更加消失了。乱于群胡，亡于蒙古，更亡于满清。以这样一个文化很高，人口很多，生活地域很大的，世界第一个大民族，在野蛮的小民族铁蹄之下，蹂躏了一千几百年，造出全世界历史中一个最特殊的历史事实。满清入关以后，以很精密而深刻的政治手段，运用八股文，圣谕十六条，圣六谕训，卧碑，几种毁灭民族精神的利器，更把识字阶级的人——大家要注意，在前时代，是一般种田作工的人，都有识字机会的。——的民族自觉性，压到再没有发生的余地。及至欧洲文明而强暴的民族，以铁甲船，后膛枪，挟着麻醉毒药的鸦片烟，侵入以来，二千年愚民政策下面养成的无识国民，方才稍稍觉醒。但是从不知道中国之外有国，中国文化之外有文化，并且连中国的文化意义也老早不认识的人，那里敌得过近代科学文化制造出来的新蛮族。一败再败，至义和团之乱之后，中国才认识西洋人的本事，是神圣一样，高妙不可思议。可是这一下西洋人的高妙倒认识了，“中国人是人，中国人是有光荣文化历史的民族，中国民族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民族，中国民族是能创造文化，组织文化，的民族，”这一个事实，却完全不认识了。自信的能力，完全消失了。由极端的守旧，变而为无意识的趋新，由盲目的排外，变而为盲目的媚外。这一个现象，尤其是在智识阶级中，最明显而最普遍。（参观“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二）欧洲民族之世界的发展 自近代科学的航海术发展以来，欧洲的拉丁和萨克逊诸民族国家，以获得殖民地为目的，渡过大洋，向全世界侵略开来。其重大事实，如美洲的开发，澳洲的占领，非洲的瓜分，印度的灭亡，土耳其的衰微，南部亚洲诸小国和南洋诸岛的吞并。全世界欧洲民族以外有色人种的国家，除日本由强烈的革命而得免于危亡，渐次完成其独立之外，没有一国不渐趋灭亡。中国在这一个运会里面，政治上既受满洲朝廷压制，而一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又受欧洲列强的宰割。日本在自强以后，亦随欧洲列强之后，向亚洲大陆进攻。中国在四面包围之中，一天一天濒于绝境。再看这一个时代里面的强国情况怎样呢。他们由工业革命而诞生的资本主义，与旧时代的军国主义相化合，

变为近代特殊的帝国主义，专门刮削殖民地人民的膏血，这许多帝国主义的国家，更以地球为范围，形成一个绝大的封建制，为争夺殖民地而拚死的决斗。在他们国内，操产业管理权的少数资本家，一面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面，造成经济的封建制，一面在工银制度下面，压伏着大多数的自由工人，掠夺工作的剩余价值。令大多数的工人，陷于极悲惨的地位，酿成极大的阶级斗争。所以在世界的争霸战中，势力愈大的国家，他们国内阶级的悬殊越大，斗争越烈。被压迫民族的呼声，和被压迫阶级的呼声内外齐作。支配世界的强国里面，个个都带着阶级斗争的喷火口。政治的经济的民族斗争，被资本主义领着，在世界交通圈内混战。现出有史以来极大的悲惨状态。

在时间上从古到今，在空间上由中及外，两重历史的背景，都被孙中山先生以极锐敏的眼光，发现出来。更以深刻的觉悟，锐敏的认识，坚固的决心，把这两层历史背景的事实，细细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综合，在空间和时间的统一，横直两线的交点上面，建设起一个很崇高伟大的主义。就是“以中国之历史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以适合中国民族之迫切的需要为方法，以世界的民生问题为解决对象，以世界人类的大同进化为终结目的之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的内容，更由先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努力，随着上述两个历史背景的展开，一天比一天丰富，一天比一天深刻。并且先生不单给我们一个三民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还给我们一个“后来居上，有志竟成”的精神教训，促起我们的自觉，鼓起我们的勇气，恢复起我们中国民族已失的自信力。

革命思想的变迁和革命党员的分化　当时中国多数人民，因为受了二千多年愚民的专制政治之压制，六根不灵，知识不开，不但这些事实一点看不出，连要求改造自己环境的观念，也不容生出来。少数聪明而有志的青年，也止能想到改革以图自强，而不容易认清楚正确的道路。革命性最强而又受过外国新教育的人，也只能认识中国之衰弱，在于异族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而不能寻出所以至于如此的原因，确立根本改革的方案。及至中山先生已经高唱了二十年的革命，更从理论和实际的政策上，主张以三民主义创国救国，提倡革命团体的大同团结，大家才闻风响应，求集于青天白日旗下。但是在思想上和知识上，还是依旧固陋幼稚，或是只图满足民族的复仇心理，或是驰骛于乌托邦的幻梦。并且有许多人各是其是，谁也不懂得受先生的训练，受先生的指导，我也就是这固陋而且幼稚的一个人。现在我们从三民主义之分析的次级概念上，来观察当日革命者的思想，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标榜种族革命的　这一种人，当中有一部分，目的只在推翻满清。此外一无主张。有许多支配欲强的，自己便想做皇帝，支配欲弱的，便以为只要满清倒了，谁做皇帝都得。皇帝梦做得最浓的，竟有假托符讦，希图煽惑同僚的人。还有几个，写信给袁世凯，要他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的故事。“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桓公复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是他们檄文中的警句。“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是他们宣传的范本。此外对于欧美日本的排斥，不用说，也是他们一个目的。至于中山先生所主张以仁爱为基础，民权为方法，民生为目的之文化的民族主义，是他们所绝不能了解的。但是这一种“复仇的革命家”，在指导中国国民革命进行上，却收了十之七八的效果。

（二）标榜政治革命的　那个时候的人，世界历史的知识，有许多是非常浅薄的。他们对于欧美日本列强的国家，所以致富强的原故，固然不十分考求，那些国家在历史的进

程上，具何种基础，向何种方向，也没有精深的研究。政治的实质是些甚么内容，当然不很明了，所憧憬的，只是欧美日本富强的现象。所具备的政治认识，只是在政治组织之一形式的代议制度。以为把政治制度改为立宪，把国体改为共和，便可以达富强的目的。而作他们最大的模范的，尤其是日本的维新。可是日本民族的习性如何，社会组织如何，国民的团结力组织力如何，并不在他们打算之内。这一种政治思想当中，本有两大派别，一派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朝廷，组织共和立宪国家。一派主张凭借满清朝廷势力，以钦定的形式，组织君主立宪国家。后者便是一般所称的保皇党。当然不能列入革命的范围。可是从政治思想的实质上说，两派仍旧是姊妹行。在中国的民权思想史上，对于启发人民思想，他们这一种速成的法律知识，都收了莫大的效果。在人民与政府的斗争上，也供给了不少的武器。辛亥革命之直发的动机，要算是川路风潮，煽动这一个风潮的，大半是保皇党系的新官僚党，就是一个显明的例。但是没有实际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作内容的形式，到了排满革命完结之后，他们除了借着议会政治的空名作恶而外，竟无所能。十一年来污秽不堪的国会，——天长地久有时尽，此会绵绵无绝期，的国会，就是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了。

（三）标榜社会革命的　初期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往往趋于空想的无政府主义，中国也逃不了这一个公例。中国青年刚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潮接触之时，生出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和同情者。他们的思想，不都是想把一切历史因缘断尽，靠着人类高尚的理性，和感情，去建设理想的和平世界。他们的情绪是极优美的，思想是极高尚的，行动是极自由而和平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随时都是妥协的。服从冥想和太息，是他们生存的意义。这一派人虽不多，但是中国民族，数千年来，饱受自然主义的哲学陶融和否认现在的宗教感化，一般贵族式公子中的消闲文学者和理论宗教家，当然很容易接受他们的戒律和教义。最初一个时期中，其中一部分革命性最浓厚，打破现在的欲望最强烈的人们，也很赞美“恐怖主义”的行动，并且直接采取这种手段。不过仅仅是政治压迫最大的时代的反响，不能说他们的主张是如此的。

在愿意接受三民主义的同志当中，我们也看得出，当民报时代，朦朦胧胧的有两种思想径路。一种在思想上接近马克思之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实际政策上尤其接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张。一种是接近奥伯来因一流的农业社会者的主张，并也采用亨利乔治的土地政策论。这两种思想和主张，并不是很明了的分派，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思想，一派是特别注意工业问题，一派是特别注意农业问题，而都是很热心的民生主义提倡者。在实际的活动上，也是直接遵从总理的主张来实行。民报社中的精卫，汉民，执信，都是明明白白为这一种思想宣传的健将，执信尤其是热心于工业革命问题。至于当时民生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方法，不能于各派社会主义之外，很清楚建立一个系统的原故，完全因为其时都只是初期的研究，没有和实际问题接触。因为没有实际的体验，所以不会注意到指导行动之基本理论。譬如执信在当时算是一个热心赞同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人，却又是一个很清楚的理想主义者。而他关于民生主义的基本理论，却始终没有论及。孙先生自己，当时又没有精密而有系统的著作。所以许多不细细从先生的思想体系上作研究的人，便把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只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看，不认为是一个完成的主义。直到去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大部分告成之后，研究者的眼光，才完全一变。即此一端，已可见从前

三民主义在民间不能普及，在党内干部中，不能深入，的原故。从主义思想的分野上看，在革命同盟会时代，一般革命党人中，标榜民族革命的人最多，但多少都带着民权革命的色彩。次多的就是标榜民权主义，议会政治的兴味很浓的人。标榜社会革命的人最少，而能切实从实际问题上，研究解决方法的人尤少。却是后来经几多次分化，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不至完全澌灭的，还多是当日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人。这一个意义，也足令人深省了。

就以上三点看来，就晓得中山先生所建设的，是三民主义，而当时在三民主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不完全的一民主义——这时候革命党所用的量尺，仅是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用这一把量尺，来量全国的人，合格的便是革命党，不合格的便是非革命党。换一句说，就是以排满复仇为民族主义全意义，是革命党的必修科，民权主义是随意科，民生主义，仅仅是科外讲演。至于革命进行中之施政方略和政治内容，更是毫无研究，毫无预备，孙先生为革命制定的基本方略，自始至终，置诸摒弃之列，毫不在一些政客式的民权主义者，拳匪式的民族主义者，眼里。到了后来，满清一倒，大多数的革命党人，完全失了主义的目的，一面在事实上和一切旧军人，旧官僚，旧学生，一切腐败绅士等妥协，一方面在感情上又和他们冲突。中心无主，当然现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怪象。在这昏天黑地的当中，拥护着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到处高唱三民主义的，依然只有一个孙中山先生了。其后时局一天一天的变幻，一般知有志气而不知有科学，和知有利害而不知有主义的人们，物质上虽拥着毫无统帅力和组织力之政治机关，思想上却赤条条一无所有。一战而败，故我依然。这就是战胜了满清，失却了革命，而且破坏了革命党的最后效果。

以排满复仇为全意义的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纵欲主义的欢乐，和禁欲主义的苦节，两种不调和的个性发展，都是证明二千年来思想专制和政治的放任下面堕落了的国民性，都是表示中国民族特殊的历史因缘。因为受过了多少年来思想上的束缚，所以在理想方面，尽性发挥。因为过惯了放任政治下的生活，所以不愿意再走到近代规律性较强的政治组织路上去。但是欢乐苦短，忧愁苦多，无规律，无组织，内容空虚的革命党，主义的妥协和利害的反抗两个矛盾现象下面，受不住反动派的千钧一击，遂全部失败到干干净净。

孙中山先生，他不单是不灰心，并且格外精神焕发，仍旧提起他的三民主义，要求失败同志的信任。在这时候，单纯的信任要求，竟鼓不起全部旧同志勇气，单纯的主义结合，敌不住失败者恢复地位的欲望。一部分已经看惯了乱七糟八的五色旗的人，很不容易一心一志的重新结合到青天白日旗下来。但是到底在孙先生的鞭策鼓励之下，成立了一个告朔汽羊的中华革命党，维持着革命史的正统。民国五年至八九年的当中，形成“复辟，”“篡夺，”“护国，”“靖国，”“革命，”各种旗帜的混战。每经一次混战，革命的青天白日旗便鲜明一分，三民主义的色彩，便彰著一分。国民对孙中山先生的信仰，也就增加一分。何以故，因为一切旗帜，都是随起随灭，只有象征三民主义的青天白日旗，巍然屹然，永不变色，一切个人的信用和名誉，都是随势力的消涨而起伏，只有代表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信用和名誉，与三民主义的信用和名义，相依为命，不问世俗的荣辱和毁誉。“中华民国”如果没有动摇，三民主义便不能动摇。三民主义如果能够

发展，中华民国便一定发展。

这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大战争，杀人数千万，加入数十国，继续满五年。这战争是甚么，就是暴露以强暴民族，压迫柔弱民族，以强暴阶级，压迫柔弱阶级，之帝国主义的罪恶。就是各强暴民族，为压迫柔弱民族起的分赃不匀的大冲突。战争的结果是甚么呢，正面是证明三民主义真为时代所必需的俄国革命，反面是证明非向三民主义，便连表面的平和，也不能敷衍的华盛顿会议。在世界大战进行当中，因国内之政治的变化和国际之政治的变化，已引起中华革命党生出一个阐明主义，制定政纲，确定方略，完成组织的要求。虽是没有到成熟的机运，却是这一个工作，在总理孙先生的指导之下，从民国六年以来，已经作了不少的豫备。最可惜的就是一方面因多数党员的不热心，工作不易完成，一方面因为政治军事问题的纷扰，使这重大问题，常常阻碍进行。民国八年以后，国内的青年，在前面所述正反两面历史的教训之下，渐渐觉悟起来，由清谈的文化运动，进而为部分的社会运动，由部分的社会运动，更进而为具体的国民革命运动。和民国六年以来党内的改组气运相衔接，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于是乎实现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之精神的意义　去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为了甚么。以后应该要如何。我们可以从总理在大会几次的讲演和改组的章程当中看出。总理在大会讲演中最要紧的话中，有下述的一段。

> 吾国的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信条。此主义是我创的。数十年来，以此主义号召国人。但是从前全国人所了解的，仅为民族主义中的一点。应该作我们全党信条的三民主义，只有一部分为同志所顾及，国民所了解。辛亥革命既成，三民主义的真精神，反为同志所忘却。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志因为受着大成功后之大失败，于是神志颓唐，群趋消极。其中一部分的人。以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目前既属无望，非待至二十年后，不能再革命。我看见这种颓丧消极的状况，要想把他们鼓舞振作起来，并且要把那三民主义的基础，建筑巩固，所以建立中华革命党。以身作则，对于那些还不明白的同志，也要他来盲从我。因为那个时候，一般国民思想很幼稚，固然不能了解三民主义，而一般同志，也把主义忘却。除却以人为中心，更无推行此主义之望。这几年以来，世界的情状变更，三民主义，不昌明于中国而昌明于世界。在俄国则有三民主义的成功，我国的青年及智识进步的人，也渐渐明白这个道理。这几年来，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在中国，为国民中的青年所信仰。到这个时候，已没有单靠个人做中心的必要，非扩而充之不可。故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关于本党组织的基础。自此次大会之后，吾党的同志，便应该一致同心，把党组织好，努力做宣传的工夫，共谋吾党主义的发展。换言之，此次是我把我平生所提倡推行的三民主义，全部付托于全国的同志。自此以后，诸同志应该要共振精神，负实行主义，宣传主义，的责任。

就这一段话来看，我们已经可以明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精神的意义，是总理孙先生，把三民主义这一个孤儿，扶养培植以至于成人的责任，完全付托于同志全体。我相从总理十余年，很看得出，在这一次大会中，总理的言词态度，真是十分悲痛，十分诚恳，处处都表现出“托孤的精神”。所说的话，句句都含着遗言的意义。当会期中，我曾对好几个亲近的同志说，“这一次先生的态度，实在沉痛得很，好象在给我们一个甚么暗示。照先生的精神和身体，应该能够再为中国奋斗二十年，但是这一次的暗示，使我很觉得放

心不下。”展堂，精卫，介石，和还有几个同志，在这一种精神的暗示之下，都很觉到一种“无常”和“悲哀”的感情。想不到先生这个努力，在事实上竟完全是托孤。以后先生在一年当中，拚着一切，努力讲述三民主义的真义。把从前靠先生自己直接的行动来代表的主义，以能传久致远的文字，记述出来，使我们全党的人，得一个依据。我们要永远记得一件事，就是三民主义是总理孙先生创的，我们信仰三民主义，一定要信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如果不是信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那就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无论是何种派别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了信仰三民主义的觉悟和决心，才可以来做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才是真正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没有神经系和血管，不能成一个动物。没有主义了，便不能成一个党。

更就组织上看，我们党的组织，是取民主的集权制。我们这一个民主的集权制，和其他别的团体的制度，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央的组织，是在委员制之上，特置总理，而总理在行动上，操最后决定之权。因为我们的同志，在主义上的训育既未成熟，组织的能力，尚没有训练，在历史的精神上，在主义的训育上，孙先生是吾党同志人格的模范，主义的导师，统帅的主帅，因为是，有孙先生而后有三民主义，有三民主义而后有党。所以总理制之在吾党，为特殊的精神表现，为主义的人格化。和普通所谓总理制，是绝对不同的。章程第四章所定，就是全表现这一个意义。

第十九条　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

第二十条　党员须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

第廿一条　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

第廿二条　总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

第廿三条　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

第廿四条　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

我们看这几条条文，如果稍有一点常识，便都能认得，条文的精义，完全是在保障“三民主义”，尤其是在保障“孙文主义”。

我们中华民国不幸，中国国民党不幸，总理不能多领袖我们些日子，使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训育，达于完成，便弃我们而长逝了。今后怎样呢。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在失却了统帅者和指导者的今天，更要明白主义的重要，更要明白“孙文主义”的重要。总理的身体虽然死了，总理的主义，由总理的著作和讲演纪录，以及总理的历史，完完全全，仍旧长存于世间的。章程第四章的精神意义，依照存在的。并且在总理逝后，这个精神意义，尤其要紧。“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这几句话是要我们全党同志大家牢牢记着的。

总理逝世后党的中心是甚么　明白了上一层意义，就可以明白认识，在总理逝世以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爱党爱国爱民族的至诚，完全接受总理遗嘱，的意义所在了。接受遗嘱的宣言上说。

……吾人惟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一遵照总理之遗教。……吾党惟有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盖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惟有完全继承中华民国创造者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意志，为能实现耳。

关于接受遗嘱之训令上说，

以后本党一切政治的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议案，无论何人，概不得决议。

本党各级党部党团之一切会议，在开会时，须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会众应全体一致，起立肃听。

我全体同志，应知吾党之成立，由于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总理孙先生。总理在时，总理之人格，为一切主义，政纲，策略，之保障。总理既没，则保障总理之一切遗教者，惟有本党之纪律。而信仰总理之人格，接受总理之遗教，即为纪律之基础。自今而后，我全体同志，必以至诚至敬，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心，奉本党之纪律，为无形之总理。然后国民革命，乃能迅速完成。……

关于确定最高原则之训令上说。

……本党为民主的集权制，但本党之为民主的集权制，有一最高原则，即本党乃总理孙先生所创立。总理所创行之主义，为本党始终不渝的主义，而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施方针，更必须以总理自著之三民主义为标准。总理在时，党员之行动，一决于总理，总理既没，党员之行动，惟有取决于总理之遗教。如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之遗教者，本党皆一律以纪律制裁之。且以后无论何时，决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此则全体党员所应确实信守者也。

我们在这许多重要文书上面，很可以明明白白地，认识出来，总理逝世以后，党的中心，完全是在总理的遗教，而遗嘱所指的四种文书，尤其是党员所必须信守的。我们要把这一个精神，在组织上，在宣传上，在行动上，在党员的训育上，都建筑得稳稳固固，表现得明明白白，然后中国国民党才可以成为一个真实不虚的三民主义之革命的政党。

中国国民党的两大病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已经经过一年多了。从党的政治工作上说，这一年多的当中，成绩实在不少。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前一段把改组的良好影响，叙述得很明白。新近这两个月来，国民运动的现象，就革命主义的普遍和彻底两面看，都是很可乐观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结之后，本党里面，生出所谓左倾右倾的现象，因这一种关系，使全党的人，心理上都起了一种暗云。大家不是猜忌，便是狐疑，种种进行，都因此生出一种障碍。深沉一点的人，为顾全大局，只是把这一种思想，藏在心里，急燥一点的，遇事便发露出来了。这一个现象，实实在在的说，内容是很复杂的。同训令的第二段，说明所以发生此现象的原因，把最大的几点已经叙述得很明白。但是此外并不是便一点都没有旁的原因。我们如果就曾经经验的事实上研究起来，还可以从心理上，和物质的关系，组织的方法，举出许多例证，是同训令列举以外的范畴。譬如有一个区党部的职员，因为他们那里生出这种暗潮，便写一封信给我和另外几个同志，要我们替他们解决，信上说，“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象这一种人，究竟在甚么党部当职员，他都忘记了，岂不好呕煞人。所以无论是那一类的原因，必定有一个共同点，是不明三民主义，不遵三民主义，甚至不要三民主义，的三者之一。同训令把这一点，虽然说得很和平很客气，但是我们也很能

够认识上述三端，是一切原因的共有性了。原因的追寻和问题的解决，是很有关系的。有必然的因，必然有一定的果，只拿结果作标准去求解决，而不从原因上去求解决，这种解决法，一定难得有很圆满的效果。倘若就法律家的见地来说，以结果为标准解决问题，只是司法的解决，消极的解决，可以制裁已生的罪恶，而不能防止未生的罪恶。从原因着眼解决问题，才是政治的解决，积极的解决，不单是可以制裁已生的罪恶，并且可以防止未生的罪恶。政党的责任在政治，政党的行动，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着眼，随时都要积极的努力，求力量的发展，才可以收除旧布新的效用。问题只在一两个人的越轨行动时，可以很单纯的用司法的手段，靠纪律来裁制。问题不只是一两个人的越轨行动，已经变作一种社会心理的发动的时候，就非努力作"造纪律"的工作不可。造纪律的工作是甚么呢，就是中心思想的确立，和党员纪律性的训练。不用说，这一种工作，在党的治权机关，仍旧要依着纪律来行，因为一脱出了纪律的规范，团体的秩序性，就不能维持的。同训令后三段，先说明党的最高原则是甚么，次说明党的历史的使命是甚么，再结到党员全体，应该恪守最高原则，为完成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努力。特殊的历史的使命，产生最高原则，最高原则，构成团体的意力，团体的意力，才生出纪律来。换一个方法说，最高原则是"纪纲，"纪纲的裁制力表现是纪律。而团体成员意志的合成，是纪纲的基础。在负特殊的历史使命的本党，最初的意志，更是决定后来团体成员意志的基础。所以本党的生命一日不断绝，则本党的最高原则一日不动摇，同训令把这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很严重的决定下来，要全党的同志遵守，实在是有很深刻的意义。我们做中国国民党党员的，非时时刻刻继续不断的从确立最高原则上面，做造纪律的功夫不可。

党的秩序的基础　本来这一个确定训练党员方针的训令，应该特别单为此制定的。此次的训令，是为了共产主义者加人本党问题，要解决由此而起的纠纷，为重大的机动。同志们或者会因前几段的叙述文字太长，便单去注意看前几段的文字，而把后面两段重要的文字，倒忽略过去。倘若这样，便是轻重倒置。要晓得这一个训令的精神，不是为何人作辩护，也不是单是为解决一两件目前的纠纷。训令的重要点，是在把本党所负的历史使命是甚么，和最高原则是甚么，指示出来，确定全体党员共信，共守，共同努力，奋斗，的标准。且看同会议关于接受遗嘱的宣言和训令的精神所在，就可以完全明白了。最近七月五日，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训令全体党员指示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一篇文字，把左右态度不同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明明白白地，解释出来。虽然不能概括全部，但关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和现在所取最小限度的政策，应如何运用，也可以显明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了。各级党部只要能够很老实很严厉的，从主义政纲和实施策略上，努力做自觉人的功夫，我想全党的秩序，必定可以很快的建设起来，而活动的能力也就可以随之增大。

右倾病的救治　就党员各人自身说，右倾的人老实把"自己为自已利益而奋斗"的习惯去了，肩起总理所说"革命军的目的，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世界"一个崇高伟大仁慈的责任。拿总理不结私怨，不报私仇，不说私话，不用私人，不积私财的天下为公的人格做模范。认清楚中国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是要国民中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人觉醒了，团结成功一个伟大的组织，作民国的真正基础，然后可以获得。也要是为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幸福而获得的国家独立民族自由，才真正是独立，真正是自由。一天

到晚，用两只眼睛看大多数农工阶级的疾苦，用两只耳朵去听农工阶级的呼声。更明白了解中国士大夫阶级，已经腐败到了极点，要想救中国，非把最诚实，坚忍，努力，的农工阶级的人，唤醒转来，以他们为改革的中坚，然后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有救。把全世界的革命潮流，细细审查一下，认识现代的革命，是工农阶级自己要求解放的革命。再想一想我们每逢开会读总理的遗嘱做甚么，总理的遗嘱所命我的遗教，是甚么思想，甚么政策，伦理的基础何在，哲学的基础何在。我们要费这么大的牺牲去求民族的平等国家的自由做甚么。放下三万七千万人的利益不顾，只为自己一时的利益和方便，牺牲主义去为二三千万人做奴隶，还要一天到晚受尽恶社会的气，这是为了甚么来，平心静气想到这里，应该可以悚然自觉了。再就人与人的关系上说，大家要晓得，中国旧日个人主义的毛病，已经是弄到一切事情都不能办了。我们在办事的经验上，时时刻刻感觉到两个大毛病，一个是“疏通病”一个是“接头病”。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一天到晚，专为疏通和接头，忙个不了。这里刚才疏通好，那里又塞住了，这里接头好，那里的关系又断了。最可恶的是某人与某人间的问题，非某人不能接头，某人和某人的意见，非某人不能疏通。因为这种情形，于是把种种真正的工作，都阻碍到不能前进。而且我们更可以看得到，一切政治的罪恶。也都由这接头，疏通，和不能接头，不能疏通，的上面发生出来。为甚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呢。这就是因为中国人只有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工作的人，只知有自己的利害，个人的是非，把国家和社会公众，不放在心里。要救治这个人主义病，除了大家抛弃了个人主义来信仰三民主义，以共同相信的主义，作互相信任的基础。能够如此，才可以把疏通接头两种阻碍工作进行的大病医得好，国家社会才可以得救。我们的党，也才可以组织得好。就是从个人说，也只有如此才可以有路走，要不然，甚么路都走不通的。民国现在经过十四年了，今天是这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那几个人，这几时又起一个分化，昨天的敌人，今天又做了朋友，联合起打昨友今敌的人。纷纷扰扰，至于无有已时。党内的现象，也是如此。随时都看见有一群的私人结合，不看见有一个主义的团体。只有在海外的同志，倒还自始自终，有一个结合在主义下的党，在国内是始终不看见有党的。敌人已经四面包围紧了，过去一切迷梦，到今天也都做到尽头了，大家应该要醒悟了罢。

何谓民主的集权制 更有一件事，尤其要一般同志们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党，为甚么叫作“民主的集权制。”这“民主的”三字，究竟有甚么意理。原来这一个制度，就是要我们党员在党内活动，必须取民主的方法，必须遵守共同意志结晶的纪律。纪律是党的意志，党员之民主的活动，就是以党员之意志，造成党的意志的基础。如果党员没有民主的精神，活动不遵从民主的方式，那么真正大多数党员的意志，就不能很完全的表现出来。如果党员的纪律，不能服从，那么，我们的党就是完全失了团体的效用。自改组以来。许多旧同志因为饱受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毒，向来对于主义又没有真心真意去研究，缺乏正确的信仰，有一些把国民的“民”字忘记了的人，自从作了官之后，人家叫他作大人，他自己也大人自居。这一次党的改组，从形式上方法上建立了民主制，一切党员，无论职业如何地位如何，在党的组织上，是一律平等的。那些大惯了的人，一旦要他和平日视为下等的人，站在一条线上，他们那里会愿意。还有一层最可怜的情形，就是中国旧日政治界的人，把求知识这一个欲望，丢得干干净净。革命后接近了政权和兵权的革命党人，十之七八绝对不求知识的进步。因为自己的知识太差，便对于较有知识的青

年们，恐怖起来。很怕在民主的制度下面，受青年们知识的压迫。因为这种种原故，所以他们都不愿意造成严格组织。仍旧想回复从前那一种自由放任的办法，可是在理论上却说不出反对的话来，便只好以不登记不领党证，或者登记了而又不出席党部会议，作一种消极抵制，或是敷衍的方法。这一种举动，直接间接使党的基础动摇，更使一般青年对旧日的革命党，失却信用，同时连对于三民主义，也因之生出疑虑来。——很多中年的党员，不肯出席党部会议，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中年的人，就国家说，是国家的柱石，就社会说，是社会的中坚，就党来说，是党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中年的人，把服务于国家社会的重大责任抛弃了，只是自己欢自己的利害，谋自己的方便，国家社会，失了重心，当然会现出一种畸形的变化来。现在中国国民党，照理论上说，是要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党员，努力负指导的责任，才可以有救，但是事实上已经做不全了。中年的党员，第一在学识上多不肯努力，第二在服务上多不肯牺牲，第三重秩序守纪律的精神缺乏。古来谚语说的“世故深，性情少”，真是不错。可是中国民族的，国家的，和社会的，危机，已经逼到我们头上来了。如果国民党中年的党员，不能够根本上具深切的觉悟，认识自己的重大责任，振作精神前进，党的基础无从确立，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改造事业，也就无望了。为了救济这一个危险，我们现在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一切党员，一定要出席党部的会议，要看党的印刷品，要接受党的训令和决议，不然就要很严重的执行纪律。还有一个提议，就是全体党员，凡是识字的人，必须把总理遗嘱所指的著作，细细的读过，明明白白的了解。——要晓得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要负担国家和社会的任务，非遵从民主的原则，是不能得到效果的。便是有飞天的本领，也要透过了公众的承认这一个手续，把自己的意思，变成公共的意思，才能有效，不得公共承认，随便甚么好意思，都不发生效力的。党员在党内活动，可以用三个字说，就是“争决议。”一定要尽力活动，用很正当的方法，做争决议的功夫，才是党员应走的道路。如果自己的意思失败了，便要服从多数的决议。以后再要实现自己的意思，依然是要用正当的方法，重新在适当的会议当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征求多数同意。总理孙先生以那样博学多闻的大革命政治家，他积三十余年的经验，第一部为中国人著的书，就是民权初步。先生说，“如果中国国民不经过这一种训练，绝不能完成国家的建设。”我们读这一部书，就应该要晓得，党国的基础，在于人民能遵从民主的原则，负创造民国责任的中国国民党，那里好不遵从这一个原则呢。我们的党。所以叫做“民主的”，就是党的组织是民主的组织，党员的活动必须具民主的精神，遵民主的方式。我们可断言，倘若党员在党内的活动，都不能遵守民主的原则，在社会上，政治上，也绝不能真心实意的做一个真正的民国国民。这一种党员，带了兵一定变做军阀，做了官一定变做官僚，在地方上做事一定变做欺压乡民的劣绅，在实业上做事，一定变做虐待工人的奸商。至于“集权制”的意义，这是很明白的。我们党的主张行动，都是完全以中央的意思为全党的最高意思。所以然要取这中央集权制的原故，因为我们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非集中国革命者的意志，造成强固有力的统帅机关。以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重的号令，求实行革命的主义不可。就理论来讲，在今天科学的工业文明世界当中，一切社会的组织，都在动力统一的原则下面，实施分工集业的组织，政党也是一个社会，当然离不了这一个原则，非此不能贯彻分工集业的组织精神。这都不说了，单从过去革命的失败历史上看来，也可以晓得，人自为战一盘散沙的革命党，是决

乎担负不起这改革的重大责任来的。大家明白了这一层，更可以决定，不革命则已，要负担革命的任务，自己先要彻底做一番改造的功夫。要自己先养成民主的性格，具备组织的精神，和守纪律的决心，然后才可以负得起为三民主义而革命的任务。本来，在我们党的情形上说，完成民主的集权制，是很困难的，所以困难的原故，十分之八是在中国社会的基础不良，民主的训练太过缺乏，有在民主的组织上活动的才干，而又有政治，经济，学识的人太少，没有组织和纪律的素养。从最浅近的一点说，就是连会议的普通规则，都不了然。这些都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缺陷，民国基础所以建设不起，也是为此。以这一种国民做材料而组织的国民党，在短期间里面，本来很不容易行民主的制度，尤其不容易行之有利无害。从前总理不得已高呼"随着我来"，就是对于这"幼稚的老国民"的一个很深刻而沉痛的口号。至于在党的中央，负责任的执行委员，人数过少，便是完全把精神和时间，都费在党务的工作上面，尚且不够，何况重要的执行委员，都是负了政治军事上的重大责任，一天到晚，忙个不了，万不能够专心专意来研究党务，执行党务。所以全国的实况，全党的实况，中央不能明了。"看报告"，"发训令"两个重要工作，也不能行之无憾。但是如果大家彻底的把这"民主的集权制"的意义，认识得清清楚楚，就晓得这两重很大的缺陷，无论如何，都非补救不可的。

旧党员的淘汰 其次还有一点，是旧党员的淘汰。一年以来，本党中央，既没有切实训令，党员当中，也没有人明白提出来，只是糊糊涂涂过去。可是在组织上，我们看得见，这是断断乎糊涂不过去的。我们自革命同盟会以来，组织上就有许多缺陷。这些缺陷，从辛亥革命起，经过几次的组织变更，和成员的分化，弄到珠玑瓦砾，杂乱混淆。现在我们的改组，不单是要把组织的方法改良，党的分子，确非大加淘汰不可。这一句话，许多不考究实际情形的同志，听见了很不高兴。可是大家如果切实负责，把从前党内的情形考查一下，就晓得这大加淘汰，是断断乎少不得的。试想辛亥革命后，直到民国二年，这两年当中加入有许多党员，目的只在升官发财，不知革命为何事，国家社会为何物的不用说了，民三至民九当中，因为四方用兵，糊乱招入的土匪，流氓，营混子，也就不少。这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绝不承认他是革命党，以后必须用一定的制度和规〔纪〕律，永远把这种败类拒绝干净，然后才说得到革命的事业。以上是单就最坏的一点来说的。至于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他拚命的向后拨。南京政府的讲和问题，民国元年黄克强在南京设留守府的问题，同盟会抛弃革命性的问题，毁却同盟会组织国民党的问题，民国二年，宋案发后，大家不肯从速举兵，以及后来大家反对组织中华革命党，这许许多多的事件，那一次不是证明革命党人的保守退婴。倘若具备相当的认识和觉悟，又何至于把中华民国弄得这么糟呢。再说民国三年的时候，大家倘若肯一致赞成"文字革命"的主张，以革命党的党义来鼓吹起来，何至于要等到民国八年，才让陈独秀胡适之来出风头。民国六七年间，大家倘若觉悟到改组的必要，认识确立主义，制定政纲，是图革命党复活的根本，训练和宣传，早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又何至于要等到民国十二年在C.P.加入的时代里，才来新起炉灶，使陈独秀们拿了中国国民党供操纵呢。所以以后对于旧党员的再加入，不但是要拒绝前面所述的败类，对于那些和时代背道而驰的人们，真非施以严格的考试和训练不可。总理所主张的建国方略，先要能完全用在建党的上面，有了健全的国民的党，才能

建设真正国民的国。至于真正有觉悟的同志们，看到过去这些苦历史，也应该奋起救党救国的热诚来，自己训练自己，自己考试自己。承先启后的责任，一般先辈的革命者不负起来，现在这种畸形的变化，也就难怪了。

旧党员登记和新党员加入 改组以后，对于旧党员的登记，新党员的加入，我认为确是太过简单。应该要从党员加入的时候，便十分注意，定要经过一定的口试，至少要了解国民党的政纲，和总理孙先生所手著的建国大纲，再经过严密的考查。才可以登记。如果是旧党员，特别要考查他从前作过重大的叛党行为没有。对于新党员，更应该要经过更严重的方式，和一定的预备登记期间，才可以允许他入党。我们要晓得，国民党一定要不是中国腐败社会的缩图，也要不是乱七八糟的杂货店才可以改革中国。如果依旧把中国的腐败分子，或者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的异端者，应有尽有的，收了进来，中国还有甚么希望呢。

左倾病的救治 左倾的人，要是把只顾说过算数，不问实际效用，的毛病去了，拿总理"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那一个重要的遗教，时时放在心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更要切实将总理的民生哲学，何以成为指导国民革命之最高原则的原故，考究明白，便可以晓得，我们今天在国民革命进程中，为农民工人而奋斗，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者所应取的途径。理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放着可以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理论，去固执一个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理论，这才真正是害了空想病。这样着想，也就能够很大胆的，擎着青天白日旗前进，不用感觉心理的不安了。

告C.P.和C.Y.的人们 更有一件，我要向一部分的青年同志们忠告的。我们今天要把国民革命的责任肩起来，第一个要件，就应该要把中国国民党组织好。大家所以要进中国国民党的原故，我想最少总不必一定希望闹完了中国国民党，就算是达到革命的目的。既然这样，就要足踏实地，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上做工夫。如果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不把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团结，作为自己的责任，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一定会使实际的政治工作上，只有反动和盲动两种势力，磨擦鼓荡，健全的国民运动，不能有确实的进步，适合国家需要的建设，作不起来。果然这样，中国国家最近的将来，真正的建设事业，谁人担负责任。这种做法，只可以说是为满足自己的空想而舍却国民的需要。尽管满口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病，而行为不把实际的国民需要作前提，实在结果，和无政府的空想病是一样的。青年是中国的宝贝，青年的国民党党员，尤其是中国的至宝。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而且拚命阻止多数青年健全的进路，弄到真正国家和民族的现实责任，没有人来负担，岂不是罪过么。这一次在选举当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P.的排干净，这尤其太过不明白自己的地位。再举一个切近的事来讲，某某同志，是中国同盟会以来的很好的同志。他的人格，是很完全的，他的性情，是很和平的。他的思想，只有嫌过于保守，决没有过于急进。他的言论，也只有嫌过于妥协，没有过于激烈。但是因为他加入过C.P.的原故，在非C.P.的同志，对于他便生出一种排拒性来，使他工作上，感受许多困苦。而且在C.P.方面，还是并不当他为真正的

同志，甚么事情都排拒他，他的行动因此失了同志的信仰，他的言论，也因此减少了许多效力。又如某某同志。在他一年来的努力成绩上说，不但是中国国民党的后起之秀，实在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假如没有C.P.的关系，一般同志,又何至于生出许多对他的反感。我们就此两件事看，已经可以晓得，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以指导得来，才可以得民众真实的信任。我们如果真是立志救国，单就这一个很重大的事实的必要上面，也应该觉悟到，要实际的指导国民革命，非诚心诚意，牺牲了自己的空想，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不可。五卅事件以来，我对于这一点，十分觉得中国青年，在政治上的认识和经验，欠缺得很。认识了世界而不认识中国，认识了中国而又不认识中国应由之道。只打着消极的口号，而没有细细想到积极的建设目标是甚么。口口声声拥护孙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教，而不肯信仰孙先生所遗示吾民救国的理论和策略，这真是绝大的矛盾呵。

右派的糊涂病 以上所说，都是事实问题，可以说是无甚高论。革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是猜灯谜，也不是变戏法，是要足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进。天下的事，是没有侥幸的。一点实在的工作都不去作，只在房子里面怀疑这个，批评那个，今天造这个谣言，明天说那个的坏话，中甚么用。要晓得革命是真实不虚的大事，自己不革命，而又要保持革命党的招牌，到了无可如何，顺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岂不可叹。并且这一个情形，从良心上说，还是改组以后的现象。在过去十几年中，一些做过大官的党员，尤其是带过大兵的党员，他们把党的意义，根本上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对于没有作过大官的人，老实是不看在眼里。发表意见，都不对国民说话，只是对着某公某老发通电。思想习性，已经变成这样腐败卑劣，那里还可以懂得革命。试问所谓大西南主义者。那个不是如此。至于给大西南主义者作走狗的政学会，以及和政学会同类的政客们，本来老早已经和革命党写了永不再见的绝书，我们可以不必再把他放在心上的了。在这一种情形的下面，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也就无足怪了。所以说一句规矩话，倘若没有C.P.一派人加入，那些先生们恐怕连糊乱怀疑都不会的。现在我所特别注意的，不是那些已坏透了的人，而是大多数真实作革命在作革命的人。我们可以看得见,这种人的数量，实在是比C.P.要多许多倍,却是他们的毛病，总是不能很切实的研究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更有一点，就是太过胆小，不敢大声疾呼，把理论和政策,明明白白地,在大庭广众的地方，群众运动的当中，来猛力的主张，精细的批评。这种态度，是绝不会得民众同情的。有本事就要走出来站在人前说话，站在人前做事，真能努力，才可以作事业的成功者。普通作人的道理，尚且如此，何况是革命事业。要想糊糊涂涂的混过去，是断断乎不行的。

中国国民党与C.P.的寄生政策 至于在C.P.或C.P.一方面的人，也要明明白白认识清楚，革命事业，是一桩牺牲自己来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一定要是至诚一贯，心口如一，才可以做得成功。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民主义，老实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心里想的，口上说的，手上作的，都要一样，才可以取得国民的同情，集合国民的力量。如果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是国民革命，让一般国民看不出真象，认不清需要。共产的条件，既不会因空想而具备，国民革命又因此生出许多障碍。到得困难发生的时候，只用一句“排反革命”的空

话来掩护真实的主义问题思想问题，这样作法那里可以服得大众，更那里可以救得中国。要晓得在二十年的长日月当中，几万的革命党员间，固然有了不少的变节分子，有了不少的颓丧气分。但是分子的分化是另一问题。三民主义的必要，和国民革命的必要，这是空间和时间的真实性。你们大家为甚么不把C.P.C.Y.的名义拿出来，还不是因为时代不需要吗。既然知道时代不需要，却又不肯实心实意作时代需要的工作，岂不是自相矛盾。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的团结问题，这就更没有必定要C.P.C.Y.才能作的道理。你们去工作，表面上并不用你们党的名义和党的理论，而且还要极力避开这一种名义和理论，就是一个证据。我承认你们真是为民族的幸福而奋斗的勇士，但是我苦心孤诣希望你们，要真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要不然你们就真正组织起一个工党，或者把你们自己的党拿出来，不要取自欺欺人的态度，要明明白白以青天白日作一个道德的标准。表里不相符的活动，只是自己苦恼，使人苦恼。今天或者看不出大毛病来，三年两年之后，万一中国政治改革的工作，完全脱了线，使没有科学训练的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是可怜极了。

团体的排拒性 至于说到国民党的组织，尤其是困难得很。去年中央的决议，一面不许党员在党的组织之外，另有组织，而一面又公然承认组织极严的C.P.加入，而且承认他们得作最高干部，事实上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他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生活力，新的营养又被小团体尽量的吸去。这样一个畸形的团体，真有无从整理之苦。假如不是这样，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在必要上，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和C.P.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这样办法，又要顺当许多。照现在的情形，在过去一年的经验上，真是困难极了。这个责任，旧的同志，固然要负若干，但是C.P.的寄生政策，不把国民革命当作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当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也不能不负重大的责任。所以我认为C.P.的人，既然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C.P.或C.Y.吸收党员的工作，不得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与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从前中国同盟会时代，本来也包含着不少的各种主义者。所以不感觉这个困难的原故，是因为同盟会以外，没有更精干的团体。那些主义者，他们所抱的思想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在党里面，除了诚心诚意拿自己的思想来感化大众，求大众赞成而外，不会有别种作用。所以一般同志，即使不赞成他的主张，却绝不会因不赞成他的主张，而疑心他个人对党不忠实，而且他们也确乎对于团体，是毫无二心的。所以现在不是主义者的问题，是团体的问题，两个团体混在一气，自然不能不受同性相拒，异性相求，的原则支配了。这一个情形，在去年改组的当时，我就完全看见，曾经再四对到上海来找我的同志明白说过。三月二十九黄花冈扫墓归来，我很深刻而诚恳地，对一个重要的新党员谭平山君，谈到这一层。我认为要想新旧党员，完全水乳交融，除非是组织成功一个单纯的团体。如果不有清清楚楚的办法，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革命的母亲何香凝同志"在旁边听得很明白的。那时候党内的这些困难问题，还没有很清楚的现出来，香凝同志也还不十分焦心到这一点。而谭平山君，很冷冷地把我的话以沉默否认了去。至于对外间那些糊里糊涂的谣言，以及党内的风波，我们一些很忠实的同志，

总是用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的态度去解释。胡展堂同志在民国日报改组纪念号的文章，就是很真确的证据。现在我认为再不是沉默敷衍含混可以过去的。但是有甚么方法呢。我现在很恳切地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全体的同志大家真实地把中国的前途作一个负责任的打算。要作国民革命便要作一个负责任的，心口如一的，三民主义的革命者。要把完成国民党的组织，作为自己道德上的任务。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如果仍旧固执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的老子的残忍策略，甚至于只单纯地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那么就只好说是中国国民的厄运了。本来C.P.和C.Y.利用中国国民党，他的目的很纯洁，心情很高尚。他们所企图的，是在中国社会的急激的进化。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的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的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不但是不反对，并且也会自己主张起来。但是在条件毫不具备的时候，突过国民的需要程度，和社会的经济条件，结果就是使中国受长时间的扰乱。使中国衰微的民族，更因扰乱的灾祸，而减少人口，阻碍文化，我为了救中国国家的危亡，图中国民族的繁荣，求中国社会文化的合理的进展，只有很诚恳热烈地，劝告中国至宝的青年，不要只顾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趋新性，用揠苗助长的拙策，阻止中国民族的生机，阻止中华民国唯一救主的中国国民党的自然成长。要晓得中国国民党即使破坏了真实的民族要求，必定使他在别的形式上，发生出来。或者所不同的，只是加了一重反动性，短少了由三民主义的建国精神，所造成的历史的潜势力。此外一点所得都不会有。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者，只是恨土耳其革命后，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而不晓得这是反乎民族之历史的，现实的，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在中国所行这种齐天大圣对牛魔王的策略，高妙是高妙了，可是越过了一定限度，结果一定不好，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就C.P.中一小部分人的言论行动来说，在他们已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上，实在是太过不尊重团体的道德，在他们的机关报上面，单是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策略，加以批评，我们还可以承认他们是应该作的，至于对于中国国民党领袖的人物，故意造作一种谣言，想借此使一般青年，生出不信认中国国民党的心理，这就很不应该了。尤其有几个没有常识的C.P.党徒，自己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并且作了中国国民党的最高干部，而把自己的地位，把国民党的关系，都完全忘却，公然说国民党的政策当中有反革命的政策，譬如谭平山今年在"革命"第一期所载的文字，就是一个证据。假如我不是很顾全同志，不给他改正，两万张的宣传品发了出来，在党中还不晓得要生怎样的恶影响。去年总理北上的时候，"向导"对于总理的批评，最近说胡展堂同志想留一部分反动军队保持自己地位，以及攻击汪精卫同志许汝为同志种种挑拨离间的论调，这些糊说，绝不是友党的机关报所应持的态度。还有一点，我们很看得出的，就是C.P.的人中，有些人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或许他们以为蒋许两同志冲突起来，他们便可以从中扩张他们的势力，并且可以使国民更因此生出厌弃中国国民党的心理，而趋向于共产党。这些纵横家的手腕，真不能不令人扼腕。固然，我也晓得这不是C.P.的人全体的意思，而且不是多数的意思，大半都是刻薄的所谓"中国列宁"的策略，但是C.P.的多数党员，为甚么不能阻止他纠正他，也就可惜极了。去年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正当机关报，从没有对于C.P.的朋友，有过这样的中伤，没有对于C.P.一派的人，说过一句离间挑拨的话。并且从来不对甲而批评乙，对乙而批评丙，尤其不肯对于国民，说一句使C.P.丧失信用的话。

这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很公正而忠实的态度。但是他们是不主张对敌人讲仁爱信义的，或者他们这一种的态度，是认中国国民党为C.P.将来之敌，所以取这一种埋伏战术罢。这一番话，并不是甚么怪癖的理论，并不是要逆流倒驶，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从这一年来宣传的趋向看，很能够看得出一个极显明而深切的处所来。

C.P.和C.Y.的青年心理　现在我且就三民主义的见地，把C.P.和C.Y.中的青年的心理，仔细批评一下。

青年们民族观念的缺乏　一般青年，对于民族主义的几个口号，非常能够用力宣传。为甚么呢。因为这一个问题，是无论怎样反动的人，都不愿反对，不敢反对，不能反对的。在一般新进的青年中，单纯的爱国主义者，固然是很容易把这一点看成国民革命的全目的，而猛烈主张。在不顾中国之社会的条件，盲信共产革命的青年，也因第三国际的忠告，能够压抑住他趋新的感情，把自己的理想，深藏起来，迎着国民心理，用各种论法，鼓吹民族主义的口号。却是总对于中国的青年们，不断的暗示着，要中国的青年们，不要以爱自己的历史爱自己的民族为出发点，作民族革命。我认为他们这一种见地，是认爱历史爱民族的心理，足以障碍他们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忘记了中国民族是衰弱一千几百年的古文化民族，忘记了一切民族，在世界革命的努力上面，都是以自己的民族存在和发展为基础的事实，更忘记了一个民族的强盛振作，为参与创造世界文化的基本。他们的心理，还以为孙先生主张要把自己的民族力增进了，自己的国家建设完成了，才可以主张世界主义，是一种过去世界的旧思想。他们只看见俄国革命是富于世界的革命性，忘记了俄国是世界上一百年来强而且大的国家，同时他们还忘了俄国在掌握世界的霸权时期中，已经有了六七十年世界革命思想的教育，托尔斯泰，德斯退夫斯机，杜格捏夫，哥哥利，契呵夫，苦鲁巴金，等许多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印入国民的心脑。所以他们这一种见地，如果要是离开了政党的关系，离开了实际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运动，单做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基本工作，是非常有益。而且中国的确真实需要这一种深切的社会思想，作将来的指导。但是拿来指导现实的政治运动，混在实际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当中，把实际的革命政治，和中国的实际需要，隔离得很远，这不能不说是大大的错误。

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　这一年来，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已经是很普遍的印入中国青年的心目中了。但是天天说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究竟是一个甚么东西呢。在社会主义的见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阶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冲破了国家的界线，便变成帝国主义了。所以帝国主义，只是资本家的掠夺术的最高发展。至于国家的，政治的，发展，单是资本主义的势力之一形式。除了资本主义而外，再没有第二个帝国主义成立的原因。”在帝国主义者的见地，他们说，“人口的增加，使各国人民感觉土地缺乏。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扩张领土不可。所以在国民能力充实的国家，便不能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这两个见地，我们如果不是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如果我们是一个以历史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的交点为立脚点的三民主义信徒，我们就应该认识，这两层都是事实。食欲和性欲，是生物两个最大基本欲望。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者，只看见由食欲推衍出的经济的生活问题，而不看见由性欲推衍出来的血统竞争，也是人类基本欲的一个表现。而且他的力量，足以支配由食欲推演出来的经济问题。所以社会主义者在打算世界平和问题的

上面，把为民族竞争基本的人口问题，完全忽略了。他们常常以为解决了经济问题，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一个打算，我们要晓得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要知道把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打破了的时候，然后真正的，单纯的，民族竞争，才会现得出来。好象是要把经济的压迫除去了，真正的单纯的男女恋爱，才可以显得出来一样，无论社会经济的组织，怎样能够美满，人们在经济上的地位，怎样平等，说是因此就可以消灭了雌雄竞争，男女间美丑观念，性格差别观念，便完全没有了，这岂不是一种笑话。和这个问题一样，认为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变更了，资本主义消灭了，民族的差别，民族的生存竞争，便因此终结，全世界便能因此得到一个永久的平和，也是一种妄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社会主义者所以绝对不讲到人口问题和民族竞争的原故，他们一则恐怕因此受帝国主义者的利用，二则他们怕把旗帜弄到不鲜明。的确，今天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他们大多数是强国的国民，生存于帝国主义的国家里面。他们这一种分析的方法这一种论调，的确是很必要而适当的。可是生存在中国这样衰弱的国家的国民，我们有甚么顾虑，我们何必要固意把眼睛遮住，不去看明白真正的事实。我们何以偏要抛弃了自己今天最需要，而且将来也需要，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去将就一个强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不完全的理论。”至于那些帝国主义者，他们硬把民族的发展这一个事实，拿来掩饰他们掠夺农工阶级利益的罪恶，这当然是我们要尽力指摘，而且要尽力反对的。我们要晓得，三民主义不单是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问题。在三民主义的立脚点上，对于一切问题的解剖和批判，都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不同。我们如果不了解民族主义的真意义，不了解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是在民生哲学的原则上面，不了解民族的生存问题是民生问题当中一个最原始的最广大的同时是最深刻的最永久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便不能够认清楚中国人今天所应该走的道路。以民族竞争为基础的人口问题，决不是制育器可以解决得了的。我希望青年们，大家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把振兴中国民族的责任担负起来，然后将来的世界上，才有中国民族的地位，在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里，中国民族的“血流”才可以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

为甚么要联俄　更就联俄的一个问题上说，我们要看清楚，一个国家要和一个国家联好，是要双方端端的站起来，大家认识清楚自己，同时认清楚对方，认清楚世界。在两个独立的意志上，做一个亲亲切切的朋友。如果自己把自己独立的意志抛去了，全身都靠到人家身上去，这就不是联好，变成了依赖。中国在图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上，有很亲切联俄的必要。并且在参与世界的革命运动上，尤其有和苏俄共同努力的必要。但是中国人总要看清楚自己的需要，尤其是要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不可把自己民族的独立性抛弃了，去依赖苏俄，更不可把自己的必要忘记了去盲从苏俄。中国的必要，要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才认识得出来，救国的方法，要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才研究得清楚。苏俄共产党的领袖红军的建设者脱离茨基对沈玄卢同志说，“苏俄为保持自己的存在，非援助中国的独立不可。”这一句话的确是一个金言。我们联好苏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中国民族的自由。”这一个主义，是要一般青年们明白认识的。至于那些盲目的国家主义者，为了反对C.P.于是反对苏俄，更因此反对联好苏俄。更因此而否认一切社会主义之学理的价值。这也是一样不认清楚自己，不认清楚对方，同时不认清楚世界。在认识错误的一点，与中国C.P.也要算无是独有偶了。

中国的民生问题是甚么 关于民生问题的指导，尤其是重要了。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中国的需要，在产业上要尽量的发展生产能力，在国民经济的建设上，要认清楚农业的革命，农民经济的实力养成，和组织能力增进，为目前最切的要图，平均地权是我们所要取的实际政策，土地农有，是我们近的将来所要取的理想政策，土地国有，是我们在推论上认为当然的理想。大工业国有，交通机关的国有，和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三者，是行工业的社会化之必须经过的阶段，是我们主张节制资本的实际内容。而且要实现这两件大事，造成国民经济基础，图中国人民的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能够在科学的实用和组织下面，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一定要很切实地做研究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在文化低微，经济落后至于如此的国家，最近的将来时期中，想要以工业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革命建设的目的，那里可以作得到。明明作不到，而且自己也晓得作不到，却是不把孙先生的民生主义拿来做指导的理论，硬要惟日不足的，用单纯以阶级斗争为手叚达阶级专政目的的政治理论，指导现在的青年，并且惟恐有一个有能力的青年不赞成，惟恐有一个有能力的青年信了民生主义。尤其奇怪荒唐的，是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但是他们自己对着人，却要说“我们不问甚么党不党，不问甚么主义不主义，我们只是为国家的利益，工人的利益。”这种言不忠信，行不笃敬的作法，细细想想，到底是合理不是合理的呢。中国国民革命，不能够成功则已，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成功，最少五十年当中，中国的政治，应该要完全握在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青年手里，才可以建设起巩固的“三民主义的民国”基础。如果现在一般青年，忘却了自己目前应该就要负担的政治责任，不去研究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不去建筑中国应该走的道路，这种纵横家的“中国列宁”统帅下的幼稚马克思主义者，实在是和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病，一样荒唐。并且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病，在思想上有促进人们博爱观念的好处，他本身又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在社会不需要的时候，还显不出他的弊病来。至于奉共产国际中极左派的意见为神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在民族的自信力丧失，科学素养不深，政治智识经济智识薄弱的中国青年里面，可以完全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眼前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非靠这一种富于革命性，肯牺牲一己的幸福，致力于改造事业的青年不可。如果青年都僵石化了，历史的进程当中一大段做事业，靠谁去作，固然，他们也说，现在并不主张实行共产，并不主张抛弃国民革命，所以才加入中国国民党。但是不能够表里两面都真实取得国民信任的人，在实际的工作上，是不是有绝大的障碍呢。现在的青年们，和实际施设政治的工作，没有接近，所以不从这些地方打算，如果真实地把中国的改造事业，双肩担了起来，实实在在的打算，就不能不替中国悲伤了。

民权运动的意义 更有一点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民权运动。在这一年来，实在看不出甚么工作，在宣传上也看不出一般人的注意来。本来，三民主义当中的民权主义，就思想上说，是思想的中坚，就实际的方法上说，为一切建设工作的基础。在革命的进行期中，虽是我们主义必须经过军政宪政两个时期，作民权训练的工作，必须使人民能够完全了解民权，使用民权，然后才可以实际图民权普及。但是我们却要晓得，我们在每一个运动的当中，万不可忽略民权运动，须要时时刻刻注意，使民众了解民权的意义。总理遗嘱

当中，开国民会议，与取消不平等条约并提，在一方面，是晓得只有真正人民的代表才能够作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伟大艰巨的事业，一方面也是揭示国人，民权为一切建设事业的根本。更就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个口号来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基本概念产生出来，打倒军阀是从我们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两个基本概念产生出来。一年来关于打倒军阀这一个口号的宣传，只是从消极方面，诉诸人民的愤怒，而不能切切实实，用民权的基本概念，来指导国民，这是一个很疏忽的地方。并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有许多青年，对于民权主义的主张，很有误解。有一天和一个青年，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主张，这真是大看左了。本来，民权是人民在政治上自己保障的手段，同时是政治之社会化的手段。简单说，就是民主的建国方法。在中等阶级觉悟的时代，中等阶级对于贵族要求民权，等到他们既得到民权，当然没有再要求的必要了。近代在普通选举未行的国家里面，无产阶级没有民权，所以他们要对资产阶级来要求，等到既得到民权之后，他们的目的，本是在以民权为手段，建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所以只看见社会问题，而不看见民权问题了。中等阶级对贵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女子对男子，他们在要求民权的时候，都是费了无量的奋斗和牺牲才得着的，何尝是贵族资产家，男子，所情愿给他们的呢。现在中国的青年们，只看见政治的民权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里面，资产阶级的人，常常拿十八世纪的自由民权说作辩护，于是便误会以为民权主义都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在中国这样一点民权影子都没有的国家里面，也不去鼓吹民权主义，并且还怕民权主义的观念普及起来，会妨害社会革命的进行，这岂不是把历史的意义，都完全忘却了吗。我们把这一种青年的心理，细细解剖开来，就可以看得出，纯正的三民主义，在今天实在被青年忘却了。不用说，上面所述的现象，是就中国现代青年的革命心理来做批评的。至于那些活死人，从辛亥革命以来就把三民主义忍心害理的抛弃了，以后再也不求恢复。一年以来，看见三民主义的口号高了起来，于是自称是三民主义的老店，而实际依然固执着个人主义，并且借反共产之名，行反革命之实。他们自己已经决心与中华民国绝交的，当然不在我所论的范围之中了。

我对同志们的希望和忠告 半年以来，我在相从总理十余年的关系上，在自己为革命而奋斗的历史上，在逃不过清夜苛责的良心上，都非打起精神，提携着中国国民党，负起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前进不可。他们C.P.的人，现在用一个口号，就是“我们不问主义如何，我们只要问革命不革命。”这一个口号，我们要晓得，很足以暗地里消除三民主义的势力。有许多思想不坚定的同志，也居然会上他们这一种不通的说话的当。我们做革命党是做定了的，死了化骨骨化灰，还是一个革命党，有甚么顾虑。但是革命不是只图破坏，革命的目的是在建设。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不同，决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同志。所以我在做党的工作的时候，只有对于主义，丝毫不能含糊，半点不能让步。我所苦心企求的，就是现在的同志，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将来的同志，日新又新，发展无量。在方法上，犹〔尤〕其特别注意的，就是要真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很勇猛精进的，团结起来。中国国民党中，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固而秘密的C.P.和C.Y.的小团体，如果我们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没有特殊的团结，深刻的觉悟，严密的训练和组织，是一定不能完成国民革命大事业的。我们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一定是要能够如此，才可以把我们这衰弱了一千多年的民族，从死人堆中救起来，恢复他二千年前在世界上为人类创造文化，发展文化的地位，世界上

有人类到今天，有五十万年的历史，好容易经过无数劫的自然和人为的淘汰，才能成就一个世界第一的伟大民族，存留到今。现在在精神上，在体魄上，那一件可以和欧美的民族比。且看长江一带，这许多灰白色的脸孔，瘦弱的身躯，颓丧的气度，真是令我们不寒而栗。就世界文化的发展，人群的进化上说，我们也应该负起振兴这一个伟大民族的责任。这一大部分的颓败民族，存在于世间，不能随着世界人类进化的程序来进化，实在也是人类中的不幸。做革命党的人，大家要晓得，我们对于国家，对于民族，责任是“当大事，”地位是“孤哀子。”要存这样深刻严重的自觉，才可以切切实实地打起精神去做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个人的享乐算什么，个人的生死又算什么，在五十万年的人类发生史上，不过是“一瞬。”眼中没有“一切，”意中没有“永久，”是做不出救国救世的大事业来的。朋友们快快醒来。

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

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复活起来。

中国的民族精神恢复起来。

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是要全国国民真正奉行三民主义才可以获得的。

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民族，在世界上是要主张正当权利的。

世界的大同，是要中国民族文化复兴了，才可以达到的。

（原载《戴季陶文存》）

〔附〕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

邵 元 冲

在广东的时候，我看了季陶同志所著“民生哲学系统表”非常感动。其时我曾著一篇短文，登在广州民国日报，大意在两点。第一，我认为这一个表解，叙述中山先生思想系统的方法，非常正确详明。把先生的基本思想，命名为“民生哲学”，尤其适当。希望研究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人，大家能以季陶同志这个表解，作为指路碑，必定有良好的结果。第二是我感于本党党员，思想庞杂。许多青年，不能认识总理“民生中心”思想，为三民主义之基础，而三民主义，更为本党所以成立的基础。既不认识，自无信仰可言。一切似是而非之言论，弄巧反拙的行为，都由此生。希望全体同志，尤其是中国新生命的青年，要切实觉悟一番，做真正的孙文主义信徒。然后党的基础，才可以巩固，党员的思想行为，才可以统一，而救国的事业也才有效果。总理孙先生逝世以后，季陶奔走南北，到处都以“互信不立，共信不生，共信不生，团结不固，”几句话，劝励同志，这也是一点不错的真理。我们大家，凡是爱党的人，那个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广州的同志们。如展堂，精卫，汝为，介石，海滨，香凝，仲凯诸兄，由这一年多来的经验，尤其是总理逝后的经验，都认必定要如此，才可以救国，才可以救党。精卫展堂两同志，是最能了解先生思想的人，都称道季陶同志所著的表解，确是很忠实的研究成绩。汝为同志，也把

来印了若干万，分给全体的士兵官佐。

回上海后，晓得季陶更在做进一步的努力，著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本小册子。这一本小册子的内容，把孙中山先生几种重要著作，从思想的系统上，作一个很深切而正确的叙述。更综合起来，从中国的思想史上，说明“孙文主义”的地位。这一本著作，虽不过二万言，却是他的价值，可以比得上考茨基之于马克思。如果同志们大家都肯如此忠实工作，我想中国混乱的思想界，固可由孙文主义勃兴趋于一致，现出一个有力的时代精神。而腐败堕落的政治界，保守退婴的产业界，也可由孙文主义的普及而得澄清与发展。今年先生逝世的那一天，我们大家很悲惨地扶送先生的遗体往协和医院。季陶哭丧着脸，一个人闷坐在秘书室里，提笔写甚么东西，我从医院回来，他已作成一篇哀悼先生的文章。在那一篇文里，以“崇高，伟大，仁慈，”六字，赞扬先生的人格，更以“仁慈”为先生一生全人格的精髓。又从中国民族文化史上，论定先生是孔子以后二千年来直承中国正统的文化思想，而发挥光大之的第一人。季陶又说：“以后中国国民，如果不从这一个要点，认清楚先生的人格，理解先生的思想，中国前途的紊乱，不可收拾，而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平等，更属无望了。至于我们作先生门徒的人，唯有要真实地把先生仁慈的人格，显扬出来，才是不辜负了我们相从先生十几年的历史。”第二天季陶又作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孝”，和前一篇都登载于北京民国日报。这一篇文字，是在说明“孝”的精神，充类至尽。要大家认识革命救国，救民族，救人类，都是孝的精神的扩大。那时候季陶在北京各处学校的讲演，必定要讲这一个问题。后来到了广东，亦复如此。这次我细细看了这一篇论文更知道季陶所以发奋鼓吹的原故。的确，今天的中国人，大家是一点自信力都没有了。“中国的”三个字，成了最恶劣，最丑陋，最腐败的形容词。“中国的”三个字，便是代表一切真，善，美。尤其受了一点科学教育的人，加二如此。在另一方面，守旧顽固的势力，和政治的支配阶级势力，深相结纳，把科学文化发展，阻碍得水塞不通。一般青年，在这两种思想的诱惑暗示之下，不生崇拜金钱万能的利欲病，便害梦想一跃而实现共产的懵懂病。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唤起青年们国民的觉悟，鼓舞起独立的精神，培养出判别是非的能力，使他们时时都晓得注意时和地的关系，认识中国真正的需要是甚么，国家的危亡，恐怕不能得救。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大党，就质和量两面说，都没有别一个政治团体，能够和中国国民党相比。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纷纠，也就不易解决。就今天中国的情形来说，一定要能够统一国民党的道理，才是能够用来统一中国的道理。换一句话说，也要真是能够统一中国的道理，才能够用来统一中国国民党。想到这一点，更看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一部小册子用意之深刻，与关系之重大了。孙先生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深望全党同志。大家要彻底的觉悟一番，自己先把自己的思想行为，用我们已经对公众发誓信守的三民主义作尺子，来量一量过，如果错了，马上就要改过来，如果尽管每逢开会念遗嘱，会议中所主张的，和在会议外所行的，又都是违反遗教，心理的虚伪，至于如此，前途就真不堪设想了。

前天季陶来，又给一册原稿把我看，题目是“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我细读了一遍，一面读，心里不觉得一阵一阵的痛。这一部书里面所叙述的，十之八是事实问题，尤

其是我们党内的事实问题，件件都是我所深知的事实。不但我一人知，只要是在党内担着责任的人，没有一个不深知，句句都是我想说的话，不但我想说，只要是真正爱中国历史，爱中国民族，希望把中国国民党组织好，以中国“国民的党”，救“中国国民的国”的同志，我相信都想说的。至于季陶同志所讲的那些纯粹的道理，第一，要全党同志，心口如一的，奉行总理的遗教。第二，要全党同志，事事时时，都把中国国家，民族，社会，在文化破产，经济落后，而又受帝国主义的列强，四面包围的今天，所真正需要的，应作的能作的是甚么，负起责任来做打算，不可只是说话，不负实际的责任，只出些题目，不作文章。第三，要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时时刻刻用眼睛看人民的疾苦，用耳听人民的疾苦，用一切心力体力和所能用的物质的力量，去替最受痛苦的人民做事，帮最受痛苦的人民做事，不可把“仁爱”两个字忘却了。第四，要青年们把民族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的真正意义，认识清楚。这些显而易见平正通达的道理，不单是我个人认为不错，我想只要那个人不是中了痰迷，也应该看得到这是很不错的理论。可是这些道理，何以到今天没有人说呢。如果说这些话是鱼在水中的“水，”人在空气中的“空气，”因为太普通了，人人意识的无意识的，都已经认识，用不着说。然而今天这许多道理，事实上却已经发生了问题，而且发生了大大的问题。说到这里，我想老老实实说一句话，季陶所指摘的事实，所焦心的困难，所看到想到的危险，所陈述的道理，在很多艰苦卓绝的同志们中，都早已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至今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的原故，我倒有一个比方。譬如旧家庭里面，由不自然的结婚，生出的夫妇关系中，有一种人，忍耐着许多不合理的痛苦，不愿意说出，以为如果说得来，更惹风波，而且外人听见很不雅相。于是天天“免淘气，”天天“受闷气”。这一种夫妇间的心理，和今天我们中国国民党里面许多真正爱党的同志们的心理，恰好是一样。“免淘气”和“免笑话”六个字，就可以把一切不能说，不愿说，不敢说的心理，都完全道出来了。就是季陶同志的心里，何尝不是如此。他本是一个很热烈的人，他的爱党和爱中国民族的感情之浓，也是许多人所承认的。我们看他去年沉闷了半年，今年正月一号，在商报上发表的那一篇“行路，”在无可如何的当中，只用一种纯文学的譬喻言词，写他十五年来历史的经验。那一种忧思深远的笔致，谁也能透过他所用的一切文字，去寻绎出他言外的意义来。去年和总理同到日本去的时候，他的日本报纸上所发表宣传总理性行的论文和谈话，今年半年当中，他在南北各处关于总理的思想和政策几十次的讲演，所选的那些题材，就如我前一段文字当中所指的那些题材，那一回不是含得有很深的意义。“共信不立，互信不生，”这两句话，他宣传了半年，假使没有这些困难问题，我想他在党内党外的思想运动，决没有行得这样热烈。他也要算一个很有点小脾气的人，假使他不这样忧思深远，去年以来，他对于那许多攻击他的盲动，决不会那样忍气的。所以我很能体察得出，季陶这一次，他竟自发出这一个勇气，把大家所想说的话，很诚恳悲痛地，说了出来，实在是时间和境遇，使他决定，“再不说没有办法了，”的决心。事业是“当大事，”地位是“孤哀子，”这两句话何等沉痛呵。至于“免外人笑话”这一个感情，是顾全大局的人，人人都有的心理上的弱点。仔细想想。事情是在很多数的人们间进行着，痛苦是由很多数的人们感受着，危险是尽管在那潜伏着，糊涂的人拚命的尽管干着，明白而有办法的人，即不敢讲，又不愿作，于是乎把手袖着，在指导地位统帅地位的人，根本上既没有办法，又被四围的小孩

子包围着，不得已只好是让激浪奔流把他卷着。在这样的境遇里面，只顾象妇人女子一样，因顾全大局而不说应说的话，听其自然，到得弄糟了的时候，然后叹一口气说，“谁错了，”“某事错了，”“运数到了，”这是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所应取的态度吗。更就我们的党来说，海内海外，全世界当中，散着几十万个党员，关于党的成败，国家的治乱，社会的安危，这样重大的问题，如果在指导地位的人，不把病之所在说出来，指出一条路，促起同志们的觉悟和一致努力，这可算是民主的集权制下的负责人的态度吗。如果要负这一个责任，除了坦坦白白地，求印刷术的救济而外，还有甚么办法。再说，中国旧日的习惯，本党人对于本党的事，不肯从组织上从策略上，下深刻的批评，而对于个人，却又会攻击。是专制政治，宗法社会下面养成的一种恶习惯。依然是一种私党的性格，不是民主的优秀集团分子所宜有的。从这一点看来，季陶所取的方法，所持的态度，我以为都是很正当的。并且我还要对全党的同志说一句话，季陶的这一个意见，是他在“政治的负责者”的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他既不是要攻击谁，也不是要排斥谁，他的主要点，是在全党同志，大家觉悟起来，对于这危亡的伟大民族的前途，切切实实地负起一个责任，把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方法去了，诚心诚意地，重新做起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三民主义信徒来。他最痛心的，是最富于革命性最能为民族开活路的青年们，不能作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真正的国民革命先锋，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自己不作真正负中国现实责任的人物，其结果会弄到只有向后退的人，才集于三民主义的旗下，使真正的改革事业作不起来。要想把时代推前，反而把时代拉到后面去，要想促成中国社会的快进步，反而把社会的进步阻碍着。所以他才就他的体验上，很诚恳地把他一切要说的话，通通说了出来。求中国民族至宝的青年，下一个深切的反省。如果要把他的意思误会了，以为是要排拒任何一派人，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如此，不单自己陷于更错误，而且真正是要逼到时代退步，逼到负责任的人灰心。尤其是一般所谓右派的人，在这时候，更要认清楚只有深切的反省，和实际的努力，是爱国爱民族的道路。如果在这时候异想天开，借着季陶的话来排斥真正为革命而努力的青年，忘记了季陶文中所述那十几年的苦历史，忘记了一个创国造党的父亲中山先生的的确确是被不革命的革命党人气死的事实，那就可叹可伤极了。“时代是前进的，人的眼睛是生在前面，永远向前面看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原则。抛弃了这一个原则的指示，立刻就失去了人的生命。

我的对于季陶这一本小册子的感想，大概如此了。我想在这一个机会里，把我自己的意思，说一点出来。我所说的话。虽是对于本党的实际问题的批评，却也是一般的关于集社心理，尤其是政治集社心理的研究。本党中所发生这许多困难问题，虽然如季陶同志文中所述，有许多很长远的，特殊的，历史关系，但这些特殊的历史关系，不过只是使现出来的现象，具备一种空间性的特殊色彩，而其根本的范畴，依然受一般的原则所支配，并不能有何种创造的差异。这一点在季陶自著的导言中，已经道破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了。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更具体的，切实批评一下，供给讨论这问题的人，一种基本的资料。大凡研究一件事情，分析综合的工夫，是万万少不得，而做分析综合的工夫的时候，最要紧是把对象的形体性质，都认得很真，一方面用的方法，尤其要完全是科学的。如果不具备这两种要素，只是糊糊涂涂，以观念的观察，下观念的判断，同时更根据这一种笼统的观察和判断，去定解决的方法，结果未有不错误的。即使靠自己的天才，和特别的机会，

观察，判断，解决方法，都完全的确了，也不过是一个侥幸，万不可为训的。至于是关系很复杂而情形很重大的问题，那就千万不可如此，本党的整理和团结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中国国家民族祸福的大问题，自然更不可不特别留意了。季陶同志，单从历史上研究出许多要点，指示出许多途径来，而不轻易下最后判断，也是这个原故。中国的人，一般是科学素养最缺乏，团体的训练最薄弱，逢着这宗问题，往往只是受历史的感情冲动，或群众心理所支配，而失却理性。因为方法错误，结果弄到“存好心，做坏事，”“种善因，受恶报。”即如现在本党的问题，从前那许多因抛弃主义而发生的团体分裂，那是“种恶因，受恶报，存坏心，做坏事。”的范畴。至于现在的纷纠，在CP的加入，和中国国民党允许CP的加入，都是好心，都是善因，结果在一般党的发展上看来，也是好事善果居多，何以在党内会感受这样大的困苦呢，单就季陶同志所指摘那些情形来看，已经可以晓得，是在方法有了错误。就一方面说，国民党重要的人，没有直接做训练党员工夫的机会，于是从最初起，关于党员的活动，尤其是宣传的活动，太过放任。不严格的以最高原则为标准，取缔党员的言论和行动，在意思上，渐渐失却集权的意义。在又一方面，中央关于组织和人才支配的事，完全和党的历史离开。本来，以一个和本党历史毫不相干，而又在两重纪律下面——中国国民党因为关于党员思想太过放任，所以事实上在他们只有一重纪律。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种种行为，实在只有社会的制裁，在无意识的上面，规律他们。——的人，担任组织的责任，就种种关系上说，都容易制造不平均的现象。因此之故，要把一般党员从非民主的训练成民主的一个工作，也就生出许多障碍来了。现在要改正以前这些错误，除了先极力做训育的工夫，就是季陶同志所说“造纪律”的工夫而外，要想一时把许多困难问题，同时解决，其结果恐怕更会因解除困难而反制造困难了。且把这些具体的事搁开，讲一讲结社心理一般的意义。本来社会的结社，尤其是带有政治意义的结社，必须有四种条件。

一、一个团体，必须有长久继续的事实和豫定，而在继续的当中，分子的交替，必须要能够保持历史的重心，使“继续的”这一个意识，在成员的当中，很明了而能确信。

二、必须要团体的成员，对于团体的性质，组织，机能，能力，分子与团体的关系，等等，具备很明确的观念和信任。这当中关于性质一项，尤其要紧。如果成员对于他所属的团体性质，不能明确和信任，团体的组织上，便会发生出破绽来。

三、常常要使他自己团体之团体的精神，能够发达。使团体的精神发展，具备最有利的条件，就要自己的团体和别的团体，在理想和目的上，有很明确的区别。而这一个明确的区别，时时要现出在团体成员的意识上面。所以一团体为保持或发展自己的理想和目的，而与别的团体竞争，冲突，是发展团体精神最好的条件。善于指导团体的人，他们一定留意在这一点。同时同地有两个团体同类的时候，决不使自己团体的理想和目的，和别的团体相混同。如果混同了，结果一定会失却存在的意义，或以并合，或以解散，而归于消灭。而性质带斗争性的团体中间，尤其是目的或理想最相近的，斗争最烈。有时为对付共同的敌人。一时联合，而在联合的当中，仍旧不断地斗争着，并且在领袖地位的人，自然会留意使他们斗争着，以斗争为防止同化的手段。只要看过去许多政治联合的经过，以及CP的人们，在中国国民党中所取的行动，就可以了解这一个原则，是自然的，而且纪律性严格的团体，尤其必然取这一种手段。

四、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要团体的成员这一种意识明了，然后成员与团体间，成员与成员间的相互关系，才容易决定。所以一个团体继续当中，新团体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如果要改良这一种传统性和习惯性的事项，必须要基本的团体分子为决定的要素，而且在决定的地位，团体性才不会动摇。

上面所述这四种要素，如果大家研究明白，把这一种必要条件作依据，来研究我们党内的问题，就很容易了然。季陶同志文中所指出的那些事实，有何等科学的意义，也可以清楚。今后要图党的组织完成，结合强固，应该要取何种方法，便可以从此打算出一个大体来，更有一件要说的事情，尤其是研究团体生活的人，所不能不注意的。大凡团体的成立，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内力组成的，一种是外力组成的。由团体的自由意志共同，而生结合，再由此结合而成组织，由组织而生规律力的，属于第一种。如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团体之类是。由外部权力的压迫，一部分之强者，利用自然的或社会强力强迫一部分弱者而组成的，属于第二种。如异民族统治下之国家，如佣兵，如以奴隶编成的军队是。必须要是前一种团体，团体精神，才能强固，才具备民主的组织之素性。后一种团体，除了用暴力压迫，禁止团体成员的自由和任意的交通外，差不多没有存在的可能，这是不用细说都明白的。

我们要整顿中国国民党，完成组织，巩固团结，不用说是要做主义的训育工夫。季陶同志常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这两句话，是一个根本要义。但是如何实现这两句话，必须要很清楚的，把上面所述四条件，一样一样，逐渐做全才行。

同志们努力，努力，奋斗，奋斗。

显微镜下之醒狮派

（一九二五年十月）

萧 楚 女

一 “国家主义的教育”！

“醒狮”第一期，平公论“内乱与教育的根本问题”，最后的结论说：“在无宗旨无气节之教育家之下无教育”，又，第二期，曾琦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说“国贼之种类”有（卯）朝三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未）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以“醒狮”自己所说的去衡量东南大学底教育，衡量郭秉文、蒋维乔等之为人；我想至少也总要承认在东大之下无教育，承认郭、蒋等是“国贼”吧？谓予不信，请看左舜生君在“醒狮”第十八期上“论东大事答客问”中说：“照我们底观察，中国的政党并没有侵入教育界，但教育界自身却是已经有了党了！他们避党之名，居党之实，把持教育机关，操纵教育团体，进一步，利用报馆，联络银行；再进一步，勾结军阀，假借外力；虚名所在，不妨让之名流，实利所在，必暗中飞跃，决不放过。”然而今年暑假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开年会，正值黄炎培系以教阀势力迫胁郑谦，使蒋维乔攫得东大代理校长之时；蒋怕他们——曾琦、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捣乱，连忙请他们讲演，表示愿聘他们为“教授”。当时有人叫他们审慎行动，以符“醒狮”二十七期上曾琦答覆东大学生李众华等质问他们被东大教授陈逸凡收买的话。（那原文是说：“本报（“醒狮”）根本企图，在‘矫正学风、廓请学阀’；同人对于学阀素有研究（！）颇知实力所在，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同人正在静观变化，研究学阀操纵把持之术（注意！）究竟如何……。”）左舜生却直劝李璜受聘，说“我们是受的东大的聘，与蒋维乔个人不相干！”（此语系他们同派的国家主义者穆济波先生当面告诉我的）于是九月十日“时事新报”“教育界”中在“东大教授除秉志、陆志苇……陈逸凡、徐则陵等数十人外，兹闻下期各科系又已聘得教授二十余人，均国内名硕……”之下，紧接着就有“余家菊”先生（教授教育概论等科）之名了：又“醒狮”第四十一期上载“国家教育协会”简章第八条说“本会会员对于本会有下列各种权利……（乙）于相当“机会”时介绍职业……。”

呜乎（这是曾琦先生的老调子）！“国家主义的教育”！

二 “有几个是实行家”？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八期上，解释他所主张的“国家主义的野战法”，并举出这些

野战法底“屡屡生了效果的”“先例”是：“同盟会在光、宣之际，对于满清便取这个手段！当时只有几十个铁血男儿不安于现状，认定满清非倒，汉族必无翻身之日。他们便不惜头颅，每省分几个去做锄奸运动。诸君当然记得徐锡麟，诸君当然记得唐才常，诸君当然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今天恩铭被炸，明天李准被炸，从北京以至广东，无处不有炸弹之声……辛亥革命只是几个人一哄，各省总督便纷纷逃窜，满清便逊了位。这个功是要归之于做暗杀运动的诸先烈，先把满清二百多年的天下弄成了个危局，满清多年豢养的走狗弄得‘谭虎色变’所以一闻武昌起义，大家便跑了！”李璜先生这种野战法，在我们不但不敢赞成——并且还要反对。不过李璜先生既然“算来算去只有这一条路才打得通”，若他能自己就去做这“锄奸”运动，我们却亦不能不予以一种客气的赞成。在一切的革命方法中，只有“暗杀”方法，要算是最简单而又最容易随着个人的意志去实施的了。他既然不要大的群众组织，又无须乎多的金钱设备。所谓“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只要实行者有一个“决心”便够！但是，李璜先生——乃至国家主义派主张暗杀的一切先生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该有几多“奸”？不说别的，只说李璜先生现在武昌师大教书，国贼萧耀南不就在他底眼前么？李璜先生说：“我不相信同盟会诸烈的精神至于今日便一点儿也不存在”！是的，我也不相信！李璜先生正可以“自身”去“不惜头颅”，为我们证实这个“不相信”呀！李璜先生！我们当然记得徐锡麟，记得唐才常，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将来或许尤其要记得你这个“李璜先生”！不过我们却在单纯的记得之外，还记得徐锡麟、唐才常，以至七十二烈士们，在他们尚未实行暗杀之先，并没有像李璜先生这样大贴仁丹广告。李璜先生！革命是危险的，它不但要牺牲博士饭碗，而且还要牺牲学者底性命；他并不像“法国文学史”可以随便谈谈，由你提倡一个什么“未来派”、“大大派”就可算事的。呼喊革命呼喊暗杀的人，应该站在革命暗杀的尖兵地位！像李璜先生这样居在武昌，眼望着萧耀南摧残武汉爱国运动，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作伥——眼望着“强权”“国贼”张牙舞爪，却连攻击他们的文章都没有做过一篇在“醒狮”上发表，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拿出去与国贼一见！暗杀！锄奸！所谓“以知识阶级为中心领导的全民革命”原来就是如此！“醒狮”第二期，李璜先生底同志灵光先生说得好：“中国目前不少新文化大家，乃至主张什么主义大家，说来都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结果一般青年都被他弄得一蹋糊涂。我在各种诗文乃至演说中读过不少……“推倒军阀、暗杀、手枪、炸弹”一类的话；但试问作过这些诗文，乃至于说过这些话的人，有几个是实行家？自己不去实行，只是空口说白话；那么他的主义，他的主张，再如何正大，他的方法，再如何良好，又谁肯听他的引导呢？”我们希望李璜先生，好好地接受灵光先生这个教训！我们“俄国走狗”静待李璜先生为我们排演他自己底拿手好戏——锄奸暗杀！我们晓得现在有许多安那其也正在那里闷气不做声的主张暗杀；所以我们又希望醒狮派尊重自己，不要待得人家做出来了，却引为是“‘醒狮’销数达到一万余份”的效力！

三 曾琦自己打耳刮子——甘脆而且响亮！

“醒狮”第七期，曾琦在“评国民党对于时局之宣言及其态度”中说：“该党之所标甚是，而所行则非，手段往往与其目的相反，历来之失败在此；吾人实为惜之！窃以为该

党果欲实践所言，则对内宜与一切军阀断绝关系，而专力于民众之组织；对外宜与一切列强断绝关系，而丝毫不假外援。换言之，即实行吾人（注意！）夙所主张之‘对内的非妥协主义’与‘对外的非亲善主义’是也。”但曾琦老先生却又在“醒狮”第三十五期“外抗强权之战略”中，列举抵抗强权之方法：

（甲）抵抗武力侵略
- ……………………………………
- （B）
  - （一）认定大敌，先排一国；
  - （二）联络与国，以夷制夷；
  - （三）帮助弱小民族以厚我声援；
  - （四）勾结敌国在野党以扰其内部。

然而曾琦先生在“醒狮”第三十七期“国人宜断绝两种无聊的希望”中，却又说“若夫希望外人仗义，尤为无聊之极……吾人只能冀各国因利害冲突而互相牵制，万不可呼将伯于列强，希望他人之仗义，而转自懈其同仇敌忾之心也！至于各国之‘劳动党’、‘社会党’与夫二三文人学士，偶有发表同情于我之言，亦不过‘秀才人情纸半张’，实际并无大效……断不能坐待敌国‘在野党’之援助……惟有努力从事于……‘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切无聊之希望，愿与国人共绝之也！”

四　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

“醒狮”第四期，陈启天先生的“醒狮运动发端”中，说“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何种职业的国民均可一致趋赴，协力图强；否则阶级划分，争斗益烈，国内混乱时局无由廓清，而国际干涉的惨祸终难幸免。”“醒狮”第二十三期，陈启天又说：“我以为对内应否和衷共济，当以国人是否破坏国家的统一为条件……不破坏国家统一的，就与他和衷共济；破坏国家统一的，就不应和他和衷共济；那就是说应‘内除国贼’……。”醒狮派以这么正大的理由反对他人主张阶级斗争——说他人主张阶级斗争，是分散了国内革命的力量——自然是对的！然而又岂奈那“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的各种职业的阶级，却故意地要和醒狮派捣乱，要故意地不“一致趋赴”，不“和衷共济”何？请看醒狮派同志自己怎么样说：“醒狮”第十四期张介石先生说：“大商则不过于持筹握算以外，犹能交结官府，送旧迎新而已！至于对于外资之跋扈，政府之凶横，则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而已。”这已足证明在“国家”这个标的之下，各阶级并不能“一致趋赴”。而“醒狮”第四十三期，胡瑞荣先生致“慕韩兄”的书中说：“中国人缺乏革命性，安于守旧而惮于破坏；可与乐成而难与图始；而尤以‘绅’‘商’阶级为甚！此两阶级在社会上颇具势力，常能指挥其他之各阶级而与军阀妥协。故人民虽痛恨军阀而不能与之反抗者，皆此辈在其间作缓冲也。故我辈今日欲‘除国贼’，宜先向两阶级劝导，使其向军阀绝缘。若不听命，则向其进攻，先去军阀之爪牙，然后易于打倒也……。”则更是明明白白说绅商阶级底实质，是个“破坏国家统一”而不能“和衷共济”的东西——主张在他们不听劝而又不觉悟时应该“向之进攻”了！然而曾琦先生却要说：“惟吾人所异于共产党者，即该党主张‘阶级斗争’，绝不容有绅商阶级存在，吾人主张‘阶级合作’，苟彼等而能觉悟，断不绝人为善耳！”原来醒狮派在绅商阶级不听醒狮派之命而与军阀妥协破坏统一之时所下的“进

攻”，却不叫做“阶级斗争”而名为“阶级合作”！假使今后有人专来提倡醒狮派的这种“阶级合作”，不知醒狮派还骂他们是受了俄国的津贴——或者月给十七元（其实，月给十七元五角也未必不可，醒狮派乃调查得如此清白。）或者岁支三十元——的作用否？好！这样的“阶级合作”，当然是可以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存在的，而且也是在国家主义旗帜之下必然应有必然不免的。原来醒狮派和“俄国走狗”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醒狮派不敢用“斗争”这两个骇人听闻的名词，而易以欺己欺人的“合作”两字罢了！至于说共产党虽“绝对不许绅商阶级存在”，其实共产党也并不是不容许这样的人存在，正如醒狮派所谓苟彼而能觉悟，断不绝人为善一样。共产党之所以要以阶级斗争去消灭一切阶级的目的，也正是为的要把全人类弄成功这种的“人”呀！譬如俄国帝制时代的许多绅商阶级，有的自甘放弃了绅商阶级的生活（即破坏统一的阶级性），已经不是绅商阶级，所以现在都在俄国国内当着快活的共产社会之一分子；有的仍然尚不能有曾琦先生所要求的那种“而能觉悟”，依然还坚持着绅商阶级的人生观，所以就被俄国现政府仿效了曾琦先生底办法，所谓“在彼等未彻底觉悟，完全与军阀（帝制和外国帝国主义）绝缘以前，决不停止进攻”。所以就有许多“白党”流离在外，要惹得胡国伟先生远从巴黎写信者给“醒狮”第四十一期，说“有一俄国难民，携一幼妹，逃来巴黎作工，每见华人，便泣告以：‘其家九口被中国红军杀死者七’了！”（至于这难民底话是否属实，可以不问；好在他是反对赤俄的人，所以大概总是实在的！）

五　左手之矛直攻右手之盾的醒狮派（一）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八期中，主张“我们决心要革国内军阀的命，国外洋大人的命。……唯一的下手办法，便是靠群众力量，得着多数的分子，怀一致的理想，抱一样的精神，去与军阀和洋人‘野战’，先使他们应接不暇；以致他们内部造成了恐怖现象，然后我们才说得上夺取他们的政权。”他底“野战法”，便是象他所举的“先例”——那些徐锡麟、唐才常所行的手枪炸弹之“暗杀”。然而灵光先生却又在“醒狮”第十八期上说：“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那些保护洋人生命财产的神圣条约当然也包含在内），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之后，再来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一个国家主义者，要我们学暗杀家徐锡麟，去造成洋人的恐怖现象；一个国家主义者，又要我们学“外崇国信”的段祺瑞，谨守奴隶卖身契上所写着的死亡命运！但“醒狮”第五十期上，却又特载一篇“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告国人书”，对五卅案提出十二条件，内有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收回海关主权，撤废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与割让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灵光先生在“醒狮”二十三期上说：“我们所主张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对内，而不是即时主张什么反帝国主义。现在有许多人主张反帝国主义，谓一切军阀均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但我要问一句，我们现在即行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有得胜的希望没有……故我以为反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办法，是在于先剪帝国主义的爪牙；而且内政不清，未有能够对外的。”是的！“剪除帝国主义的爪牙”；“先清内政”！但曾琦先生却比我们看得清楚：“是故军阀只能害国……其背后往往（注意！）各有外人之势力在，

方且（注意！）假外力以固地盘。”是的！“先清内政”！主张反帝国主义的，都是俄国的走狗，“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请看你们这些不愿“老等世界平民革命”的非俄国走狗，怎么样去剪除那“方且假外力以固地盘”的帝国主义的爪牙！

李璜在“醒狮”第一期释国家主义中，说马克思以唯物观念解释“国性”、否认国性的说法太简单了——所以他底结论就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地步。这是指马克思不该说国家是从人类经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为此一胜利阶级用以治服其他阶级的工具而言。诚然，马克思这种唯物的说法，在唯心的李璜先生，当然是要痛恶的。然而李璜先生在同一文章中，却又说近代的“国性问题的显著，一半是由于拿破仑的压迫，一半还与当时的文化程度与交通的发达有关系，然后方才真正认识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在李璜先生，或者对于“拿破仑压迫”、“文化程度发达”、“交通发达”，都不认为是“生活”、是“物质环境”、是“经济”吧？其实，因为拿破仑压迫和文化交通之发达，使民族间产生了横的“分地而食”的国家观念，与因为资本生产制掠夺剩余价值之压迫，和文化交通及帝国主义争霸市场之纷扰的发展，使阶级间产生了直的“阶级革命”的必然事实——都是一样的一部无机的社会进化史之开展！

“醒狮”第二期曾琦说：“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但他却又在第三十五期上，主张“勾结敌国在野党以扰其内部。”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既是自保的而非侵入的，那便当然与欧美各国之国家主义不同。欧美各国之国家主义，是要在国家主义之上以军阀主义建立帝国主义的。所以刘文海就译帝国主义为“大国家主义”（他怕用帝国主义犯了俄国津贴的嫌疑）；所以就惹得余家菊先生急的面红筋涨汗流赶忙去骂刘文海，辩白说国家主义不是帝国主义。然而陈启天先生却在“醒狮”第四期上，偏偏要说：“我们深信现在的世界虽异说横流，而主要的思潮仍为国家主义。英、法、日（注意！）三国固是国家主义弥漫全国；即美国的国际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也都是国家主义在背后作主。”

李璜先生在“醒狮”第四十六期“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势及中国问题”中说：“事实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无所谓‘国际的’帝国主义，在他们利害冲突彼此吃醋之中，我们大可利用外交手腕，暂时联络法、美以抗英人……因此我们反对共产主义者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老等世界平民革命，否认外交的功效。”但他接着在下面却又说：“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全体一心自强自卫才能解决；亲日、亲美和亲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固非解决之道……。”

曾琦在第七期“醒狮”上说：“对外宜与一切列强断绝关系，而丝毫不假外援……即实行吾人夙所主张之对外非亲善主义。”李璜却又反对共产党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要讲求“外交的功效”！

六　左手之矛直攻右手之盾的醒狮派（二）

陈启天在四十四期“醒狮”上说：“合全国国民力量去打倒军阀，摆脱外国的压迫尚恐不足，那有余力从事于世界经济革命？空呼几声打倒帝国主义，不惟表示国民浮浅无知，

对于国事没有相当的步骤，反足引起外人的嫉心一致谋我。”原来“摆脱外国的压迫”与“打倒帝国主义”不同。原来在现在的世界情势中，要求中国从列强压迫中解放出来，要求中国从欧洲资本主义共同经营的“市场”地位上得到民族独立，还不是一种对于世界资本主义而行的经济革命。原来列强之“协以谋我”，乃是自从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之后才有的。原来因为怕列强协以谋我，所以就要驯服承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所以就要甘让帝国主义者存在。“我们没有余力去打倒帝国主义”！但不知醒狮派所羡称的土耳其之革命，是否就是一种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但不知现在正在撑持中的里孚人，是否也是在那里打倒帝国主义？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因此引得列强协以谋我！但不知“辛丑和约”是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结果？但不知华盛顿“九国公约”是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结果？

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的人是浅浮无知，只有作那：“初由小群合成大群，合大群而成部落，后渐扩为市府，再扩而成国家；国家者，乃讲自卫谋生存发展之较大的团体也！”的论文的人，才是真正深厚有知。

“醒狮”第十八期，灵光先生主张“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后，再来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于是他便断定：“我们的革命，只要不与他们所（？）一致的利害冲突，他们因为彼此的态度不能一致，对于我们的革命，绝对（注意！）不会伸手干涉，这实是我们肃清内政的好机会。”这是灵光先生底大发明，我们自然只有尊重。但请看！“醒狮”第七期郑伯奇先生由日本写回来的信：“这回奉军背后有多少日本人？奉军危急时日本浪人（都是参谋本部和陆海军省的御用走狗）怎样着急？东京的国民大会就是这些军阀和军阀走狗一种恐慌的表示……冯玉祥的内应，把山海关的胜仗弄得首尾颠倒，一百四十万元的本钱，可以使冯玉祥唱这幕戏，毕竟张作霖是老手；‘大阪每日新闻’说价钱便宜，日本出一半，也值得……。”“肃清内政的好机会”——“只要不与他们所一致的利害冲突”——“只要遵守一切既成条约”！灵光先生的新发明！

七 李璜在法螺中认亲戚

在每期的“醒狮”上，总少不了有一篇“呜呼！共产之祸也！”的“哭头”。依照他底说法，现在的俄国，是比十九层地狱（？）的情形还要坏一万倍。“共产政治”在俄国已经差不多象杨梅疮要冲上顶了——谁一靠近它，便是谁当宣布“死”的到来了！然而李璜先生吹法螺，却又要去拉这个洪水猛兽不可响迩的共产主义俄国——即醒狮派朝朝夕夕孜孜汲汲生怕他用了阴谋以十七元一月买收青年赤化了中国的那个俄国——以为重。他说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承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必要，大声么喝着：“总之，在这暂时，我们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已经取他们（俄国）的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代之了！”（见“醒狮”第十五期）我记得“阅微草堂笔记”上，说有一户人家，因为要旁人相信他的家世高贵，在他的母亲出丧时，写了一个长铭旌：大意是“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总督××等处××大臣隔壁豆腐店王奶奶之柩”。李先生硬要在一般素来没有留心到经济学，没有把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加过详细分析的醒狮

读者之前，说列宁是李先生的“老表”，说俄国是醒狮派的“外家”，自然谁也无法干涉。不过俄国现在所行的，既然已是被你们“取而代之”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你们所朝夕梦祷祈其实现而不得的国家主义；那么，中国人就都去受了俄国的十七元的津贴，立时把全部中国弄得“俄国化”，又有什么不好呢？“醒狮”上正应该另辟一栏，专门宣传那由你们取而代之的俄国新经济政策，而题其名曰：“风起云涌之国家主义的团体”；再在下边系以注解，说：“方今之赤俄，亦吾国家主义之一团体也！”（此注解最好请曾琦先生做）李先生！你不要太夸奖俄国过度了！小心你们所不愿打倒的——不敢去打倒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在背后也把你们注入“红籍”；使得你们自从在巴黎和任卓宣们斗气到今，努力要把自己藏入“黑籍”的工作全部毁弃了！并且，一旦沾到了红的色彩，是最危险的——第一，恐怕你就不能再在大学当教授支薪水了——因为在资本主义伦理观尚未改变的时代，是不容有和共产主义的俄国做亲戚的博士的。

李璜先生说现今的俄国就是行的他们底国家主义的国家；这是在拥护国家主义的方面，在要人相信国家主义的时候说的。曾琦先生在暨南学校讲演，说：“故今日俄国所行，乃一种社会政策，非共产主义也”；这也是在要人相信国家主义和要人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时候说的。但在别的时候，俄国又变成了罗刹海市、夜叉之国。嘴是两块皮，只看资产阶级的工具们，喜欢如何说便如何说——只要有利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要拥护的阶级。

八　醒狮派的逻辑

曾琦在暨南学校讲演，说：“则试问铁道国有制度，非共产党之所企图乎？而在中国则铁道国有之结果，乃为交通系所把持，无异于梁士诒之私有；此岂非道德不发达，不足以行共产之明证耶？”我现在谨效曾先生之方程式，为读者另说一段如下：“德谟克拉西之议院政治，非醒狮派之所企图（者）乎？而在中国则议会政治之结果，乃为安福系及贿选猪仔所把持，无异于段祺瑞曹锟之私家宅舍，此岂非道德不发达，不足以行国家主义而仍应度其原始的部落生活之明证耶？”

曾琦在同文中又说：“盖欲试行共产主义，须（一）国防能力充足；（二）国际关系简单。”国际关系简单之国，却还需要国防能力充足；国防能力具备充足之国，却又能够使国际关系简单——这只好在柏拉图所著的书中去找；在眼前这个资本主义交互综错的世界上实在找不到——有之，或则在曾琦先生之脑中。

曾先生又说：“孔子圣人，当年未七十以前，固犹无资格以参与无政府之社会也；吾辈常人，更何望哉！”依曾先生，则是无政府社会者，一群斩斩齐齐的耳聋眼花七十以上之“圣人”集合所也！以此人世间绝对不会有之条件，驳倒无政府主义者；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宁有不心折而转入“吾之国家主义”者乎？

曾先生又说共产主义必须的精神条件有二：“（一）共产观念普遍，必全国了解共产为何物，然后可以实行无阻；（二）公共道德发达，必人人奉公守法，然后分配可得其平。”难怪李璜先生向人说：“我们以两年为理论时期，两年期满，再谈实行。”我初以他们必须两年为奇怪，为什么一年三百六十四日都不可以实行？原来他们是照他们在法国得学士的办法，是要有那多日子，才能毕业！可惜火星相隔太远，不能让我们遵着曾先生

之教，将中国四万万同胞暂且搬到那上面去授课，待得人人了解共产，娴习法度之后，再回地球上来实行共产。但我也有一句话忠告曾先生，便是你们的国家主义理论时期，只定两年，恐怕太短。如果真要照曾先生所说先须使得人人都先明白国家主义，那末，虽然不必如孔子参加无政府社会，须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至少怕也必须至“四十而不惑”吧？我的“论语”没有曾先生记得熟，还是请曾先生自己酌量！

九　一半儿空想一半儿妄

沈怡先生在“醒狮”二十一期上，写信慕韩先生说：“弟尝用空想，苟能组织一旅行团，尽捆载（小心这两字把人当了‘物’，落了唯物主义的窠臼。）今日国内争斗不已之军阀以西，使之周游各国，略睹他人进步奋斗之状，则至少可以换新几个头脑；更组织一旅行团，尽载今日为‘共产’‘大同’之说所惑之青年，使之周游各国殖民地，稍领略弱小民族之苦况，至少当有一半可以醒悟。惜哉，其不可能也！”我们对于沈先生提议的后一半，非常欢迎。假使能够实现，我相信沈先生底主张可以帮助中国赤化加速，比俄国“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力量要更大一百倍。对于前一半，我们只好忠告沈先生在那些游历各国的军阀归国之前，沈先生须先将家眷行李及祖宗坟墓搬出中国为妙——因为留学归来之武博士，比现在的将更会“爱身”——自然他们也很爱国，譬如游历欧洲的徐树铮，便时常有爱国的文章，而且有反对俄国的文章，在“申报”上发表；自然他底头脑是“换新”了不少！

十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问题”与醒狮派之原形

曾琦先生不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醒狮”第二期上说：“今世界亦但有‘英吉利资本帝国’，‘法兰西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日本资本帝国’；无所谓‘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何则，彼等之利害冲突，固无日不在暗斗之中也。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按曾琦先生在“醒狮”三十四期上说“今日俄国所行，乃一种社会政策，非共产主义也。”）发出，彼以共产之眼光观察世界列强，根本制度相反，自宜视为一丘之貉……。”原来现在的“列强”，在非共产主义者曾琦心目中，还不是“一丘之貉”。原来因为日、法、英、美时时冲突，所以就只有某某资本帝国，而没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但不知在临城案中，提出一致要求的，是不是那些曾琦所说的非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亦但有某某资本帝国”的日、法、英、美？但不知“彼等之利害冲突”，有不有时候也可以“利害一致”？但不知我们所常用的什么“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政策”这些名词中的“国际”字样又如何解释？大概也是那“实行共产主义的苏俄”硬造出来，乱加上去的吧？有国际贸易而无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唯一的原因便是国际贸易的名词不是苏俄发出来的，所以就“有”；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名词是由苏俄发出来的，所以就“没有”。

醒狮派底唯一口号，是“外抗强权”。但“醒狮”第十八期上却说：“在革命期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之后，再来收回一切主权，取消

一切不平等条约。”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一样的。“照旧遵守一切既成条约”！这便是醒狮派“大无畏”的外抗强权！难怪要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俄国用钱买了我们来作祟的了！十八期“醒狮”上又说：“我们现在即行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得不得与外国宣战？我们于实力未充足之前，我们即行如是，我们有得胜的希望没有？”原来醒狮派是“有”实力“外抗强权”而“没有”实力“打倒帝国主义”的。原来“打倒帝国主义”，并不是“外抗强权”之一种。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方法不同的——他们虽“抗”，却不致于像打倒帝国主义者那样要弄得与外国宣战的。原来凡一说到打倒帝国主义，那是就须与外国宣战——若不与外国宣战，就不能算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只说着玩而不实行的——因为他认为现在还是应当遵守一切既成条约的时代。原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得胜的希望，所以就只能说“外抗强权”，而不能说“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朋友！李璜说我们在中国提倡共产主义是太早了！你们现在“于我们实力未行充足之前”，即在“醒狮”上大吹大擂的“外抗强权”，不也太嫌“早”了么？

曾琦先生说（“醒狮”第二期）：“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外国人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要去打倒他所用的这个“主义”，逼着他对待我们另换一个“主义”——何至于就是“干涉他国内部组织”？照曾琦的“宋襄公主义”说，那末，我们对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所行的“资本移植”政策，也不应当反对了！因为“资本移植”政策，就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具体表现得最露骨最厉害的一种侵略，我们若要去反对他，那便是去“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了！呜呼！醒狮派的“外抗强权”！外国这样来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把我们桎梏得连气也出不来——上海、广州、汉口、重庆、南京的同胞，让他们用了达伊尔主义任意屠杀；我们还不应当去“及汝偕亡”地向帝国主义进攻！就是去干涉他国内部组织——干涉这些压迫我们的仇敌的内部组织——譬如鼓动他们底下层阶级（平民）起来推翻他们现在的这种以侵略我们为目的的政府，又有什么在道德上不应该的处所？因为要避免干涉他国内部组织，遂并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也要反对！仁义哉！这大概便是余家菊所谓“无入而不自得”的“本国历史中的好东西”吧？这大概就是醒狮派说我们不应骂倒他的“东方文明”吧？呜呼！醒狮派的“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然而曾琦先生在“醒狮”三十五期上，却又叫我们抵抗强权要“运用外交”；而运用外交时，则可以“援助弱小民族厚我声援”，“勾结敌国在野党以扰其内部”！原来援助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以及“扰其内部”，都是和因要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而“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不同的！可怜的酒醉头脑！

曾琦又说：“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何辞以对？”杞国的天要塌了！怎么禁得曾先生不如此耽忧。然而试问曾先生，我们可不可以当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压迫我的国家出来之时，暂且说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等到有了那个国家出来时，再提甚么别的口号呢？又试问曾先生，就是你自己承认的那些“英吉利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也应不应该打倒呢？依你的，纵然没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却已有了某某国家的资本帝国主义——现在我们就暂且将“国际”两字取下，单只留一个“打倒资本

帝国主义”，你还反不反对呢？外抗强权的醒狮派！你们不但拥护资本主义，而且拥护帝国主义！你们反对“打倒资本主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俄——一脉相承，都只是为了你们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的轿夫。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实现世界经济革命，都是从根本上铲灭资本主义的现制度的，所以你们要拚命的反对。什么国家主义，什么反对俄国赤化中国，什么“呜呼外蒙”，什么“外抗强权”，什么“实力尚未充足”，什么马克思学说并不真确，什么阶级斗争分散了革命力量，什么在国家主义之下，各种职业可以一致趋赴，什么“共产党人受俄国津贴”，什么俄国强捕中国使馆人员，什么“新俄祸”，俄夷马踏中原，什么俄国要把中国并为苏维埃联邦之一……拆穿西洋镜——只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一点“褊心”在那里作怪。更精粹一点说，只是拥护资本主义的那一片赤忱——那一片不可告人之隐在肚子里作“发条”，使得百代公司的唱片背出响亮的“哭灵牌”“请宋灵”来。超麟同志在“中国青年”七十二期上说：“醒狮”知道“有系统地提出所谓绝对的国家主义来抵抗共产主义”。这话未免太恭维他们了！他们那里能够有系统？我们只略微在这五十期“醒狮”中一加检查，便已找出他们无数的矛盾，简直千疮百孔。不过他们能够不顾前后，随口乱咬地始终作那拥护资本主义的工作罢了！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意国法西斯蒂……都还要去找一个一贯的逻辑；而他们却不顾这些，一个人说的话可以完全两样，可以前后完全相反，这是他们横绝宇宙的特殊精神！日本的贵族反对“相续税”，还能找出一个“歪”的理由，说：“家族是日本的特色，因为家族发达起来，所以今天日本才成世界无比的最良国体；若是想推翻家族，就是想和推翻日本国基一样。”（见小川乡太郎著“社会问题与财政”，译本第二百零四页）可怜他们连这种日本贵族都不如！然而他们之所以竟至以如此之意气，在那里背诵留音机的根本原因——还是要怪我们共产党人自己不好。李璜在武昌师大向一个四川人周君说：“我们所以要如此，都是由于他们硬逼出来的！”曾琦李璜在巴黎时，办一“先声”周报，时发学者式的政治经济学说，尤以曾琦好谈天下大事。我们底任卓宣、伍豪几位同志在“赤光”杂志上，偏要时时去指出他们的谬误，纠正他。尤其是显得曾琦底那支“新民丛报”式的文笔和他那两大传统思想——即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益发难堪。本来一切博士们都是要找一个幌子来谈一点“什么”的。譬如胡适谈白话文，黄炎培谈“职业教育”，陶知行谈“平民教育”，江亢虎谈“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乃至舒新城谈“道尔顿”写信给柏克赫斯特女士。任卓宣等硬要损伤曾琦先生们的这种“将来发展之伟业”，损伤他们的“自尊心”；自然他们就不能不纠合团体来专与共产党作对了！其实说他们本来就有心拥护资本主义，也是冤枉。不过他们既与共产党有了生活上的仇恨（恕我对于唯心派的你们用了这种唯物史观的句子），遂不能不走入那一条路；遂不得不与一切反动势力（凡足以帮助他们而致共产主义以多少之打击，使他们可以出气的——譬如下至张德惠等之言，也不惜引以为重。）相联合罢了！可怜的怯懦者！有勇气的，尽管说：“我拥护资本主义，我承认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应该存在——所以我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好了！可怜你们却又要在表面上承认寡妇应守贞节，而专门说些：“俄国月给十七元或岁支三十元”的话侮辱人类，同时也侮辱你们自己！其实，你们只单说共产党得俄国金钱还不得力；你们应该说共产党挖小孩的眼睛，把女人倒吊起来轮奸，吃死鼠，尿屎不揩屁股，以人血当

酒饮……等等像天主教神甫在欧洲募款时，在影片中形容中国人野蛮的那样。

十一　请看醒狮派之“诚实”！

李璜先生说：“每逢国家有了外患，或被人凌辱，或被人侵犯，则欧洲人无论英、法、德、意那一国的国民皆不能一日安于故常；很规律而且熨贴的一日三餐，很温柔而且美艳的少妻稚子，沙发椅何等舒适，比雅乐何等悦耳，皆一旦舍去而不顾，置身战壕，饱受炮弹，十人而九死！”（“醒狮”第二期）他这话是要用以证明爱国思想在人类界是普遍存在的本能。但我们要请读者想想那些旁边打有圈圈的字样中，到底含有多少的“诚实”！

又说：“贵族阶级在今日欧洲，最穷而无实力，然在乡城则尚居各阶级之顶；其次始为所谓大绅士，即大农主大实业家；复次为……所谓小绅士……最后乃工人。以最末一级之工人比最高一级之贵族，则工人之所入往往比贵族为多，以小商店伙比之官中执事人，则其经济生活亦前者远过后者。但贵族之女，无论如何不愿下嫁工人；而官中执事人虽终岁劳苦，无有存储，而总鄙小商店伙为贱业。并且不但同在军中奉职之士官，出自行间者与出自学校者，乃有阶级的蔑视；即在乡村共同作业之农家，出自旧家者与来自远地者亦有阶级的等差。同是工人，做细工者，每鄙粗工；同在工厂，为工头者每鄙杂役。凡此事实，皆非一经济观念为之中心，而社会习惯与知识等差在在足以助成阶级的歧视。若果主张阶级斗争，则凡此等等皆足为战争之端，何独只取大绅士与工人之对立状况，而尽弃其他？”（“醒狮”第十七期）他这段话是要用以证明阶级之应当存在，为人间天然之事实。我们除了请读者注意字旁有圈的地方，含有多少诚实之外；还要请注意他：为什么不把工人的收入与次一级的大绅士——大农主大实业家相比？又为什么偏偏不用“大资本家”而故意要用“大绅士”的名词？贵女不嫁工人，官中人鄙小商店伙，是人间道德上应当认之为“对”而予以维持的么？所谓“社会习惯”，是不是由于人类之经济生活逐渐演变而成的呢？知识高下，足以助长阶级歧视——是不是凡是贵族大绅士都是“智”者，而凡是工人小商店伙都是“愚”者呢？因为细工鄙粗工，工头鄙杂役，遂连工人反抗资本家掠夺的阶级斗争也不应该有么？一般所谓“阶级斗争”，到底是指的经济上的平等要求，还是指的知识上的平等要求，李先生大概久已明白——为什么要故意地将知识问题扯来加在阶级斗争中，诬赖主张阶级斗争者是主张知识平等呢？是不是因为知识不平等，就当承认经济也应该不平等——愚者是应该受智者之剥削虐待而过牛马不如之生活么？阶级歧视之观念，如军中士官学校出身者鄙视行伍出身者，到底是那士官底先天本能，这是由于社会的生活环境之暗示与资本主义化的教育之结果呢？打倒了经济上最不平等的资本家阶级，举一切社会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教育目的、文化制度而变更其根本之意义与鹄的，试问还有什么“尽弃其他”的足以使人受罪的阶级存在？（知识阶级和伦理的父子兄弟阶级之存在，是不要紧的，因为这些阶级本身并没有一种工具去掠夺他人，吸他人之血养肥自己。）

余家菊说：“共产党人受苏俄经济的援助，更以金钱收买学生……‘于是’强迫各校长予以宣传之自由，致送各教员以早行入党之威吓。偶拂其意，便下令各该校中之党员，

鼓动风潮，伺机爆发，或则捏造谣言毁损对手方之人格，或则乘势掠取对手方之位置。此种现象，'吾'于武昌目击而身历之，于各处又'耳闻'之，其为全国之'耻'而非一地方之'羞'也必矣！"该有多少诚实？今后，凡一教员因无能，因与他人不和，因拙笨而不能战胜狡猾政客式之学阀，因不为学生所喜而被驱逐时——都可以说是"俄国津贴的共产党作祟"！大概北京女师大、南京东南大学以及一切的学校风潮，都与加拉罕有关——都是俄国使然。"吾……于各处又耳闻之"！二十一条之外，又有此"而非一地方之羞"的"全国之耻"——余博士的新发见！但李璜说："我们绝不回骂你们共产党受了俄国人的金钱运动……"——该有多少诚实？

李璜说法国工人反对法国共产党主张国际公道，不许法国占领鲁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讲国际公道不是在今日，至少要等到德国赔款来把我们法国北方战区修复以后，说什么各国平民联合便有希望，如果德国老是这样赔款不送来，煤炭挖不来，我们生活便老是这样昂贵，工厂便要关门！"这个工人的口气，十分活像法国煤铁资本家，十分好像法国政府。可惜李先生没有替我们记了姓名，告诉我们在那一地那一时说的！该有多少诚实？

又说："请看上海的外国人，有几个是资本家？上海那些洋人在本国都是以劳力卖钱的；最多的是修理机器的工人和商店雇工。一到中国来，工资有加，红利有加，不几年他们便丰衣足食了！"这是要证明侵掠中国的，并不是洋资本家而是洋工人——证明在中国并没有洋资本家，也就没有资本帝国主义！该有多少诚实？

又说："现在欧洲平民家里，比我们中国缙绅家庭还要阔绰得多；一个机器工人，平均一天有六七元进款，回家坐的是沙发椅，睡的是钢丝床，吃的是大酒大肉。他们天天在看日报，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所以能增进，便全靠他们的资本家政治家能够在殖民地和中国找到了制造品的销场（李先生这句话可以作为教训曾琦使他了解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材料）。他们并且知道由某种机会，他们的资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国赚的钱是很多的时候，他们便用罢工的手段，去叫资本家增加工资与红利；所谓利益均沾，不肯放松一步的。"原来如此！该有多少诚实？"请看在上海的外国人有几个是资本家"和"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资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国……"这样的句子排在一篇文中——该有多少诚实？外国工人的罢工，原来也是侵略中国的——大概李先生是叫我们知道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须得先将各国工人阶级消灭；或是要使得各国工人阶级甘心驯服不向他们底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红利，然后才行吧？该有多少诚实——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掠夺者的辩护士！

又说："生老病死苦这五个字，在我们中国谈起来，很是可虑可悲的；而在他们（李先生所认为已行国家主义的欧洲各国）国里，自从有了国家主义的社会政策，简直便不成问题了！"该有多少诚实？

曾琦答覆章书谦君说，反对共产党的文字，不必向外翻译，因为是"不足为外人道"。诚然，诚然！这样的反对共产党，当然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不翻为是，因为此乃"全国之耻，而非一地方之羞也！"

说谎为人生第一可耻事，而醒狮派恬然为之！

十二　谁是“以人当物”？

陈启天先生说（“醒狮”第四十四期）：“共产党人过信唯物史观，只将人当物看，所以完全缺乏人味！”我们——共产党人——要求以阶级斗争，消灭一切的阶级——不许那一个人利用那一个人以为获得生活资料之资——反对资本家驱使工人，把劳动当商品，把工人当器械用。醒狮派反对我们主张阶级斗争；承认经济上的不平等阶级应当存在。到底谁是以人当物？到底在谁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是“缺乏人味”？陈启天说共产党所谓劳农专政，是“与尚贤的旧思想冲突”；“醒狮”上又主张“蒙贤治蒙”。在你们底“尚贤政治”下，试问又有多少“人”在你们心目中而不当做“物”看？

十三　什么是“本国文化”？

陈启天列出一个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表，说国家主义是“拣选本国文化”，共产主义是“推翻本国文化”。“醒狮”上又再三讥弹共产主义说“中国文化只有小脚与辫子”这句话为蔑视自己的文明。我们不懂所谓本国文化究是什么？所谓本国文化，当然是本国所特有的文化。我们在中国所有的文化中，打起灯笼找遍了，也没见在小脚与辫子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我们引为光荣。列位不相信，就请听国家主义派的同志，恽震先生在第二十一期“醒狮”上说的：“我不甚懂得所谓‘东方文明’。若说忠孝节义这是人类（就是全地球上的每个人）宅心处世的态度，我们只要提倡忠孝节义的教育：服务尽忠，事亲尽孝，立身重节，处世论义，在工业发达的社会里何尝不可以提倡？若说文学美术，这也与国民生计有关，长此贫乏下去，大多数失业的人将何从而论文作画，文学美术终久不过是少数暇豫逸乐的人所享有。我们要使多些人享受到艺术的愉快，似乎应该增进国民的生计，使大家不偷不盗，然后才讲得到给民众以享受文艺的机会……若说东方文明是东方先哲的哲理学问，那更没有问题，工厂开得多，理工学校到处皆是，我们仍旧可以有若干大学，容纳有志的子弟去研究先哲的哲学。我所以说，只要尽量提倡工业，不必顾到精神方面的偏枯，就是这个道理。”恽君的话，简直是代表我们说的。请问仁义、道德、忠、孝、节、义、文学、美术，既都是人类同具的本能或倾向；则除了小脚和辫子之外，还有什么是东方文明——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还有什么是东方先哲的哲学之特质？我们共产党除了叫劳动者反抗掠夺自己的资本家，除了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反对寡妇守节；我们何尝推翻本国文化——又何尝有些什么本国文化让我们推翻过？我们叫人们现在“不必顾到精神方面之偏枯”——反对人们专门去讲精神文明的原故，乃正是因为有经济上的不平等阶级存在，“大多数失业的人将何从而论文作画，文学美术（乃至一切精神文明）终久不过是少数暇豫逸乐的人所享有。”我们所以不忘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两句“国民常识”（去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开会，左舜生君向余家菊君说此二语是国民常识），而被你们骂为以人当物看待，就是因为要“使大家不偷不盗”。朋友！且不论除了小脚和辫子，中国并没有特别的文化；即令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我们也只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史上，和犹太文化、埃及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一样看

待。恽代英先生说得好："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若说必须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能谈革命，请问里孚人中间并不会产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致于因羡慕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蛮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顾屈服于人家而虚骄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抬起来。中国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化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我们也不崇拜那"德国，德国，于兹独绝！"的侵略主义之象征物。然而陈启天先生却要控告我们推翻本国文化，以期诉诸人们的感情，好对我们激起愤怒来！

十四　难懂的新玄学

李璜先生说："每个国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国家的人格；这种国家人格的缩小，便是每个国民的人格。"那末，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家人格，就是由于我们这些人的人格放大出来的了！李璜当然也在内。——从五卅运动表现出来，是无耻、怯懦，甘为奴隶；然则，李先生的人格当然也是如此了！但中国国家人格缩小的结果，为什么又都不像李璜，不像我；而又有袁世凯，又有张作霖，又有李彦青呢？

李璜先生说："爱的本体——或称良能——终有它的独立存在价值。所以我们谈感情生活，在在不能离却人的天性说话。认识了天性上本有这种爱，则爱国、爱乡或爱人，方有真实的源头，而不是虚浮的。于是方了然我们爱国并不是随声附和或有意铺张，是本乎天良而又缘于实际，有不得不然的意思。"为什么李璜先生又说："这个国家意识，国性问题的显著，一半虽由于拿破仑的压迫，一半还与当时文化的程度与交通的发达有关系；然后才真正能认识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呢？

十五　"苏俄走狗"的答复

第四十三期"醒狮""笔枪墨剑"中，质问我们——"苏俄的走狗"（这诚然是一个可以出气的恶骂）——一些俄人在蒙古的事实。现在我们答复在此："当我民国十年夏间，外蒙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蒙境所受白党之蹂躏，诸务废驰，几不成国。国民政府，乃与俄缔结协约十二条，得俄种种援助，始克百废俱举。故与苏俄关系，异常密切。"这段答话久已写在"醒狮"第四十期中——是贵同志谢彬先生代表我们说的。但希望你们不要疑心谢君也是苏俄的走狗——因为他实在没有得到每月十七元的津贴。

沈怡君问："俄之于我外蒙，何故念念不忘，而必欲置诸苏联统辖之下。"这很容易明白：（一）是因为中国无力替他制止那些白党——谢米诺夫、霍尔瓦特等——去利用蒙古，图谋推翻他底共产政治，复辟皇政；（二）是要贯彻他底世界革命主义，扶助弱小民族获得完全的独立；（三）是蒙古那块地方，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久欲利用其走狗——如前几年日本之于徐树铮——去建立甲必丹政治，以南进而侵略中国，北进而破坏俄国的

反资本主义之建设！关系中东路，也无非是因为日、法、美诸国在旁边垂涎，一旦放手，即不免为他们攫去——攫去即与中俄两国不利，最危险的是可以供给白党作巢穴，用为反革命之利器。

中俄会议迟开的原因，是因为加拉罕要求遣散张作霖张宗昌部下的成千成万的白党兵革除中东路白党人员。因为他们都是足以给赤俄以政治上之危险的。只因中国可怜的中央政府，权力办不到，所以才至于迟延。最近加拉罕已经让步而先开会议之幕了！醒狮派放心！请你们还要记得去聚集精神以严防关税会议中帝国主义者之分赃罢（最要紧是监视日置益）！

李景林逮捕天津爱国运动者，“东方通讯社”即拍电报说：被捕者已在严刑下招认受俄国领事津贴，“醒狮”从而和之，也说“闻”天津方面亦有人受俄金钱运动。现在请看八月三十日（？）“京报”所载雷殷（反对共产主义之议员）谈话，说：“并无此事，此不过日人故造谣言，欲尽坑学生于赤化中耳！”

“醒狮”第四十五期，丑伦杰问俄国为什么逮捕华使馆人员。关于此事，赤塔中国领事耿匡先生（即耿济之）——即大家说他也是被捕人之一的——曾有一信登在专造此谣的研究系机关“时事新报”上（可惜我未能剪得），仿佛说他不但未被捕，而且中国所传之事，与他数年在俄所见，完全相反。自然，俄国的否认是不能算数的——因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譬如最近帝国主义者造谣，说俄蒙又订了什么铁路条约，加拉罕否认，“醒狮”说加拉罕是狡猾的，否认了也还是有的。——一定要认为是有，谁也把你们无法。但别的帝国主义者如有什么事而出以否认时，便再无人置疑。——唯一的原因，便是因为俄国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不过有两点可以反证：（一）造谣者为什么不逼外交部抗议？（连对英对日都敢抗议五卅案，为什么既有这事而不向俄抗议？）（二）为什么外交部始终没有关于此事的正式公文宣布？稍危勿躁，不久外交部自有交代给你们！

我要声明我们并非完全与俄一体者，俄若真有什么侵略我们的事实，我们还是与对待帝国主义者一样的反对。只因“醒狮”既呼我们为苏俄的走狗，好象硬认定这些事就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只好尽我们的所知答复于此。

十六　“减杀对外的战斗力”？

醒狮派相信在他们底国家主义之下，各阶级是可以本了天然的爱国本能，“一致趋赴”着去对外的。所以李璜先生就以海外归客之资格，谈瀛说谎，说欧洲无论那一国的人，每逢一有国家患难，便能舍了一切的沙发椅、比雅乐、美妻稚子而赴死不顾。（第二期“醒狮”）所以他们就要说共产党人在“国内鼓吹阶级斗争，以减杀对外之战斗力。”醒狮派实在太恭维我们了——我们鼓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可以由人去鼓吹的么？我们若有这么大的本事，岂不成了瞒天过海的八洞神仙？唯心的先生们太“从心所欲”了吧？我们暂且让一百步，暂且不拿我们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和醒狮派说——暂且请看醒狮派自己所说的话。“醒狮”第七期上，承认中国现在资本家多是军阀的化身和走狗底国家主义者郑伯奇先生，由日本写回来的信，告诉曾琦、李璜说：“你们要揭出最简单的口号，如辛亥革命以前‘排满’‘光复’的口号，把握住那最可爱的农工阶级的同胞的心！惟有这农工阶级

才真是爱国的。你们看看俄国革命，贵族跑到巴黎依然过贵族的生活；音乐家入了美国国籍，依然发挥世界大家的声誉。与祖国同命运共甘苦，始终死守着祖国的，只有农民和劳动者。德国怕也是一样，国民被赔款苦得要死，Hugostirnes反成了世界第一等的大资本家。再看看咱们这可怜的祖国和同胞，好战的军阀和煽乱的政客都是租界构有堂堂的宅第，政变发生，租界上便充满了要人的车尘马迹；呻吟在枪刀水火之下，死不离祖国怀抱的，只有农人劳动者和卖命的兵士！——这是一种变态的劳动者。朋友们！祖国的生死存亡全在这些可怜的人们的双肩上，你们的国家主义，也只有这些人们才肯承受的。”郑先生不是得了十七元一月的苏俄走狗，他底话，当然比我们说的总有几分道理。“你们的国家主义，只有这些人才肯承受！”“爱祖国的，只有农人劳动者和兵士！”说我们减杀了对外战斗力的醒狮派怎么样为我们下一转语？我们说“劳动者无祖国”，便是说劳动者在现在这种史丁纳（Stirnes）所藉以发财而有事时又跑去入美国国籍的“祖国”中，是不应当去“爱”它的。劳动者是最能爱国的，但他只爱他自己的“祖国”——消灭了贵族资本家以后，史丁纳也一样的同他们在生产界做工（劳心的或劳力的）的时候的那种“祖国”。所以德国劳动者不应当爱现在握在工业资本家手中的祖国，美国劳动者不应当爱现在握在银行资本家手中的祖国——因为你爱了它并无益处，你在这里爱国，资本家却在那里私通外国（法国占领鲁尔时，史丁纳实参加其协议）；有利，他们发财；有害，他们跑了！所以劳动者只应当拥护那已经成为劳动者“自己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劳动者如能在各个地方，把他们自己的祖国扩大，使全地球而成为一个苏维埃国，强迫一切资本家和贵族都变成了劳心劳力的工人时，便没有了“祖国”，而获得了整个的人道、正义、自由，获得了“世界”！在正义之前，公理之下，资本家和贵族是不应当不受大多数劳动者之强制的——杀了他们也应该，他们都是已经犯罪的囚犯。不过从唯物史观上认识社会进展的“时代”，却也可怜他们是被已往的生产关系——无机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非人类意识所能支配的定律推着走，所以也允许他们放弃了罪恶而同劳动者一样的做工，我们是本于这样明显的事实，这样自然的客观律，促进（鼓吹提倡之名，太恭维我们了，不敢承受）阶级斗争——大呼郑伯奇先生所认识的“最简单”的、和“辛亥革命时一样”的工农兵联合的口号！

十七　专政问题

醒狮派不相信“国家是统治者压服被统治者——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这句话。所以他们反对俄国的劳农专政。他们拾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硬相信俄国烧毁托尔斯泰的书籍，禁止萧伯讷的戏剧是事实。现在我们且不辩护这些事的没有；更不必和醒狮派空化时间谈理论。我们且说事实。第一我们要问：设若有一群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共产的共产党，在法国秘密结社，图谋实行社会革命，到处发行他们底书籍，扮演他们底戏剧时，这时法国政府对之应该如何？是不是逮捕、禁止、监禁、死刑、烧毁书籍、放逐外籍共产党员？史丁纳在德国，有造船厂，有森林，有钢铁厂，有银行，有报馆，有各种的矿，他能够使法国占领鲁尔时，不能不先和他商量。他可以垄断舆论，他可以收买国会中若干议席。他若运用他底金钱之力，便不难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和他发生密切关系。他不难指

挥他的报馆说德国劳动者应该下死力替史丁纳作工——因为那是发展实业，挽回利权。他可以暗示着大学教授们拥护阶级存在的伦理学说（自然不是每个大学教授都如此卑鄙）。他更可以利用海陆军和警察压迫工人对于他的罢工。假使法国的钢铁业在世界市场上和他的销路相抵触时，他的报馆，他的大学教授，他的国会中的议员，便会一致的说“德国，德国，于兹独绝！”；“我们要勇敢的赴前敌去发挥德国文明”，“我们要爱国”。千千万万的战费，则征之于人民；万万千千的死尸横在疆场上，则来自“有意识有系统有组织的国家主义的爱国教育”中——征兵制度中。胜则史丁纳获得钢铁市场，或获得足以辅助钢铁业发达的煤矿——如法国战胜德国后之所为。（收回亚尔沙土、罗南，占领鲁尔）。败则从新又来爱国，作工，加税，还赔款，挽回利权，报仇——舆论、教育，一切如是。于是社会的风俗、道德、伦理、政治、法律乃至宗教（德国教士得罪了史丁纳时一定募款就受障碍）、科学（日夜研究如何发明俭省人力而生产力大的机器——必如此才可专利受奖）、美术——可以说一切都要史丁纳化。在这种史丁纳国家中，劳动者主张权利是反叛；说“工人无祖国”这话的人是犯了道德上的罪，是煽惑人心；共产党当然更应该“杀无赦”请问：这不是资本家欺骗群众，剥削工人的工具是什么？现在的英、美、日、法、意、德……除了俄国，那一国不是如此？那一国不是在德谟克拉西面具之下，实行第三阶级——资本主义的专政？这种专政便是道德上之正体，而俄国的劳农专政便是罪恶！俄国专政便是违反了自由平等的原则，而英美则否！我们请问醒狮派，请问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应不应对于满清皇党专政呢？应不应该对于袁世凯的帝制党专政呢？将来醒狮派得了政权，曾琦先生坐在北京总统府中时，也能允许我们共产党肆行反对你们自己否——也还要保存你们所说的自由原则否？依你们的，是俄国现在应该让一般资本家和帝制派去自由活动，好将俄国现在的政府推翻；让康有为、升允、金梁、江亢虎自由活动，抬了溥仪来把中华民国的共和招牌下了去么？拥护资本主义，原也可以；但应该光明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应该横行一世，俄国推翻资本主义而且实行禁止资本主义之图恢复——我们应当一致地去和他拚命。却不应该假借正义自由之名，说专政是罪恶，是不道德，以欺骗群众！朋友！只拿“醒狮”不及“向导”受摧残之甚和醒狮派人不及共产党人在在有生命的危险二事看，就已足够证明国家是“阶级的”了！私有财产制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不公之于社会而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出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专政，是用国家这个东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工具归之于社会公有——使阶级消灭。俄国劳农专政，不是反自由的，乃正是在走向自由之路的过程中——为正义之初步的累积工作。假使托尔斯泰、萧伯讷的著作中，含有破坏劳农专政，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张目之处，禁止、焚烧，是应该的。唉！专政！辛亥革命如能继以民主主义之专政，则今日之中国必不如是；将来醒狮派当国，如不专政，则北洋军阀一定会利用“自由”，鼓动军队，先将曾琦、李璜杀了再说（请读者参看“中国青年”第八十六期“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

十八　中国今日之劳资阶级

“醒狮”说：中国还没有劳资对立的阶级；又说：“中国劳资阶级，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还是和醒狮派说事实。事实太多，我们苦于不能遍举，只好且举一二，以见其概况。据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就已经有：

类别		人数
制造工厂工人	染织	302,666人
	机械及器具	16,361人
	化学	119,789人
	饮食物	151,677人
	杂工厂	35,085人
	特别工厂	13,063人
	计	638,641人
运输工人	铁道	71,811人
	海员	约 150,000人
	码头工	
	车辆劳动者	
	计	221,811人
矿山工人		530,885人

类别		人数
市政工人	邮差	约 12,000人
	电灯	
	电话	
	电报	
	自来水	
	清洁夫	
	计	12,000人
农业工人		
政府直辖工人		21,640人
外国工厂工人		324,362人
总计		1,749,339人

在上表所列的工人之中，已有工会组织者，据一九二四年八月所调查计有：

铁　　路　四四、八〇〇人
海　　员　四五、〇〇〇人
矿　　工　二六、二〇〇人
湖　　南　二六、〇〇〇人
武　　汉　三二、三〇〇人
上　　海　一六、三〇〇人（按五卅时上海总工会所属已有二十万人以外）
粤　　港　五〇、〇〇〇人
其他各处　三〇、〇〇〇人
总　　计　二七〇、六〇〇人

我想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之有赁银劳动阶级之存在吧？这些劳动者所过的生活怎样呢？自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海员，是比较的稍好；然而且看我举一例，如：山东博山煤矿轻便铁路工人的生活是：工人住处，上搭芦席棚的土洞，每一间大长方形的棚洞，住三四十人。夜间三四十人同排在地窖中。每日工作从早五点到晚八点——十五小时。推煤出洞下山，每次车钱六十个铜元，每人要每天推两次，才可得一百二十个铜元，一百二十个铜元之中，

要送十五个给“工头”。每日须买公司自卖的贵面，五十余个铜元，咸菜四个铜元，烟卷六个铜元，-每四五日要费一双布鞋，所余还有几何？铁路经过偏僻地方，没有女人，夏天工人还可随便不穿裤；冬天简直要命。铁路由山上倾斜而下，推车飞跑，偶一不慎，便连人带车血肉横飞，每礼拜必有三四次惨剧发生。死了还要公司考究原因，有时徼幸可以得着二十元恤金；考究不出原因，就算你是白死！再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上海共有童工总数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其中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女童十万另五千九百二十一。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四千四百七十五；女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共在二百七十五个工厂中作工；内属日本者三十二，英国二十四，美国十二，意大利七，法国五，葡萄牙、瑞典、比利时各一，英美合办者二；其余一百九十厂，均为中国资本家所办。很多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中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而且是终日站立。分日夜两班，直到星期日才停一班。工钱按日，至多不过小洋两角。那些童工多由包工者（Contrastor）在四乡招来。每月不过给其父母两块银洋——包工者可以向工厂得到四元上腰。在棉厂中的童工，大多数工作时间是十三小时十五小时。许多工厂中，当夜工时，儿童们都因太疲乏而滚在棉堆里睡着了——工头看见，便加毒打。丝厂中以女童工及青年女工为多——成语说“一个小孩当两个成人”。小女孩站在地下，向沸水盆中捞丝头——十指见骨。早六时至晚六时——间或还要作夜工，并须先十五分或二十分到厂。一气要站五六点钟。厂中温度，常为湿气所包孕，久在炎湿蒸气中，尤易疲倦；工资由二角至二角五分。尤苦者为火柴工厂——九枚铜元一天。工厂内又无防火设备。作火柴盒的外工是母子同作工，每千个盒的内部，九个铜元。每千个盒的外部，七个铜元。一个妇人，两个小孩，一天可成二千至三千个部分——精疲力竭。又据他们调查，上海的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收入，算比中国任何地方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每月得十五元，人力车夫得八元，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也须十六元，方能过活。上海小沙渡日本内外棉厂，作工十二小时，而最低工资且有少至每日二百文的。时常毒打工人，连大小便都要先领“厕牌”——三四千工人，只有两块厕牌。在这种生活中的工人，共计九公司二十二厂，三万五千余人。照以上所举的事实，请问醒狮派，到底中国有没有了劳资阶级？这些劳动者倘若要向资本家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到底应不应该？值不值得同情？资本家对于此等劳动者，动加高压——像青岛五月二十九日的屠杀，上海顾正红的屠杀且不说，只说郑州豫丰纱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厂主穆藕初竟不惜用三四百流氓，殴打罢工者，诬调解工潮的京汉路工人为赤化，打死韩玉山、王长保两人。——这是国家主义的同志恽震先生所亲见的（闻恽先生现在该厂当工程师）。劳资斗争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么？绝大的流血惨剧——阶级斗争，如京汉路“二七”惨杀，广东商团事件中商团和工团军农团军苦战的事实，已经写在历史上明明白白。“中国青年”八十六期中所举的资产阶级的自利性，反国家性，也已经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鼻尖上！醒狮派却还要说中国没有劳资阶级；说各阶级可以合作；说阶级斗争是减杀对外之战斗力。当中山收回粤海关时，电请安格联抗议，保护他们底内债基金的，不是上海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么？当去年江浙战争发生时，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便通电主张“租界未收回以前可不顾主权，而于法典约章之外，都可委曲就商。”——以托庇于洋人，而保护他们的财产！醒狮派昧良说谎，袒护资产阶级，还要说我们硬把五卅运动强扯成阶级斗争，举“南洋烟草公司”和“招商”

“宁绍”等公司捐款之事，证明劳资合作。朋友！“南洋公司”捐款，是要劳动者替他做工具，延长对外罢工，好让他战胜“英美烟草公司”呀！“招商”“宁绍”是要乘机在长江沿海抢钱呀！虞和德与纺织业无直接关系，所以他就说海员罢工好而纱厂罢工不对（参看“中国青年”第八十四期）——无非是“三北公司”有几只船可以抢“怡和”“太古”之利，而又希望着多有棉纱包装运罢了！事实在这里，每个妇孺都会知道它是哲学的真实。醒师派故意装做不见，硬不承认劳动者——被压迫阶级有自我意识要求好的生活；硬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所鼓吹的。告诉朋友们！北京外交部久已就行文各省，说：“俄党女子，潜入内地，乔装卖笑，宣传共产共妻主义，事关风化治安，希即严行取缔”了！用不着醒狮派再来表现中国国民之无常识！资产阶级的轿夫！依你们，天天向劳动者去唱那“不要动气”的歌：“我们耕田，人家吃大米；我们织布，人家穿新衣。我们自己，为什么受冻忍饥？咳！你若是不胡乱用钱，就没有这个道理——劝你不要动气！”使得每个被压迫者，都成为很驯服的甘被剥削者；像娼妓仰卧在大路上，摆着阴户让人随意轮奸那样——是不是？

我要请你们答复我，你们到底反不反对资本主义？

十九 世界的平民不能联合么？

李璜在第四十六期“醒狮”上说：“共产党只见着欧洲各强国在国内资本家与平民的利害冲突，而便未见着在国外他们的资本家与平民一致了！”李先生举的事实是欧洲各国的工人生活都极好，他们都知道他们底生活之好，是由于资本家政治家在殖民地和中国侵掠得来的——所以他们很赞成资本家侵略殖民地和中国；很赞成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占领德国的鲁尔。并且说欧洲工人，一知道资本家在中国赚了多钱时，他们便以罢工要求加薪。所以不但欧洲工人是侵略我们的同谋者，并且他们底罢工就是直接刺杀我们的利刃。李先生在这样的自己谎言之下，遂断定我们不能希望联合世界平民，“老等世界的平民革命”！我们没有见着欧洲各国资本家和平民在国外的一致合作！醒狮派的同志是见着了的！“醒狮”第五十期上，就载有一封由巴黎寄回来的信——报告他们所见着的欧洲资本家和平民一致对外的事实，他说：“此时英国已陷于孤立的地位（指其因上海五卅案），而其内部政潮复烈，工党极端反对与中国开战，欲借此问题为倒阁之资。最近英政府由澳洲调两舰赴中国，该两舰不独不应命，反自动的开回伦敦。”做这个报告的，是“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系以“青年党”（曾琦在法时所组织，专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的）为中心；由那向法政府告密说：六月二十一日要求陈箓签字抗议五卅案的学生都是共产党，以致许多旅法爱国者被逐的——何鲁之（青年党书记）先生所指挥而组织的。这报告当然可以靠得住。李璜先生！世界的平民联合不可能么？广州现有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内含有印度、安南、朝鲜的革命团体和我们的“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五卅运动中，有印度共产党、朝鲜革命者所组织的五百余团体联合会、安南革命党、土耳其青年国民党、蒙古国民党、波斯和埃及底国民——都曾特派代表，在中国共产党本部所在地参加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路透社”曾电传印度代表在香港活动的结果，使香港印人大愤，英帝国恐慌，一夜中遣散三百余印人——并枪毙数人（当时上海各报载香港电云枪毙三百人）。柏林无党

派五百万知识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通电慰问，说：“黄白种的资本家压迫你们的民族，同时也压迫我们的阶级；你们之敌，即我们之敌（六月六日）。”“伦敦国际职工联合会”电祝我们战胜一切反动的势力（六月六日）。第三国际通令四十二国共产党及工团，一致动员高倡“从中国放开手”，“勿干涉中国”；并于必要时以罢工援助中国。“全俄职工会”首先汇十万元接济上海罢工（六月十七日）。“莫斯科国际平民大会”，檄告全世界平民援助东方民族独立运动（六月十二日）。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电商第二国际及黄色职工国际以实力援助中国（六月十七日）。“莫斯科华侨大会”，三十九国共产党代表莅会，议决阻止列强军火运入中国（六月十五日）。“苏联无产阶级学生会”，电称“愿与中国学生、国民、工人携手并进”（六月十六日）。曾服务于巴尔干半岛之俄兵，宣言反抗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七日莫斯科电，全俄各地均因中国事件，有示威及募捐之事，全俄农民亦一致奋起。苏联职工会于六月四日电中国工人请其坚持到底。莫斯科纺织工人，特为五卅案开“反抗压迫中国大会”。海参威工人定出数小时作为援助中国工人而做之工（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二日莫斯科举行五十万人之大示威游行，援助中国。法国“劳动总同盟”捐款二万五千金卢布（六月十五日）。“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与大坂各劳动团体联合会合派代表，调查日本资本家虐待中国工人之真相（六月六日）。日本劳动总同盟，欢迎上海罢市（六月八日）。东京市内三十六劳动团体，领袖人四百余名，为五卅事件开会，被警察干涉，逮捕多人（六月九日）。英船行至神户，华籍海员罢工；雇用日本海员，日本海员拒绝，反醵款欢送华籍海员归国。英国“独立劳工党”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完全承认中国人管理中国（六月十日）。英国“职工联合会”电北京“中国劳工委员会”，相信五卅运动足以促进东西工团主义，成为有力之团结。六月十八日英国劳工党分电各支部，反抗英政府压迫上海群众。英国矿工首领电首相，反对利用英国舰队帮助厂主压迫华工。柏林“国际工人后援会”召集“勿干涉中国会”，到代表八百余人。捷克斯拉夫“国际工人救济会”为五卅事件开会，到者二万人；丹麦、挪威、荷兰，均有此等大会。六百万工人所组织之“英国劳动同盟大会”声称欢迎中国工人所起之叛乱。英国共产党提出“勿侵掠中国”的口号，迫英政府容纳下列条件：（一）赔偿被英兵击毙或受伤中国人家属之损失，取消司法调审沪案之办法；（二）取消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及不平等条约问题，应召集一特别国际会议，俄国亦须加入讨论；（三）中国关税问题，列强无须干预；（四）中国境内之英国海陆军队及战舰须立即撤退，各国政府必须担保不破坏中国之主权。英国少数派工人，正在煤矿罢工中，尚汇一百三十金镑给上海总工会。以上这些事实，都明明白白在最反动的研究系报纸中和帝国主义通讯机关“路透社”、“东方社”电稿中写着。说现在还未到时，世界被压迫者之联合尚无大力，尚不足以一举而歼灭资本主义，是可以的。说世界平民联合简直不可能，无望；说欧洲资本家和平民（劳动者）对外是一致；则明明是“醒狮”在那里出力替资本主义蒙蔽群众！

二十　半截的国家主义

李璜说：“有些人说，现在一些人在中国提倡国家主义去图自强自卫，难免将来不流

为帝国主义去侵略别人。”这本是对于醒狮派的一个绝大疑问。李璜答覆，是背诵了一段“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说我们祖先就是和平的，以证明他们不会流为帝国主义。并没有说出一点可以制止他“不流”为帝国主义的切实方法。

张介石说：“西洋的罢市罢工，都是积极的罢市罢工。换言之，罢市以外，还有其他准备；罢工以外，还有其他动作。至于中国式的罢市罢工，则仅限于罢市罢工而止。试问如此简单而和平，怎能使租界上有凶器的洋人向你屈服呢？”一点也不错！然而张先生却没有对于应该怎么样去准备“其他”的话，说出一字。

曾琦叫我们勿希望军阀救国，勿希望外人仗义，真是千真万确。然而曾先生指给我们应走的路，却只是“要之，时至今日，我已处于背水之阵，非有项羽破釜沉舟之志，难收韩信出奇制胜之功！吾人鉴于军阀之不足恃，友邦之不可靠，亦唯有努力于民众之组织，以期成一大势力，实行‘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切无聊之希望，愿国人共绝之也！”除了“排句”和“故典”之外，只有“组织民众”一句空话。对于如何“期成一大势力”，却一字未说。我们钻到各处去组织民众，醒狮派又说我们是苏俄走狗，赤化中国。醒狮派却又尽管“云腾雾驾，终究是滴雨不落。”

陈启天叫我们预备国民实力——也是一样的“且听下回分解”，没有结论。

灵光君说：“什么是国家的抵抗？即以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对外防守的目的物，以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其目的在将此国家弄到文明地位，而后更进一步，再将此文明为全世界人类谋其幸福。”却对于如何才能“弄到”的切实方法一字未说，只是在结论上说：“翻开‘大学’第一页，我们的精神，更已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我们现在实行国家的抵抗，不外实行着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啊”！啊！

二十一　“醒狮”小心赤化

依“醒狮”的理论，凡是由“向导”周报或“中国青年”喊出来的口号，凡是与苏俄有关系的口号，便都是“共产主义的”。所以他要浩叹：“呜呼！吾中华民国全国学生总会，竟以苏俄共产党之口号为口号！”而要“为我全国青年学生扼腕太息”了！其实，“醒狮”出世太迟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在“醒狮”出世之前两个多月，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久已就发表了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依“醒狮”和右派的造谣，学生会是共产党把持了！难道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底脑筋也是受了共产党人的操纵么？并且，就是“醒狮”自已也受了共产党人的嗾使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反对基督教教育，联合被压迫阶级及弱小民族，那一个口号不是在这两年中由“向导”周报站在民众面前，作“向导”喊出来的？“醒狮”第三十五期，不也随声附和主张“援助弱小民族”，“勾结敌国在野党”，“收回海关主权”，“严禁学校传教”么？在巴黎的青年党（旅法各界救国联合会），不是也一样的对于五卅案提了十二条：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么？小心哪！赤化要紧！

“醒狮”根本上发生于“投机”心理，没有中心的信仰——什么时髦，便也赶着什么后面打号子。国际妇女日（三月八日）是一个纯粹红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那以反对共产

为职志的“醒狮”（第二十五期），却也把旧酒灌入新瓶——扯些什么花木兰、韩世忠夫人、沈云英、秦良玉的腐败不堪的英雄思想附会其上，以装点它是“近代”青年的读物。它又再三佩服土耳其国民党——却不知土耳其国民党是和蒙古国民党一样的，是受有苏俄的实力帮助的。它歌颂广州的学生军，却又不怕研究系所指为红党的蒋介石沾染了它！我们不是说这些不许它称道——它肯帮着宣传，正是好现象；我们只觉得在在看见它底投机性罢了！

二十二　民族主义问题

“醒狮”说共产党既加人以民族主义而革命的国民党，而又承认蒙古独立，“使我之领土分裂”，是矛盾。它底理由，是蒙古乃五族之一，所以应该受中国管辖。但我们不知道曾琦先生还欢不欢迎五族之一的满州人溥仪做中国皇帝?如其不欢迎，而且要为文问段祺瑞“何以不杀溥仪”；则曾先生所服膺的孔子已有遗教在曾先生肚子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侵掠的保卫的国家主义，似乎也应该让蒙古人自己去讲一下。国家主义不流为帝国主义么？对于蒙古问题，业已开始在“流”了！告诉朋友，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在党纲上是：“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在宣言中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原来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民族，这是矛盾的民族主义；醒狮派奉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是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蒙古人自己底自决权。我们并没有去鼓动他们，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的自决权而已！

二十三　国民党与阶级斗争

“醒狮”又不懂共产党既加入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而又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解释民生主义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民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左舜生先生在第三十二期“醒狮”上，引我在重庆所作文驳恽代英君，不知那文乃是站在一个谨守国民党党纲的地位上立言。

我们很奇怪醒狮派反对阶级斗争的动机。曾琦先生说：“革命之对象，为军阀官僚，则被捣乱者乃军阀官僚而非人民也。革命之动机为反抗不良之政府，则陷于恐怖者，乃少数之当局而非多数之良民也。即令革命时期，人民不免稍受惊恐，然此乃一劳永逸必不可免之举也。今且假定革命手段为危险而不宜取，则试问不革命果能保守秩序之安宁乎？不革命果能免恐怖现象之发生乎？”在曾先生这一段话中，将“革命”换成“阶级斗争”，将“军阀官僚”换成“资本家”或“压迫者”；用以转询醒狮派，不知醒狮派又将何以下一转语？且醒狮派既言国内尚没有阶级，则又何畏他人之主张阶级斗争？既言尚无资本家，则又何劳醒狮派为资本家阶级着急？

二十四　新儒林外史

“醒狮”说：“本报读者万余人”，“醒狮”以大无畏之精神，宣传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举该党（共产党）一切似是而非之邪说，摧陷而廓清之，使之在理论上直无立足之余地。未及一年，而国内信仰国家主义之分子，日益加多，爱国团体之成立，如雨后春笋。”又说：“因为‘醒狮’受国人欢迎，妒嫉心的无明之火，烧得共产党忍不住了！”又说：“迩来‘吃洋教派’、‘拥军阀派’、‘亲俄派’、‘亲美派’、闻‘醒狮’之声，而内不自安，时复发为反攻之论”。我们记得江亢虎在“南游迴想记”上，也曾说：“此间大资本家，首推闽人黄仲涵君……闻名请见，言资本主义首领愿与社会主义首领接洽也！”肉麻！

二十五　上海的尼姑庵

我们常常看见上海尼姑庵，因为要使那些迷信菩萨的太太们便于来进香，就在庵中装起雪亮的电灯，风凉的电扇，灵便的电话，并且还预备有自备的包车，预备有停汽车的场所。马克思说：“不是人类底意识规定物质生活；乃是物质生活的条件，规定人类意识。”李璜先生不服，却要说：“英人以其机器进据印度已及百年，而机器之力乃不能动印度人改良之念，即名加斯特（宗教）的信仰有以阻碍之。”而归其“机械不改良、工业不进步”之原因于唯心的精神生活。真正善为帝国主义者辩护。印度人若能承英人底恩典，把一切机械应用的机会都肯给与了他们，则大英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可以剥削回去？

二十六　首阳山上的李璜

李璜夸张东方的精神生活，说他在巴黎时有一位教授，指着中国文化史问他：“我在你们中国古史上常常看见这个‘让’字，并且主张以让为国本，我很不解这个道理。或是让与攘通，不然便是挑手往往错成言字旁了。请你替我查查看，如果古训有让之为言攘也，那末我的疑团便大解释了！”这一段用小说文笔描写出来的“内台喝采”，自然足以投合素好夸大的中国人性。但我们对于此说，却觉得只有两途可信——不是李先生故意说谎，便是那位教授特作“挖苦”。好一个东方特有的让德！或者醒狮派相信孤竹二子让国是实事吧？然而醒狮派人为什么又不肯将蒙古“让”与蒙人？

二十七　曾愚公先生文集

编“醒狮”周报讫感赋一绝

“浮海归来念愈痴，士夫依旧叹无为，拚将热血临风洒，唤醒人间老睡狮！”（予于民国七年夏，因中日军事协定问题由日本辍学归国，执笔上海“救国日报”……）——

“醒狮”第一期。

海寇吟

“……窃我宝藏据我地！贻我毒药腐我神。……”——“醒狮”第六期。

勗“全国学生会联合会总会”

“……当民国七年夏，予因反对‘中日军事协约’，偕‘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志二千余人由日本罢课归国时，即极力主张全国学生应有组织。曾在天津发起‘学生爱国会’……”——“醒狮”第二十六期。

扶病编“醒狮”周报讫口占一绝

“书生报国无他道，手把毛锥作宝刀，心血未完终欲呕，病中握笔敢辞劳！”——同上。

记船上一英妇

“……有一英妇，貌丑而肥，年五十许，隐椅而卧，跣其两足，臭气逼人，众皆恶之，恬不为耻……会食之时，状尤可怪……则效非洲野人之行，以手拾菜，入于口大嚼焉……予曰：此真英人之代表也！彼英人者，世界自私之民族也……据他人之椅而无所于歉，食他人之食而无所于惭，非英人传统之经济侵略政策耶？……闻者皆笑应曰：然！遂书之以为记。”（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三日作于印度洋舟次，时方风浪大作，据椅书此，愚公自识。）——“醒狮”第三十五期。

感事书怀偶成数绝

“普恩加赉是吾师，克烈门梭更不疑，他日政权如在手，要当横海制倭夷。

“六却英夷百战功，髫龄读史慕文忠，当年一炬焚鸦片，民族精神万古雄。

“华胄千年文化古，楚歌四面国基危，从今教养兼生聚，霸越亡吴事可期。”——同上。

国防与外交序言

“……去秋，归自法京……爰与友人创办“醒狮”周报，揭国家主义之旗帜，日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义，强聒于国人之前，盖犹是八年前参加‘国防会’，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执笔‘救国日报’，著‘国体与青年’时之素志也……”——“醒狮”第四十三期。

辑者按：愚公之诗，殆可以使“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矣！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填　词（节录）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一、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二、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

“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毛 泽 东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晦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咀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咀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象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

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政治周报》1期）

《政治周报》第一期"反攻"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润

三三三一制

"何谓共产？财产充公。不准私蓄，贫富皆穷。造作好语，名曰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成，一成会用。"这是杨坤如贴在惠州城厢内外的"反共产"四言韵语告示。一个新从北京来而头脑颇算得清醒的朋友问我道："三三三一制到底有这回事没有？"我听了纳罕。我尚未答他时，心里想：难道你也有点疑惑或者广东竟行了什么"三三三一制"么？我便带着冷峭的神气答他道："有是有，不过还在杨坤如的告示上。"他说："香港《晨报》不是国民党的报？那上头也载着。"于是我才知道所谓香港《晨报》也有这种新鲜议论。原来香港《晨报》在杨刘叛变以前确与国民政党有过关系。杨刘叛变省港罢工以后便为刘震寰买了去做了香港洋大人和所谓陈总司令也者的机关，利用省港断绝交通，就在香港那荒岛上香港《晨报》那篇幅上涌出了许多的"事实"，三三三一不过那许多"事实"中的一个，却不料远远地送到了北京饱了北京朋友的眼福。我因此想：现今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那动物（如人之类）或静物（报纸之类），不必看得太拘板。因为现在"革命""反革命"分了家，那些动静物件，可以今天在这家，也可以明天在那家。香港《晨报》在国民党时，做了国民党的机关报；他被香港洋大人刘震寰先生与夫所谓陈总司令也者买了去，便只能算做他们的机关报。这正如冯自由马素一班人在国民党时，是国民党员；及被段祺瑞买了去，虽然嘴里还说国民党，招牌也是挂的"国民党俱乐部"，然而只算是段祺瑞的人了。我不是特别有恨于香港《晨报》和冯马几位先生，我是不得已要借光这一个例子点破给国内外许多朋友看，于观人察物时别要上当。至于杨坤如的告示做的词意俱佳，只有"其实不通"一句，算是败笔，所谓一粒老鼠屎点坏一锅汤者非耶？但那是秘书的过。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杨坤如的布告已经领教了，还有刘志陆等给"北京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奉天张督办，湖南赵省长，武昌萧督办，江西方督理，福建周督理，岑西林先生，吴子玉先生，康南海先生，梁任公先生"许多人的电报，那上面却稍不同。他那"其罪七"中说："我国社会，素称重农，主佃利益，所得常均，互助精神，自然而合。今乃诱以均地之说，乱其

互利之序。”不免与杨坤如冲突。照杨坤如说：“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成，一成会用。”各方面都得一点，到可以说是“互利”。刘志陆说的却是“均地”，其意谓广州政府教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都均分了，地主从此没有租收，所以是“乱其互利之序”。一个说地主还有三成，一个说地主一点没有，未知北京等处朋友，到底相信那个的话？

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

刘志陆等的电报，于数了国民政府八罪之后，加上“呜呼”一段，接着说：“总之出师靖难，伐罪救民，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师直为壮，胜负无待交绥。得天者昌，仁暴无难立判”。刘电列衔诸人如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张萧赵方周各位督办督理，或省长以及岑吴康梁诸先生，固然是讨赤志同。但香港金总督伦敦包总理，何尝不是讨赤志同？却不将台衔列上去。而且金总督助了如许金钱军械，又保护了陈总司令在香港开设总司令部，讨赤之志，炳若日星，却遍将台衔漏列，真不知是何用意？电末帅直为壮数句说的更属糊涂，他竟在替国民政府做功德颂。

颂声来于万国

有个潮梅绅学商联合会打了一个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面说：“共产妖党，煽祸粤东，近之足以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远之足以酿世界以灭绝人类之忧。我刘公仗义发难，为天下先。行见旌麾所指，浆食争迎，拉朽摧枯，大勋立就（记者按立字有弊）。赤化赖以铲除，国基由兹奠定。岂特与云南起义马厂誓师先后鼎足，抑且全世界人类赖以保障，全球劫运赖以挽回，纪念垂于千秋，颂声来于万国”。处处不忘“全世界”“全球”，眼光何等远大！刘志陆如果真把“赤化”铲除，“颂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这是陈炯明在东江所发反共产印刷品上面的一句口号。这句口号确实响亮，只可惜“反共产中国国民军”要去“大同盟”有点为难。象奉天张督办所部与汉口吴子玉先生所部，实在可算得“反共产中国国民军”了，但是何从“大同盟”呢？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然此种制造，只能比较抽象，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便容易自己擢〔戳〕穿使人不信。然此次陈炯明在东江，为了孤注一掷以图幸胜，竟甚么方法都用尽了，他竟捏造所谓“共产章程”以恐吓人民。他们的传单中有一张题目叫做“劝粤民协助粤军讨伐赤党”。那里面说：“呜呼！我父老兄弟知蒋中正拟订之共产

章程乎？区区之愚，窃虑蚩氓无知，以为共产者共富人之产，与一般贫民无与也。或更大有造于贫民也。而抑知大谬不然。吾综厥章程，概括言之：有所谓三三三一制者，盖对于产田言之也。有所谓四四二制者，盖对于房屋言之也。而对于工厂商场资本稍厚者，则更完全没收之。”但近日香港《工商日报》却载道：“省商代表到港，港商代表假座华商俱乐部，请省商代表开第二次大会议磋商解决工潮恢复交通事宜。华人绅商与省商代表皆围坐于一长桌。省商代表简石琴起言，省城政府实非行共产”。假如有人拿了简石琴的话去问陈炯明，我料陈炯明必将答道：“简石琴自己扯谎。别人共了他的产他还说未共呢？”。

邹鲁与革命

邹鲁说：“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应该觉悟，切不可因人家说旧同志不革命便抹杀一切。若不是我们同志屡仆屡起，那能有民国。若不是讨袁护法讨贼北伐诸役一向无前，那能有今日的历史。就是共产得意的工作焚毁商团，仍须要靠杨刘。打杨刘仍须要靠许梁。即今日之制许梁，又何莫非老同志。”很好！邹先生！就请你革命吧！实在没有一个人有本领敢于抹杀革命的老同志！须知单是“有民国”“有历史”是不能算数的，须得现在还是革命，须得将来还是革命。若那老同志杨刘，老同志许梁，我看还是少举例为好。

（《政治周报》1期）

《政治周报》第二期“反攻”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润

向左还是向右？

半年以来一班人有一种议论，即是说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另外提出一种中间意见，排斥右派也排斥左派，自己标明是站在中间地位。这种事情在广东不多见，而在江浙颇普遍。因为在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香港，站在香港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广州。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一齐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种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所以两边是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能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假如有人要站在广州香港之间，则其宣言必定是“香港不好广州也不好”，那香港的大炮一定对准他轰，广州的大炮也一定对准他轰。江浙一带现在还没有大炮互轰之事，“两边不好”的议论于是乎大盛。本来今年五月卅日甲方的大炮已经在南京（路）一带砰砰地响了，幸喜乙方没有大炮，只有些拳头做不成“互轰”，未酿成对抗的乱局（罢工一下子也算不了事），使“两边不好”的议论还可以公开的宣传，“留正气于两间，存自由于天地”。但我们若假设一个局面，假设那南京路上的群众，不但有拳头，而且有大炮，又是汪精卫蒋介石带领着，把那巡捕房砰的一声打个粉碎，随即占领工部局，所有“红头阿三”之类一齐变了俘虏；马上封锁吴淞口，在南北塘狮子林驾上大炮（象虎门一样），炮台上扯起“包打帝国主义”旗帜。这时候上海一定不幸要闹成广州一样的“乱局”，也会设置了卫戍司令部，请着王懋功先生之流做了司令，每日坐了武装汽车在马路上飞巡。《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将怎么办呢？自然还有北京在。但是北京也难靠久，总以段执政坐得稳为条件。段执政坐得稳那是没有问题的，不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可以高挂起招牌，就是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也可以在那里开会，比较张家口还要自由——话虽如此说，我至今还有点糊涂，何以张家口不准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开会，岂那里不是段政府管辖的地方吗？如果段执政不在——且慢，即使段执政在也难免有照料不周之处，不是听说有两个人被人捉上汽车载入城内打了又给写悔过书吗？咳！段执政辇毂之下也出来这种乱子，世事真是难说！更可痛者：据北京执行部电称：十一月二十八日发生革命运动，市民围攻执政府，要驱逐段祺瑞。又称：国民大会议决三条，第一条组织国民政府（很不幸！自然是照广州的样）。

又据路透电称："二十八日北京示威，学生执广州旗帜，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游行者分散传单，上书推翻段祺瑞，诛朱深，枪毙国贼，解散关税会议，国人武装，群众革命，真正国会等字样"，《时事新报》在这段电报中之前标题道："可骇的示威"！怎么办？这里又有了"可骇的示威"，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屋顶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酿成了广州一样的"乱局"？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站在中间的先生们！请问怎么办呢？向左？还是向右呢？

赤化原来如此

十一月二十三日《申报》北京电："使团得粤详报，识蒋介石主义虽标赤化，但对于人民颇爱护，反之反共产军陈林洪等部到地方时，反多共产行为"。原来赤化就是爱护人民。赤化我（俄？）化，安得染遍全中国！

（原载《政治周报》2期，1925年12月出版）

《政治周报》第三期“反攻”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润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痛恶左派国民党的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能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其种种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郑润琦，莫雄，魏邦平，陈炯明，林虎，洪兆麟，邓本殷，熊克武，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能领导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帝国主义痛恶苏俄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雇佣俄顾问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廷；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增加一支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

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即如上述。然而这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之一方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政府实现今日北京右派会议之目的，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梁鸿楷郑润琦魏邦平莫雄朱卓文等企图于刺杀廖仲恺后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熊克武图从北江袭取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邓本殷欲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效力怎么样呢？实在难说。自然，右派会议的种种议决，只算是儿戏的议决。但是这种“窠里反”的方法，确实比在“窠外反”要进步。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慰。即使右派中有几位口里还在说打倒帝国主义，即使右派中还有一部分并无诚心为帝国主义利用，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右派的最大本领

右派机关上海《民国日报》十二月三日社论说：“只有怕革命党的军阀，那有怕军阀的革命党”，他拿这个理由去反对下面汪精卫等感电的话：“中央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有军阀的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因此，《民国日报》以为中央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可以表示勇敢，可以表示不怕军阀。《民国日报》的错误在那里？他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革命党的活动有公开与秘密之别。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他的党的组织与会议在敌人势力之下完全是秘密的，他的主张和宣传则是公开的。在敌人势力之下要将党的组织党的会议公开起来，那必须先得敌人的谅解，就是至少有某几点是于敌人有利才能得到他的默许或者还能得到他的保护。但这还成了什么党呢？这只能是敌人的朋友，不是要革敌人的命的革命党。段祺瑞容许了右派在北京公开的开会，他能容许汪精卫谭延凯等到北京公开的开会吗？该报又谓孙总理去年曾到北京不怕段祺瑞。不知孙总理去年能到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段祺瑞刚上台其政权尚未稳固压迫国民党的政策尚未确定；一是当时北京的警察权尚握在同情于国民党的冯玉祥手里。没有这两个原因，孙先生是不能公开地到北京。假如孙先生至今还在，段祺瑞一定不能容许他在北京公开的做革命运动，他一定须秘密起来，或跑到别处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反动军阀盘踞的地方，都有国民党的组织，各级党部到处都有机关，党员及干部同志随时都有会议，都有各种企图消灭敌人势力的勇敢奋进的工作，但这都是秘密的。在这些组织和工作中，只有左派在那里不断的奋斗，右派党员都畏惧不敢近前。右派的长处就是一张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几个口号，他们也能不看党的决议案背得出；至于实际的做法，实际的行动，他们一听见就吓落了胆，右派只有一张咀，他们并没有手与脚。他们只有胆子在段祺瑞面前开会，没有胆子到广州开会，因为广州的革命空气把他们吓杀了。他们议决了他们所谓的第二次全国大会明年三月在上海或北京开会。依我的观察，他们的大会如真能召集得成（不管人数多少）未必敢在北京开，因为段执政的龙庭已是坐不大稳了。他们大概会在上海开会。在帝国主义的老窠里，向各国领事工部局洋大人巡捕房红头阿三面前公开着国民党的全国会议，这很可以表示“勇敢”。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这是右派最大的本领，左派分子望尘莫及！

（原载《政治周报》3期，1925年12月出版）

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子　任

"革命派团结起来"！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故即舍违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议决与不由中央秘书处召集等法律及手续不计，单就事实说，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这是什么意义？此事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京严驳，并由中央委员汪精卫谭组安等十余人将驳斥要点通电全国各级党部，又由中央委员会发出详明通告历举两年来右派党员之反革命行为以警戒党员勿为所感，均志上周本报。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二十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我们料到全国党员不但不附和，而且将因此引起一个更大的团结。"革命派团结起来"是廖仲恺同志倡导的口号，"要革命的向左边去"是汪精卫同志倡导的口号，在今日这两个口号必然要普及于全国各地革命同志及革命民众之间。我们从听到下列各处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声浪，推知这两个口号之必然普及于全国。

（一）　北京执行部首先反对

北京执行部报告书云。径启者。本党监察委员谢持，自离粤来京，对于广东党务及政治措施，即有许多不满意之表示，并向本党在京要人作破坏广东政府之鼓吹。而广东外交代表团来京后，本部曾作大规范的欢迎，以为彼等定将广东政府真相宣布于北方群众之前，而打消一般之怀疑与谢等之谣言。不料彼等到京后，总代表林森秘书邹鲁等，不但不为国民政府有利的宣传，且作与谢持等如同一鼻孔出气之反宣传。林森同志在三千余人欢迎会上，公然说"无论北政府南政府一概都是不可靠的……"等等荒谬言论。上月此间忽接到上海哲生，楚伧，玄庐，季陶，理鸣，诸同志来电促慧僧，溥泉，右任，觉僧，季龙，子超，海滨，衡青，石曾，青阳，诔熏诸同志赴沪开会。电中有谓尽于十日内南下开会，经费已有办法等语。嗣以此间同志多不能前往，于是又来一电，请此间同志就近在京开会。至此会议内容如何，本执行部常务委员既不在被邀之列，无从详知。但由谢持，邹鲁，林森诸同志在京举动观之，则其内容必不利于本党及广州国民政府可知。广东外交代表团于本月十四日抵京，而邹林等终未来执行部一谭。忽于二十一日邹林两同志来本执

行部，声言限本执行部于两日内召集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而又不以会议何事相告。当时本执行部常务委员王法勤同志去西安，丁惟汾同志去张垣，只于树德同志一人在京。乃答复林同志，大意谓本党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原定至迟于本月二十六日开会，现在为期已迫，诸委员应赴广州开会，不宜在京集会，以免决议之冲突。即或召集会议，亦须有两个常务委员负责召集，丁惟汾同志日内返京，可少缓一二日云云。不料此信去后，邹林谢傅茅石（衡青）诸同志大不谓然，乃由个人出名，定于十月二十五日在翠花胡同八号开谭话会。是日于树德同志以赴天安门国民大会，未能出席。乃是日上午十点钟时，谢持，傅汝霖，邹鲁，林森，石衡青，茅祖权，诸同志率领四五十人，尽系同志俱乐部及民治主义同志会分子，到本执行部，一面派人将大门把守，一面派人把持电话，入内翻箱倒柜，墙角厮所等处搜查，一若强盗入室，诚不知是何用心。幸而是日本执行部人员皆到天安门参加国民大会对于关税会议示威游行，无人在部，得免于难。计是日丢去执行部小印一方，薄册若干种。惟本执行部门前，近日常有便衣侦探，往来梭巡，一切重要文件，皆收藏妥当，故是日并未丢落重要文件。是日邹谢林等连名发出通告，定于次日（廿六）召集北京中央执行委员正式会议。二十六日本部常务委员于树德同志在本部候其开会，至九时顷，同志俱乐部民治主义同志会分子三五成群，来本执行部。问其何事，则答云开非常会议。问其何人所召集，则云不知。令其签名，则皆签一假名，或不肯签名。迨至十时顷，谢林邹相随而至，已达二三十人，大半皆持铁手杖，其势汹汹，大有用武之势。适是日有许多党员来本执行部齐集，预备出发赴新华门示威（北京示威运动分廿五廿六两天），彼二三十人始不敢动手，邹鲁同志到部一见人多，即行走去。谢林等候甚久，只有傅汝霖茅祖权到场，至十二时顷，吴稚晖先生亦到场，终以执行委员到者甚少，乃各散去。十月廿八日，见联合通讯社稿，及廿九日黄报新闻，皆登载谢持等又作“反共产运动”新闻一则。大意谓谢持等联合北京同志俱乐部及民治主义同志会，欲强占共产派所把持之北京执行部，以共产派早有预备，此种计划，乃归失败，只大骂共产派于树德而返云云。按此新闻，必系同志俱乐部人所发，吾人始知谢持等所以带领若干人来执行部者，实有极深之阴谋，而绝不料被集合以待出发之示威群众无意中破坏之也。按邹林等身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又为广东外交代表团政府代表，来京后既不为政府宣传，已为失职辱命。而况更作反宣传，其应受若何之惩罚乎？谢持身为本党监察委员，又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对于失职辱命之反宣传之邹林代表，不但不加闻问，且更借彼等来京之便，以遂其掠夺北京执行部之阴谋，真所谓丧心病狂者矣。其余如石瑛久已自行辞职，誓不闻问党事之执行委员，今亦忽随同志俱乐部及民治主义同志会分子前来本执行部捣乱。傅汝霖乃候补执行委员，宝任此次捣乱本执行部之总指挥。茅祖权实为其参谋。其余若邹德高，姜绍模，张开铭，黄英，陈兆彬，彭革陈等，皆前来本执行部捣乱。甚至如段政府国民代表会议华侨代表林森，亦冒称委员来捣乱，真所谓本党无奇不有之怪现象矣。至今彼等是否尚再来本执行部捣乱，此次尚不敢定。不过彼等俱乐部与同志会之间，似有破裂之痕迹（由联合通讯社之稿及黄报新闻可以推知），而邹林谢等则将别有所图。现闻彼等四处运动此间老同志，将发攻击共产派及不利于国民政府之宣言。此事尚不知能否实现。谨将此事前后经过情形，据实陈明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如何处置之处，即希中央斟酌施行是幸。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

（二） 广东省党部继起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上海执行部，各省党部，各级党部均鉴。前接北京邹鲁林森等同志，由北京发来一电，主张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不胜骇异。全国代表大会，早在本年五月第三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断难任令少数党员，违背党纪。而且北京为军阀及反动分子所包围，无论如何，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于北京，万无良果。法理事实，都不可行，其结果惟有使党纪败坏，受人利用。现本省同志誓以全力拥护前此在广州开会之决议，本省党部亦只知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之决议案，不知其他。苟有利用在京开会，以破坏本党之行为，本省党部惟有恃力所至，扶持正义。除一面电请在京诸同志兼程回粤开会外，特此电达。万望各省同志一致主张，拥护前此决议。谨此宣言。广东省省党部东。

（三） 广州特别市党部尊重汪精卫等感电

广州特别市党部通电云。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各级党部，海外各总支部，本市各级党部同志均鉴：顷据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同志等感日通电，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人等对于决议，一致尊重。（中略）所望吾党内外同志，顾念总理遗教，尊重本党纪律，蠲除意见，敛抑客感，迅速来粤开会，彼此咸以党国为前提，则何事不可解决。昔有人言，凡举事毋为亲厚者所痛，曁仇者所快，愿吾同志感念总理在天之灵，于此言三致意焉。谨此宣言。敬候明教。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四） 上海市第一区第五十四分部请中央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犯党律之非法会议。

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转全国各省各市党部，暨各区分部均鉴。报载林森委员等署名在北京召集所谓第四次全体会议，且为期甚速，委员等疑怪至深。全体会议何事，北京为何地，非法召集已难缄默，况会议乃在段祺瑞政府肘腋之下。（中略）本区分部今一致决议，请中央即日电京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犯党律之非法会议。迫切陈辞，并盼电复。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第一区第五十四分部执行委员会。

（五） 上海市第一区第十三分部请立行制止严加查办，以重纪律。

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见报载有林森等十五人，擅在北京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之讯，查与向例不合。彼等所用之筹备处名义，不知何所根据。且特定在军阀盘据之北京开会，显系另有作用，迹近叛变。应请立行制止，严加查办，以重纪律。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第一区第十三分部执行委员会。

（六）海外各总支部支部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福建省党部到第二次全国大会代表联合通电对于北京开会不胜诧异一致拥护汪精卫等感电

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内外各级党部各代表均鉴。报载林森邹鲁等联名通电，在北京召集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等阅悉之余，不胜诧异。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在本党指导之下之革命政府所在地开会，已由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有案。北京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两重压迫之下，本党最高党部会议及全体生命所托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若在该地开会，势不能不受其摧残。此种无代价之牺牲，实为忠于党国者所不许。本党本先总理遗训以党治国，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国民政府负有监督，指导之责，为实行本党根本主张，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尤非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举行不可。中央执行委员会汪兆铭诸同志，感日通电议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革命纪念会开会议决，对于感电主张，一致拥护。且查国民政府数月来一切措施，多能遵照党纲进行，如肃清杨刘，肃清东江南路逆军及一切反革命派，皆有事实可见。统一广东已在目前。对于交通与会议之安全，已有切实之保障。尚望各地中央执行委员，依期到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并望海内外各级党部，以全力拥护在粤开会之主张，即派代表到广州，俾党务得以解决，革命工作得以继续进行，是所厚望。谨此电达，诸维公鉴。古巴总支部代表麦兴华，澳洲总支部代表王健海，缅甸总支部代表许苏魂，暹罗总支部代表刘诵芬，日本总支部代表陈季博，古巴夏湾拿支部代表罗安，暹罗第一二支部代表林超伯，南洋英属吉隆坡支部代表王月波，英属吉樵庇能支部代表崔广秀，英属巴生支部代表郑受炳，英属巴生港口分部代表王瑞庭，荷属万鸦老支部代表邓范生，荷属棉兰亚齐支部代表冯少强，英属麻坡支部代表张东华，印度吉打分部代表凌棠，安南高棉支部代表冯宝琚，南洋芙蓉支部代表胡文，邓子实，河内海防支部代表莫杰，湖北省党部代表董用威钱介磐蔡以忱，女特别委员袁薄三，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刘伯垂向忠发女特委员谭芝仙，福建省党部代表李觉民，女特别委员王兆惠等扣。

（七）上海市第一区第十二分部谓北京擅自集会蓄有阴谋与本党前途革命事业大有不利

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鉴。近有林森等在北京假借名义擅自集会，系留有阴谋，与本党前途与革命事业大有不利。总理逝世未久，内部遽起变乱，言之痛心，请迅行制止严行查

办，以遏乱萌而肃党纪，不胜盼祷之至。上海市第一区第十二区分部全体党员梗。

（八）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谓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上海执行部，各省各级党部，海外各总支部均鉴。刻读广东省党部东电宣言，拥护中央第三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之决议，在广州开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反对林森等在京铣日所发之通电在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议，词义懔然，本会议极表赞同。盖本党自改组以来，党务进步，日趋发展，此虽由各同志努力之所至，然党纪修明，组织完备，亦未始非一原因。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更从而破坏之，其危险殆甚于反革命之敌人。查在京开会违背决议案，于法理固不合，即在军阀势力范围之内，而开本党最高会议，势亦有所不能，适足以生纠纷，而资敌人以机会。在京诸同志不乏明达，处此风雨飘摇之际，当念同舟共济之心，无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应请早日回粤开会，团结革命实力。本会议惟有竭其精力与广东省党部诸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前此第三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各省同志务请一致主张，以维党纪。谨此宣言。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冬叩。

（九）香澳总支部望海内外同志尊重孙总理遗嘱

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各级党部，广州市党部，海外各总支部同志均鉴。现奉中央执行委员会汪兆铭同志等感日通电，决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复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志等决议一致拥护，查北京乃军阀派所在地，自不应为开会地点，此理显明。今定在我革命策源地之广州开会，我海内外同志，当然认为必要。现在帝国主义及反革命之徒，互相利用，以害吾民，而我国民革命军非朝夕可能铲除此辈，因此大家须要蠲除意见，团结实力，勿念一己之私，迅速来粤开会，各展所长，则救国后盾，有所端赖。当此一发千钧之际，尤望海内外同志，尊重孙总理遗嘱，努力国民革命，以党治国。则我民众幸福实现，永享平等自由，谨此宣言。中国国民党香澳总支部。

（十）江苏省党部谓发起会议之覃石石居茅等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有关系

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均鉴。此次中央执行委员居正石青阳等，竟违反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十七次会议之决议，贸然在北京召集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本党部不胜骇异。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十七次会议决议，大会既已展期，第四届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亦照展至大会开会前三星期，并通过政治委员会，函报该会。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只可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之广州举行，以便行使指导监督之职权。按此次居

正石青阳等所召集之开会日期及地点，显系违背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而欲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标榜异议。且其开会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召集，于此既不合法，而具名通知开会者，竟有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有关系之覃振，石瑛，石青阳，居正，茅祖权等在内，尤属难索解人。本党此时之革命工作，南北均在发展中，全国同志均应一德一心协力工作，即有意见，亦当在本党最高权力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解决为合法。居正等不此之图，而竟召集非法会议，似此迹近阻挠革命工作，本党部除已电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速即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重要问题外，对于此次北京非法会议，无论其所议结果如何，不认为有效。兹将郑重宣言，务祈凡我同志一致主张，本党幸甚。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

（十一）东江各县国民党代表大会反对任何党员之分裂主张分裂行为。广州中央的一切议决系遵总理遗嘱无可指摘。开除北京同志俱乐部分子，肃清杨刘魏胡张郑莫熊诸叛徒，许胡同志出洋许许同志休假，均毫无错误。代表潮梅海陆丰二万余党员全力拥护中央。

东江各县国民党代表大会昨在汕头开会有拥护中央委员会的议决案寄到广州。其“议决案”云：本会听了东江组织主任周恩来同志关于党务经过的报告，认为本党中央一切措施均适合总理遗嘱，及其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而无违。大会代表潮梅海陆丰二万余党员，誓以全力拥护中央革命统一的主张，誓愿为党的坚强后盾，并成立下列四项具体之决议。（一）大会认为自总理北上奋斗后，一年来党内反革命分子的分化，如北京同志俱乐部等份子，妄以国民党为其招牌，投北联唐，明言联活〔合〕，暗实卖党，此种放弃革命主张，违背总理遗嘱，壹意猎官之党员，中央与以开除，实属名正言顺，且为正本清源之一大工作。（二）大会认为本年党军回师广州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成立国民政府，指挥党军，次第削平杨刘之乱，扑灭梁（鸿楷）魏（邦平）胡（毅生）张（国贞）之变，解散郑（润琦）莫（雄）熊（克武）叛变之师，收复东江，肃清南路，实为继承总理遗志，除祸粤害民假党为恶的军阀，驱逐帝国主义的滋长之势，一新国民耳目，此盖不仅雪总理数年来党令不行之恨，且更示民众以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实足为人民所有。（三）大会对于中央许胡汉民同志出洋考察，许崇智同志休假，认为毫无错误。盖胡同志在广东努力已经将总理遗嘱唤起民众，做到一部分成功，今更远适欧美，至少我们可希望而肯定胡同志必能切实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造成国际的力量，来完成国民革命。许同志休假原欲促成广东军政统一，实现广东和平。今此目的渐将达到，许同志所愿已偿，正可慰总理在天之灵而无憾。（四）大会立在总理遗嘱的指导之下，认为我们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是统一的，是整个的，反对任何同志的分裂主张，分裂行为。总理死后广州中央的一

切决议，原为遵总理遗嘱而行，无可指摘，乃竟有少数同志，不依中央规定，自行召集中央会议，此对彻于私感，远于事实，背乎党纪，为潮梅海陆丰同志所万不能承认，为中央党部万不能容许。潮梅海陆丰同志只遵总理遗嘱，努力国民革命，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革命统一主张，要求党的整个，一致反对分裂到底。

（十二）番禺县党部谓北京会议近叛逆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市县党部，上海民国日报转各省党部，各市县党部，各法团体。林森等擅发通电，在北京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大有破坏本党及国民政府之嫌。窃思北京尚在军阀暴力之下，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均不能自由，安有以最高党部会议，激言召集。且违背中央决议案，形同反叛。大非吾党同志所当为。本县党员对于中央定期在广州召集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誓一致尊重拥护。伏希发为谳论，以靖群邪。谨此宣言，伫候明教。中国国民党番禺县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东印。

（十三）上海市第一区第十六区分部请严行查办以肃党纪

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第一区第十六区分部致电中央党部云。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同志钧鉴。近有林森邹鲁等忽以筹备处名义，擅在北京西山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迹近捣乱党务，应请迅予制止严行查办，以肃党纪，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第一区第十六区分部全体党员。

（十四）上海市第二区二十二个分部谓北京会议不合之点有三

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林森戴季陶等十五人，在北京用筹备处名义，召集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竟于昨日宣告开会。查（一）筹备处名义为总章上所无，（二）该同志故在段政府反动势力之下集会，（三）发起会议列名中，有未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脱离关系之石瑛，居正，石青阳等反革命分子。此种会议，显欲破坏本党。乃本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该会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职权之通电。该会既无根据，通电何生效力。职区分部等一致否认，并请中央对于该同志等之捣乱行为，从严查究，并宣布北京西山会议议案，完全不生效力，以遏乱萌，而肃党律。临电不胜逼切之至。耑此只颂党祺。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二区第一，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等二十二个分部呈。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五）上海市第一区第五十三分部谓个人不能违叛党律自由行动

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鉴，报载林森戴传贤等，用筹备处名义，在党〔京〕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本区分会同志殊深骇异。查本党党纲应由贵会议决，饬秘书处召集始为合法。个人可违叛党律自由行动，则将来党员各标异帜，四分五裂，谁尸其咎。应请贵会迅予制止，并加此辈以惩处，以肃党纪，而效儆尤。中国国民党上海市一区五十三分部叩径。

（十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特别党部谓谬然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尽为彼等破坏而无余。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转全国各省各市党部，各区分部均鉴。报载林森邹鲁，署名通电在北京召集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阅之不胜骇异。查全体会议，关系党务前途何等重要。非仅在反革命势力集中之北京不能举行，而尤以舍革命策源地之广州，更无可适当之处。况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有案。乃林邹等此次充外交代表使命而北上，未闻于所负职责有所建白，竟谬言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事虽已经中央驳斥，国内外各级党部，又皆电请制会，若辈阴谋因无从售。但以身居要位之党员，而违反全体遵行之议决案，有如此者，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必尽为林邹等破坏而无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凡我党员，岂宜缄默。特此电达，诸维亮照。中国国民革命第二军特别党部，冬。

（十七）上海市第一区第二十一分部请予制止以肃党纪

广东中央执行委员会均鉴。敬启者。报载林森等十五人擅假筹备处名义，在北京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破坏本党纪律，应请迅于制止，以肃党纪。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第一区二十一区分部全体党员启。

（十八）南京市第三区党部谓居正石青阳等均列同志俱乐部而未声明脱离关系

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最近北京所召集之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既未经合法手续召集，复不在本党革命根据地举行，居正石青阳等均列同志俱乐部而未声明脱离者，违犯纪律，莫此为甚。此间同志誓不承认此非法之会议，尤望广州中央执

行委员会诸同志，折彼之奸，发彼之复，俾彼辈丑态尽露，而党纪以伸，党务前途，庶其有豸。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中国国民党江苏南京市第三区党部叩沁。

（十九）南京市第一区党部誓不承认插足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之石青阳等所开会议

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插足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之石青阳等，近在军阀政客盘据下之北京召集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曷胜骇异。查此举显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十七次会议之决议戾背。且其召集手续，亦不合法，蔑视党纪，莫此为甚。属部誓不承认，恳即按律以绳，借伸党纪。中国国民党江苏南京市第一区党部叩沁。

（二十）宁波市党部谓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

呈为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在北京西山不法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希图破坏纪律，卖党求荣，请中央通电否认设法制止事。窃属部于本月二十二日，接得临时浙江省党部通告内开，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已定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已在党报布告，兹据京电准梗日起开会，贵党部及所属党部如有关于党务之意见，因时期已迫，准予径寄北京会所，无庸再转本部，以冀迅速，特此通告等语来此。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向例须由广州执行部召集。今林森等不特未得广州执行部同意，且未得京部赞同，而擅以私人名义召集。实属违法已极。此属部所万不能承认者一也。广州为国民政府统辖之地，中央党部之所在，是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应在广州举行，庶便行使指导监督之职权。今彼竟舍此康庄大道而不行，反就反动势力弥漫之下北京开会，司马昭之心，已不问可知。此属部万不能承认者二也。查此次列名召集开会者，除林森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外，尚有石瑛，覃振，居正，石青阳，茅祖权等其人。石瑛等均与北京俱乐部尚未脱离关系，显系极端反革命分子。今彼等竟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违法舞弊，于斯已极。此属部所万不能承认者三也。根据上述理由，属部于彼等此次以私人名义召集之非法会议，取积极反对态度。伏乞钧部迅即训令林森等阻其集会，并请通告国内外各级党部各同志等，否认此种非法会议，使此辈不法党员无所施其伎俩。本党存亡，视此一举。除在上海民国日报上通电反对外，谨此上闻，惟冀钧裁。不胜盼祷之至。此呈中央执行委员会。浙江宁波执行委员会。

（原载《政治周报》2期，1925年12月出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駁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中国国民党自去年一月改组后，党内革命空气陡见紧张。两年以来，在党务上在民众运动上均有确实之发展。然因工作之进行，党员之间不免勤惰各别；对于革命政策，亦意见亘殊。于是显分左右两派。惟右派人数极少，且皆属腐败懒惰分子，日惟升官发财为念，慑于积极革命之不利于升官发财，乃大反对。廖案起后，一班革命意志强固之党员，看明白此乃革命反革命之分水线，乃奋其不妥协手段削平一切反革命分子，因以巩固了广州的革命政权。然因此懒惰右倾分子倚靠国民党升官发财之路愈绝，其怨愤情状亦愈加甚。尤其无状者，竟不惜勾结熊克武企图倾覆国民政府，进而与南方之陈炯明北方之段祺瑞相联结，完全抛弃革命地位而站入反革命的地位。不料国民政府东征北讨，熊陈势力根本铲除。此辈计穷，乃怂恿少数在京沪之中央执行委员，谋托于北方军阀势力保护之下，通电主张在北京开会，要求在粤委员赴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即复电驳斥，并就法理事势两方面万万不能在京开会之理由，电告各地各级党部各同志使大家明了此意。兹将两电照录于次：

致北京电

北京东城翠花胡同第八号转于右任，李大钊，王法勤，丁惟汾，于树德，恩克巴图，诸同志鉴。本日接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邵元冲，邹鲁，戴季陶，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吴敬恒，茅祖权，傅汝霖等铣电，致广州汪精卫，谭组安，熊锦帆，谭平山，林祖涵，邓泽如诸同志，称已于铣日决定梗日在碧云寺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等语。兹严驳如下：（一）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全体会议，只能在广州开会，已经决议在前，并已定期开会，何得违反决议。（二）此举显然未得北京执行部之同意。（三）熊克武已因通敌被捕，听候审讯，何得通电请其□京，公□□□中央决议及政府命令。以上三点，以中央委员而举动□此，实为可耻，惟背签之事，已成习惯，望北京执行部诸同志切实查明，如系背签，请复电声明。其主动者，应施行惩戒。中央执行委员会苛。

致各级党部电

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近接北京中央执行委员林森等铣（十一月十六）

电，主张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复电严驳。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今年四月间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未半，即中辍南下，继续开会于广州，即基于此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岂可复蹈故辙，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隐谋。况第二次全国大会原定八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嗣因省港罢工，交通梗塞，广州扫除反革命派，战事频仍，以致屡次展期。兹者广东全省统一，广州安如磐石，纵使交通颇感不便，亦无碍于开会。故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诸同志尊重决议，愿念事势，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除胡汉民同志现在莫斯科，李烈钧柏文蔚两同志于役京外，已电征同意外。弟等一致尊重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之主张，并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谨此宣言，诸维鉴察。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谭延恺，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感（十一月二十七）。

观此，则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必须在粤开会不能在京开会，已十分明了。惟尚有一部分人不甚明了党部组织者，以为署名通电召集在京开会者，已居委员之半数，纵使前已议决全体委员及代表大会须在广州开会，惟署名者既占多数，亦应服从。不知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原有二十四人，候补委员十七人。执行委员除在中央党部执行职务外，余分在上海北京各执行部，谋党务之活动，其余则有监察委员五人，候补五人。其人名如次。中央执行委员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传贤，谭平山，谭延恺，杨希闵，李大钊，于树德，邹鲁，王法勤，丁惟汾，居正，覃振，李烈钧，于右任，恩克巴图，叶楚伧，石瑛，熊克武，石青阳，柏文蔚，林森。候补执行委员则为邵元冲，林祖涵，邓家彦，沈定一，瞿秋白，张秋白，李宗黄，彭素民，于方舟，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张苇村，白云梯，张知本，茅祖权，傅汝霖。其中执行委员张静江辞职，廖仲恺逝世，杨希闵熊克武及邓家彦李宗黄等皆以先后谋叛除名，以林祖涵邵元冲沈定一递补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为邓泽如，张继，谢持，吴稚晖，李石曾。候补监察委员为蔡元培，杨庶堪，刘震寰，许崇智，樊钟秀。而刘震寰因叛乱已除名。查北京署名召集开会者虽有十五人，惟执行委员仅得其九，余则为监察委员或候补委员，而监察委员则向无表决提议之权，既无冒签情弊，亦仅为全体委员之最少数。况其中多有冒签者，不日即可证明。而吴稚晖且当数日前政〔致〕汪精卫函，声明后此凡京中一切通电或函件，非经本人签字，一律无效，盖已明知京中少数不肖分子，或有此等谬举矣。

（原载《政治周报》1期，1925年12月出版）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一九二六年一月）

子　任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

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满清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改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咨议局化身，咨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目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

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帅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帅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〇〇·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扫平郑莫，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

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惟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象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原载《政治周报》4期，1926年1月出版）

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同志：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个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也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

（原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議紀录》）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

恽　代　英

今天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日子，我本无话可讲，因为所有的好话，都给各位同志说完了。但是由今天的情形回想到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时候，我想不但我们同志承认，而且凡中国国民也都承认，我们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永远纪念价值的一个大会。因为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发达，已比前不同了，全国革命的运动，比前进步得多了，这都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绩，都是因为第一次大会以后同志们受总理的指导，决定了种种方策而能够努力工作的成绩。现在在这里的同志，应该想到要这回第二次大会象第一次大会一样的有价值；一样的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永远纪念的价值。

要想使第二次大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纪念的价值，我们就要怎么样呢？要说的话很多，现在单说两件事：

（一）第二次大会以后，我们的党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党。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也要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虽然是好，但仍有许多缺点。最易见的还是缺乏森严的纪律。两年以来党中发现不少明白违背党的纪律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毫无办法去制裁他们。这就表明我们第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在太没有力量，表明我们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太没有力量。大家都知道我们议决了很多的议案，不是要说空话，是要实行的。怎么样才能够实行呢？就要靠大家同志回到各地以后，把这种议案，告诉给一切党员知道，训练他们，使他们每人都能够为这种决议案去奋斗。现在本党的内面、外面，都有许多人想妨害我们的决议案，我们同志应当加倍努力，要使第二次大会以后，本党比以往的两年更有力量。把应该做的事情，一一实现出来，不许甚么人能妨害我们。已往的我们不谈了，因为虽不很好也不很坏。我们只是要本党以后更好。因为中国革命是很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党，很需要一个真实能够有严整的纪律、而能实践各种决议案为民众利益奋斗的革命党。

（二）第二次大会以后，我们同志要更加认清楚本党的主义。两年以来最妨害本党的进展的就是什么主义之争。比方有些人常说那班人是共产党员，那班人是纯粹国民党员。这种分门别户的办法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只有使党员之间生出很大的隔阂。有那些存心破坏的人，说什么我们只要三民主义，我们要反共产。但究竟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们那里懂得。很简单的说，讲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定是反对帝国主义，一定是反对军阀，一定是要为平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农工——的利益奋斗。必如此乃可以言国民党。不如此者决不配称做国民党。也有许多人见我说这话，又说我这是宣传共产主义了。不错。共

产主义者或者亦要宣传这种道理，但我要反问三民主义者就要反对这种道理吗？

在这几天开会之时，最高兴的就是我们的党，不特不因孙先生的死而涣散，反转而更加团结；不特不因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反对而分散，反转更有精神更有力量。从此以后，我们一定会见着本党一天一天的更加进步，三民主义也一天一天的更加明白，为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所了解所信仰。最可怜也可笑的，是许多现在或者已经脱党的人，他们不知自己的主义是什么，天天说这个是共产党那个是共产党。稍有一点意见和他不同，他马上就要说你共产党。一般老同志，常常说国民党如此下去，快就要亡党了，党给人家夺去了，如西山会议这班人，就是此种思想之代表。他们对于这回第二次大会的心理，就是：说“在广东开会的党员通通都是赤化的。国民党在这一回一定给共产党拿去了”。但我问问各位同志，你们都是已经赤化了么？究竟党有给共产党拿去了没有？实实在在的说，本党虽创立十多年一直到现在，才真实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才真实是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们说亡党，不错。冯自由、谢持、邹鲁的党确实是已经亡了！至于孙总理的党，不但未亡，而且到现在为全国人民所了解所信仰。什么是孙总理之党，就是信仰而且实行三民主义的党。这个党是没有亡的。亡了冯自由之党，这有甚么可惜呢？我们正在剧烈反对冯自由、谢持、邹鲁的党。我们要每个同志都能够明了要真正为总理的主义来奋斗，那才是真正的国民党。至于有相信冯自由、谢持、邹鲁的主义的人，我们请他走开。我们希望第二次大会以后再没有这等人。各位请看，冯自由跑了，广东便好了，我们要冯自由这等人做甚么呢？他们不是真正忠心于总理、忠心于三民主义、忠心于本党的。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些人开除了许多，亦只是为这个原因。那末，或者在第三次大会时亦许要把我开除掉。如果我到那时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打倒军阀反对为被压迫的农工奋斗的，我承认我是应当被开除的。不过这一次我在上海是已给他们（西山会议派）开除过了的，他们这种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开除，我却不能承认。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开除我的理由，只说我是共产派。但姑无论我是不是共产派，我要请问共产派是违背了民族主义或民权主义或民生主义吗？如果没有违背三民主义，便是一个共产派亦没有被开除的理由。我相信我始终是站在总理的三民主义这一边的（不过绝对不是站在冯自由的甚么主义一边）。如果各位同志发现我真正有违背三民主义的行为，当然可以马上开除我象开除冯自由等一样。

那末我当真是永远忠心于本党的事吗？也不一定。如果本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我的入党是因为想做官吗？想认识某要人吗？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这是冯自由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总理的国民党了，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

总而言之，各位同志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派，只要问我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如果有违背三民主义去做反革命的事情，便马上可以拿去枪毙。如果没有，便不能开除。我的理由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说我是共产派，我这个共产派便是这样主张的。

（选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議記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会1926年4月印行）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年）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总理孙先生召集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广州。大会以一致议决，通过总理提出之宣言。其宣言内容：首在说明中国之现状，次为对于三民主义之解释，次为最小限度之政纲。自第一次代表大会闭会以来，本党同志，在总理指导之下，努力奋斗。总理更于此时，制定建国大纲，完成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之讲演。更于挺身北上之际，发布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宣言，而殿以最后之遗嘱。凡总理之所言者，必以力见之于行。本党同志，以总理之言为轨范，以总理之行为表率，无间生死，以迄于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深念总理之遗教，综核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之事实，确信总理所定之主义及政纲，实为今日中国之唯一生路。谨按诸世界现状，中国现状，及本党努力之经过，宣言如左：

第一　世界之现状

总理遗嘱有言："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国不自由不平等，曰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孰使此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加于中国，曰帝国主义。故打倒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之第一工作。而打倒帝国主义之必要方法，总理于遗嘱中，亦已明告曰，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谓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有已能以其自力，打倒帝国主义，自致于平等，同时以平等待我者，如苏俄是。有与我同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期相与努力，以打倒帝国主义者，如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压迫民族是。此等民族，对于平等之观念有二：（一）自求平等，（二）同时求他人之平等。合此二观念，故民族运动，与国际运动，实为相须，而民族主义，与国际革命主义，其内容实为一致。惟其如是，乃能与以不平等待人之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本党既抱此目的，故对于苏俄，以诚意与之合作，虽受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之种种诬蔑，种种挑拨离间，而继续进行，初不因之少挠。至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压迫民族，以地位相若观念相同之故，其联合实出于自然，且其联合之程度，亦日以密切，请析言之如下：

欧战以后，世界地图，实表示一幅人类被奴隶之可怖的写真。如世界全面积等于一万三千四百万方基罗米突，则属于帝国主义及被管辖于帝国主义之殖民地，其面积等于九千万方基罗米突。如世界人口为十七万万五千万，则其中有十二万万五千万为帝国主义之牛马奴隶。英国为帝国主义之巨擘，其本国面积仅三十一万四千方基罗米突，而其殖民地之面积，则为约四千万方基罗米突，盖百三十倍于基本国面积矣。英国本国人口，仅四千六

百万，而其殖民地之人口，则为四万二千九百万，盖一英人与九殖民地奴隶之比矣。法国本国人口，仅三千九百万，而其殖民地人口，则为五千四百万。甚至渺乎其小之比利时，其本国人口仅七百万，而其殖民地人口则一千七百万。日本之殖民地人口，几与基本国人口相等。此犹专就殖民地而言耳。至于半殖民地，如中国暹罗等尚不在内。帝国主义者以极少数之本国人民，而能驾驭大多数之殖民地人民，其工具有三：

一、高度发展的工商业，庞大的资本积聚。此等资本积聚。能供给帝国主义者以伟大之信用。

二、强大的海军及航空队，能使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民族，虽蓄怨望，谋反抗，而卒不能脱离其势力范围之外。

三、强有力的宣传机关，若千百种之新闻杂志，若千百种之学校，若教会及戴面具的慈善事业，若无数受熏陶于统治殖民地人民的精神之官吏，皆足以为帝国主义之喉舌与爪牙。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奴隶，不特有摧残的能力，而且有麻醉的作用。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不特能幂蔽其罪恶，且能使人相与歌功颂德之不暇。

有此三者，帝国主义之历史，乃能趋于发荣滋长，以极少数之人类，乃能强制大多数之人类，而使之屈服。然而欧战之后，帝国主义之基础，已被动摇，其所以使之动摇之条件如左：

一、帝国主义之最庞大者俄罗斯帝国，已归于复灭。其结果使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脱离帝国主义之区域。同时使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在自求解放的奋斗中，得一先进者以为之指导。此为帝国主义之一大损失。德意志帝国，本亦为帝国主义之极猛烈者，而以战败的关系，受其他各个帝国主义者所排斥，而处于被抑服之地位。此亦为帝国主义之一大损失。盖不啻帝国主义家庭中之分子，因减少之故，而即于衰微也。

二、各个帝国主义者中，以利害冲突，而互相妒忌，互相排拒。英国对于法国之陆军与航空队，极端猜嫌，乃于近东及欧洲大陆，为不断的暗斗，例如洛加拿协定，即英国所设之圈套，欲使德国入其玄中，而即利用德国，以对抗苏俄，并于相当时机，对抗法国。此等帝国主义之互相冲突，适足陷于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之陷井中，而莫能自拔。而东亚帝国主义之日本，则又以美国在太平洋与在中国之经济势力之增涨，认为相逼太甚，谋以海陆军之势力，摧挫而复灭之。凡此各个帝国主义者间之互相冲突，皆所以自暴其弱点也。

三、在欧战中，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工业，骤形发展，其天然结果，适为工人阶级之发展，工人阶级已以可惊之速度，而成为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时更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的地位。

四、为帝国主义巨擘之英国，其殖民地虽广大，而于经济上已与本国脱离，由是其加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缧绁，亦更为严紧。法国本国之领土，被毁于欧战中之枪林炮雨，则欲尽其力所能至，刮削殖民地，以为之补偿。于是此两帝国主义者之殖民地之奴隶，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乃不得不挺而走险，为不断的骚动与反抗。

五、一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已于继续的民族运动中，表示其自觉。此等自觉，因苏俄与土耳其之革命独立，与以暗示，且与以模范。其最大之意义，则为苏俄与土耳其能以民族群众的势力，而打倒强有力的帝国主义之军队也。

六、在帝国主义之本国以内，因劳动群众之失业，生活程度，日以低落，货币日以低价，不得不陷于贫穷之境遇。而货币跌价，且使中等阶级，失其储蓄之资。此种经济上之惨淡与恐慌，足使阶级斗争，更形激烈。其结果必至于将大多数民众驱入革命的战线以内，而此大多数民众，又必同情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愿与之合作，为解放而奋斗也。

由此种种，可断定帝国主义之基础，已被动摇，其崩溃之期，必不在远。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及民众，联合奋斗，实足为其致命之伤。中国之国民革命，由中国言之，为中国民族之自求解放。由世界言之，为一大部分人类之自求解放。故中国之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中国人民从事于国民革命，决非孤军转战，若苏俄，若世界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若帝国主义本国内之被压迫民众，皆与中国之革命民众，立于同一战线者也。试错〔借〕举事实如下：

美洲之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等国，其共和制度，为美国所蹂躏，其城市为美国海军所占据，其国民为美国所摧残，其宪法为美国所修改以适合美国银行家的利益，其自决权被拒绝，其独立被完全打销。此外尚有无数黑人种，为自命民主先进国所压迫所剥削所虐待。夫压力愈重，则反抗力亦愈大。故夏威夷之爱国团体，墨西哥之农工党，全美洲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黑人之救国保种的组织，皆一致努力，以求其种族或民族的解放。

普通的观念，皆以为欧洲乃帝国主义的老巢，在此老巢中，必不至尚有被压迫的民族。按之实际，则殊不然。阿尔塞斯罗伦，欧战以前，被德国帝国主义所压迫，欧战以后，被法国帝国主义所压迫。四十五年以来，法国以阿尔塞斯罗伦由祖国沦于异域，引为莫大之悲哀，其实则法国工业为阿尔塞斯罗伦之煤铁而悲哀也。1918年以来，阿尔塞斯罗伦，重归于所谓祖国，以尝试法国帝国主义之压迫，乃较德国帝国主义之压迫为尤甚。前以二十万操法语之民族，受德国民族主义之压迫，今则以一百万操德语之民族，受法国狭隘的爱国主义之压迫。法国政府，在学校，在官厅，在法庭，在商业上，禁止土人之操土语，法国政府所派遣之官僚，宪兵，警察等，所在充满，为严厉之监视。青年被强迫而在殖民地的军队中服务。工人运动，遭迁最严酷摧残。于是阿尔塞斯罗伦之人民，因工人与农民的团体之指导，已宣言自主。

其在墨西托尼亚，（Maccdonia）有居民二百三十万，在其历史中，已以不断的奋斗，而求其民族之独立。乃凡尔赛条约，竟相与瓜分之。南斯拉夫取其五，希腊取其四，布加利亚取其一。此等新兴之帝国主义者，其对待墨西托尼亚，一如法国之对待阿尔塞斯罗伦。对于所征服人民，务压抑之，或使之同化。此实为现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共同政策。而此种政策，实受国际联盟所拥护。为是之故，墨西托尼亚之革命党人，已于联邦派指导之下，努力进行，以求实现其国家独立，及为巴尔干半岛革命的联邦。

其在皮沙拉比亚，（Bssarabia）布哥维那，（Bakovina）西里西亚，（silcsia）克洛西亚（Croatia）诸地，其民族所受之待迂，与墨西托尼亚大略相同。故此等民族，已各准备其战斗能力，以求脱离奴隶之待迂。

其在非洲，被压迫的民众，已由沉睡而即于猛醒。自地中海以至好望角，反抗帝国主义之空气，弥漫于黑人及阿拉伯人的大陆。其民族革命运动之最显著者，为里夫（Rff）的战争。里夫民族，为数不及一百万，而能与世界上开拓殖民地最早的西班牙，及世界上陆军最强的法国，为勇猛的对抗。里夫民族革命运动之领袖，为阿白尔克里

姆，（AbEIKrilm）以所部兵六万五千，击败西班牙兵十万。继以法国之陆军六万，及航空队，铁甲车队，统之以最善战之将领，战争半年，法国之陆军，死者万人，而里夫民族，仍能于艰难危苦之中支持其勇气。至于阿尔及利亚（Algeria）埃及等，其反帝国主义之运动，亦随时勃发，经一度之屈服，复为一度之反抗，且其反抗之程度，更烈于前。帝国主义者，已知非洲种人非复如曩日之易与矣。

其在亚洲，如波斯，在欧战以前，受英俄帝国主义双重的压迫。及俄国革命，波斯人民，已由俄国革命党人之手，解除俄帝国主义之羁绊，而受平等之待迂。波斯人民，受此刺激，更谋脱离英帝国主义之羁绊，使英帝国主义之工具波斯国王，碎于人民一击之下，而成立波斯民主的政府。如阿拉伯，其民族解放运动之思潮，已达于最高点，能以碎石击走波尔福(LordBalfour)勋爵于巴勒士登。最近更宣布政治的罢工，以表同情于叙利亚(syria)同胞。如叙利亚，自去年7月24日以来，反抗法国帝国主义。法国之陆军，屡败于叙利亚爱国党人之手，其狼狈之态，不亚于在摩洛哥(Morocao)。而其野蛮之行为，亦较在摩洛哥为烈。杀戮妇孺，纵火掳掠，无所不为。此等野蛮行为，实足使叙利亚人奋斗之志，益以坚决。国民政府，已于最近成立。叙利亚之爱国运动，虽一时或不免为法国陆军优越的势力所屈服。然终信最后之胜利，必操于叙利亚爱国党人之手也。如土耳其，在一般帝国主义者中，久已视为无问题之捕获物。谥之以近东病夫，加之以压迫基督教徒之罪名，刀俎鱼肉，一惟所命。而近则以土耳其国民党之努力，及苏俄之扶助，已脱离帝国主义者之压迫，而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最近土耳其国民政府，因英国抢夺莫塞尔（Mosul），集合国民军，并与苏俄成立更密切的同盟，以准备保护其领土及其政治的经济的主权。如荷属东印度，其国民革命的奋斗，已积极进行。荷兰帝国主义者对待土人，与英法同其残暴。土人所有学校及种种团体，皆被封闭。一切集会及示威运动，皆被禁止。教授新闻记者，可以随意监禁。爱国党人，可以随意杀伤。1925年3月，荷兰警察在爪哇枪击爱国党人一百有七人，伏尸枕藉。9月，复捕获爱国党人一百六十三人。此等残暴行为，适足使爪哇之国民党及农工党，更坚固其团结力，及更增益其为国民革命而共同奋斗之决心与勇气而已。如印度，自治党人，及共产党人，正共同努力，以反抗英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对之，虽以无人性之残暴，加以摧毁。而所谓不合作运动，经济的绝交，消极的不服从，进行如故。如非律宾，安南，台湾，高丽，其民族革命之奋斗，或以公开，或以秘密，相与为不懈之努力。此等奋斗，终必使帝国主义所施与之桎梏，归于粉碎。

综合此等错〔借〕举之事实，可得结论如下：

一、被压迫的民族，已开始觉悟其所处地位之不平等，已认识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之种种压制及掠夺，故民族革命运动，已普及于全世界。此等民族革命运动，有已与帝国主义直接发生武装的冲突者，如里夫民族及叙利亚民族是。有其武装的冲突，已得胜利，使其民族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得解放者，如土耳其是。而其中尤当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之过程中，有一种历史的事实，能促进此过程，此事实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业发达而产生之无产阶级是已。此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

二、凡民族革命运动，欲求成功，必须有广大的民众参加。而农工民众，尤为必须。过去民族革命运动之失败，由于参加者限于知识阶级，故不能得广大之基础，与广大之势

力。于现在及将来，为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以其意义普及于田间与工厂，且必须使之组织于反抗帝国主义的奋斗中。

三、凡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明了其共同之敌人为谁。对于共同之敌人，而共同奋斗，自助与互助，初无异致。所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之革命运动，有联合战线之必要。

四、凡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排除狭隘的国家主义。此等狭隘的国家主义，常为帝国主义之诱因。纵使民族革命成功，亦徒成为新兴之帝国主义。故一切被压迫民族，相互之间，要求人以平等待我。同时亦要求我以平等待人。必如是，乃能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中国之国民革命，对于革命先进之苏俄，固共奋同斗。而对于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亦共同奋斗。于此之时，彼此以平等相待，以期民族革命成功之后，同进于大同。

五、各个帝国主义者间之冲突，及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人民之愤激与怨望，实为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以推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族独立之良好机会。凡从事于民族革命运动者，必须勿失此良好机会，务使一切革命的势力，皆得以集中，而活泼进行。

六、在民族革命运动进行中，必须看破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及防止其一切包藏祸心的宣传。此等宣传，实含有挑拨离间之两种作用。帝国主义，为遮断其本国内大多数人民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则倡黄祸之论，以为恐吓。为遮断东方被压迫民族中各阶级间之联合，则倡赤化共产之论，以为恐吓。此种恐吓手段，能使革命势力，归于离散。故凡从事于民族革命运动者，必当大声疾呼，以揭破其阴谋。同时益以诚意与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及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联合一致，向于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者，猛烈进攻。

第二　中国之现状

如上所述，可知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所挟以为暴之工具，前已言之。然使中国以内，无为帝国主义之内应者，则帝国主义，亦无所施其技，试列举如下：

一、军阀。军阀之大者，借口武力统一，把持中央。其小者，借口联省自治，把持地方。其唯一目的，在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一手段，在拥兵自卫。其所豢养之军队，不知有国家，不知有人民，只知为受其，豢养之军阀而效死。顾其豢养之程度，乃至为微薄。军阀掠夺所得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只以自肥其身家，及分肥于同恶共济之将领。至于大多数之士兵，不过仰其所不屑馂余。故大多数之士兵，其生活至为困苦。战时则驱之死地，平时则不免于饥寒。由是大多数之兵士，遂被迫而为盗贼之举动，以自绝于人民。而为将领者，则以军阀为终极之目的，惟知以相斫求其大欲。中国之内，于是兵戈相寻，而莫知所届。

二、官僚。凡民主之国家，所谓官吏，本人民之公仆。其自身实为人民，于执行国家之政务及事务时，乃为官吏。而中国之官僚，则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阶级。其结果惟有助军阀为虐，以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肥军阀，且借以自肥。

三、买办阶级。帝国主义者如虎，而买办阶级则为之伥。帝国主义恃之，对于中国国民，得以择肥而噬。而买办阶级则于无数中国国民被噬后之残尸中，咕嘬其血肉，以餍其下流之欲望。

四、土豪。此为封建制度之余孽，其在乡村间，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其为厉于人民，甚于盗贼。

以上四者，在帝国主义者之心目中，实为应用之工具。盖帝国主义者，欲使中国永为其次殖民地，则其所采之方法，莫大于阻遏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而欲阻遏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其所采之方法，又莫于遮断国民间各阶级的联合，尤莫大于摧抑农工阶级之发展。盖不如是，则不能分散国民革命之势力也。而买办阶级与士豪，其性质上实为摧抑农工商各阶级之利器，故必利用之，以垄断中国经济之利益，同时即以窒塞中国国民革命之生机。顾经济上之势力，必得政治上之势力，为之辅助，然后能活泼无碍，以日即于繁荣。故又必收军阀官僚，以为己用，使政治上之势力，归于掌握，所以军阀官僚与买办土豪之于帝国主义，实犹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而军阀官僚与买办土豪，其生活之目的与条件，同为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自肥。于是四者之间，不期然而出于共同行动。帝国主义，得此等工具，遂敢悍然破坏中国国民革命而无所惮。

征之民国元二年间，五国银行团，不惜以二万万五千万之大借款，贷诸袁世凯，以助其驱除东南之革命党人。六七年间，日本又不惜以三万万之参战借款军械借款及种种借款，贷诸段祺瑞，以助其扫灭西南之护法军队。八九年以后，欧战终了，各国恢复其远东势力，则又相与痛抑日本，助曹锟吴佩孚，以推倒段祺瑞，其各种借款，为额之巨，至今尚未能知其确数，而曹锟吴佩孚则亦以摧破广州革命政府，为效忠于帝国主义之表示。盖帝国主义者，由借款而得之利益，不特经济方面而已，于政治方面，尤获有种种特权，而其最大作用，则为助军阀以镇压国民革命也。前岁秋冬之间，直奉再战，其结果曹锟吴佩孚推倒，而段祺瑞张作霖崛起，要不外易英美帝国主义之傀儡，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傀儡而已。帝国主义得为军阀之傀儡，对于中国，遂得为所欲为。军阀得为帝国主义之傀儡，则亦有恃无恐，虽获罪于人民亦恬然不以为意。前岁冬间，段祺瑞不恤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为各国承认临时执政之交换条件。去岁五卅以还，张作霖之军队，在天津上海，极力摧残各界人民之爱国运动，而于工人运动，尤遏抑之不遗余力。军阀之甘为帝国主义之鹰犬，以咋噬人民，阻碍国民革命之进行有如此者。

大军阀之把持中央者，受帝国主义之卵翼，为之效命，如上所述。小军阀之把持地方者，论者或以为其地位势力，尚不足当帝国主义之一顾，故把持地方之小军阀，其殃民之罪状，虽视大军阀为甚，而卖国之罪状，似反从未减。顾按之实际，则殊不然。征之去岁夏间，唐继尧起兵，寇桂窥粤，语其内幕，乃在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唆使，与法国帝国主义者之怂恿。而十二年来，陈炯明等之得苟延残喘于东江，以为祸于广东，乃全恃英帝国主义者为之后援。自去岁夏间以还，更公然以香港为其寇粤之大本营。运兵筹饷，皆以香港为策源地。北洋兵舰，集中于香港，以往来窥伺广东之沿海岸。复由香港输运军械，以接济南路诸贼。而陈炯明等更于海丰摧残农民运动，于汕头摧残工人爱国运动，务残害同胞，以取媚于帝国主义。呜呼！五年以来，青岛九江上海汉口广州各处惨杀案相继而起，全国之爱国民众，方血肉狼藉于帝国主义枪刃之下，而陈炯明等乃忍心受其豢养，听其嗾使，以危害国民革命运动。盖小军阀之末路，倒行逆施，久已枭獍之不若矣！

以上为各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状，至于买办阶级，受帝国主义之颐指气使，以为厉于民国，其罪状亦擢发难数。大抵数年以来，北京之财政总长，几成为买办阶级之专

利品，自王克敏以至于李思浩，无非窃国帑以纳诸外国银行，同时更以无自政治上经济上之特权为之媵。至于各省巡按使督军之属，其盗国病民之所得，莫不由买办阶级，为之置业于租界，以为其脏污之保障。财政现状之紊乱，政治现状之污浊，实以此为一大原因。买办阶级之罪恶，深足为国民所唾弃。而其罪恶之尤著者，莫如十三年秋间广州沙面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之作乱。陈廉伯始则借英帝国主义之资助，而得自由贩运军械，组织商团，以谋反抗广州革命政府。继则受英帝国主义之袒护，以类似哀的美敦之通牒，恐吓广州革命政府。其始末于总理致英国前首相麦克端努之电报中及宣言中已详之。及乎作乱失败，仍得安居香港，终日从事于破坏广州革命政府之行为，醵资助贼，扰乱地方，视为当然，曾不稍怪。盖中国自有买办阶级，而国民人格，几于扫地以尽矣。

在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状中，官僚则骏奔以为军阀之给事者。在买办阶级受帝国主义之颐指气使之现状中，土豪则蚁附以为买办阶级之响应者。

不宁惟是，买办阶级及土豪，平日于经济上，既占优越之地位，洎乎得帝国主义者之媒介，以与军阀官僚勾结，则进而于政治上亦占优越之地位。试观全国，商埠表面，虽以趋于繁荣，而其内幕，则不免受帝国主义及其附庸者之支配，至于村落则其困穷之象，每况愈下。盖商业为所操纵，新兴工业为所扼制，农业手工业为所摧毁，农民工人之利益为所吞蚀，更无待言。民穷财尽，悉由于此。加之各国军阀间，其互相冲突，在原则上，无可幸免。或为扩张地盘而战，或为保障地盘而战，或迭相雄长，或以下烝上。数年必战，甚至数月必战。其破裂之期，可以预测而逆臆。有如前岁秋间，江浙之战，直奉之战，去岁冬间，江浙直鲁及辽东之战，所杀伤者，人民之生命，所荡析者，人民之财产，盖人民至是，已岌岌然不能保其生存，更无生活程度之可言矣。

中国之现状具如此，吾人苟一体认，可知今日之中国，其当前待决之问题，实为求一生路。然所谓生路者，果如何乎？关于此点，第一次大会宣言中，曾列举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之各种主张，而指示其谬误。近更有所谓国家主义派者，以为今日欲救中国，但当如日本之维新即能自致于富强。为此说者，不惟未知日本维新之际，尚留封建制度之余毒，以为害于其人民。且已生帝国主义之厉阶，以为害于世界。且其于日本维新之际，时代与环境之关系若何，亦忽焉不察。日本维新之际，帝国主义正如旭日初升，故日本之摹仿，出于不自知其然而然。若夫今日帝国主义，已近末路，其自然崩溃之期，已可以推算而得，尤而效之，适见其惑而已。至于所谓良心救国派，所倡导者，为性善，为自由，陈义不为不高，然其除恶不勇，其纪律不严，一方坐视率兽食人者之猖獗，咨嗟扼腕，而不能制。一方不能组织民众，既不能以纪律自绳，自亦不能以纪律绳人，遂使团体行动，散漫而无力。于此而欲求拨乱致治，亦徒见其幻想而已。凡此，皆坐不能体认中国之现状，故于救治之法。亦茫然莫知所措。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

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

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土豪买办阶级。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

凡此对内对外之必要手段，约而言之，即总理遗嘱所谓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

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也。此于中国之现状，为对症发药之救治，观于以上所列举之事实，可灼然而无疑。

第三　本党努力之经过

吾人既深信总理所定之主义及政纲，为中国之唯一生路，故于第一次大会闭会之后，即服从于总理指导之下，以努力而进行。吾人非不知当时所处之环境，至为恶劣。所挟持之势力，亦至为微弱。弹丸之广州，已为香港帝国主义者，纳诸掌握之内。而北洋军阀，如曹锟吴佩孚等，复眈眈然欲灭此而朝食，不恤百计以求逞。陈炯明等跳梁于东江，邓本殷等负隅于南路，杨希闵刘震寰等，更反侧于肘腋之下。吾人苟鲜明其主义及政纲，无异自树一的，以待此等敌人之共同进攻，况所谓官僚买办阶级土豪，正环绕于吾人前后左右，将以保护其不正当之利益之故，而同心合力，务置吾人于死地。惟吾人则百无所畏，准备与之为殊死战。吾人于此四面包围之中，所艰难成立者，有中央各地之党部，以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有陆军军官学校及党军，以造成与人民合作的军队，使进而为人民的军队。有各种工人的组织，及农民组织，俾之能保卫其利益，而发挥其能力。吾人曾与勾结北洋军阀之叛军战，曾与勾结帝国主义之商团战，其结果，此等敌人，不特不能困苦吾人，且使吾人益增长其气势，进而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战。曹吴推倒之后，总理挺身北上，以开国民会议，制军阀之死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制帝国主义之死命，事虽未成，而以身殉道之精神，已普及于全国民众，而深入其肺腑。去年5月30日以后，青岛上海九江汉口广州等处之惨杀案，接踵而起，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面目，暴露无遗，而全国民众努力从事于国民革命之精神，已渐为世界所认识矣。最近北京民众之示威运动，又足以褫军阀之魄，使知与帝国主义勾结，非惟不能恃以为固，且适足以犯众怒而促其死亡。大河南北大江南北及湖南湖北间，农工民众，团体组织，日以坚固，能力日以发达，其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亦日以热烈。吾人更于此时，巩固广州之革命根据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扫除东江南路一切叛徒，建立与人民合作之政府，及与人民合作之军队，以坦白真挚之精神，为民众谋利益，同时领导民众，从事于国民革命，虽受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之重重压迫，屹然不为之摇动，且决其复灭之期，必不在远，最后之胜利，终属之吾人。此吾人于第一次大会闭会之后，至于第二次大会开会之前，努力之经过，所可为国人告者也。

第四　结　论

世界之现状，中国之现状，及本党努力之经过，综合而观察之，可得结论如下：

总理所提出于第一次大会之宣言，对于三民主义之解释，及最小限度之政纲，实为中国之惟一生路。吾人于第一次大会闭会以后，所努力者，仅为扫除障碍，以准备主义及政纲之实行。不独主义之自身，未能实现，即最小限度之政纲，亦未能施之实际。故第二次大会，对于主义固当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即对政纲，亦无所修改，惟期其得见诸施行。前乎宣言，有建国方略，其后复有建国大纲，及民族民权民生之讲义，暨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以迄于总理临终之遗嘱。凡此皆总理披荆斩棘，为中国开此生路，吾人循此

路以前进，若总理时时指导于吾人之前，使吾人之热诚，弥以兴奋，吾人之信念，弥以坚固，吾人惟有一致遵守总理之遗嘱，以奋斗不懈。吾人敢举此信念与热诚，以昭告于世界民众及全国民众之前，吾人愿献此身以为一切民众之前驱，为一切民众而效死。吾人尤知欲为民众所尽力，则不可不巩固吾人之组织，扩大吾人之能力，以期能负荷吾人所欲尽之责任。第一次大会，已于党员之纪律及训练加以注意，第二次大会更将使此纪律益以森严，训练益以精密。凡为革命党人者，不可不忠实诚笃，勇于改过，党员之间，互相亲爱以互相扶助，互相攻错。盖不扶助不足以为亲爱，不攻错，尤不足以为亲爱也。

若过而不改，则不能不以铁的纪律，加诸其身，盖对于党员姑息，即对于党为不忠也。吾人必努力使党员成为革命化团体化，以期不负总理之指导，不负民众之期望，吾人大呼以祝：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原载《政治周报》6、7期，1926年4月10日出版）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

关于本党少数中央委员及监察委员发起西山会议，大会接受各地报告之后，认定此等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大会聆悉关于本案之审查报告以后，认此事为吾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但西山会议诸人，有主动最力而蓄意谋危本党者，有属于盲从附和因一时之误解为人所愚而致引入歧途者，有因个人之主张不同而致为人利用者，情节既有主从之分，则处分自不能不有重轻之别。兹特按照各人之行为判定其应得之处分如左：

（一）谢持邹鲁二人，自民国十一年即在北京组织民治主义同志会，其意即欲于本党之外，自成私人团体，以谋一己之利益，此次在京发布种种反对国民政府言论，诬蔑同志，破坏党政府之信用。纵无西山会议，亦当处以严重处分。况此次西山会议，谢邹二人事前奔走联络，利用同志会之分子，捣乱北京执行部，更进而发起西山会议。事后又派遣党徒，分赴各地运动联络，攘夺党部。故谢持邹鲁二人，纯为主动之人，其违反党纪，以此二人为最。谢持邹鲁应永远开除党籍。

（二）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十二人，附和谢持邹鲁，除张知本外，均参与西山会议，实属违背纪律。张知本虽未到会，然未声明与西山会议脱离关系，亦不能无附和之嫌。惟此十二人，并非西山会议之主谋，略述原情，应予以自新之路，由大会用书面向上列十二人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此十二人中有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执行纪律，开除此不接受大会警告者之党籍。

（三）戴季陶于去岁五月，曾在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起草关于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训令，乃曾未一月，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纭，但于此次西山会议，始终未与会，离京之日，曾函吴稚晖同志表示悔悟，综核其个人言论，虽或出于爱护本党之热情，然因此致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与戴同志原意适得其反。惟念戴同志为党奋斗有年，翊赞　总理，改组本党，颇有勋劳，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对于西山会议一案判决如此，其有与别案关涉者，当另案办理。

（原载《政治周报》6、7期，1926年4月10日出版）

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

（一）列名西山会议诸人兼有其他违犯党纪行者

甲　居正除列名西山会议外尚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经警告不理；且现尚在湖北捣乱应予以除名处分。

乙　石青阳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且勾结军阀，亦应予以除名处分。

丙　覃振，石瑛，茅祖权，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应予以警告。限二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

丁　邵元冲现尚在上海主持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予以警告，令其立时停止进行。

戊　叶楚伧除主持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外复主持民国日报作反动之言论，应令停止职务，并将该报交出改组。

己　沈定一在浙江省党部作反动之举，应予以警告，令其立时停止进行。

以上诸人，经警告而不服从大会决议者，是自绝于本党，应予以除名处分。

（二）凡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分子，限二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否则开除党籍。

（三）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人员，如邵元冲，叶楚伧，并入（一）条丁戊二项办理外，其他九人如桂崇基，周佛海，刘启明，沈仪彬，刘庐隐，马超俊，郎醒石，袁世斌，黄季陆，等则加以警告，限二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否则除名。

（四）服务段政府机关者处分如下：

甲　马君武彭养光参加段祺瑞之善后会议应予以除名处分。

乙　杨庶堪未得本党许可，而参加段政府阁员，应予以除名处分。

（原载《政治周报》6、7期，1926年4月10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自从鸦片之战到辛亥革命的几次国民革命运动，因为没有有组织的领导，没有革命的政纲，没有正确的策略而失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的意义，就在他能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以有组织的领导，革命的政纲与正确的策略。

第一次大会通过反帝国主义的政纲，确定中国民众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障碍。大会迄今两年，已把中国的民众运动放在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这可证之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与五卅运动。但是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到底还没有完全深入广大的群众，而且反帝国主义是反对其为一种制度之意义亦未能被群众所了解，并未能被国民运动领袖所透彻明了。国民党的领袖没有能个个明白：利用帝国主义间与军阀间的冲突以促进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运动之政策，更有时有专对某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有被他国帝国主义利用及给民众以错误领导之危险。所以第二次大会的责任应在如何能使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深入群众，如何使民众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有一正确的观念，及指示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如何。

国民革命运动不是只有了目标就能成功的，所以第一次大会决定革命的策略：采取联合苏俄与组织工农的政策。联俄的政策非特帮助了国民党在南方建立了革命基础，更给了中国革命民众一种重大之意义，就是要对抗帝国主义的联合，全世界革命的势力必须联合起来。五卅运动得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的同情与赞助，于是中国民众更明白了解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第二次大会的责任应使中国国民运动与革命先进的苏俄之关系更形巩固，并应规定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与阶级联合的方法。

自第一次大会采取了发展工农势力的策略之后，国民党在其统治权下之区域，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加以帮助，因此广东已有六十万农民组织起来了，省港二十万罢工工人，能与帝国主义奋斗至半年之久。在这次五卅运动及广东与反革命奋斗中，更可看出工农阶级在国民运动中之地位而证明第一次大会所采取的政策之不错。但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对于工农运动不是明白的反对，即是暗中的破坏，因此工农势力的发展有极大的妨碍。国民党党员更有对于工农运动态度的错误，不知反对工农要求改善生活的阶级斗争，即是反对工农运动的发展，亦即违反要工农参加国民运动的宗旨。所以第二次大会的责任，是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以严厉的处罚。

国民党自从第一次大会后方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在这两年中其组织已渐次发展全国各部。但是组织尚未能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从五卅运动的经验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的组织在质量上与数量上尚不能指导全国的民众运动，虽然在广东一隅已有相当指导的能力。所以第二次大会应决定如何能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的党，使其组织能如网一样的布满全国，使有指导全国运动的能力。

自从第一次大会后，国民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革命政纲的，有革命策略的政党之后，国民党中旧有之反革命分子势在淘汰之列；因为他们的利益与革命是相反的，国民党既然成为真正指导革命的团体，决不能与他们相容。虽然这班反革命分子一批一批的退出国民党，借口于反共产主义，其实是反对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中国人民能建立廉洁政府，他们出党后做帝国主义军阀的工具，公然拥护其利益之事实已完全证明他们反共产主义的不真。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知道独立的中国与廉洁的政府是与他们的利益是有妨害的。所以国民党每经退出这样一批的反革命分子后，非特不受损失并排泄了腐烂而添了生机。在这两年中，国民党所以能继续依照党纲进行革命工作，全靠对于反革命党员能有坚决的态度。所以第二次大会应完全追认旧中央对于党中反革命分子的开除而确定革命的纪律。

第一次大会后党中的斗争在广东更形成武装的斗争。从商团事件起到最近统一广东军事行动止代表两年不断的最剧烈的斗争。党指导下的革命政府要与香港帝国主义，北方军阀，省内军阀，政客，买办，反革命党员等反革命势力，一齐奋斗。只靠革命政府能坚决采用左倾的政策，才能把危害广东革命基础之一些反革命势力扫除。现在更进行巩固此基础之工作以发展全国之国民运动。第二次大会应完全赞许革命政府过去为巩固革命基础之政策，并指示其将来保障此革命基础与借之以发展全国革命运动之方针。

这两年中国国民党党内发生反对共产党在党内合作的问题，本党党员自从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正式允许加入国民党，努力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进行国民革命工作，对于第一次大会的政策，是最有力的拥护者，在每一次的革命运动中是最勇猛的奋斗者。因此惹起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之妒忌，国民党内之反革命分子与假革命分子，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利益，极端的排除共产党员。他们的反对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因为本党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本党党员为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共产主义者，最注重客观的事实，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但他们也看见达到这目的的路程。他们认定在现在中国是在必须经过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共产主义者与其他真正国民革命者一样，要做反帝国主义运动。既然共产主义者与国民革命者在这时期目的相同当然须要携手合作，只有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因怕惧革命势力联合而思破坏之。不论何人反对此种联合，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将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本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发展国民党与国民运动起见，是因为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政策的实行与左派势力的发展需要共产党员的帮助，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与革命政策的实行。本党决无心占据国民党，如国民党与国民运动需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时，本党党员不待国民党的命令，必可立即退出。但是现在既未到此时期，本党决不因帝国主义走狗之反对而退出。本党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责任是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建筑在左倾的政策上面（左倾政策即最革命的政策，即最合乎革命运动要求的政

策）。本党党员真能信奉孙文主义者，因为他们能在行动上表显他们是反帝主国义反军阀的战员及实行第一次大会政纲与政策的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本党党员是最好的国民党党员，因为他们最能恪守国民党纪律与尽他们的职务，如有违背国民党章程，政纲与不尽职的非特愿受国民党之正当处置，并须更受本党之惩罚。信仰孙文主义而忘掉联合革命势力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不是真正的孙文主义的信徒，犹如信仰马克思主义忘掉了忠于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假马克思主义者，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定变成反革命党，假孙文主义者，不革命的孙文主义者，其结果必变为反革命党。所以希望第二次大会审查是否第一次大会对于容纳本党党员加入之议决尚属有效及授权与监察委员会以革命的纪律与革命的政策审定党员之是否忠实。

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开会时正在北方民众五卅运动失败后重新崛起时；正在广东刚才肃清反革命势力而罢工尚未解决正与香港帝国主义奋斗时；当右派西山会议后正进行破坏国民党时，第二次大会之责任如何重大。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使国民党自身有了一个基础，使全国国民革命运动有了广东的革命基础，本党希望第二次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邓中夏同志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

刘、杨打败以后，国民政府虽告成立，然而反革命派尚是麕集广东，日谋危害国民政府；罢工工人见着了，于是号召广州市民做肃清反革命的大示威运动，督促国民政府，下大决心先发制人。其后廖案发生了，反革命异谋完全暴露了，于是罢工工人帮助国民政府，毅然决然，扫除反革命派；再则打东江与南路的时候，组织运输队、宣传队与国民革命军一道开赴前敌，共同奋斗。国民革命军"不拉伕"为口号，假使没有罢工工人运输队五六千人，即使不拉伕，军事进行一定没有如此神速。国民政府肃清反革命的斗争，工人是无役不从，而且是无从不先。现在好了，东江肃清了，南路也快肃清了，广东统一了，国民革命的基础更加稳固了；如果没有此次罢工，那能有这样快的使反革命的势力肃清，使革命基础稳固。稳固革命基础这一点，比使香港受经济打击还重要，因为香港经济打击，到若干时间尚可稍稍恢复，革命基础稳固，则是无价之宝，有此基础可以使中国国民革命势力更加发展而扩大，以致达到最后的成功。

现在罢工还没解决，但是我们可敢向各位说的，这〔就〕是此次罢工一定是胜利的解决。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于北方、中路各地工会运动之指导，在上海设了一办事处，至于指导上海罢工以及北方、中部工人之奋斗，种种成绩，今日时间不多，只好从略了。

现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之下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在第二次劳动大会时已有五十四万，经过此次"五卅"运动，其人数更见增加；如上海一处在第二次劳动大会时仅只五万人，现在扩充到二十万了。其余各地皆有甚〔长〕足的进步，现虽无确实的统计，大约总在八十万人以上。

今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敢代表八十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表示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现在中国需要一个国民革命，但是要成就国民革命，必有一领导各阶级革命民众，以从事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之国民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之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责任与使命是很伟大的。我们工人阶级虽非全体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然而认为中国国民党与国民革命有不分离的密切关系，所以国民党政策是不是于国民革命有利益的，工人阶级实有表示赞成与反对之必要。

中国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孙中山先生与〔于〕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如对外之联俄政策，对内之工农政策、和共产党合作政策，都是对的。这些政策于国民革命有利益，在事实上已在这两年当中证明，使国民革命势力之日益扩大与进步。

我们工人阶级对于这些政策是绝对表示拥护。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党员不明了这些有利于革命的政策，在言论上或行动上发生反动，我们工人阶级深以引为遗恨。原来这本是国民党内部问题，工人阶级似乎不过问，但是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党，国民党之一举一动，关于国民革命之生死存亡，这类危害国民革命的反动倾向与行为，工人阶级是不能含默不言的。我们希望而且确信在座各位代表，一定会仍然根据孙先生及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之政策，继续促其实现，而且会更具体的促其实现，使国民革命势力日益进步，以至达到成功。我们高呼：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原载1926年1月8、9日《工人之路》194、195期）

邓中夏同志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答词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

刚才承各位代表赐教一切，我们是非常之感谢的。我们一定遵照各位赐教的，更加去努力奋斗。

在各位代表演说之中，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说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

是的，这一点，我们一年以前曾经这样说了。不过那时还只是一个理论，没有事实证明。所以一般大学教授听了此种说话，无不嗤之以鼻，说是工人阶级自己吹牛。现在经过刘杨战争、“五卅”运动，种种实际的争斗，果然证得明明白白了。事实还是事实，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加以抹杀的。所以一般大学教授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紧急的时候，也变更态度，说工人不错，工人很有力量，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他们也不能不在事实上很恭顺的加以承认了。

既然如此，既然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刚才有几位代表提到国民革命不应反对阶级争斗，使我们联想到一块，发生一个深切的感想，也不能不略为说说。

国民党中有一位负过盛名的先生另创新说，劝工人阶级不要“为了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我们对于这位先生说话，只有表示惋惜，表示遗恨。为什么？我们即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就是站在国民革命的观念上，认为这位先生的说话，是太欠考虑，太欠明了。国民革命原是要联合各阶级的力量，共同作战，但是事实上今日中国社会各阶级因为经济地位的关系，不是妥协性极重，便是战斗力极弱。中国不言国民革命则已，若言国民革命，只有靠革命的工人阶级提携着农民阶级加入战争，才有成功的可能。

大凡一个军队，都要给养，才能作战。既然要工人阶级这一支军队加入国民革命的战线，做国民革命的主力队伍，岂可不善其给养，即提高其地位，改善其生活？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痛苦或是舒泰？大家都是知道的。枵腹露体是可以作战的吗？只有容许改善经济条件的阶级斗争，可以使工人运动更加进展，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更加雄厚，就是说使国民革命的势力，更加强旺。阶级斗争是妨害国民革命的吗？今乃反对工人阶级为稍稍改善经济条件，增加其组织力、战斗力的阶级斗争，老实说就是不愿意工人运动之发展；不愿意工人运动之发展，老实说，便是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国民党中那位先生说“为了阶级斗争，打破了国民革命”。我们得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却是“为了反对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

但是那位先生的反阶级斗争论，工人阶级决不受其欺骗与迷惑，这是可以担保的。工人阶级很明白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对于此种破坏国民革命的说话，只有表示惋惜，表示遗

恨。他并且很明白，决不因国民党中那位先生个人破坏国民革命的说话，而减少他对国民党之同情与帮助。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只要国民党是革命的，他必同情到底和帮助到底。

（原载1925年1月12、13日《工人之路》199、200期）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瞿 秋 白

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从五四时代起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内部生产力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渐渐的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制度。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力求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就是掠夺殖民地，以维持自己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侵略弱小民族——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发展的国家，他们可以独占那地的市场，垄断那地的原料，因为这些地方自己既然没有工业当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润——比本国市场内多至百倍的利润。可是，这种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的冲突，二、不能不使被侵略的国家逐渐的资本化。这两种结果，原是帝国主义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社会革命的爆发便在这帝国主义内部崩溃的过程里发现；帝国主义的欧战是列强冲突的表现，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战争的延长和破坏，使全社会中大多数群众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都倾向于无产阶级而造成革命的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发动，又加以内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类种种矛盾冲突的汇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国在欧战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也都经过一个可怕的革命危机。至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致命伤，他们的种种殖民政策经济政策，无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业发展；可是弱小民族内部假使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大多数人民安于农业的自足经济，那时，资本主义国家便无从畅销他们的商品，无从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业方面，逐渐的资本主义化，商业资本的积累（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必然发生工业资本，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了。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为夺殖民地而互相战争时，正给殖民地以发展自己工业的机会，宗主国的生产完全集中于军事，殖民地的生产和原料，当然只能自己经营自己应用；那商业里（买办，洋货商）积累的资本，久受宗主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束缚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业生产。这便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于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代。帝国主义之前的一时代里，后进的资本国与先进的资本国相竞争（如俄国彼德大帝变法，日本维新）的过程，和现时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国主义革命的过程是断不能相混的。即前一过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

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后一过程，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这里原因看上述的经济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他在政治上的成绩，影响于多数民族最大的，只是"国货"两字，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可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各国革命史都是实例，中国何尝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展之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力固然集中而强大，无产阶级的增多与团结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里有没有工人的工厂呢？况且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当初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这种联合战线，第一、当然不是自觉的；第二、当然增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力军，以救辛亥革命后垂危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些思想上的新潮，只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仅仅只产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社会力的伸张，确是一大进步，可以使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于俯就马克思主义——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孙文学说等等，都是在这时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大学教授、戴季陶（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到所谓"中兴名将"的曾左李国家主义派。这是甚么缘故？原来，中国社会在欧战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别方面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上新力量产生的初期，共同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军阀社会，涌起国民革命的巨潮，随后的发展，便是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这六七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进而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从资产阶级联美制日的希望进而至于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到五卅运动而得了极高的发展。国际关系上，在这六七年中，资产阶级所希望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着着落空；而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苏联，不但事实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并且进而切切实实赞助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国内斗争里，在这六七年中，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四五年来的罢工运动已经使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至少数）组织在工会里，每次在民族斗争里，表现他的力量；国民党改组一年，在党内刷除买办官僚的分子，在广东给买办和土豪阶级

（商团民团）以极大的继续的打击；并且军阀之中亦起分化。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而努力于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这里阶级分化的现象是非常之明显的，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演。可是，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民党的主张，如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运动等，都因而渗入普遍的群众里去；中国社会一般的革命化的过程，当然影响到政党界与思想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莽原杂志，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群众的左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思想界与政党界左右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日益激厉的，或者以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反动的表征，其实不然，这种反动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

*　　*　　*　　*

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须的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来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并非如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然而右派——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故意装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个共产做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他们却偏偏当真的来攻击。

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便应当明瞭共产主义的意义。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说。譬如邹鲁、孙镜亚等类的国民党员，曾琦等类的国家主义派便都是如此。他们或者说广东政府立刻就在实行共产，或者说共产党是要中国社会回到原始共产制度（醒狮第六十八期）广东政府是否共产，现在不值一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吗？这不过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学与荒谬，不值得去说他。至于比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独立青年杂志的灵光先生，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共产主义四字是何所指。季陶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灵光说中国共产党要抄俄国的老文章。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究竟是甚么？我想，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主张明日

便使中国社会里实现共产制度；可是他们因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故意一口咬定的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找着丝毫的客观态度吗？当然不能够！

我们应当分清楚共产制度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制度是说全人类社会之中阶级已经消灭，一切生产分配由社会经营，个人只须依照社会的计划去参加工作，便能得到社会的一切供给——衣食住娱乐科学等等。共产主义是说从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列强，商业资本宗法社会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致于非洲、西伯利亚等处的原人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制度的种种式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方法：政党的策略，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经济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后的国家制度等等。他们右派说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即不能实现于现时的中国，如果是指共产制度而言，那么，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如果指的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他们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加以详细的虚心的研究，才有开口批评的资格。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锋杂志曾经登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二）这种国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都应当和他奋斗，都应当推翻，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么，劳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中国、印度、安南、朝鲜、南美等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英日美法意等国内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便当然根本推翻；（五）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推翻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亦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执行有规划的发展经济实业计划，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这种政策，是否适合与中国的国情？用不着理论上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劳动运动之后，这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进行，直到五卅的大开展，全国工人农民小商人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普及穷乡僻壤，便是老老实实的证据。

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农工阶级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赞助革命政府，还在继续不断的和地主买办阶级奋斗，以巩固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一般人民现在能免除苛税杂捐的重负和反动军阀的压迫，便是这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国民革命的结果。苏联、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叙利亚、英法工人等革命势力对于广州政府的赞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权确

定而不受英国帝国主义摧残的保障之一。这种政策是否抄俄国的老文章，更不用详细的解释了。醒狮派和邹鲁派当然每况愈下，已经和买办阶级的冯自由派不能互相区别，他们除反对苏联反对赤化而外，本无别种任务，只是信口造谣，说广东是俄人统治是实行共产，说共产党是否认国家等等。广州的事实，最近国内外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甚至于得到华侨及香港华商的赞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诚意的和国民党左派，革命派的孙中山主义合作——这第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当然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相符合。何以能说共产党否认国家！可见醒狮派的态度，还不仅是曾琦等无知荒谬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混朦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至于戴季陶灵光等也是无的放矢，还有些人，或者接受共产党政策而故意反对共产党。适足以表现他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

* * * *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所反对的既不是共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终极的目标，当然便是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情势的政策。这些政策之中第一个重要问题，便是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中国；自然而然工人阶级的运动也随着开始；尤其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既在实行对于殖民地劳动者的奴隶制度，中国的资本家又因处于帝国主义强力的压迫与竞争之下，不必能如资本先进国的余裕可以及早让步賂买部分的劳工贵族，亦是拚命的向劳动者压榨，以求利润，——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种双方两重的剥削，自然不能不开始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绝无改良主义的阶级妥协之可能。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斗争的期间，所争的不过是增加些工资承认工会和罢工的自由——罢工期间的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实际上也还很少；开始斗争的方式何尝不是"和平"的谈判，然而资本家的政策，都是非常狡猾无信，残暴狠毒，次次必须以罢工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阶级斗争本来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行为。如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右派却叫无产阶级不准回斗，岂非纯粹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右派常说，要劝告资本家，诱发他们的仁爱性——彷佛共产党只是鼓动工人斗争，而又反对资本家仁爱。这种劝告，事实上是否收效？——中国几千年的孔孟仁爱学说，是右派自诩为中国的国民性的，何以中国资本家都变成孔孟化外的人，而且变得如此之速呢？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事实具在，现时工人阶级所处的实际地位具在，何以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七八年前说中国没有大资本主义，或者可以说得过去，而五卅之后，上海、香港、汉口、河南、安源、天津等处，百万余工人的罢工事实还想否认吗？工人阶级默无声息的替资本家用汗血去赚钱，资产阶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或者还可以装着不看见，信口乱说中国没有工人——没有工业资本，如今工人阶级已经有实际的行动，震动全世界的大罢工，资产阶级的学者等等还能装聋装瞎吗？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资本家仁爱，而且**只有共产党能够使资本家仁爱，——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使资本家仁爱**。譬如去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工会方面前三天提出条件，要求答复，然而资本家不理，一定要等到宣布罢工，军警压迫开枪鞭打而工人不屈，而后资本家"仁爱"起来，假猩猩的哭起来，退职俸金的条例答应了……这是一个证据。五卅以前，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都是反对阶级斗争，甚至于说农民协会工会等的保护政策都是赤化（那时骂广东政府的口头禅，谢英伯冯自由等反对广州中央的"证据"）；如今右派和国家主义派除反对阶级斗争之外，也赶紧谈起劳工

立法，谈起劝资本家仁爱来了。假使不是工人阶级最近几年来的斗争，戴季陶先生的仁爱说，商报陈畏垒君的劝告说（一月二十四日），独立青年杂志的宣言，醒狮国家主义派的“解决国是办法”——处处不敢不提起劳工利益的口头禅，——恐怕还未必见得实现罢？而现在谈得格外起劲，更是因为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之充分表显。这是第二个证据。再则，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的时候，罢工要求承认工会，以几十万人的斗争力量，逼使段政府不得不拟议工会条例，上海总商会也不得不代行电请；等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摧残了工人运动，工人的大规模的斗争被停止了，段政府和总商会便不肯“仁爱”，不肯提起工会条例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总说工人阶级的斗争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反动，分散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尤其是笑话。难道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忍受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同时却又能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参加国民革命？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工人的力量争民族的解放，便应当牺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当然也反抗中国资本家同样的压迫；中国资本家不能自动的减轻压迫，便只有受反抗。假使中国资本家因受反抗而竟反动，以至于勾结军阀帝主国义，那就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尤其必要。总之，中国资本家地主，只有两条路：一是〔向〕工人农民让步，不禁止阶级斗争，因而取得民族解放——关税自主权、国家的统一、军阀的肃清、苛税杂捐的免除；一是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的虐使，而勾结他们来压迫工人——自己忍受军阀的扰乱市场，勒捐饷项，帝国主义者之扼制——如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租界管理权等。前一条路是现在广东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所走的；后一条路是上海资产阶级的所走的：广东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工会的发达，资本家剥削的限制，工人罢工斗争的自由，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战斗）是革命政府的基础，而如今广东一般商人资本家地主，已经能免除苛税杂捐，自己建筑黄埔商港；上海的资本家却宁可受帝国主义者的统治，电气业由他们垄断独占，五卅时租界局停止供给华厂电气时，中国资本家赶紧出全力帮助帝国主义者用种种勒迫欺诈的手段摧残罢工，仅仅因为不肯牲牺停电期间的工资！

再则，如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革命导报宣言，如商报一月二十四日的社论，总是说：“中国工人只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战斗的目标也只外国资本家”，或是说，“以阶级斗争助成民族独立运动，吾人亦不能无异辞：民族独立要求，意义有在麦饼米饭以上者”。诚然不错！可是，阶级斗争的意义不但在“麦饼米饭”以上，并且还在民族解放以上；现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所以能懂得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正因为他们实行了阶级斗争，正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阶级斗争之最低限度的目标，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国民党右派要反对国内的阶级斗争，要否认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有一方面的共同意义，并且要工人的战斗目标限于外国资本家——正足以见他们完全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努力工作”“站起来”和赤化及阶级斗争奋斗，反对中国共产党，用种种手段欺蒙无产阶级，说中国“任何阶级”（军阀，买办似乎也在内）都有共同利害，实际上是叫工人去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而不要反对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去年上海、天津、郑州、安源等的华厂工潮，已是中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明证——他们还要说没有！）——正足以见得他们努力从事于“阶级斗争”，站在资产阶级地位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他们自身的发现于中国，他们自身的政治态度

和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和共产主义适合中国情势的最有力的例证。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呵，你们如果要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适于中国，要证明共产主义是不合事实的理论，那么，你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最有力的打击，便是停止你们自己的存在，消灭你们自己！

国民党右派的内部，正和中国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内部一样，是决不能一致的；虽说他们反对赤化，和帝国主义也可以结合联合战线，可是他们各派相互之间仍旧有许多不同的矛盾的观点和政策。去年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的西山会议，完全受邹鲁谢持等买办阶级派之统治——他们勾冯自由等之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对于戴季陶等右派中较左的，施行绑票，提到俱乐部中，加以殴打恐吓，强迫签发宣言。所以继承西山会议的所谓上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邹鲁派的，而还不是戴季陶式的，戴季陶因此而宣言辞职。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见民国日报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所谓"中央"的告国民书，公开的骂共产党是依赖苏俄，说苏俄是另一属性的帝国主义，对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作战，简直完全不提起，只说"必先取得中国在世界的平和地位，然后才配进行实际的援助弱小民族。"然而戴季陶先生最近的表示（致楚伧的信），却明确说："现代之帝国主义成为一国际的组织，反帝国主义之工作非一民族之力所能成功，故……凡信仰先生（中山）之遗教遗嘱者，必须重视此点，对于先生与革命之苏俄友善，及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与世界各国之革命的民众提携之旨，尤不可忘。至对于同在革命道途之友党……亦宜尊重同仇之德义，相见以诚，不为无益之猜忌，无理之攻击。"此中的分化，又更显然。嗣后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革命导报宣言还是说："他们（左派）只是消极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一制度，国民党之反对帝国主义，乃积极的扶植中国农工商兵士各阶级之利益的发展，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各被压迫民族在同一战线上促进帝国主义之崩坏。"这可与戴季陶先生不同了：第一革命导报宣言中有许多"无理之攻击"；第二，戴先生认帝国主义为国际的组织，必须"与世界之革命势力切实合作之以图我民族独立之成功，而促世界革命之实现"（见他覆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电。）革命导报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是消极的反对帝国主义，这竟是抹杀许多事实——共产党四五年来的实际斗争，迹近造谣诬蔑；他们自己承受了联合被压迫民族促帝国主义崩溃之政策，却还反过来攻击最先提议这一政策的人，实在有点可笑。可是善变的周佛海，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孙中山主义的修正派的周佛海，更退后了一步，竟说国民革命不是根本打倒帝国主义，而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见他论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演讲和革命导报上的释打倒帝国主义）。这不但和戴季陶先生不同，并且与革命导报宣言自相矛盾。这种政见已经与独立青年和醒狮完全相同，不过肯用帝国主义四个字罢了。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动辄高呼外抗强权，认打倒帝国主义为共产党一党的口号，"非国民革命之所宜采"（见曾琦"对于开除共产党后的国民党之三大忠告"——醒狮第六五期。）独立青年宣言也说："我们要认清我国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国际的问题，是应由我们中国人自起而解决的问题，不是要联合全世界那一阶级来打倒他一阶级的问题——如共产党所主张的甚么打倒帝国主义的问题。"

邹鲁周佛海派的上海右派国民党中央和独立青年醒狮等派的国家主义，总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而只说要抵抗外国的侵略。无产阶级当然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同时认清必须打倒国际的帝国主义，而后中国才能根本免除侵略；资产阶级却不愿打倒资本主义

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这些右派的资产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中国民族如果真能排斥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他和土耳其的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大不相同——必然与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各国无产阶级得此援助，必然群起革命，推翻世界的资本主义，那时帝国主义自然要根本打倒。周佛海等难道还赶去救护这一帝国主义吗？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互相联合起来——这是反乎所谓国家主义的，国家主义派势必努力反对的了。这结果，岂不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是列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很恭顺可靠的保护人！

不但如此，中国民族同时要反抗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国帝国主义如有巩固的国家主义足以蒙蔽国内的劳动平民，他们便有可靠的军队，教徒，军事上的技术能力，加上外交阴谋，资本势力，中国民族用甚么力量能抵抗这种侵略！国家主义派反对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孙文主义学会也是如此（革命导报宣言只说被压迫民族）。这种主张适足以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证实他们的"黄祸"谣言——法国总理白里昂便以"防御"摩洛哥人屠杀白人的理由欺骗法国工人，使他们不反对出兵摩洛哥"。中国国民革命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作战，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必须努力宣传世界的阶级斗争，使各国无产阶级自己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政府，同时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放——所以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中，反对各国国家主义，是联合世界一切革命势力所必须的工作。

至于联合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革命运动问题，邹鲁派的国民党"中央"既是包藏着攻击苏俄的用心，并说先求中国独立，然后再能援助弱小民族。邹鲁等也曾和醒狮派一样，说广州革命政府受俄人的统治，况且他们的"援助"弱小民族也和醒狮独立青年等派一样，主张改蒙古西藏为中国的行省，反对民族自决。先论联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可笑的现象：他们尤其是醒狮派，反对"帝国主义"的名词，可是却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是否帝国主义，有事实可以证明——试看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的苏联领事早已没有领事裁判权，最近那右派的所谓中央却说苏联要以陆路通商条约为废除领事裁判权之交换条件，这岂不是造谣伎俩？他们攻击广州是俄人的统治，现在已经不成问题，香港的华商及一般人都已经看见事实的证明；俄国人在广东的唯一"罪状"，大概只是帮助国民政府练成强有力的革命军，弄得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无从侵略。他们最近宁可和张作霖及日本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对于中东路风潮反对苏联，仿佛中兴名将于曾左李之外，又添了一位咱胡子也姓张的张作霖了！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即使站在民族的观点，也应当和他联合，利用他和各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所最恐惧的，便是中国民族与苏联联合战线，而国家主义派所最反对的，也是这一联合战线；大家想想，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功绩多么大！对于与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问题，孙文主义学会形式上是赞成了；邹鲁派的国民党"中央"却要先"独立"而后"援助"。真不错！日本现在先独立了，所以讲起大亚细亚主义，国家主义派亦很赞成，只是不要日本来行，而要中国来行（醒狮第六六期曾琦答孙文主义学会。）这种中国帝国主义的阴谋显然暴露。独立青年，更反对蒙古西藏的民族自决，因而反对联邦，要使他们变成中国的行省（独立青年创刊号"联邦与中国"。）蒙古自决问题呢，国民党右派——连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内，以及醒狮派，独立青年派，都因此问题而说中国共产党是"亲俄卖国"，要"求中国为俄国的第三国际的附属品，……促成俄国发展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显然违背孙中山主义

——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明确的承认蒙古等民族的自决权，主张各民族自由结合的中华民国。其实，单由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的观点上来论——就是醒狮和独立青年也不能不承认这种革命，——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只有汉族采取绝对自由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才能解决；如果蒙藏民族自己要坚持联邦制度，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都可以让步——只有这样，才能使弱小民族倾心于革命的中国。各种右派的民族问题政策，正足以恐吓蒙藏使他们和中国离贰，或者愈益倾向苏俄或者受帝国主义的利用；他们几百年来受中国大商阶级及满清贵族的侵略，自然有许多过分的怀疑和不信仰。列宁主义说："民族自决直到分立国家"，这种原则，已经结合许多民族而成立伟大的苏联；孙中山主义说："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只有这一原则才能结合巩固的"五族共和"。

*　　　　*　　　　*

国家主义派醒狮独立青年等，往往说共产党的打倒帝国主义是社会革命的口号，"共产适是以召共管"。这一说法，刚巧和辛亥革命前保皇党的康梁派之"革命适足以召瓜分"太相像了，这可不是偶然。所谓共产是甚么？难道是中国共产制度的实现，那么，中国这种落后国家里共产制度尚且实现了，帝国主义当然早已不存在，又何从来的共管呢？假使是说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各劳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及苏联劳动平民的联合战线——在他们目光中，甚至于说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如辅助劳农，平民的组织，不禁止妨碍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苏联及各国革命平民相联络等，也认为共产主义，——假使所谓共产是说的这些政策，是说的现时中国达到共产制度的革命途程（这里所谓共产主义并不名不副实——如灵光君在独立青年第一号所说的），那么事实上已经证明"共产即召共管"的论调之荒谬。这些政策，不是广东国民政府所实行的吗？事实上这些政策正是救广东出于共管现象的唯一道路；而上海北京等处的五卅经验中，都证明不能实行这些政策，适足以成就帝国主义的共管事实：五卅案司法重查，关税自主经列强一致否认等等。

至于理论上，他们以为中国只要利用列强的冲突，便可求得独立，常常举土耳其来做例子，用不着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这一理论的错误是很大的：第一、譬如土耳其，在欧战以前，同样有英法德俄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冲突，何以不能独立解放。——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决不能帮助自己所要侵略的国家解放。第二、土耳其的革命成功，因此显而易见是苏联革命胜利，第三国际成立后，英法共产党的工人反抗帝国的侵略政策和苏联政府的实力赞助之结果。第三、中国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和土耳其完全不同，当然更比维新前的日本不同。维新前的日本是处于资本主义初初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时期，列强的"海外侵略"还有较阔大的战场，他们因互相冲突而放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还有如中国等处的市场可以侵略。土耳其在经济上对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现在也不占举足重轻的地位，他的独立，不足以致整个儿帝国主义制度之死命。中国现时既处于帝国主义末期的时代，帝国主义的命根差不多全在中国而且中国本身有最大的富源，最多量的廉价劳动，最优越的商品销场。因此，中国即使不行"共产主义"政策，仅仅民族革命，也足以促起列强的联合战线。共产主义的政策正足以破列强国内的民族的国家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各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减杀大部分的力量，不足以行共管。何况，五卅运动的经验里（见本号五卅运动与国民会议），证明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只能到一定的限度，过此限度，便必然互相冲突；中国方面民族解放运动愈彻

底——民族革命政策愈共产化——他们的联合战线愈软弱而至于破裂。

* * * *

国民党右派——邹鲁派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如今说共产党是勾结一派军阀以打倒别派军阀（见右派中央及革命导报宣言）。这在国家主义派口中，还彷佛是假清高的论调，在右派口中，真不知是何居心，有何颜面！邹鲁等勾结杨希闵刘震寰的事实谁都知道；当共产党反对这种右派政策，反对依赖军阀的时候，右派说共产党是离间国民党的“友军”（卢永祥等）——前年双十节，黄仁同志还因此而被“人”凶殴致死。共产派反对这种残杀行为时，叶楚伧等还要为“人”辩护，不肯开除。如今却说共产党勾结军阀！——何等的……！国家主义派（醒狮）说共产党勾结军阀，竟指出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督促冯玉祥为国民会议奋斗的电报做证据。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政策是看清现在军阀的崩溃和分化，主张平民召集国民会议将一切倾向民众或表面上赞助民众的军阀，放在平民的国民会议之统治之下，使他们无可遁形。帝国主义者反对冯玉祥蒋介石等，说他们是赤化军阀，正是要恐吓他们，使他们离开民众。国家主义派也帮着谩骂冯蒋联俄卖国。国民党右派最近已不敢反对国民军，对蒋介石更从来不敢“开罪”，然而还空口的说共产党勾结军阀。他们这种行为何等的“对内一致”——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呵！冯玉祥等的国民军，当然还包含着不少反动成分，其中有吴佩孚余党，有犹豫畏怯，冯玉祥式的政策。可是人民方面，只有督促着国民军往革命道路上走，才能肃清他内部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政策；决不能将所有中国的武力一概视作军阀而反对之，都送给帝国主义者御用。人民与武力的结合，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这一策略的运用，一方面是造成国民革命军和武装工农平民，别方面是将现有的军队、兵士、下阶士官以至于忠实于革命的“将军”，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这种策略运用得不好，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如以前杨希闵等的所作所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以至一般人民都要反对，并且要力求肃清这些势力的。我们对于国民军，亦是这样主张。至于蒋介石等，现时的国民革命军，恐怕唯一的“罪状”，便是遵照人民的意志，肃清了反动军阀，停止了拉夫，勒派饷项，擅收租税杂捐等的事罢了。国家主义派要反对这种军队，何不直说反对国民革命的成功呢？

奇巧不巧，革命导报居然说：“他们（左派）之反对军阀，目的在利用少数军阀，以促成名义上的劳农专政实际上的寡头政治”。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代并未主张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谁都知道的；右派的这种攻击，和其他攻击一样故意自制其“共产主义政策”来做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理论上驳难共产主义政策的能力，所以只好以造谣的伎俩来中伤。共产党所主张的——国民党左派当然也可赞成——正是在国民革命时代必须革命的，各革命党联合战线的，对于保皇党帝国主义党军阀党买办党土豪党，对于一切反动势力的独裁制——国民革命的革命派独裁制。一切革命没有独裁制便完全是空想；难道革命胜利之后，还能容许反革命派的自由，以便他们推翻革命？至于醒狮独立青年等，更宣言反对一党的专政，可是独立青年第一号民众势力与军阀势力一篇论文说：“由真诚了解民治主义者，抱我入地狱长期牺牲之决心，分途羼入各机关团体，加以切实之整顿，有力之指导，严固之组织”。这不是政党作用又是甚么？如果这些机关组织内，推而至于一国内，有买办军阀等反革命分子，不服从所谓“有力之指导”，那时怎样呢？难道照德谟克拉西的原则，应当放任？——推而至于国家的政治，应当由国内一切阶级，所谓全民：军阀、买

办、土豪、人民等等的“联合政府”来治理？真正的民权主义，只有拥护保障真正平民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一阶级的独裁制，诚然不错，是共产主义，可是这一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事实上当然只在社会内其他阶级，如资产阶级，完全变成反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现时认为国民革命时代中应当实行对于军阀买办等帝国主义的走狗之革命独裁制。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种政策，已经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国民党所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灵光君对于无产阶级独裁制怀疑，他以为：“无产者的志愿是在乘机得到一些财产……所谓成功，不是共产革命成功，而是他们个人的致富成功”（独立青年，灵光“质郭沫若……”）。又说，共产党有什么“不投降便打倒”的政策，这和误解劳农专政是寡头政治是一样的。灵光君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国现时——革命胜利后第八年，无产阶级是怎样“团体致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工人农民的俱乐部、协作社、公共寄宿舍等；他也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国现时的选举制度，各省各县及中央的国家职员有多少农民工人（这些都有统计和事实可以复按的，最好要不以耳代目）。至于说中国工人幼稚，——甚至于如商报上的姚公鹤，说女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都是出钱买她们来的，——这种对于劳农平民的不信任，实是智识阶级傲慢与无知的结果。俄国工人农民当初也是很无智识很幼稚，而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共产党的工作，使他们现在做了苏联的主人。就是中国的女工，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五卅斗争中的经验，也有一部分比以前的智识能力长进得多了。假使说这都要用钱去买，岂非大笑话；五卅时期上海大街小巷都贴着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大半都是一般普通人民所写的，难道都是钱买来的？这种意见，简直认农工民众中，永无增进智识的变化，显然是不切事实的。“不投降便打倒”和“寡头政治”的说法，尤其是“海外奇谈”——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和投降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也往往这样的骂俄国共产党，事实上俄国政治的实际状况和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动，都可以证明这完全是谣言。共产党不但不抱着“不投降便打倒”的原则，而且处处都是引导革命派的统一联合；譬如广东政府里的汪精卫蒋介石，现在更加上胡汉民，甚至于伍朝枢、孙科，他们何尝投降了共产党，而并没有被打倒；上海最近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固然仅仅只有左派而无共产党，然而共产党是赞助他的）。极力与孙文主义学会去合作，只见右派拒绝，却不见左派打倒他们。总之，社会革命时代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可能与必要，正和国民革命时代革命派的独裁制之可能与必要是一样的，现时都有具体的事实证明。

* * * *

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已经有很广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谓“民族精神”或“国家主义”，也就因此而发现出来，国民革命运动里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已经确有明显的表示。虽然戴季陶先生、上海孙文主义学会、邹鲁周佛海派的国民党“中央”、独立青年派、醒狮派等相互之间互相矛盾，尤其是对于帝国主义及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问题上：季陶先生赞成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只赞成和被压迫民族联合，可是还要促起帝国主义的崩溃，周佛海则便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之中已经互相违背“党的纪律”；国家主义派更连帝国主义的名词也不肯用，他们内部也有冲突：孤军社（独立青年）和醒狮社共同署名答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居然在独立青年杂志和醒狮周报上发表的互相不同，听说中间经过曾琦个人擅自的削改（这真是寡头政治）。——然而这不过是聪明的和愚笨的，远见的和近视的，不愿受帝国主义

利用的和宁愿受买办阶级指导的种种式子的资产阶级政见之冲突。他们比较有一共同的目标：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以口头上的保护劳动社会政策诱惑无产阶级，使为己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这种“指导”，像我们上面的分析，其势必定使国民革命失败或妥协：以反对阶级斗争而减杀劳农平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反对联合各国革命势力而巩固帝国主义的国家。

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正因此而不得不加劲发展，否则，共产党的失败，不仅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失败，而且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和无产阶级携手共进，在无产阶级之政治领袖之下，结合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国现时正是格外需要共产主义之宣传，不但对于工人农民，而且对于一般人民，甚至于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使他们知道人类历史的演进，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从国民革命以至于社会革命的，不过是革命的，亦就是所谓“赤化”的政策罢了，并没有甚么洪水猛兽似的可怕；使他们知道，世界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必然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末日，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社会革命的胜利，不久，便要临到；他们那所谓的顽蛮的抵抗，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压迫自己，没有别的好结果。共产主义的发展在中国今日决不太早，只嫌太迟而太缓——以至于增加资产阶级许多愚妄自欺野蛮残狠的枉然的顽抗和梦想。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分化虽然开始，然而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使资产阶级知道别无出路，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使小资产阶级知道自己的犹豫畏怯只是造成帝国主义巩固其统治之机会与可能，——这种分化的结果，只能使大多数革命青年和劳农阶级，在经验上更加确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使小资产阶级等逐步觉悟，因而逐次巩固一般平民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只有极少数的反动“领袖”将来完全倒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的的怀里去，变成明显的反革命党。

（原载《新青年》3号，1926年3月25日出版）

中共中央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国民党同志们：

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内，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民族革命运动，固然有了突飞的进步；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山先生有灵，应有两件最痛心的事：一是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一是反赤运动之高涨。全世界反赤运动的主人本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指示反赤运动者自然也是它们，尤其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它们所用在中国反赤运动的工具是反动的军阀（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陈炯明、魏邦平等）及反动的知识阶级（研究系、国家主义派及老民党反动分子如尤烈、徐绍桢、章太炎、冯自由、马素、邓家彦等）；他们所反的赤是工会、农会、学生会、共产党、国民党、国民政府，甚至于国民军和郭松龄，更甚至于段祺瑞治下之贾内阁，也算在赤化之内。这班鼓吹反赤的人们，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一不是背叛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他们所反对的赤化派，大部分都是参加民族运动的，而且除共产党之外，没有一个说得上是什么赤不赤；可见他们所谓反赤，实际上乃是用反赤的旗帜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对抗，为帝国主义者来破坏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先觉，他若亲见一班老同志参加这种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岂不是一件痛心的事！

至于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中山先生有灵，那更是痛心了。右派对于党内的纠纷，不待第二次大会来解决，竟痛痛快快由西山会议产生了在广州统一的中央党部以外之中央党部，接着又另立和左派分离的各地方党部，在分裂之形式上，我们可以说是右派之错误。分裂是西山会议决定的，右派对于左派分离之理由，在西山会议的议决案可以看出，一是反对共产派，二是反对苏俄，三是反对联共联俄的左派，在分裂之理由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右派之错误。

国民党联共联俄，本是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大会时所决定的革命政策，当时公然表示反对此政策的便是冯自由一派。列席西山会议的右派领袖们，自以为是中山正统派，又声称不能和反动派合作，可是实际上西山会议之目的及其主要的议决案，乃是反共反俄，乃是抛弃了孙中山的政策而采用了冯自由的政策，这是我们所深为惋惜的。或者他们自己不承认是根本上反共反俄，不过对共不赞成党内合作，联俄须以平等待我为条件，即令是如此，已经明明白白将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政策加以修正了。这一修正，不啻将中山先生的主张根本推翻，不啻表示冯自由的主张对于孙中山的主张之胜利。因为对它党党外合作是普通的党略，联络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是普通的外交政策，和中山先生联共联俄之特殊

的革命政策不同；中山先生看清了国内无产阶级的共产派有党内合作之必要而无危险，看清了国外无产阶级的苏俄必然以平等待我而无所疑虑，才决定联共联俄这两个特殊的革命政策，现在右派对此政策而怀疑而修正，至少也可以说是孙中山与冯自由之间的调和政策。

右派对于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为什么这样怀疑而要加以改正，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小问题，而有很大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说明的。在前，中国民族运动，如洪杨事件，如义和团事件，都只是原始的农民暴动；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参加运动的主要成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之知识者站在领袖地位，因此，中国民族运动的形式及性质，遂进了一步；到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以来，全国大都市都发生了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运动，并且发生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运动一开始即带着浓厚的民族运动色彩，且直接参加民族运动，因此，中国民族运动的形式及性质，更进了一步。这一个进步，遂又反映到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国民党，在党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国民党，其中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如章太炎、冯自由等，看轻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地位，不相信中国有继续革命之必要与可能，遂先后脱离国民党而投降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其余的革命分子，虽不曾看轻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之力量，而同时看见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力量还是很雄厚，感觉着自己孤立，遂有结合同盟军之企图。这一企图在国民党是必要的，也正因这一企图使国民党起了猛烈的分化：一派企图向左结合无产阶级，一派企图向右结合资产阶级。企图结合无产阶级，遂不得不采用容纳共产派、联俄、拥护工农利益等革命政策；企图结合资产阶级，遂不得不修正联共联俄政策及提出阶级调和的口号，国民党左右派乖离的真因完全在此。

依照中国革命之现状，这两派的主张究竟谁对，这更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在每个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固然应该采用适当的口号与策略，努力获得资产阶级之参加，至少亦要能够使他们中立，万不宜驱之使其站在敌人那边；可是国民党若企图结合资产阶级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同盟军，来担任困苦克己的决死斗，不能不说是一个幻想。全民族的经济解放运动，本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应该努力参加的；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大半都是从买办阶级分化出来的，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及本国封建军阀有很复杂的经济关系，未来的抽象的希望，敌不过他们眼前具体的利害打算，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运动走一步退十步的态度，也就是这个缘故。反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乃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并且他们大部分亲身在外国资本家鞭笞之下，每日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资本帝国主义之凶猛，他们比任何阶级都看得清楚，所以他们在事实上已很猛烈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国际状况上看起来，帝国主义本是资本主义获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掠夺发达到最高形式，所以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不明助或默认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掠夺与压迫的；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的，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苏俄及德国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德国共产党。依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说民党左派企图结合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同盟军是对的，因此中山先生的联共联俄的革命政策也是对的。

可是反动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及苏俄所造的谣言与非难，国民党右派竟据以做怀疑及修

正中山先生联共联俄的革命政策，这也是我们应该辩正的。他们捏造中国共产党之谣言很多，最重要的是破坏国民党或是想变国民党为共产党。可是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若企图破坏国民党，便成了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在事实上，自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国民党党员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大有进步，所破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打败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反动分子，这正是反动派所痛心，所以不得不出死力来造谣非难共产党的最大原因。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决不至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之幻想。他们非难苏俄，最要的有三件事：一是蒙古问题，二是中东路问题，三是广东问题。在国际革命运动上说，援助一切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是苏俄开国的国是，他援助蒙古民族，和援助中国民族是同一的理由，并且同时他不赞成外蒙压迫内蒙，和不赞成中国别的大民族压迫蒙古民族也是同一的理由；在国际交涉上说，中俄协定已经明白规定蒙古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是中俄对于蒙古关系，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余下来的就是政治组织问题，这是要中蒙两民族自己决定的，难道我们愿承认苏俄对蒙古的关系和法国对安南、日本对台湾一样，要他亲手交还我们吗？中东路的办法，不过是暂时的局面，拉得克和杜洛斯基都解释的很清楚；为什么要维持这暂时的局面，此理甚明，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若今天交给张作霖，明天便转到日本手里或和其它帝国主义的国家共管，苏俄是希望中国的人民政府早日成立，能够接受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并不是企图永远中俄共管的，我们若望苏俄马上交还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表面上虽然是为中国向苏俄争得此路，实际上是为日本或其它帝国主义的国家向苏俄争得此路。关于广东问题，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似乎更是不须辩正，他们硬说广东已经被苏俄统治了，嘉伦将军掌着军政权，鲍顾问掌着民政权，可是嘉伦将军和鲍顾问都已经先后离开广东，试问现在执掌民政权、军政权的又是谁？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民族革命进行之故，现在极诚恳的劝告中国国民党的右派同志们，你们如果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便应该完全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而不加以怀疑与修正，而不站在孙中山与冯自由之间的调和地位，便应该取消和左派分离的党部组织合成整个的左倾的中国国民党，来努力担负中国民族革命的工作。眼前民族革命之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打倒反赤运动；你们及资产阶级虽然不曾积极的参加这个运动，似乎取了中立态度，这是不够的。他们所谓反赤，俨然和反帝国主义是对抗的口号，明明是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利用中国反动的军阀和反动的知识分子，向中国参加民族运动各派反攻的政策。因此，负有中国民族革命使命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者之反攻，是不应取中立态度的。

所以我们在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高声叫出总的口号：

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结合起来！

全中国的革命派结合起来！

打倒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对于上海伪中央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处置

（一九二六年）

此时是帝国主义军阀及其他一切恶势力组织联合战线向国民猛力进攻之日，中国国民党的任务，是组织一切革命势力向敌人的联合战线进攻，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所不可一刻忘记的责任。乃本党一部分党员忘记了他们的责任，不组织起来向敌人进攻，反组织起来向党内最能革命之同志进攻，前有西山会议之召集，现在又有伪第二次全国大会召集。党的全国会议已于一月在广州开过了，其结果之完满与其能领导国民革命已为国人所周知，乃上海等处一部分反动党员，惧怕革命，不能遵守大会之决议，竟定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集另一会议，此种分散革命势力的行动，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努力。中国国民党一切革命的党员，均应奋起声讨，以卫护孙中山先生的宝贵的遗产——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反动分子所为非常愤慨，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议决：（一）推汪精卫同志起训令，将该伪中央叛党举动向全国各级党部宣布，俾明真相；（二）授权国民政府以全力制止其开会，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归案严办。兹将国民政府命令及汪精卫致黄惠龙等电先录于下：

国民政府命令

去岁冬间，少数叛徒托庇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在北京开西山会议，在上海开伪中央会议，蓄谋破坏本党基础，造谣煽乱，无所不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曲加矜恕，许其自新，稍有人心，当知悛悔。不图少数叛徒倒行逆施，每况愈下，近更以三月二十九日开伪代表大会为号召，仍谋在西山集会，不遂，则在上海举行。似此公然叛乱，实属罪不容诛，政府谨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对于此等叛徒，严厉惩治。特此布告：凡有敢在上海北京等处假冒本党最高机关名义以遂其叛党营私之目的者，不分首从，一概拿交法庭照叛逆论罪。此等叛徒或自托翊庇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之下，为政府权所不及，得以肆无忌惮，惟政府必尽力所能至，使此等叛徒依法递解，毋使幸免。兹特先行布告：凡列名伪会者，务于三月二十九日以前声明背签，否则届时定按名通缉，决不宽贷，其各凛之，此令。

国民政府致总理灵前卫士铣电

北京西山碧云寺孙总理灵前卫士黄惠龙马湘暨诸同志均鉴：总理灵前，须清严肃静。

去冬少数叛徒，假冒中央会议名义，擅在灵前喧呶集会，亵渎神灵，违犯纪律，兹闻彼辈又将于三月二十九日假冒代表大会名义集会，似此怙恶不悛，至堪痛恨，仰该卫士等严行制止。无论何人在灵前，只许肃恭瞻谒，不得有其他喧扰行为。至于少数叛徒生无面目见同志，死无面目见先烈，犹敢在总理灵前放肆，实无可恕。该卫士等职责攸关，若袖手坐视，则与贼同科，国法具在，勿谓托庇北京恶势力之下，即可弁髦国民政府之规律也。仍将情形具报，勿违。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汪兆铭洗〔铣〕（十六）。

附伪中央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告

本会前日公布于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总理灵前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披露各省代表之籍贯姓名，因秘书处发稿之时误用废稿，其中不免乖戾之处，兹特将本会依据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条丙项之规定，经总理指派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之代表，因身故或开除党籍而增补者之籍贯姓名录正，公布如下：

（广东）邓泽如　胡文灿　马超俊　（广西）刘崛　苏无涯　覃超　（福建）刘通　丁超五　詹调元　（云南）邓泰中　纪人庆　李文治　（湖南）邓光禹　刘况　谢晋　（江西）萧炳章　王恒　桂崇基　（浙江）沈定一　戴传贤　沈肃文　（贵州）李元著　王度　周仲良　（直隶）李永声　李东园　张星舟　（山西）王用宾　刘盥以　刘景新　（陕西）焦易堂　（山东）　于观成　张苇村　于洪超　（江苏）茅祖权　刘云昭　狄侃　（湖北）刘成禺　田桐　祝润湘　（河南）刘荣棠　张善与　丁骞　（奉天）　朱霁青　王秉谦　宁武　（吉林）李希莲　董耕云　徐清和　（黑龙江）田铭章　乔根　傅汝霖　（甘肃）师世昌　张宸枢　邓宝珊　（新疆）张凤九　（西藏）乌勒吉　（蒙古）克兴额　（广州市）孙科　吴铁城　林云陔　（上海市）何世桢　叶楚伧　伏彪　（北京市）　谭煦鸿　石瑛　姜绍谟　（汉口市）居正　时功玖　彭介石　总理指派之海外代表全数有效　特此附白

附吴铁城等声明冒签函件

（一）吴铁城启事：顷阅上海商报二月二十六二十八等日封面广告，载有由西山会议产生之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一则，谓定于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总理灵前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各省代表中，广州市下竟列有铁城姓名。铁城对于此事始终并未预闻，显系窃名冒签，绝对不能承认。除函中央委员会声明否认外，特再登报郑重声明，希全国各同志亮察是祷。

（二）苏无涯等上中央党部函：敬呈者，顷阅上海商报二月二十六二十八等日封面广告，载有由西山会议产生之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一则；谓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总理灵前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各省代表中，竟列有无涯等姓名。无涯等对于此事，始终并未与闻，显系窃名冒签，绝对不能承认。除登报声明否认外，特此陈明，敬祈鉴察。谨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苏无涯，李元著，周仲良，刘崛，王度。

（三）谢晋致国民日报函：二月二十八上海申报广告栏登载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

通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代表内有湖南代表谢晋等字，殊为骇然！兹特声明，此等反动分子，如不觉悟，当永与绝缘。其他之无耻行为，自不遑计也。耑此即请披露，是为至荷。

（四）孙科濮电：中央执行委员会鉴，沪会冒列鄙名，绝不承认。特闻。

（五）乌勒吉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函：敬呈者，本员向来不阅上海商报，故对于反革命分子之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总理灵前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事，毫无所知。兹阅报载上海伪会分子竟有本员名字，查本员民八护法南来，始终未离先总理左右。先总理逝世后，迄今供职国民政府外交部，于此次上海伪会事，绝未与闻。其为窃名冒签，昭然若揭，特此呈明，谨祈鉴察。

（六）王恒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函：敬启者，顷阅报载知有一部分本党叛徒假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在沪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列与会名单中，列有恒名，不胜诧异！恒事前既未与闻，所有该伪代表大会以后种种行动，恒概不负责，特此声明。

（七）覃超呈中央党部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诸公钧鉴：北京西山会议分子，已成叛党行为，背签超名，实为可恨！谨电声明，伏乞垂察。

（八）刘通呈中央党部函：敬肃者，顷阅上海商报二月二十六二十八日等日封面广告，载有由西山会议产生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一则，定本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总理灵前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会。其所列各省代表中附有贱名，本人对于此事始终并未预闻，系属冒名背签，除登报声明外，理合呈明，只请察核。

（九）马超俊呈中央党部函：敬复者：顷奉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警告，将超列入第三项处分之内，并饬于二个月内答复等因。查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执行委员会曾委超俊为工人部部长，但因私务纷纭，早经正式辞职，经营商业。至于上海报纸载上海第二次全国代表大列有超俊名字，系属背签，并未与闻，承函前因，用特函复，尚乞垂察为荷。

（十）萧炳章呈中央党部函：敬启者，炳章数月以来，卧病汉皋，并未与闻党务。顷由沪来粤，途中检阅报纸，借悉有人妄假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在沪召集所谓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冒列鄙名，炳章概未与闻，所有该会以后一切行为，当然不负其责，特大函声明。

（十一）邵元冲戴季陶紧要声明：此次上海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员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鄙人等认为非法，均未加入，特此声明。

（十二）叶楚伧紧要启事，此次上海所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鄙人概未与闻，特此声明。

（原载《政治周报》8期，1926年4月出版）

国民党右派大会

（一九二六年四月）

独　秀

一个党内发生左右倾的争论或派别，这本是各国政党中恒有之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中国国民党本早已有了左右倾的事实，而许多老党员抵死不肯承认，以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故意造出这个名词以图离间国民党的，至少也是由于共产党之神经过敏；及至现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组织，仍然要说："他们（指共产党）一方面尽量的宣传左右派别，使国民党分子自相歧视（此之所谓左右是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只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真是一件怪事！

至于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什么，右派之内容究竟是怎样，他们都曾经讨论过，或者他们以为这都是我们的推论或误会，不足为据；现在右派的上海大会，已将他们的理论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大会宣言上公表出来，我们把他们的宣言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通过的孙总理提出之宣言，对照一读，便能够明白：所谓左右派，真是我们"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还是他们（右派）的主张，和孙总理生前亲身领导的国民党所决定的主张实有不同。明白了这些，便知道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事实存在，并不是由于共产党故意造谣或神经过敏；而且可以知道年来国民党内的纠纷，不尽是因为右派排斥共产派，而实有左右派因主张不同而冲突的事实存在。

孙总理所决定的联合苏俄及容纳共产分子这两大革命政策，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到第二次全国大会，都未曾变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会议，即以变更联俄联共这两大政策为目的；由西山会议而产生的此次上海大会，也是同样的目的。此次大会宣言上关于联俄之主张，表面上虽然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于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同时，实际上历数苏俄对中国侵占领土，把持中东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赔款，等罪，和张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对于苏俄之宣传论调，完全一致，事实如果是这样，其结论安得不"一反联俄政策"？且在事实上，他们的重要分子如孙镜亚何世桢，竟在反赤大联合之化身所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文书主任宣传主任之职，如此而还非一反联俄政策，什么才是一反联俄政策？他们根本不了解苏俄，遂因而不了解以苏俄共产党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主义的党派结合，即戴季陶所谓横断国际；国际联盟是各资本主义的国家结合，即戴季陶所谓纵断国际；他两个的性质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和第三国际对抗的是第二国际不是国际联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说："国际联盟与第三国际，此世人所视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在吾人视之，则确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视此两个国际，则便无所短长，盖皆基于战胜民族之组织也。"他们称第三国际

与国际联盟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们视此两个国际无所短长，都是战胜民族之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一个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组织，更不是一个什么战胜民族之组织，战胜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国的共产党固然在第三国际，战败民族中之奥匈土等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被压迫民族中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鲜中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他们更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遵守列宁“扶助被压迫阶级”“扶助被压迫民族”这两大革命遗教而奋斗的，在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完全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的压迫弱小民族之总机关；在事实上，第三国际所号召的“不侵犯中国Hands off China”，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苏俄已成了很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中国历年来在外交上对于国际联盟的呼吁，得着过什么应声？他们（国民党右派）不知道这些有所短长的事实，因此不能了解孙总理联俄联共的政策之真实意义，因以在实际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态度，他们口头上说绝不一反联俄政策，不过借此掩饰他们显然违反孙总理的政策之痕迹罢了。他们对于共产党之态度也是这样。此次宣言上，一面说：“吾人当认为友军两不相迕。”“或有分则相求之可能。”一面：中国共产党“中饱五卅惨案捐款至四十七万之多。”“甚至起反动于本党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他们所指责的这两件事如果是事实；则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更加于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诛之，国民党为什么还当认为友军，还有什么和他相求？民国元二年间，国民进步两党，在报上相互造谣攻击，已经不是正当的态度，况且在一个党正式负责的宣言上任意造谣诬蔑他所自认的友军，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于广州事变，其中心问题之中山舰调动阴谋，现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谁起反动于国民党之政治策源地——广州？他们的宣言上，又说共产党“广设济难会为猎资及宣传其主义之工具。”按“济难会”本是不分党派的社会团体，其经费出入照例是公开的，任何党派都不应据为宣传其主义之机关；照右派宣言上那样说法，是不是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告密，破坏这一个救济政治牺牲者的社会团体？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之三民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根本政纲；并且这宣言是孙总理向大会提出的，当然不能说是汪精卫所伪造，更不能说是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当时右派的首领冯自由，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反对孙总理。可是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的内容，显然和第一次大会宣言相抵触，其要点如左：

（一）在民族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第二方面，……辛亥以后……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视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而此次右派的大会宣言则说：“而民族间之生存竞争，至今犹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其一为战胜民族，其一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他们（右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他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又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是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说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和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

释的民族主义之第一方面显然不同，土耳其对于协约国是战败者，对于希腊是战胜者，他究竟是战败民族呢，还是战胜民族？右派的民族主义若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战胜民族，若丢开主义而以战胜战败定反对或同情之标准，则反对英法日美，同时也要反对苏俄，或者也要反对土耳其，甚至中华民国若对帝国主义者战胜了，也应在反对之列；更进而应用到国内问题，固应反对战胜的奉直军阀而同情于战败的国民军，同时也应反对战胜的国民政府而同情于战败的陈林刘杨了。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帝国主义者则可，若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战胜民族则似乎不可。丢开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固甚希望蒙古将来能为中华民国联邦之一，然亦必须军阀政府推翻全国的国民政府成立，始有资格始有余暇和蒙古民族商谈此一问题；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将"叛国""僭窃"等徽号加诸蒙古政府，视蒙古民族的独立宣言与宪法如无物，这是明明违反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之宣言。

（二）在民权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民国之民权，……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极力号召全民政治，显然与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权主义相违。

（三）在民生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的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竟轻轻的将这两个口号去掉了，"平均地权"本是中国国民党最初期同盟会时代的党纲，宋教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新党纲上，轻轻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不幸的平均地权这一口号，现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抛弃了！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现在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己而奋斗也。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忽说："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至于无所困苦，俾农人于团结组织之中，不致发生阶级斗争之惨祸。"又说："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雇主，而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社会，盖此种担负，实社会消费者所共任，此社会上大多数之经济利益所以常相调和也。"两相对照起来，前者是主张为农夫工人之解放反对特殊阶级而奋斗，实质上是反对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希望地主觉悟以免除农人之困苦，希望雇主施恩使工人得较美生活，实质上是主张阶级调和，是反对阶级斗争，且明言"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季陶先生闻此言否？）

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不同，是右派大会宣言的主张和孙总理所领导的左派主张不同。而不是和共产党主张不同。）有了这些不能否认的事实，所谓国民党左右派，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了罢！如果右派能够仍旧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而取消他们的此次大会宣言；如果能够取消他们自己的各级党部，而回到广州中央党部统辖之下；我们便甘心承认造谣离间神经过敏之罪。

可是事实上我们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谒诚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因为右派中有些较右的分子，已经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黄大伟邓家彦徐绍桢童理璋等所组织的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合作；这个国民外交协会，和陈炯明派章太炎黄大伟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张作霖所资助之反赤大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团体。蒙他们不弃认我们为友军，现在敢以友军资格，希望他们和我们在相同的口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上合作；并敢以友军资格，奉劝他们勿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宁可使我们受神经过敏之咎，不可使我们□幸而言中！

（原载《向导》150期，1926年4月出版）

上海伪国民党
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反响

（一九二六年五月）

慕　翰

少数叛徒邹鲁沈定一等在沪召集之第二次伪代表大会已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建国学校开过会了。据其事前在上海各报所登之召集全国大会人数，不过七十一人，而其中戴传贤叶楚伧吴铁城等共十余人均于该伪会开幕前分别通电登报，声明冒签，如邓宝珊刘成禺石瑛王用宾等都不曾到会。那末，所谓“第二次全国代表”者，不过是邹鲁谢持居正沈定一等反动分子一手包办，临时拉凑几个胡乱成局罢了。兹将该伪会代表的姓名录下：

易国杞　汤仁溥　张近芬　黄季陆　黄复生　高岳生　黄　鲍　马　彬
茅祖槃　龚材榕　陈灿章　谢　持　孙甄陶　黄泳台　朱乃斌　张平江
宋镇仑　肖　异　任西萍　张惠如　陈去病　梁楚三　邹　鲁　陈啬民
龙丐子　唐启宇　林　翔　傅汝霖　何世桢　李东园　王振民　刘恺钟
沈定一　蒋希曾　田　鹏　周海航　谢英伯　任雷军　郑　观　梁庆桃
谭　赞　黄　英　项东山　宋垣忠　张禀丞　关培林　曾宪明　居励今
王寄一　薛广汉　李翊东　王光辉　张若柏　丁常樵　张星舟　雷万钧
李宗邺　毛仲衡　张耀德　张寅亮　李　鹤　伏　彪　吕子人　张善与
王仲年　胡文灿　钟汝中　李敬斋　刘求南　黎东方　徐之圭　李西岸
孙镜亚　桂崇基　沈素生　孙　镜　覃　振

三月二十九日为伪代表大会开会之第一日，举定张继居正谢持覃振沈定一傅汝霖林森七人为主席团。张继演说，即大骂共产党，以示该伪代表大会的真面目。可惜其词未终，即因“脑病”下台，沈定一覃振等相继演说并纪念七十二烈士。最后，有陈啬民朱乃斌报告广州三月二十日事件，大造谣言，谓广州已肃清共产分子，上海商报记载当日经过情形有谓其“每至一段落时，全体皆鼓掌称快”。第二日则为这些叛徒腼颜接受遗嘱及说明宣言草案等。第三日开预备会议，预备“大会移粤问题”的提案。他们幻想得可笑，可于他们所发表的意见中看出来。“当时发表意见者，纷纷不一。如孙文主义学会派，则主张由孙文主义学会，先派代表前往广州，接洽合作问题。如与蒋介石有私交者，则主张先由私人电探蒋之真相，俟其复电，再为计议。其外更有主张由大会派员往粤，先做宣传功夫；或直接训令广州政府及蒋介石各将领，服从大会决议案，为清党运动者。惟湖南代表覃振则谓先将大会应行之工作做完，使广州各同志，明了此间大会真相，引起信仰心理，然后再决

定五月五日，本党总理在粤就护法总统之纪念日，召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临时大会之议案，使各个同志有所趋向，共同努力前进，然后再由大会特派专员，前往筹备，吾人前途，庶几可抱乐观。否则贸然派人前往，或思由文字上表现，恐未必能如吾人之所愿也”（见四月一日上海各报）。次日即将此案提出讨论。这般自命为革命党人的勇气和决心，当时真是象煞有介事！请看四月二日上海商报的记载：“当时发表意见者，甚不一致，龙丐子，翁吉云等谓革命党固无所谓生死危险，但广州既有中央委员会，我们即使冲锋前去，在他的地位上，利害上，能否与我们并立，能否容纳我们开会，此两点，大家应注意。陈籥民黄英蒋希曾等则谓国民党不是做官发财的党，是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党，革命党存了流血的决心，任何疑难的事，都不成问题，本会一定要转往广州去开的。傅如霖则谓广州是我们的策源地，我们开会当然是可以去的，什么危险生死，固非革命党所宜顾虑；但是事实上利益如何，开会时期如何，蒋介石对于我们态度如何，我们自己又当如何，亦不能不一一研究，譬如大会议决了移粤开会，各个代表毕竟能否全去呢？如能全去，固为吾（傅君自称）所深盼。如其不然，或少数人去，以及近半数人去，无论如何解释，吾总觉得有损大会声价。所以很望大家将能否全去的一点，须先解决。沈定一则谓，革命党是创造局面，非因人成事的，现广州虽有反对我们的，但亦有欢迎我们的，断不能因反对派而辜负了欢迎的方面，且党员是受党支配的，断不能以自己能去不能去，肯去不肯去的疑问为问题”。讨论后，即通过下列的“十二分郑重”的决议案：

“我中国国民党为建立中华民国之革命政党，亦即我民族唯一的纯一革命政党。广东，我革命之策源地，亦即我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总理孙先生竭四十年之心力造党造国，中道逝世，加入本党之共产党分子，乃窃据吾党以破坏之，并假吾党以破坏我国。最近之事实，如各地人民委员会之组织与广州工人政府之密构，大沽运械与黄埔谋变，此在政治上，军事上，已显见共产党人之谋劫吾党，谋劫我国民政府，谋劫我全民托命之国家，叛迹昭著，无可掩饰。赖我在粤之忠勇同志，平镇乱萌，不为所劫，此可见总理在天之灵爽，孙文主义信徒之精神。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以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本于谋我同志之团结，及党之自由。今共产党派之逆迹已彰，策源地之自由可复，海内外二十七省区代表，一致决定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移至广州继续开会，以明我中国国民党为我民族纯一的唯一的革命政党，并将肃清党内任何属性之叛党分子，务使各省区歧出之恶现状，一例敉平。秉我总理全部遗教，革命精神，以为国民先，为此决议普告海内外同志。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五年四月一日”

这些叛徒口里虽然这样说，议决案虽然这样郑重，心里毕竟有点怕，于是决定一个滑头办法，选定黄复生张星舟黄英管鹏宋镇仑李敬斋黎东方钟汝中八人为特派员，先行赴粤，探试稳当了，然后他们再跟在后面去“创造局面”。不料这些特派员也乖觉，表示主席团不派人同去，未免令人疑惑主席团有意避难，而以他人为牺牲，观其次日会场中谢持以四川代表资格所发之言，便可知道。他说：“昨日通过将大会移粤开会，并附带先遣特派员八人往粤筹备案，足见同志热烈爱党。但是对于主席团加派特派员同往一节，虽一时有所误会，互相争论。结果仍是服从议案，实是本党的好现象。不过主席团在昨晚开谈话会时候，也觉得主席团不派人去，在同志方面，确不免怀疑为怕死，怕危险，或只能唱高调，

想利用诸位青年同志，去牺牲奋斗，所以就决定希望张继同志去。但因脑病在事实上实不能去粤。本席及沈玄卢同志，定愿前往。惟须由大会指派，决不推诿，如何仍希公决”（见四月三日上海商报）。当时发表意见者甚多，结果，决定沈谢二人赴粤。这消息传到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愤慨，在第十八次常务会议时，陈公博同志提出，近闻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伪第二次代表大会，派人来粤捣乱，应即拿办，俾知警惕案。决议，着国民政府严令军警一体缉拿归案惩办。国民政府即日发出通令云：

> 前闻有少数叛徒，蓄谋破坏本党基础，拟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集伪代表大会，以图借名号召，遂其奸谋。政府为促其省悟起见，当经下令警告，乃该叛徒等犹不知悔，仍敢违法集会，并致电各处，造谣煽惑，复拟派人来粤，肆其离间挑拨伎俩。似此甘心作乱，实属罪无可宥，着广东省内各军警一体严缉，迁有上海伪代表大会派人来粤煽乱，即予拿解法庭，照叛逆治罪，以肃法纪。此令。

同时，广州市公安局亦饬各警察署所一体遵照政府命令办理。这些“存了流血的决心”的所谓革命党人听见这种通令也有点寒心而裹足不前吧。不过事有凑巧，四月三日的会议场中有个什么“新自粤到”的周海航报告广州政变情形，他说：“广州政变完全为蒋介石个人地位危险起见，并非驱除共产党之全部，而欢迎上海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各位同志。所以要请各位对此一点格外注意”。这些“创造局面”的所谓革命党人因此便把十二分郑重的“大会移粤”的决议案，人不知鬼不觉地打消了！

这些叛徒整整的开了十日会议，除闹了一场“移粤”的高兴及通过一些不关重要的决议案如“改进农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原则案”，“制定农业政策大纲案”，“肃清共产分子案”（在他们看来是最重要的）等之外，弄不出半点成绩，便以选举监察委员及执行委员而宣告收场。关于选举一节，四月六日上海商报之纪载颇饶兴味，兹将其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自前晚（星期日）借大东酒楼宴请本埠各新闻记者，要求对于该代表会作舆论上谅解以后，复于昨日（星期一）上午十时，在建国学校，开预备会议，出席代表六十七人，主席邹鲁，首读遗嘱。次湖南代表萧异，主张将第二次大会应举之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提前办理，并主张依原额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增至二十二人，候补委员十七人，增至二十人。附议者有五人以上，案遂成立。惟主席团附带意见数端：（一）人选问题，须有革命史者；（二）凡青年同志，精神活泼，而能服从本党指挥者；（三）执行委员人数，须维持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决之先例念四人，候补可由十七人增至三十九人。盖前者是尊崇总理在日之意见，不可更改，后者是容纳新同志之意见，使一般青年同志，亦可多数列入委员之地位，鼓励其志气，提高其希望，发挥其本能，为党奋斗，但对于被广州二次代表大会选出之执行委员，及候补者，概不推选，以为判别。当时发表意见者，颇形纷纭，青年一派，则多附和萧异之主张，而主席团之沈定一，则坚持主席团之主张。反复辩论，至午后一时，尚无结果。比及苏代表沈素生，痛斥主席团，所谓第一次大会议决之执行委员二十四人之荒谬，略谓第一次大会，总理对于执行委员所谓二十四人者，系由大会选举，其实连总理共二十五人，对于表决议案时，始可依过半数之规定表决，如谓二十四人，则不仅对于第一次大会之议事录，未曾观察，且对于会议常识，竟是绝无，故本席希望主席团，先将第一次大会议事录考查一下，再议人数云云。沈始俯首无辞。结果将执行委员改为二十五人，候补委员三十九人

（按海内外每区一个计算）。由主席付表决，多数通过（仍须待正式会议通过始能生效）。复次主席团之覃振以湖南代表资格发言，反对主席团对于曾被广州二次大会选出之执行委员及候补者不得再被选之限制。继以法定开会时间已过，主席宣告暂行休会，不及讨论，遂无结果"。在这纪载中，沈定一等之用心，昭然若揭。第一，他们所谓"有声望而有革命史者"，便是他们自己，一旦委员到手，可以冒窃国民党的名义，招摇撞骗，奉迎军阀官僚，以达他们升官发财的好梦。第二，他们利用一般青年的虚荣心，增加候补委员人数，以"列入委员之地位"诱骗青年，供他们的驱使。其实世界也没有这种怪事：一个团体的正式委员只有二十五人，其候补委员反有三十九人的。

他们整整费了二天的时间，才把伪会委员选出来，伪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五人：林森，邹鲁、覃振，张继，谢持，胡汉民，李烈钧，邵元冲，沈定一，居正，许崇智，傅汝霖，黄复生，张知本，石瑛，田桐，桂崇基，何世桢，张星舟，刘积学，茅祖檠，管鹏，黄季陆，焦易堂，孙镜亚。伪候补执行委员三十九人：陈箇民，张平江，宋镇仑，孙镜，黄英，张近芬，李次宋，高岳生，李宗邺、李翊东，蒋希曾，张善与，宋垣忠，沈萧文……伪中央监察委员七人：石青阳，李敬斋，马叙伦，陈去病，干洪起，谢英伯，樊钟秀。伪候补监察委员五人：张秋白，郑毓秀，黄斗寅，沈素生，丁骞。其中胡汉民同志是国民政府委员，外交部长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叛徒姑将其列入，是有意侮辱。他现在国外，不久定有声明。邵元冲同志曾登报否认于前。

这些叛徒也知道他们这次的"代表大会"在社会上看去未免太难以为情，于是一面由他们自请一些工贼（上海工团联合会一派）所把持的招牌工会出来招待他们（所谓十五工会之招待）；一方面由他们伪造一些贺电祝词，如四月十五日广州民国日报所载云："伪会之召集，本为本党同志及国人所不齿，遂伪造各方贺电，以自掩其丑。计逐日在伪会日刊所发表之贺电祝词，安徽，江苏，河南等省党部，及其他海外支部等贺电或祝词悉出于叛徒之伪造；又恐为人否认，则于某某省或某某市之下加临时二字以为掩饰，即如本省明明仅有广东省党部，伪会则造一广东临时省党部名义，其可笑至于此。最近又在伪会日刊第九期发现一更奇怪之祝词及贺电，竟用广州特别市党部名义，兹录其词如下：贺电云：敬闻大会在沪召集，不禁雀跃三百，际兹异党人寇，党命绝续，国基飘摇之秋，有此伟大集会，当可奠党国于磐石之安，谨电驰贺，并祝前途。广州特别市党部叩。又祝词云：武力肆虐，邪说纵横，神州腥膻，国武孔难，绝续之交，以辅以翼，正义彰明，欃枪寝息，簇簇冠裳，济济群英，宏严新谋，吾党干城，敬献俚词，聊舒胸臆，谨祝前途，与天无极。他们这种无聊的举动，自然立即会被人揭穿，兹录广州特别市党部致函民国日报否认该贺电祝词之公函如下："径启者，顷阅四月十五日贵报登载上海伪代表大会捏造之敝党部贺电祝词各一通。查系该伪代表大会假借名义，意图欺骗之所为，敝党部绝对不能承认。希贵报以此函登报声明，俾社会人士明了，不致为所摇惑，实纫党谊。广州特别市党部。

这些叛徒本为国民党人所共弃的，此次假窃名义，托庇于帝国主义者的势力之下，在上海召集伪代表大会，尤为党人所痛恨。甚至曾为西山会议捧场的上海民国日报都不为出力。全国各级党部之反对该伪会者，函电纷飞，可惜本刊限于篇幅，不能尽录。兹录江浙两省党部及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启事和电文，以见一班。

一　江苏省党部复安徽临时省党部电

三月卅日读贵省党部艳电称：本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早经闭会，现忽有人在沪窃名召集，殊堪骇怪，除呈请广州中央查办外，乞一致声讨云云。敝省部深表赞同。前敝省部对此事，早已一再发表宣言及警告，声明如有不知自爱敢参与若辈非法会议，一经查出，敝省部即当呈请中央，惩以最严之纪律，决不宽贷。不料若辈丧心病狂，仍倒行逆施，召集此非法会议，是其蓄心反动，破坏本党之罪，业已白喙难辞。敝部惟有依照前宣言与警告进行，愿与贵省部共负铲除此等反动分子之责任。江苏省党部叩陷。

二　浙江省党部申讨该伪会启事

本党少数叛党分子，自去冬举行西山会议后，占据旧上海执行部，成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背纪非法，迭经海内外各级党部申讨在案。今该伪徒等又假本党名义在上海召集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我中央党部予以处分，各地被指为伪代表之同志，多先后否认。惟据近日报载，仍有少数执迷不悟之叛徒强自开会，本省执行委员会，兹特郑重声明该伪徒等悛恶不改，实自绝于党。本省同志一致申讨之。除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令国民政府即行通缉外，特此通告各界诸君，幸勿受其欺蒙，此启。

三　上海特别市党部全体党员大会启事

本党不幸，发生叛党分子，自非法召集西山会议后，麕集上海，盗窃本党最高机关名义，实行其破坏本党之阴谋，业经本党各级党部声明否认，近更召集伪代表大会。此伪代表大会，即系非法之西山会议所产生。西山会议之手续不合法，行动反革命，及经过事实之滑稽可笑，尽人皆知，本无根据。然彼等厚颜已极，径自进行其毫无事实根据之宣传，恬不知耻。自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圆满开成，产生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彼等益感其无根据之苦，故尤亟亟欲以伪代表大会之名义，强其宣传之根据，虽洁身自好者，早已先后声明脱离关系，然彼等仍可本其自拉自唱之故技，不论事实上开会之成否，径自进行。其捏造事实之宣传，以摇惑观听至此。伪代表大会之反革命及非法无庸再论，即事实之滑稽，亦无殊于西山会议。代表沿用第一次之名单已全失团体改进之法理，而复任意更动，真不知何所根据。昨日开会现状，据旁听者报告，零落之状，深堪发噱。上海人士近在咫尺，可以亲自考查，为此本大会敢谨告大众，慎毋为其所愚。至党员不知底里，误受其愚者，务须立即脱离，免致自绝于本党，是为至要。特此声明。

四　上海市党部女党员大会电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叛徒谢持邹鲁等，不惟不接受广州第二次大会之决议

案与训令，深自悔改。反在上海私行集会，冒充全国代表大会，分裂本党，乱人观〔视〕听，已属悖谬之至。近竟决定派谢持沈定一等赴粤，蔑视国民政府之明令，意图施其挑拨手段，颠覆革命政权，党员等愤慨莫名，特此电达中央，请政府严行究罚，上海市党部女党员大会叩江。

五　广州孙文主义学会通电

万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钧鉴全国各团体各报馆各地党部公鉴上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阴谋破坏革命，动摇本党。不惜效忠于帝国主义，罪状昭然。民众已深恶而痛绝之，决不受其煽惑。近该伪代表大会通电，对于本会诸多诬蔑，殊堪痛恨。本会一切行动，向均听命于党，而唯革命领袖之马首是瞻。对于总理手订之两大革命策略，尤不敢有丝毫怀疑。今该伪代表大会，无端行本会为反赤同调，显系有意侮辱。此等鬼蜮伎俩，本不足道，诚恐外间不明真相，特电公布，唯希鉴察。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叩，虞（七日）印。

（原载《政治周报》10期，1926年5月出版）

〔附〕　西　山　会　议

邹　鲁

“西山会议”这个名词，在民国十五六年，可说妇孺皆知，中外闻名，象煞神通广大，万恶可作，罪恶弥天的。当时许多同志，给共产党加上了“西山会议”派的头衔，有被开除党籍的，有被革除职务的，也有壮烈殉职的。究竟什么一回事，待我个中人来说说真相吧。

“西山会议”名词的由来，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因为广州中央党部，被共产党把持，不能行使职权，同时洞悉共产党奉着第三国际命令，加入本党，为党团作用，要危害党国；遂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总理灵前，举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来谋挽救，因此就叫他“西山会议”。

这次会议既然是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开会来谋挽救党国，所以到会的人，只有中央执监委员。计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除胡汉民先生在俄，熊克武先生在狱，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系共产党，不许出席外，实际上只有十八人，这十八人中出席西山会议的，有我和林先生、居正、覃振、石青阳、石英、戴传贤、沈定一、邵元冲、叶楚伧诸先生等十人（正式开会时，戴邵两先生没有参加）。李烈钧先生虽未出席，却来电表示赞成。所以没有出席也没有表示赞成的，只有谭延闿、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格巴图、丁维汾六先生和汪兆铭。监察委员共五人，出席西山会议的有谢持和张继两先生，

吴敬恒先生署名通电召集“西山会议”，并于“西山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出席，且做主席；所以吴先生说他是“西山会议”派，就是这个原因。邓泽如先生虽没有到会，却暗中出过钱。这样，监察委员五人中，只有李石曾先生和西山会议没有关系罢了。候补执行委员，出席者则有茅祖权、傅汝霖先生等。这些是西山会议的脚色。

当“西山会议”开会的时候，发表一篇宣言，原文如下：

“本党奉总理手创之三民主义，指挥全国民众，努力国民革命肃清帝制余孽，扫除任何属性帝国主义之压迫，以建设中华民族之独立国家；且愿扶助一切弱小民族及帝国主义国家中之被压迫民众，取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使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永远绝迹于世界，此实本党所负之使命，亦本党历史上之光荣也。

依于上述之旨趣，凡以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本党所乐受。向者，本党总理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加入也，因其声明系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愿于国民革命进程中努力于本党主义之宣传与工作，非以共产党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乃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本党党部及党员，曾再三以至诚之意，纠正劝告，冀其勿负加入之初衷，迄无效果，且益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为。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联。此不徒事实昭然，抑且文字证据具在。共产党员忠于共产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苏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崭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转得商洽并行，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用是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善意的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免使两革命团体内部问题而相消其革命力，盖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

至本党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苏联，在革命进程工作之中，有联合之必要时，自然相与提携；即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亦视为友党，以明此次善意的决定取消加入本党中之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理势所不得不分，而情谊未始不可合也。

这是“西山会议”的主张。

“西山会议”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幕，会期十天，正式开会二十二次，通过以下的重要议案：

（一）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

（二）鲍罗廷顾问解顾案；

（三）开除汪兆铭党籍案；

（四）决定本党此后对于苏联的态度案；

（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钊等案；

（六）取消政治委员会案；

（七）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案。

这是“西山会议”的工作。

将要开“西山会议”的时候，我们都一致主张，清党必须在全党共同来做，不要因为

清党，使本党同志分裂起来；因此由我写一封很长的信，谢持、张继、覃振、石英、茅祖权、傅汝霖诸同志连署，给广州方面的同志。这封信开始说：“吾党成立数十余年，其中分子不无离异落后，然大多数莫不一心一德，努力革命；以故虽无严密组织之党员，尚能屡仆屡起造成民国。讨袁、护法、北伐、讨贼诸役，无或退馁。乃自前年共产同志加入以来，党中杌陧，无日或宁；直至今日，杀机尽露，迫逐之事，层见迭出。凡此多数十年革命仅存之同志，何以共产党员来加入本党以前，悉能相安，不见离异？此中挑拨离间，实为不可掩之事实。”

继则列举共产党加入后操纵、跋扈、压迫和残杀的事实，证明本党同志意见的不同，的确是由于共产党的挑拨离间；而对于共产党诽谤本党同志不革命，更加以说明：“盖吾党同志固实行革命，数十年如一日者，非俄国少数党主张在议会改革者可比，万不能以诋俄国少数党不改革之名询诋吾党，即目前共产同志反客为主之广东，何莫非吾党同志革命所得之地盘乎？至于党员之不紧张，则因吾党组织未周，不关同志革命性之薄弱也。且改组以来，机关为共产之同志把持，凡非共产党之同志，则欲插足而不能；即间借一二非共产同志以为点缀，亦必出种种手段以制之，俾无以自展。然党员总四出奋斗，未尝或懈，无论何时何地革命工作，无不有吾党之分子在焉。且彼辈之用心，非仅欲破坏吾党团体已；直欲毁灭吾党之历史，破坏同志之感情。……双十节竟然改为警告节，丑诋吾党创造民国之历史。吾党稍有心肝者，宁无痛哭流涕乎？以上事实，皆同志亲见亲闻。以吾党富于革命性之党员，而犹多所隐忍，犹未爆发者，以已容许其再入党于前，而彼亦信誓旦旦，自谓实行吾党主义于后，冀其或能觉悟。在中国今日，非吾党主义革命不可；在国民革命战线上，非团结全国革命分子一致进行不可。不图此愿非特不可达，而彼辈乃敢于如彼之横恣妄行！”

又叙述目前之危机：“近月以来，更不堪问。党权不在最高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之国民政府，而悉集中于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乃以政治委员会顾问之资格，操纵其间；而鲍罗廷所有措施，复先决于其共产党。以故党务政务之重要者，共产党之小学生莫不先知，而吾党中之重要委员则冥然无所闻也。与其谓共产党同志加入本党，毋宁谓吾党附属于共产党之为真实。此不独吾党同志痛心，中外人士亦莫不共为叹息！吾党同志若不大彻大悟，谋根本之救济，速与共产党同志划然分开，不使彼辈再行干涉吾党之事，则再过一年，恐青天白日旗，必化为红色矣”。

再阐明联俄和容共，并不是绝对分不开的事，不要以为取消了共产党员在本党中的党籍，就会损害本党和苏联的关系：“兄等须知联俄为一事，与共产党同志分开又为一事，当不至以与共产党同志分开，而影响于联俄。世界各国，非特多数未与共产党合作，且多数拿捕共党仍与联俄无关，甚至苏联认为大敌之英国，亦惟恐其不缔约”。

至于联俄，究应取何种立场；苏联所助我者，是否与其所得者相称；苏联对我，真否平等待遇；他国对付共产党，情形如何；以及共产党的政策，适合于我国与否；更加以检讨：“即以联俄言之，亦以其有益于党有益于国为前提耳。今如何者？以党事言，彼固利吾共产党投入吾党，以便脱胎换骨也；年余内部之剧烈纷争，端即在此。……至彼所谓助吾党者，计不过万余枝枪耳。然盘据吾党最高之党权、政权、军权，所得代价，实太过巨。吾兄等于此，讵未尝动于中耶？……此外如外交部顾问、参谋团主任、航空局局长，交通总

监，舰队总监，兵工厂顾问，各军训练，莫非俄人。袁世凯二万五千万大款，予人以盐务稽核，吾党犹责之为卖国。今俄人之助我至少，所攫至大。设有人以卖国责吾党，吾党其何辞以对？况乎助我者其名，自为者其实耶？观于最近鲍氏演说及共产党印行之P一号'宣传必读'，已以'得与法国相当之广东为其革命试验'，满心称意而出之，宁复有吾党国在心目中哉？以国家言，彼固谓以平等待我矣。然中东路之不平等，甚于俄皇时；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虽已舍去，然以日本对朝鲜方法而攫我蒙古；大小轻重之间，不可同日而语。徒以貌为平等之故，遂使素以爱国自号之吾党，亦禁若寒蝉。吾只见苏联外交手段之妙而已，固未见以平等待我也。遑言助我哉？夫思启封疆，以利国家者，何国蔑有？所难堪者，吾国与吾党耳。苏联助土耳其革命，而土杀俄人。德革命后，不与苏联携手，低首下心与国仇之英法联络，夫岂无故而然哉？最近英国工党尽摒共产党出党，谓其'投入工党捣乱'，正与在吾党之情形相同。质言之，共产党'有己无人'，日以阶级斗争相号召，资产阶级固认为敌矣，而同是工人，非彼党者，彼又号为资产阶级之走狗。稚晖谓：'共产党视党外人为赘人，得取而尽坑之最妙；留其余喘，以终其饥寒之天年，实其厚惠'。此语最能道其心事。故一翻苏联之历史，无非残杀异党之历史；今则向吾党残杀矣。夫人类本非性善；中国向来革命，以仁义号召，欧美近世革命，以平等、自由、博爱、人道号召，尚未免于杀戮恐怖。况以斗争为号召者，欲人类不供其牺牲者几何？故共产党阶级斗争之号召，实人类前途之大忧，固不仅吾党国已也。总理谓：'马克思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实即在此"。

最后说："总上所言，是共产党之加入吾党，实欲夺吾党之躯壳，而换其骨；因此不惜破坏吾党团结及吾党同志感情，以达而目的。并假国际以压党部，假党部以压党员，使之虽死犹蒙叛党之名；又假苏联助我之名以握党权、政权，使吾党、吾国受其蹂躏，而我亦不敢有所告诉。总理之许共产党加入也，为其能实行吾党主义也，总理之联俄也，为其以平等待我也。今悉违反总理之期望，吾党员于此，若不毅然决然与之划分，俾党国不为所灭，犹复拘文牵义，以总理许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说以自误，则不惟失革命之精神，且恐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矣，况乎为党为国，与共产党划分，未必即为联俄之障，苏联外交早示我以事实，若必卖党卖国以联俄，则反对白色帝国主义之列强者，今何独厚于赤色帝国主义之苏联？同人等为党为国，内察外审，观察虽有不同，宗旨悉归一致，觉悟虽有先后，此志无或游移，而一般青年尤有迫不及待之势。兄等在国为元勋，在党为领袖，其不忍党国为人撕灭之心，想无不同？用敢以最纯洁之心，掬诚布达于兄等之前，务请兄等午夜细思，上念总理，下为党众，容纳所陈，共策前进，党之幸，亦国之幸。而且善意之分立，较之内部之互杀，结果尤有天渊之判，否则同人爱党之愚，所见已真，尽力所至，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惟求无负总理，无负党员，无负国家而已。悬切陈词，诸维亮鉴！"

但是这时广州的同志因环境的关系，没有接纳。所以十五年一月广州中央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西山会议同志有严厉的处分案，对于我个人，更被开除党籍。人问我有何感想？我说：这是必经的途径，但必如吴敬恒先生所言，终有一日抱头相哭的时候。

"西山会议"为什么闹得万恶似的？这固然是由于共产党的造谣离间，亦由于自称"革命的向左转"，汪兆铭帮着推波助澜。共产党对于异己的，一概加以"不革命"、"反革命"的罪名，积极消灭。何况"西山会议"明明要肃清共产党，当然是第一等的

"反革命"，罪不容诛的。

但是要拿反革命的罪加上"西山会议"，又无事实，于是就不得不用共产党诬人的惯技了，说是和段祺瑞勾结，和帝国主义勾结。闭会后我和谢持先生由京汉车南下的时候，沿途各车站，处处贴着这种标语和传单；然而这些都和事实不相符。依事实而论，可说我们天天在那儿和这些恶势力奋斗。

我们真是勾结段祺瑞吗？当时北京各界对段祺瑞的施政，很不满意，酝酿反段运动，第四次全体会议便乘机出来发动和领导。那时所发表的"对时局宣言"、"告国民书"、"致国民军全体巧电"、"反对段祺瑞恋栈感电"等等，都表示得非常明显，在开会之后，我和林先生更约集各团体代表和北大教授王世杰等，在欧美同学会讨论倒段的办法。当时所刊发的讨段祺瑞和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的传单，都是我们做的。有一次，民众包围吉祥胡同，站在前列手持青天白日旗的民治主义同志会，主持人就是我和谢持先生。而我和林先生所住的竹竿巷寓所，就成为民众运动的发动总机关。我们还乘机吸收北京的优秀分子入党。

我们真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吗？那年十一月的时候，国民第四军郭松龄通电请张作霖下野，祠向关外进兵，日本竟进兵东三省南部，阻止郭军前进。第四次全体会议首先出来反对，并拍电致郭，说："日本公然出兵，截我铲除军阀之路，亟应限令撤退，否则急击勿虑。不宜许其任何条件，致陷奉张之续，并请分电吉里，防止俄军借故侵入。此战胜固胜，败亦胜，愿先生为国民前驱，毋以成败为虑"。同时会中又推我和林先生到日本公使馆，提出严重警告。上海空前的对日国民大会，也是由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人所主持。至于反对关税会议，日日与颜惠庆等争持，尤为在欧美同学会开会的各团体共见共闻。

对于所有攻击，虽然我们明知有意中伤，但是始终没有公开反驳。我们采取这种态度的重要原因，不外两端。第一，事实俱在，不值得一驳；否则共产党更加要起劲了。第二，我们想到本党同志，若不将共产党清出党去，必将被共产党清出党来；不论结果是那一种，大家一定有再团结起来的日子。如果这时彼此弄得恶感太深，必有害于将来的团结。于是世人只听见他们尽情丑诋我们的话，而并没有见到我们的反驳，还是我的气量窄。虽然不敢对中央及政府发表不恭敬的话，却借着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发表了两篇反驳的文章。"西山会议"万恶似的罪状，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便是象煞有介事了。其实，问起"西山会议"的罪状，除了不应该清党和变更联俄政策之外，别的可说绝对是无中生有的。所以"西山会议"，虽然被人攻击，但是响应的，海内外遍处皆有。结果本党成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主张容共的；一个是主张清党的。这种情形，海外尤为明显。此外为孙文主义学会是青年组织的，也作桴鼓之应。

我们复依照第四次会议的决议组织中央党部，成立于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并创办江南晚报，做党的宣传机构。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我们更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二十八个省市区的代表，结果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

三月中旬，共产党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企图推翻本党政府，幸赖蒋先生迅速弹压，始得无事。大会曾致函慰问蒋先生。中山舰事件虽平息，但情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开会后，吴敬恒先生来和我们接洽。他对我们说"广州中央预备成立五院，把在沪的同志，安置在监察和考试两院内，特来请我们全体回去，共同合作。"我们很诚恳地答

道："此间同志唯一的希望就是清党，广州方面若实行清党，我们就可以无条件的回去合作，他非所问"。但是这时广州中央党部里共产党正气焰熏天，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愿望。

五月十五日，广州中央召集第二届第二中全会，讨论调整国共关系的办法。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信给蒋先生及胡汉民，张人杰先生，痛陈必须立即清党的理由：里面分三点说明，（一）联俄问题；（二）与反革命勾结问题；（三）影响北伐问题。关于（一）（二）两点，上面已经说了不少；现在只把第三点的那段照录如下：

"以为一行清党，内部必发生纠纷，对于应付北伐，必生阻力。不知清党不实行，纠纷尤甚，北伐更难见事实，人以讨赤为名，曾惨杀人，三告尚疑于其母，况吾辈确有共产党在内，其不为国民军之续者几何哉？倘一清党，则内部团结，全国对于吾党表同情者，一致起而拥护；事半功倍，有必然者"。

但是广州中央第二届二中全会的结果，却使我们非常失望。决议案中关于"整理党事"的具体办法，共分八点；其中重要的是：

（一）华共党及第三国际对民党内之共产党一切训令，须交国共联席会通过；

（二）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

（三）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其对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对三民主义不许怀疑；

（四）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对于这个决议案，除了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一篇"告同志书"来驳斥之外，我又用私人名义，致函蒋先生及张人杰先生，特别指出以上四点之非，信中我说：

"关于（一）之意义，即第一届第二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设立国际部之意义。当时以为直接与第三国际联络，使其发布一切关于中国共产党训令，皆得与闻；如此共产党不能为患。卒之共产党不理，闻口头允诺之鲍罗廷，亦为共产党弹劾。而国际部乃不能成立。今兹共产党用旧法对付吾党。固无不可。弟意其必进一步对付，完全承认条件。但条件中载明：'华共党及第三国际对民党内之共产党一切训令，须交联席会议通过'。可见其不对民党内之共党训令，可无须交联席会议。此后彼一切皆以对共党，对第三国际党员下训令，我无参与之权；彼之党团作用如故，彼之破坏吾党如故。盖彼党员奉行彼之训令，自不利于本党也。夫一空间，同时不能容两体积，此物理之定义。吾党破此定义容纳共产党，其如共产党不欲破此定义，且此定义亦无可破何？

关于（二）（三）之意义，即第一届第三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中明纪律案也。卒之我辈尽量申明纪律，彼之轨外行动，前之见于言论者，今竟见于事实，且欲复吾党政府。若夫向导之诋毁吾党，吾党决议请其改善，彼竟谓彼为共产党之报，不容吾党干预（此事均有案可查）。然则今兹之（二）（三）两案，其结果亦不外是。在加入吾党之共派，一面文字上承认申明纪律，一面事实上轨此行动。至于向导则日日肆其诋毁如故，日日骂梯云，哲生诸同志如故，彼固有完全自由也。

关于（四）之意义，自然可以减少共产党之操纵。但此办法，行之二年前甚有效；今则彼之党羽，早已分妥各处，即不为部长庸何伤？今试问属于广州党部派往各省各处组织党部者，非共产党有若干？派往各地组织农民协会者，非共产党有若干？派至工会组织工人团体者，非共产党又有若干？夫亦大可恍然矣，为部长者能换之乎？否则为其傀儡耳！况农工两部，向来部长都挂名本党之人，特其势已成，莫如何也。

故总上理由，十五日之郑重大会，其效等于零。弟非不愿意兄等之能由此解决也，特事实不然，尤恐其包藏祸心；向之排斥数旧人，杀逐数旧人，为彼辈所满足者，今后恐非一网打尽不可。弟尝对人讨论，谓共产党。对付吾党人，可排者排之，不可排者非杀之不可。……观于其二年来之计划，一致到底，加以中山舰之事发泄。其机已露，尚能长此相忍乎？况其对于总理人格可议论，对于三民主义可怀疑，此而可忍，恐总理在天之灵，永无瞑目之日矣！”

其后广州方面，决定北伐。我们得到报告，知道共产党将随北伐军所到之处，夺取群众，掌握政权，实行复灭本党。因此我写了一篇“北伐与赤化”的文章（注一），警告广州同志。结论中我说：

“质言之，北伐与赤化，泾渭判然。本党即不北伐，固当清党，以免人因怀疑而生反对。即为北伐计，容许貌赞成而实反对之共产党在内，更有溃决之一日；故本党无论北伐与否，皆当先行努力清党；而努力清党，必可促北伐之成功。凡我同志，急起直追。党之幸，亦国之幸！”

广州的同志对于这个主义，仍没有接受。及至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我们便只得分派同志，潜入北伐军中参加工作。他们处处受到共产党分子的排挤和压迫，其中许多同志不得不变姓换名，忍痛工作。

北伐运动进展很快；但是政治情形的演变，也完全如我们所料。十六年初，广州中央随军事的进展移设武汉。共产党见北伐成功在即，于是消灭本党和破坏国民革命之心益急。三月，第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会。他们便趁这个机会，将党、政、军各方面的机构，完全改组，企图消灭本党的领导权力，以便把持一切。继又喊出“打倒新右派”的口号，以排除蒋先生，及其他不愿被共产党所利用的本党同志。武汉整个局面在共产党势力之下，本党同志中觉悟的，亦敢怒而不敢言。直到沪宁克复，在蒋先生领导之下，南京另组中央，实行清党。至是本党形成鼎足而三的中央党部：一在南京；一在汉口；一在上海。

这时候，我们很高兴，认为与宁方同志的主张，已完全相同。吾党党务，不久可仍归统一，便决定四个统一党务的办法：

（一）恢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施行职权；

（二）粤、沪两方之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施行职权；

（三）粤、沪两方中央党部，分别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集事宜；

（四）沪中央党部宣告清党目的已达，自行结束。

后来武汉方面也清党。于是由汉、宁、沪三方同志，会商统一中央党部的办法；一致决定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各推出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另三方共同推出委员十四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来统一党务，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并负统一地方党务，及筹备第三次全国大会的职权。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也由特别委员会改组。谈了三天，得到圆满的结果。于是九月十五日，汉、宁两方中央执行委员在南京成贤街开会，沪方中央执行委员在紫金山开会；分头一致将谈话会所预定的案件通过。特别委员会遂告成立，党务由此统一。“西山会议”的同志即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中央党部移交特别委员会，

"西山会议"就此结束；而"西山会议"的目的，也成事实。至于"西山会议的功罪"，我以为亦自有定论了。

最后还要说一句，就是"西山会议"只有主张，没有派别。特别委员会成立，主张已达，"西山会议"即不存在；当时曾迭次声明。现在仍把"西山会议"来做标题，亦不过因为那时闹得人人皆知，竟成为一个专门名词，袭用起来，反觉明了而已。

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我发生一件最痛心的事，就是我父亲在原籍丧餐。我的父亲对我说期望最切，而为了我所受的苦也特别多。他富于爱乡心，不愿离开里闾；但是讨袁、讨莫、讨陈诸役，因为我的关系，不得不远离桑梓，奔走于香港、漳州、澳门等地。又因为清党关系，共产党欲得我而甘心，以致我的父亲病时，我不能亲侍汤药，殁时，我不能亲视含殓，这是我抱恨终天的事。

（注一）北伐与赤化："北伐者总理之遺志，本党之使命也。赤化者，国民对于共产党甘为赤俄作倀，而厌恶之的名詞也。二者原风馬牛不相及，乃軍閥往往将赤化加諸北伐軍，而北伐軍中亦有一部为共产党所操纵，且有俄員参与其間，遂使北伐与赤化，几成为連带名詞，連带事实，世人不明，多为及惑，混北伐与赤化而为一譚。軍閥欲遂其私，以为借赤化之名，可以利用国民之厌恶赤化者厌恶北伐，为其作战上之便利。共产党尤喜北伐与赤化混而为一，以便藏身北伐軍之下，攫北伐之长，掩自己之短，并借势而摧残异己，发展党势，由是以言，国民不知不覚之中，为人所惑，认为北伐与赤化为一；軍伐似知似覚之中，冀其有利，认北伐与赤化为一；共产党則明知明覚之中，借为藏身，认为北伐与赤化为一。惟我国民党，既不愿共产党借北伐之名，以行其赤化，亦不愿軍閥用赤化之名，以中伤北伐；尤欲国民了然北伐与赤化之判然不同，共同为北伐努力，以完成国民革命。如是不能不将北伐与赤化詳为剖解。

"北伐者，国民党之職志，而共产党所不愿者也。当去岁党軍肃清东江时党軍业进閩境本拟乘机入閩以北伐，俄人力阻，以是进閩之軍，亦行撤退。自后屡拟北伐，共产党无不由俄人出而阻止，或由俄人主使为其鷹犬之本党党員阻止，此种事实，于蒋先生解散軍队党代表时之演說，可以見其梗概。及至十五年三月共产党謀倒本党及国民政府之中山艦阴謀发现，本党党員，社会民众，一致努力驅逐共产党。于是俄人被拘留嗣后又被遣离粤者数十人，軍队中共产党所把持之党代表，悉行解散。广州复召集五月十五之第二届二中全体大会解决共产党。共产党大惧，乃迭次万急电促其保鏢鮑罗廷来粤。鮑乃追胡汉民同归。归途犹自怯曰："此行准备牺牲"。然結果反至为共产党获得共管本党之利权，而且得达其将本党作焦来剝之目的，又剝去一班本党党員。北伐究非共产党所愿，迭次上海市党部区党部政治之报告，皆謂："此次北伐，非共产党之北伐，本系反对；但北伐已成，須将政治把持，所便借北伐之势，造成共产党之势"。而陈独秀亦在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一六一期論国民政府之北伐中，詆北伐为专事投机，連吊民伐罪的意义，沒有了，統观以上事实，此北伐实共产党所反对，完全与赤化不相属，至为明了。至于北伐軍之直接軍官，大都是完全本党党員，即有一部有为共产党滲入者，亦不过十之一而已。共产党所把持者，实为北伐軍之政治部，即共产党員有为軍官者，临时亦多借題退至政治部。由是言之，北伐战斗員，純为本党党員，完全与赤化无关，又悉为事实。

北伐为共产党反对，北伐战斗又悉为本党党員，何至共产党仍得藏身其間，致軍閥得借口討赤以中伤，国民聞将行赤化而却步？此則不能不痛心于本党少数党員为人所餌，甘于作倀，而不奉行本党的清党案，至使为北伐战斗而牺牲者，則为本党党員，所占得之地方，則为共产党把持之政治部，宣传其共产主义，以惑民众；遂使北伐所至之地，即共产党势力所至之地，北伐虽为本党之北伐，而共产党反得借之而扩其势力，甚而至于摧残本党。若举其事实，則北伐軍一至湖南，湖南之地方官，悉須受委于政治部，湖南劳工会本党之工人团体，竟被蹂躏，捕去本党北京市党部工人部长湖南劳工会本党之職員譙小岑；北伐军一至湖北，委出之政治委員主席某，財政委員主席陈公博悉为共产党員，（陈公博去年五

月入党，自云非共产党員，实則本年七月之向导，载明陈公博系共产党留党察看党員）；其余之职任，更計不胜計。而为北伐出力之大汉报記者，本党同志祝湘，市执行委員郭聘伯等，反为政治部䲭人拿捕。士卒之善战，紀律之严明，因而博得民众之同情，本党北伐军之特色也，而共产党混为己有；四出捕人，攪乱社会，共产党之毒手也，而本党反为其負責。似此則共产党不肃清，军閥借口，国民生疑，实难奏其全功。即幸而北伐成功，共产党随"北伐军"之势俱长，吾党亦将蹈俄国少数党之复轍，而遭其荼毒；不特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且恐中华民国因之变色。此所以本党愈努力北伐工作，即不能不愈努力于"淸党"工作也。

或者曰：军閥日言討赤，对于本党淸党目的将毋同，而本党之淸党，或亦与討赤有相同之手段欤？是大不然。夫共产党之能以"阶級斗爭"、"世界革命"諸名詞，鼓惑少数人盲从，供其为苏俄販卖品者，以中国列强侵占民生凋弊之背景有以使之。今军閥借外力以供內乱，将使此种背景，有加无已；口虽討赤，实則造赤，实与本党为三民主义而革命淸党相差天渊也，本党虽抱总理与人为善之怀，非必拒人于千里之外，然亦必以能接受三民主义、努力国民革命为条件；否則宁坚持以造就时势，决不迁就以失民众同情也。此又本党之淸党所持之坚决手段，非北伐军化混为一談者所指討赤者即討北伐军之謂也。

质而言之，北伐与赤化，涇渭判然。本党即不北伐，固当淸党，以免因怀疑而生反对。即为北伐計，容許貌贊成而实反对之共产党在內，更有潰决之一日；故本党无論北伐与否，皆当先行努力淸党；而努力淸党，必可促北伐之成功。凡我同志，急起直追。党之幸，亦国之幸！"

〔附〕为西山会议告同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蒋介石

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上海执行部，各省各级党部，海外各地各级党部，本党全体诸同志均鉴：本党不幸，值兹广东统一将告完成，北方民众共起奋斗，卖国军阀自行崩溃，总理主义可即实现之时，忽有一部分同志异动，自赴北京，开其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自布议案，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褊心，而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此已有中央党部及各地党部辞而辟之矣。

究其开会情形若何，谁为主席，谁为提议者，谁为附议者，是否经过议事秩序所必须之讨论与表决？求之京沪报纸，皆无纪载，若辈亦未能自行公布，曾是总理信徒，而并且民权初步一书亦未之读耶？京沪报告，若辈并未成会，会且未成，何来议决？此即其召集为合法，其所宣布之议决案亦决不能有效也。惟上海民国日报亦为若辈所利用，怪异之论，层出不已，最可痛者，张静江同志苦口劝告，犹不能促若辈之觉悟。若辈自承为读后甚受感动，而饬词强辨，曾未稍改，实际破坏之技已穷，乃乞灵于文字。中正承总理训诲甚久，他无所求，惟愿与诸同志迅速完成国民革命。国民政府消除反革命派之设施，无役

不从，睹目现状，窃为之惧。辄敢本其所见，以党员之资格，为负责之驳正，非仅正群众之观，亦冀此一部分异动之同志，幡然思返。知我罪我，不暇计已。

关于共产党之问题，若辈所以主张排除，不外两种理由：第一，谓共产党之共产主义与本党之三民主义根本冲突，故共产党在本党之内亦根本不能相容。不知共产党之加入本党，为总理所特许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果使两种主义根本不能相容，以总理之明与第一次全国代表之忠于本党，宁肯贸然决定，以贻本党之危险？且总理已明言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矣。故第一说决非总理之意，此在若辈亦未始不知。于是有第二说，谓总理之特许共产党加入，乃欲共产党完全化合于本党，而非本党为共产党所同化，今则共产主义已有蚕食三民主义之危险，然总理果若是褊小耶？三民主义又果如是之易于撼动耶？此说之诬总理、诬本党，盖视第一说尤甚。总理今固已逝，然当其在时，此种疑惧即已起于一部分同志之间，同志中已有为反共产之运动。试问总理亲自出席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其结果究若何？总理盖严词警告"反共产"之同志，而又决定仍容许共产同志之在党也。总理之所以如是，乃总理之伟大。总理手创之三民主义，诚不同于共产主义，而其为革命的主义则同。总理深知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也。今日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革命成，则世界革命为之促进，亦世界革命成，中国革命始真正成功。总理自信三民主义能兼容共产主义，而决不惧共产主义蚕食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岂在中国国民革命尚未完成之时，而已惧何种主义之蚕食？总理有如许伟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年，而后死之同志，惴惴焉惟被共产主义蚕食之是惧，其师大勇，而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谓不肖之甚者矣！人患不自强自立耳，惟国与党亦然。本党同志能自振奋，能努力于国民革命，能知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敢信全国国民均将奔集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决无被他种主义蚕食之危险，若不求自强自立，且务自侮，即严拒一切主义于千里之外，亦终于自行崩溃，鱼烂而亡耳。此次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布共产党籍之执行委员应除名者共四人，夫以二十四名之中央执行委员，跨共产党籍者四，盖仅仅六分之一，此而惧人之蚕食，非自暴自弃不自振作者不能作此奇想也。此种怯懦薄弱之心理，其果爱党者之所为乎！凡我同志，均宜深戒。关于汪精卫同志，上海民国日报加之罪者凡三，盖无一而非任意捏造。共产党为欲先求中国国民革命之实现而来加入本党，谓其惟以消灭本党为策略，又何异谓共产党惟求自杀。此语既诬，则谓精卫同志对于共产党挑拨离间排除本党同志之言动一一实行，自无一而非诬矣。精卫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时，谓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此为极沉痛极明彻之词，所以警勉同志共努力于革命，乃以此为"叛了总理"，真不知民国日报记者是何居心也？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立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如精卫同志向左右之说为不当，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之分为当乎。吾同志盍不自反而徒责人也。鲍罗廷同志之为政治顾问，为总理所特请，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真理，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此不独鲍顾问为然，而鲍顾问固亦如是。廖案未发生以前，国民政府与政治委员会等均依法定日期开会，廖案发生以后，重要事件由特别委员会办理，中正为即为特别委员之一，凡事应

与精卫同志共负其责，何得独责精卫同志一人？更何得谓“听鲍一人专断”？至谓精卫同志先不主张讨伐刘杨，而其后乃攘人之功。中正躬与是役，敢为切实之声明。精卫同志本年五月自北京归粤，先抵汕头，与于讨伐杨刘之议，决策之际，实先得汪精卫同志之赞同。惟今日反对精卫同志最力之人，乃真有于讨伐杨刘时避居香港者。革命本非成功，而谓其攘人之功，尤不知何指也？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自改组迄今两年，成绩具在。“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总理于遗嘱中认与“唤起民众”为完成国民革命所“必须”者也。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中国革命不成，列强敢来侮我，皆因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争意气，团体惯于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谓之反革命，不可得。不为革命，便为叛逆，中正益自信此言之不诬，当永以自勉，并愿我同志共勉焉。蒋中正叩。十二月二十五日于汕头国民革命东征军总指挥部。

（原载《政治周报》4期，1926年1月出版）

〔附〕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

（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蒋 介 石

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亲与相爱。传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理；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止于至善者何，格致诚正也；明德亲民者何，修齐治平也。未有不格致诚正而能修齐治平者也，亦未有不亲亲而能仁爱，不仁爱而能革命者也。中正奉总理命创办本校者，乃欲穷革命之理，而行革命之大道也。深知欲革命之成，必使革命同志以维精之理，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之行，其有豸乎！夫同志之共死生，同患难，其关系之密切，有甚于父子兄弟之亲也；而团体之存亡成败，乃有重于其家庭间骨肉手足之生命也。一年以来，集合五百同志，成立斯校于全国弥漫反革命空气之中；招募三千子弟，组织本军于四周假革命环境之内。回顾经过历史，晦蒙否塞，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今春孤军挺进于潮梅，同志死伤者六百余人；桂军袖手旁观于东江，滇军且通敌以谋袭我后。孟夏回师广州，讨伐叛逆之杨

刘，死者伤者以百数计；而沙基之役，帝国主义之英法残暴袭击，竟使我同志死者至二十人之多，而伤者不计也。九月廖公被狙，反革命派之阴谋毕露，先平杨刘，后灭郑莫，各方怀疑丛生，中正几成为众矢之的，且将伦比为冒天下大不韪之罪犯，而本校本军之危殆，亦成为飓中之孤舟，其能支而不复者几希矣。十月奉命重征东江，进攻惠州，世皆视为天险之老巢，人人以为难攻莫敌者，而本军将士，目无全牛，视若坦途；目〔自〕刘团长尧宸以下，如耿泽生，谭鹿鸣，徐廷魁，但德芳，张忠熙，彭继儒，金章鸣，刘铭，陈作云，叶振南，王嵩，周德保诸子等死者百三十余人，伤者如詹忠言，曾扩情，蒋先云，杜从戎，冷欣诸子且四百余人，此其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者，何哉？主义之所感，敌忾之所兴，亲爱之忱油然勃发而不能自已耳。海丰之役，以三百之众，而战四千之暴逆，唐子同德，张子志超等死焉。何婆之役，以一团之众，而敌三师之强寇。横江之战，林逆主力悉数来犯，谋以三面包围我军者，反为我所各个击破；惜乎陈子厚，王步忠，侯吉文，范涛诸子皆亡于是役。华阳一战，以三千初集之卒，而攻一万五千背城借一困守死斗之顽敌；殉难死者，自周团长保生，党代表姚世昌，周玉冠，车鸣骧诸子以下一百二十五员名，卒能转败为胜，扶危为安。呜呼可谓荣而哀矣！自二次东征，以至克复潮梅，全军阵亡五百九十七人。嗟乎，死固壮矣，而生者悲惨，盍其有极。以师弟之亲，部属之爱，每得其死音噩耗，心酸肠割，不知其所止，虽百譬而终难自解。既知死者之不能复生，废者之不能复全，乃必欲驱此至亲至爱情逾骨肉手足者，而使之死焉伤焉，以我今日恸悼之状，而推之于其死者废者之父母之妻子之兄弟，其孤苦凄怆为何如乎！呜呼！何其忍心乃尔，中正之罪，诚万死而莫赎焉矣。甚矣！处动心忍性之逆境，当风雨飘摇残破零落之危局，极恶战苦斗之全力，而其所得之结果，徒丧失我宝贵而难得之信徒。不期庄严灿烂之黄埔，竟成白骨之狱，赤血之渊。而于民生之痛苦，民权之斫丧，民族之衰弱，皆无补于万一。至今军阀作恶如故也，列强横行有加无已也，五卅惨案之仇未报也，不平等条约之耻未雪也；而我总理赍志以没，一生之抱负，及其遗我之明训，其果有见诸实行乎。杀我同志者敌人也；而驱我同志就死殉难者，中正也。丧失如许之同志，尚不能实行其主义于万一，上何以见总理在天之灵，下何以慰殉难将士之魂！纵人不我责，我之神明乃能泰然自安而无疚乎！此恨绵绵，虽倾珠江之水，而不足净洗黄埔之血痕与泪迹矣。嗟乎！总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灵，不昧不爽者，惟在其所遗本校后死而未亡同志一线之命脉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为何？是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统也。吾人至今，悔不问明当时先烈之死者，为共产乎？抑为非共产而三民乎？中正兹特预言以答复吾死者之问曰：“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实行我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且敢为国民党内共产同志死者代答。“吾愿死于国民党青天白日之旗下，而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吾愿与党内死者诸同志，同穴安眠于地下。吾愿本党后死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终始生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校训，团结精神，继续我先死者之事业，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他〔也〕，吾并不望后死者人彼出此，尤不愿其较长争胜，冰炭水火，以断我辈已死者之命脉。不然生者之是否安心，姑置不问；而我辈死者诚为枉死之冤鬼，而不

能瞑目于地下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知止于至善，行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行之，止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止之，不止不行，不行不止。革命之道，一以贯之。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未有本末倒置，终始不一，而能成其事者也。阐明革命之理；实行革命之道；不为外物所认，不为感情所累；以至诚之意，力求三民主义之发展，以至精之理，实行国民革命之成功。未有中国之国民革命而可不实行三民主义者也，亦未有今日之国际革命而能遗忘共产主义者也。中国革命不能不认为世界革命中之一部；而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矣。吾辈死者，但知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不能分而为二；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而徒使吾辈死者痛哭于九泉乎。吾愿未亡诸同志，由定静安虑，以臻于格致诚正，而求得革命之真理。如负少年一时之意气，斗争蜗角，徒赍盗粮而授人口实，以忘修齐治平之重任，是则帝国主义与军阀所欢笑，而总理与廖党代表一般殉难同志之痛哭也！生者有心，其当牢记校训，团结精神，以实行革命亲亲仁爱之道；则阋墙不生，外侮难侵，不忧瓦解，其必玉成。以本校今日之精神，如不发生内部之分裂，则三民主义虽百世其可传也。合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全力而莫能御也。吾辈死矣，吾党不绝如弦一线之命脉，全凭诸同志相亲相爱团结之固以求存。本校之存亡，主义之成败，不在外敌之强与弱，而在内部之分与合也”。此作中正代我已死同志所答之言焉可，即为中正预留生前之言以备死后答我未亡诸同志之言亦可也。呜呼！言者谆谆，而所者藐藐，吾泪已涸，吾声已嘶，精卫犹能填海，而顽石无法补天。分乎合乎？败乎成乎？惟在吾后死者之一转念。生死存亡之迫切，已不容毫发犹豫于其间矣。语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正虽未届垂死之年，而革命工作，实使吾早具决死之志。兹敢以至哀之言，为同志告，而复益之以先烈之遗言，总理之遗训。同志乎！中正之言或不尽善，而不足哀，倘一念及总理与先烈之死事，其能无动于中乎！一念之是，可以兴邦，一念之非，可以杀身。同志乎！荆棘丛错，此吾党今日之前途也；楚歌四面，此本校今日之环境也；艰窘危迫，疑惧震撼，未有如今日本党与本校之甚也。列强日伺吾侧，军阀图袭吾后，彼且掀，张目而声言曰，国民党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已启内讧，不久其将瓦解，不须吾辈亡矢遗镞之劳，而彼已陷于自杀之境矣。呜乎！是言也，何言耶！是岂好设危词以耸同志之听耶？抑果有其事而不能幸免者耶？吾党同志可不警惕戒惧反省自悟，刎颈求欢，犹恐不足，奈之何反以分裂为能事，不使党校与国同归于尽而不止！以艰难产生遗腹之孤儿，竟匍匐以堕于井中，途人见之，犹且急切赴援，惟恐其不及；而其寡母师傅当之，则焦急之心果为何如乎！本校诸子，如能以寡母师傅保子之赤忱，以自救而救党，以骨肉手足家庭之亲爱，以自爱而爱党；则推而至于仁民，至于爱物，无所往而不利，何所事而不成，革命又岂难事哉！甚矣，亲爱精诚之校训，不可须臾离者也！子思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则亲，诚则爱，诚则精，而诚则成矣。未有不诚而能实行三民主义者也；亦未有不诚而能实行共产主义者也。未有不以诚对三民主义而能以诚对共产主义者也；亦未有对共产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然则今日本校与本军何为而然者？曰，不诚而已矣！吹毛求疵者，不诚也；钩心斗角者，亦不诚也；未有不诚而能避免冲突与分裂者，亦未有冲突与分裂而其革命能成者。是故不成者，不诚也。本校诸君盍不反其本乎！此非特言在党之共产主义者应诚于三民主义，即三民主义者之对共产主义者亦应以诚意相孚也。歧视者，不诚也；逆亿者，亦不诚；己先不诚，而徒责人以诚，难矣！是故诚者无所往而不诚，不

诚者无所往而能诚者也。中正为三民主义之信徒，然而对于共产主义之同志，敢自信为最忠实同志之一人；尤望诸同志开诚相见，本我校训，不负我总理之所期，则幸矣。第三期同学行将毕业，丐余以同学录之序言：余因今日追悼阵亡同志之有感，故录此以慰其乞序之殷，并以此勗我第三期之同志，使其知革命之学之大，革命之理之精，尚不外乎吾亲爱精诚之校训。不亲则离，不爱则妒，不精则杂，而不诚且无以致亲致爱与致精也。诚则明，诚则强；诚则金石且为之开，而况爱人乎？况于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蒋中正序于潮安行营。

（原载《政治周报》4期，1926年1月出版）

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节录）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　之　龙

编者按：本文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原为当时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印行的揭露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的一本小册子。这次在本刊刊载时，删去了一些没有史料价值的章节。

一　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爆发之原因

在一九二六年开始的时候，以北方的国民军为中坚之全民反奉战线，被日本出兵满洲与吴佩孚进攻河南之内外夹攻破坏了，一变而为很反动的严重局势。参加西山会议的叛徒，正积极奔走于京、津、沪、港之间，以谋遂其颠覆广州国民政府之阴谋。他们受英日帝国主义者之颐指气使，一方面讨好于安福系，造成三一八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门前的大屠杀；一方面勾结孙传芳，造成上海的反赤大同盟与上海的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方面买通孙文主义学会，设法破坏省港罢工及造成广州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奉直军阀、国家主义者、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联合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活动。三月二十日在广州发生的排共仇俄的政变，就是这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中的一部分。

这一政变之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的原因如下：

一、帝国主义者见国民军占领京津，已成为北方反帝运动的大本营，省港罢工又立时可以发展到津沪一带造成一道沿海的整个的反帝战线，因而设法破坏之。

二、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及一切的反动分子，见广东之统一、国民政府日益巩固，民众的组织力量日益强大，因而促成其破坏国民政府之阴谋。

这一政变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如下：

一、蒋介石素来自视为唯一之总理"继承者"（不在主义上着想）；在各军中，总是自视为总理嫡出，他率领的第一军，总认为应当享优越的待遇。可是在第二次东征、统一广东时，第二、三、四、五、六各军都是同样的出力；各军的政治军事训练，在这些战事以后又都蒸蒸日上，国民政府当然不能有所歧视，因此惹起蒋介石对国民政府与国民政府的苏俄顾问的不满。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黄埔军官学校召集之第一军卸职党代表会上的讲话中说，政府中有人想利用他（蒋）的部下（王懋功）来背叛他，故意将第七军不设，而设八、九军，以为诱动王懋功背叛之用，便是蒋介石之招供。

二、蒋介石在总理死后，即已存了继任领袖的野心，常说："一个党里，不能有两个领袖"；又常说："我是总理唯一的信徒"，"只有我是真正'革命'的"，早已目空一切，早已表示其狄克推多（独裁的音译——编者）之野心矣。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存在，使他的狄克推多的野心不能实现，他非常不安。为了排共仇俄和反对国民党左派，他就联合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和流氓恶棍陈肇英、欧阳格等反革命分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三、陈肇英，浙江大涌人，一九二二年时，率闽南土匪民军，尝窜扰漳泉潮汕一带，刮有数十万之家财。一九二五年，兵溃来粤，以同乡之关系，逢迎蒋介石，得为虎门要塞司令，凭其地位与势力，专门做扒钱的勾当。在虎门私收过境船货保护费，常自称每日有四千元之收入。大贩私盐，嘱盐商运私盐至沙角炮台交货，陈即以司令部差船胜利号，将私盐拖运至广州。中途若遇海军检查时，即出伪公文一纸，上书拿获私盐若干，拖运返省（指广州——编者）究办，希予放行云云。象这样骗过海军的检查，即拖到广州。常驻天字码头附近南园酒店的该司令部副官长潘宜之（北伐出发时充总司令部秘书，现充任"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咳！），即于船到之前，经手与省城商人说合承卖，船到起货。象这样不知做了多少次。太平（虎门附近的市场）商人，时常报告海军军舰党代表，海军政治部接到党代表报告之后，即经海军局长（彼时局长为斯美洛夫）报告于国民政府，密令查拿。江大舰果于莲花洋面拿获虎门要塞司令部差船胜利号拖盐船二艘，当即带省报告海军局。参谋厅长欧阳琳接江大舰党代表报告时，陈肇英即向欧阳琳恐吓，谓如不释放，将以相当手段对待。欧阳琳不敢报告斯局长，口头叫释放，但又不敢下令释放。江大舰党代表报告海军政治部主任李之龙，同时欧阳琳亦向李说办理此事之困难，不如释放。欧阳琳说："陈肇英自称为蒋介石兰兄弟，又系蒋保充司令，此事与蒋面子有关。他现在只要求释放胜利差轮，允给一万元为江大舰士兵酬劳。"之龙谓："蒋介石保他做要塞司令，是要他革命的，不是要他来扒钱的。扒钱才对蒋介石无面子。这个黑幕不打破，更对蒋介石无面子。无论如何，非报告不可！"欧阳琳说："他说要用相当手段对付。"之龙答云："什么相当手段！至多不过是用朱卓文对付廖党代表的手段（指暗杀廖仲恺事件——编者），那又算什么！"李即报告斯局长。除由斯局长报告军事委员会外，另由之龙用海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报告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总党代表汪精卫及蒋介石。结果，军事委员会将陈肇英撤差查办。蒋介石得到陈肇英走私的消息，置若未闻，任陈肇英住在黄埔军官学校附近之陈长洲要塞司令部，进行其反革命之阴谋活动，以图报复李之龙。

四、欧阳格自一九二五年八月来粤，多方设法，总想在海军中攫得一个有实力的地位，以造成私人的势力，达到扒钱的目的。当时海军中所谓有实力的位置，一则为海军局长，一则为参谋厅长，一则为中山舰长。其时局长是斯美洛夫，参谋厅长中山舰长皆系欧阳琳兼充。欧阳琳系格之堂兄，欧阳格见斯美洛夫不易攻去，于是把攻击目标移到欧阳琳身上，而欲夺取中山舰长位置。当时中山舰实权在该舰枪炮教练官刘刚策（即刘殿臣）手上。刘与欧阳格极不相能。当欧阳格初抵粤时，刘知格素来胆大非为，即一面将中山舰戒严，加班守卫，不许格登舰；一面声称欧阳格前年在大元帅（指孙中山——编者）手中骗去永丰舰，在汕头时私吞四万元犒赏费，有蒋校长（指蒋介石。蒋当时任黄埔军官学校校

长——编者）、戴恩赛二人作证，要与格算账。欧阳格即勾结中山舰士兵之受刘殿臣压逼者，结成义兄弟，将刘殿臣绑起，数出刘的罪名，要求政府惩办。其时政府因刘把持中山舰，思有以去之，遂将刘殿臣处死。刘既去，欧阳格欲利用舰上的义兄弟赶走欧阳琳，机事不密，为琳所知，中山舰戒严数日，将为首士兵革去数人，其事始寝。未几政府有创办海军军官学校之议，欧阳格欲获得校长位置，而政府欲以斯局长兼校长，只允予以副校长。格大不满意，当众宣言："我不干，就要捣乱，使大家干不成。"乃亲赴汕头求助于蒋介石。蒋得斯局长电，置之不理，格怏怏返省，就副校长职。无如海军军官学校预算，日久未经军事委员会通过，一时不能开办。欧阳格复欲赶走欧阳琳，事为中山舰副舰长章臣桐知悉，言于众。欧阳格怒，在欧阳琳家中，将章痛殴，打得章臣桐头青面肿。格并声言："小心老子要你的命。"章报告斯局长。欧阳琳为人忠厚，力为其弟格调解，请酒赔礼，其事始寝。欧阳格见运动士兵不成，遂改计恐吓欧阳琳使之逃去，以获取其位置。当王懋功被蒋介石驱逐时，欧阳格即造谣谓欧阳琳：潘文治、陈策、萧广业、伍景英等（皆海军中人，粤籍）已联名在政府告你，王懋功并未去上海，甫捉上电船，即用枪打死。你不如速逃。欧阳琳素来庸懦胆怯，即称病藏着不敢出。遍觅不得，有谓其已去香港。数日后，欧阳琳接潘文治等写的信，辨明无其事，请其回局负责，琳始回局办事。此次海军中人，莫不知欧阳格之阴谋也。两星期后，斯局长因公回国，欧阳琳代理局长。时江固舰长胡轩以缉获五大洲船私得赃款六千元擅放搭客案，被政府扣留；金马舰走私，被虎门要塞缉获。欧阳格又向欧阳琳恐吓，谓政府要查办中山舰，你终久总是干不成的，不如速逃。欧阳琳见空气不佳，遂又逃避，有人谓同沙面某日人逃往香港。海军局参谋厅蒋秘书系欧阳格同乡，问其赶走乃兄，好意思自己来做吗？格答云：有政府命令，为什么不做。可以证明欧阳格之野心矣。当欧阳琳逃避之第三日，之龙以海军政治部主任之职，奉政府命，率领宪兵前赴广南船坞将中山舰上不法士兵义兄弟十三人缴械扣留。越三日中山舰修理完竣下水，海军局及中山舰均无人负责。国民政府乃命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参谋厅长、中山舰长事宜。三月十四日中山舰副舰长章臣桐、二副邹镇澜报告，传闻欧阳格此次阴谋未成，恐乘夜抢船，逃往北方。之龙即赴国民政府报告情形，并谓自己不能兼顾海军局与中山舰，请委该舰副舰长章臣桐代理舰长。国民政府即下令委章为代理舰长。之龙又请第二师调兵一排，以便驻守该舰。当晚兵即调来交之龙指挥。章代舰长谓一排人过多，无地安置。之龙即以二班驻中山舰，一班驻民生军舰，自思中山舰既将不法士兵缴械，又有代理舰长负责，今又派兵驻守，当然是安全无事了。数日以来，局中事忙，之龙未尝上舰。

十八日上午九时在海军局，欧阳格寄来有个十字的快信一封。信上故意装着很惊讶的样子，问之龙三事：（一）中山舰为什么升火？（二）闻第二师有军队在舰上，究竟在不在？（三）（忘记了，俟将欧阳格原信清出再补正）。并云学校（指黄埔军官学校）的人，甚为诧异，请即示复（注意：此即欧阳格捏造的伏根）。之龙答复说：（一）已派人往查；（二）第二师有兵力二班驻舰；（三）（忘记了）。总之中山舰现在很安全了，请勿挂念云云。不一时，中山舰长章臣桐来了，谓升火是因为修理汽笛烟突各部分尚未完工，广南工厂正在升火，才有汽来试验汽笛。过了一会，欧阳格亲自来了。之龙即告以中山舰升火试验汽笛事，并云中山舰不法士兵已缴械，决无问题。格云：缴得好，你不去缴，我都去缴的（注意）。格问："你晓得不晓得介石在那里？"之龙答："不知。"后来他谈

到海军军官学校的事，问之龙有什么意见。之龙答云："海校事俄顾问正在起草计划，请你下午来问他。"下午欧阳格又来，顾问尚未到。格云："我有一事同你商量，须俟闲人散了再说。"到了五点半钟时候，之龙请格说。他并未说出什么要紧的事，还是七扯八拉，说了几句海军军官学校的话。此时人已走完，格说："我搭你的汽车回去。"之龙遂与格同车，先至文德楼之龙寓所，再命车夫送他回去（注意：欧阳格知道了之龙寓所，以便进行诬告的阴谋）。本晚黄埔军官学校驻省办事处来要船与之龙派船的经过。详附录。

次日，十九日晚七时谱，欧阳格命其卫兵（原系欧阳琳卫兵）持信到之龙私寓。信中略云："傍晚潘文治来云：奉政府命到海军学校帮忙。问帮何忙，则又不肯明说。想已委他当正校长而我副之。似此已无恋栈之余地，请兄告知，究竟有无其事，以便起草辞呈"云。李之龙复云："关于潘君事，弟闻汪主席（指汪精卫——编者）也说过，不过谁正谁副，尚无命令发表，请兄不必灰心，潘君为人甚好合作也"云云。卫兵持复函去。此卫兵即带人来拿之龙者，此时已探悉之龙之住址及室内之情形了，并知道之龙当晚确系在家中。到了半夜，欧阳格即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十师王柏龄的军队来文德楼拿之龙，而三月二十日之案起矣。

五、一月尾正是革命军克复了海南琼州的时候，西山会议派邹鲁等，就在省港散布许多谣言。第一次的谣言是说：李济深阴谋倒蒋，省中发现假冒第四军攻击蒋介石的传单，说蒋是吴佩孚第二，吴佩孚宣言不做督军做巡阅使，蒋介石宣言不做军长做陆军总监，并且兼并各军军官学校，都是想做大的军阀的企图。第二次的谣言说：第一军要缴第四军的械。第三次的谣言说：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第四次谣言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第五次的谣言说：蒋介石倒汪。到了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发生，他们更大造谣说："共产党倒蒋，推翻国民政府，建设工农政府了。"他们的用意，无非是挑拨革命领袖的感情，离间革命的势力以图一逞。果然不幸，恰遇着个蒋介石，不出他们的暗算，受他们的利用，始而怀疑李济深而无如之何，继则不满意于中国共产党、苏俄顾问和国民党左派，思有以去之，结果就勾结孙文主义学会，造成三月二十日之第二次的陈炯明叛变。

六、孙文主义学会最初为几个反动的黄埔学生贺衷寒、冷欣等所组织，其后上海南京各处的反动分子相继而起。他们在上海双十节群众大会中，打死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卢永祥"口号的黄仁同志；在黄南捣乱总理奠墓的典礼，并殴伤努力的同志；在常德更发动大规模的残杀。这种组织在广州的主要工作，最初是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其后经伍朝枢、吴铁城之介绍，与西山会议派结合，受其利用而扩大为排共仇俄反对国民党左派之阴谋组织。他们在广州发难，领过了上海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数万元之运动费，陈肇英领了一万五千元，欧阳格领了五千元。三月二十二日欧阳格发给中山舰副舰长章臣桐（当时代理舰长）一千元之补助损失费（被捕时的损失），以结其欢心，留为己用。不用说，这时候孙文主义学会是中山舰案在广东方面的主要执行者了。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领袖人物是第一军中的几个不肖军官，其中黄埔学生也有一些。这些军官是第二十师长王柏龄、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二师第六团团长惠东升与第二师党代表缪斌等。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由潮汕回广州的时候，见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冲突得很厉害。他在八旗会馆宴会第二师全体军官的时候，曾在席上拍案大骂：什么青年军人联

合会、孙文主义学会，都是会消灭在他的手里的。并戒当晚的讲话，不准传出。又有一次由校长与党代表联名邀两会负责的人到黄埔会商。蒋介石曾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做下层革命工作的；只有孙文主义学会，是被几个少数大军官利用，他们利用孙文主义学会作私争，以后不准团长以上的军官加入。但是他虽是这样说，结果，他还是被孙文主义学会的代表在席上声称在潮汕有十几万的工农会员的妄报所欺骗而心折了。当时蒋听了这句谎话，便沉默半时，不出一言，已可以窥见蒋的心理已转念到：如果我袒护孙文主义学会，也还是有群众拥护，仍然可以做领袖的。

二　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的爆发与蒋介石反动的事实

有了上述的种种原因，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右派之指使与播弄，蒋介石首领自为的野心，加以孙文主义学会之包围，又得陈肇英、欧阳格之卖力泄恨，于是乎所有的反动分子、不肖军官——王柏龄、刘峙、惠东升、缪斌、马文车、潘宜之、杨引之、潘佑强却都成了三月二十日排共仇俄反对国民党左派事件的同谋者。他们定了计划，拿中山舰做导线，在黄埔军官学校造作假的命令来要船（参看附录）。他们借中山舰的题目爆发，假借蒋的命令来要船，或者蒋介石不知道，但是他们阴谋排共仇俄反对国民党左派的酝酿，蒋介石确是预先知道了的。三月二十日早三时，欧阳格、陈肇英奉了蒋的命令拿捕李之龙（参看附录），调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缪斌、惠东升奉了蒋的命令，集合第二师全体官兵讲话，当场就将第六团团党代表胡公宪以下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连长左派人员四十余人全行看管，拘捕于造币厂内。

同时刘峙又派兵包围东园内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枪枝。大沙头、东山、北校场、东校场、惠爱马路一带，实弹的步哨林立，断绝交通，商店多不开市，拒绝使用中央纸币，第五团营长李树森受命驰往东山包围俄顾问住宅，收缴卫队枪枝，监视俄顾问，断绝其交通。

三月二十日上午十点钟，蒋介石又调第二师第六团第一二两营兵赶赴黄埔监守该校，并密令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训练部主任严重、军官团长张治中，以防变动。孙文主义学会在省中大造谣言，说邓演达是受第三国际的指使来中国当坐探的，与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结合一气，彰明较著的骂蒋介石为新式的军阀……。高语罕当时不在黄埔，教育长邓演达与训练部主任严重却受了孙文主义学会的无赖潘佑强辈的严密监视，不能自由。还是第四军李济深亲赴黄埔把邓接出，往见蒋介石解释一切，才得恢复自由。但是过了两天，蒋介石就调邓演达到潮汕为第一军党代表。第一军军官多半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此时潮汕的孙文主义学会正猖獗异常，对邓极力排斥，不许其行使职权。

蒋介石在省城里面一切布置妥当后，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撤销全军党代表。党代表制，乃革命军中之一种革命的制度，能训练士兵对于主义之认识而发扬其战斗力者，在两次东征及扑灭刘杨诸战役，皆有莫大之成绩。但是一般不肖军官，非常恶嫌党代表，此次事变以后，他们就乘机把党代表制度取消了。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那天，本想把俄顾问一律遣散回国，但是其余各军领袖不同意，结果蒋介石就托辞基山嘉、罗茄觉夫、察罗磐诺夫三顾问阻止他的北伐的主张，就把这三位顾问辞退了，其实顾问何尝阻止他北伐

呢。总之蒋介石为人奸险不可与共事。他对于第二、三、四、五、六各军，总想兼并在他的系统之下，不愿政府对各军有政治军事的整顿。他唯一的愿望，是想多派黄埔学生到各军去当下级干部，以备将来有一天把各军都并在蒋介石的系统之下。这三位顾问，是整顿各军使能同样的发展的，所以蒋介石就恨之如仇。

蒋介石不过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校长，而军校又不在广州而在黄埔。广州乃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在之地，蒋介石有何权力，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所在之地，未得党与政府的命令，且不使政府知道，能在首都宣布戒严？如有军事行动，蒋介石有什么权力干涉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的海军局而逮捕其局长，并派兵占领其舰队？纵如蒋介石所云中山舰有“异动”，亦应报告政府与以相当处置。蒋介石谓“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为什么调动军队的时间有，而反无时间来报告政府呢？他明明是借孙文主义学会的叛乱，来排共仇俄和反对国民党左派，以达到个人专政的野心。

蒋介石将之龙逮捕、占领中山舰、看管第二师左派党代表、包围罢工委员会、围缴俄顾问卫队枪枝后，即在造币厂召集军事会议，行使其太上威权，自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他对于军事委员会，还觉得不能专断，于是想取消军事委员会，但是自己又不好说出口，于是把半身不遂的残废张静江搬到广东来作一个傀儡，并且把口头革命的挂名党员吴稚晖也找到广东来，于是乎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会议请蒋公布三月二十日事件的真相。蒋说此案的真相不能公布，如果公布，就会使政府军事摇动。这也就是说，三月二十日事件，是政府里面、军队里面几个右派分子的阴谋，不便公布。“整理党务案”的结果是：

一、破坏国民党党章、昏庸老朽、半身不遂的张静江，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二、裁撤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做了超过大元帅职权的总司令。

三、蒋介石做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因兼顾不来，由陈果夫代”。

四、张静江辞职，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北伐时由张再代）。

五、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

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不得超过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规定共产党发指示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

蒋介石象这样做了，才放心北伐，使将来争来的天下，好自家享受。对各军事长官方面，蒋介石极力拉拢李济深，对付其余的军长；委曾被廖党代表要捉拿惩办及在廖党代表死后复为第二十师副师长、临二次东征出发时潜逃之林振雄（蒋同学）为长洲要塞司令兼海军处长；专门罗致同学同乡来垄断军事、党务、政治。

北伐至克复江西时，蒋介石反革命的原形毕露了。他仿照吴佩孚坐镇洛阳垄断政治的故事，打算在南昌做吴佩孚第二。三月二十日事变第一幕已毕，现在即开始演蒋介石叛变记的第二幕了。这第二幕开始于本年二月，他指使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在赣州杀死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并羁留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委员于南昌。三月十六日，强迫解散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员，封闭学生会，通缉学生会执监委员，并封闭宣传三民主义之“贯彻日报”。十七日他在九江收买手持刀械的流氓数百

人，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并杀毙国民党市党部三人、总工会一人，重伤第六军政治部九人。工会纠察队捕获行凶流氓数十人，复被蒋之卫兵将被捕流氓全数劫去。他到安庆，就在三月二十三日雇用土匪流氓青洪帮，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安徽省和安庆市两党部及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殴伤同志多人。他到了上海，阻止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之上海市民政府成立，封闭总政治部分部，更于四月十二日晨，指使驻沪军队用大炮机关枪围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枪械，毙伤工人无数。在南京，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及南京市党部，侯绍裘被打重伤复失踪。蒋介石不仅在他所到之处，竭力进行摧残党部压迫农工等种种倒行逆施的罪恶活动，并且指使各地的走狗，同样的向革命的民众进攻：三月三十一日，发动重庆大屠杀，死者四百人以上，伤者在千数百人，失踪者不计其数；电令厦门军警包围总工会，阻止工人运动。蒋介石现在不仅破坏武汉国民党中央财政统一交通统一的决议案，而且召集少数落伍的国民党中央监执委员，在南京开非法会议。总之，现在蒋介石是极险恶的反革命了。

附录：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

一　派舰之经过

三月十八日晚，有三人来文德楼之龙寓所，一人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斗争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校长调遣。时适之龙外出，此三人即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留呈之龙。及之龙是晚回家启视，该函略云："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邹科长自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云云。之龙阅毕，即往对门自由舰长谢崇坚家商量派该舰前往。据自由舰长云，该舰新从海南返省，机件略有损坏，现正在修理，即时不能开行。之龙遂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听候差遣。未几宝璧舰黄舰长持邹科长函来请之龙下一命令。之龙遂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交宝璧舰长，一请代交中山舰章舰长。该两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等语。此乃军校驻省办事处来要舰与之龙派舰的经过情形也。

十九日邹科长因派舰事向军校驻省办事处索补一公函来局，之龙已饬编号存案矣（见附件一）。未几，邹科长又来对之龙说：顾问询中山舰在省否，因苏俄参观团要参观军舰。之龙遂一面饬给养科给发新军衣，一面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因是日参观团参观舰队，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当承蒋介石允许，故电该舰返省，预备参观。及是晚六时许，中山舰长章臣桐来寓报告之龙云：昨晚未得你的命令时，在海军俱乐部中迂邹科长，他曾对我（章臣桐自称）说过了。我（章臣桐自称）当时答云，以无舰可派，则中山舰亦可以去。及接你（称之龙）的命令，即行准备。次早六时许，开赴黄埔。抵埠时曾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答云不知，恐为日本商船某事，可稍待候。后得你的电报及学校通告始返省云云。此乃十九日调舰回省之手续与章臣桐之报告也。

〔附记〕作战科邹科长留呈之龙之函，被陈肇英于之龙扣留后，派人到之龙寓所搜查三次，搜去毁灭了，只有信封尚在（因之龙阅后并未装还），至邹科长给宝璧黄

舰长之信犹在。于邹科长留呈之龙信中，是否有提及“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之话，尚可由章舰长返省后，来之龙私寓报告中，言及前晚在海军俱乐部遇邹科长曾提及过的话，可以证明。

派舰时，因邹科长信中谓驻省办事处来员云，系接邓教育长（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云云，之龙忖思此语，料蒋校长必在黄埔无疑，故不能径向蒋请示也。次日邹科长告之龙谓：办事处说，蒋已返省，故之龙向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回省预备参观。

二　被捕的详情

十九夜(即二十日午前三时许)，之龙在私寓，梦中被叩门巨声惊醒，听声音即先时七点钟欧阳格派来送信之前欧阳琳卫兵也。问其来此何干，答：对李局长有话说。此时之龙即知有异，盖恐欧阳格所谋不成，特夜深派人来暗杀我也。时婆妈已开门，之龙暗思两卫兵均在楼下，万一有变，我只好听之而已，遂着袜下床。出房门视之，见随来者有携带驳壳枪之兵士六七人。问何为者，该卫兵凶恶答云：欧阳校长奉蒋校长命来捉你去。说毕向之龙手提皮匣中搜去函件（想系搜去可以证明之信，拿去灭迹也）。之龙答云：“好！要去等我穿了衣服同你去。”甫穿外衣未及扣钮，众即拥之龙下楼。此时之龙见士兵服装不若第一军之整齐，料系欧阳格勾引土匪冒充军队来虏我者。行时向街上四望，以为有巡查队经过，将呼之起虏。至文德东路转角，见有一警察，之龙大呼曰：“我是海军局长，他们不是正式军队，无有命令乱拿人。救人呀！救人！”士兵嘈杂曰：“不是正式军队是土匪，一枪打死你。”警察低头而去。未几到监察院门前，又遇着旧时相识之党军第二营勤务兵，问为何故。该士兵答曰：“他们是第二十师办事处的，你同去不要紧。”瞬时即到万福路第二十师办事处。登楼，见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先已在（章是晚并不在舰，被捕时在东堤某家宴饮）。问为什么，彼云不知。欧阳格出，故作态向之龙曰：“你为什么这早起身”（因他报告我已夜起登舰将发动）。之龙答云：“未有起身，是你派人到我家中把我拿起来的。”欧阳格遂不复言，命人将之龙外衣剥下，将手绑起；先将章臣桐捉下楼，复命人用毛巾将之龙的眼蒙蔽，又用手巾二条以驳壳枪启子塞入之龙口中，口破血出，既不使看见，又不使之龙出声。之龙想道：为什么这样不正大光明？既是正式拿办人，为什么不经审讯，这样黑暗。死不足惜，只恐死得不明白。此时全副精神，只注意到听那一声枪响耳。稍待片刻即下楼，押解在汽车上，天已渐明，由毛巾内见车经过惠州会馆向广九车站方面进行。此时之龙心中想到必是将我载到车站附近人之地谋害。

至第一军经理处（现时不知改作何名），下车登楼。之龙料到必须经过审问了。到经理处长房内，处长问道：“你是李之龙吧？”之龙口内塞有手巾，不能出声，想先时押解之兵，常摸之龙口，恐手巾脱出，此时处长既问，想可让我自由说话了，遂以舌极力将手巾抵出，始能出声，答云：“是。为什么捉我？”处长云：“有什么事对不起校长未有？”答：“未有。”问：“你想一想。”答：“只有前几天把校长的坐船江固派到梧州去了，这是打电话向校长请过示，经他许可的。先打算派到西江剿匪，又因招待苏俄参观团，送他们到梧州去了。”问：“中山舰是那个派到黄埔去的？”答：“是校长的面谕，叫邓教育长演达打电话到办事处来要我派去的。”问：“是那个调回来的呢？”答：“因为苏俄参观团定昨日午后二时参观舰队，曾用电话向校长请示，得其允许才调回的。”

问：“你能够指挥那条船？”答：“用代理局长名义，都可以指挥,用私人的名义,一条也不能指挥。”问：“中山舰上有些什么人？”答：“有舰长，有兵士，另有看守该舰的第二师兵力二班。”问：“中山舰上共有若干人？”答：“约百三十人。”问：“有枪枝若干？”答：“长短枪三四十枝。”问：“派了船到西江去未有？”答：“军事委员会要海军局派船去剿匪，但因财政部黄埔学校各处调去的船尚未回来，故尚未派出。昨日有两只船名‘安北’‘平南’到海南去，是军事委员会前一个星期要的，迟到昨天才出发。”问：“你为什么这早就起来？”之龙一闻此语，顿时心中就明白了，就知道是欧阳格诬陷的阴谋了，遂答道：“并未起床，是欧阳格派人到我家中由梦中拿来的，你看衣履都不齐整，就知道了。”处长云：“报告的人说你深夜起来上船有举动。”答云：“请处长转报告校长，务必要将报告人扣留，以免逃逸。”处长云：“我去对校长说，”言已遂去。此时将之龙移到一小房内，取去蔽眼毛巾，另加几条粗绳，把手腿绑得动也不能动。陈肇英时时来看一看，呼云：“校长的命令，绑紧一点！”监守兵又紧一次。过一刻，陈肇英又来云：“校长的命令，再绑紧一点！”监守兵又拿一条绳来，竭力绑，绑得两手肿得痛入骨心。约三刻钟后，陈肇英得意洋洋，带了卫队用汽车把之龙押解到造币厂内，遂由第六团特务连监守矣。

附件一

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舰公函（此函已由海军局作战科于会审日缴呈会审官）

敬启者，顷接

教育长电话，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

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附件二

海军局值日官当晚的记录（此记录除钞呈会审官外原册归海军局总务科保存）

值日官 李光邺 吴国祥

十八日下午七时四十分，有黄埔军官学校后方办事处，派员来局，请即派有战斗力军舰两艘前赴黄埔，听候差遣。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矣。十时，宝璧黄舰长到局面称：奉邹科长命，即开赴黄埔，但因手令无李代局长签字盖印，故欲知李代局长公馆住址，以便前往请示等语，当经查明该住址，告知黄舰长矣。

十九日上午七时中流砥柱来电：中山兵舰于是日七时出口。七时三十分中流砥柱来电：宝璧兵舰于是早六时出口。下午六时中流砥柱报告：中山兵舰入口。六时二十五分江防司令报告：中山兵舰入口（从这一个记录可以证明中山舰不是深夜返省，而是六时三十分以前抵省抛锚了）。

中山舰事件前后

包惠僧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第一个阴谋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并扣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从而窃取了第一军的军权。现在将这一事件的亲身见闻叙述如下。

（一）

一九二五年七月，广东军政府在平定杨、刘叛乱之后，即进行改组，成立了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汪精卫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八月间廖仲恺被刺后，汪复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则负一部分、或者可以说大部分军事责任。重大决策，全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不可能、同时也不必要遇事都由蒋介石来决定。在廖仲恺未被刺以前，一切问题有他周旋于汪、蒋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廖仲恺被杀以后，汪精卫做他的主席，蒋介石搞他的军事，双方就有些貌合神离的样子。特别是在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在前方作战，关于黄埔军校、广州卫戍司令部、新成立的海军局等军政机构的人事调配以及其他重大问题，都由汪精卫负责处理。汪、蒋之间的关系到这时就更加疏远了。

当时蒋介石的几个亲信人物之间也有内部矛盾。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是一个贪污腐化、狡黠诡谲的人，同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黄埔军校军需处长徐桴及海军方面的陈策、欧阳格等勾结一起，狼狈为奸。他们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同西山会议派也有联系，他们的首领是蒋介石。王懋功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官僚，原是许崇智部的一个旅长，以出卖许崇智、投靠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被任为第二师师长并代理广州卫戍司令。但王懋功与王柏龄以权利冲突，积不相能。王柏龄到处攻击王懋功，说“王东成是以‘反水’起家的，校长相信他，将来是要吃亏的”。王懋功对王柏龄也是一样，逢人便骂王柏龄是“一个贪财好色、贪生怕死的小人，打仗的逃跑将军”。他们见面时相互笑骂为“狗屎”。王懋功与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为了走私的问题，也有利害冲突。王懋功与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为包赌、包烟、包娼的问题也有矛盾。他们彼此之间几乎相视如仇人。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大本营直辖的海军局和航空处，有两个苏联专家分任局长和处长，但都没有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海军局与航空处正式成立，苏联专家自动辞去局长、处长职务，由参谋团与国民政府商洽决定，派张静愚为航空处处长，李之龙为海

军局局长。李之龙原系烟台海军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曾在武汉、上海等地工作过；国共合作之初，他在广州曾担任过鲍罗廷的翻译。黄埔军校成立后，他奉共产党的命令投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学生。第二次东征军出发时，他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转任海军局局长（没有经过蒋介石的同意）。他当了海军局局长以后，把陈肇英走私的勾当，报告了汪精卫。汪精卫就下了一个手令给海军局，严禁军警机关走私，并令海军局厉行缉私。李之龙奉命之后，即把虎门要塞司令部的走私船只扣留起来，人员拘禁，货物充公，陈肇英以下有走私嫌疑的人员，都受了处分。这样，陈肇英就与李之龙结下了不解之仇。一九二六年一、二月间我任教导师党代表期间，有一次同蒋介石、王柏龄（当时是教导师师长）到虎门、东莞检阅部队时，陈肇英由广州同我们一路到虎门。陈肇英当时一面向蒋介石诉苦，一面托王柏龄央求我向李之龙说项，希望李不要与他为难，请他把船只放回。

李之龙兼中山舰长，也是爆发“中山舰事件”的原因之一。这只兵舰原是永丰兵舰，因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先生曾在永丰兵舰避难，改名中山舰，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蒙难的。陈策、欧阳格都做过中山舰舰长。它是国民政府惟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也是水上走私的一个堡垒。自从李之龙兼任中山舰的舰长，对于大大小小的走私军警机关和人员，都是一个威胁，在蒋介石看来也不顺眼。因此，李之龙就成了众矢之鹄了。

黄埔军校没有建立预算和决算制度，开支经费都由蒋介石信笔乱批。他用钱的手面很大，公私不分，自然有很大的亏空。王柏龄当教育长时，也和蒋介石一样，狂嫖烂赌，还有三个小老婆，亏空也很大。王柏龄调教导师师长后，邓演达继任教育长，把王柏龄任内亏空的情形报告了蒋介石，并要他把亏空填清再行离职。因此王柏龄与邓演达结成了不解的冤仇，所以后来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邓演达也曾被监视起来。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举行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事先，黄埔军在汕头选举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选举完全采取自由选举的办法，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选举结果，当选者多数是共产党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选者较少，连贺衷寒也落选了。选举完结以后，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们就罗唣起来。蒋介石看见共产党如此得人心，也大吃一惊。他就硬派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团、营长十余名列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及汪精卫转请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核准。汪精卫把蒋介石的请求提到国民党中央，转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予以同意并报告大会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两天，蒋介石才从汕头回到广州。他只出席大会作了一次军事报告，其余的会都没有参加。代表大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选举中央委员。在选举之前，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召集了一次党军系统的党团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方面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代表，一共不到二十个人。汪精卫召集这个会议的主要动机，是要听取蒋介石对于大会及选举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始终缄默，不表示任何意见。冷了半天的场，汪精卫才开口说：“党军方面的候选人，我们希望蒋先生能提出意见，我们的意见是，除了蒋先生及何敬之（应钦）同志应该当选外，还有王茂如（柏龄）、王东成（懋功）也应提为候选人，另外还要选拔几个青年同志。”蒋介石就截断了汪精卫的话头说：“我还是在军事方面多尽点力，我不要当中央委员，也不应该当中央委员。一个军人如果什么事都管，就难免造成军人政治。我决不能做苏俄的托洛斯基。王柏龄和王懋功更没有必要。至

于提拔几个青年同志当中央委员，我倒没有什么意见。”蒋介石从开始一直到散会，态度始终很不自然，好象是有千言万语说不出来的样子。

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有一天早晨，王懋功到东山去见蒋介石汇报公事，蒋介石突然下令解除王懋功卫士的武装，并送他三千元的旅费和一张船票，限令他即刻上船，驱逐出境，即以刘峙调升第二师师长。后来据钱大钧说，沈应时（蒋介石的亲信，二十师的副师长）有一次问蒋介石关于处置王懋功的原因，蒋介石笑着说："王东成的环境不好，为了保全他，所以教他离开广州。"

（二）

蒋介石在潮、梅底定后，把军事、政治都作了一番新的布置。在他准备回广州之前，新右派就天天制造谣言，说什么"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又说什么"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帐，说蒋介石有贪污"；还说什么"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诸如此类的含沙射影、挑拨离间的谣言还有很多。我最初听到的这些谣言，是从王柏龄那里播弄出来的。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我同王柏龄都在东莞驻防，彼此来往频繁。有一天他约我在他家里吃晚饭，饭后他的话匣子开了，谈了很多嫖经和赌经，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老兄，你知道吗？昨天毛县长（东莞县长，蒋介石的大舅子）从广州来，听说广州方面反蒋的谣言很盛，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听了觉得很奇怪，便说："谁反蒋？这个谣言从那里来的？应该追究一下。"他又说："你大概是装糊涂吧，这个谣言老早就有的。你想，除了汪精卫，谁还能反蒋呢？天下竟有这样不平的事，校长东征西剿打下来的天下，他做了主席，今天还要反蒋，真是岂有此理！"我接着说："这样的谣言，我确实没有听见过，如有，真应该严查究办。"他又说："那你真是孤陋寡闻了，这些谣言，不仅广州有，东莞也有。"我越听越觉得离奇，就说："如果你的话真有根据，汪精卫就是自找死路，广东的军队不都是我们的吗？"他才哈哈大笑说："可不是吗？"

当夜我回到政治部，即打电话到广州方面问情况，好几处的电话都没有打通，最后打到我家里问夏松云，因为她是广州妇女协会的主任，常同陈延年同志一块儿工作，如有什么事，她可能知道一点。她在电话里说："今天下午还在文德路汇报工作，广州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新闻。"我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听了王柏龄所传的谣言，一夜翻来复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打电话找王柏龄，据司令部的值日官说，他一大早回广州去了。我更感到奇怪，即召集各团中我们的负责同志到政治部汇报。我把王柏龄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也听到同样的传说。总的情况表明，这些谣言多半是出于王柏龄的亲信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之口。这样一来，我认为问题应该搞清楚，我即准备回广州。但是那几天刚刚凑巧有暴风雨，商船净了江，我回广州或回黄埔都没有船，电话也不通了。我即打电报给校长和校党代表，说我因有要公面陈，请派船到东莞接我。

第三天，黄埔军校派来一只小火轮到东莞来接，我即坐船先到黄埔去看蒋介石。约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我即笔直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会见蒋介石，向他报告说："王师长

已回广州去了好几天，我从王师长、毛县长及其他同志那里得到一些奇怪的谣言，说广州有反蒋的空气，又说校长与党代表有矛盾。我听到这些谣言，感到奇怪与不安。我想这些谣言很危险，即令仅仅是谣言，也应该进行查究，予以澄清，如果是事实呢，那就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要着手镇压。”蒋介石听了我的话之后，带着微笑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的意见当然不错，不过我还没有听到这样多。我今天夜晚要给学生讲话，我们一路到校本部去，你可以同邓教育长谈谈，并要他给你安排住宿、吃饭。”我说："我同校长到校本部去看过邓教育长后，即就原船回广州，我还要去看看汪党代表。”我们就一路步行到了军校。我同邓演达除了寒暄以外，谈了一点关于二十师训练的情况。我同邓虽然认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交谈过，这是第一次打交道，我们也不便深谈。我辞出后即坐原船到了广州。

我回到广州家里的时间还不到七点，即打电话给汪精卫说我要去看他。汪精卫亲自接电话，他说："周主任新从汕头回来，我约他在国民政府吃晚饭，同席的有陈公博、缪斌，请你也来吃晚饭。”我马上到国民政府，同他们见了面，闲谈了一下就吃饭。吃完了饭，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就散了，因为有缪斌、陈公博在坐，我要说的话也不好同汪精卫说。临散时，我同汪精卫约定明天再去看他，说有一些人事上的问题请他决定。他答应说："校长今天夜晚就回来，我明天早晨到他家里去，你也来一起谈谈好不好？”我答应了，才分手。

我从国民政府出来即到文德路去找陈延年同志，他正在主持工作汇报。夏松云也在坐，她告诉我说："前天夜晚你在电话上说的话已报告给陈延年同志了。”我把陈延年同志拉到另外一间房里，把王柏龄在东莞酒后所说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陈延年同志说："我想这是新右派制造的谣言，王柏龄就是谣言的发动机。他现在既在广州，你也可以在广州多住些时，同他多多接近，看他还说些什么。你得到什么情况，同傅烈同志联系。”傅烈同志是四川人，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广东建立的一个情报机构，即由他负责。当夜我等夏松云开完了会一路回家，她说："广州市这几天风平浪静，你疑神见鬼干吗？”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因同汪精卫有约，急急忙忙地吃了点东西，就跨上车到东山蒋介石家里。我进门正遇着汪精卫从楼上下来，他表示很诚恳的样子，拉着我的手说："政治训练部需要一个副主任，因为陈公博兼职太多，工作很忙，政治训练部的工作又多，他顾不了，要一个副主任负实际责任，我想请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如何？这个工作比二十师的工作重要一百倍，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答复我。”我当时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就很世故地回答说："我对工作完全服从汪先生的旨意，我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不过我从东莞回来，有一些情况要给汪先生报告。我们什么时候谈？我希望快一点。”他看了表，迟疑了一下说："已经九点半钟了，十点钟我还要到中央党部开会，今天没有时间，明天早晨再通电话约时间好了。”我也只好同他分手，上车回家。

汪精卫为甚么要调我当政治训练部的副主任呢？这是一个新发生的问题。因为当时党代表的职权很重，不仅有监督所属人事、经费的权责，还有权监督同级主官，在必要时可以作紧急措施，先处理再报上级。这样的制度认真执行起来，主管人事、经费的师长、团长、连长，就不能克扣军饷，也不能随便动用经费、任用私人。当时蒋介石所用的中上级干部大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及云南讲武堂出身的雇佣军官，都是以升官发

财为目的的；为了革命而来参加这里军事工作的，除了共产党人而外，那就寥若晨星了。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而忠实执行革命政府的法令，是丝毫不苟的，尤其各级党代表在士兵同志中的威信很高，他们谁都知道任何命令没有党代表副署是无效的。各级将领大部分都是作贼心虚，所以对党代表制度都感到惶惶不安。为了便于私图，他们就设法破坏这个革命制度，阴谋取消党代表。最初他们不敢公开直接反对制度，就先从反对人、反对共产党员开始。蒋介石为了防备共产党人，就提拔一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如缪斌、张静愚、贺衷寒等任党代表。他们这些人当了党代表，无非是同那些同级军官一起吃喝嫖赌。蒋介石和王柏龄等想把二十师的共产党人都排挤出来，好造成他们的清一色的黑暗势力，所以同汪精卫谈到将我调职的问题。

有一天大早，王柏龄到我家里来找我，态度很颓丧。他还没有坐下就开口说："党代表，事情搞坏了，我们在东莞酒后乱谈的那些话，你就认真地报告了季山嘉顾问，季顾问就当成了一桩大事，告诉了汪党代表。汪党代表很生气，他跑到校长家里辨别是非，并指定是我造谣生事。校长是什么也不知道，今天五点钟就打电话要我去，大发雷霆地骂了我一顿，还要我把事情的经过和消息的来源，当面向汪党代表报告明白。我当时对校长说：'话不是这样说的，包党代表可以作证。'我想请你替我负点责任，不然我恐怕呆不下去了。"他说到这里，几乎要哭出来。其实我并没有见季山嘉，季山嘉的消息是从陈延年同志那里得来的。我便答复王柏龄说："我没有见季顾问，你同我讲的话，我是报告过校长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同汪党代表讲。我认为这样的事是要搞清楚的，应该追查消息的来源。我请校长查究谣言的来源时，校长还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既然话说穿了，你就应该把谣言的来源向校长和党代表说明白，这样，不就完了吗？还要我负什么责任呢？"他又说："这个话讲的人很多，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一个传一个，没有那一个能负责交出真实凭据来。如果一个一个地攀扯起来，牵涉的人很多，反而不好。我想只好请你对校长说，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或者说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就减轻了我的责任，校长就不会对我生气了。"我心里想，这个家伙天天在那里制造谎言，还要我替他扯谎。我又顾虑到如果我不敷衍他一下，对于将来的共事就是一个裂痕。我就答应同他到蒋介石那里去一趟。

我同王柏龄一路到了蒋介石家里，蒋介石的态度还很平静，他带笑地问我："你同季顾问怎样说的呀？叫汪先生感到不安。"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季顾问，我也没有同汪党代表谈这个问题，我仅把我听到的谣言报告校长。"蒋介石听说我没有见季山嘉，就有点奇怪的表情，他说："你们去看看汪先生，把话说清楚，叫他安心就好了。"我们坐了一下，就一同去看汪精卫。汪精卫不在家，我们就分别回家。

我们在广州一连住了三个星期，中间陈肇英还来看过我一次。我问他："船放回去没有？"他说："没有。"我告诉他说："我同李之龙说过，他说要请示主席再决定。"陈肇英很不高兴地说："我看他总不能没收吧？这又不是那个私人的东西，就听他去吧。"我因为以前到虎门检阅军队时，他曾经隆重地招待我们，为了还他的情，我就请他在我家里吃晚饭，还请了王柏龄、詹大悲作陪，打了八圈麻将。第二天他又请我们到西园吃饭，随着，王柏龄又请我们吃饭。我同他们这样昏天黑地地混了几天，而不知道他们就在这几天中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

（三）

三月二十日早晨约在八点钟前后，新任二十师副师长林振雄同入伍生团团长张叔同先后到我家来看我。他们向我说："外面有几条马路戒严，从惠州会馆到造币厂这一带断绝交通，十字路口都架着机关枪，第五团全副武装向省议会急进（海军局在省议会内），不知出了什么事故，党代表知道吗？"我听了他们的话，想不出是什么事故，就打电话到蒋介石家里问情况，接电话的是蒋介石的秘书陈立夫，他说："校长不在家。"林振雄、张叔同走后，我再打电话到蒋介石家里问消息，还是陈立夫接电话，他这次才告诉我说："校长昨天夜里三点钟就出去了，不知是处理一件什么紧急公事，他此时在造币厂。如果有事，你可以到造币厂去见他。"我又打电话给王柏龄，他家里没有人接电话。

约在十点钟左右，我把所有的情况用电话报告周恩来同志。他为了明了情况，就到造币厂去见蒋介石。他带着四个武装卫士，到了造币厂就被缴械。周恩来同志见着蒋介石，蒋介石告诉他说："李之龙及中山兵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觉得早，李之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一军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

周恩来同志从造币厂回家之后，他同我通了电话，我马上到他家里汇报情况。周恩来同志叫我去看看王柏龄和刘峙（第二师师长），去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

我去看王柏龄时，他家里警卫森严，楼上楼下都布满了武装卫兵。他住在文德路附近新建的一所房子里，与李之龙是楼上下邻居（李之龙住二楼，他住三楼），到他家里要从李之龙的门口过。顺便看去，见李之龙的房门开着，并没有一人，家具什物都是乱七八糟，好象抄了家似的。我通过警卫岗哨到三楼见到王柏龄，我问他："茂如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你怎么不打我一个招呼呢？"他得意洋洋地说："李之龙造反了，他同汪精卫、季山嘉勾结在一起，要把校长骗上中山舰送到俄国去。中山舰正在升火待发的关头，被我们发觉了，即将中山舰解除武装，李之龙已被捕了。我们大家都很愤慨，如果他们要抵抗的话，那就是一场血战了。"我问："同海军局打吗？"他说："也许不止是海军局吧。"我就又顺着他的语气问："就你所说的情况来看，就应该把汪精卫、季山嘉都逮捕起来呀！"他说："校长不肯这样干，汪精卫是主席，季山嘉是客师。"我同他又胡扯了一番才辞出。

到了下午七八点钟的时候，全市已戒严，我又去看刘峙。刘峙见面，也很客气。我同他握手坐下，问他："今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呀？"他到是很平心静气地说："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们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会，我就回家了。

我刚到家，夏松云就告诉我说："陈延年同志派人来通知，叫你少出门，夜晚不要住在家里，行动要简单轻便一些，不要坐汽车，不要带卫兵，也不要到他那里去，有事他派人来通知你。我们门口有几个便衣侦探来来去去，你知道吗？"当天夜晚我在西濠口亚洲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一夜。我们共产党人一连也紧张了几天。

事后才知道，中山舰事件，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三月十九日下午，蒋介石回广州，当夜三时（即二十日上午三点钟）到

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但是共产党方面对于这一次的反动阴谋没有预先料到，也没有作任何准备，事出突然，所以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反抗。就是刘峙把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捆起来的时候，大家还都很从容地说："我们问心无愧，不知为了什么？见了校长再说吧。"这些被捆绑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是周恩来同志到造币厂看见了，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才下令把他们解开了。蒋介石当时还装着很生气的样子说："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

李之龙新婚不久，十九日夜间陈肇英、王柏龄带着十几个人破门而入，他夫妻俩从睡梦中惊醒，被他们从床上拖到地下，拳足交加地打了一顿，然后捆了起来。李之龙最初喊叫，他们就在李之龙的口里塞满了乱纸破布。陈肇英还亲自动手打李之龙和捆李之龙，并且吆喝着说："校长的命令，把这个忘八蛋捆紧些。"蒋介石把李之龙关了很久，才释放他出来，派他随北伐军到前方工作。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政府时代，李之龙曾经写过一篇"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①，揭发蒋介石这一阴谋活动。

中山舰事件以后，蒋介石以排挤共产党人为目的，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党务整理案"，并解除了季山嘉的聘约。但蒋介石在这一次事变后不久，即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以钱大钧继任二十师师长。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要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曾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表示仍请汪精卫继续负责。汪精卫称病，表示消极，从此即不问事，也不见人。约在四月中旬，汪精卫轻装简从，悄悄地离开广州，乘船到了香港。事有凑巧，汪精卫由广州上船时，正遇着胡汉民也搭乘这只船到香港。胡汉民自廖案发生之后，与许崇智被驱逐离粤的同时，就被蒋介石软禁在黄埔，到此时才释放出来。从此，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2辑，1960年3月出版）

① 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編《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的統一战綫》，171—186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陈　独　秀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我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

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象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子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

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够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象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的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抑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

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个别需要所构成的个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做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附〕正告本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

（一九二六年五月）

蒋　中　正

中正由汕回省，至今已三阅月矣。处境之拂逆，精神之痛苦，其间之悲惨情状，实有不忍言，且不能言也。当回省之初，党事纠纷，学会风潮正盛之时，中正目击心伤，惄焉忧之。一方虑右派之捣乱，以分裂吾内部之团结。一方虑处置之不平，造成本党根基之错误。至对于军纪风纪，日渐废弛，尤使吾心焦灼难安。然犹深信吾同学将士，必能以总理

之心为心，且知其必能详明总理之意旨，当不至以区区意见之相左，而自相倾轧也。窃自去年组织政府以来，凡党务政治，均推汪主席主持一切，中正但有惟命是从而已。即军饷财政，亦以中央集权为首倡，故自请解除军长总指挥之职权，还诸政府。凡东江民政财政各人员，概由中央派遣，决不敢妄荐一人，干涉丝毫。军区分配，部队驻防，任由中央之指定。惠州为我无数将士牺牲而得者，中正且提议划归第六军区，以免除未流割据之恶弊。至今军饷总由财部支配。所部军无宿粮，士尽敝铠。日闻呼苦之声，亦惟以严法绳之，无稍姑息宽纵，当为世人所共见也。惟北伐未成，为总理毕生之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此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成为无意义之举动。故不惮正色力争期达目的。无如力不从心，所有北伐计划，竟至根本打消。事至于此，中正认为军事与政治，已失自动之能力，乃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然中正不忍自诉冤屈，以寒同学与将士之心。仍以团结内部，服从党义自勉，以勉我将士。故尝一再告诫，以期吾同学将士化除意见，共策进行，勉为模范军人，以期完成革命之责任而已。且自本校创办以来，于今二载。当创办之始，学生与教职员，不过五百余人。然而上下同心，精神一贯，无或间言。惟共产与非共产之分，已有一部分同学之成见，存于其间矣。当时总理以容纳共产分子，为革命原素之一种；而中正亦以为本党非容纳共产分子，不成其为国民党。且革命战线，非联合共产分子，实为国民革命之缺点。故自开校以来，惟恐同学歧视共产分子，或因怀疑而起决裂。是以时时以总理之意为意。对于共产分子，扶持提携，不遗余力，务使本校革命之基础，免除此共产与非共产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团结，完成国民革命之责任，以慰我总理之心。此中正二年以来，对于团结内部之苦心，至今未之或变者也。故同学间有以中正为偏袒共产，或抑置同学为言者，皆一概置之，但求无愧于神明而已。各期同学，凡能知中正之苦衷者，亦无不为之体察谅鉴。故其对于中正之言论行动，无论何时，未有起丝毫怀疑之心。而且听从之惟恐其不至。此固中正二年来，对于本校同学亲爱之情萦绕胸臆，朝夕所不容忘者也。亦惟有此精神之团结，乃能一出而平东江，回师而灭刘杨，再出而破惠州，尽歼叛逆之余孽。此无他，盖同学精诚之所至，故能无坚不摧，无攻不克耳。总理尝为中正告曰，“团体不患其小，惟患其不能纯一。今本校同志，虽止五百人，如能亲爱精诚，历久不变，则精神未有不团结而强固者。革命基础，全在于此，望勿有始鲜终，期告厥成”。甚矣，本校之责任如此其重，而总理属望于本校之心，又若斯之殷也。吾同学宜如何淬励奋勉，团结精神始终如一，以巩固此革命之基础。不负吾总理之期望。又宜如何实行主义，消除成见，以图战线之坚强，而达成革命之目的。不意吾总理与廖党代表及先烈各同学将士之骨血未寒，而本党本校即为之精神涣散，团体破裂。回忆去年梅县学会纷争以来，即起有心者无穷之隐忧。言念及此，痛心曷极。一年以来，不啻肠断泪涸，舌敝唇焦。而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忠言逆耳，无济时艰。卒至两方各处于极端，竟不顾其根本之倾颓，此皆中正诚不足以动众，信不足以孚人，有以致之，虽万死而不能辞其咎也。窃中正自追随总理革命以来，无时不以牺牲个人自矢，对于革命之希望，惟有乐观与前进。然如今日内部之情形，长此以往，虽欲不抱悲观而不得矣。盖北伐主张，既不能贯彻，辞职又未蒙批准。既不能使之专心办学，以励后进；又不许其奋勇前进，以完成革命之责任。卒致进退维谷，挽救乏术，同时军中党中，讧争益烈。青年军人联合会也，孙文主义学会也，诽谤

主义也，怀疑共产也，倾轧之声浪，日高一日。中正目击心伤，不忍坐视危亡，乃与汪主席约期开两会联欢会于本校，以谋精神之团结。不期联合会员届时又爽约不至，卒使各项问题，悬而不决。妥洽未能，纷纠益甚。遂致酿成三月二十日之事变，竟至破裂而无挽救之方策。二年苦心，诸烈赤血，竟成泡影。本校之光荣，党军之成绩，乃为此“内部破裂”四字，而贻革命历史上无穷之瑕点，能不悲乎！总之，此次事变，虽尚未审明其真相，然不得以个人问题，而牵动全局。尤其是中正以校长之地位言之，更不忍扩大破裂，至于不可收拾也。今共产分子，为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均愿以一律自动的退出，并期于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其态度之光明磊落，实足为吾同学将士所钦佩。盖以其少数幼稚分子之谬妄，而归咎于其全部，于心已有所不忍。而况其愿自动的退出，且无一句异辞，是其爱本军与本校之心，于此可见。而其坦白为怀，毫无自私之见存于其间，亦皎然明矣。吾今愿军中同学将士，试一平心反思之。联会与学会之出发点，究在何处？其立足点，又在何处？是岂凭空而能产生乎？抑有所本乎？今日所称学会与联会之干部，共产与非共产之分子，非皆出自吾总理所首创本校之同学？如无总理，安有今日之本校？更安有今日之学会与联合会乎？如此，当知联会与学会皆产自本校。而其出发点，自在本校。而其立足点，亦皆在本党与本校之上，无论学会与联会之损失，而其为本校与本党根本上之损失则一也。今日退出本军之同学，大部皆为联会之会员。而学会之会员对之，不知其作如何感想也。以此为乐乎？抑以此为悲乎？以此为荣乎？抑以此为耻乎？呜呼，“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之名词，不幸加诸吾本校诸同学将士之衔上。蒙此恶名者，是我诸同学。而使诸同学蒙此恶名者，实中正失德不道之所致也。中正诚无颜以见吾总理与已死诸同志于地下矣。吾今特告本校各期同学曰，今日本军分裂之现象，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损失；即我诸同学，凡为革命分子者之个人，无形中亦皆受极大之损失；而我团体之损失，固不待言矣。各同学其知之乎？呜呼，中正既不能防止分裂于未然，复不能补救设法于事后。不惟无以慰退出之同学，亦且无以见军中之将士。同学乎？吾辈非皆昔日相亲相爱，如手如足，同生同死之同志乎？而今则如何？若学会与联会，易地而处，则学会同学，又将何以为怀耶？如同学立于校长地位，则又将何以为怀也？吾言至此，吾泪涔涔而不能复止。吾之革命观念，本不许有感情容于其间。然而平心以思，此退出本军全部之同学，其果人人诬蔑总理人格者乎？其果以人人违反三民主义者乎？其果可以敌人相待者乎？其果可以仇视相终者乎？其果无伤于已死之总理与诸同学之心乎？事至于此，吾实不能复抑吾之情感，而致吾同学将士之难堪，吾不能不自悔吾处置之失当，以致吾亲爱同学之分离。吾复不能不自认吾罪恶之重大，以失革命战线之联络。吾敢直告于诸同学之前曰，吾不愿使吾退出本军同学之难堪，吾不忍本校之同学，终久分裂，如在队同学，仍予离队同学以难堪。或为外人利用本不自知其环境之险恶。则中正惟有与同人作长别，不忍坐视本军之解体，使我数万将士，皆陷入于自杀之途。而致我手创革命之基础，仍复亡于我之手也。吾惟望吾离队之同学，不再诬蔑总理之人格，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一本亲爱精诚之校训，不宿怨，不怀恨，不寻仇，不灰心，以光明之态度，亲爱之精神，捐弃前嫌，续欢同学，人非木石，谁能无感？吾知军中同学，必能坦怀释疑，恢复旧谊，终有共同努力于革命战线之一日也。如从此以后，势成骑虎，两不相下，一方以报复为事，一方且防其报复。水火冰炭，终不相容，必至同归于尽而已。吾今复敢以一言进告于同学曰：

吾对今日之内部，吾不能问其是学会与非学会，是联会与非联会之别。吾只能问其是同志与非同志，是同学与非同学之分也。吾只能问其是与非，情与理，横暴与亲爱而已。如昔日之联会，骄横暴戾，不可一世而忘其本者，吾必以校长之资格，惩之戒之。凡为本校之同志与同学，其能团结联合，始终如一者，吾必亲之爱之。革命党员，以革命为前题，报仇挟嫌者，固非革命之男儿；而防人之报复，怕人之挟嫌者，亦非革命党员之所为也。革命党员，固无怀恨挟仇之事。亦不怕人之怀恨挟仇也。而况同生死，共患难之同志与同学，有何不可解释之仇乎？情理不能埋没，是非自有定论。中正惟有以总理之志为志，总理之心为心，不偏不倚，公平正直，惟期团结内部精神，实行三民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而已。吾同学其思之，其重思之。

（原载《政治周报》10期，1926年5月3日出版）

〔附〕复林柏生书

汪精卫

柏生先生：五月二日的来信，已经收到。我读了来信之后，所最欢喜佩服的，便是来信已解答了本党目前最紧要的一个难问题。我曾说过，反共以后，最紧要的工作，莫过于清厘本党理论。这种工作，如不能做到，则其他一切宣传运动，种种工作，几乎无从做起，如今来信所说的“本党之目的，在于集中被压迫民族中各阶级之最觉悟的革命分子，组织之，训练之，使成为一超阶级的革命党”；“故本党既非代表任何单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谓本党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固谬，谓本党如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尤谬”；真可说得反共以后清厘本党理论的一篇重要文字。有了这种理论，则此后本党同志宣传运动得了方针，不致误入歧途。这是我所最欢喜佩服的。来信所说，我从前在论文及演说里，也曾说过一二。例如“党与民众运动”里头有一段说：“我们相信中国之国民革命是以帝国主义为对象的。所以必须唤起一切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以从事国民革命，因此国民革命的党，天然是多阶级的，凡是多阶级的党，必不能以一阶级的专欲而底于成功，故非各阶级集合一个共同目的之下，为共同目的而奋斗，同时调节各个之特别目的，则此各阶级终不能得真正之联合，党的领导之必要即在于此。”这段议论，与来信所说大致相同。在“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国家”里头，也有这样的话，我那时所说：“真正之联合”，是已经感觉到共产党徒“若干阶级临时联合斗争”之说，有无限阴谋及弊害在内，所以想起来矫正。如今与来信比较看来，我所说的“真正之联合”，远不如来信所说的“超阶级”之意义周密。而且来信明明指出“若干阶级之临时联合斗争机关，共产党人常作如是说，以便利其背叛本党之企图”，大为透辟痛快。

去年秋间，我在九江时候，曾和甘乃光同志说过，“本党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这是三民主义里明明白白指示给我们的。民族主义里所叮咛反复的固然如此，就是民权主义

里头也何尝不是如此。除了申述民权主义的原理之外，便恺切指出说："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狠坚固的团体。"又说"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或一个狠坚固的团体，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国家成一个大坚固团体，非有革命主义不成功。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就是民生主义里也何尝不如此。除了申述民生主义的原理之外，便沈〔沉〕痛说出中国民族因为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连食饭穿衣都无法维持，这是何等的发人深省。所以"本党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实在是三民主义里一贯的理论。来信所说"集中被压迫民族中各阶级之最觉悟革命分子组织之训练之使成为一超阶级的革命党"，实在是最能说明本党之性质及基础，无论何人，都不会有疑义的。

来信又说到"超阶级性的结合，其形成当较任何单阶级或复阶级性的结合为尤难。"这一段议论，将历年本党复杂纠纷之原因和盘托出，我读了之后，只有悲从中来。如今本党有些号为同志的，其步骤已经和民国元年以后的样子差不多了。他们已经一跤跌倒在帝国主义的怀里。要和北洋军阀及其豢养之官僚政客争食馂余了。他们已经把三民主义里头所谆谆指示的话忘记得一句不剩，而且向着相反的道路走去了。先生，他们已经连主义都丢掉了，你还说些"组织""纪律"做什么？你不看见他们已赐了我一个"党纪先生"的头衔么？老实说一句，他们党且不要，何况于纪？我于悲从中来之后，我依然擦干我的眼泪去和他们争斗，我定要将他们的劣根拔去，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可恶，并不恶于共产党。

以上我答你来信的话，简单极了，因为意见没有什么冲突，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罗苏。

来信还有问我的话，就是关于"三月二十日之变"。我于此次事变，从未有说明过。如今来信既然问及，我便也答几句。只是我不愿发空议论，我只愿拿事实来证明。我既然只愿拿事实来证明，则于我之行止，不能不先说几句。我于三月二十日以后，因肝糖病重，在办事时候屡屡晕倒，所以自十八日起便请假在家调养，二十日事变之后，蒋同志及其他同志因我不能起床，所以都到我家中开不正式会议，还开过一次正式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二十三日以后我便离家，不久便离国。在我离家以后，蒋同志及其他同志屡有恳切的挽留函件。离国以后，也不时函电往来。这就是说三月二十日以后，我并没有和蒋同志翻脸，及至去年四月十五日，我在汉口闻得南京不待中央决议即举行清党，才和蒋同志翻脸的。

我的行止已经说明，我便可拿事实来证明来信所举五项那一项是确的，那一项是不确的。

第一项说："共产党欲建立工农政府，故蒋不能不以断然的手段处置之。"如果这样，则共产党徒当时已公然背叛国民政府，那么，蒋同志至少也要将这些背叛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徒照谋叛律治罪，何以蒋同志当时并没如此办去？而且于五月间中央全体会议提出党务整理案时仍然继续容共政策，并且主张和共产党开联席会议呢？可见得此说不确了。

第三项说："西山派联蒋以倒汪，共产党联汪以倒蒋。"联蒋倒汪是西山派的口号，我前年七月间在法国南方海边养病时候曾复蒋同志一封信说及此事，很滑稽的说，"西山

派联蒋倒汪只做得一半，因为汪虽倒了，蒋仍未联。”这话不错，西山派至今还联蒋不成。至于共产党联汪倒蒋云云，也许当时有些人要造出此口号，但是事实何在？如果说李之龙要将中山舰来倒蒋，那未免太儿戏了。况且若然如此，则李之龙罪在不赦，何以事后蒋同志并未将李之龙治罪，而李之龙仅仅声明脱离共产党，便已释放呢？所以中山舰案，实不过一种风声鹤唳罢了。

第四项说："蒋主张北伐，鲍罗廷反对甚力，故蒋欲去共，共亦欲倒蒋。”这完全与事实不符。鲍罗廷于前年二月离广州赴北京，当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之时，尚在北京。其后由北京绕道蒙古以至海参威，由海参威下船和胡汉民等同载，于四月底（或五月初）始回到广州，那时我已离国了。鲍罗廷回到广州以后，有没有反对北伐，我不得而知。若说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由鲍罗廷反对北伐而起，太不问事实了。

第五项说："先生因袒共，故愤而去国。”这段来信已证明其不确了，我再加几句话。我于三月二十三以后，摒挡去国，系由广州经香港搭法国邮船安者号直至马赛。当时我已解除政府职务，两三个人，学生生活，当然没人注意。到马赛后，病势缠绵，延至九月十五日，终不能不在病院行剖腹疗治。十月杪，广州中央催促回国，勉强行至柏林，又复病倒，直至去年三月始再成行。三月八日到莫斯科，十二日离莫斯科，经西比利亚铁路及由海参威搭船，于四月一日到上海。在去年三月以前，绝少与国内外同志通讯，仅有答复中央催促回国之函电及答复蒋同志等几个人的函电。到莫斯科后，闻得党内分裂消息，兼程赶回，统计在莫斯科，前后不过五日。

以上四项，都是不确，只有第二项所说，“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冲突日甚，蒋为免除军中纠纷，故解散两会另组黄埔同学会，共产党政治工作人员，悉令退伍。”这实是三月二十日事件酝酿爆发的一个原因。我今就我所知，详述如下：

十三年春间总理改组本党以后，跟着就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同志为校长，廖仲恺同志为校党代表。当时总理所给我的使命，是往来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所以我在广州的时候，虽然也在校里担任教授，却是除了演讲以外，校务从不过问。直至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同志被害之后，我方才兼任该校的党代表。那时候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冲突，已是很激烈了。须知道这种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无可调和的。然在当时广州革命根据地方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及反革命重重包围之核心，这种冲突如果发生，则广州革命根据地必然摇动，所以当时蒋同志和我都是注意于防止这种冲突之发生的。试看当时蒋同志在汕头总指挥部所著论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学录序”和我在广州省城所著论的“我们应该怎样的努力”可以看出我们两人意思相同。蒋同志还有一篇“总理实行中俄联合的意义和世界革命统一指挥的必要”，是十一月七日在汕头总指挥部所讲演的，措辞更为激昂，其用意无非策励两派，使同为国民革命尽力，不可互相冲突。只是蒋同志和我这一番工作，都是徒劳。这种互相冲突的形势，至十二月底而达于短兵相接的程度。蒋同志因此由汕头回到广州和我一同处理这种纠纷。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前年一月一日开幕，大会所决定的是依然继续总理联俄容共的政策。孙会当时不免失望，而且西山派正在北京隐在帝国主义与军阀，两重保护之下借着反共的口号来反对广州革命根据地。孙会虽然和西山派没有什么关系，但总觉反共二字几乎为反革命者所借口，所以表面上的活动一时也就顿挫了些。而青会对之却趁势要将他压倒。苏俄顾问因党派关系，当然暗中帮助青会，因此又

惹起了孙会之激烈反攻。其形势之轧轹，至于如此。所以前年一月及二月间，是蒋同志并没有抛弃联俄容共的时候，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也就于此酝酿爆发了。蒋同志做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独断独行，未尝谋之于我的。就事后蒋同志给我的手书及蒋同志所做出来的事情看来，可以归纳到以下两点：

第一，蒋同志并没有抛弃联俄容共政策，尤其没有抛弃联俄政策的意思。

第二，蒋同志以为国民革命是本党的使命，应由本党主持，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

以上两点，是蒋同志当时的根本思想。因为有了这样的根本思想，所以听得关于中山舰之一方面的报告，便有触即发，后来虽然知道这一方面的报告，是不实的，但借此裁抑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也未为非策，所以就这样的干下去了。试看三月二十日以后的事，都是跟着这条线路来的。就容共来说，规定了跨党分子，不得为本党最高党部的部长，因此撵走了组织部长谭平山等。蒋同志以为如此已可裁抑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了。容共政策并没改变，跨党分子仍然存在，而且还提议开两党联席会议。就联俄来说，罗加觉夫基散嘉都撵走了，蒋同志以为如此已为裁抑苏俄顾问之势力增长了。联俄政策并没改变，鲍罗廷加伦依然受蒋同志之欢迎，而且还在黄埔军校演说有“愿受第三国际指导”的话。

此外还附带着一件事，便是解散了孙青两会，另外组织黄埔同学会。本来孙青两会的轧轹，其主原因，是由国共两党的问题而起，其副原因，则是由孙青两会分子之积不相能。蒋同志以为国共两党问题，既得了相当的办法，便趁此解散了孙青两会，另外组织黄埔同学会，统一了基本军队的意志，以便同心协力，为国民革命而奋斗，这种意思，蒋同志在黄埔同学会的演说里，已经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

以上是我所认为三月二十日之事的真正原因，至于蒋同志当时何以独断独行未尝谋之于我呢，就事后蒋同志给我的手书看来，是虑我不能同意，以致不能进行，所以只得自己独断独行的做去。

如今且就三月二十日之事，下些批评。

我还记得当三月二十日之事发生后，西山会议派高兴得了不得，曾发出一个嘉奖蒋同志的电报。以后看见蒋同志依然继续联俄容共政策，方才复归于攻击的态度。不但西山会议派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为蒋同志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横竖三月二十日之事已经给联俄容共政策以一个打击，何不直截了当抛弃联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后又酝酿爆发出无穷纠纷呢。这些说话，完全没有体察当时的环境。须知道当时一方面正和帝国主义军阀及反革命者作战，一方面又拆散了自己的联合战线，这是何等的危险。“夹攻中之奋斗”，是苦语不是壮语。处在夹攻的形势中，固然要整顿全神，悉力作战，抱着一个不计成败利钝的念头，也要审度形势，分出个缓急先后，方才能将敌人各个击破。自从总理定下联俄容共政策以来，有些同志，无心和帝国主义军阀及反革命者作战的，当然只有看到联俄容共政策越早抛弃越好，至于那些正和帝国主义军阀及反革命者作战的同志，如何能不顾虑到自己的联合战线发生动摇，授敌人以间隙呢？所以蒋同志当时之不能抛弃联俄容共政策，实是环境所不得不然，无足为异的。岂但三月二十日以后是如此，便是去年四月间，蒋同志决心分共的时候，还说并没有抛弃联俄政策，直至去年十二月方才在第四次中

央全体会议预备会议席上，提议对俄绝交啊。

然则我于当时，何以不于事后赞同蒋同志之断然处置呢？我曾想过，假使蒋同志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将这办法，征我同意，我便怎样？我还是赞同，和蒋同志一致行动呢？还是拒绝，和蒋同志决裂呢？我不可不严格的自己审问自己一番。国共两党之合作，任何一方面，都知道是暂时的局面，不是永久的局面，但一度联合战线之后，到何程度，到何时候，方才拆开，始为恰当，则人人所见不能一致。不但本党里头，为了这个，生出无穷的纠纷，便是共产党里头，也为了这个，生出不断的争执。关于共产党的，不用说了。关于本党里头的，几乎可以说是改组以来种种复杂变化的一个总原因。所以我此时如果将自己审问自己的话，向先生说出来，倒不如将我以后所做出来的事情，来做个证明，较为适当。我于去年四月初旬在上海的时候不是拒绝过蒋同志等“不待中央决议即举行清党”的主张么？我于去年七月间在武汉不是向中央提议实行分共么？我于向中央提议以前，先约同非共产之中央委员，开了十几次的谈话会，取得大多数之后，又召集非中央委员之重要同志，军人非军人都在内，作了种种的说明，及作了种种的准备之后，方才向中央提议。通过之后，方才实行。我这样做法，或者有人以为“迟慢”，以为“容易误事”。但我总以为应该如此。便是赐我一个“党纪先生”的头衔，尽情丑诋，我还是总以为应该如此。明白了这一层，就可以知道我于三月二十日以后，所以不能事后赞同蒋同志之断然处置的缘故了。中央之没有威权，由来已久，不独北京政府为然，国民党所树立的政府，也是如此。自从总理于十三年春间改组国民党以后，方才将权力渐渐集中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是杨希闵刘震寰犹在，党的权力不能实现于军事政治各方面。及十四年夏间，杨刘扫灭，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凡事都根据着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努力奉行。于是党的权力，方才渐渐的实现于军事政治各方面，广东方才得以统一，到了十五年二三月间，广西也来一致结合了，湖南也来联络进行了，北伐大业渐渐的也有了基础了。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三月二十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三月二十日，第二师团党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我的责任，应该怎样？我这时候，以为不问这事情做得错与不错，而这件事情做法，不能说是不错。我只责己而不责人，我以为皆我不能尽职所致，所以引咎辞职。恰好蒋同志也在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里，自请处分。如此地，中央威权犹在，我和蒋同志，也不致因这事情而至于决裂了。

以上是说明我于三月二十日之事的态度。我这种态度，始终是一样的，就是蒋同志等在去年四月十五日所做的事，我以为不问这事情做得错与不错，而这件事情的做法，不能说是不错。这样事情，也不待中央决议，便断然去做，则中央要来何用？所以这一回，我便不幸的和蒋同志决裂了。及至去年十二月间，蒋同志于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进行困难的时候，诚诚恳恳的，出来维护，对于武装同志，谆谆忠告，以为武装同志，离开了党，便成为军阀，这一番忠告，至少又使一班武装同志，怀了忌惮，不敢阻挠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进行。我对于蒋同志，完全谅解，所以于去年十二月十日，有催促蒋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之提议。

事至今日，特别委员会已取消了，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已开会了。蒋同志在中央里

头，为党务政治军事之领袖，负起责任，以戮力于国民革命之进行了。从前旧事，一笔勾消，已无复提起之必要。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先生来信，郑重问及，想是这个意思。我便就我所知，一一答复，于旧事重提的时候，不掺杂一毫客气，务求明白事实之真相而已。此致，革命的敬礼！

汪兆铭谨启　五月十八日

〔附〕林柏生致汪精卫书

精卫先生：顷由留欧通讯社四月七日通讯，得读先生三月二十九日致此间四十一号总支部复书，捧诵再三，欣慰无似。本党自十三年改组，至今虽仅四载，然就革命的观点言之，实中国革命史上一最重要的阶段。

先生将改组的精神，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奋斗之经过，三月二十日之变，汉宁之战以至于广州事件，及蒋介石同志之复职，分列十余项，详释其因果变迁之关系，实为本党自改组以来最重要之历史的文据。且本党所负历史之使命，自推翻封建制度以至于民生主义之最终建设，包括一极长期之历史的进程。惟其如此，故在本党领导下之民众，其所代表之社会阶级性至复杂，亦惟其如此，故本党既非代表任何单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若干阶级之临时联合斗争机关，共产党人常作如是说，以便利其背叛本党之企图，愚意此乃清厘本党理论应注意之一点）。质言之，本党之目的，在于集中被压迫民族中各阶级之最觉悟的革命分子，组织之，训练之，使成为一“超阶级”的革命党，以负起中国底及世界底历史的无间的革命之责任，社会是演进的，革命是无间的，则本党自身——不是它所代表的及领导的民众——必须为“超阶级”的结合，然后能依照社会底演进，完成革命进程上多阶级之历史的使命，其理至明。谓本党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及棒喝团，——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固谬，谓本党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如德之社会民主党，——尤谬。至若戴季陶之孔教民生哲学，——相当于英国之基督教社会主义，——李石曾之蒲鲁东化的孙文主义，则更为穿凿附会！然于此吾人犹有应注意者，则“超阶级”性的结合，其形成当较任何单阶级性或复阶级性的结合为尤难（但非绝不可能）。故在未结合为最严密的超阶级性的组织之前，本党党员倾向之复杂，自是客观事实上不可避免之事，社会力量之分配与社会进化之程度有关。社会每经一度之进化，社会力量即起一回新的分化与综合，世界革命史上以革命而始者竟以反革命而终之事变，层出不穷。以此本党自总理首创革命以来，中经几许的分化与改组，三十余年始成今日之雏形，亦即以此，而“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般忠实同志在总理指导之下努力奋斗，使本党之组织与纪律日加严整”，然此组织与纪律即为跋扈武人与腐化分子所最仇视不忘者，而同时共产党人为求达其篡夺本党之目的，则又仅望本党有空洞的躯壳无充实的精神。故自总理逝世后，一方面跋扈武人与腐化分子既勾结一切封建势力，与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建立封建的与资产的联合专政；他方面共产党徒复乘机煽惑半封建底非纯粹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利

用一切土棍地痞流氓捣乱社会安宁，冀以人工造成“中国之莫斯科的苏维埃化。”数年来中国革命之进展无日不在此两种倾向之剧烈的斗争中，间有一部分以中派自居的同志，——大都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又往往欲以左右纵横的手段，造成中国革命之“罗伯斯比”，以柏观之，此种倾向纵能防恶化之危险，终必令本党断丧于跋扈武人与腐化分子。盖所谓中派，其政治主张社会基础本至动摇，究其终极必降服于右派可无疑也！试观四次会后，跋扈武人日益猖獗，腐化分子充斥各地，可了然矣。处此情况之下，究将何以寻求出路耶；跋扈武人腐化分子为吾中蠹贼，党中蠹贼为本党组织与纪律最大的敌人，据过去以测将来，则先生此书，实示吾人以今后奋斗之方针，固不特一重要的革命史料也。惟柏于此时期中各次之事变尚有未能了然者，厥为三月二十之变，盖此时柏尚远在莫斯科，虽微有所闻，然皆路听途说，殊不足靠，返国后询诸同志，则又众议纷纭，莫衷一是，语其大要约有五端：

一、共产党欲建立工农政府，故蒋不能不以断然的手段处置之。

二、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冲突日甚，蒋为免除军中纠纷，故解散两会，另组黄埔同学会，共产党政治工作人员悉令退伍。

三、西山派联蒋以倒汪，共产党联汪以倒蒋。

四、蒋主张北伐，鲍罗廷反对甚力，故蒋欲去共，共亦欲倒蒋。

五、先生因袒共，故愤而去国。

然此强半臆断之词。（第五项之纯属诬蔑，尤为明显。曾忆在俄时，孙文大学教务主任亚哥尔，曾以孙大共产党书记名义，向柏询及先生去国后地址，并谓系第三国际委员询问者，柏答不知。复谓倘将来吾人——俄人亚哥尔自称——仍未能知，可否代为访查。柏以九月十六日离俄，此谈话系在八月念间，则由四月以至九月第三国际犹未知先生所在，未能与先生通音问，而谓先生因袒共而去国，谁则信之。）惟亦不无应研究之点。谓共产党即欲建立工农政府，未免神经过敏。谓共产党全无动作，亦殊弗可。事变之后，被遣归俄之某顾问，曾对某同志言：双方均有错误，言外之意，概可想见，反之若谓蒋之处置纯为对付共党问题，则何以事后竟仍有受第三国际之语，及设立联席会议之议。凡此种种，皆柏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因将访询所得，并述之以问于先生。倘先生于休养之余，能为之告则幸甚。专此，谨致

革命的敬礼。

林柏生上　五月二日

（原载《汪精卫集》4卷）

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鉴：

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剥削之下，国民革命之需要迫切万分；中国社会中一切革命分子正须建立强有力之联合战线。本党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久已认定处此世界社会革命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平民之唯一职任，即为实行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与国际帝国主义以巨大之打击，一方面解放中国民族，别方面即为完成世界革命。本党之此种政策实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之阶段及世界政治之趋势，乃一整个的历史时期中之根本工作，决非临时应付或利用之手段也。

贵党于中国历史上有革命之伟大功绩，辛亥失败以后，仍能继续为被压迫人民奋斗；本党认为此种奋斗之目的，在于完成辛亥革命，彻底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下，此不仅为　贵党现时之历史使命，抑且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本党之职任。

故本党与　贵党合作之政策早经明白确定，盖此即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唯是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实在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凡足以达此目的者，即为适当之方法，原不拘拘于形式。然当本党决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之于　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现亦可适用此种合作方式，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　贵党，同时，本党与　贵党结政治上之联盟。自此以后，吾两党革命之联盟已于三年来引导中国民众，努力奋斗，五卅运动之蹶起，国民政府之成立，以及军阀之崩败，国民军之形成，皆使革命势力得极广大之发展；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恐惧战栗于吾人联合战线之下，然彼等既利于国民革命战线之破裂，以灭杀中国民众之革命力量，乃日施其造谣离间挑拨反赤之伎俩。五卅运动至于今日，帝国主义既已利用反动军阀征服国民军而攫取中国政权，对于民众施以严重的压迫及屠杀，且已从湖南着手开始四方围攻　贵党执政之广州国民政府，以为彻底消灭革命势力之计。自然更在阴谋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勾结革命政府所在地之内奸，从内部摧毁　贵党；彼等意欲以卑劣手段，利用反动分子攫取广州政权，如此外攻内应，以摧残中国之革命。因此，现时中国之革命势力，实在危殆至于极点。故吾两党之共同职任，即在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其内部，反抗以至于推翻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当此英日吴张战胜而形成反动统治并在日谋力讨所谓北赤南赤之时，吾人尤当集中全力于反抗其压迫革命势力及民众之斗争，且领导一般党外的民众，使集合于国民革命之战线。今　贵党于本年五月十

五日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亦尝报告及此，然因党内纠纷，不无特别侧重于“党务整理”问题之处。帝国主义者见之或且疑为 贵党已中其奸计而自破革命战线，表现右倾，因而私心欣幸，俟机欲动，然 贵党之出此，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份人之疑虑猜忌，致使为反动派所乘，散乱革命之阵线，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祛除一般无谓之疑忌，然后决然肃清内部，打击反动派，方能整齐革命之战线，以全力对待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与压迫乎？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此原则为何，即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不问其团结及合作之方式为何也。果若此，则吾两党联盟之根本精神，不因反动派之分裂政策而稍减，帝国主义之欣幸．适足以自暴其奸而愚矣。

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 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 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 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党务整理案”中，关于以后两党合作方式之问题，则吾两党本为革命联盟中之友军，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总之，当此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征服中国压迫民众之际，革命势力遇此，正在酝酿磅礴之时，吾人双方俱负有历史上重大艰巨之使命与责任，愿 贵党于“整理党务”之后，更加努力奋斗，肃清反动，巩固内部，与吾人及一般民众结合伟大广泛之革命的联合战线，有明确之政策，积极之行动，勿为帝国主义者所乘，则中国革命之幸也。专此，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

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广州通信）

乐生（赵世炎）

国民党中央最高干部，自本月十五日起，举行第二次会议，至今已将结束了。当此全国反动势力压迫民众，革命问题十分紧张之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有此会议，在事前殊引起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与盼望，因为在形式上国民党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之大党，自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甚为民众所属望。所以在此次会议中，民众至少所盼望的是国民党最高干部对于目前政局，是如何的意见，有如何的分析，具如何的策略，提出如何的口号，使民众如何的奋斗。这并没有一点苛责或奢望，只是一种常识，民众对于一个政党，当然只有如此认识：譬如每当政变之时，连辛亥俱乐部、新社会民主党、上海总商会还有些意见发表，何况国民党？所以在开会以前，广州的平民群众也如此属望的。

但是等到开会那天，广州城内忽然满城风雨的："共产"谣言，甚至于有阴谋反革命分子去运动罢市，广州中央银行也挤兑起来，当时各种各式奇怪的谣言发生，或者说五月十五日民党中央将宣布共产，或者说会后将没收商人财产；运动罢市的人便说非胡汉民当权不能保财产田宅，煽惑挤兑中央银行的人便说非杀尽共产党，蒋介石始终受包围，银行一切存款，都要没收。这种谣言街头巷口，时常可以听见。三月二十日之役后，反动派的阴谋未告成功，香港帝国主义者，也高兴了很少的时间。民党右派分子仍旧有些郁郁不快；五月十五之前便发生了一种理论，说是民党本无左右派，完全是共产党挑拨，这次会议左派既占多数，共派想必又要利用他们打击右派，实行赤化国民党。这种谣言和议论风传后，广州忽然宣布戒严，空气紧张到万分，银行挤兑，军警梭巡，于是社会上对于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感想，便弄得恍惚模糊，莫名其妙：也不知道这次会议究竟是共产党讨论实行共产呢，还是反革命预备杀共产党？

等到该会宣布开会，政治报告之后，关于现时革命策略，北伐问题等，固然没有讨论，关于实行共产，更是一字也没有提起，大家仿佛松了一口气似的；但是殷殷属望的民众，等待正确明显详尽的革命方针的议决案，对于颜内阁的态度，关于护宪问题的表示……等，待到该会开完，还是没有！一般广州民众，明白的革命的一般人民，都明知道中国现时没有什么实行共产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同样的明了：现时的紧迫问题，是怎样抵御英日帝国主义和吴张之反革命；他们并且要求知道广州的革命力量究竟怎样，革命势力内部的纠纷，是否会被帝国主义者利用，而毁灭广州的革命根据地。民党中央会议对于这些问题至今还无明确的答案。如果有，亦许只有对于最后一问题的，即广州革命力量的情形。

是的！民党中央这次会议，表示了些该党内部的各派实力的关系。民党之中向来有许多派别，民元以来国会中许多小政团，自称为民党者甚多，确系民党分化出来，堕落下去的也不少，就广东护法以来的历次政府之中，也有好几派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之后，许多十分腐败堕落的分子固然大半刷除了，但是余留下来的这种成份也还有些；同时第一次大会之前，已有共产主义者加入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第一次大会之后共产派当然因民党政纲之明确规定而更加增多。第一次大会后政纲既确定，又受民众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的冲动，新生的和旧有的左派日益团结巩固起来。民党中之有派别，在中国各阶级联合革命的过程里，当然是无足怪的很自然的现象。第一次大会明白确定赞助工农，并且更加明确的恢复了民元以来为妥协派（黄、宋）所抹杀、为一般党员所遗忘的平均地权主张，再加之以新定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代表买办土豪阶级之冯自由派，便首先发难，反对国民党的赤化，以一切“罪名”，如反帝国主义等，加之于共产派，要求开除。嗣后谢持等又从而附和之。第一届中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便讨论这一反共的纠纷问题。当时正是商团（买办阶级）反革命暴动之时，买办阶级失败，英帝国主义的气焰受一次挫折，冯自由也就被开除，而谢持等反共运动，便亦暂告停顿。民党内这种反动派从北京政变之后，历次受大大打击而消沉，尤其是廖案之后。五卅以还，中国无产阶级势力大增，国民党左派得其政治上的赞助，而得形成国民政府。中国资产阶级便因恐惧而退缩，国民党中也有所谓戴季陶主义发现。随后帝国主义由守而攻，联合主张实行反革命战争，自然而然，民党中买办土豪阶级的反动派及机会主义的右派应命而联合于假借戴季陶主义名义下，召集西山会议开除汪精卫及共产派。随后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表现充分的左倾，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共产派虽减少，而左派势力大增。西山会议派亦召集自己的大会于上海。不过，在这时候北京三月十八日屠杀，国民军败，民众革命运动亦受摧残；广州又有三月二十日反动派之阴谋捣乱，诬陷共产派之事；并且汪精卫也因“病”离粤。——因此，机会主义派中便有些不公开的参加上海大会，这是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前之内部纠纷的情形，亦就是民党革命力量之消长分合的情形。

这次民党中央会议之前既有党内各派斗争这种历史关系，又有开会前反动派的捣乱造谣威胁，于是这次会议不期然而然的以全力注重于所谓“党务整理案”。开会之前，西山会议派之预留回粤地步者，纷纷都到了广州，甚至于曾经出席于西山会议又出席上海大会被选为右派中央委员之邵元冲等亦去活动。……会外空气之紧张和会后运筹帷幄之努力，都使主持民党中央者专注意于“党务”。这次会议便全被“整理案”党务所占据。左派无形之中受四围空气之压迫，虽占多数而不能进展。其中颇有愤愤不平的，有说：“向来反对共派党团作用的人，如今却自己在背后执行党团作用了！向来以捣乱秩序诬陷共派的人，如今更自己指挥造谣捣乱！难道因有共产谣言，我们中央便应当专事抑制共派以自洗刷吗？帝国主义者见着我们这种情形，真正高兴，我们算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整理党务案究竟是什么呢？蒋介石对于三月二十日事件自请处分（中央议决免议），同时，提出其整理党务案。其中重要之点即限制共派在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派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他党加入民党者须将其原存党笈报告；推举代表邀请共党设联席会议①，请共产党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民党主席保存。并议决选举中央主席。这些议决在前两天的原提案还要复杂些，字句还要严

重些，提案后经历次修改才改到现在公布的条文。可是此地报纸不得中央委员会许可，早已将草案原文公布，此等底稿，究系何人取出公布，现尚未调查明白。

这一议案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用不着多所解释；这是左右反动各派的一个很复杂的斗争。西山会议议案的精神亦可以说有部分的实现了；可是，反动派还并不因此而骤然得势。

此次会议中，亦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可以一述。右派在国民党中仍然存在，是一件事实，本不是可以否认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左派之胜利，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勇于团结的好现象，此时右派无地自容，所以又有右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另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全中国的国民，都知道这个右派，右派的行动和消息，京、沪各地的报纸，都大书右派，加以分别，这并不是别人可以捏造的。但在这次会议中，偏有一位孙科要提出一个议决案，要禁止以后国民党有左右之分，结果遭了否决。孙科在会议中，且用口头说明，提出本报独秀的论文，指为有意挑拨，而实际独秀那一篇“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分析，是根据于事实，是十分正确的。所以左派与共产派俱在会议中，反驳孙科提议之无理。共产派除从理论上解释左右派的原因外，并从历史上与事实上加以说明；左派则痛责俱乐部的组织与另立一党的右派行为之荒谬。此案之结果虽被否决，但在事实上又一次证明反动派之行为的表现。

至于左派，当然受四围种种束缚，如共产谣言，军事暴动的谣言等，可是，左派与共产派的联盟很巩固，一般民众，如最近农工学商联合会议，都赞助左派政策。可见单是这一中央会议的党务一案，还不足决定民党中央的右倾。最近（二十六日）民党中央已有对时局宣言发表，大半只是偏重于该党内部解释纠纷意义的说明，中有“本届中央委员，深信此议决案，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语。所以虽然整理党务案本文之中，很明显的有机会主义之渗人，而民党革命力量之前途，还要看以后“与反动派战斗”一语之实行如何而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与不革命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之胜负，至少在南方很和民党中央里左派及机会主义派势力之消长有密切的关系。机会主义派是否能对于打击反动派之事不多所牵制呢？

共产派认清革命的现时形势，要求极巩固的极彻底的革命联合战线，他们在此地对于民党中央的新议决案的态度，便以此为标准。民党中央会议中的共产系（Fracfion），在开会时对于民党内部组织问题，如委员人数分配及担任部务之义务等，毫没有甚么争执；并且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亦有宣言发表，说明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及与民党合作之意义。至于民党内部问题，共产党不加可否，正如民党对于共产党党务不应干涉相同。

总之，这次会议的结果，既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的宣言，又非根本推翻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当然他们留给会后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变更的问题，乃是民党中央是否决然打击反动派，巩固革命战线，以实行不幸现在竟不能实行的国民党的天职——做中国民众的先锋，反抗英日吴张征服中国的战争和统治，集中全国一切革命力量以达到召集国民会议，打倒贿选国会系统的北京现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中国民族的经济政治于帝国主义之下。

（原载《向导》157期，1926年6月9日出版）

① 由国民党与共产党所組織之联席会議——編者。

〔附〕中国国民党整理党务之训令

本党遵循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负荷领导全国被压迫各阶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任。在此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日益鸱张之环境之险恶，实足以使本党每一同志，均懔然于革命势力团结之急要，知非全党之意志精神，完全归于一致，必不能应付此严重之时局，以为我被压迫民众，谋解放之道。乃本党自总理主张改组以来，虽一方因同志之奋斗努力，颇有益于全国民众之革命化；然同时以四志之中，亦未能尽免幼稚与落后之弊，亦惹起甚多无谓之纠纷，以致反妨碍本党各种正当工作，有时且摇动及于本党革命之基础。此我全体同志所宜一致觉悔而改正者也。本党之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为总理所特许，其时同志有因疑惑而起纠纷者，屡经总理剀切晓谕，说明本党所以容纳共产党员之故。十三年八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共产党加入问题，曾有极明了之决议，其要点：第一说明本党为代表各阶级，共同于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三民主义政党，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第二说明本党章程规定，"凡志愿接收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加入本党所辖之党部，依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故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此章程之规定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若其行动违反党纲章程，则不问其思想上属何派别，概当以本党纪律绳之。第三说明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乃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故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同一部，吾人即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本党之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十四年五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宣言接受总理遗嘱以后，又发布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引正上述之三要点，而加结论。谓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惟既加入本党，在取本党党笈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嘱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判之，而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动摇本党最高原则，即为三民主义。盖两年以来，因共产党加入本党，而引起之疑虑与纠纷，始终不绝，而本党之所以训勉各同志者，一以总理之意志为依归：一方求全国革命分子之集中，一方求本党最原则之确定，亦始终不懈也。至本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于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第八项，为下列之规定：革命的势力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所以承认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以后凡有此类争议，须在党部指导与监督之下，用公开的形式，共同讨论，务使一切误解，得到合理与满意之解决，惟不容有感情攻讦的行为，致危及革命势力集中根本政策。我全体同志，能依此进行，本不难在国民革命事业中，收同力合作之效。乃数月以来，党员间之纠纷，仍未尽释，疑虑亦未尽释，而环境之险恶，则更甚于前。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痛念本党与国民革命前途之艰巨，又深知我同志并非漠视本党三令五申之原则；而实未有具体之办法，足以消释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乃经过极郑重之讨论，成立整理党务案凡四。

此次议决案之精神，固完全根据总理容纳一切革命分子之政策，与本党历次之决议，而其拥护本党最高原则，改善党员合作办法，统一革命指挥机关，尤皆为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也。我全体同志，应知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为解放全国民众之唯一方法，非以最坚决之信心，为最奋勉之努力，无由达其历史之任务，而中国之国民革命，尤为世界的革命民众之互助提携，则联合各阶级之革命分子，一致为国民革命努力宁非必要。我全体同志，于接受此整理党务各案之际，必以最亲爱互信之精神，确定各阶级共同奋斗之基础，永绝党内之纷争，以应付目前最严重之时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深切感受我同志之能否改善精进，实本党存亡与国民革命成败所关，深不愿于整理党务有具体办法之后，而犹有执持私见，以梗阻国民革命之进行者。不幸而竟有之，则亦惟执纪律以绳其后，愿我全体同志共勉之。

（原载《政治周报》14期，1926年6月5日出版）

〔附〕整理党务决议案

一

吾人为求革命势力之集中与革命工作之完成，深信有与国内各阶级革命分子联合进行之必要。同时在此一二年中依事实之教训，合作之经验，深知同一进程之中，一切合作的个体间，苟无互信的规约，互助的保障，以道德的基念，公忠的精神，为合作信约，共同遵守，必牵制时起，误会滋生。初则因内部不安，减少革命能力，继则因能力相消，同为敌人所摧残。吾人痛念总理当日主张合作之初衷，决不如此。中国共产党为革命集团。中国国民党亦为革命集团。共产党员认国民革命为必经之过程，毅然加入于国民党，国民党信共产党员能努力于国民革命，欣然许其加入。持此光明正大之心理以合作，本无牵制误会之可言。乃两年以来，实际之表示竟不如此，此非合作之咎，乃不善合作之咎也。吾人须遵守总理之主张，不忍两党合作之美意，至此失坠，革命势力之集中，至此分裂，特提出整理党事案，如左：

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

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

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

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

以上四事，吾人认为合作之理论基点，为实现此基点之意义，解除本党内部之纠纷计，特提议组织国民党共产党之联席会议，其组织大纲，别定之。总期两党党员不再有违背规约之行为，而后革命集团之合作，得臻于圆满焉。

二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

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三

（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因革命进行之需要，暂设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

（二）常务委员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于本会委员及监察委员中选任之。

（三）常务委员会主席职权如下：（甲）常务委员会开会时为其主席；（乙）依照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名册，妥为保存；（丙）督促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机关各部长之进行。

（四）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设置，应否继续，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下次开会时决定之。

四

全部党员依以下之规定从新登记：

（一）全部党员应在中央命令组织之党部从新登记。

（二）登记机关指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

（三）登记时间定为三个月，但海外党部登记时间，由海外部另行规定之。

（四）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切宣言，及议决案。

（五）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者，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

（原载《政治周报》14期，1926年6月5日出版）

〔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信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

敬启者：查本党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为求中国共产党员与中国国民党员以道德的基念公忠的精神为合作信约共同遵守以蕲革命势力之集中与革命工作之进展起见，议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基此规定，本党业于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选举张静江、谭延闿、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五同志为本党出席联席会议代表在案。特此奉告，并请　贵执行委员会批定代表三名，并于推定后通知敝处，俾得早日成立。无任企祷！

此　　　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

六月十九日

〔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一、国民政府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航空各军，　均其统辖；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须完全负责；三、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四、总司令部参谋长，以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任之，或由总司令呈请国民政府委任之；五、总司令部设置参事厅，以参谋长、总参议、高等顾问若干人组织之，参赞戎机，襄助总司令处理进行事宜；六、总司令部设于军事委员会内，以作战之进步，随时进出于前方；七、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事部、海军部、航空局、兵工厂等各军事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八、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九、总司令出征时，设立治安委员会，代行总司令职权，该会受政治委员会之指挥，其议决案关于军事者，交由总司令部执行之；十、总司令部之编制及规则另定之。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原载《军事政治月刊》4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3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533
SS号=10273505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关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
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1925年1月）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1925年6月）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1925年7月10日）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1925年8月18日）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1925年9月）
上海总工会告全体工友（1925年6月1日）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1925年6月7日）
上海总工会致各工会通告（1925年6月25日）
上海总工会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1925年8月10日）
〔附〕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1925年）&超麟
五卅运动中上海罢工调查&上海总工会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1925年6月）&瞿秋白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5年9月）&瞿秋白
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1925年12月）&瞿秋白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1926年1月22日）&瞿秋白
〔附〕实业界对于学生之希望（1925年）&穆藕初
解决五卅案之我见&穆藕初
我们应该怎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摘录）&梁启超
高调与责任（摘录）（1925年6月）&丁文江
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胡适
中共中央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1926年3月20日）
中共中央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1926年5月30日）
“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1926年2月）&邓中夏
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1926年4月10日）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1926年5月）&刘少奇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1926年5月）
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1926年5月）
〔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1926年5月13日）&乐生
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1926年8月）&邓中夏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1924年7月）&挥代英
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1924年9月23日）&巨缘
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11月）&《向导》社记者
中山北上后之广东（1924年12月31日）&周恩来
国民党底分析（1924年12月）&陈潭秋
〔附〕邓泽如写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1923年11月29日）
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1924年6月18日）